
邓鹏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下卷
無聲的群落
续
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邓鹏 / 主编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無聲的群落（续）

“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

下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的群落：续编 /邓鹏主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9
ISBN 978－7－229－01214－4

Ⅰ. 无… Ⅱ. 邓… Ⅲ. 回忆录－中国－当代 Ⅳ.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451 号

无声的群落（续编）
WUSHENG DE QUNLUO
邓 鹏 主编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戴前锋
责任校对：何建云
封面题字：丁重九
插　　图：甘 铭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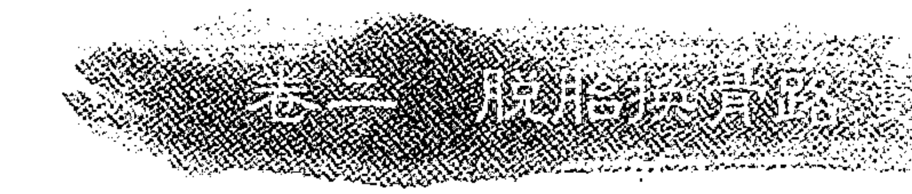
开本：787mm × 1 092mm 1/16 印张：58 字数：1070 千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套
ISBN 978－7－229－01214－4
定价：97.00 元 / 套（上下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上卷

目录



卷三



卷四　见证乱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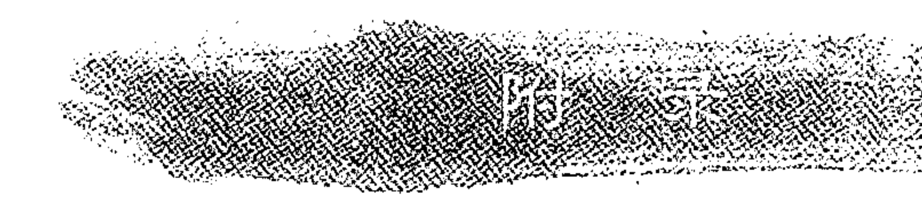
下 卷

卷五　生命的驿站

卷六　铭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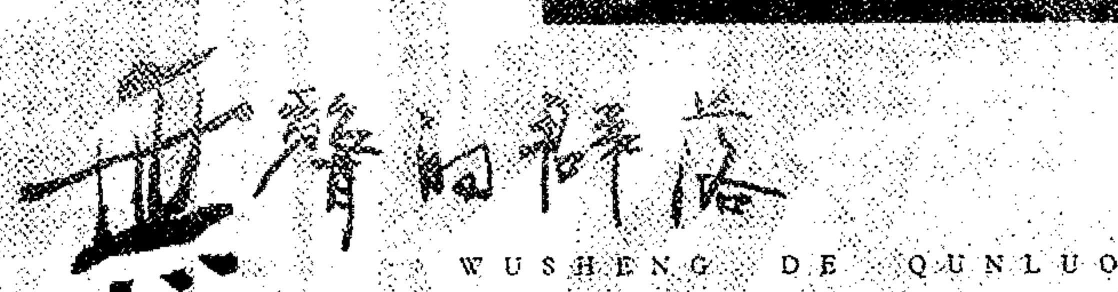
卷七 守望心灵

卷八 青春之歌——老知青


附 录

人生像一次长途旅行，他们一路艰苦跋涉、风餐露宿，同时也领略了这大千世界的万种风情。





卷五 生命的驿站

生命的驿站

张健夫

一

8月，骄阳似火，将整个大地烤得焦干焦干。漂泊中的我，走着走着突然倒在了湘南小镇冷水滩那条凹凸不平的街道上。

脑子里突然出现一片混沌：红黑两色交叉显现，各种状似人形的怪物在互相撕打，然后，猛地齐齐地正对着我，咧开血盆大嘴向我发出狞笑，伸出无数有着长长青指甲的手渐行渐近地向我的脖子靠拢。我只感觉窒息，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怖。由于很热，有液体从脸颊上流下。我想可能是汗吧，随意抹抹，黏糊糊的，夹杂点腥味。血，那是血！我努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想呐喊一声，以便驱去眼前那真真实实的恐怖。我历来内向，实在是老外婆的一句"驱邪"的话提醒了我：感到害怕时，你就喊！

但是，我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因为从我身边走过去的人，根本不屑于瞟我一眼，仍然在赶他们的路，仍然在优哉游哉地踱步，我躺着的地方在路人眼中似乎是一块无物的空白之地。我的精神世界里复又增加了另一种恐怖：孤独，命运之神已经将我孤独地抛落在荒凉的大漠中。

我猛地大叫了一声。随即，那些怪物消失了，满脑子都是橘黄橘黄的光在闪烁……

二

听到有人在轻轻地呼唤我，是那种久违的普通话，亲切而有点苍老。继之，又听到"普通话"的一声叹息："这孩子病了，也饿得太厉害！"

迷糊中，有人在搀着我坐起来，然后使劲一提，居然让我站起来了。连拖带搀她进了一个大门，坐在一张四面摆着长凳的方桌边。我努力地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一位鼻子有点破损的中年人，头发有点花白，平头。他两只审慎的眼睛镶在那张突显沧桑的脸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你哪人？"中年人开始问我。

"……"我没有出声，心想兵荒马乱的时候，最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嗨，小伙子，你嘴唇都烧白了。饿昏了？"感觉他在摸我的额头，声音一变审问的口吻，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我只觉得全身在燃烧，软绵绵的。

我嘴里嗫嚅出两个字："长沙……"中年人将耳朵贴到我的嘴边，终于听明白了我说的两个字。"我可是在长沙工作过几年的啊，你讲几个地方给我听听！"他似乎仍然保持了某种警惕。

"五一路、清水塘。"我像接受考试般地将两个地名脱口而出。

喝了点他递来的水以后，胃虽然仍饿得发痛，但神志却完全清醒过来。我看见他一转身，一招手："来一碗白糖稀饭、十个馒头！"

中年人告诉我，他坐在饭店已经观察我多时。

我昏倒街头多时了？

三

我记起来了：江永这该死的8月！武斗连天，杀人的事不断传来。为避血光之灾，三天前和四个知青仓皇夜逃，想到长沙老家去躲躲。几个伙计身上合起来仅有四元六毛钱，过道县的时候，早就囊空如洗。当时的道县正是"八月大屠杀"的发源之地，满街行走的都是一些荷枪实弹的"抗暴"造反派。只要是看见陌生面孔，只要听见说的是长沙话，一律捆起，一律用鬼头刀砍脑袋，然后一律抛到潇江河里喂鱼。这些造反派的"壮举"被当时的革命理论延伸为"彻底清除阶级敌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恐怖的传说如噩梦般缠绕着还留在江永的长沙知青。事实上，也有几个长沙男知青不幸成了这种"革命理论"祭坛品。于是，我们再也顾不上中央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号令了。命要紧，跑一个是一个。

因为没有钱，只得选择最为凶险的大路逃亡，而道县正是横亘在我们"胜利大逃亡"的必经之处。我们的如意算盘是，期盼在路上能碰到一个好心的司机，哀求他将我们带到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或是广西泉洲。只要有火车，我们爬也要爬回长沙。

然而,我们躲躲闪闪、迤逦行至道县时,“菜包子”一句地道的长沙话:“健鳖,到县城看看吧?”顷刻引来两名手持“半自动”的造反派的盘查。我的土话本讲得不赖,赶忙迎上去递根“经济烟”。一顿叽哩呱啦的江永土话讲起,向对方说明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组织的,要押着这长沙“狗崽子”蔡其政去长沙落实外调问题。我们在农村已经生活好几年了,一身标准的当地装束不露半点破绽。他们虽有些狐疑,却侧身让开了路。

千不该万不该,我们脱险后真不该再走大路。未及一根烟工夫,只听见身后几声清脆的枪响。正惊愕间,只见一辆解放牌车满载着一车人,一路胡乱放枪,一路吆喝,疾驰而来。显然,那两个“半自动”参透了我们外调的把戏,叫了一车人,是来将我们捉拿归案的。

只要被捉,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来不及作什么逃跑部署,我一声“分散下公路!”就一轰而作鸟兽散了。此刻,在五中读书时踢足球充任左边锋的速度帮了我的忙,只感觉子弹在头顶炸开,两只脚像安了马达般飞速地迈动,只用十几分钟便转过山坳,脱了险境。菩萨保佑,我的身上没有被钻个洞,真是老天爷有眼!

待到我茫然四顾时,知青伙伴们早不见踪影,自己已是孑然一身。漂泊中两天过去,身无分文,一身褴褛,活脱脱是个叫花子模样。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行至靠近零陵的一个村庄时,一位慈祥的老奶奶给了我两个叶子包的糯米粑粑,并且叫她16岁的孙子带了我一段路。多亏这两个粑粑,让我顽强支撑着步行到了有火车靠站的冷水滩。

记忆中,我是想直接扒车回长沙。但是,我还是昨天咽下最后一口糯米粑粑的,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沾,饥饿早将我的躯体拆开。头皮发紧,冒的是虚汗;身体僵硬,腿是软绵绵的。几次拥在乱哄哄的人群中企图溜上车,都被喧嚣的人群无情地挤开。我跌坐在月台边的一根枕木上,大汗淋漓,视野模糊地看着一列列风驰电掣的火车从眼前掠过,却无力上去攀爬。我感觉到了自己独有的世界末日,我似乎像一颗陨落的星辰落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原。

于是,那些红黑两色的人状怪物在我脑海里轰然而至……

四

“吃吧,慢慢来。”中年人轻声的催促一下惊醒了我。

我回忆起那次的吃相至今仍然羞愧难当,人的礼仪在饥饿面前会荡然无存。用“电光石火”来形容自己两手拿馒头塞向嘴里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夸张。中年人笑起来了,学着电影里的日本腔说我“战术的不懂,会把肚子大大的吃坏”。看着他用手有力地一挥,感觉他有点像军人。

果然,中年人说他姓吕,河北人,曾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营长。1949年南下后再也

没有回过老家，曾在南方的几个城市待过，因为“随媳妇的愿”来到冷水滩定居，现在冷水滩某招待所工作。他要我叫他“吕叔”。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后的我，顿时感觉年轻的生命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我不想再继续麻烦吕叔，于是向他连声道谢，我估摸自己有能力爬上下午那趟北上的快车。吕叔连连摆手制止我对他表示的由衷感谢，并拉我起来，嘴里说：“你身体仍然很虚，要休息一下，你听我的安排！”他不容置疑的腔调让我无法不服从。反正已是“天涯沦落人”，就顺其自然吧。

一件奇迹发生了。当吕叔带着我在冷水滩破败的街衢中穿行的时候，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背影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想都未想就冲着那背影高喊了一声：“菜包子！”果真是他！他回过身来，仅惊疑了片刻，就激动得一下子将我抱在怀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菜包子”告诉我，他也有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吕叔急忙赶过来怜悯地拍拍小蔡的肩头，催促我们赶快回招待所好安排“菜包子”吃饭。路上，我将遇见“贵人”吕叔的事约略地讲给“菜包子”听了。

到招待所后，老吕拉着一位白皙秀丽的女孩子来到我们跟前介绍说：“这是徐姑娘，你们的老乡，专门来服侍你们的……”这个女孩一口纯正的长沙话验证老吕所言不虚。徐姑娘端过来一大碗蛋花面给小蔡，我也吃下了徐姑娘递过来的两片退烧药。交谈中，细心的吕叔发现我的手指焦黄，断定我们是抽烟的，便“骂”我们“小孩子不学好！”但他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却一手拿着一包“三门峡”（当时的高级烟），塞给我们每人一包。

吕叔告诉我们，有什么难事找徐姑娘，他凌晨会来安排我们登上早晨四点二十分的车。我们放心了，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有个内弟正是这趟车的司炉。

有点饶舌的徐姑娘还告诉我们：“吕叔正在遭难，造反派‘撤’了他所长的职务，现在全家六口每月只有40元钱……”

听了徐姑娘的话，我们沉默下来。

这一夜，我们洗过澡后舒服地睡了一个好觉。然而，令人难堪的是，两人睡前边抽烟边闲聊，因为过于疲劳，昏昏睡去竟将烟头落到枕头上将芦花做的内胆引燃。毫不知情的我们酣然入梦，任凭房内烟雾弥漫。要不是徐姑娘发现有烟雾从窗口漫出，急急地将我们喊醒，将火扑灭，恐怕会酿成火灾。是否烧死不说，我俩不定会成为“恩将仇报”的罪人。这件“难中有难”的趣事一直成为了我们今后岁月里相逢时的谈资笑料。

是日凌晨四时，外面下起了小雨。老吕硬塞给我们每人五元钱，在他表弟的帮助下，登上了一列直抵长沙的快车。车启动时，透过小站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吕叔和徐姑娘在小雨中睁着眼睛寻找着车厢里的我们，我的泪水不争气地淌了下来。

人生如旅，总有驿站。很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之旅也经过了很多的驿站。冷水滩



的人生际遇成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我记住了那里的人：吕叔、徐姑娘！世事的沧桑，人心的变幻，生活的无奈，让人们很难记住过往的每一个日子。假如你曾经记得在这个驿站所经历的细枝末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着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

至今，我不知道吕叔的全名，但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善良、有着侠义心肠的人。时隔多年，我希望用自己并不高明的笔触，朴实而真诚地写下这件往事，寄托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专程为寻找吕叔去了一趟冷水滩。只可惜，当年的小镇已然变成城市。世事沧桑，物变人非；斯人不见，徒添惆怅。算起来，吕叔也应是八十好几的人了，我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我总感觉他还活着。至少，他的灵魂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作者简介

请见《湘南往事》后的作者简介。



靠山屯纪事

翟雅萍

那片土地在辽宁省开原县威远乡靠山屯。1964 年 7 月 28 日，沈阳二十九中学的 19 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来到这里安营扎寨，隔年又有 27 名同学在先行者的感召下来到这里。全体同学在学校大多是好学生，却是自愿来务农的，其中有的人甚至自动放弃了升学与高考的机会。

这些壮志凌云的年轻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庭出身不好，在当时被称为“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上山下乡给了他们成为革命者的机会。他们怀着一片虔诚与梦想：改变这里“一穷二白”的面貌，把文化带给这小山村！于是这片土地上掀起了一场知青风暴，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的青春活剧。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靠山人，深情地将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叫做家。这是一个拥有 46 口人的大家庭，最大的 20 岁，最小的 14 岁。全家人按年龄大小来排行：老大张宝林、老二赵志岩、老三赵守诚……然后是老四、老五依次地排下去，最小的是 14 岁的郎蕙丽，我在这个家中排行三十六。

从下乡那天起，我与 45 个兄弟姐妹朝夕相处，在青年点的大草房里生活了七年。那些才华横溢、思想深邃、以苦为荣的同学们令我感到高山仰止，是他们伴随我走过那日不出即做、日落仍不得归的艰苦单调的农耕生活，是他们给我友爱、给我力量、教会我直面人生。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兄弟姐妹们。岁月早已无情地吞噬了我们的青春，但那纯真年代发生的事情却清晰得如同在昨天。

点 长

1965年的一个明媚的夏日，我们沈阳二十九中学的全体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某大礼堂里，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去年到农村插队的高三同学喻国政回母校来做报告。当剃着光光的秃头，穿着农民才穿的对襟白小褂的他冲上讲台时，一股青春的朝气，一股山野的馨香迎面扑来。年轻的心全被激动了，会场上爆发出迎接元首那样的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19岁的他用朴实无华、真切感人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在开原县的威远乡有一个靠山屯，那里生活着勤劳善良的人们，还有19个自愿去务农的兄弟姐妹。那里有青山座座，那里有寇河蜿蜒；那里有春种秋收的辛劳，更有劳动换来的甘甜。那块土地上缺少文化，有志者不妨去一搏。

当时上山下乡的话题，在社会上乃至我们学校一直沸沸扬扬。听他言罢，我对那片绿水青山产生了怎样的梦幻哟！我拿出了从小长大的全部倔犟，不去看母亲的涟涟热泪，不去听弟弟、妹妹的苦苦哀求，偷出了户口本，毅然走上了被人认为是受了鬼使神差的下乡之路。

是喻国政的报告决定了我青春的脚步。我认定自己是去革命的，俨如江姐俯视着滔滔长江，"今日告别雾重庆，乌云沉沉夜未央，待到明朝归来时，迎回一轮红太阳"。

走进了梦想的广阔天地，46个知青兄弟姐妹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们每日三餐同一锅饭，相互间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了如指掌。身为点长的喻国政一言一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视线：他的组织能力，他的语言天才，他的睿智，他的真诚善良，他的身体力行无不令所有的人折服。

一叶知秋，那些发生在我们与点长之间看似平常的小事折射出他特有的领导才干和人格魅力。

1966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晚上8点了，点长喻国政心急如焚，因为青年点丢了两个同学（我和张秀春），这是家里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男女同学们议论纷纷，担心的、埋怨的话语在点长耳畔说个不停。当时寇河正在涨水，好多天了，天像漏了一样，雨一直下个不停，寇河的水势总不见小。有的人家油、盐、火柴这些必需的生活用品都断了捻，但没人敢蹚过波涛汹涌的寇河（公社供销社在河南岸，我们在河北岸）。点长分析了种种可能，然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他把男同学分成两组，组成两支搜救小分队：一组去北山，一组去寇河边。于是男同学们一脸的庄严，拿着绳索、镰刀分头行动。

雨一直在下，晚上近9点时，两只"落汤鸡"像小偷似的摸回了青年点。男同学还没回来，女同学们尖刻的责备声像一阵冰雹那样砸过来："太不像话了！无组织无纪律！""为什么不告诉家里？""男同学全去找你们去了！"我们自知理屈，匆匆换好衣服，像傻

子那样坐着等候发落。各路男同学陆续回来了。一进院，于众就高声嚷道："准是翟雅萍的主意！"喻国政马上制止了其他也准备高声发作的男同学。他把他们拢到一起，对他们一阵耳语。一会儿，孙雨、杨冬、徐连斌等几个男同学像表演节目那样故意站成一排，他们分别端着地瓜、面糊糊、葱、酱、高粱米水饭等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面前："先吃饭，先吃饭。"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真的饿坏了，管他呢！我俩一阵胡吃海塞。打饱嗝的时候，喻国政进来了。他坐在我俩对面，像一座山："你们去哪里了？""我们去南城子了，看蒋铃、秦昆他们。"（南城子大队离靠山有八里多地，当时有五位同学借调在南城子大队。）"为什么不打招呼？知道大家多担心吗？如果出事，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代！这几天寇河发大水你们不知道吗？有多危险！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强调得少吗？"点长嘴里一连串吐出的虽都是问号与惊叹号，但声音还算柔和。在这个大我们三岁的点长面前，我们像两个不懂事的娃娃那样垂着头。他接着又故意轻松地询问蒋铃、秦昆等同学的情况，最后又严肃地说："要保证以后不再犯！"我俩态度极好："我们保证！"点长走了，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喻国政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使得大多数同学，特别是我这样的初中同学对他形成一种似对家长般的依赖。

我家是先进青年点，县知青办在我家办了一次图片展，几十张反映我们全家人生活的照片挂在多功能的食堂的墙上，外边来参观的人赞不绝口。

图片展结束后，照片由喻国政集中保管。其中有两张照片我很想得到。一张是：在青年点的大院子里，我挽着裤管（刚下田回来），高擎右手，正在唱"天塌下来只手擎"；我身后有好几个同学在为我伴奏，丁峪麟吹笛子，韩渝生拉手风琴，江宁娜弹阮，刘恩义、孙雨拉二胡，苏嘉元敲木鱼，石里奇打竹板，段伟拿着一支短笛还没找着调；最后面一排是赵守诚大哥、我的同班同学杨冬及小胖子徐连斌；在水井边还有张大爷搂着两个小孩；最边上是放牛的二胖子，他们在饶有兴味地看我们这台戏。

另外一张则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连绵的青山下面是片片碧绿的水田，我们二队的社员正在水田里插秧、耙田，我站在田埂上，段伟在水中扶犁，锦绣手拿鞭儿催促老牛快些走。每一个干活的人都是笑吟吟的，好一派令人神往的田园风光。这张照片总叫我想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里那男耕女织、宁静祥和的醉人景象。照片上看不出我们的疲惫，看不到那时常袭击我们的彷徨。两张照片是多么难得的两个瞬间！

我总在心里策划着怎么才能说服喻国政把这两张照片给我，我窥伺着时机。一天我看男寝室只有喻国政一个人，于是走了进去。

"喻国政，我求你一件事。"我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当然不是为了换回一个灿烂的笑，而是为了那两张我朝思暮想的照片。"什么事？"我看得出来他情绪很好，于是我充满信心："你肯定能办到，但你要先答应行还是不行。"我耍了滑头。"好，我答应你。"他像

对待其他事情那样认真地说。我得寸进尺："办展览的那些照片有两张我想要，归我保管行吗？我保证不会弄丢。"

我终于表演完了自己导演的节目，心跳有点加快。我看定他的脸，注视那上面的变化。他稍沉吟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心花怒放，哈哈，得来全不费工夫！他跳上了土炕，打开了自己的柳条包，我看到那些照片已被他精心包好，不由得暗暗称赞他对这些照片的珍视。他拿出所有照片帮我一张张地找，我终于得到了那两张对我来说无比珍贵的照片。

靠山屯知青永远忘不了19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夜和那冲天的火光，小学校着火了！当时是半夜两点左右，正在熟睡的知青们闻声后慌乱地穿上衣服，飞也似的奔向火场。小学校的上空浓烟滚滚，大家心里知道，学习黄继光、邱少云的时刻到了！着火的中心是教师办公室。喻国政马上指挥女同学压井运水，几个男同学上房用二齿钩把苫房草扒掉，他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则冲进冒着浓烟的办公室。奋不顾身的少男少女们在浓烟中穿梭：女同学端着水在结冰的地面踉踉跄跄地来回往返，男同学进进出出那正在燃烧的办公室，奋力抢救教具及桌椅板凳。火势很难控制，火越来越大，人被呛得咳嗽不止。能抢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不能再进去了。喻国政还想保住一样东西，他止住别人，自己又一次冲进浓烟，准备把那唯一的脚踏风琴拖出来。可那琴身已在燃烧，那琴键正燃起一排美丽的火苗，只好放弃。在同学们的一片叫喊声中他总算安全出来了。天亮的时候，在知青们的努力下火终于扑灭了。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救火后，我们的棉衣全冻成了闪亮的铠甲，每个人的脸都是黑的。喻国政的脸不但黑还被灼伤，手也被灼伤，眉毛被烧焦，如果不是戴着帽子，他的头发将不复存在。他的"花脸"一年后才恢复正常。在需要英雄榜样的时候，点长会有英雄的行为。

喻国政还是个不错的庄稼把式，赶车、扶犁、点种、铲地样样精到。总而言之——一个合格的庄稼人。

这个合格的庄稼人一直有着崇高的政治追求，他决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平常常的毛头小伙，他的目标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那动荡的年代，他以同龄人少有的能力驾驭了自己的命运，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1968年6月喻国政跃升为开原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脸上过早地失去了天真与单纯，取而代之的是成熟与老练，这个靠山屯知青的带头人的政治生命从此枝繁叶茂。从此他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所缠绕，青年点很少再见到他的身影，虽然他的人事关系暂时还在靠山屯大队。但只要有时间他就回到青年点，他一进家门就扫院子，帮同学们整理内务。但当见到他不再粗糙的双手和不再有被太阳光照耀过的黝黑皮肤，我们心里明白：点长与我们已不在一条旧船上，暗地里我们开始叫他"县太爷"。点长已不属于我们，不属于靠山屯青年点，他属于那个忙忙叨

叨的政治。在大家看来，当了"县太爷"的点长的一切都镶上了耀眼的金边……就像今天的追星族那样，感觉我们被点长抛弃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过。当然我们的感觉归咎我们自己，这岂能叫喻国政承担？

喻国政离开后，靠山屯青年点那两排大草房在寒来暑往中飘摇，后来换了几任点长，靠山屯知青却再也找不回那昔日的辉煌。

可敬的兄长

赵守诚是一位可敬可亲可爱的兄长，是我农村七年的保护神。他对我恩重如山。

我下乡是 9 月份，正赶上收割。当农民没有培训期，第一天生产队长就交给我一把镰刀。接下来每天体会着从未有过的腰酸背痛和"拉兜"（落在后边）的痛苦，满怀豪情下乡的我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晚饭照例是面糊糊、包米面大饼子。劳累了一天的年轻人都在狼吞虎咽。赵守诚端着碗挨我坐下。他是我家老三，是 1964 年毕业的高中生，在第三生产队。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那镜片并没遮住他的浓眉大眼。

"怎么样？这几天？"他温和地问我。

"还好。"我含混地回答。

"别着急，时间长了就好了。以后在队里有什么事要回家来讲，我们这些大同学生怕你们这些小同学在队里受什么委屈。"

不知为什么，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怕他看见，赶紧低着头将那面糊糊连同眼泪就着一起喝下去。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从这一天开始，我认定他是一个可以亲近可以信赖的人，从这一天起我的喜怒哀乐全都可以向他倾诉。

赵守诚曾是副点长，还是当时 46 人中寥若晨星的三个共产党员中的一个。他是个坚强的人，是个知难而进的人，是个大事小事样样在行的人。他好像会呼风唤雨，凡是经他操办的事情件件都妥帖、稳当。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与喻国政等同学珠联璧合地为靠山屯青年点尽心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他是这个大家庭中最能调节气氛的人。他每次与女同学握手都要将你的手捏得生疼，直到对方疼得大叫时才笑哈哈地松手。每次全家开会他发言的前奏总是："同志们，大钱们，诸位，各就位！"大家都被逗笑后他才一脸的严肃，书归正传。他是一只快乐的吉祥鸟，凡有他在的场合你总会感到其乐融融。

赵守诚是大家的兄长，他爱每一个同学。在农村种地我们的鞋穿得很费，他就准备了一套修鞋工具，不管谁的鞋坏了都送去叫他修补。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一堆烂

鞋中间,开始像一个大嫂那样飞针走线,嘴里还不时地哼着小调,样子滑稽而可爱。他活计很好,修好的鞋完全可以和专业的修鞋匠媲美。

赵守诚有着不幸的童年,过早地尝到了人间悲欢离合、寄人篱下的滋味。苦难是人生的不幸,但也造就了他的善良。不管谁在困难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好多同学都得到过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任何出身"好"的同学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感,但赵守诚从未用任何语言和行动伤害过任何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当青年点中出身好的同学(大多是六八届的)一批接一批被抽调回城,出身不好的同学四顾茫茫的时候,他利用自己出身好、是党员的有利条件,顶着种种压力,费尽周折,四处奔波,使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从田间走上了农村教师的讲台。秦昆、梁啸海、刘恩义、金霆、刘锦绣、江宁娜、黄静丽、孙洪祺……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农村教师的。在逆境中处处想着别人,这就是赵守诚!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人性的灿烂光辉。

作为一个真诚的人,他对一切虚伪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文革"时举国上下批"三黄四旧",批"毒草",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几朵是"香花"。一天,他从沈阳乘火车回开原,闲着没事,捧起一本苏联小说《形形色色的案件》看了起来。一个男列车员走过来看到了他手中的书,便大惊小怪地喊起来:"你怎么能看这种书?这是毒草!"说完他就伸手来抢书。赵守诚怒不可遏:"你要干什么?"那人仍在喊:"这是毒草!"赵守诚气愤至极:"这毒草交给你我不放心!"他三下两下将那本书撕个粉碎(现在觉得这样的事近乎荒唐,但那个年代,与这位列车员一样的"革命群众"比比皆是)。当他回到青年点从口袋中掏出那本书的残骸叫大家看时,仍余怒未息。赵守诚就是这样一条铮铮的汉子!

一天,生产队长叫我在队部的门两侧写两条标语。我用红铅油在左侧写上"毛主席万岁!",右侧写上"共产党万岁!"。同队的社员朱文国看了之后说:"你这标语有问题。""什么问题?""你应该写'中国共产党万岁'。你这样写是指哪个共产党?"

朱文国平日是个"秧子"(当地指干不动农活的人),有点文化,他总以自己是贫下中农而引为自豪,经常指点评说。我顶撞他道:"这是在中国,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万岁了。"其实我这么写是为了两边字数一样多,写完后也觉得有点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写成"中国共产党万岁"。他听出我的不屑,勃然大怒:"你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苏联也有共产党,你是在替修正主义说话,是说苏联共产党万岁对不对?"(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他接着给我扣帽子:"你这是反党!应该拿根绳把你绑了,送你去公社专政队!"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最猖獗的时期,把谁"拿根绳绑了"送公社专政队的事时有发生,这是任何革命群众都可对阶级敌人轻易采取的革命行动。于是这个革命群众怒气冲冲直奔大队部。正好遇到了赵守诚(赵守诚当时是靠山屯大队的群专队长)。他哇啦哇

啦地对他喊了一阵事情的经过，赵守诚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大叔，她年龄小，政治觉悟不高，决不是阶级立场问题。"他仍然不依不饶："不对！这就是立场问题！"赵守诚说："大叔，你消消气，我马上去二队叫她把标语改过来。""不行！这事要与她的出身联系在一起！"朱文国又一次强调："一定要用绳把她绑了送公社专政队！"赵守诚知道他胡乱上纲上线的后果，急忙跑到我们队。他批评我："你怎么敢把这两条标语这么写？这还得了？""我只是想让两边的字数一样多。"我还是争辩。"标语要改过来，你还必须去向朱文国认个错，别把事情搞大！"说完他就动手帮我把标语改了过来。

晚上赵守诚带着我去朱文国家，他歪在炕上不理我们。赵守诚满脸堆笑地说："大叔，翟雅萍给你道歉来了。她年龄小，你是贫下中农得多教育她，多担待她。"接着我就违心地背诵赵守诚一路教我的话："大叔，我错了，是我觉悟不高，标语改过来了。请你原谅我……"朱文国的一张瘦脸好不容易才阴转晴，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是哥哥救了我。

赵守诚很有音乐天赋。记得在学校的一次开学典礼上由他任主角的一曲"萨拉姆毛主席"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地道的新疆舞姿，那动情的歌唱，一招一式都表明他是个文艺天才。他有着一副纯正的男中音，我尤其喜欢他用饱满的胸音唱苏联歌曲。有一天我在窗下洗衣服，听到他在屋里用俄文唱到："我们走在田野的小路上，我们放声歌唱……"苏联歌曲本身就意境深远，由他一唱更是格外动人。过后我向他学会了这首歌（我们学校学俄文），直到今日我仍能用俄文一字不差地将那首歌唱下来。

在靠山屯，他的一曲《老赵头盼丰收》倾倒了全家同学及靠山屯的男女老少。每当他唱道"老赵头盼丰收……老两口亲亲热热一辈子，还要奔向那共产主义……"时，有一个人总是一脸的羞涩，她是侯嘉丽，是哥哥后来的妻子。侯嘉丽是1965年毕业的高三同学，她虽不是个大美人，但也生得眉清目秀、丰满端庄；她聪明、贤惠、善解人意，言谈举止不瘟不火，正应了那句"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这是一对神仙眷属，是青年点中结婚的同学中最恩爱、最幸福的一对。

他俩结婚后一再叮嘱我："青年点的饭菜不可口时就回家来吃。"因为我的缘故，他们夫妻在年底分粮食的时候想办法向生产队多买了一些稻子。我几乎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只要有空就去他们家。赵守诚背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赵亮要活宝，在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逗得我和侯嘉丽前仰后合，一阵阵笑声从小草房里悠悠地飘出……

不管是大雪席卷的严冬，还是北风萧瑟的深秋，每当我轻轻推开那小小的柴扉，马上会在那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寻到无尽的芳菲。辛苦、劳累、忧愁、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春去秋来，在那间普通的草房里，在那淡淡的灯光下，我得到了世界上一对最善良夫妻给我的无尽温暖。我们在一起促膝交谈，谈曾经的理想，谈面对的现实，谈不可知的未来……在青年点后期"乱云飞渡"的日子里，那间坐落在靠山屯的前街，四周用木篱围起的

小小草房更成了我避风的温暖港湾。

随着赵守诚、喻国政、蒋铃、丁峪麟、高勇、金霆等一大批青年点的顶梁柱结婚搬出青年点，随着1968年又有一大批母校同学被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刮进青年点，青年点的"家风"每况愈下。这里没了昔日的繁荣，再也听不到那激动人心的歌声。青年点的门窗已破旧，后院用高粱秸竖起的防风障被西北风一吹干枯的叶子稀里哗啦直响，叫人心生凄凉。如今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后睡觉的地方。知青们每天重复着吃饭、干活、睡觉三步曲，一颗颗失落的心在无奈中挣扎，我的心情有时也很糟糕。一天我去赵守诚家，对他们夫妻谈起死，我说："活得没意思。"两人异口同声："不要胡说！"哥哥开导我："既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让生命自然地走到尽头，你的毛病就是爱胡思乱想。"其实我说的不是哥哥理解的那种死。

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怎么想的，可我真的好多次想到死。当你的梦想与现实大相径庭的时候，当你虔诚地一次次交上入团申请书而被嗤之以鼻的时候——同样的下乡干革命而自己仅仅是个陪衬！生命的意义何在？与其一天天混日子还不如壮烈地死去！但怎么个死法？ 1969年3月珍宝岛之战打响了，"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全国，特别是我们东北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兴奋异常，一下子找到了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死的方式。出于战备需要，公社要求各大队培训卫生员，我求公社文化站的王老师（原威远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领队）帮我说说话，费了好大劲才争取了一个名额。我认真记笔记，认真学习三角巾的包扎技术。这回好了，我要去战火纷飞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我为他们包扎伤口，为奄奄一息的战士嘴里喂水；在隆隆的炮声中我背起一个受伤的战士，刚把他放下，一排子弹扫来，我在硝烟中慢慢地倒下……多么悲壮的画面！多么壮烈的死！我就这样一直在憧憬着"壮士一去不复还"。可后来一级战备不了了之，我也没能实现"死得其所"。

1970年的冬天，我却意外地有了一个暂时告别黑土地的机会——去辽宁省"八三工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赵守诚、侯嘉丽两口子像得了喜帖子，好几天乐得合不拢嘴："出去好好干！要珍惜这个机会。"他俩反复叮嘱着，好像我要去干什么大事业。临行前几天，他们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粘火烧、红豆饭、豆面卷子……天天花样翻新，着实让我大大地改善了一阵子伙食。临行时，侯嘉丽拿出20元钱塞给我，对我说："不用还。"那是什么样的年代？那是什么样的20元钱！知青生活非常清贫，我真的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了。我接过钱，热泪涟涟。是这对夫妻的深情叫我懂得了什么是患难之交。

最初文艺队驻地在开原，赵守诚只要去开原办事或开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看我。那天很冷，我们正在指挥部的礼堂里排练节目，队友喊"外边有人找你"！我走出去，一眼见到风尘仆仆的哥哥：他的脸冻得通红，头上的狗皮帽子上全是白霜，因为已在外面等了一

阵子,他穿着大头鞋的两只脚交替地跺着。我心头一热,眼圈发红:“哥哥,天这么冷跑来干啥?”“给生产队买东西,顺便来看看你。”

望着他那双和善的大眼睛,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心头热浪滚滚,于是言语如泛滥的春水一发而不可收:“侯嘉丽好吗?赵亮又胖了吧?”我围着他转来转去,问个不停。他永远是用那饱满的乐观情绪来影响我:“哈哈,混得不差!我小妹还当了副排长,我对国政说,咱家的人在外面都很争气……”哥哥大老远的来看我,我得请他吃顿饭,但没有好吃的,指挥部的食堂里只有高粱米饭、白菜汤。看着他吃得很香,我心里酸酸的……

在靠山屯那块土地上除了爱情还有兄弟情、姐妹情,我把它看成是一种超越手足之情的情意,这是除了靠山人之外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

1971年12月31日,我接到了回城的招工通知书。是喜?是忧?是完全能够割舍还是仍有几多眷恋?这张招工通知书倒叫赵守诚、侯嘉丽欣喜若狂,他俩跑到青年点为我打点行装。赵守诚的脸乐成了一朵花,他在我们青年点宿舍的地上走来走去,嘴里叨咕着:“好人好报,好人好报。”我知道他是故意说给那些不曾善待我的人听的。当侯嘉丽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时候,我泪如雨下。我拥着侯嘉丽的双肩心里好生难过,那些凄风苦雨之夜,那些静夜小窗之时一一在眼前闪过,他们给我的阳光雨露我这一生何以回报?怎一句“我忘不了你们”了得?

农村七年我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把心爱的二胡,我把它送给了他们。当然是见到二胡就会想到我,也希望以后他们打发寂寞时光时能用到它。

四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绵延着我们的友谊。当两鬓苍苍的我们坐在一起“海阔天空”的时候,每每提及往事还让我激动不已,那相濡以沫、催人泪下的真情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嵌入了我的生命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泪总是止不住地流呀,流呀……

不寻常的友谊

张秀春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文静而秀丽。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她性格内向,言语很金贵,给我的感觉就像天上的月亮不冷也不热。

人们企盼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都3月份了出工时仍得穿上厚厚的棉衣。每天在外面干活脸被风吹得生疼,总有“春风疑不到天涯”的感觉。

寇河刚刚开化,全大队的年轻人去寇河岸边修河堤。我们拿着锹、镐、土篮、扁担涌向寇河边。要去河南岸干活,必须过那简易木桥。那桥是用粗铁丝将一棵棵树干连接而成的,桥又滑又不稳当。胆子大的小伙子当然几步就蹿到桥头,可我们这些姑娘却拉拉扯扯、小心翼翼地往桥头蹭。大批人马都顺利地过了河,忽听“咕咚”一声,原来是张秀春掉进了河里。幸亏她落水的位置水不是最深,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打捞上来,她整个人成

了"落汤鸡",棉裤全浸透了,棉衣也湿了一大截,那股透心凉是可想而知的。大家叫她赶紧回家去。

这时是农闲时节,每天工分很低,一个男劳力一天也就挣块儿八角钱,女劳力就更少,也就六七角钱。按理张秀春不用回来了,可没一会儿她已换好了衣服远远地走了过来,那纤小的身材似一片柔弱的叶子自远方飘来。她这一举动引来一片赞扬声,掀起人们心中不小的波澜。这个平日里寡言少语的女孩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含而不露的坚韧。后来因这事她受到点长喻国政的好几次表扬。

我俩挨着睡觉,一直很要好。她总说"真的喜欢看你写点什么或听你讲点什么"。冬天天短,我俩早早就钻进了被窝。我说:"今天开始我给你讲《牛虻》。"

我是那么爱《牛虻》这本书,就像爱自己的恋人。我是多么喜欢那些描写:"因为经常想起自己做过了的事情,她的全部青春已经遭受到损害……她坚定地、无所顾惜地一步一步走进他以往生活的地狱里去。那些情景都生动得如同她自己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一般。那裸露的灵魂的无可奈何的战栗,那种比死还要难受的嘲笑,那种孤独时感到的恐怖……

"她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坐下来,对那美丽的、孩子气的头凝视着,慢慢地,一阵迷茫的热泪涌上来,遮蔽了手中的照片。啊,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思想呢!即使是在梦里,让这一光辉而超脱的灵魂被束缚在那种污秽、卑贱、苦楚的生活里,也要算是一种亵渎啊。宁可让他化成绝对的虚空,也比活在世上做牛虻好一千倍呀!"

就这样,在那寒冷的漫漫的冬之夜,我们头挨着头,她两眼紧盯着我,听我讲述在那遥远的意大利发生的关于"牛虻"的故事。

后来我们青年点不知是谁弄到一本旧得不能再旧的《牛虻》,在女同学手上传来传去,待传到张秀春手上的时候,她兴奋地对我说:"我一定仔仔细细一个字不漏地好好来读这本书。"

一个下雨的秋日(时为 1966 年)我和张秀春坐着闲聊(雨天不下地干活),话题是想念去支援南城子大队青年点建设的蒋铃、秦昆、梁啸海、黄静丽、陆子光五位同学,突然我俩作出一个决定:马上动身去看他们。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我俩头顶着一块塑料布(那时谁都没有雨伞),光着脚穿着塑料凉鞋踏上行程。靠山大队离南城子大队不算太远,约八九里路。农村的路晴天还算好走,一下雨就翻浆,格外难行。我们在泥浆中艰难地跋涉,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寇河边(寇河上游流经南城子大队的河段)。寇河涨水好多天了,比平日宽出了几倍,流经南城子大队这段更是水深浪高。面对咆哮的河水,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丫头手拉着手下了河,大约蹚了三分之一时,我们预感到形势不妙:湍急的水流把河底下的石头都掀了起来,它们骨碌碌地从脚面上滚过,砸得脚面生疼,河水用力把我

们推推搡搡，根本站立不稳，再往前挪了几步，水已快没胸。我俩开始害怕了，没有退路，前后都是一片汪洋。于是两个人只好紧紧地抱在一起艰难地向前移动。河对岸一个放羊的老人忽然发现了我们，他用放羊的鞭子指指点点并惊恐地连喊带叫帮我们绕过深水区。在水里一阵惊心动魄的扑腾后终于快接近河岸，老人将长长的鞭杆伸向我们，把我俩拖了上来。他惊奇地看着我们并不停地念叨："胆子真不小，胆子真不小！多少天了没人敢过河……"我们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奇迹般地完成了过河的壮举。到南城子青年点时天已黑了，我俩的突然出现把五个同学吓了一跳，当他们得知家里无一人知道我们的去向时，我俩的屁股还没坐热乎，蒋铃就立即送我们踏上返程。（那时基本没有电话，只有大队部有电话，大队部离青年点又很远。）蒋铃领我俩经水库走盘山路绕过寇河，之后他千叮万嘱，叫我们剩下的路要小心，就先回去了。

这是我和张秀春至死都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一起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

说起张秀春就不能不说起她的另一半——于众。于众是个骄傲自负的小伙子，他高高的个子，外表潇洒漂亮。他的性格直率，说话时言辞激烈。在他眼中女同学应具有这样两种品格：一种是郎蕙丽那种直来直去，凡事都弄个水落石出；一种是张秀春那种轻易不表露心迹，寡言少语。他常对我们女同学说："要不你们就像郎蕙丽那样，要不你们就像张秀春那样。"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这种介于这两种性格之间的人。

那么他爱情的天平的指针一定是在他赞成的这两种性格间摆动，他选择了后者，选择了张秀春。张秀春很满意，一提起于众，言语中就充满了骄傲与满足。在他们热恋的日子里，我当着她的面很少说及于众，因为于众一直对我不太友好，不知为什么他对我总是冷言冷语。

隆冬时节。那天很冷，我们几个人被家里留工，在菜窖里收拾白菜。菜窖虽然在地下，里面却也很冷。我一直站在那里用冻得发僵的双手撕扯着白菜叶子，于众走过来抱白菜，无意间碰到了我的手。他说："翟雅萍你的手怎么像死人手那么凉？"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好像愿意叫别人伤心。

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就像魔鬼挥动着硕大的火把，点哪哪着火。当城里的造反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进靠山屯的时候，这里的年轻人也按捺不住颗颗驿动的心。"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歌声，每天能在青年点的上空响彻几十次。热血在年轻的血管中沸腾，城里的人都在造反，我们有什么理由沉寂？总得有点革命行动！于众在这个时候是比较激进的一个。

那可怕的横扫一切啊！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叫人心寒。我们家有那么多好唱片，《祖国之春》、《江南好》、《送你一枝玫瑰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那些美妙的旋律我

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将它们背下来。我曾是家里的广播员，它们当时归我保管。可于众对我说："这是毒草！"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将这些唱片一个个掰成两半，我的心也同时被掰成了两半，除了心疼根本就没有回天之力来保护它们。

我们女寝室有一面下乡时家长送的大镜子，每天早晨女同学都按照个头的大小站成一串在镜子前梳头。这可怜的镜子也没逃脱厄运，因为无产阶级是不该照镜子的，所以于众和另一个男生把镜子也砸了。女同学们只好把镜子的残骸拼接起来，再站成一串梳头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都晃来晃去，努力地躲开那些裂痕，尽量寻找自己完整的脸。

听说城里的女人全把头发剪得不能再短，谁的头发最短谁就是最革命。我家的女同学闻风而动，好多人剪去了小辫子变成了短发。于众见到女同学就动员，可我就是不肯剪掉我的两只本来就很短的小辫子。于众怒不可遏地指着我的脑袋对我说："翟雅萍，你的头发留得这么长就是不想彻底革命！"

我真想杀了他！我们是同一天下乡的，他对我这样无情无义。你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听你大呼小叫？

那时我真的恨他，即使在他心上人面前我也毫不掩饰对他的敌意，有时我会故意问张秀春："于众对你好吗？他脾气那么坏，是不是总对你发脾气？"她总是给我作种种解释，因为她深爱着于众，所以处处袒护他。

其实无须张秀春解释，于众的那些极端的行为虽令人发指，毕竟得归咎于其少不更事。骄傲之人必有过人之处，于众在男同学中当属佼佼者。这个争强好胜的知青在后来的耕耘岁月中，因家庭出身的困扰在各个方面屡遭挫折，但他没有沉沦。1973年，他所在的第七生产队领导班子撂挑子，连团员都不是的他被选为生产队长。因为出身不好，下乡后只有接受改造干活的份，如今有了领导贫下中农的机会，诚惶诚恐的他下决心当好这个队长。七队属于落后队，当时分值是六角钱（一个全劳动力一天的所得），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奔忙的农民根本吃不饱饭。首先要提高粮食产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第一步要解决粪肥的问题。那时化肥还很少见，各家各户的厕所就成了积肥的重点。于是这个年轻的队长拿起铁钎、铁锹挨家挨户去起厕所。农村的厕所极简单，在房山头的地上挖个坑或放一口破缸即成入厕的地方。时值深冬，粪便都冻成硬邦邦的一个个大冰坨，必须用铁钎子戳松动后才能挖出来，每戳一下都有粪便溅在脸上、灌进脖子，他根本不去理会。在农村想办成一件事情身先士卒多么重要！新队长的行动感动了大家，有的人主动参与起厕所的工作。接下来的披星戴月、风里雨里自不必说。天道酬勤，在于众的带领下，经过一年的打拼，1974年底七队打了个翻身仗，粮食打了20万斤，比往年增加了一倍，分值也翻番为一元两角。由此这个在农村干了九年一直要求入团的知青才得以入团。于众一下子成了公社的红人、开原县的劳模，着实风光了一把。

于众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沈阳音乐学院大院内，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多才多艺尤其对音乐的悟性一般人不可比拟，虽嗓音不是很好，歌却唱得很有味道。平日他真人不露相，“大颂扬”时，他和另一个同学表演了一段风趣诙谐的双簧，差一点笑破了同学们的肚皮。

他们夫妻回城后，张秀春马上来找我，把我俩中断了几年的情丝又重新接上。她对我说：“于众常常提起你，往往在看电视的时候，听到那里面的插曲，也会说还没有翟雅萍唱得好。”

张秀春的话深深地拨动了我的心弦，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于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常常提起我。靠山屯的那些往事一件件又在心里翻腾，我心里那个恶作剧的男孩已经遥远，此时面对的应该是一个长大后的成熟的于众，是一个经过岁月洗礼、千锤百炼之后的男子汉。

我这个人很重感情，于是买了几盒卡拉 OK 磁带。时值炎炎盛夏，我利用两台录音机，唱了十首歌录在了一个磁带上，将这磁带送给了他们夫妇。我给他们的信中写道：“谢谢于众还记得我的歌声……”一天，于众骑着自行车来药厂找我，回赠我一盒贝多芬的交响音乐《命运》。他对我说：“记得你喜欢这音乐。”于众走后，化验室的女人们炸开了锅：“这是你农村原来的对象吧？哈哈哈……”我望着于众远去的背影，手里拿着他送给我的《命运》沉思良久。

2003 年他们夫妇去深圳定居，张秀春因工作需先行一步，于众善后处理房子、家具等事宜。临行前我单独请于众去酒店为他饯行。我们相对而坐，快四十年了，回城后彼此虽没间断来往，但今天我仍有千言万语。我真诚地举起酒杯：“祝你一切顺利！”他却说：“还恨我吗？”我摇摇头。看来多少年来他什么都不曾忘却，而那些往事一直令他耿耿于怀。这个即将远行的人除了给了我一份牵挂，还会有什么呢？

恩义之士

正是农忙季节，大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当时的提法是越忙越不能忘记宣传毛泽东思想。队员是从各小队选拔的社员或知青，我也从湿漉漉的田埂中走了出来参加这支队伍。知青在宣传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有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它们散发着知青文化的气息又不失浓浓的乡土味道。

在这支小小的文艺队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热爱这个给了我最初艺术功底的山村“乌兰牧旗”。

军代表老王是上级派来揭靠山屯阶级斗争盖子的，他动辄挑动群众斗群众，激起了人们强烈的不满。对此我也曾有微词，不料有人向他告了密，于是这个“革命军人”对我

怀恨在心。



演唱者为翟雅萍(摄于1966年靠山屯知青大院内)

有一天在一队演出，我独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天下一片红》，老王一直沉着个脸在看我。演出结束后，他让队长马先明召集大家集合，他说："有的人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歌唱得软绵绵的，舞也跳得软绵绵的。"然后，他又学我跳舞的样子比画了几下，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支队伍有问题，回去要整风！"这样的一番话在当时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搁到谁的身上都会被吓坏，何况我是一个出身有问题的知青！

第二天，就在一队的队部，文艺队开始整风。我忐忑不安地坐在炕沿边，心悬着，等待着天塌下来。

这实实在在是为我一个人准备的点名的批斗会，我唯一要感激大家的是没让我像走资派那样把腰弯成90度。老王抛砖引玉之后便是万箭齐发，我昔日的那些亲爱的同学们找来最能伤害我的语言来"帮教"我，更有那一下子就刺痛人心的幸灾乐祸的眼神。我一时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我没有招架的力量，低垂着那颗19岁的头，听凭别人对我信口雌黄，心像被人扔进了污泥，委屈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来。

正在我准备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时候，人群中传出一个大胆的声音："别给同学无限上纲，别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谁不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似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我循声望去，原来是坐在墙角的刘恩义，他被激得大怒了。在这个谁也不肯放过表现自己革命立场的关键时刻，如果一言不发就是对我不小的馈赠了，哪还敢奢望谁能站出来保护我？但刘恩义毕竟是刘恩义，他是个从不随波逐流的男子汉！听着他铿铿锵锵十多分钟的"辩护词"，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北方农村到了冬季即进入冬闲，其实整个冬天我们都闲不着，要么去山里修梯田学大寨，要么去寇河边刨冻土、挖鹅卵石修河堤。春节刚过不久，九个生产队的年轻人涌到寇河边，我们要把那冻土刨开，再把下面湿淋淋的鹅卵石用土篮挑到指定的地点去。我

担着一对土篮，吃力地挑起带水的鹅卵石，刚走了两趟，水就把土篮浸湿了。光挑着空土篮走我都觉得沉甸甸的，土篮浸湿后就更感抬不动脚。偏偏几个农村小伙子不怀好意地说"得照顾照顾翟雅萍"，就一起往我的土篮里装石头。两只土篮被装得满满的，我试了几次土篮都纹丝不动，他们挤眉弄眼地看着我的狼狈相。离得不远的刘恩义看到了这一幕，他怒气冲冲走过来，拿起铁锹稀里哗啦把土篮里的石头往外铲，还剩下不多时对我说："挑走吧。"下一趟回来时再没人敢故意难为我。

刘恩义是高三同学中年龄最小但学习最好的一个。他聪明智慧，善良正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无所不好，无所不知。他的数学出类拔萃，文学也毫不逊色。刚下乡不久，他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生产队估产（用眼睛测量粮囤），那些有几十年估产经验的老农估出一个数，刘恩义用所学的几何知识也估出一个数，整囤粮食称重后，刘恩义估的数非常精确。下放学生（当地人这样称呼我们）有如此的本领，着实让老农们吃惊不小。他所在的九队是靠山大队最穷的生产队，位居深山沟，穷山恶水，十年有九年欠收，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四五角钱。刘恩义和同队的知青们建议把沟外的旱田改种水稻。那时靠山屯还没有塑料薄膜育秧，刘恩义千方百计查到了有限的一点资料，于是知青们没日没夜地带领社员"旱改水"。晚上怕有牲口糟蹋秧苗，刘恩义就住在临时搭建的小窝棚里。后半夜太困了，他躺在潮湿的地上睡着了。天亮了，他发现自己的两条腿怎么也动不了了，他明白：是风湿！他用两只手强撑着把身体挪出小窝棚，再让阳光照耀着自己的两条腿。真得感谢年轻！晒了一阵子，腿可以活动了！但风湿症跟了他一生。

当年水稻种植成功！年终结算九队的分值第一次达到八角多钱。大家开始信任这个小伙子，一致选举他为生产队长。他上任的第二年，九队的分值又创历史新高达到一元三角钱。

冬闲时，我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刘恩义是三个"教授"之一。一天晚上，上课讲的是氮磷钾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他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因溜号回答不上来，于是他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说："翟雅萍，你的脑袋怎么摁不出褶来？"他用的一个"摁"字叫我愤怒异常，好几天不理他。回城后一天同学们相聚，他半开玩笑地说："想我吗？"我说："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你，你说我的脑袋摁不出褶来。"没想到他的神情马上变得很凄然，伤心地说："你怎么就记住了这句话？你忘了过河我背你，你去'八三'文艺队我帮你搓包米换粮票，你回城时我帮你收拾行李……"听他"翻小肠"，我哈哈大笑："我跟你开玩笑的，傻瓜！"

刘恩义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十年知青生活历尽坎坷，但他仍很珍惜靠山屯曾有过的美好时日，我们有着同样的靠山情结，我们是一生的好朋友。

小妹妹郎蕙丽

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长得很美，她是我家的46号、年龄最小的郎蕙丽。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气质清纯，目光清澈。

我们也是同一届，下乡前我们在同一个学习班里学习，谈理想，说抱负，情投意合。快到出发的日子了，上级为我们自愿去插队的同学补助一批布票（布票在当时是很珍贵的），谁有困难可以提出申请，有的同学接受了补助。当时我的家庭很清贫，家里根本没有布票买布为我做被褥，但我打肿脸充胖子，不肯接受补助，认为这是革命态度是否坚决的表现。对此，郎蕙丽对我颇有好感。

到农村后，郎蕙丽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好作风赢得了大家的赞扬。她能从一个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很快完成对艰苦生活的适应，是多么了不起！别看她年龄最小，在女同学中论起谁最能干，她当名列前茅。

每当日落西山红霞飞，割了一天地的知青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知青大院的时候，你看，数郎蕙丽的样子最最动人：她的额前耷拉着一绺被太阳晒焦的黄头发；脸被汗水浸过后，不知怎样用手抹的，留下一道白、一道黑；后腰上别着几枝"甜秆"（包米秸），手里拎着一把镰刀。那天真的样子好可爱，又叫人好心疼。难怪她的父母到靠山来看她，一见到她这副样子都流下了眼泪。郎蕙丽却大惑不解："你们哭啥呀？"

不管严冬酷暑，不管下雨刮风，她从不误工，每到年底她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在女同学中都是最高的。我们每次上山打柴，女同学都以她为标准来判定自己柴捆的质量。她的柴捆个个都一般大小，又结实又漂亮，而且我们还在暗中数着她柴捆的数量，生怕被她落下。每当谁劳累过度想偷懒休息半天，一看到比自己小的郎蕙丽能天天坚持，也就不好意思休息，咬咬牙就熬过来了。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人在艰苦环境中最应具备的品格，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些哥哥姐姐们：战胜困难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强。

1969年，郎蕙丽被选为生活委员，肩负起管理全家生活的重担。管理几十个人的吃喝非同小可，在生产队劳累了一天后，她的身影总是在青年点的厨房和粮库之间穿梭。她很有计划，每天晚上拎着一杆秤把第二天大家吃的米面称出来。她很会精打细算，哪顿吃大饼子，哪顿吃高粱米饭，哪天改善生活，绝对心中有数。

我们的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日久天长各自看到了对方的缺点，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却看不得别人的缺点，她那出奇的率直有时会令你倍感难堪。渐渐地，我们拉开了距离，彼此最初的那些好感消失殆尽。

刚下乡时，我为了表明自己很早就认识肖平，一天，我吹牛说："我上学的路上天天遇到肖平。"当然我遇到过肖平，但不是天天。在全家的大会上，郎蕙丽发言说："翟雅萍这

个人太爱撒谎。”我吓了一跳。几十个人洗耳恭听，“你说你上学的路上天天见到肖平，肖平天天骑自行车上学，你怎么能天天见到她？”从此我领教了她。

1969年底，同学们准备选我做大师傅，她直截了当地表示不同意。后来我的选票超过了半数，她的希望落了空。虽说当时她作为我的上司（生活委员）有权利严格要求我，可我总觉得她是在故意刁难我。

大师傅除了做饭还要喂猪，我每天忙完人吃的忙猪吃的，天天累得焦头烂额。一天我正忙得不可开交，她大着嗓门叫了起来：“翟雅萍你听到没有？猪饿得直叫唤！”猪饿了会嗷嗷地叫唤，数九天北风一吹，猪也会冻得嗷嗷地叫唤。她这样对我嚷不是头一次了，我也不示弱，马上回敬她：“难道你做饭的时候猪饿了就不叫唤吗？再说今天猪叫唤是冻的不是饿的！”

我用一块干净的布缝成一个小口袋，将花椒大料装在里面，做菜时这个口袋可以反复使用。一天我糊里糊涂地把小口袋倒进了猪食锅里。待到它漂上来以后，我想：算了，不要了。沉吟了一会儿，又觉得可惜，又把它打捞上来，用水洗了洗，准备以后再用。这个过程全被郎蕙丽看到了，她又是大声地对我说：“你怎么把猪食锅里泡过的东西叫大伙吃呢？”我对她解释说：“今天锅是我新刷的，锅里只有水和糠，再说做出来的菜我也和大家一样吃呀！我不是坏了良心，而是反应得慢些而已。”她根本听不进我的解释，拂袖而去。

我是个喜欢干净的人，洗菜时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洗，淘米时，几十斤米一瓢一瓢地淘，从不胡弄。即使这样，她还是能挑出我的毛病。每次与她争执后我的心情都跌入低谷，没办法，谁让我偏偏遇上了这个冤家！她就像一个常常在客人面前专门为父母“直罗锅”的孩子，很少考虑被伤害后对方的心情。直率实则美德，但任何美好的东西你把它异化了，就会使其变味。

我也有报复的机会。早晨同学们用水缸里的水刷牙时，都先用水瓢舀水，再倒进自己的牙缸里。那天早晨，郎蕙丽因着急，将自己的牙缸直接伸进水缸里，于是我也对她喊道：“你的牙缸比大家的干净吗？那是给大家做饭用的水！”她自知理屈，没有做声。当着大家的面我也给她个下不来台，很是得意扬扬。其实我知道她是单纯的，单纯得眼里揉不得沙子。可我们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难道我愿意演绎出这种种不愉快吗？

晚上睡觉前我们女同学习惯在炕沿边坐成一排洗脚，南北两铺大炕，自然就坐成两排，脚泡在水里，面对面地东拉西扯。忽听郎蕙丽当着大家的面说：“翟雅萍这个人实际上有好多优点。”我怕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这个时时找我毛病的人，在她眼里我会有优点？我的眼光越过几个盆惊奇地看着她。“她爱学习，还那么喜欢文学，如果能收到一封翟雅萍写的信，那一定很有意思。”真是如雷贯耳！我的脸刷地红了。我这个人心软听不得好

话，更难得听到她的好话，于是附和道："那好，明天我就给你写封信，从炕头寄到炕梢。"大家都笑了。过后我沉吟，我是不是对她成见太深？

我拿到招工通知书那天是1971年12月31日，是一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全家人在开每年一次的元旦联欢晚会。晚会刚开始，大队通讯员张大爷趴在窗口告诉我，现在必须去一趟公社给招工通知书盖章，不然第二天就是1972年了，会影响将来回城后的晋级等等。

大冷的天，外面又是黑咕隆咚，我真愁这夜路可怎么走。我犹豫地望了望窗外，想找个人陪着又不好开口，因为正在开会。即便不开会也不见得有人愿意陪我去，因为今天我的一纸招工通知本就在青年点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今年的9月份是1964年建点以来的第一批抽调，走的八名同学除了马先明和苏立力是1964年毕业的老高中外，其余六名全是1968年来的出身好的同学。到了年底，第一次抽调的余波还未平息，大家都沉浸在"哪辈子能轮到我"的茫然遐想中时，我所在的辽宁省"八三"工程文艺队也争取到了几个抽调知青的名额，其中有我（文艺队已解散，我早已回到青年点）。像滚开的油锅里倒入凉水，青年点炸开了锅。"她凭什么走？比谁干得好？""她改造好了吗？她出身好吗？"是的，论资格，论出身我怎么能比得上此前的八位同学？可这是天意，我又没占青年点的名额！是愤懑也好，是嫉妒也好，是我回城的现实叫大家因9月份抽调刚刚平复一点的心情又波动起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我怎么好意思叫别的同学黑灯瞎火地陪我去公社？没关系，夜路我也不是没走过。我系上围巾，穿上大棉袄，郎蕙丽忽然站了起来："天这么黑，我陪你去。"说完她就穿衣服。我吃惊地望着她，真是说不出的意外和感激。

黑夜一口将我俩吞进它的肚子。出了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踏进无垠的雪野，寒风中一只手电筒的微弱光芒扫射着茫茫的远方。冬天的原野寂寥而空旷，一场场大雪不仅把黑土地罩了个严严实实，还带来了逼人的严寒。这是我耕耘过的土地，即使是黑夜，我也熟悉它的一沟一坎、一坡一湾。

我们紧紧挽着胳膊，第一次挨得这么近，彼此能听到对方的呼吸。我们一路走着唠着，她还帮我憧憬着回城后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我早于她先回城的嫉妒情绪。我从来没感觉到身边的这个女孩是如此的亲切。这个美丽的女孩其实像白雪一样圣洁，我多么后悔从前的日子没与她好好相处。我比她年长却不曾有过做姐姐的样子，如果一切能够重新来过多好！此时好像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恩怨，没有过矛盾，倒像一对一直非常要好的姐妹。很自然地我的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绵绵的眷恋，涌起一阵依依的别情。"总是离人泪千行"，我默默地流下眼泪，是因为此时对她的感激，是因为从前我一直不曾善待她。黑暗中我希望她没看见我脸上的泪光。这是我作别靠山之际，第一个引得我流下别离之泪的人。

岁月只能改变郎蕙丽的年龄，但永远改变不了她的品格——真纯与善良，诚实与执著，出污泥而不染。永远的郎蕙丽！我永远的息息相关的好朋友。

写在后面

几度山下春草绿，几度山上秋叶红？在岁月的更迭中我们奉献着、拼搏着、彷徨着、痛苦着。我们调动了生命中的全部顽强蘸着汗、蘸着泪、蘸着血书写了自己的知青岁月。难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幻，尽管有那么多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2004 年，靠山屯知青纪念自己上山下乡 40 周年时，我们的同学丁峪麟写的一首情深意长的歌曲表达了靠山屯老知青的心声：

我曾义无反顾奔向你，
我曾满怀豪情追随你，
为了你我披星戴月，顶风冒雨，
你却让我伤痕累累耗尽全力。
我把满腔热情抛给你，
我把壮丽青春献给你，
为了你我百折不挠，备受磨砺，
你却让我梦想破碎迷失自己。
我是不是应该恨你？
你使我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你叫我变得自强不息。
你让我懂得了幸福的真谛，
你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真的爱你。
究竟是你拒绝了我，还是我放弃了你？
我的爱没有结局，没有结局。

作者简介

翟雅萍，女，1965 年初中毕业于沈阳二十九中。同年 9 月赴辽宁省开原县威远公社靠山屯大队知青点落户。1971 年末调回沈阳。现已退休。

人狗情

庞统敏

我们林场的杨明开真可以算个动物爱好者。早在去林场的路上,他就对遇到的看家狗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们去的前进林场不但环境险恶,而且连知识青年的宿舍也没有,借住在农民家中的杨明开自然无法圆养狗梦。

初冬,林场迁到了任家大院,改其名叫先锋林场,我们有了自己的宿舍。因为远离城市的喧闹,又缺少娱乐活动,且难买到照明的煤油,工余饭后感到有些无聊,知哥知妹们大多围在火塘边,靠聊天消磨时光。杨明开却与众不同。他从农家抱回了两只毛色黑白相间的活像绒线团的小狗,在兼有烤火、吃饭两种功能的大厨房里开始养狗。

只见他一边来回走动,一边撮拢嘴唇,"啧啧啧"地呼唤,那两个可爱的"绒线团"就跟着他的脚"滚动"。正有些无聊的场友们看得眼热,便七嘴八舌地学他唤起狗来。在众多的"啧啧啧"的呼唤声中,"绒线团"不断地由这个人的脚边,"滚"向那个人的脚边,引出一阵阵带着童趣的欢笑声。不过谁也争不过杨明开,似乎他的唤狗术天生就娴熟得多,"绒线团""滚"向他的概率最大。他不但会唤狗,也用心关照它们。他怕它们冷,出工前总把它们安置在尚有余温的火塘边。出工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去火塘边看它们。狗太小了,还不大会吃东西,他便特意留下米汤,装在碗里喂它们。它们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使劲儿舔,他则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之后,他会一一抱起它们来,小心地擦干净它们的嘴。

虽然杨明开很疼爱它们,伙伴们也都很喜欢这两个小家伙,可是,没过多久它们就死了。当地农民告诉杨明开:这样小的狗,不易养活,现在到了冬天,就更难养了,因为俗话说"火是乌龟,越烤越萎"。可他却舍不得放弃自己的嗜好。伙伴们也觉得,逗小狗好玩

儿。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又先先后后、断断续续地养过好几只刚满月的或稍大点儿的狗。他一如既往地关照它们,也记住了农民的话,不让它们烤火。怕冻坏小狗,晚上总是让它们睡在自己的寝室里。可最后仍然都没能养活。这不光因为狗小、天冷,也因为缺少适合它们吃的东西。老实说,当时我们都吃不饱,连米汤也不可多得,哪有粮食喂它们!

狗没养活,他自然有些伤心。可是,伙伴们却渐渐发现了狗的许多缺点:又脏又臭,爱长跳蚤,有的跳蚤甚至都跳到人的被窝里了,有的小狗在夜里还要哼哼唧唧地撒娇。林场各寝室之间,都只隔着一层木板,不隔音。累得精疲力竭的人,被狗的哼叫声扰得不能安宁。所以,狗没养成功,大家反而高兴了一阵子。

可是杨明开却不死心,又看中了牟家山的一条大狗。大家知道后,在火塘边自发地开了一场"批狗"会。有的说,对狗的脏、臭、跳蚤早就难以忍耐了;有的说,夜里被狗的哼叫声扰得心烦时,恨不得立即把它扔得远远的;还有的说,大狗不同于小狗,俗话说"喂不饱的狗",人都不够吃,拿什么喂狗啊?

开头,杨明开还犟嘴说:这只大狗很懂事,决不会随地大小便,夜里也不会像小狗那样哼叫。又说,农村到处都养狗,到处都有跳蚤,不养这只狗,一样有跳蚤。直到提出"吃"的问题,他才渐渐把头埋下去,不吭声了。他能说什么呢?因为缺乏蔬菜,油、肉供应也不多,35斤定量根本就不够我们吃。到林场不久,就因为寅吃卯粮,发生过断顿的事儿;也因为难耐饥饿,包括他在内的男生们还抢过大锅里的饭。虽说后来经过计划安排伙食,蒸过"罐罐饭",没再发生断顿、抢饭的事了,却始终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拿什么喂狗呢?

谁也没想到,第二年初夏,我们刚开始挖新洋芋,杨明开就把那条早就心仪的狗弄回了林场。本来大巴山的狗不值钱,但主人舍不得那条狗,他只好把这个月发的一元五角零用钱全掏出来,塞到主人手里,才把狗牵了回来。对此,同学们自然议论纷纷,我更是如闻惊雷,坐卧不宁。我忘不了在前进林场,多次被场长家的两条大花狗惊吓。尤其刻骨铭心的,是第一次出工回来,我累得精疲力竭,把刚刚掰下来的一大背包谷背到了屋后的晒坝边上。没料到,那两条大花狗突然狂吠着朝我扑过来,吓得我心慌腿软,一下子跌进了蓖麻笼里……想起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心有余悸!最可恨的是在头天晚上的"接风宴"上,我还按场长教的方法,喂这两个畜生吃了好多肉骨头,仅仅过了一晚上,它们竟然就不认得我了!我对狗自然又怕又恨。迁到先锋林场,最庆幸的,就是这里没有狗。可如今杨明开却要养一条大狗,我怎能不心慌!

怎么办?劝他把狗退回去?估计他不会听。大家那么多意见都没能说服他,能劝得转么?

我们几个怕狗的同学,决定先看看刚牵回的狗再说。

那条狗拴在厨房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全身雪白,骨架高大,我们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它却并不向我们示威,甚至根本不看我们一眼,只顾径自发出一种凄楚的呜咽声,似乎是宣泄心中的悲哀。不仅悲哀,它还扭过头去,拼命啃咬那使它失去自由的绳子,显然想要逃走。可是,绳子上套着竹筒,它哪里咬得断!于是它愤怒地转圈、挣扎、嚎叫,累了就伏在地上,悲哀无助地喘气、哀鸣,缓过劲来再开始新一轮的挣扎、啃咬……

如此这般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使原本恨狗的我也生出了一点儿同情心来。它为什么如此悲哀且执拗地想逃走呢?会不会是太饿了?我们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些,没想到,在我们刚才的位置看不到的地方,竟赫然放着满满一碗白米饭!我们惊讶了!最近,每人那份饭虽然分量比过去多些,但都以新洋芋为主,只有很少一点儿米,杨明开却为狗准备了这样满满一碗白米饭,真不知他是怎样省出来的!

可是,那狗却对诱人的白米饭根本不屑一顾。估计它不会留下来,我们有点儿放心了。

我们想错了。两三天后,出了早工回来,就看见杨明开轻松地吹着唤狗的口哨走过来。紧随其后的,正是那条曾以绝食抗争的狗。我不知他是怎样收服了倔犟的它的,只好赶快躲开。杨明开却笑着说:"不要怕,它不会咬你们的。它叫雪豹子。我已经把它驯好了,以后雪豹子就是林场的狗了。吃饭的时候,你们都喂它吃点,它会听你们的话的。"说完,带着狗欢快地跑开了。我想起了前进林场那两只没有眼色的狗。不大相信杨明开的话。

但雪豹子很快就证实了主人的话。当天傍晚,我们收工一回到院中,雪豹子便殷勤地摇着尾巴,迎了上来,眼神那么和善、友好,像在告诉大家:"你们好!你们都是我的主人。"我和同伴们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眼中都流露出惊喜。雪豹子聪明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它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呢?我突然萌生了好奇心,试着喊了一声:"雪豹子!"没想到,它立刻专注地盯着我,更使劲地摇尾巴,而且亲热地向我靠拢来,吓得我连忙改口,大声喝道:"走开!"它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犹豫着停了下来,疑惑地看着我。我不敢再喊它的名字,却也不好再撵它走,愣在了那里。它注视了我好一会儿,才不解地走开了。就见杨明开从屋里出来,得意地对我们说:"怎么样,不怕它了吧?"

原来,他先我们一步到家,导演了刚才那一幕。雪豹子一见到他,立刻靠拢去,快乐地围着他跳跃了一阵,又偏过头来靠在他身上,还亲昵地"嗯嗯"叫着,似乎向他报告:"迎接主人们的任务完成了!"杨明开则温柔地抚摸它,和它说话,眼神透着喜爱。

从此,工余饭后,就常常见到杨明开吹着唤狗的口哨,逗雪豹子追着他跑。有时,他随手扔出什么东西,雪豹子立刻一跃而起,矫健地追踪而去,再把"猎物"衔回主人面前。有时,他故意让雪豹子坐着或是只用后腿站立,仰起头来,张嘴接他抛过去的一点儿食

物……这些简单却又充满人狗情的活动，使我感到狗也有招人喜爱的一面，在我们艰难的生活中，雪豹子是能带来乐趣的朋友。

雪豹子和杨明开虽然亲热，开饭的时候，它却不缠他。它也许知道，他那份饭有限，所以总是在大家面前转悠。如果大家都不理它，它就选定一人，用恳求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还殷勤地大摇尾巴讨好。谁能狠心拒绝它呢？几乎人人都曾被它乞求的样子打动过，都或多或少地从自己那份尚不能完全饱肚的饭中，夹出一点儿来喂过它。它总是激动地扑向散在地上的饭团，临到嘴时，却又尽量装得"绅士"一些，斯斯文文地用舌尖一点点地舔起来慢慢品尝，直到一粒不剩，才到另一位主人面前去耐心地等待。

它的乞求技能虽然高，却也有落空的时候。那是我们上坡干了重体力活儿之后，又累又饿地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端起自己那份饭来，感到特别香也特别少。等到饭全下肚，才发现雪豹子正眼巴巴地盯着自己，肚子瘪瘪的，连尾巴也翘不起来了，不过还在摇。同情和歉然中，急呼："谁还没吃完，喂雪豹子一点儿！"吃得慢点儿的，便忍嘴匀点儿给它。不过，有时也会响起这样的回音："我自己还没吃饱呢！"大家正在遗憾时，忽然发现食量大、吃饭快的杨明开居然还剩了一点儿饭，于是雪豹子有幸填填肚子。怪不得它对他特别亲热！

虽然常常半饥半饱，雪豹子却忠实地护卫着我们。在寂静得可怕的夜里，它用雄壮的"汪汪"声示威，使山林发出的令人心惊的"呜—呜——"的风声，屋前屋后窸窸窣窣的虫鸣和突然传来的稀里哗啦的异响不再可怕，我们得以放心地进入梦乡。对想进知青屋的生人，它会威严地大声警告，甚至扑过去把来者撵得落荒而逃。不过，它对我们喜欢的刘社长和外场来玩的知识青年却像对老熟人一样，这使我们不得不赞叹它的聪明和世故。

后来发生的故事，使我们对它越发刮目相看了。

离林场较远的二大队有一位老红军，很想亲眼见见众乡亲都夸赞的知识青年，便借娶幺儿媳妇的机会，托人带口信到林场，邀请我们去喝喜酒。偏偏许多人有事，只有我和谢赐雯、涂德懿有幸去见仰慕已久的老红军。我们有些怕一路上的农民养的看家狗，杨明开便叫我们带雪豹子去赴宴，说是有了它就不怕别的狗了。雪豹子能打败这一路上所有的狗？我们不敢相信，但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试一试了。一上路，雪豹子就乐颠颠地跑在前边，好像是专程赴宴去。我心里有点打鼓：遇到狗时，不知它会怎么样呢？

经过离林场最近的吴家院子时，因为我们早就知道院里有条很凶的狗，不免惴惴不安，蹑手蹑足，想悄悄从院旁的小路通过。可那狗的耳朵何等的灵，人刚到院外，院中立即响起它震耳的吠声，吓得我捏着棍子的手都发抖了。在这个关头，只见雪豹子身影一闪，进院去了。我们还在惊疑不定之时，就听到吠声突然变得温和了，再后来就没有了。我们又惊喜，又担心有变，赶紧趁机快速离去，直到远离了吴家院子，才松了口气。雪豹

子匆匆赶来,又蹿到前头探路去了。虽无法问它用什么法子镇住了那条恶狗,但见识了它的本事,心里安定了许多。

可是,来到第二个院子旁边的时候,我们再次慌了神,因为那院中竟蹿出了三条大狗,气势汹汹地分两路包抄过来。我们胆怯地停下来,把棍子捏得紧紧的,以防不测。雪豹子显然也意识到局势的严重,立即朝着那几条狗一阵狂吠,居然就把单走一路的那只黑狗镇住了,那狗犹豫地停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雪豹子矫健地飞身纵起,只两三个起落,便到了从侧面袭来的另外两只大狗面前,横身一挡,封住了它们的出路,嘴里还"咿里咕噜"地"说"了些什么,那两只狗居然也停下来,"咿里咕噜"地"答话"。雪豹子又礼节性地摇了摇尾巴,那两只狗也朝它摇摇尾巴,似乎双方"谈"得很友好。看着这一幕,我们又惊又喜,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走得远远的。等雪豹子再次追上来时,我们都忍不住喊着它的名字表扬它。它朝我们看了看,翘得高高的尾巴摇了几摇,好像是说:"算不了什么。"又前头带路去了。

就这样,我们在雪豹子的护卫下,安全通过了一个个"关口",见到了头缠青丝帕,和老农民没什么区别的老红军。他饱经风霜的脸显得和蔼慈祥,满面笑容地接待了我们,又热情地邀请我们入席。我们则好好地犒劳了雪豹子一顿。

这次出行,使雪豹子名声大振,我们宁愿自己少吃点儿也要多匀出点儿饭喂它了。

秋收后,林场迎来了第二批知识青年,显得特别热闹。我们热情地为新伙伴献上自编的歌舞,雪豹子跑来跑去,殷勤地向新主人摇尾巴。公社请来木匠、棕匠,为新来者做床,扎"背搭子"(用棕做的,背在背上的垫子)。虽然雪豹子热情,但也有新主人不喜欢狗。正待我要讲雪豹子的故事给他们听时,他们就亲见了雪豹子的本领。

那是新伙伴来的第二天晚上,大家围着火塘聊得正高兴,突然听到雪豹子愤怒的狂叫声,好像是在咬陌生人,又像是发现了危险情况。我们都有点儿奇怪:这是怎么了?新伙伴喻光成突然一激灵,惊呼:"哎呀,是不是有人偷我们的铺盖卷了?"因为床不够,有几个新伙伴的铺盖卷尚未打开,暂时堆在我们的大寝室里,而寝室从来不上锁。本来以为没什么问题,可雪豹子的叫声使我们觉得不妙。赶过去一看,雪豹子坐在大寝室外边守着,虚掩的门大开着,离门最近的铺盖卷散了,那正是喻光成的行李。喻光成急切地查看行李后,松了口气说:"还好,没掉东西。"不难想到,林场中可能混进了不地道的人,而贼刚刚打开包,就被雪豹子发现了。

我们辛苦一年后,学会了种菜和养猪,又有第二批知青的供应,生活当然好多了。大家喜爱的雪豹子也养得更壮,显得更加威猛了。

虽然生活比过去好,但时间一长,大家都厌倦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了,都觉得街道的宣传太夸张,远大的理想似乎成了肥皂泡。这时,文化大革命波及了社办林场。"砸烂社办林

场”的口号唤醒了我们深藏心底的“回重庆去”的愿望，大家积极地参加了“3 · 12”“6 · 12”等知识青年的集会，又轮番走出闭塞的林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或回到思念中的故乡。不多的几个暂时留守者，也是人在林场心在外。老场员都回了生产队。林场真像被“砸烂”了。

尽管主人们时来时往，流动性大，雪豹子却忠实地看守着几近空屋的知青房。可林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雪豹子也随之慢慢变得忧郁、瘦削了。寂寞而又迷茫的留守者，有时看着它日渐嶙峋的骨架，也不禁有些心酸。它却还向主人摇尾巴，不知道是在安慰主人，还是希望得到主人的爱抚？

数月之后，许多人陆续返回了林场，雪豹子兴奋地摇着尾巴在人群中穿来穿去，似乎觉得等来了它盼望的好日子。它哪里知道：主人们是因各方动员、没有粮食关系等各种原因不情愿地回来的。大家忙着交流带回来的各种小道消息，探讨着自己的前途。传闻“社办林场可能解散，知识青年都要分散插队”，大家感到大失所望，不愿相信却又有一种不幸言中的预感。只有“等几年要招工”的传闻是佳音，人人都希望这是真的，可是“等几年”自己会不会落空呢？这几年好难等……前途未卜，哪里还有心思逗狗呢。

不光心安不下来，连日子也差点儿过不下去了。保管室里还有一点儿五谷杂粮，省着吃还可以吊命。油荤却是一点儿也没有了。养的猪早在数月前处理完了，供应早就断了，肠胃几乎生锈，清口水往上冒，渴望尝点儿肉味儿，却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来。饥肠辘辘的人无可奈何地把眼光瞄向了雪豹子，向杨明开提议“打了解解馋吧”！闻听此言，杨明开惊诧地搂住雪豹子，连声说：“不、不、不，我不干！”

但生存的本能，使渴望尝到油荤的人又几次旧话重提。每次杨明开都摇摇头，只默默地抚摸雪豹子。雪豹子总是乖乖地依偎着他，任由他爱抚，却不再活蹦乱跳了。使人觉得，聪明的雪豹子是不是悟到什么了？

一个浓云覆盖的阴天。大家散坐在院子里，没谁说话，都显得心事重重。雪豹子卧在旁边。我望着天空，觉得灰蒙蒙的天就像我们的前途一样看不透。突然听到背后的一段对话。

“杨明开，你看雪豹子那可怜相，活起都遭罪。”

杨明开轻轻叹了口气。那人也叹了口气。沉默了一阵，说话声又响起来：“我们以后究竟怎么办喽？”

“哪个晓得。”这是杨明开的声音。

“人都不晓得怎么办了，喂狗还有啥意思？”

“可它是条命啊！”杨明开无奈地说。

“我们也是命呀！现在知青和雪豹子一样可怜。”说话者大约想起自己的处境，语调

变得悲哀了。

我转过身来，看见杨明开呆呆地望着前边不知什么地方。良久，神色黯然地走到雪豹子身旁，蹲下来一把搂住它，潸然泪下。院子里一片沉默。搂着雪豹子的手突然放开了，杨明开疲惫地站起身，双手迅速地在脸上抹了一把，不知是要驱走疲惫还是抹去眼泪。"哎呀，我狠不下这个心。"他伤感地摇着头，小声地自言自语似的留下这句话，便头也不回地逃回寝室去了。我心头一紧："雪豹子危险！"雪豹子似乎也感受到什么了。它没有像平日那样紧随杨明开离去，而是紧紧地夹着尾巴，可怜巴巴地立在原地，眼睛里分明含着泪水。可怜的雪豹子！我冲口而出："不打嘛，雪豹子好可怜啊！""不打嘛！"许多人喊。可是，几个男生却"啧啧啧"地把雪豹子往厨房引。我们几个女同学着急地喊："雪豹子，快跑！"可是，雪豹子没有听懂，虽迟迟疑疑，却仍听话地跟着进了厨房门。眼看悲剧就要发生，我们无可奈何。

为了从哀思中解脱出来，我们躲进了远离厨房的寝室，再拾有关前途的话题。这一招很管用，我们很快就全身心投入了争论之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听见有人喊"吃饭了！"肚子咕咕叫着，跨进久未冒过油烟的厨房，忽然闻到一股奇特的香味儿，不自觉地咽下口水，才猛然想起了雪豹子！

不少女同学不忍看菜盆，可香喷喷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不由自主地加深了呼吸，踌躇了半天，最后夹起一两块肉，端着饭走开了。

我不敢沾菜盆的边，匆匆端着饭进了寝室，却似乎看不到饭，只有雪豹子的故事一一浮现在脑海里，连成了一片，挥之不去。直到吃完，竟全不知饭味儿。

去洗碗时才发现，冷清清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人蹲在地上，那是杨明开在拾雪豹子的骨头！我猜到了他的意思。果然，他包好骨头，在厨房外的大松树下刨坑。我的眼睛湿润了。

作者简介

庞统敏，女，1964年初中毕业于重庆井口中学，当年9月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涪阳公社林场。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西昌师范，一直任小学教师。现已退休。

上山下乡四部曲

谭世通

一　失学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家庭，但打记事起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气氛中。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正统教育，同其他少年儿童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家庭教育我诚实正直、友善乐群，我在学校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干部，对社会抱着美好的心态，并决心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到了1963、1964年，周围的政治空气已有了越来越浓的极左味道，我也慢慢懂事，在长沙湖南师院附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开始感到自己似乎属于另一类人。我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我的思想仍旧十分正统，人也仍旧正直诚实活泼友爱。在不带阶级偏见的老师心目中我仍是个好学生，自己也自认为是个好学生。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不使我在潜意识中有了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最初是从学校常常要填一些表格开始的。这些表格都毫不例外地有“家庭出身”一栏。

我知道我父亲作为我祖父唯一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主”。因为我那与反清革命志士陈天华是同窗好友，也曾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的祖父解放前拥有二十几亩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田产，老年时一直靠收租为生，“土改”时虽年事已高，仍被划为地主。

然而我们这一代的家庭出身该怎么填呢？我父母解放前一直在城里靠教书维生，父亲办了一所县立女子中学，但由于经费不足，他这个做校长的常常自己不领薪水。幸亏祖父不要父亲供养，母亲娘家境况也好，父母的小家庭才没有为此而生活困难。

我姐姐也曾在湖南师院附中读书，1960年考入湖南医学院。她一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她说对党要忠诚老实，党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填什么出身不要紧，关键是听党的话。于是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以祖父的为准，填“地主”。父母对此也没说什么。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时，我也就填了“地主”。

但是从我学习的课本中，从我看到的电影、听到的广播中，“地主”都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概念，这不能不使我开始感到自卑。不过最初，这种自卑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填表过后不久也就忘了。

然而，在那个将阶级斗争奉为宝典的时代，如果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那个阴影是你根本不可能摆脱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刻都在提醒你的家庭出身问题。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大约是初二年级下期（1963年），一天学校召开各班主要班干部会，我也去参加了。那次主持开会的是学校李副校长。会议一开始，李副校长就劈头盖脸地大叫：“有的人对组织不老实，隐瞒家庭出身。”“难道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共裤连裆吗！？”李副校长完全是在咆哮。

那次会上李副校长还讲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李副校长咆哮过后，我的脑瓜子已变成一团浆糊。不过我还是记得他咆哮时很多同学都低下了头，我也不例外。我倒并没有对组织不老实，不过我也曾想过，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不再填“地主”。一来我觉得我本人并不出身在地主家庭，而更主要的是，填“地主”丢人。虽然我仅仅只是在心里想以后不再填“地主”，但李副校长的斥骂仍使我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似的，脸上火辣辣的。

家庭出身产生的自卑感使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初二退出少先队后，不少同学开始争取入团，但我却已打定主意不入团了。因为我姐姐申请入团的经历告诉我：团的门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我姐姐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群众关系极好。她不但学习成绩顶呱呱，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对组织也极其忠诚老实。

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她紧紧地关闭着。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虽然我姐姐对那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考验态度始终虔诚，但这种考验却在我们这些做弟妹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而这种浑浑噩噩，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前途的盲目乐观和对周围正在急剧左转的政治风向的毫不觉察、毫无戒备上。

初中，我一直都是半学半玩。凭借一点小聪明，没花工夫就使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名

列前茅，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读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以为就这样半学半玩地读下去，将来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也不成问题。

当然，我也隐约地感到周围的空气正在变得令人很不舒服（25 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种空气叫“极左空气”），报纸电台以教训人的口气宣扬的理论，与我们实际接触到的现实、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我却丝毫也没有将这一切与自己的前途（更没有将这一切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这一切完全没有防范。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升学考试前，我仍旧同以前一样没有半点紧张感，仍旧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田径场和篮球场上。

1964 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物理一百分，外语九十九分，是全班第一；数学和化学也都是九十几分，语文和政治这两门需要背诵的科目分数虽然比不上数理化，但也不差。随后的高中升学考试，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漫长的暑假过后我等来的不是高中录取通知书，而是不录取通知。在学校时，同学们都称那种通知书为“安慰信”，但我从那半张劣质的油印纸里却没有读出丝毫安慰的味道。那份只几行字的通知除了告诉我因招生名额所限我未被录取外，就是告诫我：个人的理想要服从党的需要。

说实在的，接到那份通知书时我的心情是相对平静的，也就是说我对那份通知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同前几年比，湖南长沙 1964 年的大、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离新学期开学已经很近了，按往年，大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下来了，但这一年，参加大学、高中升学考试的学子们却迟迟没有得到录取与否的消息。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从近两年越来越令人头皮发紧的政治空气中，大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点什么。

大学录取情况终于揭晓以后，人们的预感和议论被证实了。

以前升大学虽然也要“政审”，但毕竟也看看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可这一次人们发现，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已经完全没有用。那些本人表现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不管他如何一贯成绩优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学，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只要“苗正根红”，不管他以前表现是好是差，学习是优是劣，这次统统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显然，这次大学录取凭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和平时表现。因此当随后高中的通知书发下来，我接到的只是“安慰信”时，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强了，大学的录取结果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

回顾初中生活，不论怎么说，在班上我都是一个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尊师守纪、诚实正直、爱护集体的思想单纯的好学生。

我学习不甚努力，但成绩却名列前茅；我发育迟缓、个头矮小，却是班上篮球队主要

得分手；学校的少年广播站，我是三个广播员之一；学校搞文艺演出，我总是班主任最先考虑的参演人选。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校的大门对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

我没有能够考上高中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因为自己太幼稚，对党太忠诚老实。当然对后面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后悔，忠诚老实永远都是一种好品质。而且在中国当时越来越左的非理性的政治气候下，家庭出身不好，终究没有好果子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的初中同学蒋氏、阿锋当年都考上了高中，是因为他们填家庭出身时都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蒋氏一直填他父亲是工人，为此 1968 年长沙的老三届最初“三个面向”时，蒋氏甚至被分到了广播电台。不过，很快他就被清了出来，仍旧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因为进电台审查特别严，终于查出他填报的“父亲”其实是他继父，而他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

初中毕业之前，学校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其实当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思想品质及平时表现的好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出身”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升学、升到什么学校的唯一标准。

我们年级有个诱骗幼女到山上进行猥亵、学习成绩又很差的外号叫豺狗的同学，因为阶级出身好，“考”上了本校师院附中的高中。好多品学兼优却因为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和我都被关在了校门外。小小年纪就受到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们当时对那套极左政策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和不满，反倒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无资格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

接到“安慰信”以后，我去了学校一趟，到了班主任夏老师的宿舍。对我不能上高中，夏老师的话很少，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现在想来，当时他也不可能对我作什么安慰。虽然从当时的作为和以后的发展来看，夏老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献身教育的人，而是一个思想“进步”有政治抱负的人，我不过是他政治抱负的牺牲品之一而已。不过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点都不怨他。尤其是后来我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政府实行的又是一套非理性的阶级斗争极左路线，这就更加加重了国家经济的严重困境，这种困境必然使大量的学生不能升学或就业，那么，谁来为执政者的低级错误埋单呢？上山下乡就成了我们这一代出身不好的人的“命”。

转念又一想，我们湖南师院附中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总是要有人被关在校门之外的，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个个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被关在校门外，其他同学也可能就多了一份上学的机会，我用这样的想法来平静自己。当时夏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尽职的，决定把谁关在校门外是当时的政策，不是夏老师可以左右的。

那天刚到夏老师宿舍时，单纯的我一开始心中并没有因为落榜而感到太多的委屈。当他问到我是否准备报名上山下乡时，我不假思索地就说准备报名，但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却不由自主地抽泣了起来。作为一个酷爱学习的学生，我隐约地感觉到今生大概我已

经永远失去了读书上进的机会，老师、同学和校园的钟声将可能与我终生无缘，我突然感受到无助、茫然和一种彻入心肺的痛，于是抽泣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伤心。夏老师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我虽然没有面对着他，只是低着头抽泣，但却似乎感到有一双同情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抽泣了一阵以后，自己默默地抹干泪水，就告辞回家了。

街道动员的上山下乡队伍也开始奔赴“广阔天地”了。没多久，我父亲工作的湖南师院人事科的人就找上了门，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罩住了我，在随后的一年里，我每周都必须到街道办事处参加一两次社会青年的政治学习，要参加街道办事处经常组织的义务劳动，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开会和政治学习。

走投无路的我这个时候又接到区里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的通知。学习班办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的古岳麓书院里，参加学习班的青年也住在岳麓书院。我们睡觉的一排排地铺，就铺在书院内一间大殿堂里。

每天上午到山上参加修筑岳麓山环山公路的劳动，下午在书院内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上刊载的先进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显身手的优秀事迹，以及谈自己的体会和打算，晚上则常安排看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电影。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用修环山公路的报酬支付伙食费。

在半个月的学习班上，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利用各种机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论在劳动、学习中还是在休息时，反复对我们宣讲革命青年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道理。

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个个都小心谨慎，在家信里、在回家探亲时从不敢乱说。但是私下里，农村生活的劳累和困苦、“辛苦一年还挣不够口粮”、“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等信息仍然悄悄地从他们口中传了出来。不过，我终于还是报了名。因为父母单位的动员，使我和父母都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单位的动员，不报名上山下乡，我父母在单位里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

我报名上山下乡，父亲什么也没说，母亲则用男子汉就是要出去闯的想法来分散自己内心的担心。她想，外祖父年轻时两手空空漂洋过海去美国，边当洗衣工边攻读学位，结果学成回来做了大学教授；而祖父虽然与反清革命志士刘天华是同窗好友，并结伴游学省城京城，也随刘天华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却因为害怕漂海而滞留在自家闭塞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土地主。刘天华成了写进历史书中的尽人皆知的反清革命志士，祖父却因为当土地主把后代连累了。母亲“男子汉就是要到外面去闯”的思想于普天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期盼也许有普遍意义，对因出身而惩罚性的必须上山下乡的我们恐怕就不能同日而言了。

就这样，1965年9月，已是个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广阔天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

二 劳累、饥饿与睡眠剥夺

临下乡之前，我对将去的农场也作过一番想象。虽然我知道农村不比城市，却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我更加失望。汽车把我们拉到的这个叫做樟树下、又称樟市的地方，却是一处杂乱的乡村墟镇，偏僻而破败。一看到它，就使我联想到初中课文《故乡》中的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樟市叫市不是市，说乡不像乡。它横亘在一条黄泥大土丘的上面。挤挤密密顺丘而建的房屋，连接成了一条长约三百多米、狭窄又高低错落的正街和另一条几十米长的横街。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这街上的住户除了极少数是与公社干部一样也穿着干部装、打着干部腔，在公社粮站、食品站、森工站，供销社、信用社、缝纫社，农具厂、木工厂、麻绳厂，以及饮食店等官办单位工作的吃国家粮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队耕田种地的农民，但是家家户户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结构，都有一个已经发黑、肮脏不堪的曲尺形木柜台，都叫做铺子。似乎在过去的年月，他们不是农夫，而是生意人。

我们农场的场舍处在这些“铺子”的包围中。之前它虽然是公社机关之所在，却只是一幢旧的老式大屋。现在，我们这批最大23岁，最小14岁，由71女36男组成的新式农民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虽然下了乡，却仍是住在街上。

当然，我们人虽然住在街上，但生计却在山沟里。作为我们主要生产资料的几百亩土地，分布在离樟市墟街三四里外的几处缺少水源的山窝窝里和山坡上，这些土地因为没有水源，当地农民才没有开垦而闲置。刚由拖拉机翻耕过来，从翻过来的大块红土仍交织着竹根、布满了树桩来判断，这里不久前还是长满着杂竹、荆丛和灌木的山沟和山坡。

107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少男少女，面对古旧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400块钱的安置费（包括我们下来的旅费、一年的生活费以及拖拉机为我们耕出这几百亩荒地在内的一切生产生活开支以及场舍的建设费全都在里面），构成了我们农场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粮食定量指标，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用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我们被告知明年将“吃自己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字：苦干。

下农村之前，我就作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在各种会上也表示过这样的决

心，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和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说到劳动的艰苦，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整日挥汗如雨抡着锄头使手上打满血泡，会想到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过坳。

其实，手上打满血泡还好对付，因为手上长满老茧以后就不会再打血泡了。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爬山过坳，压得肩上痛如针扎，腰酸得像要断裂也没什么大不了，半个月二十几天后，肩上的皮肉就适应了长时间压着的重担，腰力增加后筋骨也就不那么酸楚了。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楚都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在一天劳累之后，筋疲力尽，既填不饱肚子，连必要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更莫说有一点余暇和放松的时间！

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吧。

每天天还未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还睡意惺忪，就挑箧荷锄往地里赶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轻松吗？不，每人还要从地里挑一大担整出来的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又累又饿，还要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摇一晃地摸黑赶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场里。这个时候，腹中的空虚和极度的劳累使人感到双腿发软、腰往下坠、脊柱快断……

每日晴天一身汗，雨天则是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而且还满身稀泥，就连打着赤脚的脚板底下，都沾着几斤由草根黏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黏泥。一天两头不见光，这种机器人样的生活磨砺着 107 个从未干过农活的 14—17 岁的未成年人，天天如此。

在如此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米。菜更是少得可怜。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之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有时候，连小菜都没有。收工回来如饿狼奔到食堂，却只能发现每张做“饭桌”的条凳上除八钵饭外，仅摆着一钵照得见人影的干辣椒汤，这便是八个人的“菜”了。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就着点盐味和辣味狼吞虎咽。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每餐都是粗劣有限的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我发现有些场友也是如此）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场友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啊，那时的饥饿真令我刻骨铭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都没有如此饥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毕竟还没到“吃长饭”的年龄，更没有参加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虽然我们过着极度劳累又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我们却并没有感到半点委屈和不幸，

相反，我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下到了省委书记所蹲的“点”上，与省委书记为邻。

几乎在我们下乡到樟市的同一时间，湖南省第二号人物——省委王书记，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彭将军、省委统战部官部长，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晏将军等省委及部队的高级领导也来到了樟市，在这里“蹲点”，搞起了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省委书记和将军们就住在与我们场舍隔壁的一幢大屋里，我们能常常见到他们，并有机会请他们在我们的日记本上题几个字。这些都使我们兴奋，甚至自豪。而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这个由长沙知识青年组成的新农场的场长，是省委王书记亲自指定、从领导以前的“点”上调过来的长沙知青模范邓云玉。

邓云玉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虽然下乡只早我们两年，但她的年龄却已经25岁了。

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勤杂工的邓云玉，小学时代据说是在她那远离省城的老家乡下度过的，不过念初中时，她到了长沙，而且是我妈妈的学生。

在考大学虽靠家庭出身，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要看学习成绩的1963年，她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差，所以虽然有个工人阶级父亲（可惜不是高干），算得上“苗正根红”，却仍旧没能考上大学。

也许是从来就没有穿过漂亮衣裳，也许是思想革命化，尽管邓云玉已经被省委王书记提拔成了国家干部，但衣着却仍旧朴素得惊人。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她都是穿着那套已洗成灰白色的、男式的干部服。从面部看，如果不是鼻梁上的那副近视眼镜，她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不过，她穿着干部服时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套干部服太旧的话，却颇有几分像文化大革命中穿着军服的中央首长江青。

虽然，我们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倒不是由于她命令劳动委员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拼命地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开工，并且不到夜幕降临不准收工；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她手下，干着粗活重活却连肚子都塞不饱；而是因为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必要的睡眠。

每天收工以后摸黑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奔进食堂将几两饭吞进肚后，一个囫囵澡还没有洗完，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一点，招来的必是一顿劈头盖脸、严厉尖锐的批判。

我们的政治学习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自己农场学习；另一种则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队部，或各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即参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大会。

邓云玉的训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教育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学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还

要学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第二，则是讲她自己光荣的过去，讲她插队当知青时如何如何。

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覆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都像熟透了的稻穗头直往下栽。政治学习和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天天如此，这种被强听硬灌的日子又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起初邓场长也随我们下地，但只稍微干干，后来下地也少了。她是世故还是无知，我现在仍有些琢磨不透，不过多半像后者。她这样的人中国当时还有不少。现在回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感到自己直接用手将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粪捧回粪桶都算不了什么，筋骨的极度劳累和肚腹的极度饥饿也还好忍受，唯独那每天饥劳之后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想起来，仍禁不住心里打颤和头皮发紧。

三　革命！革命！

我们极度辛劳饥饿和剥夺睡眠的日子正好过了一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中的革命造反运动，将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断了。

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等，沿墟街那些歪歪斜斜的破旧木板屋的墙上，贴满了由公社党委，樟市食品站、粮站、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农具厂，还有樟市完小等各大小单位写的大字报。作为模范人物，邓云玉自然不甘落后，在她一手推动下，我们农场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人人都写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

1. 运动仍在深入

狠批了一阵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的邓拓以后，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身边的“邓拓”了。于是，在樟市公社的最高学府樟市完小，一个据说曾经当过国民党少校的老教师被揪了出来。虽然樟市与北京相距遥远，但两地的“邓拓”命运完全一样，他们都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据说长沙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抓“黑帮”运动，一些同学的家被抄，家人被剃半边头，被挂了黑牌子游街……这一切使我的心情也紧张起来。

我父母分别在大学和中学教书，这些地方向来都是运动的重点。因此，我担心父母也会被打成“黑帮”分子。因为很多事实都向我表明，像我父母那样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是最容易被“揪”出来的。虽然我知道父母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在我下乡前他们还教导我，叫我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说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搞得好。不过我也隐约地感到关键不在你是否真正拥护共产党。如果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吃阶级斗争饭、吃政治运动饭的人总会找到证据。

我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中带有普遍性。在一天晚上"向党交心"的大会上，陈韫安同学就道出了她的矛盾心情。她说，父母从小把自己养大，所以自己对父母是有感情的；但他们又有历史问题，如果他们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黑帮，自己应当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呢？陈韫安同学话还没讲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我感到，陈韫安同学的话也是我心里的话。

运动在深入。我们在担心父母、家人的同时，也开始人人自危。因为据说邓场长也正在我们农场物色"小邓拓"，并准备开展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争取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希望以此来使自己成为"小邓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有几天，我们这群来自同一座城市、平日关系融洽的知识青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相互攻击之中。不过，这种知识青年间的大字报战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就在这时候，邓场长贴出了一张决定性的大字报。正像不久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斗争矛头全都指向了刘少奇一样，邓云玉的那张"陶进雄，你想干什么！"的大字报，一下子使全农场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陶进雄。

陶进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县农业局樟市农技站技术员，应省委王书记的要求，他一直在我们农场指导生产。陶技术员虽然是个大专毕业生，但外表却有几分像农民。他教我们做堆肥时，手捧猪屎牛屎往肥堆上摆，完全不怕脏和累。近一年来，他天天同我们一起劳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农业技术。因此他与我们大家，尤其是与几个爱学农业技术的同学关系相当好。

在邓云玉导演的这场对陶技术员的斗争中，原先因为有的同学不会干农活，陶技术员以爱护的口吻，开玩笑地说的"你这猪脑壳"，就成了打击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行。

斗争大会一连开了好几个晚上，但陶进雄却并没有被斗垮。邓场长们很快就想出了办法，物色了可怜的姑娘陈韫安作炮灰。陈的父母因有历史问题已在单位被揪了出来。经过邓场长的思想工作，陈韫安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斗争会上发出了一颗令人难以置信的炮弹：控诉陶进雄曾对她进行非礼。虽然陈韫安的故事十分离奇，陶进雄也坚决否认，但会场上的一片"打倒"口号声就是结论。陈韫安控诉时声泪俱下，这是那个可怜的姑娘对自己身心受到玷污的痛悔。每当回忆起斗争陶技术员的情景我就感到内疚。斗争会上我没有充当打手，而且每次陶技术员被押上台时我几乎都因紧张、害怕而牙齿打颤、全身发抖，但我毕竟附和在人群中喊过口号，这助长了那种不道德的诬陷人、侮辱人的行为。

最后，陶技术员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受了连累。1995 年 9 月我们重返桂阳县纪念下乡 30 周年，打听陶技术员的下落时，曾经也在我们农场当过技术员，早几年还担任了县农业局局长的侯技术员告诉我们，陶技术员

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籍后仍是残酷斗争的对象，不久就被斗死了……

2. 我不是红卫兵，我并不想造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文化大革命"的经典名言传到农场后，邓云玉在对大家进行训话时就也学着以"黑狗崽子们你们听着"来开头了。当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传到樟树市时，邓云玉场长立即就带领我们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去县城造县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反，造省委王书记的反了。

虽然邓云玉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为闻名全省的知青"模范"，变为樟市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樟市农场场长，变为国家干部，靠的是省委王书记的赏识和提拔，但听到长沙的大学生造省委的反的消息后，邓场长不是奋起保卫给了她名誉地位的省委和省委王书记，而是立刻就来了个翻脸不认人。她不但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县委，也指向了省委工作队和王书记。这使邓场长立即又成了一名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邓云玉的造反行动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时。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邓云玉为什么要造县委和省委工作队的反？尤其是，为什么要造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书记的反？说老实话，我并不想造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自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弟，最好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去出风头，冒充红卫兵造反。

不过，在邓场长要做"革命左派"以及她的行政命令中，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仅仅只是被迫充当了一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而已。

跟随邓云玉造反以后，我们立即陷入了疯狂敌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夜之间，整个樟市墟就被讨伐我们的大字报所淹没。这些大字报千篇一律地从家庭出身上来攻击我们，说我们造反是地主资本家狗崽子想翻天。就连本来出身响当当的邓云玉，也被说成是资本家小老婆生的。

桂阳县委还是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农场。邓云玉跑到了"革命造反"的策源地北京，县委未能逮住她。工作组的领导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如1957年"反右"，先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充分暴露，然后毛主席再一声令下……

不久，从省里传来了确切的消息，王××（即省委王书记）是个叛徒，已被彻底打倒了。

王××是叛徒这一消息，没有使昨天还决心誓死保卫省委王书记的县委工作组有半点难堪。这些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对急剧变化的政治风向和人事斗争浪潮适应性良好并如鱼得水的"变色龙"，立即又有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曝出邓云玉与大叛徒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形势飞速发展。省里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宣传队到了桂阳县，来到了樟市人民公社，"造反"之火终于在桂阳县燃烧开来。县里其他单位、学校也开始造县委的反，甚

至县委内部也有人造县委的反了。一片大乱，进驻我们农场的县委工作组再已无心在我们农场抓右派，只得草草撤离了。

3. 天下大乱，思想搅乱

社会上完全乱了，我的思想也开始乱了。

以前的课本明明告诉我们，是朱总司令1927年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现在却说当年带领红军在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井冈山会师应当是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元帅都还在世，难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所有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历史事实都可以今天说是这样，明天又说是那样吗？

这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欺骗。对此我感到难以接受，我开始怀疑。

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涂满了城乡所有墙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全国震耳欲聋的时候，以前一直被党的报纸、电台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党和国家的多数领导人，如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贺龙元帅，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彭真等，却一个个名字上打着红×。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对毛主席的过分歌颂，使我头脑中不能不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一产生，就立即被我自己否定了，这是罪该万死的反动思想啊！我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呢？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往引起我疑问的种种事情上想，而是照"毛主席语录"上所说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现象，使我的思想总是离经叛道。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存，我宁愿相信那些近乎荒谬的宣传，而不愿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当时，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而只要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不满18岁也照样枪毙。

总之，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我在郴州火车站就亲眼看到一张由某法院发布的处决一个15岁的现行反革命的布告。布告说，该现行反革命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县某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其走资派老子被打倒后，他心怀不满，公开呼喊打倒伟大领袖的反动口号。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极左宣传的蛊惑加上镇压的威慑，使我（我想也使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思维只能在党中央毛主席划定的范围内打转。

革命造反使全国陷入了混乱。混乱中我们农场的生产瘫痪了，混乱中我们全都倒流回了长沙。当时的长沙，社会上造反组织林立，"司令"满天飞。一些地方的知青还成立

了革命造反组织，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要打倒，实际上是想"造户口的反"。不过对"造户口的反"我并不关心。虽然乡下的辛劳和饥饿使我更加留恋城市，做梦都想自己的户口能迁回长沙，但我心中明白"造户口的反"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事情明摆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挂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金字招牌。

因此，其他地方的知青在长沙造反造得热火朝天，我与我的伙伴们却多半只是看热闹和串门逛街，当逍遥派。

四　接受另外一种再教育的日子

1968年下半年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场是办不下去了，上面也认为成堆知识青年在一起难以控制，决定撤销农场，分散插队。11月1日，我来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知青的生活。

生产队的劳动与农场的劳动一样累，不过由于有了萝卜红薯作为填充，我的肚子总算不饿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对我也很友善，尤其是在生产队不必天天晚上政治学习、听训话、亮思想，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一种轻松感，很快适应了生产队的劳动生活。

在生产队，我心甘情愿地与贫下中农一起面向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地劳作。

然而，大约两年以后，我受到了另外一种再教育。

1. 在知青中招工对我的再教育

1970年前后，传来了工矿企业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卫国的来信，靠关系转到长沙城郊农村的他，已被招进有名的长沙纺织厂当了工人。

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

虽然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极其真诚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扎实实（或者说老老实实）地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希望以此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但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这样做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一方面，大肆正面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报纸宣传和实际执行完全背离，我开始怀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了。

2. 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的再教育

由于长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接触了社会，我发现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

多少年来报纸电台都是大肆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在平时劳动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却听到了另一种大跃进。

乡亲们几乎是争相告诉我说，“大跃进那阵，‘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最厉害了。本来是个好年成，可是稻谷倒穗了、红薯在地里烂了都不让收。劳动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结果钢没有炼出来，还把各家各户的锅也砸了，山上的大树也为烧木炭炼钢铁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将到手的粮食没有及时收获，造成很大的损失。搞到后来，饭都没有吃，过起了苦日子”。

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那时我们人人都偷过萝卜。我们都当过小偷呢！”乡亲们说。

乡亲们除了喜欢讲大跃进的往事外，也喜欢讲大跃进时的人物。而讲得最多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这一带农民将那些好吃懒做、在外流窜，靠诈骗、偷窃过日子的人称做“烂钵头”)。

“烂钵头”是邻近的岗口大队人，“土改”起家。据乡亲们说，“烂钵头”工作能力很强，搞行政命令软硬兼施很有一套。“烂钵头”又能说会道，扁的他可以讲圆，圆的又可以说扁。

搞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准养猪，结果过年时户户都无猪可杀。无猪杀就没有肉，就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做猪肉肘子、猪肉丸子。过年都没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丧。可“烂钵头”却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口水横飞地说：“我们有‘萝卜肘子’‘萝卜丸子’……”

不过，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权力，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屁股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

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宵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

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大跃进的许多往事是苦涩的，但有一件事，岭下的乡亲们一讲起来就笑得合不拢嘴。

乡亲们说，我们生产队涧对面的一大片土地，原来是坪冲生产队的。大跃进时，因为吃公共食堂搞“共产主义”了，所以个个生产队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划出一些给其他生产队耕种。坪冲生产队是个大生产队，人“强”地广，硬是要把涧对面那一大片地划归岭下生产队，而岭下人向来老实本分，在大队的劝说下，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了坪冲生产队划来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划给岭下，坪冲人开心极了。可不久，则轮到岭下人开心了。因为后来公共食堂垮了，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那一大片土地使岭下生产队多收了不少粮食。

“后来坪冲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们坚决不给。‘当初可不是我们要占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硬要划给我们的’。要了几次要不回土地，坪冲人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说起这件往事，岭下的乡亲个个比捡到宝贝还开心。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只有苦涩感。我从小就从书本中知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但大跃进却使农民不再爱如自己命根子般的土地。对于报纸上经常吹捧的大跃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呀。

乡亲们的大跃进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使我隐隐约约感到，多少年来，报纸、电台上一直极力吹捧的大跃进并不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不单只是一场瞎胡闹，也是一桩大罪过、大灾祸。

1968年下半年，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贫下中农争相购买毛主席著作，我看到的却是硬性摊派，每家每户都必须购买一套《毛泽东选集》。我下乡时已有一套《毛选》四卷，刚下到生产队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过这次仍得再买一套。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眯眼哥”、“财拐”和“马拐”家都得买。而面对这种硬性摊派，农民们只有无奈而木讷地接受。

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却是粮食不够吃、衣衫破破烂烂，常常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锅里没炆，肚里没魂”呀！坪村生产副队长春福癞拐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拿到自由市场卖了，结果在全公社生产队干部会上受到批判，说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总是宣传旧社会地主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我却从响当当的贫雇农那里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两个解放前在桐木一带所有的地主家都当过长工、打过短工的老贫雇农（其中一个叫侯守元），他俩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土改根子，土改、社教时都担任过贫协组长。1971年秋冬季节，村里一个农民的母亲死了，我与同队知青杜陵被安排上山挖墓坑，两位老农带领我们挖坑。老农们边挖坑边说话（根子不红的人是不敢说的）。

他们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对农民有利，却被整死了；过去当长工挣的稻谷比现在在队里出工挣的多得多；以前的东家有好的也有差的，但好的占多数。雇工是由东家供饭的，有的东家怕你吃饭时讲客气不夹肉吃，就会将肉块埋在你的饭底下让你吃。现在的大队书记，比过去的地主还剥削压迫人！（他们讲的大队书记是他们同宗的侄儿辈人。）

总是宣传解放前地主如何不劳而获贪图享受。1969年初，生产队派我到大队合作医疗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一天，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工地旁的马路走过，建筑队的大工骆师傅就与其他人议论，说那汉子是个窝囊地主。我问他们什么叫窝囊地主？他们解释说，那个人是我们大队贺家生产队的，解放前过得比贫下中农还苦还累，冬天连棉衣都没有穿过，省吃俭用又辛劳过人，省下钱刚买了田，还未来得及享受就解放了，田也被分了，家庭又划了地主。你说这样的地主窝囊不窝囊？

总是宣传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贫困。我却听说当年岭下最贫困的雇农"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贫如洗，是因为他父亲嗜赌如命，"最后连灶头上的火钳都输掉了"，"马拐"差点被他父亲卖了。现在，"马拐"却常常说："那时候，我当长工一天挣的谷子，比现在在队上出一天工挣的多多了！"

刚下到生产队时，我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我以为，贫下中农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泽东。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使我惊奇地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那时，我正被生产队派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余休息与工友们聊天时，我说起自己从报纸上（当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办的那种报纸）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医生检查，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的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中年泥水匠骆师傅似信非信地说："我们顿顿吃红薯，毛主席餐餐吃大米，他当然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明拐、从林等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则一致反驳："无论如何，一个人活一百二十岁，不可能！"我说："这可是经过医生检查的，是科学结论。"但石磷坚持说："肯定是医生怕杀头，才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还嬉皮笑脸、十分不恭地断言说："我敢保证，毛主席一定经常和许多年轻漂亮女人睡觉，所以才能活这么长。"我当即反驳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道德极其高尚。但石磷坚持说："你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搞过多少女人呀！""就是，就是！"明拐、从林等人纷纷附和。

这些出身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农村青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条二三百米长、破败不堪、住户全是农民的墟街，每家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形结构。似乎这些住户过去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小店主而不是农民。似乎，过去这儿曾经有过工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不像现在这样，除了几家由官方

机构垄断的工、商单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褴褛的农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压制、让人民自由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樟市这偏远的乡村集镇也是可以有某种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繁荣的。所以，最初我对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铺面结构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为，樟市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

当我与贫下中农相处久了，当我对樟市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终于明白：樟市过去确实有过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那些临街的铺面并不是樟市人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而确实是他们当年从事工商、服务业的需要；或者当年他们本是从事工商、服务业的住户，由于不允许继续从事他们的行业而被迫做了农民。而樟市之所以叫"市"，是因为这个曾经樟树成片的地方有过一个一定规模的集市；樟市又叫樟市，又说明那些樟树是高大的。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市"的含义是集市，而不是以前我所理解的城市。但那个曾经繁荣过的集市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那成片的、高大的樟树被大跃进中的炼钢大军一扫而光了。

我想象不出，这个今天破破烂烂的乡村小镇，过去怎么会有工商业的繁荣呢？我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这种繁荣现在反而不再有了？

3.从受再教育走向新的再教育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依旧年年都有，依旧年年都没有我们这些出身不好老知青的份。我破釜沉舟：不要户口，外出流浪打工了。我的知青伙伴久哥，早就在紧挨着省城的望城等县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辗转当"打流师傅""打机械流"。他鼓励我也走这条路，并说外面不少知青伙计都在这么干，于是我也跟着他这么干了。

20世纪70年代初，停办多年的大中专学校又开始少量以推荐的方式招生，即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

推荐和招生全都是秘而不宣的。

1974年六七月间，我终于得到了机会，被公社推荐到了县里。在县里体检和填写志愿时，我听说桂阳县有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县里已定了这个名额给某某公社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书。

由于桂阳体育界元老、县一中老教师兼体委老教练刘烈鹏老先生，1967年被贬樟市公社时，见过我打篮球，对我的球技十分欣赏，因此当刘老师得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就专门赶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到我，劝我报体育专业。他说桂阳县今年有一个推荐上北京体育学院的名额、一个上武汉体育学院的名额、两个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名额和六个衡阳师专体育科的名额。"你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当然，刘老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学体育，将来与他一道为桂阳县的体育事业出力。

出于对刘老师的尊敬，我填报了体育专业。不过我并没有像刘老师预言的那样“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虽然一个与我一同被推荐的没有任何体育基础的乡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入学通知，但我却只收到衡阳师专体育科的。不过，我仍旧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闷的知青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这样，1974年10月，我告别了农村，在接受了九年的再教育后，又将去接受新的再教育了。


作者简介

谭世通，男，1964年长沙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后失学，1965年下乡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公社第二农场。1968年农场撤销，插队落户到桂阳县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1974年10月，到衡阳师专体育科学习。现为广州港技工学校体育高级讲师。

世上还是好人多

黄欧平

在1968年8月至1969年3月，我被园艺场造反派批斗监管半年多。其间我得到了知青朋友和一些善良的老职工的关照和保护，没有他们，也许就没有了我今天的一切。是他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用自身的正直和善良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样做事。他们的行为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不能忘记的恩人。

谭　妈

1968年"8·19风暴"后，我被场革命筹备小组转移到场部，不久就被安排住在猪场后面的专门监管我的老徐家里。谭妈是老徐的老婆，从我到她家的第一天起，她就让我和她睡在一个大床上。起先我以为她是为了方便帮助老徐监管我，在床上便不和她说话，只是瞪大着眼睛，一个人望着蚊帐顶发呆，常常许久许久不能入睡。她感觉到了，就爬过来和我同头睡，轻轻地劝说我，那些话现在想来倒是挺实在的，只是当时我见谁都怕，也就不敢相信她。很快开始的批斗会，让我对她彻底放心了。

那是一个蚊子特别多的夜晚，职工们都呼呼地摇着扇子在看批斗会，人们时不时地用手或扇子拍打着敢于靠近身边的蚊子，小小的会议室里凭空多了许多啪啪声，空气也就显得更燥热了。

我双手被两块大石头占着——开批斗会时，那些积极分子会随心所欲地想出些花样来折磨阶级敌人，以打击他们的锐气，这次就是他们从外面搬进来两砣有篮球那么大的石头，自始至终让我双手向上托着接受批斗。我只好任凭蚊子咬。忽然，感觉一阵又一阵的凉风飘过来，我以为是外面起风了。但是，马上就发现，正对着我坐在前面第一排小

凳子上的谭妈，正在不停地使劲扇动着她的大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在我的腿前横扫着。她眼睛望着别处，嘴巴在和旁边的女人们大声说笑着。

这件事有人向造反头头汇报了。记得有天晚上，谭妈很晚才从外面回来，一进门就高兴地咧着大嘴对我说，刚才她找某某大吵了一架，很过瘾。我听后吓了一跳，这个名字当时在园艺场就是权力的象征(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可是她说她才不怕，她早就想找机会和他吵架了。用谭妈的眼睛看，“他现在是欺负你们小孩子”。事情就这样不可思议，从此，她在开会时给我赶蚊子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情了。

冤案发生后我被放到场部接受监管，老徐白天跟着我时，手里总提着一根用粗藤编成的一米多长的鞭子。晚上的批斗会上，他也会手里提着这根泛着油光的粗藤条，在会场里四处神气活现地游荡，有时他就停在我的身后。我担心他的鞭子有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来，因为我听人说过，他曾用这根藤条一鞭子抽死了毒蛇。但是，自从我住到了他家，藤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老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别人面前凶巴巴地对我了。这个谜底，是猪场的郭妈后来偷偷告诉我的。原来，我到他们家不久，谭妈就把那根藤条塞进灶膛里烧了猪食，听说当时老徐还挨了谭妈好一顿数落，其中骂得最狠的一句话就是说没儿没女的老徐“没良心，只配当绝户”。

那年冬天，我和谭妈睡，床上垫得厚厚实实，盖着暖暖和和的大棉被，老徐竟毫无怨言地在门板床上睡了一个冬天。我曾经向谭妈提出来让我一个人去睡门板，可是谭妈告诉我是老徐说的“哪有让姑儿(当地称没结婚的女孩)睡门板的事情”？他还说他“没结婚前就是这样过惯了，冻不着”。唉，人心呀，我该用什么尺度去丈量它呢？

好多年以后，我的知青朋友家珍告诉我，老徐死了，是让毒蛇给咬死的！听到这消息，我竟然惊得半天没回过神来——如果老徐的藤条还在手，他肯定不会被蛇咬死！呵！那根曾经让我害怕过的粗藤条！

四个老伯

养猪场的老刘长期咳嗽身体很不好，他与谭妈是邻居，进谭妈家，要经过猪场的堂屋。出事前，我除了春节拜年时到过老刘家，喝过郭妈泡的芝麻豆子茶外，平时是很少和他们来往的。

自从我到了谭妈家，老刘打理好了猪场的事后，常会坐下来陪我说说话，他总记得我不像别人过年到他家怕传染肺病不喝他家的茶。“过去你不嫌我们家脏，不嫌弃我有病，现在我才不信人家说你是坏人，不怕人家说你是‘黑帮’子女，也不怕人家说我让小子们跟你学习！”这就是一个淳朴农民对复杂事物最简单的推理。

每到夜晚，猪场就是老刘的朋友——邓伯、柴伯和张伯过来聚会的地方。“文革”以



前排左为作者

来，他们从不参加造反派，也不参加什么批斗会，但他们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造反派头头拿这几个倔头也没办法，如今的革委会也不能治他们，只好自己找台阶下，说老头们都是文盲，就让他们用“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持造反派搞革命吧”。

于是，一到夜晚，四根烟管就像搞比赛似的，一根比一根抽得响，一锅比一锅抽得快！烟雾缭绕中，张伯和柴伯话多，邓伯只听着，听得高兴了，会用牙齿龇咬着烟管，咧着嘴笑，模样挺滑稽的。如果张伯和柴伯的争吵声突然低下来，那一定是邓伯嫌他们太吵，在使劲砸自己烟锅儿里面的烟灰呢。

柴伯是老红军，参军前是个孤儿，因为当年打仗一只眼睛受了伤，部队把他留下就地治疗，伤好了，眼睛却永远瞎了。在老乡们的帮助下，他娶了老婆成了家，并有了儿子，从此一个异乡人就在当地安家落户了。解放后，他享受到了老红军的待遇，政府将他一家人从农村迁到了城里住上了别墅，过上了安逸日子。但是，年逾花甲的他闲不住，自己要求到这个园艺场来当义务看山员。因为爱吹牛，他和张伯成了一对吹友，天天见面就斗嘴，谁也不服谁地瞎吹。

“文革”开始后，县城里的造反派硬说柴伯是红军的逃兵，他大字不识一个，自己又说不明白自己的事情，于是，老婆孩子全被赶回农村。从此，在农林水系统“牛鬼蛇神”的队伍里，

多了一个“假红军”。他不识字不要写检讨，只要每次去陪斗。陪斗完了回来，人还没落下座位，他的嘴巴就会“他妈的！他妈的！”地发起牢骚来，把当晚会上的事情，全部按照自己的观点向另外三个老头学说一遍，边说边骂，多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陪斗的人不平而骂。

当年的邓伯五十岁开外，是园艺场的放牛人，他整治出的牛比人还干净。邓伯不爱多说话，见人也难有个笑脸，许多人怕接近他。可是他和牛在一起时，嘴巴却叨叨着没个完。因此，老职工里有人背后说邓伯对牛比对人好。

“8 · 19”前，我和邓伯的交往也不多，在山上碰到他时叫上一声，他也不说话，朝我点点头，然后，两片嘴唇撮成了一个喇叭形，嘴里发出几声“斥斥”的响声，人和牛就一起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冬天，郭妈会在猪场堂屋的火塘中从早到晚留着火，火塘里的柴多半是在场部食堂做饭的炊事员张伯给弄来的。

柴伯出事后，聚会的气氛没多少改变，四个老头仍按时坐到猪场来，只是坐得更晚。邓伯吧嗒、吧嗒的抽烟声，老刘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和张伯、柴伯仍然继续的争吵声，就像一曲老人四重奏。如果这时候进来一个外人，绝对不会想到，这是在外面昏天黑地的批斗会之后的聚会。

有一天晚上批斗会完了后，我带着一身寒气和雨水跑进堂屋，发现邓伯身边留有一个较大的空当，还放着一条小板凳，老爷子正用烟杆敲打着小凳子，眼睛看着我，示意哆嗦着的我坐到他的身边去。当他再装上一锅烟时，就把烟锅儿送到我面前，让我帮他找个燃着的小树枝点火。火光下，我看到了他用难得的慈祥的笑容注视着我，我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久而久之，我也就习惯了和他的配合，习惯了四个老伯给我留下来的位置。不管晚上的会开得怎么激烈，回来得怎么晚，我只要往火场边靠过去，心里就暖和了起来，什么委屈什么冤枉，我一概不去想它了，只想着面前这四个和我一起坐着的老汉。他们给了我温暖和信任，给了我亲人一般的疼爱，让我得以度过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

有一件事，令我一生谨记。

因为县园艺示范场有义务为农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人员，有在山区推广种植良种柑橘的义务，所以只要下面有植树的任务，场里就要派出自己的技术工人或技术员到下面去指导种树。派出去的人，有时需要一整天一整天地在农村工地上和当地农民一起栽种树苗，事后还得经常去帮助管理解决问题。进入冬季后，这样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如果是近郊山区没通车要靠走路的工地，下班回来一般都很晚。这是又累又饿的活，没谁乐意去受那份罪，工区长很难派工。1968年的那个隆冬，这种事情很自然就落在我们几个“另类”的头上了。

有一天晚餐后不开会，我吃过饭照例和四个老伯一起坐在火塘边，邓伯突然问我：“你明天是不是要去盐池栽树苗？”我很奇怪他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吃晚饭时

才接到的通知。

记得第二天天气特别冷，大家都说肯定要下雪了。我离开盐池工地时，天已经快黑下来，气温也比早上我去时低了许多。近二十里的山路，不见行人，我有些害怕，一个人紧张地小跑着，饥饿和疲劳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只想快点回到场里，回到那温暖的火塘边。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当我终于一脚踏进了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时，我不管不顾地朝人堆扎过去，好一阵大家都没说话。等我透过气来后，张伯说："给你热着饭呢，去吃吧！"说完，他已经先走出去了。

我赶紧跟了出去，看到张伯从大铁锅中用一块毛巾小心地捧出来一大钵子饭，又从大锅里端出滚烫滚烫的蛋汤，还有一盘青椒炒瘦肉——肯定是刚炒不久的，那青椒还油绿油绿的。这是我平时最爱吃的菜。我感激地朝张伯笑笑，就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吃完了桌子上所有的东西以后，我没忘记从袋子里掏出饭菜票，张伯朝我一挥手："算啦！这时候谁还开餐？"嘿嘿笑了两声后，就说天太冷他要烤火去。看他大踏步朝猪场方向走去，我只好反手锁上了门，也跟着他一起回到火塘边。

郭妈早给我准备了一大桶热水，我看过正在病中的谭妈，边洗手脸边对堂屋里的几个人说着在盐池那里的见闻，刚才的疲劳和饥饿全然不见了。

洗漱完后，我回到空位子上，顺手抓了一根火枝，给四个老伯每人点上一锅烟，柴伯和张伯自然是占先了，然后是老刘，最后我望着邓伯，只见他没有像平时一样早早地伸过他的烟锅，而是笑着问我："姑儿，炒肉好吃吗？"我说："真好吃，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肉了。"张伯呵呵笑着告诉我，肉是邓伯亲手炒的！我惊愕地朝邓伯看着，看到那张紫红色的老脸，看着他慈祥的微笑，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了！

自从受了这天大的冤屈以来，造反派们就指望我能哭着求他们。他们说过女的不肯哭，就是很顽固，不把我逼哭了，他们还算什么造反派？

可是我天生的就不爱哭，从小就这样，越是委屈就越不哭！那天晚上，我放声大哭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几个亲人一样的老伯面前，我没必要硬撑下去了，我放纵自己的情感，放纵自己的泪水，让它们尽情地流淌着，几个月来的委屈、羞辱和艰辛全浸泡在这些奔放的泪水里！

朋友啊，朋友
——两个小朋友

家珍是三工区的小知青，平凡得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人们记起她！但是我又极想写她，因为她是我35年知青生涯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

认得家珍是因为阿贞(化名),与她交往也是因为阿贞,识得家珍更是因为阿贞。

阿贞是和我在一个工区的好朋友。她工作踏实肯干,为人耿直,从小跟着离婚母亲进城和继父一起生活。小学毕业后,她就下乡来了。

家珍的父母都是搬运工人,尽管他们终年在外面风吹日晒辛劳挣钱,可是家里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小学毕业后,家珍决定让弟弟继续读书,自己高高兴兴地和阿贞相邀一起下乡了。

两个人同年同班又同住河边街,现在又一起来到园艺场,就只恨没分到一个工区里。于是每逢休息日的下午,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来去像一阵风的小女孩家珍的笑声,总会在我们工区的院子里响起。然后,两个小姑娘一路打闹着,飞下山坡回家去了。

好像是一个五一节的前夕,工区领导决定在食堂做馄饨过节。下午大家提前两小时下班,二十多个知青和几个带队老职工全集中在食堂里自己动手做起馄饨来。

馄饨虽然出了一锅又一锅,可是大家的吃兴似乎没有一丁点儿减退。知青们边做边说笑,边吃边打闹,好不快活!

领导关心群众,让放开肚皮吃一次,宣布平均每人有五碗可以分配。于是吃不完五碗的女知青,就把剩余的带回了宿舍,准备带回去与家里人分享;男知青肚皮大,吃完了五碗也想带点回家去,几个人就围在锅台边不肯离去,嬉皮笑脸地大声嚷嚷,争着要给自己再来几碗。

当时,我正好当着食堂事务,虽然不会厨房里的功夫,但也汗流浃背地帮着充当大厨师的老职工在配碗下作料,把煮好了的馄饨数好个儿分装到各个备好了料的缽子里,同时还要给每个来领吃的人登记吃的数量。我笨手笨脚地忙得满头大汗,也就没顾得上给自己盛一碗先吃着。

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食堂里帮着做事的人越来越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女知青,打扮得很时髦,看样子是已经准备下山回家去的。她们俩挤开男生,其中一个对我嚷着要给她们每人再来两碗。阿贞平时就看不惯这一对做事不卖力的伙伴,看到这种情形,她那火暴脾气犯了,扒开人群,抢过我手中的笔,大声对我说:“你盛一碗先吃去,我来帮你装碗打码!”她迅速给我装好一碗,把我推出了人圈子。

几个正在嚷嚷的男知青一下子愣住了。只见阿贞指着登记本上那两女孩的名字大声说:“你们俩都领十份了,还没吃够?做事咋就没这么积极?”阿贞嘴里说着手上没停,把几个男生打发了后,看着悻悻离去的女孩又补上一句话:“下次你们俩做事也这样积极,我把我的送你们吃!”

这时,外面响起了家珍的尖叫声:“我呢,我还没吃呢!阿贞,你说好叫我过来吃的。”话音未落,人已经坐在我旁边拍打着桌子了。

她肯定是直接从工地上过来的,身上有一股很浓的青草气味,黑黑的脸上正流着的汗也没来得及擦一擦,阿贞正在气头上,没给家珍好脸子,端过来两份,“啪”的一声放到她面前:“吃吃吃就知道吃!”家珍满心高兴过来吃馄饨,让阿贞这么一说,生气了,也“啪!”的一声把两碗馄饨一齐推出去,我顺手一挡,汤就溢在我的手上了!她也没管这么多,把我刚吃的一碗拢到自己的面前:“我吃你的,不吃那种怄气食!”抄起我的饭勺就吃,正眼也没看阿贞。

望着面前两个赌气的小姐妹,有个外号叫“干干”的男知青竟然觍着脸凑过来,要吃推出去的馄饨,家珍手快眼快嘴更快:“这是我和欧平换着吃的,你想歪了脑壳吧?”两碗馄饨又让她给拖回来,摆到了我的面前,同时她眨巴着一只大眼睛冲我一笑,厚嘴唇下露出了雪白整齐的牙齿。

阿贞送过来一块抹布,要给我换一碗,我说:“你也盛一碗过来吃吧,干脆我们三人比赛谁吃得多!”家珍一听高兴了,忘了刚才说的话,马上附和我:“行呀!我先吃你两碗,再吃阿贞的!”阿贞在一边也没好话,嘟囔着:“刚才不是说不吃吗?我还不爱送你呢!”家珍的舌头朝她涎着!

这一顿,我们每人吃了两大碗,然后再各带了两碗回家。等我清理好了登记的数据,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食堂门口两个好朋友坐在那里说笑,就像刚才根本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一样。我问她们为什么还不走?她们告诉我:“等你呢!”从这天开始,我就成了她们俩的朋友。

每次回家我们都是沿着澧水河走。阿贞家最近,家珍家住我们学校的食堂旁边,送她到家后,我穿过食堂,就到了父亲的宿舍。回来时我先到家珍家坐上一会儿,我喜欢她的父母,一对有着古铜色脸膛的老人。我喜欢在进门时看到她的母亲用大眼睛朝我微笑,微张的厚嘴唇下露着雪白整齐的牙齿,给人一种厚道平和的感觉。我喜欢在她家小坐一会儿,也是想感受一下家的温馨。

然后,我俩再去邀阿贞,人还没到阿贞家呢,家珍就会扯着尖嗓子叫她,阿贞几乎每次都会早早地站在自家门前等我们,听到尖叫声她总会对家珍说:“就你会吼,满世界都听得到你的声音!”

晚上,家珍常在我们这边玩,有时候就不肯回自己工区去睡觉,不管我同意不同意,爬上我的床就睡。阿贞平时有周末和我一起睡觉说话的习惯,也只好让着她了。有一次,我看她们俩在我屋里玩“剪刀槌子布”,家珍好像还耍了几次赖。我说我也来玩一把,谁知道两个朋友都不要我玩,原来她们在比输赢,赢了的晚上和我睡保管室,输了的到下面大宿舍里睡阿贞的床。输的往往是阿贞。

如果没有那场噩梦,家珍在我心目中永远只是一个任性的小妹妹!一个又黑又瘦,

爱打爱闹的快乐的小姑娘。

真水无香

有位名人说得极对:“朋友,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8 · 19”事件发生前约半年,我曾经把父亲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我的保管室,一是为了方便学习英语,二是为了父亲不再被人无端怀疑里通外国。平时,阿贞最爱听里面的小喇叭节目,在家珍来的晚上才没法听,因为家珍要听歌!如果听不到,家珍会不管不顾地用手掌拍打着开关。记得有一次还让她拍“跳闸”了,弄得全场停电,等到查出来事故原因,我挨了批评,阿贞责怪家珍给我惹麻烦,家珍不服气,又和阿贞“吵”了一架。

1968 年“8 · 19”的“红色风暴”刮过,收音机和我父亲的那些所谓“罪证”一起被卷到了园艺场场部,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工区通知我搬到场部去接受监督后,原来玩得来的一些知青,利用到场部办事或者开大会的时间,偷偷来屋里看看我,大家只是相对默默坐上几分钟,然后就离开!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敢来的人不多了!但是,家珍和阿贞照例过来,家珍像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还是又说又笑,阿贞却心事重重,本来话不多的她,显得更沉默了。那一年她俩都是 19 岁。

终于有一天,场部特别安排了一场知青批判会,按以往的规矩,参与发言者多半是要求入团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不出现冷场,领导事先排好了次序,要求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据说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能让他们迅速成长,这些人中的积极分子,将在斗争中学会革命并成为党组织的新鲜“血液”。

在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发言后,我记得出现了难堪的冷场。我虽然不方便用眼睛看会场中人们的脸色,但是,我能听到我们工区的妇女主任覃妈用轻轻的却很急促的声音在叫着阿贞的名字。妇女主任是 1958 年大跃进中入的党,是我原来工区唯一的女党员。

阿贞平时口齿就不怎么清楚,也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言。记得场里组织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比赛,她就因为这个原因才没被选中去参加的。妇女主任让她来发言批判我,目的我也明白,因为她是我在工区里最好的朋友,又是正在积极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如果她能揭发一些什么重要事实,无疑是给我最沉重的一击,也是组织对她最好的考验。

终于,我听到了她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声音,有些颤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偷偷抬起眼睛看了一下站着的她,她竟然也在低着头翻着眼睛看着我,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她躲开了。嘴里嘟囔的话语却让我犹如听到了晴天霹雳!她说我“每天晚上按时收听敌台”,理由是里面全是说的外国话她一句也听不懂。她还说,我和我父亲说话时也是用她们听不懂的家乡话,一定是接头暗号!最后,好像是说她以前受了我的蒙蔽,把我当她的学习榜样。今后,她一定与我划清界限,坚决跟党走……

她艰难地说完后，又是一段让人窒息的冷场。

阿贞开了重炮，下一个发言的将是谁？我在想，眼睛的余光也就在会场里搜索着另一个熟悉的身影。但是，直到主持人宣布"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时，我始终没有在会场里找到瘦小的家珍！

我知道阿贞是再也不会过来看我了！家珍也有些日子不见，不会是病了吧？可是她从来就没有病过。还有一个可能，在上次批判会上她当了逃兵，可能受到批评也不敢来了？（去年我回到石门，又住在家珍家里，请她回忆起这段时期。原来，就在我被抄家的第二天清晨，睡梦中的家珍和与她同房的几个知青被闯进来的工区长杨某和另一位杨姓职工叫醒，并且不让她穿好衣服就赶到工区地坪里站着。这两个人在宿舍里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一一检查，并且带走了家珍所有东西。第二天当杨把东西送回给家珍时，遭到了她一顿臭骂。后来的知青批判会上家珍又拒绝对我进行批判。不久，场里就借故把她和另一部分知青调到了石门苗圃一年多。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她好长一段时间没来看我的真正原因。）我烦躁着。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回来继续抄检查练字打发时光。

让我奇怪的是，检查交上去后，竟然没人说我为什么不反省听敌台的事情，也没见造反派催着一天一反省的要检查稿了！小道消息是由"干干"传过来的：原来是场部会计、当时的场革委会副主任杨某，在那天散会后说了一句"敌台不说英语"。我至今没听过"敌台"，也就不知道他说得对不对？（我去年回场才得知，有个姓聂的驻场植保技术员就是因为被指控听敌台而判刑多年，直到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出狱。）我只知道我父亲的收音机被抄去后一直被他占用着。职工们倒也厚道，竟然没有人追问革委会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敌台不说英语的，也就更没人追查我了。副主任在"文革"后期，因为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往地处深山的林场去了。也不知道他去时，是否还带上了我父亲的收音机。反正，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收回父亲被抄走的任何物品。

生活在继续

1969年3月初的一个寒冷的清晨，我孤零零地走在刚刚下过雨的公路上，朝汽车站走去。忽然，我看到家珍站在不远处搓着双手在等我，她身上穿的是我早两年送给她的粉红色雪花呢做的上衣，头发上有很重的水汽。那天不是星期天，她起了一个大早赶来送我，两个好朋友忍不住抱在一起放声大哭起来……

1970年夏天，为落实政策我第一次返回园艺场，场里不安排我的住处，男知青刘南锐冒险送我到他在郊区的父母那儿。家珍知道后，第二天就把我接到他们的小屋里一住就是十来天。她的丈夫也非常诚恳地劝我住下来，他说不管你住在哪里，也没有住我们家让家珍放心的。虽然他们夫妇都属当时的"红五类"，但我还是怕连累他们。在1970

年我为自己争取落实政策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他们留宿我更有一定风险。我知道，几年来，家珍一直没能入党，就是因为和我"划不清"界限。我不能再连累她了。

1975年，在我父亲的错案落实一年多后，我第三次回到了园艺场，奢望我的事情应该有个正确的结论了。但是老书记已经调离，新书记不了解情况，那个革委会副主任进了深山老林，闹得最凶的造反派头头杨某两年前因肺癌去世了。当年看批斗会凑热闹的小娃娃们都长成了大人，但谁也不能为那时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更荒唐的是，我的错案在农业局竟然没有档案可查，农业局也就不能对此案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按当时的政策，园艺场至少也得独立承担补发我近七年(82个月)的工资近3000元。这个数字对于当年一个一月工资29元的代课教师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对于一个自负盈亏的小小的园艺场，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只有家珍明白，补钱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还自己一个清白的身！

我仍然住家珍家，这时候的我们都已经是一双儿女的妈妈。家珍理解我的难处，知道我没法久等在那里，我得回学校去代课，得回去照顾幼小的孩子。她让我先回家，场里这边的事情由她来慢慢办理。

大约一年后，我已经被招为矿山大集体工人，平反昭雪的通知书和大堆当年的"检讨"材料，才全部由新书记签字寄还了我，赔礼道歉的信和通知也同时送达了我当时所在的矿山人事部门。虽然，一切都来得太迟太不如人意，但是，我知道若没有家珍的个人努力，这一切将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也可能真会不了了之！家珍同时寄来了一封信，关于生活补贴，她替我做主了，只要了600元，并告诉我场里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寄过来。

1982年春节后，钱终于寄来了，又收到家珍一信，通知我到银行查600元的汇款。为了这600元，她不知道跑了多少路，花了多少时间，但是在信里她一句也没提及。

我常常扪心自问：如果当年出事的是她而不是我，我会像她相信我一样相信她吗？我能像她保护我一样的保护她吗？我会不会像她为我做事一样尽心尽力替她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不敢说我的回答会是肯定的。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家珍和谭妈等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恩人。所以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作者简介

请见《历练痛苦》后的作者简介。

人猴之间

卢晓蓉

偶然翻看《汉语成语词典》,查"杀鸡儆猴"这个成语的含义,上面没作具体解释,只是引用了《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的一段文字作了间接说明:"俗话说得好,叫做'杀鸡骇猴',拿鸡子宰了,那猴儿自然害怕。"但凡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或被儆戒过的猴,对此类意思,想必都有切身体验。

40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在火车上摇摇晃晃硬坐了两天两夜之后,来到了河北地界。这时,广播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就跟着毛主席,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还配合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乐曲,似乎有大事要发生。接着就听见播音员郑重宣布首都红卫兵司令部的通知,勒令车上的"黑五类"分子及其"狗崽子"必须在火车进入北京城之前下车,以保障首都的纯洁安全。

不一会儿,只见十来个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革命小将,推搡着一个被揪出来的女人,从另一节车厢挤进了我所在的车厢。女人约莫四十来岁,原先的短发被剪成了阴阳头,身上的衣服也被扯烂。幸好是深秋天气,里面的衣衫尚未撕破,还能蔽体。脖子上挂着一个箱子,记不得是皮的还是纸的,里面装满了乱七八糟的物品,还有女人的内衣什么的。押解女人的红卫兵用话筒向旅客们喊话,说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却想蒙混过关,现在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这就是隐瞒成分不滚蛋者的下场。还说她箱子里竟藏有罐头,这不是地主过的日子是什么!那女人举止斯文,像个知识分子。此时苍白着脸,低垂着头,在车厢里跌跌撞撞地前行。红卫兵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落实"勒令"而"杀鸡给猴看"。围观的群众有的兴奋莫名,有的推波助澜,有的害怕,有的漠然,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

那是 1966 年 10 月，我受所在社办茶场知青们的委托，到北京上访。

尽管此后我还在各种不同场合见过这样的场面，有的甚至更吓人，但这一次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几乎成了我对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记忆，原因在于我当时就是一只隐藏在旅客中观看杀“鸡”的“猴”。我所在的位于大巴山深处的社办林、茶场，主要就是用来安置那些被重庆市各级学校不予录取的“黑五类”分子子女的，尽管这样的“分子”绝大多数的帽子都是错戴的，但当时离平反昭雪还有一段天涯路。社办场兴建于 1964 年。两年后“文革”爆发。我们以为有了机会申诉我们所遭遇的不公，于是满怀希望想去北京讨个说法。没想到刚上路就遭遇了上面那一幕。我躲藏在围观的人群中，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像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忐忑不安。在前面临近的车站下车吧，知青们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回去如何交代；继续待下去吧，又担心露出猴子“尾巴”，步那位地主子女的后尘。虽然我最后还是成功隐瞒身份，混在旅客中到达了目的地，但第一次近距离亲临杀“鸡”现场的恐惧、矛盾和无奈，从此便像紧箍咒似的，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开局既然如此不利，上访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又过了两年，社办林、茶场受到“文革”洪流的冲击而自动瓦解。我们却没有因此而获得回城的机会，而是和其他大批新知青一样，被安排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地处偏远山乡的农民对我们的身份比较陌生，最普遍的认识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所以，我们不仅享有和贫下中农一样的劳动工分，一样的粮食分配，一样可以参加“早请示，晚汇报”，队里有些称斤记账又轻松的活路，还常常让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有文化，而且信得过”。这样的平等待遇，不仅对于农村的“分子”及其子女来说是非分之想，就是对于上学时期的我们来说，也属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白日梦。那时的界限是分得很清的：上课，出身好的坐前边，我们坐后边；老师开“小灶”，他们在里边，我们在外边；考试，他们开卷，我们闭卷；毕业，他们上大学，我们下农村。故此，插队落户的日子虽苦，我们却如释重负。

不料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队长的老婆突然凑到我耳朵跟前问我：“你们城里的资本家和我们农村的地主有什么不同？”我一时语塞，继而脸红得像猴子屁股。看来她已听到了我祖父是资本家的传闻，毕竟我的履历表总是这样填写的。面对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要回答这个社会发展史学上的问题本来就很难；加上我祖父并非资本家，他自己没钱，只不过是利用社会集资为社会做了许多事情，即使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钦定的标准，他也绝对戴不上“资本家”这顶帽子。可是这样去对她解释，只会越搅越乱，落得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下场。她见我面有难色，口张不开，就岔开了话题，不再追问。我却从此心里明白：“紧箍咒”还在头上悬着哪，尾巴还得夹紧才是。

我们队里有两户地主一户富农——严格说来是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子女——因为当

家的早都死了，由老婆和子女继承他们的剥削阶级成分，这样生产队也就有了儆猴的“鸡”。但因为我们的队长比较务实，向来认为“多生产点粮食比开那些尿莫名堂的会强”，所以这些“鸡”只是关在“笼子”里，没有试过“刀”。但是邻近那些没有“鸡”的生产队，却要到我们生产队来借。队长老实，不敢不借。三户“分子”中，有一家是独子，还当过几天乡村教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扫地出门，回乡务农，但“臭老九”的眼镜还始终架在鼻梁上；另一家是独女，三十多岁了还没出嫁，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却招不来女婿上门。队长显然想给他们留一点面子，所以每次出借的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了张姓地主家。张姓地主早死，其老婆带着三个儿子住在生产队边上一座破房子里。当时大儿子已经四十多岁，没讨到老婆。小儿子不到二十岁，也是单身。唯有二儿子结了婚，老婆却有些智力残障。三个儿子平时只知道埋头干活，从不敢乱说乱动，连农民习以为常的打情骂俏，他们也绝不敢沾边。即使如此，也难逃当“鸡”的命运。而每次出借的往往都是张家的大儿子，因为二儿子有老婆、有孩子；小儿子还有希望讨媳妇，不能破相。对此，队长心中自知不公，所以每次出借之前，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儿子：在批斗会上放“老实点”，“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不伤皮肉，骂几声算不了什么。大儿子也总是顺从地点头唯唯。尽管这样，他还是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回来。队长见状只能叹气。我虽然对他也动过恻隐之心，但不敢说出口，有时还暗自庆幸自己当“猴”总比当“鸡”强。

以我当时的见地，参加镇上的公判大会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我看来，公判对象都是以身试法，罪有应得。于是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对参加公判大会有一种向往，似乎只有在那种时候，自己才能晋升为猴王，摇身一变进入做人的境界。有一次，镇上召开公判大会，我自然没有缺席。其中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犯的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路线罪。他把关乎上千万知识青年命运的那块语录牌从墙上摘下来，放到了我们平时赶场的马路边，还将一封用红笔写的信端端正正地放在上面。信中竟敢公开对抗最高指示，竭力动员我们尽快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去，不要再在农村搅扰农民安宁。有此明显物证，公安局很快就破了案。据说罪犯原本就在押，最近才越狱外逃。过去犯的什么罪不清楚，单凭现在这宗罪，就足以再判他 20 年徒刑。未等台上的宣判完毕，台下的群众已经义愤填膺，声讨的口号此起彼伏：“×××，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喫（读‘qie’音，当地方言‘吃’的意思）！”其中当然也包括我的声音。此时只见一个农村青年急步跨上宣判台，使足全身的力气，当胸就给罪犯一拳，鲜血顿时从他的口鼻处流了出来。这一拳无疑又把我打回了猴的原形。本来嘛，“杀”这样的“鸡”，不正是给我这样的“猴”看的么！

“鸡”被杀了仍然是鸡，可“猴”被骇得丢了魂，还能算猴吗？

作者简介

卢晓蓉,女,1946年生,重庆人。1965年高中毕业下乡,历时13载。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经济专业。1982年本科毕业,先在大学任教,后来"下海",参与多家企业的创办并担负高层管理工作。现任香港安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副研究员。香港作家协会永久会员。著述甚丰,其中《青春有价》获得冰心文学奖散文大奖;《香港的速度》获得《中华散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征文三等奖;《母亲的搬家生涯》获得2003年冰心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水咬人》。

刻骨铭心的岁月

唐思齐

人的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多如过眼云烟般忘却了，消失了，唯有知青岁月的情景，四十多年了，记忆中还是那么清晰，那么刻骨铭心。

糊里糊涂下了乡

我是在姑妈家长大的。1954年到我姑妈家时，姑父还在关押之中。姑父在读书时集体加入国民党，1950年就被逮捕，罪名是军统特务，被关押了七个月之后，无罪释放。后来成为西南贸易部的工作人员。一次偶然机会，姑父遇见川大同学×××。这位先生在校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曾经追求过才貌双全的姑妈。姑父遇见他时，他是西南贸易部人事处处长。为了公报私仇，他利用手中权力，篡改姑父的档案，诬告姑父在川大时，受国民党指派监视共产党进步学生。姑父于是再次被捕入狱。这一去就被关押了五年多，直到他去世，这个问题都没得到澄清。

我五岁时母亲去世，父亲1959年因莫须有的罪名（20世纪40年代报考了公费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1957年他发表同情“右派”言论）被关押。姑妈的长女，表姐唐小宁从小与我生活在一起，情同亲姐妹。1964年8月就读于姑妈任教的重庆市第一中学，品学兼优的表姐唐小宁因姑父所谓的历史问题考不上高中，经历了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后，她毅然决定去了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的柏桠寺林场。

1965年7月，我初中毕业，也尝到了落榜的滋味：绝望、黯然无光，经历着天地之大无处容身的日子。班主任曾万伦老师一直盯住我和同学谢于坤（谢的父母1949年去台湾时，她才几个月大，她也和我一样跟着自己的姑妈长大），三番五次动员我俩下乡。我

俩的父辈同属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不下乡谁下乡？留在城里找工作也无望，加之表姐唐小宁已经在通江农村，到她那里姊妹之间也许可以相互关照。这样，我懵懵懂懂，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去了通江柏桠寺林场。

来到林场，才知表姐信中描写通江林场如何美好，统统是怕姑妈担心而编造的谎言，现实情况正好相反。我是最后一个去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此前已来了两批知青，加上我共有 45 人。我们中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好。在阶级斗争被“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那个时代，成分不好的人在中国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是不会大有作为的。林场另外还有三户本地农民。所谓林场其实就跟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差不多。知青跟农民一样，每天扛锄头出工、开荒、种粮食、记工分(一个劳动日几分钱)。国家第一年给知青发基本生活费，一年后就不再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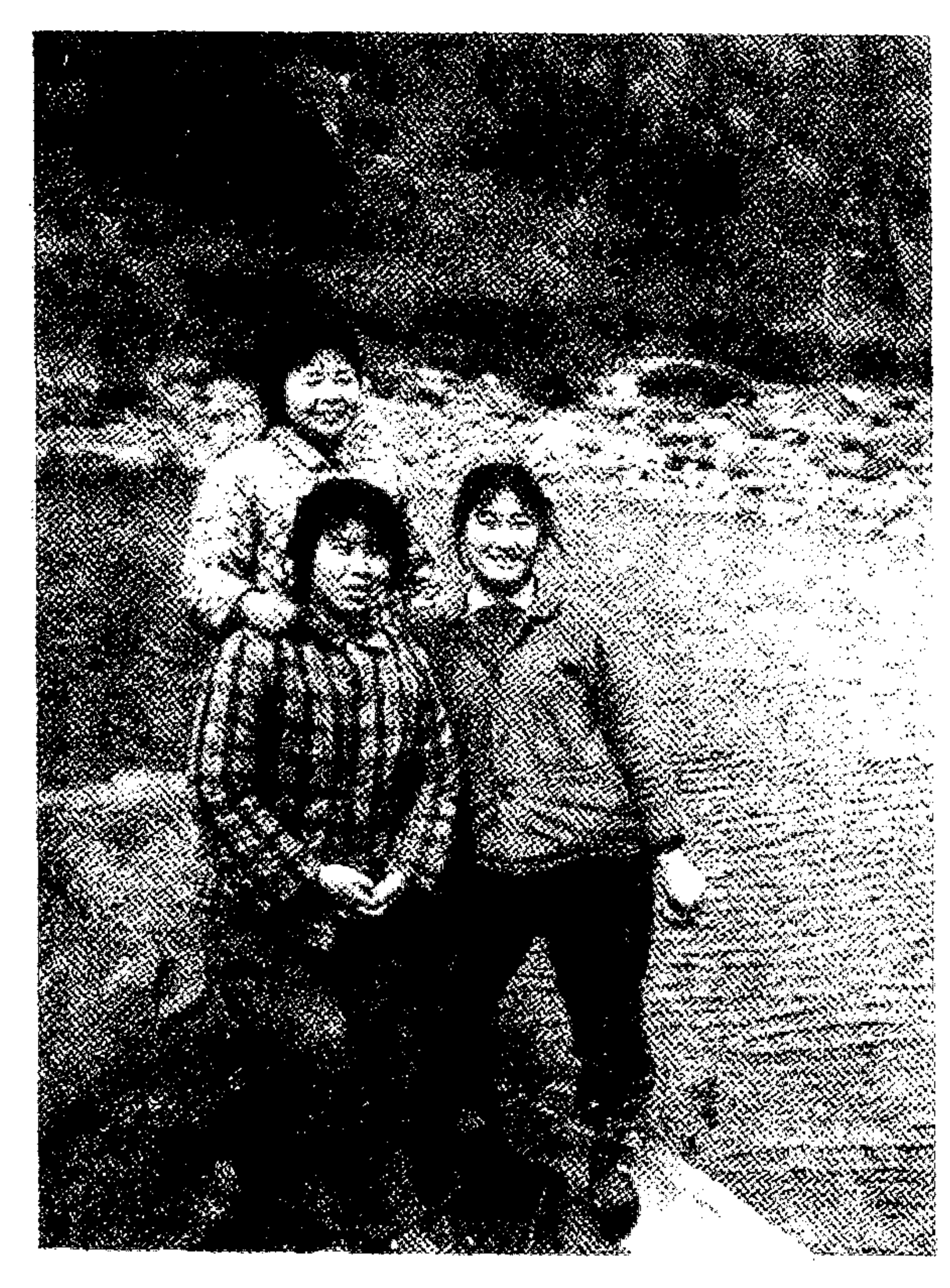
林场是伙食团集体开伙，红苕从地里挖回来，一开始是吃挖烂了的。整天吃红苕胃里直冒酸水，一直到红苕吃完都有一股烂苕味。另外就是老包谷籽，头天晚上就掺水煮，第二天煮开花了，放些油、盐，每人分得到一碗。老包谷籽连皮嚼把牙都嚼软了，太阳筋嚼得绷起、发痛。晚上深夜还要点马灯开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下雨天“扎雨班”，可以打打乒乓球。但夜深人静时常听到有人哭啼喊妈妈，要回家，那凄凉无助的声音伴随着一天的劳累渐渐变小、消失而进入梦乡。当时林场的生活非常清苦，我们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缺油少肉，不少女生月经紊乱、痛经，男生大多瘦骨嶙峋。

当时农村非常贫苦，照明的煤油、食用的盐巴都买不起。冬天晚上睡觉烧火取暖，并借用火光纳鞋底、宰猪草……不但用钱紧张，分的粮食也不够吃，除了过年能吃上一两顿白米饭，一年到头顿顿是红苕、洋芋和缺油少盐的南瓜、萝卜充饥。既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又要长身体，知青的饭量都大得惊人，吃不饱饭而饥饿、心慌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柔弱的生命

农村缺医少药，贫困落后，就在我下乡的生产队，贫困和疾病几年时间里就夺去了好几个年轻人甚至小孩的性命。我们同院子周钦先的三儿子才六七岁，大家都叫他宁娃，他刚满月母亲就死了，是吃百家奶、米羹羹喂养大的。他长得十分乖巧，说话声音悦耳，见我们挖洋芋，就跑来指点道：“姑姑，把碗豆大的洋芋留下来推粉。”我们挖了红苕背回家，他又跑来说：“姑姑，把好红苕放进苕窖，先吃挖烂了的。”那口气就像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在给我们提供生活经验，稚嫩的语调里居然透露出盘算生活的老成，逗得我们发笑，大家都喜欢他。没想到一次他摔跤后，肚子上划了一条大口，一直未愈合，我给他打过几次针、送过药，总不见好转。他天天睡在火坑旁边大板凳上，没钱上医院医治。

“文革”武斗期间，我回重庆探亲去了，但心里一直挂念着那可爱小家伙，在重庆梦里还梦到他已经好了，活蹦乱跳地在院坝里玩耍。一个多月后我回到下打磨溪，迫不及待地问：“宁娃呢？”“死了。”“怎么死了？”周钦先说：“后来没钱打针，伤口感染了，肚子里长蛔呢……”听后，我难受得哭出声来。宁娃到这个世界才短短的几年，一个小小的外伤居然要了他的性命。



后者为本文作者

宁娃去世一年，周钦先又结婚了。又隔了一年，一天清早，周钦先突然急匆匆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找我（我已是公社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了），说妻子预产期已到，肚子痛了三天，都没生下来。当时农民生小孩除非遇到难产，迫不得已才请医生的。我检查了她的胎位，诊断她怀的是双胞胎。周妻个子小，又是初产妇，我再三叮嘱周钦先必须马上抬到医院做手术，这样才能确保母子安全。

几天后我看见周钦先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地在公社办事，我急忙问他：“是不是双胞胎？母子还好吗？”他声泪俱下地给我述说在区医院发生的事情：“当天我们抬到区医院已下午五时了，×医生检查后也说是双胞胎，并说晚上八点动手术。谁知晚上区上放电影《红楼梦》，医生又说看完电影动手术。电影结束后已十一点多了，医生改口说现在太迟了，干脆明天上午八时做手术……我在旁还说：‘医生，她痛得很厉害哪，她不只下腹疼痛，上腹部也疼痛，像有东西钻顶心口，她能不能熬到明天上午啊？！’……”

周妻又剧烈地疼痛了两个多小时，大汗淋漓，辗转不安，犹如五内俱焚，痛哭流涕地大声惨叫，脸部表情变得扭曲、可怕。凌晨二时痛死在区医院，嘴巴、鼻孔爬出若干条蛔虫，让人心惊胆战……单一的蛔虫钻胆，痛起来都让人死去活来、万箭穿心，何况是快分娩的初产妇！三条生命就这样葬送在见死不救、缺乏职业道德的医生手中！

张成金是盐井公社大梁层大地主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五朵金花”演员杨丽坤一样，弯弯的眉毛下面一双明亮有神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匀称，光彩照人。丈夫

艾春华原是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接班人。他俩的婚事公社是坚决反对，千方百计刁难、阻止，施加压力，艾春华不顾撤职处分，仍然一往情深、坚定不移地要同张成金结婚，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家喻户晓。张成金暗自高兴，以为今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1967年结婚(张成金才17岁)，婚后，艾春华也贬成了农民。

大巴山封建贫困、重男轻女，媳妇清早起来就像机器开动了一样，一整天都不停地转：地里、家里、猪、小孩……夜深人静才能入睡，吃的是残汤剩饭……张成金生了第三个小孩后，在月子里感冒了，咳嗽不止，婆婆偏要认为她患的"月假痨"，强迫她喝药酒，结果咳嗽加剧，痰中带血，白天仍得干活，晚上照顾婴儿。艾春华对她也不关心体贴，没钱上医院检查、治疗，偶尔吃几副中药。由于长期劳累，休息不好，抵抗力下降，肺部感染扩散，几个月后诊断为肺结核。去世前已骨瘦如柴，面如死灰，双颊深陷，与病前判若两人，一双无神无光的大眼睛，更显凄凉悲切，美丽的花朵来到人间没得到应有的珍惜、呵护，26岁就早早凋谢了。

那些年头，莫说山里的农民，连我们知青的命也不值钱。1968年夏天，我公社知青汪家福因涨大水过河淹死。1969年7月，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孙京郑又病故。孙京郑1964年初中毕业。他父亲在新疆劳改，家中有母亲和妹妹，家庭比较困难，1965年5月就到了通江。他喜欢唱歌，也唱得很好。他患有风湿心脏病，有次下河游泳，刚下水全身发抖，四肢僵硬，是几个男知青揉、推、捏，用了30分钟，才将他身体及四肢恢复正常。临死前一天在高家梁知青家，大家都对回重庆感到渺茫，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我清楚记得他说过："我就不信到了50岁还回不成重庆！"——他对回重庆的渴望，最终望穿秋水也没等到。当时我还在想："50岁才能回重庆，我都成了老太婆，太遥远了……"第二天，就听到赶场知青讲孙京郑死了，估计是心肌梗死发作，无钱医治！

现在我才想起，他当年怎么不办病残呢？心脏病随时都会危及生命，根本不能干重体力活啊！汪、孙两位的坟都在我们生产队，我们出工路过时常常看到他们的坟墓，心头总是感慨万千。他们都那样年轻，处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木，被无情的狂风给吹断了。写到这里，联想起我家去世的亲人：脆弱的生命可以随时消失，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存在的。

然而无论生活条件多么贫困恶劣，大巴山的农民都安于现状，从不抱怨。当时一年每人供应六尺布票，能穿一件粗布衣裳就很不错了。人们的衣裤都是补丁重补丁，邻居们见到我和小宁姐穿了一件灯芯绒衣服，个个都来摸摸，表情里透露出惊讶、羡慕："娘哇！她们穿的是灯芯绒，我这辈子能穿上一件灯芯绒衣服，死了眼睛闭得梆紧……"意为穿件灯芯绒，死了都情愿。中国农民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农民啊！他们承受苦难的韧性和逆来顺受的善良本性，宽容了解放后国家政策的失误带给他们的种种灾难。

田明惠发疯

1966年，我们林场周围的田地生产的粮食不够吃了，公社在五大队给我们划拨了几座山，在山间平坦地带搭建了一座约六十平方米的草房，将树木砍成三四米长，一根根捆成排，搭平整，上面铺满了稻草当做床，搭了两层，并在外面搭了简易厨房和厕所，上层是男寝室，下层是女寝室，没有门，就像餐风宿露一样。由汪家福、秦宗碧带队，一共去了15个人。

天刚鱼肚白就吃早饭开工了，每人手上拿一把弯刀，从山下往山上砍，杂草、杂刺、小树、大树，统统砍掉。有的刺一长串，砍起来很不利索，常常将手、脸、脚划一道道血痕，甚至鲜血长流，不擦药也不感染。每天收工后人就像散了架一样，全身疼痛，真想美美地睡几天，第二天天泛白又精力充沛地迎接战斗。大家都这样任劳任怨地生活着，虽然劳累、艰苦，环境条件恶劣，感觉却充实愉快。砍完一座山后，将山之间连接交界处砍净，用土隔开，以防烧山时，引燃另一座山林。然后将树棒堆起、交叉起，点火烧，只见整个山上烈火熊熊，红光映照，浓烟滚滚，大家的心情莫名的兴奋，好像打胜仗一般，欢呼、跳跃……烧尽后还得检查一下有无火星，会不会死灰复燃。与周围绿葱葱、生机蓬勃的山脉相比，这座山成了一片黑沉沉焦土，一幅焦头烂额、面目全非、不忍目睹的荒凉景象。当年我们知识青年就在“战天斗地”的革命口号下从事这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干得很欢，根本没有保护环境、生态的意识。经过我们毁坏的山林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复！

播种玉米了，用一种尖锄头，身上挎一小竹篮，装满了玉米种子，隔两尺的距离，用锄尖啄一个坑，抛上三四粒种。有的岩石陡壁上比较难种的都是男同学去播种，稍不留意就可能摔下来，农民就发生过摔成残疾，甚至死亡的悲惨结局。四个月后，包谷成熟了，就要专人看守了。一座山要搭三个窝棚，防火、防盗、防野兽偷袭，而且整晚不停地敲木梆子和吆喝，守了一个多月就开始收玉米了。

第一年是丰收年，好的一棵玉米要结三四个包谷，长的有一尺，颗粒也饱满。三四年后土壤营养耗尽，就放弃这座山，另开一座山。就这样，祖祖辈辈，反反复复，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都是这样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玉米收获后，山上就没事可干，只留下两名女生看房，守农具。田明惠、胡梅英她俩胆大，都单独一个人在上面守过；我同胡梅英守过两晚上。一到深夜，山林里野兽怪叫，山风呼啸，吓得人心惊胆战的，一夜未曾合眼。

几年后才听说田明惠一个人在守窝棚时，被不知名的当地人强奸了。田明惠是1965年5月29日到柏桠寺林场的老知青，与她一起来的共29人，都是从土湾街道来的。她生于1948年，小学文化程度。中等个子，身体好，结实；模样一般，皮肤较白，圆脸，眼睛不大，鼻翼较宽，嘴唇厚，笑起来声音特别响亮，眼睛眯成一条缝，开心十足时尤显憨厚。

她性格豪爽，讲义气，却孤僻，没有朋友，不爱讲话，尤其从不谈及家庭，大家只略知她的继母、父亲待她不好。她力气大，做事麻利，泼辣，是劳动能手，样样农活都干，就像当过农民一样。她到林场一周左右，急性阑尾炎发作，是几个男知青连夜抬到沙溪区医院动的手术，术后恢复还好。

那一年秋天，田明惠从山上回到林场没几天就“疯”了，她用弯刀将自己食指几乎砍断，只剩一层皮相连，鲜血直流。我们大家都吓得不知所措，她却哈哈大笑……黄天华、文光頫是场干部，又是大姐姐，她们遇事比较冷静，马上用纱布将整个食指包好，立即送她去区医院缝合、包扎，她“疯”后常哭喊：“梅英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一个人在山上怕不怕啊！”

为了病残回重庆，田明惠竟然选择了自残方式来达到目的，多么无奈和可怜啊！十指连心疼痛起来那是无法忍受的，这样做是需要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然而，她虽然付出血的代价，却没有达到回重庆的目的。不久，她就失踪了，至今也无任何音讯。

有关她被强暴一事，郑尔兴最先听到社员讲。郑尔兴插队在五大队六队——当年开荒的生产队。我们窝棚对面山上住有两兄弟，社员讲是他俩兄弟中一人干的，这事一直无法落实，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三十几年，知青当中没有人再看到田明惠，她究竟生活怎样？我们大家仍很想念她，知青聚会时大家也常谈及她。

胡梅英在前不久的一次聚会上谈及她一人守窝棚时的事情。有天晚上，我们喂的狗朝着对面树林一直不停地叫，梅英估计有人在那躲藏。她声音好，是女高音，手上拿一把弯刀，扯起嗓子吼：“如果是人就站出来！我不怕你，我要和你拼了……”吼了好一阵，狗才不叫了，那人也走了。

卫生院见闻

1978年，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开展起来了，工作需要经常下乡，使我更广泛地接触，更深入地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任人摆布。他们对医生十分尊敬、友好，如果医生治病化险为夷，药到病除，他们就感激不尽奔走相告。如果庸医误诊，坐失良机，致人死亡，他们就认命，宽宏大度不去理论。最让我触目惊心、刻骨铭心的是一次计划生育剖腹、取胎、结扎术，那可以说得上是惨不忍睹，惨无人道。

在手术的前几天，公社、大队、生产队大肆宣传，动员的对象是家中有三个以上的孩子现在且又怀孕的妇女。动员说：区医院医生到我卫生院动手术，医生手术高超、安全，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手术的前一天，全公社来了二十多个妇女，她们怀孕都是在五个月以上的，有几个已经要到预产期，马上就要瓜熟蒂落了。本来可以先引产，再结扎，

这样孕妇就安全，风险小，痛苦少，需要一周时间。为了节省时间一步到位，取胎、结扎同时进行。在简陋的卫生院房间里消了毒，烧了两盆㭎炭火，火盆上放着装满水的茶壶，旁边放着装了半桶水的木桶，两张方桌拼搭起一张床，铺上棉絮、手术单，孕妇们就睡在上面接受手术。

主刀的杜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外科医生，而他的助手邓步棋医生却是中专医校才毕业一年、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从没进行过外科手术的进修和培训，居然第一次就在鲜活的人身上实践。两天后杜医生有事回区医院了，就由邓医生主刀，我院侯盛德医生当助手。七八个月的胎儿从母亲子宫里取出，生命鲜活（还来不及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就因他们是多子女），用一纱布块塞进嘴里，丢入桶中……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多，是他们造成的，他们"罪该万死"。

社员陈新仁的妻子的胎儿取出后个头特大，发育良好，乌黑的头发，有七斤重，取出后被丢入桶中，只听到桶里发出"呼……呼……"声，一直持续十几秒。只见那妇女眼泪长流，不敢吭声。侯医生示意我几次，我明白是要我将煮沸的水倒入桶中。我当时虽然麻木不仁，但无论如何也不敢、不愿、不忍心这么做，婴儿的肌肤娇嫩得像纸一样薄，怎容得下烧热的水更何况是沸水啊！侯医生只好放下手中器械，用戴着胶手套、沾满鲜血的手，毫无表情地将水倒入桶中……

手术后有人问邓医生怕不怕？他说："怕啥？简单得很，就像杀猪一样，有次我用力过猛，一刀划下去，将子宫划穿了，差点将胎儿头皮划伤了……"

手术一年多后，陈新仁的妻子和四五个做了结扎术的妇女又怀孕了，她们欲哭无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天啊！你为什么要折磨我们啊！"这些可怜的农村妇女精神上、心灵上、身体上遭受了多么巨大的创伤。伤口还没有愈合，又在上面撒盐！难道中国人口多就应当让她们受到非人的待遇吗？

户口与婚姻

1968年12月，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新高潮。社办林场被砸烂了，我们全部到生产队插队落户。老知青的回城梦更是遥遥无期，悲观、绝望像利剑悬在我们头上。除了办病残，婚嫁成了许多女知青离开农村的唯一出路。

户口像无形的枷锁，控制着、指挥着、掌握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扭曲的婚姻、不幸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普遍发生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为了一纸户口廉价出卖自己的青春，好多女知青对来谈婚论嫁的男方无论认识与否、了解与否，只要对方能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农村就行。如果不是那年代，很多知青都应该有更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我场女知青杨均枝，在生产队实在待不下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幸福和一生作赌注，

远嫁山西，与一个毫不相识的男人结了婚，条件只有“只要你对我好”。算她走运，遇到了好人，夫妻同舟共济，相守至今，儿孙满堂。每当提及当年冒险，她都禁不住感激上苍的眷顾。

女知青夏明芬也是通过结婚离开通江的，男方是北碚施家梁农民，那农民家贫如洗，住着简陋的茅草房。夏明芬在林场称得上吃苦耐劳，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她穿的鞋从来就是自己做的，身体也壮实，绰号“夏蛮子”。婚后七年，生下三个孩子，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又白手起家修起了砖房，由于操劳过度，终积劳成疾。1979年知青大招工时，张明利见到她已面黄肌瘦——白眼珠、颈项、手臂、腿全呈黄色，差点认不出来了，就送了几斤白糖给她，并提醒她去医院治疗。她还为自己马上能当工人、孩子户口可以农转非而兴奋。殊不知几天后她就丢下三个不省事的孩子，带着一身遗憾与世长辞了。

女知青×××在学校读书时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因父母是所谓“漏网地主”被遣返农村。在重庆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只好婚嫁西北妹妹那儿。短暂的接触被男方假象蒙蔽，婚后才发现男方心胸狭窄，猜疑心重，文化素质、人品太差，连女知青间的书信往来，也疑心是“恋人”。惹是生非、无理取闹，发展到大打出手，丧心病狂地动刀杀人，将×××砍成重伤，住院，最后离婚，留下心灵上的巨大伤痕。

一些深受家庭出身连累的女知青，为了下一代根正苗红，择偶专找贫下中农、共产党员。有的知青婚后工作、经济收入都不错，只是双方貌合神离，视而不见，行同路人；也有婚后双方通情达理，相濡以沫的和睦夫妻。

1968年4月，小宁姐和我在广州幺姑妈家探亲，幺姑爹是海员，老家是四川盐亭农村人，深知四川农民的疾苦，出于对我们的关爱，给我俩都介绍了他船上的船员。我俩从小受家庭教育影响，将婚姻大事看得很慎重，也知道，如果同意这门婚事，从此可以脱离苦海，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我俩却拒绝了。

1972年小宁姐顶替回了重庆，我一个人孤独、寂寞、恐惧地度过每天的日子，出工、收工、砍柴、煮饭、洗衣，周而复始，机械麻木，毫无生趣。心情格外压抑，忧愁、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只有接到亲人来信，紧锁的眉头才能舒展。插队期间的日日夜夜，就是这么煎熬着、等待着、期盼着，不知命运之神何时光顾，前面将是什么。公社剩下的女知青只有我是单身了，每次独自行走在乡间小路上，生怕丛林中蹿出什么坏人来。住房也缺乏安全感，半夜里多次被猫上楼的脚步声惊醒，只有虚张声势，恶狠狠问道：“哪个！……”听到“咪——”的一声，才放下心来。

我们那年代的女孩子，将贞操和纯洁看得与生命一样宝贵，周边单身女知青遭欺负的传言更增加了内心的恐惧，只要风吹草动，莫名的声响，都会搞得我提心吊胆。惶惶恐恐地过着日子，那滋味至今想起都心有余悸。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出现的几次重大政治运动给我们这批人的父母和家庭带来了无可言说的灾难和痛苦。我们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人造的“自然灾害”；读书时讲“成分”无端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小小年纪下乡受到身体上、精神上的种种折磨；工作时遇到买断工龄、提前退休、下岗分流……种种不幸都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究竟是谁造成这一切的？！人生的大幕将徐徐降下，荒诞年月造就了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庸无成就、工资待遇低、没有医疗保障，甚至老之将至衣食不保、贫病交迫。尤其是破产企业和厂矿企业的退休职工，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弱势群体，在夹缝中求生存。老知青虽然能够做到直面人生、宽容理解、安贫守困、气定神闲，但是为了后来人，却不该忘却那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唐思齐，女，1949年4月出生，汉族。1965年7月重庆六十八中初中毕业；1965年9月上山下乡到通江县新民公社柏桠寺林场；1969年3月到新民公社二大队六队插队；1979年8月到通江县新民公社卫生院任助产师；1981年4月调通江县土产公司；1985年4月达县地区财贸中专学习；1991年8月任土产公司会计；1991年9月调大足糖厂；1992年10月调灯泡三厂分厂任会计。2000年退休。

"团长"、"连长"与"排长"

王令福

这里讲的并非军人的故事，而是关于几个本地场员。1964年四川省达县地区在各个人民公社创办社办林场接纳重庆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教知青学会做农活，每个林场都派入了几个本地农民，他们必须是贫下中农，一般都比较年轻，男性。我们林场的几位本地场员待我们真有兄长之谊，他们是值得记忆的。

"团长"

我们刚到新农公社五一林场的时候，龙光辉还没来。他是1965年秋天奉命抽调到林场来的，那时候又有一批重庆知青共16人来到林场不久。说是来协助场长彭顺财管理知青的，但是又没有宣布任何职务；据说是共产党员，四大队的大队干部。我们凭借下乡一年来的阅历，猜测此人可能犯了点错误——当然不能犯大了——被贬到林场来的。譬如说，贪污——将扶贫款装了一些在自己的口袋里，或者返销粮有百拾斤进了自家的粮缸；腐化——同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睡过觉。

本地场员背底里叫他"团长"。他在一次填火药的过程中不慎将雷管引爆，左手只剩下拇指，其余四根指头齐掌根炸没了，于是手就变得团团的了，这就是"团长"的由来。

可是残废的左手似乎一点也没妨碍他干农活。照样挖地，只不过锄把加工得扁平一些，便于残存的拇指与手掌扣住；照样犁田，只不过用右手扶犁。他似乎显得比别人的手还灵巧哩。谁都赶不上他的背篼编得好，方方正正、板板扎扎的，既好看，又耐背，而且不硌背。知青回重庆探亲，爱捎点山货回去，托他编只背篼，他是不会拒绝的，回答说："空了来。"——你就放心地等着吧。于是某一天中午，便看见他砍来两根赤竹，在晒坝上支

了根板凳，坐下来，破竹，起篾，编织，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经纬交错中一只散发着新竹光泽与香味的背篼就编成了。

我喜欢看手艺人做手艺。龙光辉残缺的手还如此能干，更令我好奇。看见他那残疾的手居然能做出我们所不能做出的物件来，我遐想他健全的时候该是何等能干呵！

我没看见彭顺财场长编过背篼什么的，他也许根本就不会。

我们林场距山顶不远，一排平房紧挨着一座四层的土坯岗楼。据说这里以前是监督犯人劳动的一个住地。彭顺财场长住在岗楼的第三层，第二层住着会计杜国典，是彭顺财从本大队带上来的。知青们都住在平房里。彭顺财只需站起身来，往岗楼四壁墙上都有的外阔内窄的枪孔里探头那么一瞅，我等的行状便一目了然了。

龙光辉没能住进岗楼里去。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还不能息，夜间在煤油灯下一边掰着包谷籽一边“学习”——听彭顺财训话。有两桩事情翻来覆去地讲。

——桂华堂他爹，一辈子勤扒苦做，把钱财一颗一颗地往屋里头捡，儿子却用铁锹往外面掀……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

——吴熙古不仅有田，还开铁厂，还在大码头有商铺。土改开始时他还算个开明士绅，每次斗地主他都坐在台上。土改快结束时，一次斗争大会上，突然有人跳到台上高呼道：“还有一个最大的恶霸地主没有揪出来，你们说是谁？”台下齐声呼应道：“吴熙古！”台上问：“把他哪个办？”台下吼道：“枪毙！”于是三五个小伙子跃上台去，将吴熙古拽了下来，拖到河边，“嘭”的一声就崩了。

最初听到还觉得新鲜，日复一日翻来覆去地讲，终于弄得来一听到就心里发毛。彭顺财“后三十年睡不着”，而我们却“前三十年睡不醒”，常常在他的絮絮叨叨中打瞌睡。

龙光辉来了后情况悄然变化。

“桂华堂他爹……”——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个勤扒苦做的典故了。

龙光辉插话道：“人家桂华堂兄弟读书出息了，谁还稀罕回到这山旮旯里的穷家……”

“吴熙古土改刚开始时还算个开明士绅……”

龙光辉接嘴说：“人家就是一个开明士绅嘛，同王维舟还拜过把子哩，把家里的钱财都支援给川东游击队了……”

我们乐于看见他们之间争论，至少不像一个人讲那样沉闷。后来彭顺财就不那么爱讲他那通大道理了，我们乐得早点躺在床上。

这两个人掰着手腕哩，谁能赢呢？龙光辉可是有后台的——他弟弟是公社副社长。我们等着看戏。

正如他悄悄地来，龙光辉也悄悄地去了。有几天没看见他同我们一起做活路了。

"龙光辉到哪里去了呢？"

"他不会再回来了。"——彭顺财答非所问地大声说道。

彭顺财又开始讲那些桂华堂他爹之类的故事了。还好有火，我们围坐在火塘边上打瞌睡。

"连长"

黄贞道两三岁时在火塘边摔了一跤，右手伸进火石里去了，大人们听见哭喊声赶过来将他拉出火塘，烧伤治好后，无名指和小指就打不伸展了。平时无事他总是将右手插进裤袋里，但总得拿出来，一拿出来就有些像小孩子玩"官兵捉强盗"那样将手扮成手枪状。据说部队里官阶到连长才能佩带手枪，本地场员就叫他"连长"。我们知青不这样叫——这未免太残忍了——我们叫他贞道。

贞道是孤儿。父母亲过世得早，是被长他七八岁的哥哥拉扯大的。

他哥哥是从朝鲜战场凯旋回来的复员军人。据说长得十分高大，干活一顶仨，不过吃饭也差不多一顶仨。这就为难了。在生产队里干活，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评 10 个工分，不可能给你评 30 分，连 11 分都评不上—凭啥？可是吃饭却是吃自己的。别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春夏三顿秋冬两顿，瓜菜代粮……勉勉强强从年头拖到年尾，贞道他哥却时常断炊。20 世纪 60 年代初灾荒年来临，更是饿得嗷嗷叫，估计熬不过去了，不如省一点粮食下来给弟弟。一天，趁贞道不在家，贞道他哥从墙上取下火药枪来，仔仔细细往枪管里填满火药和铁砂子，口含枪口，右脚的大趾头按下了燃着的纸媒子—"嘭"的一声，越过苦海去了。

贞道幸而不像其兄那样高大。

山区有各种各样的鸟儿，当地农民常常依鸟儿的叫声给鸟儿取名。有一种鸟儿叫"不够"，我以为就是"布谷"，农民们长年累月对粮食的不够有太痛切的感受，因此就这么叫它。有一种鸟儿叫"快快下种"，点小麦时叫得最欢。还有一种叫"几磕钻"（大人勾起食指敲在小孩头上叫敲磕钻），个头很小，叫声却十分清脆，十分活泼，飞行时一栽一栽的，爱与人搭腔——确切地说是爱与贞道搭腔。我们在地边歇晌，传来零星的"几磕钻"叫声，贞道嘴唇一撮，也"几磕钻，几磕钻"的叫起来。渐渐地"几磕钻"的叫声热闹起来，地边树丛里十来只"几磕钻"在枝头上欢快地叫着，不停地蹦来蹦去，贞道乐得嘻嘻地笑，又黑又亮的小眼睛闪烁着灵动的光彩。

这年夏天，彭顺财叫我进山去管一座煤厂。我问："为啥叫我去？"彭顺财说："一个鸡蛋，我们得找一个安稳的榻榻放。"这话感动了我，便卷起铺盖卷，带上几本书，去了。

所谓煤厂，不过是两眼狭窄的煤窑。雇了两个啄匠（挖煤的）和两个拖匠（运煤的）；我只负责卖煤，卖得的钱按四六开与挖煤人分。挖出来的煤夹灰多，质量不好，来买的人少。

一天午后，百无聊赖。贞道却提着一个竹笼来了，笼里有一只鸟，我认得那是一只野鸡，雌的。此前贞道曾给我许过愿，要带我去捉野鸡，我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着这样的机会。

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山路前行。这天天气晴朗，苍翠欲滴的群山一览无余，山谷里弥漫着淡紫色的雾霭，影影绰绰地显露出鸟巢般的农舍，漫山遍野碧绿的白夹竹随风摇曳，"哗哗"地低语着，仿佛大山在述说着什么。

路过一片松树林，贞道说："采一些菌子烧汤喝吧。"我们钻进林子里，前几天刚下过一场雨，松针下的泥地还十分潮湿，零零星星的一些黄褐色的松菌，顶着松针，从腐叶中探出头来。我们边摘边放进卷起来的衣襟里，走出这片松林时，两人的衣襟里都塞满了香喷喷的松菌，足够我们饱餐一顿了。

贞道突然停住了脚步，目光沿着山崖上的灌木丛搜索。我问："找什么？""八月瓜。"贞道回答道，并回过头来冲着我嘻嘻地笑。——又是那种淫亵的笑。当地有谚云："八月瓜，九月奓（音 zhā，张开之意）。"

贞道从攀援在山崖上的一簇藤蔓中摘来两只八月瓜，扁平，微长，黑褐色，表皮覆盖一层灰白的绒毛，自蒂至尖有一道微凹的缝。我很难想象此东西可以与彼东西联系起来，以至当地人一提起便会发出那样暧昧的笑；也很难想象这东西能吃。只见贞道两只拇指顺凹缝轻轻地那么一掰，立刻显露出金黄色的瓜瓤来，异香扑鼻，其味甘美，至今还两颊留香。

终于来到一块平地。贞道砍来一些竹枝，张罗开一张网，从竹笼里取出雌雉，放置在网下，用麻绳的一端拴住一只雉脚，另一端固定在灌木枝条上。布置停当后，贞道从裤袋里掏出一把碎米，撒在网下雌雉周围的地上，然后找了个隐蔽的地方，叫我一起蹲下。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冉冉升起，冰凉的月光洒在坪地上，雌雉悠闲地踱来踱去，漫不经心地啄食着脚边的碎米粒。"咕，咕，咕——，咕，咕，咕——"贞道撮着嘴唇，不紧不慢地叫唤起来。雌雉停止了啄食，抬起头来，顾盼了一阵，"咯，咯，咯……"低声地回应着。隔了一会儿，贞道又咕咕地唤着，雌雉又咯咯地应着……终于，对面山坡的树丛里传出"咕，咕，咕——"的叫声。"来了。"贞道小声说。我们屏息静观。雄雉的叫声越来越近，一会儿，便听见噗噗噗翅膀拍打的声音，一团黑影翩然而至，落在坪地上。雄雉收归好羽翼，踅向雌雉。雌雉却避开了。雄雉又逼近，雌雉又避开……两只鸟在坪地上你来我往地兜着圈子，叫声却分明急迫着。我望了贞道一眼，贞道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轻微地摇了摇头，全神贯注地盯着坪地上的两只鸟。

"噗噗噗"又一阵强健的拍翅声骤然响起，又一只雄雉降临到坪地上。两只雄雉立刻在坪地上扑打起来。后者分明大了一围，凶悍得多，斗了四五个回合，前者便只剩招架之功了，且斗且退，终于悻悻然飞离了这块是非之地。胜者理了理翅羽，气宇轩昂地啼叫了几声，然后径直扑向雌雉。此时雌雉似乎吓住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雄雉拍打着翅

膀,跃上雌雉背,猛啄雌雉的头部,雌雉两脚发软,蹲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贞道猛地拉动了绳索,灌木枝上的网哗地坠落下来。

当夜我们吃到野鸡炖鲜蘑。

社办场瘫痪后,贞道是最后一个离开林场的本地场员。临走时向我辞行,希望我到他那里去玩。

说实话,我很快就将他淡忘了。往后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倒时而想起他来。——依旧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又黑又亮的小眼睛,腼腆憨厚的笑脸。

"排长"

大概是挟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雄风,各生产大队组建或重建基干民兵。按当时的说法,社办林场与生产大队同级,那么我们也将组建基干民兵?也将配置七八条枪?——我在公社武装部见过这类枪,有日本造三八大盖,有汉阳兵工厂造步枪,都已破旧得令人怀疑子弹上膛之后真能开得了火。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男生来说,若能挎着这样的枪,而不是提着一把砍刀,巡山护林,当然胆壮得多,也威风得多。因此心里真的就有所期盼。但是,按政策,只有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才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们林场只有六七个本地场员与一两名知青够资格。没想到若干月以前,出身不好使我们失去读书的机会,在城市无立锥之地;如今逃到山沟里来,这阴影继续地笼罩着我们,不由得悲戚起来。

幸而上面有文件下来,知青一律按贫下中农对待,可以当基干民兵。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党的政策真是英明伟大啊!我还被指任为新农公社五一林场基干民兵排排长哩——几十年过去了,知青朋友相聚时,竟然没有人记得我曾经是他们的长官!不过回忆起来,似乎也没有行使过什么职权,大概在组建之初喊了几趟操,随彭顺财场长到县城去开过一次会,随行的还有知青副场长周玉如,有三个人当时的一张相片为证。

林场基干民兵排副排长是黄德开。他可是正宗的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

他好像对我们怀着几分敌意。

他是唯一一个会对我们大声呵斥的本地场员。

初学做农活,难免笨手笨脚,黄德开就会给我们示范应该怎样做,还哇哇啦啦地说着。这本是抽调当地贫下中农社员到社办场来的目的——教我们做农活,当然也帮助我们改造思想。不过其他本地场员不怎么教我们,他们认为手上活路,一看就会。这倒也是实情。他们也压根儿没想到来改造我们的思想。他们其实是相当谦卑的。他们对城里来的能识文断字的知青有几分敬畏,也有几分怜悯——这么小就离乡背井,到这个穷

山沟里来同他们一起吃苦受累。

即便我们已经学会在坡上做农活了，黄德开有时也会突然蹿到我们几个小男生前面，大声呵斥道："手搭硬点！"抬起锄头频频地铲，扬起的泥土扑打在我们脸上，使我们自尊心很受不了。

有人说黄德开像二郎神杨戬那样有第三只眼——他的两眉之间的额头上情绪激动时就会出现一道竖直的暗红色的杠。我想那可能是一道过去落下的伤疤吧，同他在一起混了好几年也没能弄明白。他在呵斥我们的时候，这"第三只眼"就会显现出来，仿佛用它看清楚了我等剥削阶级子女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怀念父辈不劳而获的生活、妄想旧社会复辟等等劣根性来。

有一次黄德开又这般呵斥我们时，周伟业挥动着锄头迎了上去，两只锄头相磕，铿铿锵锵一阵乱响，惊得坡上的人都停止了手里的活，看着他俩。只见周伟业瞪圆了眼睛，怒视着黄德开。

那时候周伟业已经习得一手好农活，无论手上肩上腰上腿上，没有哪样功夫比黄德开差。黄德开讪讪地笑了，那"第三只眼"也渐渐地隐去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长大了。这以后黄德开再没有呵斥过我们。

他为什么对我们有敌意呢？他长我们不过六七岁，解放那年仍是一个孩子。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下大雨，没有出工。黄德开蹲在门坎上看一本小人书。我凑了过去，虽然书已相当破烂，但从那些熟悉的画面上我立即认出这是连环画《半夜鸡叫》，心里不由得一震。这是我孩提时代的阶级斗争启蒙教材之一，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没有不熟知的，几乎是它第一次使我对地主阶级的贪婪、狡诈和残酷剥削农民有了相当形象的认识。不过稍稍长大，我便想到地主和长工都不至于愚蠢到装鸡叫和听不出是假鸡叫吧，作者高玉宝该是在编故事吧。下乡若干年后，我也看不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有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而贫下中农里，老实说吧，有的人却不敢恭维。这念头当年只能搁在肚里。黄德开不识字，难道他从《半夜鸡叫》的画面上得到与我孩提时代相同的对剥削阶级憎恶的体认？

我在乡下的那些年里，多次参加过公社、生产大队组织的批斗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大会。耐人寻味的是，上了点岁数在旧社会就已经长大成人的贫下中农往往并不作苦大仇深状，即便是发言批判，也显得温温吞吞；狠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大概是因为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吧；最狠的要算个别知青了，大概是因为不仅受过系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训练，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操练了阶级斗争的文武全行吧。有一年大队开会批斗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富农分子"，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他大概根本不认识这位富农分子吧——突然跃上台子，取下嘴里叼着的铜头旱烟杆，"砰砰砰"向富

农分子的光秃秃的脑袋上猛敲:"你还不老实交待!你还不老实交待!……"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一敲一个血疱冒起来,鲜血顺着面颊缓缓地淌下来……看得我心惊肉跳。连主持批斗大会的贫协主任都看不下去了,走过去拽住了这个知青扬起的举着铜头旱烟杆的手。几十年过去了,知青们都垂垂老矣,我偶尔见到这位仁兄,即刻想起这件事来,看来一辈子也忘不了。

有一天上山割竹笋(用于造纸浆舀纸),我拖着一捆二百来斤的竹笋最后下山,半山腰被一棵竹桩划穿胶鞋,在右脚掌上划出一道长约一寸的口子,鲜血直流。幸而不十分深,我赶紧脱去鞋子,照当地农民所教授的,解开裤裆,屙了一泡尿冲洗伤口,干净后立即从衣襟上撕下一缕布条,将伤口紧紧缠住。平躺了一会儿,血似乎止住了,脚又塞回胶鞋里,拖起笋捆,一步一步地往下挪。艰难地挪了一段路,伤口痛得难耐,低头一看,血已经渗出来打湿了鞋帮。我只好躺了下来,将伤脚抬高,等着血小板凝结。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心里慌了起来,便弃下笋捆,一跛一跛地往山下移。伤口胀痛得厉害,脚一搭劲,伤口的疼痛直往上蹿,整条右腿都使不上劲了。我一下子涌出满脑门的汗来——今夜我怕是回不了林场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晃动着火把,来人是黄德开,背起我,噌噌噌地几乎跑着回到了林场。

我很感谢他。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照样不太答理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将彭顺财抓在台子上批斗。黄德开瞪大双眼,满脸错愕,"第三只眼"又显现出来了,但是仍然看不明白——秩序被上下颠倒了,他难以理解,也难以接受。

本地场员中他最早离开林场回到他原来所在的生产队。他的哥哥害痨病(当地人这样称肺病)去世了,他得回去娶自己的嫂嫂为妻。贫穷山区娶妻不易,而娶自己的嫂子,简直就是拣了一个大便宜——不需要送彩礼,房子是现成的,也许儿子都是现成的。他的嫂子——应该说他的妻子——来林场帮助他收拾行李,接他下山。她显得比他年长许多,且高大得多,似乎不太般配。

大约两三年以后,有一次赶新农乡场,见到黄德开,他比以前瘦得多了,面无血色,看上去很虚弱。万业权(与我搭伴的知青,他父亲是医生)说,可能传染上了肺病。我心里一惊:在贫穷偏僻的山区,这可是要命的病呀。

我被命运驱赶,在大半个中国闯荡十来年后回到重庆,万业权告诉我,当初生产队同院子的一位十分壮实的小伙子后来患肺病去世了。我很惊愕,随即就想到黄德开,但愿他并不如万业权所料想的那样患上肺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现在就还活着,当然老了。

作者简介

王令福,1964年9月下乡到宣汉县新农人民公社,1975年12月进昆明钢铁厂做工,1978年9月考入东北工学院读书,现在在重庆某高校教书。

柿子风波

骆振坤

又到了金秋十月柿子上市的季节。每每看见街头巷尾水果摊上的那些金灿灿的金钱柿，三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触动我的一个心结，勾起我丝丝愧疚和歉意。

1969年初，为了便于参加草坝区“星火”茶场知青宣传队的活动，与宣传队的大队人马会合，我从石窝公社六大队的老屋转到草坝公社三大队黑池坪，和另两位知青朋友插到了三生产队。

我们的知青屋安排在大路边，与蒲姓院子毗邻。蒲家有两弟兄，老二身体差，饱受咳嗽和哮喘的折磨。媳妇姓冉，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但透过那张扭曲的脸，依然可以看出以前那端正的棱角。如此不幸的家庭，上帝却赐给他们两个乖儿女。老大是女儿，叫文女子，约七岁，长得眉清目秀。老二是儿子，小名叫牛娃，约四五岁。这娃五官端正，一撮黑发留在剃光了的头顶上，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一双晶莹的大眼睛，透露出童稚的天真。他皮肤光滑细嫩，略微尖细的下巴上，长了一张棱角分明的小嘴，如不是因营养不良显得有些清瘦的话，活像年画“吉庆有余”里那个怀抱鲤鱼的年娃娃，煞是好看！

牛娃他爸因病出工少，工分挣得少，粮食也分得少，家里经常闹粮荒，是三队人人都知道的困难户。我们时常看见冉嫂子跟在队长后面乞求，口里喃喃地念叨着那同一句话：“姑父，娃娃饿得不行了，求你借点粮食嘛！”看着这屡屡“借”粮的农妇，队长扛着锄头，边走边无可奈何地说：“我看你们咋搞(万源草坝土话，搞念“guo”)哟(怎么办)？”队长心慈，冉嫂子软缠硬磨，每次总能多少讨“借”点粮食，得以渡过难关。轮到分粮时，扣除借粮，他们家粮食又所剩无几了，新一轮的饥饿不到下次分粮又重新光临，阴霾始终笼

罩着他们家。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队上分粮食的时候。每逢这一天，平时死气沉沉的蒲家便出现一派繁忙景象：全家大小一起上阵，大背小篼地往家里运送粮食。倾倒粮食的声音、推磨声、火炉坑中木柴的炸裂声、小孩兴奋的打闹声、大人的呵斥声、敞放在堂屋里的小猪吱吱的叫声不绝于耳，顿时充满了生机。不管粮食好晚背拢家，他们总是队里第一"尝鲜"的人。

牛娃子的脸，就像寒暑表。大春季节时，他脸蛋上像挂着两只苹果，长得红头花色的，乖得很！老人们说是吃了红苕的缘故，红苕"壮"娃娃嘞！到了分小春粮食时，牛娃的脸就变黄啦！我们队田少地多，小春作物以洋芋为主，因不堪忍受天天顿顿吃洋芋，便时常听见他的哭闹声："娘啊！我不'喫'(吃)那'歪'(当地土话，"不好"的意思。)洋务儿(马铃薯)，我要'喫''刀豆角'(四季豆)！"冉嫂只好让他把那几乎没有油水的四季豆当饭吃。有时，牛娃会在他娘的"指使"下，来到我们门前。他一手拿着饭碗，一只小手拇指含在嘴里，泪眼里饱含着羞涩和饥饿的目光。他不说话，就那么胆怯地静候在旁边。有饭时，我们会"施舍"些给他。但他哪里知道，有时我们的锅里也和他家一样，煮的炒的都是"洋务儿"啊！

大路旁有棵柿子树。我们没去时，此树果实大概归蒲家收获。在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当地农民常将尚未完全成熟的柿子切成片后晒干，和着粮食煮饭吃。青柿子摘下放到坛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涩味便可消除，吃起清脆可口，也可填塞辘辘饥肠。我们去后，以为此树的所有权理该归属我们。一来在我们门跟前，二来又在我们的自留地旁边。一句话，在我们的辖区之内。柿子没结果时，我们和蒲家倒还相安无事。看着柿子一天天长大，而且是扁扁的，近似于四方角的金钱柿，与大巴山的圆拱形柿子大相异趣，惬意之情难于言表！儿时生病发烧，睡梦中，妈妈曾放过这种柿子在枕边，因此对这金钱柿，我情有独钟。

我们队是大队部，宣传队的排练都在这里。因此，我们家便自然成了知青们的根据地。柿子树成了我们颇为得意的炫耀之物，我们时常在树下静静地观察柿子的成长，心里默默地企盼着柿子成熟的佳期，企盼着与知青朋友的聚会，企盼着共同分享这金钱柿的佳味。

柿子日渐长大，但因家中几乎天天有人，窥视它的人还不敢轻易下手。后来，我们的演出任务多了，不仅到区政府所在地的草坝街上去演出，而且按区里要求，开始在全区乡镇巡回演出。那次远距离演出回来，我们发现自留地边上的那棵柿子树遭劫了！满树还未成熟的"青宝宝"柿子，几乎被打得片甲不留。落叶撒了一地，树梢上依稀耷拉着的几个柿子，在风中微微摇曳，无声地倾诉着它们的伤痛。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我们被惊呆



右一为本文作者

了。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动我知青的“囊”中之物?

一番调查,得知柿子已被蒲家浸泡在坛子里,我一下丧失了理性,气冲冲地闯进了那黑黢黢的家。堂屋里,除了几条放在火炉坑边的条凳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在那破旧不堪的神龛桌下,我很容易地找到了装满柿子的坛子。揭开坛盖一看,天哪!离家前一树生机盎然的柿子,果然被歪歪斜斜地挤在了坛子里。我不禁怒火冲天:“要不吃大家都不吃!”我一边吵,一边使着蛮力抬出了那坛还散发着阵阵“生”气的柿子,全然不顾及蒲家夫妇的阻挠,也没理会孩子们惊恐的目光,将那坛大家企盼已久却谁也没尝到一口的柿子毫不犹豫地倒进了粪池。一口恶气出罢之后,我扬长而去。从此,牛娃再不敢上门来,只有远远地用他那双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我们与冉嫂便没有了语言,直到后来离开黑池坪。

其实,我本是十分胆小的人。在“文革”那个打、砸、抢盛行的疯狂年代,“天不怕,地不怕”的狂热火暴烙印,已不同程度地“烙”在了我的身上。那年月,哪个知青不知道“毛选”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啊!潜意识中农民“自私”的观点,唯我独“尊”的心理,驱使着我采取了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行动”。

转眼之间,离开万源草坝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每一想起此事,我就追悔莫及!心里不由阵阵酸楚,更为当时的冲动而羞愧!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倾倒的不光是柿子,而是蒲家孩子们一年的期盼,是他们赖以充饥的食粮啊!我处理此事时的冲动与鲁莽,

不知给牛娃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多大的创伤?

2004年五一大假期间,我们一帮老知青为纪念下乡40周年,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黑池坪。当我来到了我们知青旧屋旁时,看到那棵柿树根深叶茂,风姿依然。在蒲家院旁,我们见到了冉嫂,她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我可是那年伤害过你的"浑知青"啊,几十年的心结在双手紧握中瞬间融化。多么好的乡亲,多么淳朴的大嫂啊!

逝去的往事,虽已随着时光的年轮逐渐淡化,但由那场柿子风波所带来的自责,却时时在鞭笞着我的灵魂。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难以原谅自己。我常常在想,假如当时不那么冲动,多一点忍耐;假如当时不那么绝情,多一些同情和善良;假如历史的车轮可以倒转……当一切假如都已成为假如的时候,我想告诉冉嫂:宽容和善良又重新回到了人间,请你原谅我当年的无知和莽撞吧!


作者简介

骆振坤,女。1964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万源草坝区石窝公社红星茶场。1968年插队石窝公社六大队十一队,1971年调万源县文工团,1975年始从事中小学音乐教学至2003年退休。

知青小屋

任宗景

大巴山群山褶皱中有一道苦竹葱茏的山沟，我的知青小屋就孤零零地蛰伏在这深沟的一隅。

毛老人家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布后，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潮水般地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在这种大背景下，社办林场撤销了，老知青们也只得告别集体生活，形单影只地下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们一起“战天斗地”。和绝大多数知青同辈们比较起来，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了。不管怎么说，我有自己的窝，而许多同时插队的知青，往往到离开农村时都未能搬出烟熏火燎过的保管室（山区的保管室多兼作烘焙包谷的烘房）或冷风穿堂过的牛圈（住人，自然不能再拴牛）。小屋共两间，是好心的老队长承头专门为我营建的。刚落成时，那种天然质朴的风格真使我喜出望外：檩、梁柱和椽子，都取自新伐的松树，散发出浓郁的松脂味儿；用卵石打磨过的土墙上，尚未枯萎的杂草的根茎不服气地支立着；而青灰色的瓦片堆上屋脊时，似乎还带着砖瓦窑的余温……

我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为了不辜负生产队为我建房的一番盛情，我决计像模像样地活出个样儿来，还人们一个知青也会过日子的好印象。于是，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只有木匠活儿找人帮忙），有滋有味地搞起“内装修”来：

右边一间屋用苦竹剖篾夹成两小间，里面一小间做卧室兼储藏室，外面一小间做书房——将两根未剥皮的杉木桩楔进牛肋巴窗棂下的墙壁，横放两块长木板，铺上塑料布，便成了书桌。书桌上置一广口玻璃瓶充作花瓶，这儿取之不尽的野花可以保证瓶中的花

儿一年四季都鲜活耀眼。傍书桌再安放一搁板，将当时的全部藏书(二三十本)炫耀般地在搁板上排列着。再把自制的竹筒二胡、几支箫笛，醒目地点缀在书桌上方——虽说简陋了些，却也不失琴韵书香之雅致。左边一间屋则完全按当地的格式搞成厨房和柴房，条石围成的火塘、案板、水桶、泡菜缸、放锅和铁罐的木架……以及红苕窖，均布局有序，井井有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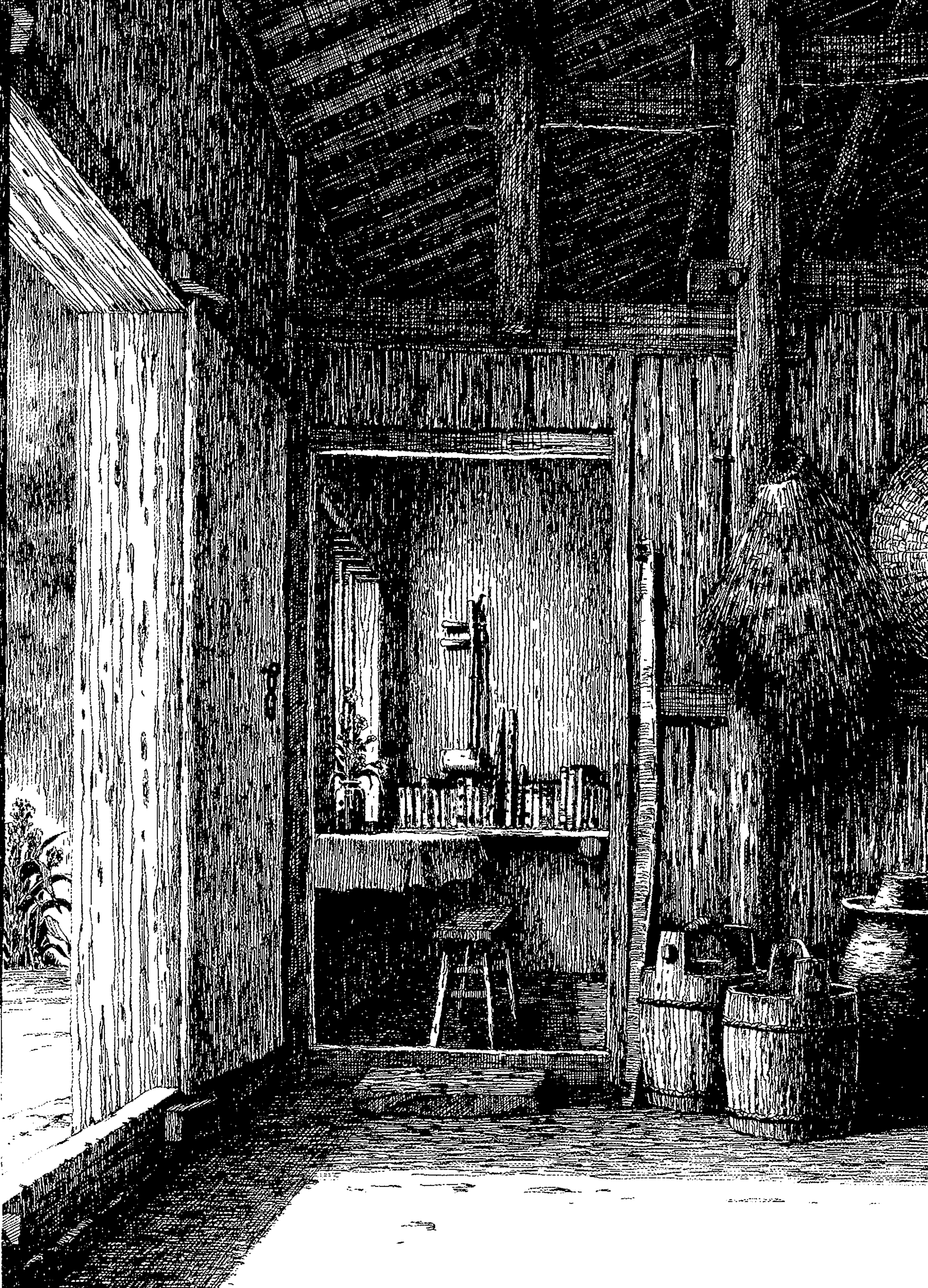
我的操劳没有白费，自我感觉好且不说，队长还表扬我"像个扎根农村的样儿"哩。

屋内安顿好后，意犹未尽的我又把地坝铲平，绕屋基挖了排水沟，并在地坝前的斜坡上栽上芡藕(一种花冠如美人蕉、块根可磨制淀粉的植物)和魔芋。再后来，又沿地坝边打了一圈竹篱笆，播下丝瓜种子。待到农历四五月，浓密的丝瓜叶儿把篱笆变成了绿色的墙，鹅黄色的丝瓜花星星点点，争相展露出笑靥。不经意间，丝瓜便从叶隙间伸了出来，全盛时，一次即可采摘大半背篼。每每此时，总忍不住为陶潜先生叹惜：侍弄那劳什子菊花，何如种丝瓜，既悦目，又实惠！

插队落户毕竟不同于当寓公。山区地多人少，紧张繁重的农事劳作使人收工后全身都像散了架。奇怪的是，无论多累，只要一回到小屋，疲惫就统统逃到爪哇国去了。便有条不紊地生火煮饭；或者既不生火，也不煮饭，从铁罐里掏出几个冷硬了的红苕，舀一瓢冷水就着啃。及至洗漱完毕，照例美美地裹一支叶子烟，巴咂巴咂着，走到书桌前，打开不知读了多少遍的书，神游于另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天地……这时，知青特有的种种烦恼(如对未来的焦灼、失落的彷徨)全部烟消云散。当然，也有心绪恶劣得无法自抑，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我的单人床便责无旁贷地提前接纳了我，让我辗转反侧(不过，大多时候是木头似的躺着，听竹梢与夜风的呢喃，咀嚼深沟里化不开的寂静)……此时此际，难免不英雄气短，止不住的清泪偶尔也悄悄滚过面颊。

倘有三五个知青朋友来访，那就是小屋的节日了。总要想方设法把饭菜弄丰富一些，毫不顾忌这顿吃了有没有下顿。好在竹林里有竹虫(油炸竹虫香脆可口)，溪涧里有螃蟹，水田有黄鳝、青蛙，只要肯出力，饭桌上的风景还不致让我这个主人太难堪。每每填饱肚子，主客便放浪形骸、神吹海聊，专拣高兴的话题摆谈，笑呵，闹呵，全不知今夕何夕，常常通宵达旦。若兴致特别好，则把二胡、笛子、箫、口琴以及护秋守夜用的楠竹梆子一股脑儿搬到地坝里，大家一起合乐，什么《雨打芭蕉》、《梁祝》、《多瑙河之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古今中外的曲调通通拿来，绝不厚此薄彼，只要有一个人记得全谱子，众人便学南郭先生跟着混奏，管弦齐下，千山回应，悠悠袅袅，不绝如缕。

一天复一天，小屋无言地陪伴着我的悲欢；一年复一年，小屋助我从容地抵御着孤独，并使那仅仅为了活着的日子多少透出一点儿亮色。真难想象，如果没有它的守护，我



将如何打发那软刀子割头般的十几年光阴！然而，当我怀揣招工单位的录取通知书，背着和插队时一样简单的行李卷，爬上通往大城市的山坳时，却“忘恩负义”地在心中呼喊：见鬼去吧，从此，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

谁知，记忆老是与我闹别扭，想忘却的偏偏无法忘却。回城后，我住过四星级的宾馆，进过号称一流的夜总会……现代物质文明可以让我目瞪口呆，却无法撩动知青小屋给予过我的那种温馨和熨帖之感；尽管当知青时的种种梦幻大多变成现实，灵魂反而无法找到一个牢靠的皈依之所。于是，每当那被时间和空间阻隔的知青小屋凸现于眼前，我就在心底默诵普希金题在姬姬·渥尔夫纪念册上的诗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过去了的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任宗景，男，1946年12月22日生，汉族。1965年高中毕业后即上山下乡，赴达县专区宣汉县天生区芭蕉公社八一林场，现在重庆某杂志社供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发表各类作品二百余万字，获全国、省、市级奖二十余项，出版散文集《风絮》，中、短篇小说集《情窦初开的时候》，有电视剧及多部专题片投拍。





难忘那年九月九
——政治风暴中的知青命运

周永生

难忘那年九月九

又到九月九了，离 1967 年 9 月 9 日正好是 40 年。入夜，窗外秋雨潇潇，檐漏滴答，我思绪万千，回到了当年。

1967 年是我下乡的第三年，那年九月，湖南全省发起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九·九”行动，那一天，长沙市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纷纷被赶出笼，挂牌游街，电影院、剧院也因关押审查对象而人满为患。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不能幸免。事后听弟弟说，父亲被挂上“右派分子”的牌子，祖父也被挂上“反动文人、资本家”的牌子。治安指挥部的来人气势颇凶，而祖父却偏不服气，和他们顶撞起来：“你们莫神气，土改是二流子斗地主，等到地主斗得差不多了，就会轮到斗二流子了。”结果招来一顿毒打，差点要了他的一条老命。

在千里之外的湘南某县红云公社一个小山村，穷山僻野里的运动却更加野蛮、残酷。那天上午我送一担公粮到 18 里地外的允山区粮站，刚一回家，发现气氛不对，我唯一的财产——两只大樟木箱被贴上封条，上写“贫下中农封”，箱子里装的是我喜爱的一些文学书籍。眼前的情景使我十分愤怒，有谁能代表贫下中农封我的箱子？一气之下，我撕去了封条，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横祸。

入夜，几个拿着鸟铳的基干民兵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地把我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一块用铁丝穿好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上书“破坏三查一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几

个大字，然后把我押赴批斗会会场。

会场设在大队礼堂，这也是我每天晚上给农民青年上课的夜校，没想到变成了我的批斗台。

会场四周挂了几盏煤油灯，台上书写着标语，台的两边站着一排背枪的民兵，显得阴森、恐怖。我一进场，会场上就喊起了打倒我的口号，大队支部书记谭××在台上拉长脖子、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一撮头发遮着前额，甩来甩去，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希特勒。他首先宣布了我的罪行，说我出身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在此次中央文革发动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公然对抗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他说我这样做绝不是偶然的，是有预谋的反革命行动。他还要我交待子虚乌有的反动组织的名称、成员名单、组织纲领、枪支弹药。

他是十分恨我的，因为1967年9月在他指挥下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用鸟铳杀了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富农，一个是道县修水库移民的外地贫农。我曾经背后讲过他是目无王法的土皇帝，他对此怀恨在心，此次趁机报复。在批斗台上，我又和他顶撞起来："我是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是反革命。你杀害贫农才是反革命……"

"还不老实！"民兵营长打了我一记耳光，将捆我的绳子愈勒愈紧，我的手也一阵阵钻心的痛，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捆绑刑罚的厉害，绳子渐渐地嵌入我皮肉之中。

我又用目光迅速扫了一下台下的乡亲们，不少人低着头，显然他们不忍看眼前的一幕，我的一些学生眼里都含着泪。我知道，在台上对我张牙舞爪的就只有那么几个坏东西。

一阵口号声中，我被悬空吊了起来，剧痛中我晕了过去。

……

昏迷中我恍惚又和我的夜校学生水养、送崽等一群年轻活泼的小伙子在一起。为了赚钱给夜校买煤油，买课本，我们一起又在山上砍柴烧炭。他们在山上砍下杂木树，一根根放倒后，滑下来，我在下面接着，把它们拖到挖好的木炭窑边……当我们干得正欢，突然一声嚎叫，是一只凶狠的野猪向我直扑过来，我吓得拔腿就跑，可怎么也跑不动。我惊醒过来，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已被关在生产队的粮仓中，两个手臂已麻木而且血肉模糊，双脚仍被绳子绑在粮仓的木柱子上。

第二天正逢赶闹子（集），我又被押送着参加了红旗公社的批斗会。首先是游街，然后是批斗。允山闹子（集）上，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挂着形形色色的闻所未闻的牌子在游街。我的牌子临时换成了"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子弟"。游街的人有的戴着高帽子，有的还边走边敲锣，队伍排了半里路长，围观的群众把允山闹子挤得水泄不通。

下一个节目又是批斗，作为重点对象的我又登上了公社的批斗台。在批斗台上，一个公社的治保主任，用棕绳把我捆起来，用一根扁担把绳子反复地绞紧，然后淋上水，绞

紧的绳子遇水缩得更紧,我感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我回头望了下这位如此狠毒的主任,他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看什么,不认得我吧,想报复吗?”

我怎么不认识他?几个月前,他患胃溃疡出血,有生命危险,急需输A型血,当时在场的公社干部不愿献血。我正好路过,是我伸出瘦弱的手臂献出了400毫升血救了他的命,我和他可算是血肉相连了,想不到他竟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螺旋的力学原理加害于无辜的我,用冷酷的行动来证实他阶级立场的坚定。

天气炎热,受刑后的两个手臂感染化脓了,而且麻辣火烧地痛,当地的好心人叫来公社的伤科蒋医生,他给我送来了一大包草药,我每天用它洗敷伤口,药还挺管用。我至今感谢这位蒋医生,没有他的药,可能就保不住我的手,今天也不可能在此敲着键盘来回忆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了。

次日,大队决定把我移交县治安指挥部、公安局去法办,几个民兵又将我绑送县城,一行人押着我离开了村庄。走上“大干头”,回头看了一下我下放劳动几年的村庄,不禁泪眼模糊。别了,山水环抱的秀丽的村庄;别了,那挺立在村口、苍翠茂密、见证历史的风水树;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别了,我情同手足的知青战友;别了,我那上山下乡知青革命幻梦,我如今与你们永远分手了。

四天后,我被关进了公社的阶级敌人学习班;四个月后,我成了学习班通缉的一名逃犯;四年后原大队党支书谭××因强奸村里的一名少女、造成少女自杀被关进了监狱,刑满出狱后,被村里人赶出了村子,不许进村,后来病死在山上;40年后,我的手臂和心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印记,留下永远抹不去的痛。

……

体验“学习班”

弯弯曲曲的山口溪,在山峦环抱中,急流而下,清澈见底,流经山口村,汇入潇水河。1965年底开始修建的山口溪水电站,将溪水拦腰截断,河床抬高,形成美丽的镜面湖,山水秀美,风景宜人。

1968年9月,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开始了,湘南江永县红旗公社“清查学习班”在此开学。这里的学员是从各大队揪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我在“九·九”行动后被大队捆、绑、吊、打、批斗之后再送到县里,县里又将我转送到此,成为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是何等的熟悉,水电站刚开工,我就是大队派来的一员民工,一个月后,我被调到指挥部,担任测量和施工,对周围的地形、大坝、渠道、涵洞各种数据了如指掌。1967年武斗开始后,我离开了工地,没想到此次重返工地,竟成了学习班的一名学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当然得剑拔弩张。八十多个学员被关在院子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民兵在站岗，显得煞有介事，杀气腾腾。学习班大队长是革委会的负责人，副大队长是山口溪电站的阳秋平，他曾拿着标杆，陪我工作过两年多。

学习班开学了，首先是大队长训话，无非是要大家在此老老实实地改造，接受审查，顽抗到底就是自寻绝路。然后讲明：大家一边检查问题，一边在电站劳动改造，完成电站的扫尾工程；晚上分组学习，交待自己的问题。

我们这个组共 10 个人，年龄最大的五十多岁，我是最年轻的一名学员。大队长指定了一名组长。组长姓关，1949 年以前是一名伪营长，大家背后叫他关老爷（关云长），1960 年劳改释放后在家管制劳动，每天晚上的讨论会照例由他开场。

九月的湘南仍然十分炎热，夜间堂屋里蚊子嗡嗡直叫，堂屋中间燃着熏蚊的黄荆叶，烟雾缭绕。关老爷拉长了声音说：“同犯们，我们都是人民的罪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感谢政府对我们宽大处理，给我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我们要重新做人，要听‘管教’的话，好好改造。”他说得那么流畅自然，背诵着那多次运动中重复的台词。接着发言的也跟着他以“同犯”相称。我只在小说和电影中看到革命党人在监狱中以同志相称，“同犯”这个单词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的，很不习惯。

小组里那名干瘪老头外号叫“罗酸菜”，据说 1949 年前，他家几代都是当地有名的抠门，家里一年四季吃酸菜，平日炒菜舍不得放油，用一根筷子绑上一块肥肉，炒菜时用筷子在锅里涂几下，炒完菜又把它放回酸菜坛子里。他家还有祖传的宝贝，木鱼和木鸡，是过年拿出来待客的，只能看不能吃。经三代的努力，到 1949 年前买了 18 亩田，成了穷村里大户，土改中被划了个地主。老百姓说他犯的是土地法，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从此他交上了辛酸的厄运。这个土地主身上哪能找到丝毫黄世仁、刘文彩的影子？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练出一身好功夫。别看他身材瘦小，干起活来可不含糊，两包水泥 200 斤担起来健步如飞，难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顺德说，阎王老子打发他来就是来做事的，他是天生的“工蜂”。

鲁师傅和我是熟人，他是远近闻名的木匠。当地的木匠是要学徒三年的，前两年做粗活，给师傅家干家务，给老板娘倒马桶，后一年才能得那些师传的秘传。所谓秘传无非是一大堆口诀，例如板凳各部分的尺寸比例、屋顶的坡度等，由于没有文化，学的东西不能活用，你如果想就地形盖个新式样房子，他就可能盖出一个炮楼不像炮楼、房子不像房子的怪物来。水电站建大坝要做模板，找了很多木匠都做不好，后来有人找来了鲁师傅，他看了下图纸，用一张纸在一旁画起来，我在旁边一看，他是用三角函数在计算，字体流利。我问他在哪里学的木匠，他苦笑着回答我，是自学的。我心中很纳闷。后来人家告诉我，他原是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就自己做起木匠来，因为手艺好，

大家都叫他鲁班师傅。原来如此！

在学习班他很少说话，当年不就是乱说话惹下了祸根吗？如今他选择了沉默。

这些老运动员，运动一来就得登台亮相，挨斗挨批，演出一番。村子里闹争水争山，闹械斗，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有个风吹草动，就抓几个阶级敌人出来斗斗，杀个鸡给猴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就风平浪静，迎刃而解。

顺德是天生的养蜂迷，他三句话不离蜜蜂，在他的眼里，人也变成了蜜蜂。养蜂人当然买卖点蜂蜜，因为得罪了村干部，此次运动中，有人说他的蜜蜂是吃社会主义的花粉，酿资本主义的蜂蜜，蜂蜜饱了他私人的荷包。他的罪名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蜜蜂被人共了产，家产全部充了公。望着那些老同犯，比起那些死鱼子来，他可成了显眼的浮头鱼，他总担心运动到头，会怎样为他“一定终身”。

花荀的罪名是坏分子，是学习班最潇洒的人。他蓄着西式头，口袋里还放着香烟，香烟有两种牌子，“岳麓山”是专给干部抽的，自己抽“红桔”牌。六十多斤的担子压得他缩着颈根，两肩耸起，大家笑他三个脑壳。大家喜欢听他讲故事。他是这一带有名的赌头，经常到瑶山里去开赌。他告诉我赌博的方法就是“压宝”。赌博的场面是相当壮观的，十几张桌子成直线摆开，赌客坐在桌子边，每人面前放一块砖，把赌资压在砖旁，每人可压“1、2、3、4、”中的两个数字。他作为庄家坐上方，在众目睽睽下抓一把黄豆用碗盖住，再用筷子将豆子四个、四个的扒出来，然后抓着最后剩下的豆子数论输赢。开碗“揭宝”时，几十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碗中的豆子，仿佛他们就是阶级敌人，是一个也不能跑的。当然大赢家总是花荀。有一次赌到深夜，赢的钱装满了书包。赌客愈赌愈眼红，他连忙装着上厕所，一出门拔腿就跑，里面的人发现后，紧跟着追出来。他一边跑一边丢钱，后面的人因捡钱减慢了速度，他终于逃脱，带着四分之一书包的钱脱了身。他告诉我只要学习班一结束他就重操旧业，只要把赢的钱交一部分给生产队作为搞副业，就没有人管他了。

秋荀在学习班和我同罪，他沉默寡言，是个大难不死的人。1967 年武斗时，非法组织贫下中农法院把他作为反动子弟绑赴刑场，幸好县里的支左部队闻讯后，开着摩托急驰而来，大叫“枪下留人”，才救了他一命。那年八月，在那股武斗的恶浪中我们是从广西绕道逃跑回家的，假若不跑，就也在劫难逃了。知青战友、诗人王百明就在那场浩劫中长眠在都庞岭下、潇水之滨。

既然进了这个门，当然就有所犯，我的罪名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黑五类”子弟。具体罪名有三：一是出身于反动家庭；二是当我看不惯那些目无国法、私设贫下中农法院、草菅人命的人时，挺身而出，在大会上顶撞他们，站出来为那些受迫害的群众说了几句公道话；三是撕毁了贴在我的书箱上所谓贫下中农的封条。在此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千条万条，贫下中农的扁担第一条”，哪里还有我说理的地方。

学习班里形形色色的同犯有各种各样的故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如今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作为学习班里最年轻的接班人，想起同犯们的遭遇，看看自己满身的伤痕及胸前挂着的反革命牌子，我绝望了，这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苦难的岁月何时是个头……

那一天歇气时，我溜到了电站的坝上，往下看，坝高二十多米。我突然起了轻生的念头，走近坝边，咬了咬牙，闭上眼睛，准备往下跳……

"不，我不能跳，我决不能做懦夫。"这时我耳边恍惚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我是一名堂堂的男子汉，当年韩信能忍受胯下之辱，司马迁能忍痛遭受宫刑，这种令人倍受污辱失掉尊严的处罚，并未损坏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我当然不能和伟人相比，但至少不能做辱没祖宗的窝囊废。此时假若跳下去，明天外面就会传出消息：一个长沙下放崽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我将会在此"盖棺论定"，川流不息的山口溪，将永世洗刷不了我的冤情。我毅然地转身回走，在一块阴凉处坐了下来。

远处副大队长阳秋平拿着一个瓶子朝我跑来，原来他在到处找我。他走近我身边，将一个瓶子递给我，那里面灌的是蜂糖水。又顺手在口袋里拿出了两个棕叶粑粑要我吃，安慰我说："俗话说，君子不跟牛头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耐一下，过了这一阵就好了。"他陪着我走下了大坝。

啊，在他的眼里，我也不是敌人。

学习班的民兵站了三天岗，就撤退了，因为革委会知道，这些土生土长的敌人是既翻不了天，也逃不掉的"死鱼子"。民兵撤走了，由谁来看管我成了问题，经再三考虑，他们把我交给了学习班的何叔。

何叔，四十多岁，矮矮的个子，四方脸，大眼睛，显得很面善。他家住永丰大队，是一个富农，一家四口人。儿子比我小，在队上出工；女儿九岁，在念小学。一家人穿着整洁简朴，四间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那天我刚到他家，他老婆走出门口迎接我们，晚餐还砍了肉，加上几个小菜，显得较丰盛。饭后在他家洗了澡，上床睡觉，没想到何叔竟来与我同睡。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学习班把负责看守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希望我不要给他为难。真是"恶人出高招"，不知是谁出的馊点子。

就这样，我白天在工地劳动，晚上就住在他家。他家没把我当外人，生活安排得可以，人也很热情。他自留地里瓜菜满园，还喂了不少鸡，间或为我添点菜。

我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原已想好了逃跑的计划，翻过他家后面的那座山，就上了去县城的马路，然后直奔县城边的知青组，先躲一阵子，再找机会逃跑。但一想到这样会株连他全家，也就暂时放弃了计划。日子一长，也和他们拉拉家常。我和他们谈谈城里的事

情,家里的过去,祖上的故事,一住就是三个多月。我养好了伤,恢复了身体。在那年月,就是这场运动,让我和这些同犯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几个月,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那年11月底,大队又调我回去批斗几天,我回到了大队,还是老一套,反正适应了,皮肉当然也受了点苦。第三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趁民兵换班的机会,从后门逃出了村庄,村后的小路很黑,我摸着出了村,一出村口,就没命地跑起来。从大队到公社,要过一座桥,夜间慌不择路,竟找不到桥。赶紧脱光衣服,用手举起,蹚过齐大腿深的水,上了岸,光着身子又跑。身上的河水刚干了,又淌满了汗水,跑得气喘吁吁。我真想学花荀的办法,一路丢钱保命,但我身无分文,无钱可丢,就也顾不得丢人了。好在乡间的路上夜间无人,否则会把我当做精神病人抓起来。清晨四点多钟,回头望望无人,才定下神,在路边穿好衣服,跑到江河大队知青组。老哥子和小哥子一看我的狼狈样子,早就猜着几分,赶紧将我藏在知青组的二楼,白天大家轮流放哨。知青洪哥间或来神秘兮兮地报一点外面的动静,大家都很紧张。三天后弄来一条船,沿着一条小河沟从水路将我偷送到马河。我又在马河知青组躲了七天,逃离县城,返回长沙。

在逃离村子的两个小时后,大队组织了十多个民兵在后面追赶,并在大山里找来了几名枪法出众的猎手,要他们发现逃犯,就绳之以法。接连五天,每天都派人到汽车站去抓人,好险!

我多么庆幸,终于告别了"同犯学习班"。

……

我感到十分冤屈。我们是带着"出身不好"的原罪到广阔天地的熔炉中脱胎换骨的;我们是满腔激情到农村去,与贫下中农结合、走革命化道路的。我记得知青诗人王百明的诗句:"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我们的事业属于人民,我们的理想——红旗手,我们的事业——革命人。"但谁能想到,我们满腔的豪情壮志得到的是如此回应,我们遭受的简直是一场灾难。

闯荡淮北

1970年7月,看来是走投无路了,背着反动知青的罪名,我逃离了江永县。一想起批斗场上捆、绑、吊、打的情景,总有些惊魂不定。刚一回家,派出所的人又上门训斥,勒令立即回乡,否则给予遣送。晚上,弟弟的同学来敲门,我以为查户口的又来了,吓得翻墙而出,事后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但仍不敢回家,于是在外过着流浪的生活。

那天,正在街上游荡,碰到同公社的知青李为贵,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周哥,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有人还说你自杀了呢。看到你我就放心了,我正找你有事,走,我们一起吃面去!"

算是他为东，请我吃了一碗光头面。为贵边吃边问我："我倒有个好去处，你去不去？""能住有吃就行。"我立即答应，这是我当时最高的生活要求。

为贵的老家是安徽省利辛县，解放前，他父亲被抓了壮丁，后来在部队混上了个连长。解放后，由于这段历史，成了管制对象，为贵当然也跟着背黑锅，1964年和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起戴着红花下放到江永当知青。前些日子他去了一趟安徽，回到老家三黄寨村。他的叔叔、伯伯是贫农，跟大队公社干部还有点沾亲带故的。亲戚们知道他的苦衷，劝他说："你父亲当年是五花大绑走的，谁知道绑出了一个军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这样吧，你干脆回老家，回来你就是贫农，在家里挣工分吃饭，谁也不会欺负你。"为贵一想这话也在理，在当地住了几天，虽说苦，却还舒畅。看到当地肥皂紧缺，突然想到我曾有办小肥皂厂的念头，特来邀我同去。他许诺，到他家保证我享受贫农待遇。我虽觉得事情太玄，却挡不住贫农的诱惑。以前不是有很多人迫于生计闯过关东吗？我何不去闯闯安徽？

下一步就是考虑具体的计划。两人口袋里总共12元钱，这点钱好干什么？为贵心中却暗有打算。

第二天，我们花八元钱在南货店买了八斤茴香，然后用塑料包了两层，打成一个背包。傍晚我们偷偷溜进长沙火车北站，看准了一趟往北开的货车，爬了上去。火车经过湖北，车站查得很严，我们就躲在货车里，饿了吃干饼，渴了喝凉水，车子进入河南才松了一口气。这里外流的人特别多，爬车已经习以为常，烈日下大群农民坐在敞篷货车上，每人背上一只细而长的口袋，装的是高粱、小麦、玉米、地瓜干，都是出来倒腾粮食的，有的是倒个差价，有的是细粮换粗粮，因为粗粮比较容易填饱肚子。我们也加入了这支外流大军。

我旁边坐着位大伯，居然隔着塑料袋闻出了茴香味，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兄弟，你的茴香能卖上好价钱，每斤七八元钱。"

我心里一紧，对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小兄弟，别紧张，我可不是'打击办'的，一不抓投机倒把，二不反资本主义。你看车上这么多人倒腾粮食，还不是换点吃的，谁能当上资本家？"

我没有搭腔，对阶级斗争这些话题，我总是有些过敏，还是李为贵插进来用安徽话和他拉起了家常，我才轻松了一些。到了徐州，转乘汽车来到他家附近的马店镇。在镇上，为贵用茴香换了六七十元钱，有了本钱，心里也踏实了。

"五七牌"肥皂

一到三黄寨村，他的叔叔带我们到了大队部，大队干部知道我们的来意，表示欢迎，

但对我们能否制出肥皂却将信将疑，要我们先试一下再说，并把我们安置在荣誉军人李为相家里。李为相在朝鲜战场负了伤，一只眼睛失明了，因此每月能享受一份粮食补助。1960年过苦日子时，他总是匀出一半补助粮食给弟弟，老婆不答应，他一气之下就把老婆打跑了，从此成了单身汉。李大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家的房子是土坯屋，墙是用泥巴垒的，很矮，房顶结构看来很别致，用杂木棒、向日葵秆、麦秆编织而成，外面糊上泥，颇像南方的茅屋。

李大哥带我们围着村子绕了一圈，矮小的土坯房排成一排，每家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和槐树，周围是队里的庄稼地。这里属淮北平原，放眼眺望，一马平川，火红的太阳炙灼着每一个角落，丝毫也不比南方的日头逊色。夕阳从远方的村庄后落下，家家屋顶冒出缕缕炊烟。因为没有山坡，没有树林，没有高大的建筑，也就没有阴凉，夏日的傍晚显得比南方还热。入夜，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们都睡在村口的打麦场，老少爷们都将裤衩挂在树上，光着身子睡觉。看来，北方人比南方人还会乘凉。

第二天，我们在李为相家里架起两块石头，放上个大陶钵，用牛羊油和烧碱开始了土法制皂。熬了十几个小时，油和水总是不能相融，我和为贵汗流浃背。其实小样试验我在长沙做过，无非是油和烧碱进行皂化反应，然后加入填充料。牛羊油和固体烧碱是制皂极好的原料，可这次偏偏就是做不成。李大哥站在旁边也干着急，赶紧拉起风箱灶给我们煮小米粥喝。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李大哥讲朝鲜战争的故事。有一次，他们部队被美国兵包围，苦战了两天一夜，终于胜利突围。我苦笑着对李大哥说："如果肥皂做不出来，我和为贵就打道回府；如果肥皂厂能生产，是您思想工作做得好，我们请您当肥皂厂的政委。"

经过反复试验，调整配料的比例以后，肥皂终于制成了。我们三人一起边吃早饭，一边商量下一步工作。为贵建议用烧饭锅先做上一锅，给全村每家送上一小块。另外我们还得给肥皂起个"名号"，李为相建议叫"贫农牌"，为贵说叫"公社牌"好。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不妥。我突然想起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里提到"亦工亦农"，我们是农民办工厂，肥皂就取名"五七牌"吧。只是肥皂太少，村里每家分不到一块。李大哥建议，肥皂不够，就多加点水。这倒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给每家送去一块像牛皮糖一样的"五七牌"肥皂。

第二天傍晚，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水渠对面大声问我和为贵："喂！光脚鸭子，你们的肥皂为什么叫'五七牌'？"淮北人穷，但一般怎么都得穿双鞋，看到我们老是赤着脚，觉得特别，所以有时叫我们光脚鸭子。"小家伙，这还不懂，你们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都不知道？""'五七牌'的意思谁还不懂，就是每块肥皂只能洗五到七分钟！"一位小孩俏皮地说。

不管怎样，"五七"牌肥皂终于诞生了。

为了正式投产，我和为贵准备去蚌埠采购一些原料，单程有一百一十多华里。为了节约开支，我俩决定步行。我们走的是一条简易公路，当地叫“晴通雨阻”公路，这条窄窄的公路上稀稀落落地跑着几辆汽车和胶轮车。淮北平原虽然平坦，却没有钱修路，公路未铺砂石，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就像沼泽地一样。

我和为贵将解放鞋背在背上，光着脚赶路，一图凉快，二图省鞋。开始，我们边走边欣赏平原的风光，不觉得累；而我们赤着脚赶路倒招来了不少好奇的眼光。走到七八十里地时，腿就酸痛起来。快到蚌埠已经很晚了，干脆在马路边草地上躺下来休息。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脸上和脚上满是蚊子咬的疙瘩。穿上鞋，在路边池塘里洗了个脸，拍打净满身的尘土就进了城。买好原料，赶紧去买回头车票。恰好那天天气好，车站挂出了“晴通雨阻”线的售票牌。买完票，口袋里只剩下了两分钱，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分钱只好买一条菜瓜，为贵掂量了一下，从中分开，每人一半。虽说是随手分开，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两块菜瓜重量绝对是相等的。

回到村里，生产队腾出间房子，“五七”厂挂牌开张了。我们先用铁锅熬制好肥皂，像做豆腐一样倒在一个四面能拆开的木箱中，冷却后用钢丝切成块，然后用模具给每块肥皂压上“五七牌”大印，肥皂正式出厂了。

村里人轮番来参观“五七”厂，三十来岁的大嫂们全都光着膀子，两个奶子一甩一甩的，赤膊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聊天。起初我们很不自在，后来细想起来，她们和我们光脚走路一样，图的是凉快。

李为相的工作是担水、烧火，还管煮饭。烧火用的是省柴的风箱灶。风箱一拉起就腾起火苗，一停火焰就下去了，这样可以节省柴禾。经过反复琢磨，肥皂质量倒还不错，拉到集市上去卖，很快销售一空。小肥皂厂开始赚钱了。那一天我们为李为相添置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张凳子。李为相还特意请队长、会计吃了顿饭，商议结果是这个厂由生产队来办，我们拿工资，于是皆大欢喜。

工厂越办越红火，来订货的人也不少，不到一个月，赚了几百元钱。队上给每家发了两条肥皂、两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原料准备大干。队长跑来为我们打气，他说：“小周，你别回去了，在村里跟我们一起干吧，我们全村都是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不过你们吃惯了南方的大米饭，这儿的窝窝头你吃得下吗？”“好，干就干，只要能当贫农，窝窝头我爱吃。”

何处是归途

那天早晨，李大哥刚将缸担满，准备开工，突然闯进来一伙戴红袖章拿长枪的人，自称是“马店贫下中农造反军”。有个领头的高个子宣称，肥皂厂是地下黑工厂，是搞投机

倒把，全部财产要没收上交。李大哥怕我吃亏，一手揪住大个子，一手抓他背上的枪气呼呼地往外推，边推边喊："肥皂厂是我办的，你把老子怎么办？他妈的，你的枪口对准谁，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的枪我都不怕，还怕你的吹火筒吗？"来人知道李大哥是打过美国鬼子的荣誉军人，而且有股连老婆都能打跑的傻劲，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乡亲们趁机跑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在老乡们的掩护下我们溜出了大门。那伙造反派最后还是把我们苦心经营积累下来的全部家当，作为他们的战利品用大车拉走了，临走时还狠心砸了我们的锅灶，在门上贴了封条。

回到李为相家，三个人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肥皂厂完蛋了，我们的希望成了肥皂泡，贫农没有当成，还差一点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走……

真是祸不单行，这时为贵突然喊冷，紧接着哆嗦起来。我连忙将他扶到床上，给他盖上被子，他嘴唇发乌，牙齿叩得直响，脸上显出痛苦的神情。片刻又推开被子喊热，大汗淋漓。发烧过后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

病急乱投医，李为相在村东找到膀大腰圆的李四卿，要他想法治。李四卿赶紧回绝："俺大叔，您好糊涂，这些年靠队上分给我两担地瓜干能活得下去吗？在外地跑码头卖的药都是牛粪晒干碾碎做的。牛吃百草，百草都是药；我的药是什么病都治，什么病都治不好。"

村上派人骑车到镇上请来医生，医生诊断为疟疾，给了些药片。药片倒挺灵，服下后为贵再没有发作过。

已是 11 月底，家家都缝好棉袄准备过冬。冬天是这里最难熬的日子，吃的、烧的都成问题，去年大雪封锁了交通，家家户户锅内煮的、灶里烧的都是地瓜干。为了不加重乡亲们的负担，我们决定在寒潮到来之前赶紧离开，天一变想走也难了。村里人听说我们要走都来送行，我们含着泪告别了乡亲们。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徒步走出了漫长的"晴通雨阻"公路，来到京广线上的滦河车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时寒风凛冽，下起鹅毛大雪，窗外已是白茫茫的一片。我穿着一件单薄的学生服，冷得紧缩着身子。回想起淮北平原几个月的生活竟像是一场梦，回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火车在原野上飞驰，离长沙愈来愈近了，我却是有家归不得，我真不知道，何处是归途……

后记

1979 年，大学的年级主任通知我，我那毕业于北京大学、满怀报国志向、在 1958 年被打成漏网右派的父亲终于平反了。

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于方舟》中，当时的河北省地下党书记“于方周”说出了我祖父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当时华北新闻的总编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危险，多次营救地下党员的事实，其中有不少是中央领导同志。

2004年4月16日央视国际播放的《五四运动在天津》的历史回顾中，报道了我祖父为天津“五四运动各界联合会”新闻界代表的历史事实。

2001年天津市政协出版了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祖父作为“不平常的报人”入选，原书指出：“他终身从事新闻事业，而且与马千里、于方周等人一道参加五四运动；亲聆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得到冯玉祥的信任和资助；由两名共产党人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数次参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并与《新天津报》的刘髯公、《大公报》的张季鸾两度开展论战；在军阀混战下苦苦挣扎……天津报人中有这样传奇经历的人实不多见，故本书选他作为近代天津十二报人之一。”

这就是我家几代人背着的历史原罪，它压在我家身上几十年，这公平吗？不，不说这些了。

作者简介

周永生，男。湖南省长沙市三中毕业，1964年插队下放到湖南省江永县红旗公社，1969年转点到浏阳县洞阳分社，在农村劳动13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湖南医科大学学习，后在医院及研究所工作。现在长沙市医学会工作，任内科主任医师。



回家

刘天立

在20世纪60年代，成都到原西昌专区会理县的公路里程大约为七百五十公里，成昆铁路未通车前，坐长途客车回成都需要四天，票价为36元。这对于从成都到会理县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讲，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五个月左右的劳动收入。要买车票乘车回家，是极不容易实现的奢望。因此，尽管我们这一伙1964年4月下乡时才十六岁左右的小青年天天想家，但一直到1966年初的两年多的时间里，都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回家，只能在宁静的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朝思暮想的回家梦让小知青们演绎出许多悲壮的回家故事。

巧乘免费车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攀枝花市（原渡口市）开始建设时，成昆铁路尚未通车。中央有关部门从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等全国部分省市抽调人员组建了五大汽车运输公司，每天通过公路从成都拉运各种建筑物资到攀枝花市，返回成都时全是放空车，这就让知青们找到了免费搭车回家的一条通道。但是，要顺利地免费搭上放空车也不是一件易事，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换取”驾驶员的同意。通过摸底调查，知青们找到了打通关节的“润滑剂”：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又正处“文革”时期，日用品非常紧缺，成都市按工资额为每个职工发放工资券，凭券购买紧缺日用品。外地来川的驾驶员很希望在成都买些紧缺日用品回家孝敬父母，工资券就成了知青们向驾驶员申请免费搭车的“介绍信”。远在成都的知青家长们为了早日见到久别的亲人，千方百计地八方搜集工资券，才让许多知青巧妙地打通了免费搭车的关节，得以实现回家的愿望。这条免费回家之路一直延

续了五年左右，直到 1971 年 7 月 1 日成昆铁路通车以后，知青们才开始选择更快捷的实现回家愿望的交通工具——火车。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当时来川支援建设的驾驶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未婚男青年，不少还是从部队转业的复员军人，又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在当年是非常吃香的汽车驾驶员职业，对于下乡六七年、因出身不好被招工单位拒之门外的大龄女知青来说，能与出身好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驾驶员攀上亲，也不失为一种跳出农村、曲线回家的途径。所以，原本只是想免费搭车回家看望父母的知青中，又有一些人只好有意无意地在搭车回家过程中，与那些有意找媳妇的驾驶员们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跟随完成任务返家的驾驶员们回到其异省他乡去安家落户了，她们最终也没能回到自己的老家。

智搭串联“车”

下乡插队两年多，无时无刻不想家。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后，全国各地为红卫兵大串联设立了许多免费食宿的接待站，我们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机会。我们十个志同道合的小知青组建了“广阔天地长征队”，打扮得像红卫兵一样，头顶红军帽，臂戴红袖章，打起绑腿，背起背包，开始了艰难的步行长征“串联”，其目的当然是回成都老家。由于我们毕竟不是红卫兵，为了回家选择了冒充红卫兵搭“串连”车，一开始我们内部还是有分歧的。第一天宿营后，就展开了“还继不继续往前走”的辩论。尽管双方都找出各种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对家乡的思念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第二天一早，我们又高唱毛主席语录歌踏上了回家的征途。我们每天平均步行六七十华里，吃尽了苦头，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我们始终积极乐观，一往无前。每天，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向沿途老百姓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所到之处，受到彝汉同胞们的热烈欢迎。我们在零下三度的寒冷冬天翻越银装素裹的拖乌山时，与修建成昆铁路的工人们在寒风刺骨的工棚里举行了大联欢。大家用各种文艺表演形式歌颂工农兵抓革命促生产、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直到深夜，大家的热情仍然很高，久久不愿入睡。第二天我们踏上征途前，一位工人兄弟还硬把自己身上穿的棉大衣脱下来送给我们队伍中年龄最小、穿得最单薄的一位兄弟，让我们感动不已。当我们拜谒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拜弟兄的彝海时，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红军时代。正是红军战士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鼓励我们克服困难，一往无前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 12 月 26 日毛主席生日那一天从海拔三千多米的泥巴山上的雪地里冲下山时，尽管每个人的全身上下都裹满了冰雪，双手和脸蛋都冻得绯红，但我们却都情不自禁地放声高唱起“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因为我们都知道，翻过了泥巴

山，离家就不远了。经过近20天的艰苦跋涉，我们十位兄弟姐妹终于从会理县步行走回了老家。只有经历过多彩的风雨人生，才能真切体会到“回家的感觉真好”（《梦落大凉山》画册中，第48页有一帧照片“广阔天地长征队”，是我们当年“长征”结束时的合影。其中少了一位兄弟，他已经去世了）。

结伴混火车

1971年7月1日成昆铁路通车以后，成都知青回家的路子又多了一种方式——混火车。当年，想回成都的知青一般都要为家乡的亲人带一些诸如黄豆、胡豆、糯米粉、板栗、石榴之类的当地土特产，大包小包地背上几十斤。从会理回成都，需要先搭长途汽车至永郎火车站，再转乘火车北上，经过德昌、西昌、冕宁、泸沽、乌斯河、峨眉、眉山等站，次日上午才能抵达成都。到了永郎汽车站后，要爬很大的一个坡才能到达火车站，加上汽车到达永郎的时间和自攀枝花市开往成都途经永郎车站的火车的停留时间很接近，怕赶不上火车，知青们一下长途汽车就得身背几十斤重的包袱小跑步爬坡去赶火车，那个狼狈劲儿就像难民逃难一样。正因为如此，为了互相帮助，打算混火车回成都的知青们，一般都会邀约几个知己，结伴而行。

要成功地混火车回成都，需要闯过三关：上车、查票、出站。而要全部顺利过关，一要凭本事，二要看运气。

混上火车最常用的有两个办法，一是买站台票，凭站台票以送客的名义混上火车；另一个是买短途票（只买距永郎火车站两三站就到站的车票）上车。当然，也有趁车站工作人员不注意从背向站台一侧的车窗口翻上火车的（一般是男生所为，先凭站台票将女生送上车去，同时将自己的东西交给女生带上车）。

上车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混过查票关。知青们最希望的是列车超员，特别是严重超员，车厢内外、走道上、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甚至行李架上全挤满了人，列车员根本无法履行查票职责。遇到这种情况，混火车的知青们是最惬意的，因为可以放心地睡一觉就能混坐回成都。但也有一点很难受，那就是十几个小时没办法喝到水，上厕所也特别困难。好多知青后来患的肾病也多少与混火车的经历有关。如果车厢通道内还能走得通，那查票就不可避免了。为混过查票关，知青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一是躲：到厕所内躲，到锅炉房躲，侧身躺到行李架上躲，钻到长座椅下面去躲……总之，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留下过混火车知青的身影。二是混：查票一般是在夜间，照明的灯光昏暗，车厢内人员杂乱，只要看准机会，就可以从未查票的一侧混到已查过票的一侧车厢去，那就过关了。三是骗：知青之所以结伴混火车，除了互相帮助以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在混火车时可以互相掩护，骗过列车员。要实现这一招，前提条件是要买一张真的火车票，而且同伴要

背向相邻而坐。当持真火车票的知青被查验过车票以后，趁列车员去查别的旅客时，迅速而隐秘地把真车票递给背向而坐的同伴，拿到真车票的同伴也就能顺利过关了。如果操作得好，还可以像接力赛似的传下去，解决好几个人的问题。

次日天亮以后，火车快抵达成都了，混火车的知青们面临的第三个难题也随之而来了——如何混出车站检票口。通常有两个办法，一是提早通知家乡的亲人到火车站接站。亲人们都早有默契：总会多买几张（视所接人数而定）站台票。（最早的站台票是用薄纸印刷的，无法剪口。因此出站时，检票员也无法判断站台票是经过了检票口的还是带进车站去的。）亲人进站以后，将多买的站台票交给知青，再把知青的行李分散，分别找一个出站口凭站台票出站，给人的印象就是接亲友的人接到了亲友。另一个办法就是，如果没有成都的亲人来接站，知青们到成都后就不走出站检票口，而是往南或往北沿着铁路行走，一直走到车站围墙消失的地方或一个平交道口处即可出站；还可以走到铁路员工通行的通勤口，冒充铁路员工家属混出车站，完成混坐火车回家的计划。

当然，并不是每一次混火车都顺利。混上火车相对好办一些，最提心吊胆的还是怕查票。如果运气不好，或操作不当没有蒙混过关，那就惨了。列车乘警会把你赶到餐车上去，既要补购全程车票，又要被罚款，还要训话洗脑壳，其狼狈劲儿就不摆了。更有甚者，如果所带钞票不够补票罚款，还会“享受”在半途将你赶下火车的待遇，那麻烦就更大了。若如此，这一次的回家经历就真的是苦不堪言了。

逼上“末班车”

20世纪70年代初期，知青开始陆续大返城，主要渠道是应各单位招工返回家乡。但并不是所有知青都能有幸被招工单位调走的。一些在下乡期间虽然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是无缘通过招工渠道回家的。这种不公平让许多热血青年心灰意冷而又不甘沉沦。于是，知青们在向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又多了一段心酸的历程。

遭遇了延续几年的招工都无望回家的知青们，将眼睛盯住了当时的一个政策：对身患疾病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知识青年，提供医院证明和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可以享受病残知青的待遇，将户口从农村迁回原籍城市。其申办手续简称办病退。自1972年开始，未被招工调回城市的大部分知青都想赶上这趟大返城的末班车，被迫开始了办病退。

虽然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炼对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知青们的身体发育多少都有些影响，但要真正查出患有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疾病的人还真没有几个。但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达到回家之目的，知青们使出了浑身的招数。

说起办病退，最要命的是病情证明。因为办病退的基本条件是，首先本人要有符合规定的疾病。其次，要取得县级以上医院的病情证明，还要通过成都市级有关医院的复

查。有关系认识医生的好办一些，可以找一个熟悉的医生开假证明。但要取得县、市两级医院的医生开出的假证明也并非易事，需要动员所有的亲朋好友通过各种直接的、间接的关系去打通医生的关节。最伤心的是那些既无大病，又不认识一个医生的知青，要取得一张事关前途的假病情证明，真是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所谓想尽了办法，是要认真研究各种疾病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疾病，无病装病，无病"造"病。而欲达目的，却必须吃尽苦头。譬如，要造高血压病，天天练倒立；要造胃溃疡，天天吃"血旺"；要造心脏病，长跑到医院；要造肾脏病，吊脚坐几天……为了取得一张合格的小便化验单，刺破自己的指头将血滴入尿液中（还有父母代刺指血的），将鸡蛋清混入尿液中，甚至去外科换药室拾取病人丢弃的脓血纱布，取其脓液搅拌到尿液之中……这些做法在当时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当然，为保险起见，还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服用一些诸如可以升高血压的药、可以加速心跳的药等等来配合，才有可能骗得一纸病情证明。有一首打油诗"走投无路搞病退，查遍心肝与脾肺，但求医生抬贵手，开成癌症最到位"，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部分知青们的心态。

有了病情证明，还要情真意切地写一份申请病退报告（因时间太久远，原保存的一套申请病退的资料已经散失），要写出对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刻认识，下乡后自己的良好表现，以及自己因病残无法继续留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的原因等等。接下来就是到生产队、大队、公社、县委知青安置办公室、成都市知青安置办公室、成都市父母住家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等机构和部门逐级烧香拜佛跑审批。这个过程一拖就是一年半载。假如某一个环节没有勾兑周全，任何一级的领导甚至经办人，都可以给你出很多难题，让你无功而返，从头再来。个中的辛酸，非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味的。

就是那些千方百计地成功办妥病退回到家乡的知青，因为是属于病残青年，条件好的单位是不会要的，连报考"电大"都没有资格。这部分病残青年绝大部分被安置在了集体所有制单位和街道生产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又踏上了新的艰难人生旅程。

作者简介

刘天力，男，四川成都人。1964年4月下乡到四川西昌专区会理县。70年代初回到成都。先在成都市人民银行工作，后来到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供职。现退休。

曹家岁月拾零

简木全

1964年9月9日，我和五百多名一二十岁的青年，乘坐二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离开了重庆，奔赴四川北部的大巴山区。老实说，当时重庆于我而言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一是因为我在重庆生活的时间太短，二是因为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我迫切需要出去闯荡，改变现状。那年，我刚好十八岁。几经辗转后，我和十几个年轻的伙伴来到四川省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大沙坪药场。

药场生活拾零

药场建在名叫大沙坪的一片荒山上。

我们的劳动生活与当地农家没有多大区别，早晨，两人扯猪草，两人扛烧柴，其余的下地干农活。和生产队一样，药场也凭劳力大小记工分，本地场员劳动一天记十分，男知青记八分，女知青分别记六至七分。

药场刚开办什么基础也没有，连吃饭都成问题。煮饭由本地场员陈定国的父亲承担，年轻个矮、结实的陈定国负责挑水。九点左右是早饭时间，午饭在下午一点半左右，天黑了吃晚饭是常事。

知青刚到的一年里，公社粮站按上级指示供应知青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大米、四两菜油。可是药场除了重庆知青之外，还有好几个从几个生产队抽调来的本地场员，他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口粮是包谷。由于知青和本地场员在一起吃大锅饭，所以每顿饭都掺和着磨碎了的包谷米。一些知青，特别是几个女知青吃了这种饭不消化，肚子痛，很不情愿吃。但不吃饭呢，肚子又饿，所以常常是端起碗就掉泪，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过来。

几个月之后，我们倒吃不惯“精白米”饭了，因为它容易消化，不经饿。

最困难的是冬天没有蔬菜吃，我们经常吃米汤煮的干萝卜缨子(即萝卜叶)，当地农民们常常用它喂猪。此外还有一种本地农民叫“酸菜”的萝卜缨子。酸菜的做法是将新鲜的萝卜缨子用开水烫过，然后放到木桶里加凉水完全浸泡，萝卜缨子的上面用石头压实。一个多月后，绿色的萝卜缨子经过发酵变成了黄色，产生一种独特的酸味，它是当地人过冬时的家常菜。

到药场没多久，知青们个个变得饥不择食，不管饭菜好吃不好吃，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男知青们轻轻松松地可以吃八九两米煮的饭。为了充饥，知青经常在本地场员的指导下采集一些野生果木，为此也招惹过麻烦。

药场附近长着一些漆树。五月初，漆树绽开红色的嫩芽，看上去跟香椿芽一模一样。上顿下顿都吃干萝卜缨子和空心萝卜的我们，听说漆树芽也可以吃，立即爬上几棵漆树，摘来许多漆树芽，用开水汆一下，伴上坛子里的酸盐水，做成一道佳肴，吃起来竟然十分鲜美，也没任何怪味。不料当晚就出现了问题：知青个个觉得身上奇痒难耐，早上起来，发现到处是红斑，一些人的脸也肿了。尤其尴尬的是肛门附近好像有虫子在爬，只好躲在无人处挠。

漆树芽与香椿芽最大的区别是香椿芽的断口处没有任何黑色物质，而漆树芽的断口处由于流出的树液接触空气而变成黑色。不过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初到大沙坪时，不少人因水土不服生病。我们虽名曰身处“药场”，但在那缺医少药的边远山区，每逢生病，也只能求助于当地的草药先生。有的知青家长因此不时用包裹寄一些药来，我们下山到白沙或曹家沟街上时也常常买些治疗风寒感冒的常用药品。当然外伤用药如消炎粉、油膏、纱布之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劳动中这里划条口子、那里碰破一块皮是很常见的。我的“连二杆”(即小腿前内侧)就因在坡地挖土的时候多次被滚落下来的石块砸伤，而且常常是旧伤口还未愈合又被砸得鲜血直流。

挖天麻

洋芋、包谷、四季豆这些“进口货”种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早已是五月份了。既然是药场，药材是必须要种的。我们一帮重庆知青到达之前，二大队曾派两个人在此栽了两分地的玄参、几十棵大黄、几棵黄柏。除玄参、大黄用分蔸繁殖外，药场又在供销社购回党参、黄连、大力子等种籽，对这些药材进行人工培育。黄连的生长对环境要求十分苛刻：土层深厚、疏松肥沃、半阴半阳的地方才能生长良好，一般要生长五六年才能长成“鸡爪黄连”。我们费了很多心血栽种了一大片地的黄连，指望靠它卖一笔大钱。三年过去，药场始终没有办成。但俗话说，“靠山吃山”，几年间我们不经意地也淘到了一些生存的本事。

挖天麻算是其中之一。大沙坪遍山都有野生的党参、泡参、柴胡、防风以及天麻。当地的农民常常利用工余时间外出采药，晾干后卖给当地的供销社，换一点油盐钱。这些野生药材中，最名贵的可能要算天麻。当地农民说起挖天麻这个行当常常有几分神秘色彩：挖天麻要凭运气，天麻埋在地里自己会跑掉，等等。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这帮小青年心里痒痒的，总想试一试自已的运气。刚好药场附近有一家姓覃的农民，父子几个都是挖天麻的能手，我们决定慕名前往，跟他们学挖天麻的手艺。

一个星期天，我和朱四明、罗润生、邓福彬、马仕渝从药场出来，过一道湾再上一道梁，来到覃家父子的住处。覃老汉老伴已去世，留下三个儿子。大儿子覃兴荣四十多岁，已经结婚，但未分家，一米七八的个子，瘦削的脸上有一块伤疤；二儿子覃兴元结婚后分家在一边居住，房子离覃老汉家不远；三儿子覃兴华尚未成家，与父亲和大哥住在一起。

我们知道覃兴荣挖天麻最有办法，就死搅蛮缠地央求他带我们去挖天麻。他磨不过我们只好答应了，提出条件是要我们帮他割牛草。这还不容易，山上到处都是牛草，我们一口答应。协议既已达成，他拿着一把锄头出了门，我们背上背篼、拿着锄头跟着他朝屋后的山坡走去。走着走着，他随手一指路边说："这里就有天麻！"我们几个连背篼也顾不得放下，急忙开挖。一阵乱刨，挖出一个抢一个。看着每个人不论大小、抢得慢的手里也拿三四个的时候，他笑着说："没有了，没有了，前面还有！"又走了十多米远，他停下来随手挖翻一个树桩，里面又滚出五六个天麻来，我们又一拥而上乱抢起来。他站在旁边扶着锄头大笑说："莫抢了，前面有的是！"于是我们继续簇拥着他往前而去。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几个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后来，通过翻阅资料，我终于弄清楚了天麻的生长习性。原来天麻这种在中医里镇惊息风的药物是一种依靠吸取密环菌作营养而生长的植物，密环菌没有了，天麻个体哪怕还很小也会迅速抽苔开花、结籽，以传播后代；如果密环菌丰富，天麻的个体会长得很大也不会抽苔开花。农民在没有了解天麻的生长习性情况下，挖来野生的天麻种在自留地里，由于没有密环菌不能存活而烂掉了，使得农民误以为它跑了。天麻密集生长的地方，可以闻得到一股马尿味。覃老大之所以达到指哪里哪里就有天麻的水平，说明他对天麻的生长环境了如指掌。真是"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啊！只是可惜在那些年头里，曹家山上再多的天麻也没有改变那里的农民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

炸鱼乐

曹家公社前面流着一条弯弯的小河。小河里的浅滩上经常能看到一群群当地人叫做"洋鱼"的鱼游来游去；而另一种全身带麻点叫做"土鱼"的鱼则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洋鱼是一种高山冷水鱼类，全身密生细小鳞片，鱼肚白色，身躯长圆形，肉质极为鲜嫩，最大

的可达三斤左右，四十来厘米长，喜欢生活在深潭阴河或洞穴中，食物以水草、青苔、水虫为主。

先前，曹家沟会往水里钻的人只有学校里的两三个老师。当农民们晓得知青里有些好水性的人时，就主动找上门来要求跟我们合伙炸鱼。我们没有炸药、雷管，而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就有这些东西，搞点炸药、雷管易如反掌。于是上至钢厂河坝的龙滩子绿阴潭（此潭上部有一个两米多高的瀑布，水流湍急而使洋鱼无法逾越而到此为止），下至手爬岩河坝，到处都留下了我们一群炸鱼人的足迹。

第一次炸鱼点导火绳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手不停地发抖，火柴都划了小半盒也还没点着。躲在大石头后面的知青们几次探出头来问："哪个搞的，得不得行？"我回答道："得行。"又划了几根火柴终于点着了，带着浓烈硝烟味的火苗子"哧"的一声冒了出来，我赶紧把手中的一管炸药扔进水里，后退几步看着那不断咕噜噜冒着硝烟气泡的水面。几秒钟后，只听"轰"的一声，被炸起的水柱冲起四五米高，躲在石头后面的知青们纷纷脱去衣裤，跳到水里抓鱼。

炸鱼的次数多了，经验也丰富了，点燃导火绳只需一根火柴就足够了。又比如我们了解导火绳的长短取决于水的深浅，最好是让炸药在快沉到或刚沉到水底时爆炸；如导火绳过长，鱼闻到硝烟味会逃远就炸不死。到后来，鱼少的地方我们每次能炸到三四斤鱼，多的地方可炸十多斤，无论多少，绝没有空手而归的。

捡鱼的时候，先把浮在水面的鱼捡完。一般情况下，水面上的并不多，因为洋鱼喜欢在深水里活动。鱼鳔里没有多少空气，被炸后就沉下了水底，浮上来的是在浅水活动的鱼，鳔里空气较多。水面的鱼捡完了就钻入深水里去捡。说是绿阴潭，由于水质特别纯净透明度高，没被污染，所以躺在水里三三两两或是一小堆一小堆的鱼看得清清楚楚。有岩石的地方更是容易，站在高处可以借助惯性，猛吸一口气，双手合十，头朝下，一使劲就钻下去了。较浅的地方只需划一两下手，就是八九米深的潭底，也只需划四五下就到了。双手各抓起一条鱼，口一张，把两只鱼头轻轻咬住，两只手再各抓起一条鱼，然后浮出水面，脚不停地踩水，先把手中的鱼扔上岸，再把口里的鱼扔上去。岸上的女知青或水性较差的男知青负责把鱼集中起来。

女知青们有时也参与炸鱼，她们是不下水的，只在岸上观战或协助捡鱼。我们却不愿意她们来，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赤条条的，这样方便、省事，除非在大路边的水潭里抓鱼才穿条短裤。

洋鱼不能长时间存放，上午炸的中午吃，下午炸的晚上吃。由于洋鱼的鳞极细，根本用不着刮鳞。烹饪洋鱼不需多少油，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采用水煮的方法，只是象征性地放点油，再加上葱花，只要有盐就行。其实在那机关单位每月都只供应四两菜油的年代，

我们也不可能有多少油。大盆的水煮鱼依然香气四溢，鲜嫩无比，那鲜味是今天市场上出售的人工饲养鱼所绝对没有的。

下水抓鱼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哪怕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经常梦中钻到水里去抓鱼，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打　猎

木桥洞有个农民叫付经成，他黑脸膛，矮个子，四十七八岁，长得獐头鼠目。他家里喂有一大一小两条狗，尤其擅长打猎撵山。付经成不仅是打猎的好手，而且很看得起我，每当外出撵山时总要喊我同去。

一次，我们正在地里干活，三大队一队一个社员来找付经成，说是他们队的包谷被野兽咬倒了一大片。午饭后，付经成带着两只狗来喊我一同去。在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不背猎枪，他说："这回用不着。"其实他心里已有把握了。他向我介绍了两条狗的特点：大黑狗，粗壮，五短身躯，擅长追撵野兽；小黄狗，身体细长，擅长钻洞。

来到三队的地里，察看了被咬的包谷秆后，付经成肯定地说，这是刺猪咬的。原来，刺猪偷吃包谷有它独特的习性：它先靠近地面将包谷秆咬断，包谷秆如果顺山倒，它就接着去咬第二棵；如果是朝山倒，它就顺着包谷秆找到包谷棒子开吃，并且只啃吃露在地上部分，朝地下一面不吃；然后，再咬第三棵。所以，刺猪的危害特别大，一条刺猪要填饱肚子，至少要咬断一分地面积宽的包谷。包谷灌浆的时候被刺猪糟蹋，无法再食用，只能拿去喂牛，农民因此特别痛恨刺猪。

刺猪的牙齿非常锋利，包谷秆的断口处如刀割一般，付经成从脚印和包谷秆的鲜活程度判断是前天早晨发生的。正说着，大黑狗已闻出刺猪的踪迹，跟了过去，小狗也紧跟着去了。付经成赶紧叫我下到大路上去"望红"，自己也跟着狗去了。所谓"望红"就是观察狗追踪野兽的情况，及时向在后面追赶的人报告方位，因为人是跑不过狗和动物的，加之山梁山湾的阻隔和密密的山林遮挡，远远落在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狗和野兽的情况。

一会儿工夫，狗就发出了急促的叫声，表明狗已接近刺猪，闻到它呼出的热气了。由于密林的遮挡，我只能听到狗的叫声，随着叫声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我也在大道上跑来跑去，不断向付经成报告狗的方位。在一块空地上，我终于看到狗已与奔跑着的刺猪并肩在跑，狗不断地转过头撕咬刺猪的身子，刺猪身上的硬刺由于剧烈的奔跑互相撞击，发出稀哗稀哗的响声。不等付经成赶出密林，狗又追着刺猪钻进林子里了。等刺猪再次跑出林子，速度已经大减，两条狗趁机一拥而上，把刺猪扯翻在地。

黑狗追赶刺猪相当有经验，它赶上刺猪后并不急于下口，而是再紧跑两步与刺猪并肩后，再扭头咬住其腰部的硬刺将其拔掉，那里的刺较短，狗不容易被刺伤。尾部的硬刺

长而粗,足有十五厘米左右。几口之后,刺猪的肠子掉了出来,就再也跑不动了。这条刺猪足有三十来斤重,尖尖的嘴,样子非常难看。

半个月后,付经成又受到邀请,到五大队一队去撵拱猪。

第二天,我们赶到那里,拱猪已没了踪影,于是我们一人带一只狗从半山腰向山顶搜寻。我快要爬上山顶时,发觉跟着我的小狗已经不见了。怎么办?没有狗,我就成了瞎子。于是我又折回去找狗,找了几个湾、几匹梁也没见狗的影子,我只好抄斜路去找付经成。翻过两道山梁远远听见了狗的叫声,我急忙赶过去,付经成正趴在一个岩洞口往下张望。大黑狗在洞口跑来跑去,小狗已经钻进洞去了,洞里发出狗和拱猪的撕咬声。洞的上口是坚硬的岩石,下面是泥土,洞口斜着向下,隐约可以看到狗的尾部。

付经成分析说,肯定是拱猪头朝洞口,屁股坐在洞底,一时把它弄不出来。他叫我从附近农家借来一把锄头,用它挖洞口下部的泥土。坡比较陡,挖出的泥土大多滚到坡下去了。没有多久,洞口就扩大了,付经成费了很大劲才把小狗唤出来。他说只有用一根木棒来先把拱猪捅死,再继续扩大洞口把拱猪拖出来。话才说完,拱猪好像已察觉到我们的意图,"呼"的一声,一团黑影从洞口飞出,很快钻入坡下一个柴堆里面去了。两只狗连跑带滚地追将过去。我和付经成爬到柴堆上,看到两只狗一前一后堵着咬,拱猪咬前面的狗时,后面的狗就咬它的屁股;拱猪转过身子咬后面的狗时,前面的狗又咬到它的身子。我们把木柴掀开一个洞,付经成钻下去用弯刀背打死了拱猪,这才结束了战斗。

这只拱猪有十四五斤重,身上黑白色的杂毛,嘴短,爪子锋利。它的肉经过烹调,细嫩鲜美,肥而不腻,最适合红烧,加燕麦粉清蒸也是很美味可口的山珍。

认"家门"

1968年底,药场树倒猢狲散,我只好插队落户。我插队所在的小坪溪有位与我同姓的妇女,按当地习俗非要认我这个外乡人作"家门"。她有四十来岁,把我喊作"弟娃",我也就入乡随俗,叫她姐。所谓认"家门"就是指那些不在同一地居住,又没有血缘关系的同姓人因偶然的机会聚集在一起时,通过"认家门","通喊叫(认辈分)",互认为同族。这种风俗在川北、陕南、鄂西等地十分流行。

那是个大雪初霁的早晨。吃过早饭,我坐在火坑(即火塘)边烤火,姐推门进来了。"弟娃,起床了没有?"我连忙站起来招呼姐坐下烤火。

"还没吃饭?"姐问道。

"刚吃过。"我回答说。

"这么冷的天,还习惯吧?"

"下乡都三年多了,山区的气候已适应了。"

自从认了家门后，姐对我挺关心的，平时嘘寒问暖，遇有客人到来杀鸡煮肉时，都要请我去陪客坐席，自小失去母爱的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温暖。

"弟娃，这雪天没事干，光是在屋里烤火也没有多大意思，出去走几天要不要得？"

姐的话有道理：大巴山上的农民11月底前就收完地里的庄稼，12月中旬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地坝里已堆放起许多过冬柴火，人们窝在家里烤火、打草鞋、抽叶子烟和闲聊，就是北方农民说的"猫冬"。直至过完大年，土地开冻，山民们又才开始出门干活。

"三九四九，冻死老狗。这么冷的天，到哪里去？"我问道。

"到小中河去，娘家来人接我回去耍几天，我专门来请你一同去。"我听说过小中河，那是流入陕西境内的任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在城口县境内，靠陕西省边界。

"远不远啊，我去怕不合适吧！"

"半天就到了！小中河是我们这个姓的老家，他们都想看看重庆来的知青，欢迎你去。"

在山区，走半天路是很平常的事，我也早听说过城口县比万源县还要偏僻、还要贫穷，想去看个究竟，于是就答应了。

"好久动身？"

"立马就动身！我回去收拾一下就来。"姐说完就起身到她家的院子去了。

十多分钟后，姐一行三人来了，除了她十二岁的儿子外，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这姑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黑里透红的脸庞上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乌黑的头发扎成两根一尺来长的粗辫子，身材匀称、壮实。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色咔叽布里套着棉衣裤，脚上穿的是双"解放鞋"。姐指着女孩介绍说："这是我哥的女儿，叫文秀。"姐刚说完，文秀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大大方方地冲我亲切地叫了一声"叔"！

"我空着双手，什么礼物也没有，多不好意思呀！"说实在的，除了三十华里远的曹家街上有供销社外，附近根本没有任何店铺，拿钱也买不到东西，何况我们要去的地方跟曹家正好方向相反。

"这次是去认路的，以后又去时再带礼物吧。"姐说道。

"叔，你还客气！带礼物去就见外了。再说这么大的雪，带着东西也不好走路。"

"舅，我们快走吧！"姐的儿子巴不得早点到小中河，也来催促。

离开小坪溪不远就开始爬山。我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竹棍，一是可以助力，二来可以探路。

大雪已经把蜿蜒崎岖的山路掩埋掉，许多路段还没有人行走过。文秀自告奋勇，走前头带路。二十多厘米厚的积雪在我们脚下发出唧唧喳喳的响声，稍不留神，就会滑下路边的深雪里。山崖上的瀑布已经冻成一块巨大的冰帘子，崖下的冰块堆砌成奇形怪状

的许多小山峰，如同融化了的水晶浇铸而成，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潜藏在冰帘下的流水仍发出哗哗的声响，宣示自己并没有因严寒而退却。

翻过了两座山就进入了城口县地界。这里人烟稀少，往往走上十里八里看不到一户农家。山势越来越陡峭，一路羊肠小道也越来越险峻，文秀不断提醒我们踩着脚印走，以免滑倒而跌下峡谷。

我们走在一匹山的山路上，对面另一匹山上的农家却清晰可见，站在家门口的人可以大声和我们对话，因为两山之间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百米。但如果要走到这户农家，就得花上一二个小时，因为中间有一条峡谷阻隔，只能通过山腰的小路绕行到两座山的结合处才能过去，这就是山里人说的“望到屋，走得哭！”

虽然朔风扑面，我们并不感到寒冷，反而因赶路发热还解开了外衣的纽扣，深吸气后从嘴里、鼻孔里喷出长长的白色水蒸气。我的胶鞋已经湿透了，鞋带头子因沾裹上冰雪而凝结成枣子般大小的冰坨子，随着脚步的移动而左右乱滚并互相碰撞着，发出叭叭的声响。

又翻过一座山峰，山势稍微平缓了一点。文秀指着山下隐约可见的房舍说，那就是她的家了。沿着之字形的山路，在山梁和沟谷间迂回向下行走，农家也三三两两的出现了。看家狗在汪汪地叫着，告诉主人有客人经过，姐和文秀不时停下来和从屋里钻出来的人们打招呼，时而指点着我悄悄说几句，估计是在向好奇的乡亲介绍我这个来自远方外乡人的情况。

又走了一阵，文秀突然兴奋地扬起手乱舞，向下面小溪边一座茅草房旁站着的几个人大声叫喊：“爸！姆！（当地方言把妈称姆）我们回来了！”

文秀的家人非常客气地把我们迎进屋内的火坑边坐下，姐把我介绍给她的哥哥一家。听说我是重庆来的知青，主人感到十分的惊奇。这也难怪，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穷乡僻壤，交通闭塞，对外界知之甚少，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走出过大山。前几年，城口县城修通了公路，通车典礼那天，许多人半夜打着火把走几十里山路去看热闹。第一次看到汽车这个庞然大物，大人小孩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有的人甚至还问汽车一天要吃多少斤草。司机突然按了一声喇叭，有胆小鬼吓得尿了裤子掉头就跑。

进了家门就得通喊叫，我跟着姐把文秀的父母叫哥嫂了。哥身材魁梧，粗眉大眼，浓密的络腮胡子，说话带着鼻音，艰辛的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条条皱纹，一条半新旧的白布帕缠裹在头上。嫂是一位极普通的山区农妇，脏而乱蓬蓬的头发上星星点点沾着燃烧后的柴火灰，一条破旧的白布帕子缠在头上。在川、陕、鄂边界，缠裹白布头帕的习俗据说起源于三国时期。相传诸葛亮死后，百姓头缠白布吊孝，天长年久成了山民们不可缺少的服饰之一。文秀有个哥哥，已经十八岁，最近就要入伍参军；还有一个小弟，十三岁。因

为我和他们的姑的姐弟关系，他们对我以叔相称。

嫂拿出几双布鞋让我们换上，把湿透的鞋子放在火坑上面竹子编成的“炕笆折”上烘着。我注意到挂在火坑中央的火搭钩是用树枝做成的。山区绝大多数农家都使用铁制火搭钩，这种树枝做的火搭钩容易被烧坏，且不能挂较重的铁罐，这说明他们家境并不宽裕。

小侄子又在烧得很旺的火坑里添了两根木柴，我的半截湿润的裤子在烘烤下冒起阵阵水蒸气。哥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浓茶，用对待尊贵客人的方式，左手端着碗，右手帮扶着碗沿递了过来：“弟娃走累了吧，路可不好走哇！”我无意中注意到他的手：因长年累月的繁重劳动，那双手上的皮肤变得极其粗糙、布满裂痕。

“不累，我也经常走远路，已经习惯了。”

嫂把早已搓好的汤圆煮好了，我刚要起身去端，坐在我旁边的大侄子一把按住我，“叔，你别动，我给你端去！”

“真不好意思，还要你们端到手上来。”

“你是难得来的稀客嘛！”

我刚咬了一口汤圆，哥和嫂连忙解释道：“我们这里没有水田，用豆子在河坝（指沿河岸有稻田的农家）里换了些糯米掺上白包谷做的汤圆面。”这种汤圆外观和纯糯米做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稍硬一点，口感差一些，还带有浓浓的包谷味，里面包着一小块红糖。走了大半天的路，我已经饥肠辘辘，吃得津津有味。不等我吃完碗里的汤圆，嫂又用汤瓢舀了几个加到我碗里，我竟一口气吃了三十二个汤圆！

汤圆下肚后，我的裤子也烤干了。我从火坑边站起来，四下打量。哥嫂的家简陋贫穷，只有几件破旧的家具和必要的生活用具。墙壁用泥土抹平，房屋的进深约有四米，开间却有六七米，房间七八个。因为山地陡峭不能平整出更宽的宅基地，只好沿山修建，一米来宽的阶檐下就是陡坎，小小的地坝紧挨在房屋的山墙下。

走出房门四下一望，附近稀疏的农舍和哥嫂他们的房屋一样，也是用茅草盖顶、片石砌墙（当地盛产一种厚度基本相同的碳酸钙片石，砌成墙后形同火砖一样整齐）。

山上坡陡土少石头多，只有旱地种包谷、洋芋和豆类庄稼，山脚才有零星的小块稻田。猪、牛只能终身圈养，牛的功能退化变成制造肥料的工具。

三天后，我回到了小坪溪。以后，我再也没有去小中河。但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片贫瘠的山坡，那些简陋得近乎破败的农家，以及我那忠厚、质朴的“哥”、“嫂”。

夜宿吴家院子

那年夏天的一个赶场天，我和强子从曹家回生产队途中，天气骤变。太阳迅速消失

在黑云背后，一时天昏地暗。眨眼间，一道道刺眼的闪电把乌黑的天幕撕开一条条口子，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惊雷在头顶上隆隆炸响，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打在地上溅起阵阵尘土。我和强子一阵猛跑越过了土垭子。

“强子，我们到那户人家去躲雨吧！”我指着百多米远的房屋说。

“算了，我们干脆到吴家院子五妹子那里去吧！”强子建议说，“趁这阵雨还不太大。”

有十几户农民居住的吴家院子就在离我们二百来米远的一大片松、杉林边的山坡上。五妹子是单个插队在这院子的女知青，她一米六五的个头，身材匀称，丰满壮实，粗眉大眼，缀有两个小酒窝的圆脸上时常写着浅浅的微笑，平添了几分妩媚，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在屁股后头不停地甩动着。

当我们气喘吁吁来到吴家院子，狂风暴雨接踵而至。刚从地里收工回来的五妹子正在门口用毛巾擦着头上的雨水，看见我和强子突然到来非常惊喜，一脸灿烂的笑容。她一边问我们从哪里来，一边递过毛巾让我们擦水。

我有几个月没有见着五妹子了，她还是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笑嘻嘻地面对生活，少了些娇气，多了些老成。她上身穿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浅绿色的确良短袖衬衣，下穿蓝色斜纹布长裤，脚上是一双沾满泥浆的米黄色塑料凉鞋。

几句话工夫，天几乎完全黑了，大雨倾盆。五妹子把我和强子让进屋内，然后从墙角拿起搪瓷盆和拖鞋到外面洗脚去了。一只脚刚跨出房门，她又扭过头来说火柴和煤油灯就在桌子上。强子点燃了桌上用玻璃药瓶做成的煤油灯。这种极简易的煤油灯在山区农家很普遍，只需用一根装有棉线做芯子的铁管直接插在瓶里就成了。在摇曳着的昏暗灯光下，我打量着五妹子的家。这间约有十平方米的屋子原是生产队存放化肥和种子的仓库，四周是黑糊糊几乎看不出纹路的木板墙壁，三面都被农舍包围，所以没有窗户，只有一扇单开木门进出。门的正对面靠墙横放一张老式的双人旧木床，右边靠墙放着一张二尺来长、一尺多宽的破旧条桌和一根独凳，左边墙下码放着两只存放杂物的纸箱。我坐了凳子，强子只好坐在床沿上。

“你们还没吃饭吧？”五妹子进屋边放盆子边问道。

“我们已经吃过了。”强子和我异口同声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再吃点吧！”

“不用，不用，你自己弄吃的吧！”

“我一个人好办，随便吃点就可以了。”说着，五妹子又出门去了。

我探头看了看门外，天已完全黑了，闪电、雷声没有了，暴雨依旧。“大雨不停怎么办？”我有些担心地向强子说。

“怕啥子！”强子笑嘻嘻地借用一句山歌词：“我是天上麻鹞子，哪里黑了哪里歇。”

知青们相互串门都比较随便，任由主人安排食宿。吃的东西好办，有啥吃啥。睡觉就不大好办了，特别是单个知青住的房子更小，只得借宿在农家。有时不麻烦别人，几个男知青就爬上农家的猪、牛圈，挤在四面通风的干草堆里过夜，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农民们把这叫做“冲壳子”。

五妹子端了一大碗没有一粒米的熟洋芋进来：“那你们就看着我吃了哟！”在山区，人们都是靠天吃饭、吃季节。正值洋芋收获结束，把洋芋当做主粮是很普遍的，只有极少数家境殷实的农家还有少量的稻谷或玉米可以掺和洋芋吃。天天顿顿吃洋芋也腻了，不吃吧又饿肚子，只好变着花样做洋芋餐：切片、煮汤、掺四季豆、囫囵煨烤、捣烂成泥……如此而已。

五妹子没有炊具，更没有火坑，借用隔壁农家的火坑做饭。因为同姓，淳朴憨厚的山民把她当做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经常同桌吃饭，自己动手煮饭的时候不是很多。五妹子就着几块泡咸菜很快吃光了碗里的洋芋，又在门外的水缸里舀了大半碗凉水，一伸脖子咕噜噜地喝了，然后用手抹了抹嘴，算是结束了晚餐。转过头问我们：“只顾自己了，我去烧点开水给你们喝。”

“不要烧水了，刚才我们已经喝过了。”我俩答道。

五妹子也觉得自己过于客套，不觉诙谐地笑了起来：“好吧，我是问客杀鸡哟！”

经过几年的农村生活，知青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无法讲究营养、仅能果腹的粗糙食物和直接饮用生水。烧开水泡茶喝已成了一种奢望，好在大巴山的水是没有被污染的纯净水。

五妹子坐在床沿上和我们谈起了各自在劳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说到高兴处禁不住哈哈大笑，说到艰难困苦时都互相鼓励。我们最关心、谈论最多的是我们知青的前途和命运。当时国家都乱成了一锅粥，区、公社各级机关都瘫痪了，领导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大多数都躲在家里看时局的发展，新成立的革委会则忙于搞派性武斗。混乱时局中，农民们还有自留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们知青孤孤单单在这穷乡僻壤的山里，连一个像样的家也没有，就连起码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任凭青春被毫无价值地消磨掉。不过，尽管前途迷茫，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念：我们绝不可能在大山里待一辈子，走出大山是迟早的事！

不知不觉已到深夜，煤油灯里的油也所剩不多了。我起身拉开门朝外看了看，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雨声虽然小了些，却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我转过身来对强子说：“怎么办？”不等强子回答，五妹子起身出门去了。“下雨天是留客天，老天要留我们，只好在这里住一晚了，”强子笑着，“她可能去安排睡觉的事了。”

不多一会儿五妹子回来了。她一进屋朝我们伸了伸舌头，轻轻地说：“他们都睡了。”

“那怎么办？”我有点着急了。

“我们凑合着挤一晚上吧！”强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无所谓，我早把你们当成是自己的哥哥了。”五妹子认真地说。不等我和强子表态，她已脱掉鞋子爬上床，面朝墙壁、蜷曲着身子和衣躺下了。

五妹子比强子略小点，也满了二十一岁。在我不知所措中，强子也在床的另一头面朝外睡下了，“睡吧！只要行得正坐得端，怕啥子！”强子催促我道。在我二十二岁的生涯中，除了孩提时代躺在母亲身边睡觉，从未有过与异性同床的经历，何况我们现在都正是血气方刚、青春勃发的年龄，即使是亲兄妹也得回避一下吧。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和羞涩。

“你先睡吧，我看一会儿书。”不出两分钟，他们两人都轻声打起呼噜来。我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本《中国青年》杂志，随意地翻了几篇，眼皮沉重得使劲睁也睁不开，太疲倦了。我也不忍心把瓶里少得可怜的那点煤油烧完。武斗期间，日用品很难运进山里来，煤油、食盐、肥皂等都奇缺。雨还在下，又没有做火把的材料，即便有材料也早被雨水湿透了，何况山洪暴发也根本过不了河，这时即便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床上的两人屁股对屁股睡得正酣，留给我的一点地方是五妹子睡的这头。没办法，睡就睡吧！只要心中无邪念一切皆可行，我在心里鼓励自已，顿时觉得坦然多了。我吹灭了灯，紧挨着床沿躺下。由于不通风，煤油燃烧后的烟味弥漫在小屋里，呼吸感到有些急促，过了好一阵才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一下惊醒了。浑身大汗淋漓，燥热难耐。暴雨并没有使屋内的温度降低多少，三尺多宽的床上挤着三个年轻人，不热才怪呢！我再也无法入睡，悄悄地下了床，摸索着拔开了门闩。门还没完全打开，一阵凉风扑了进来，太爽了！正想出门透透风，院子里的狗就向我发出了咆哮声，我连忙紧紧地关上房门。我不想再回到床上去挤，只得趴在桌上睡了。

在雄鸡一遍又一遍的鸣叫中，天终于亮了，一道道光线从木板墙的缝隙挤了进来。我站起来，一边活动麻木的腿脚和僵硬的身子，一边朝床上望去，只见五妹子和强子两人仍然睡得很香。五妹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翻过身子侧躺着，她那发育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胸脯轻轻地靠在仰睡着的强子的小腿上。

我推醒了强子，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嘟哝道：“你起来多久了？”

“刚起来。”我应付道。

“你们不要走，就在这里玩，我还有一块腊肉。”五妹子也醒了，挽留道。

“你都舍不得吃，我们怎么好意思吃，留着吧。”我答道。

“过河注意点！以后常来。”五妹子见我们执意要走就不再挽留，刚坐起来的身子又

躺下了，“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告别了五妹子，在离开吴家院子的时候，有几个起早床的人见我和强子从五妹子房里出来，大惑不解，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盯着我们并互相窃窃私语。我和强子相视一笑，大步向曹家沟走去。

一抹金灿灿的阳光已把山尖染成了金黄色，尽管河谷里还有些昏暗。清新、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崇山峻岭格外苍翠，天是那么格外的蓝。

作者简介

简木全，1946年8月出生于重庆。1964年9月上山下乡到万源县白沙区曹家公社药材场，1972年5月参工在万源县白沙粮站，1999年9月在万源市粮食局退休。1965年加入共青团，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管委会委员、分配员、会计员、粮站站长、副主任等职。

岁月悠悠

陈 述

一

1965年9月中旬，广州天气仍然十分炎热。清晨，太阳从东面楼房之间的狭缝跳出来，给休息了一晚的大城市再次送来逼人的热气。母亲和我很早就起床，我要乘火车离开这个熟悉的城市上山下乡到陌生的花县果肥农场。

母亲一向认为出远门前最好吃一碗米饭，免得中途肚子饿，在她慈祥的目光注视下，我匆匆把一大碗米饭倾入肚内。母亲四十多岁，长有南方妇女常见的瘦削面孔，又粗又黑的头发自然地向后梳，依稀可以见到已掺有几根银灰色的白发。身材不算高大，但腰杆硬朗，一双露着青筋却非常有力的手帮我提着新买的棕红色的牛皮衣箱，我背上包裹棉被的背包，手提水桶杂物跟在她后面离开了家门。

广九火车站红旗飘扬，长嘴的高音喇叭播放着充满时代节拍雄壮豪迈的歌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狮子锣鼓也被搬来为我们壮行。一时间，车站内人声歌声锣鼓声汽笛声混为一团，给这个残旧的中国南方最繁忙的火车站增添了一丝生气。

来自广州四十多所中学千多名上山下乡同学（在农场，场友之间仍以同学相称），还有前来送行的老师同学家长亲友把长长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披着红花彩带的专列喘着气俯卧在乌黑发亮的轨道上。母亲和我好不容易才挤到列车门前，她拉着我的双手，看得出她还有很多话想对我说，认字不多的母亲沉默了一会后只对我说了一句话：“进去吧，多写信回家。”

火车上每个向着站台面积不大的玻璃窗都挤着十几个幼稚的面孔,他们感到兴奋,因为即将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战天斗地;他们也感到难受,因为今日与老师亲友相别,不知何日才能再相见。

"呜……"火车的汽笛长长叹息一声,然后狠狠抖动了几下,慢慢地开始向前爬动了。我透过车窗看见身穿普蓝色大襟衫、黑色宽腿长裤的母亲强忍着泪水,踮起双脚挺高身体向我挥手。

车厢在一阵狂热的"再见"、"保重"的呼喊后,回到了死一般的寂静。我默默地坐在座位上,呆滞的双眼盯着我那牛皮衣箱,思绪又回到三个月前。

二

我就读在一座在城东的寄宿中学,校园十分简朴,二层高的教学楼掩映在墨绿色的丝栗树丛中,石灰外墙斑驳剥落,水泥地板满布裂痕,门窗透冷风不透光,课室内摆满的是没有油漆的简陋桌椅。全班同学在"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宣传教育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这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的一次高考。"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就是要求每个毕业生怀着一颗对领袖和党的红心,能考上大学就去读大学,考不上就准备好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填报高校时,我还斗胆报了北京的名校。在两种准备中,我似乎对读大学的准备多一些。

学校的课室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灯火通明,三排横吊着的日光灯管发出惨淡的灯光,四把老式吊扇有气无力地在天花板上摇着头。一个闷热的晚上,我与全班同学正在用功复习,突然班长匆匆走来通知我:"校长要找你去谈谈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暂停自修往校长室走去。

校长办公桌上堆满了一叠叠厚厚的学生档案,校长约五十出头,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紧扣着衣服上每一个扣子,干枯的头发下一双疲倦的眼睛用力打量我一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的家出身不好,按照政策没有机会上大学了,你要作好上山下乡的准备,到祖国需要的地方锻炼和改造自己,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我父亲解放前经营一家杂货店,勉强供养一家人,过着并不宽裕的日子。我却因此被打入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行列中。

我呆呆地站在严肃的校长面前,眼前是一片空白。室内一片沉静,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扑扑跳动的声音。我不知该如何去回答校长,无奈之中仅从嘴里面挤出一句话来:"服从学校分配。"

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我把校长的话语告诉了母亲。平时喜欢唠叨的母亲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用她长满了茧的手轻轻地拍了我几下。这几下是对我的理

解，是对事情的无奈，还是从我的遭遇感受到痛苦？

父亲在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因疾病离开我们。母亲艰难地用双手撑着这个家。她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将来有美好的前途。但善良的母亲这个不太大的愿望在当年却无法实现。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紧张地为我的远行作准备工作，补改衣服，洗缝棉被。在寄宿学校读书三年，母亲亲手缝制的灰布袋就是我的衣箱。上山下乡远离家庭需要带的衣服杂物增加不少，总不能还沿用那个灰布袋，母亲思前想后，决定买一个像样的衣箱给我。我们到过不少百货商店，帆布衣箱便宜但不耐用，牛皮衣箱耐用却价钱贵。母亲咬咬牙，拿出近半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棕红色的牛皮衣箱给我。

新街火车站只有一个简陋的无顶棚的站台，狭小而陈旧，与花县的美名相去甚远。十几台军用卡车把我们这批年轻人浩浩荡荡地从车站运到部队腾出来的营房和营地建成的农场，团营连长都是现役军人，我们按连排班的形式分配组织起来，因为我是高中毕业，而且高大肯干，就戴上了班长的小帽子。

三

农场坐落在苍翠的雅髻山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流沙河蜿蜒地穿过农场流向远方，黄色细沙铺满了河滩，河水清澈又冰凉。在一片片高大的桉树林旁，盖着一排排低矮的俄罗斯式军营，厚实的砖墙，苏式挂瓦，板条天花与粗糙水泥地板，空荡荡的房间内只有一排铺在地上的木板，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的家具，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小河对岸是一个破落的小村庄，疏疏落落散布着十几间用土坯泥砖盖的旧房子。一间稍微像样的房屋大门旁边挂着一块硬木板，上面书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洪秀全故居”，是著名学者郭沫若的行书，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出生和成长在这里，百多年过去，这一带的村庄与老百姓经历帝王、民国、共和国的不同年代，岁月的痕迹依旧是如此平凡和寒伧。

刚到达的第一个月，安排我们军训和学习。清晨，嘹亮的军号准时吹响，每个人揉揉蒙眬的双眼马上就跳起来，把各自不同颜色的棉被叠成豆腐方块，棱对棱，角对角，款式杂乱却排列整整齐齐。简单洗漱之后就去出操，正步走，齐步走，跑步，把一群乌合之众操练成一支不穿军服的军队。没有步枪和刺刀，人手一根木棍；没有草绿色的军装，穿着一片灰蓝的“时装”。白净文静的学生哥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柔弱的握笔纤手因操持木棍而长满厚茧。

一个月后，我们连队被派往县城修建一座大桥，这是通往广州市的主干道，原来的木桥已不敷应用，秋冬时分，江水不深，正是修桥良机。我们这批便宜的劳动力有旺盛的干

劲，负责挖土、运土和打夯等最繁重的工作。挖桥墩基础却没有任何机械，我们用铁锹和双手把土方搬到岸上，百多斤重的土石块被我们用肩膀摇摇晃晃抬到基坑旁边，几十米长的粗钢筋由人龙歪歪扭扭运送到模板上。

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天寒地冻，我们早早就钻进了被窝这唯一能御寒的地方。突然一阵急促的集合哨声响起，连长紧急宣布："为了确保基础的质量，马上要浇注混凝土的桥墩基础要加深，必须马上出发施工。"外边北风凛冽刺骨，阵阵微雨纷纷飘下，南方冬天特有的湿冷寒气渗入人的骨头。军令如山，几十名男知青立即披挂上阵，穿上雨衣拿起铁锹就跑向工地。被连长宣布"赦免"的女知青也不甘人后，坚持随我们一起前往工地施工。

桥墩基坑外江水奔流，基坑内灯火通明，坑底的积水上浮着冰屑，黏土也冻成了硬块。整个晚上毛毛雨下个不断，汗水与雨水交织在一起，每个人头发湿透了，衣服也湿透了，连续施工到天亮，任务才终于完成。每人喝两碗红糖姜汤，啃几个干硬的馒头就一头钻进了被窝蒙头大睡。第二天，很多身体瘦弱的知青就患上严重的感冒。

在那样的岁月中，我们被人改造，我们也在改造世界。经过近一年辛勤工作，大桥终于建成通车，我们连队又被派往其他工地。

四

有一年夏天，连队被派往巴江沿岸围垦，支援收割水稻。连队的临时宿舍设在一个建于小土丘上的荒废很久的残破寺庙，寺庙的墙壁灰土斑驳剥落，被香火熏黑的屋顶挂满了蜘蛛网，神灵们久未品尝人间供奉的新鲜香火，不但灰头土脸，而且手折脚断。我们就在神灵面前安顿下来，因地方太小，伙房只好安设在远离寺庙的小村中。

一连十多天阳光灿烂，水稻差不多收割完毕，晒谷场上堆起了一堆堆黄灿灿的新鲜稻谷。

在广东，连续日晒高温之后，台风或雷暴就会降临。果然，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小休，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伴着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大地与天空被白茫茫的雨幕连接起来，稍远一些的树林竹丛都被雨帘所遮盖，几小时内雨势一直没有减弱。寺庙内"雨脚如麻未断绝"，所有能盛水的器具如水桶、面盆，甚至漱口盅都派上用场。庙外轰隆隆的雷声哗哗水声令人震撼，庙内滴滴答答的滴水声使人寒心。暴风雨令供电也中断了，庙内那几盏像油灯般昏暗的小电灯投入了罢工行列，堤内几台大型的抽水机无电抽水，洪涝水不断上涨。"屋漏偏逢连夜雨"，送饭来寺庙的小路也被淹没，炊事班无法把饭菜送到寺庙，大家只好挨饿。晚上大家又饥又渴，只好肩靠肩，背对背整晚挤坐在没有滴水的一小块一小块地板上。

残破的窗户终于透进黎明的鱼肚白光，雨停了，当我们走出庙外正要欢庆的时候，却发现寺庙已被滔滔洪水包围，小土丘成了灰黄混浊江水中一座小岛。大家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假如洪水继续上涨，庙内的泥菩萨就要和我们一起“过江”了。

大城市来的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洪涝自然灾害，已经饿了一天，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男知青急得团团转，女知青拥在一起流泪。总不能坐以待毙呀，连长综合了大伙七嘴八舌提出的各项合理化建议，决定把几扇门板扎扎实实地绑起来，从大批自告奋勇的勇士中选出四名游泳高手强渡“大渡河”。四壮士带着全体饥寒交迫人士的期望穿上球裤，用手浇洒江水拍拍胸口把舢板推入水中。“风萧萧兮‘巴’水寒，壮士一去兮请速回”呀！看着这艘插着红布条的舢板越飘越远，大家的心也绷得越来越紧。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勇士们终于登上了彼岸，把我们被洪水围困的消息通知上级，接着再用这舢板运回饭菜解救我们这批灾民。

几天之后，混浊的江水慢慢退去，到处一片荒凉，树梢挂满了河草杂物，大地铺上厚厚的淤泥。我们想改造自然，自然却狠狠地教训了我们。当地农民说，洪水留下的淤泥会成为下一造农作物丰富的养料。我们连队知青踏着泥泞的小路，从“小岛”撤回“大陆”。洪水曾经淹盖了大地，但泥泞的大地毕竟还是留下了我们岁月的足迹。

五

在农场生活的艰苦岁月里，每个人只配有一张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我的牛皮衣箱忠实地陪伴我。每个驻地都是非常潮湿，牛皮衣箱小五金零件锈迹斑斑，皮面不是发涨就是开裂。白天它为我守护缝满补丁的衣服与书本杂物，晚上它又成为我的书桌。伏在衣箱上我写了不少给母亲朋友同学的信函，阅读了一批很不容易才找到的书籍。生活的磨难铸造了个人性格的坚强，困境中的学习使人的思考更加理性。

我是上帝与孔子合资公司的烤炉里烤出的不焦不生的泥坯人，多少具有中庸的品格。家父在我年幼时就要我背诵《三字经》、《论语》等读本，他把我送到私塾读了一年，可能在我的同辈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曾经进入私塾读过书。父亲希望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熏陶下一代，严父的教育使我偏好中庸，讲求与天和，与人和，与己和，内外不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农场无可避免也卷入了两派斗争的旋涡中，我加入了一个中性的小组织，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场内两派知青串联游行批判武斗，直至最后又相互消磨平衡相互结合，结果是两败俱伤。

内耗消耗尽农场仅有的一点资源，知青群体团结奋然向上的精神已被闲散消沉所代替，许多知青从闲散走向疲惫、懒惰和木然，偷渡港澳形成一股风潮，农场开始逐步走向末路。

六

终于接到招工回城的通知，我携着那个已经破损的衣箱，没有欢送也不需要欢送，回到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喧闹的大城市。

“文革”后，我有机会重新实现当年的梦想，考入了大学并在大学工作。

改革之风吹向神州，大地开始复苏。劳碌了半辈子，母亲退休了。她被批准移民美国。没有中美之间直航的飞机，需要由香港转飞美国，太太、女儿和我把母亲送到新建的广州火车站。60岁的母亲一头刚整理过的卷发，黑发白发参半，带花的衬衫配上灰黑色的长裤使她显得端庄而略带严肃，金色的老花眼镜无法掩盖眼角深深的鱼尾纹。我提着刚买的红黑相间的衣箱跟在母亲后面穿过人丛进入车站，新车站宽敞明亮，铝合金窗透入令人舒畅的自然光，黑色的花岗岩地板光洁照人，月台上一排排的顶篷还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漆香味。不善言辞的母亲啰啰唆唆地叮嘱一回才登上南行的列车，女儿、太太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向她挥手道别，远去的列车再次拉开了我与母亲的距离。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中美之间的直航飞机把我们一家三口送到了洛杉矶。早春二月，广州仍略带寒意，洛杉矶已是春意融融。汽车驶至家门，母亲早已守候在门前，她灰白的头发带有光泽，略胖的脸庞挂着笑容，一件织花的薄毛外套显得非常合身，人看上去矮小了，但仍十分精神。她想帮助我一起移动那蓝色的大旅行衣箱，它太沉重了，母亲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年度的报税表格填报了几份，我们夫妇俩辛勤劳碌聚积了买房首期费用，终于如愿在美国新大陆供下属于自己的房屋。母亲习惯与我妹妹同住，不愿意随我迁走。搬家当天，我忙着把衣服塞进大衣箱，母亲默默站在一旁，背有些驼了，两腿微微向外弯曲，双手不停颤动，看着我们把皮箱杂物搬上汽车。她帮不上什么忙，但我看到她那刻满岁月年轮的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

岁月流逝，月圆月缺，滩平水浅，风凛林空。没有经历过动荡年代的人是幸运的，但他的生活可能会是乏味的；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是不幸的，但生活确实又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无法把过去的一切从记忆中忘去，但不能总是回头感叹。从前有“目的地”，走来走去总走不到；现在不知“目的地”在哪里，只好抬起头继续走，前面的路并不平坦。

作者简介

陈述，广州市人。1965年9月高中毕业后到广东花县果肥场务农，1975年回城，先后当过工人、学生、工程师、大学教师等。1998年移民美国洛杉矶，现任洛杉矶1430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生日忆

张诗亚

2007年10月5日，我的学生在嘉陵江江舟水上餐厅为我举办了60岁生日庆典。按"男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把虚岁60当实岁60搞了一次庆典。来的学生主要是博士生，也有几位博士后和硕士生。很多博士已毕业多年，专程从广西南宁、桂林及成都等地赶来，他们的一片诚心化为盛情，着实让人感慨。老朋友李力以及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夏天恩先生携夫人陈美玲也为此专程赶来。

学生们为这次生日庆典筹备了很久，具体情形及庆典内容事前我大半不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孙杰远还特意将我的诗集整理赶印出来作为生日礼物，也好就便送给前来参加庆典的学生。此前，孟小军、陶红等同学还请秦效侃老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先生的对联是：福慧因缘八极觥筹尊智者，文章道德一门桃李拜先生。先生的对联文好、字好，且师母还专门为此联裁纸、粘裱，所有这一切着实令人感动。

庆典中，学生的举动有不少让我吃惊之处。除献茶、发言外，难得的是同学们还即兴将我的一些诗词串起来朗诵，并谱曲合唱。

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喝酒，少不了热闹。事后平静下来，心中却久久不能释怀。尤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诗集中收录的为纪念1965年10月5日17岁生日所写的《虞美人》：

通川桥跨山门叩，
父老抛身后。
解家梁上映山红，
遇险山洪生死几乎同。

一攀高鼻云中寨，
脚下群峰矮。
巴山打杵撑天宽，
山路走来心路更无前。
（《无名堂吟稿》2007）

其中“遇险山洪生死几乎同”记的是我1965年生日遇险之事，诗仅有一句，但此事并不是这一句诗可以了结的。

1965年5月20日我同胡慧笙、蒋昌焕、徐有成、王建国等一批朋友离开重庆，过石门前往达县，继而到万源大巴山。一帮知青伙伴有的比我大一岁或半岁，有的比我小一岁或半岁，大多不省事，故而谁也记不住谁的生日，往往事后才惊呼某年某月某日是某某的生日。

但这样的遗忘不属于母亲，母亲总记得我的生日。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此千里之行是到的高寒山区。那是我到大巴山的第一个生日，母亲早早就为我准备好包裹。我估摸她大抵认真计算了时日，包裹单送到公社，继而到社办场里是十月三日。拿到包裹单，心里很是高兴。一帮伙伴看见包裹单也都惊呼：有香肠吃了！因母亲的包裹单上明明白白写着糖果、香肠、腊肉，足足有两公斤。我们下乡尽管不到半年，但吃萝卜缨子、米汤、包谷米掺饭、洋芋饭等几无一星半点油水的日子足有两月。看到如此“盛宴”，能不欢呼雀跃？一帮伙伴都嚷着“围山打猎，见者有份”，大家要共同享用。这自然是我们那个年龄、那种知青交情应有之意。但要把包裹取回来却是个难题，因只能到草坝区的一个小邮所去取包裹，而从我所在的解家梁到小邮所足有四十多里地，来回近九十里地，取包裹就得花一天时间，更糟糕的是那时号召为革命献身，为革命吃苦，开发山区，建设山区，全无节假日，而且农场全无八小时以及星期天等概念。记得草坝星火场的知青，在1966年初因提出“八小时工作制”与“每周休息星期天”，竟被批判为“反革命口号”，我能为取生日礼物而耽误场里出工、干革命么？所以，请假的事是断不能提，甚至也不能想的。

偏天助我，10月5日晨六时许大雨瓢泼。那雨一下，我们挤在小小板楼上的四十几名知青全都狂呼起来。平时正是准备出早工之际，早工是天亮到早饭前那近两小时的活路。早工或砍柴，或薅草，或挖地，均视季节、农事而定，但均在野外，故而一下雨就不出工，便有一整天的清闲时间。大家自然高兴，而我更是高兴，因下雨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去草坝取包裹，于是匆匆吃了几个洋芋，便把绰号王保长的王建国叫上一起下山。他自然非常高兴，久在场里不下山，日子很是憋屈。城里的娃天生爱上街，尽管草坝的街从头走

到尾不过几分钟，但毕竟是赶场。

我们穿着麻布里子、蓝布面子的“劳改棉袄”（知青语），踏着没踝的水，走过石板路，穿进密林，径直往山下走。雨势并不大，每人戴了个斗笠，披了张破烂的塑料布，衣服大半已湿。大巴山的秋雨天温度大概在五六度，尽管年轻，时间长了仍感觉冷。

踏着水中的松针路一路下山足足走了15里，我才开始意识到这场雨未必是好事。解家梁这15里山路的沟底便要过两条沟，平时的小溪沟仅有几块石头，浅浅的、只能没过脚背的水清流而下，小山涧罢了，而此时小山涧两岸的麻柳、松树、野藤、竹子等全都被洪水冲得歪歪倒倒，奔涌咆哮的洪水从山上泄下，一山的雨水全都汇聚到了这条沟里。下游过不了，我们就往上游走。我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生性不怕水，自命这条小溪沟就能挡住我么？左蹦右跳，从这个石头到那个石头，和王保长二人还算过了河。但过了支流后，到草坝还须经过一个三条溪沟相交的三叉河口，当地人称礅子河，河中每个石礅都是一丈二以上的巨大青石，礅子之间的距离大概一尺五。5月24日从草坝到解家梁经过此地时正是春夏之交，四周山花烂漫，礅子河中清溪潺潺，两岸不知名的鸟叫与垂到溪水上各色带刺的小花相映成趣。当时的印象极好，跨过礅子，觉得分外轻盈。几个伙伴还在议论，这样的小河沟哪用得着那么高的礅子？山里人真是干劲大，要把如此大的石头搬来竖在河中，不知有多费劲。有同学还一本正经去打量这些石头，估计每个石头都有三四千斤重，以至生出了这些石头是怎样竖到河中的疑问。

此时站在岸边，看着汹涌澎湃翻滚着泥沙的洪水从上往下倾泻到礅子河中，号称“不怕事的王保长”和我都傻了眼。河中每个礅子上都是一道水柱，靠着岸边的浅一点，水漫过礅子一米多高；在河中央的就更高了，且明显能看到一道道高两米左右的拱形水柱，整个情形就像大坝泄洪。傻了眼的我们看了半天，无计可施。终于还是王保长先开口说，这河我们过不去，弄不好是要死人的，回去吧。他刚把话说完，我就劈头盖脑给他一顿臭骂，心里想着好不容易走了这几十里山路，却因一条小河沟过不去而使牙祭泡汤么？当时那种沮丧心情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因除了口头上讲的想吃腊肉、香肠、糖果外，内心深处还念叨着那可是母亲费心准备的生日礼物。那时候像我这样所谓的男子汉是不屑于流露感情的，尤其是在王保长面前，我丝毫没提对母亲的一片感念之心，只说大伙儿都在等我们拿礼物回去，况且，我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自己都记不清游过多少次嘉陵江、长江，旋涡、鼓澎等各种怪水都是我嬉戏的对象，根本没把这条小河沟放在眼里。为了给王保长壮胆，也是给自己壮胆，我提了口气，把裤腿挽到腿根处，拿着随身携带的竹棍去试探水深。水柱似乎还淹不到身上，礅子也很结实，于是我从岸上稳稳地跨到了第一个礅子上。或许是因为顺利地过了第一个礅子，心中有些得意，也有些轻敌，左腿站在第一个礅子上，右腿就往第二个礅子跨去，还未及收腿，我甚至还未及意识，整个人已被汹涌

澎湃的洪水冲倒。亏得忙乱中我反应快，一跌入水中就伸手一抓，也是命不该绝，居然抓住了岸边的一根麻柳枝。麻柳枝韧性真好，竟把我从如万马奔腾之势的野水中拽到了浅水间。脚下一踏实，我就纵身跃上了岸。上岸后，浑身湿透则罢，从灌木丛中钻出来回头一看，这时才真正感到害怕：

我水性虽好，甚至还救过不少人，但这种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江河水开阔，但其凶险程度远不如山洪，因小河沟河道窄、落差大，水势奔涌而下，瞬间暴发的力量极强。更为可怕的是，河水翻涌中有各种各样的怪石，大小参差，错落杂乱，绝对无法预测防范。人被汹涌的浊浪裹卷着，是完全不能自已的。被乱水一打，撞到石头上，是绝难避免的。撞晕了被淹死，或一下被撞死，总之一个死字了得。

落汤鸡似的我，呆呆地站在河岸上，发愣地看着那奔腾咆哮、满河乱石的山洪溪沟，脑袋里几乎空白了。嘴里喃喃地直说："老子命大、命大"。

当王保长跑来，问我伤否，并事后高明地说，他说过不去，我不信，险些丢了小命之类时，我才缓过气来，仿佛说了些"老子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易涨易落山溪水"，"什么叫山洪暴发的可怕，我总算认识了它的本质"之类提劲话。而我二人说得最多的，也是最由衷的话便是"知青命大"。

这一劫我算是躲过了。而"知青命大"则是那个岁月的我们，明明"命苦"的知青们说得最多的话。记得一次翻车，惊魂甫定的胡慧笙和饶传辉，从翻倒的车厢中爬出，面面相觑说的也是这句"知青命大"。那年头，不说这话，还能干啥呢？

惊魂初定，我俩赶忙往回走，再也不敢提到草坝取包裹的事了。此时只听得对面山上有人喊我们。但因山洪水太大，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只看见一个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拄着竹棍的中年男子向我们挥手，大声喊叫。待他走到跟前，只见他脸青面黑，冲着我们便破口大骂："你这两个娃子不要命啦？这是啥子水啊，你们晓不晓得？这是强盗水（因山洪突然暴发像强盗似的突如其来，防不胜防，故而称强盗水）！哪个鸡娃子日的活得不耐烦了，敢过去，你们真日了天，胆子大，不要命！"我俩被他一通骂后，面面相觑，不敢答声，只觉骂得很舒服。原来，这位中年人是隔壁魏家公社姓王的书记。他路过此地远远地看着我俩打算过河，大声呼喊试图阻止，没想到我们站在河边，根本听不到任何喊叫声。王保长站在岸边，看不到全景，而这位书记站在高处，把我们莽撞、胆大、草率的举动都尽收眼底，却只能干着急。等他讲完这种种险境，我俩更是后怕。

我和王保长乖乖地跟着书记到了对面半山腰上一户农民家里，换上了农民的干衣服。当时农民的衣服是那种很乡土的式样，我第一次穿在身上，觉得有点滑稽，自己想嘲笑自己，可是看着书记铁青的脸，不敢造次，只好坐在火边烤火。不一会儿，主人家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顿美餐。那一餐吃得很愉快，洋芋饭、腊肉，还有几个菜。真没想到我们

在那里还吃了一顿真正的饱饭，打了回牙祭，而我也算过了17岁的生日。至今我还记得那位姓王的书记和不知姓名的农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念，倒不光是因为让我们吃了顿饱饭，而是真正感觉到了火的温暖和人心的温暖，当然那洋芋饭、老腊肉也是特别香的。由于山洪，三天内谁都别想过河。吃过饭后，直到衣服全部烤干，我俩只得悄悄地回到场里，对此事也只字不提，一是怕伙伴们嘲笑，二是担心场里领导收拾。

此事已经过了42年，至今却记忆犹新，生日几乎成了祭日。如果在17岁的生日就被淹死，今天哪能看到这么多同学来为我贺寿，哪有这样的福相、这样的盛况？我也更不会成为大学生、教授、博士生导师，所有这一切自然也都没有了。我倒是幸运地躲过了那一劫，但那个年代的许多知青并没有躲掉厄运，倒不一定是山洪，也可能是火灾、塌方、生病以及其他的一些灾害。这样的年龄本该在学校读书，却离家到大巴山，他们的光阴和青春，是被山洪淹了，还是被其他什么淹没了呢？"知青命大"的话也不能都保住他们的命。

我由60岁生日想到了在大巴山的生日，写下这点感受聊以记之。一是为纪念自己及同时代有着同样经历的一代人所走过的风雨岁月；同时，也是写给后代、写给我的学生们看看，让他们知道这些往事。

作者简介

张诗亚，重庆人。1965年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草坝区赶场公社八一茶场务农。1969年到四川荣昌县吴家区梁坪公社插队落户。现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研究所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

岁月虽然带走了几多轰轰烈烈的场面，却也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卷六 铭心往事

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

李忠公

“户口兵”这称号是有特定含义的。那是1967年初，我们老知青造反派中部分敢作敢为者，组织起来闹回城。这勇敢率真的行动，这合理合法的要求，革命的红卫兵们不但不理解，反而轻蔑地给老知青扣了一顶“户口兵”的黄帽儿。

37年过去，岁月如烟，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如今再来细看那“黄帽儿”，再来细品个中滋味，苦涩涩酸叽叽直教人难咽难纳又难受。

从户口簿在家中如贵重物品被锁在了柜子的抽屉时起，上面所登记了姓名的人，也犹如那不起眼的本本一样，被锁在了它规定的空间里，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从懂事时我就知道了它的珍贵、它的分量。记得小时父亲说过：“哪朝哪代不是这样，官得管民嘛！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也有保甲制吗？”特别是它上面登记的家庭成分一栏，更是重要，大意不得，乱写不得，因为从读小学开始，只要填报什么表之类的东西，就得照着它来。



前排中者为本文作者

下乡上山的老知青中，有豪情满怀的，有天真幻想的，有踌躇满志的，也有无可奈何的、逃避现实的、赌气的……不管什么类型的，都明明白白地或糊里糊涂地上了山下了乡。殊不知，那些只有十五六岁，甚至更小的知妹知弟们，相信了别人的鼓动，真心诚意从父母锁着的箱箱柜柜里千方百计偷出户口来，让别人从上面抹

掉了自己的名字。

经过三两年荒山野岭的搓磨，在风里雨里泥里摸爬滚打，尝到了世态炎凉悲哀人生的苦楚，才翻然醒悟，才意识到那小本本对自己人生的重要。又适逢那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汹涌澎湃的浪潮，于是乎便有了走回头路的人，便有了“户口兵”之说。

我算不了先知先觉那一类，只属于明明白白之列。高考前，在南岸区粮食公司守大门的父亲对我说：“老八，今年你考上了大学算你运气好，考不上是符合规律的！”1962年考入四川大学的七哥说：“我们那年是看在自己成绩好、表现好的分上才被录取的，虽然你条件比我还好，但今年有点悬！”父亲掐指都能算出我的命运，自己又何尝没有预感呢！

1964年高中毕业教育时，同学们热烈讨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为论题“工人农民与工程师教授对国家谁的贡献大”争论得面红耳赤。身为班长、学生会学习部长的我，毫不含糊地支持“工程师”论，没想到在校毕业生大会上学校教导主任黄大永居然说此论是鼓吹“白专”，不点名地批评我。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高考前竟失眠而服安眠药。填报志愿时专选最差的大学和冷门专业，连“西南民族学院汉语言专业”也囊括在内，即使明白毕业后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当个语文老师也在所不辞。符合规律地，我落榜了，而班上“不一定论”的领头陈玉华同学，虽然成绩差，却留校当了专职团总支书记。

在家如坐针毡，苦熬时日。经过百日炼狱，怀着视死如归的气概向父亲要来户口簿，决定到农村去找出路。父亲长吁短叹道：“其他弟兄读不成书我不心痛，唯你读不到书我真心痛！”无奈之下父亲让我把自己的名字从户口簿上抹掉了。

1967年初，知青们的造反毫无结果，识时务者都各自散去，各找自个儿的出路去了。不少老知青加入到了“户口兵”的行列中，以各种形式欲索回那本该属于自己的、宪法赋予公民人身基本权利的象征——户口。

1968年8月，重庆造反派武斗升级，著名的“八·八海战”过后，很多重庆人躲避武斗去了成都。由于林场已被砸烂，好多知青都回到了家中。邻水县风垭林场老知青余立和我，还有华蓥林场的蒋光曦、古路林场的张益庭、柑子林场的曾敬文等不约而同地到省城成都上访，大家是住在“省革筹”接待站时相遇的，我和余立根本不知道他们心怀鬼胎，蒋光曦算是先知先觉者类，他给我俩透露了天机。

“好多人都在办户口，你们还不晓得嗦！”他笑道，“在知青中这是公开的秘密了。”

“办户口？哪个办？”

“你们到成都来不办户口又干啥子？”

“看看形势嘛，反正吃饭又不要钱噻！”我们真是没那打算，只是巧遇了。

在我看来，那户口哪是恁好办的。“你恁个不开窍，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大道不行有小道，正门不行还有歪门嘛！”于是乎他如此这般戳破了那层纸，道出了不晓得是哪位聪明人被逼而出的歪点子来。

“那都得行吗？”

“当然得行啦，前面有人办都办回去了，你还不信嗦！”

户口簿上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对我们来说，拿出去容易，拿回来难矣！摸到良心说，哪个老知青不想把户口弄回城去？上学也好，工作也罢。该立于世立于业立于家时还糊不了口，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还能言其他。说齐天杵齐地，那个东西栽在了农村，这辈子随便啷个整，都有点恼火了。

要归功于那“十年浩劫”，对我来说那是一次思想解放。我不再听信空洞的说教，开始怀疑那“脱胎换骨”之说，动摇了过去的清教徒式的虔诚。虽然从造反那天起，便背叛了先前的“背叛”，但真要让自己置身于真枪实干的“户口兵”之列，真的要点勇气，还得三思而后行。

其时，心里非常矛盾。顾虑有三：一则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户口没办到，真给戴上了“黄帽儿”，以后有机会安排工作恐怕也给搅黄了；二则怕办到了拿回去上不起，哪来口粮吃；三则怕退回去挨整日子更难过。但那天边升起的希望之星，真的好诱人，真的好迷人。能回城，能回家，就是扫厕所都愿意！余立对我说：“那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办得成还有一线生机，办不成充其量也是当农民而已！”

“宪法不是赋予我们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么？即使办不到也犯不了好大一个法！”蒋光曦说，“现在都横扫了一切，打倒了一切，当官的都自身难保，哪个还来管你办不办户口！”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渴求，都有一种奢望，一个明明白白的目标，但必须通过反叛，通过斗争，甚至要牺牲明天才能得到，这真是用青春去赌明天。

思想虽然通了，我仍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一种负罪感，成了真正的“户口兵”。

在去上访接待站之前，我们几个老知青聚在一起商量策略。曾敬文首先告诫大家：“呃，我说，就是我们几个晓得这事，就莫要再给其他人说了，要得再好也莫说，晓得的人多了都去办，我看都会搞不成。”蒋光曦考虑得更细致，他说：“这几天，我们不要一同去，各去各的最好，免得让上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怀疑。”他接着说：“理由也不能写成一样，编也要编得像点才行，不然别人一看，这两天啷个邻水恁多知青来开证明？一个电话打下去，煮熟的鸭子也飞了。”

翌日上午，余立先去四川“省革筹”上访接待站，没多久他便得胜而归。他详细地把整个过程讲给我听，“省革筹”接待站的同志很同情知青，要返回当地要求开证明的有求

必应。下午，我独自一人去了上访接待站，上访的知青不多，在我前面的只有两三个。我坐在长条椅上细心地听前面的人讲话，接待的工作同志边听边作记录。当轮到我时，先申报家门，接着便讲了些社办场的问题和知青的艰难处境，言词恳切。最后，以上访耽误了“抓革命、促生产”回去怕遭打击迫害为由，要求接待站开证明，说明情况，特别写明不能歧视、迫害等条款。工作同志听我反映的问题实际且具体，和颜悦色地又开导又安慰，表示一定把问题反映上去，要求我们回当地“抓革命、促生产”。

看到他把证明写好递给我时，悬在嗓子眼里的心才落了下去。其实写什么一点不重要，要的是那个省上访接待站鲜红的大印。当我们每人怀揣一张命运的路条马不停蹄地往回赶时，为希望即将变为现实而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但冷静下来后，心中又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与忧思，瞻念前程，无尽的渺茫。

第一仗顺利地取得了胜利，莫高兴得太早，以后的路是坦途？是小道？还是万丈悬崖？谁也说不清！

1968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回到邻水，县政府早已被打翻在地，取而代之的是“县革筹”。革命派斗斗停停、合合分分，为瓜分政权闹得不可开交。“县革筹”是由各派力量凑拢来的，成立的生产指挥部等组织，主事者都来自县武装部，对很多政事他们并不熟悉。

张益庭在知青朋友陪同下，来到县生产指挥部，找到管户口方面的同志，要求开具证明到公社下户口回城。开始他们总是推诿、搪塞。气愤之下，知青们便与他们大吵起来。最后，他们一是看知青气势汹汹，再则又有“省革筹”接待站鲜红大印的证明摆在眼前，无奈之下便为张益庭出具了到公社下户口的证明。拿着县里的证明到公社，便立即办到了日思夜梦的户口迁移证。

看见张益庭成功的前例，我心释然，“县革筹”那班人马我与他们素不相识，不会见了尴尬难堪。沿其路径如法炮制，我毫不费力就拿到了那梦寐以求的一纸户口，好像获得了迁徙自由权利似的着实高兴了一阵。而那似幽灵般的怅惘与虚空总是时不时来叩心扉，让人心神难宁。去成都的几个老知青，先后数日都拿到了户口迁移证，其时公元1968年9月初。

蒋光曦、张益庭、余立和我都顺利地办到了回城的户口，但没有哪一个心里踏踏实实地高兴过，一时的兴奋总与侥幸结伴而行，似乎兆示着前景光明。虽然以后的那段经历各不相同，但老知青的命运却始终是一样的。

我怀揣户口迁移证回到家，家已今非昔比，根本不敢向父母亲提及户口迁移之事。父亲瘫卧病榻一年有余，气息奄奄。为伺候病父，母亲上街买菜，天雨路滑，急匆匆摔倒在石梯上，摔成了脑震荡合并脑溢血，在医院昏睡了七天，瞳孔都已放大，医生告诉家属

准备后事了。或许是牵挂卧榻的老伴，还有不能自立的老八，她到了阴曹地府的门口止足不前了，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后来母亲勉强能下地行走，做点轻巧的家务。十几个兄弟姊妹的特大家庭，只有在玛瑙溪生产队当农民的九弟与两位病老长相守。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里挑大粪抬连二石，累得来站着就想坐着，坐着就想睡着，睡着就不想起来，根本无法照料生病的父母，我归家便承担起照料父母的担子。

能干好强的母亲哪里要我顶起干活，“三分病，七分撑”是她的口头禅，除了给父亲翻身、换床单之类的重活她干不了的让我干外，煮饭炒菜没我的份。父亲越来越不行了，屎尿在床，褥疮溃烂，只能活天天了。1968 年 10 月家父辞世，唯其八子独自一人在床边坐看父亲喘了最后一口气，静静地闭上了那双看透了世事的慧眼。我居然没有一滴泪，然心痛至极，劝慰痛哭中的母亲不要过分悲恸伤了还未复原的病体。

送走父亲后，摸出那户口迁移证，也不敢给母亲讲，只给九弟提及了此事。他说：“能办回来又怎么样？你看这家啷个办嘛！我在家也是当农民，你又能干啥？”前思后想，我还是向玛瑙溪派出所走去。然数过其门而不敢入，不知为什么，竟在关键时没了勇气。

新中国诞生后，虽然二姐参加了志愿军，家有一块“军属”牌牌，没有谁找过多少麻烦。但每况愈下，特别是“文革”初，已有红卫兵进过家门“破四旧”了，以后如何，难以预料。或许是不想再给这般衰败的家找麻烦，或许是怕派出所识破自已拙劣的做假伎俩，碰到管段户籍哪敢开口，看到他一脸峻相便不寒而栗，急忙躲开。在那人鬼不分的年代，我们这等家庭只有衰落破败之份，哪敢有团圆兴旺之想，更何况心怀忐忑，惴惴不安，似做了贼一般，揣着那迁移证如怀揣着炸弹。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连母亲的户口也从本本上给抹掉了，要退回原籍。因为我们那本本上成分栏中的“工商业兼地主”里沾上了“地主”的边，连“工商业兼地主按照工商业者对待”的老政策也全然不要了。母亲的户口都给吊在了半天云，哪里都上不起。我就更不敢奢望了，只好把它揣在怀里。

夕阳余晖，黄桷晚渡，下河街 22 号河边的家，虽然穷愁潦倒，还是名噪过一时的。解放后我家七个兄姐弟妹同时读书，哪个在班上不是名列前茅？济济一堂的热闹，着实让邻居们同学们赞扬和羡慕不已。那热闹的人气已随河风飘散，那兴旺之象已随长江水向东逝去。

这家恐怕是回不成了，但我也不轻易死心，揣着那来之不易的迁移证，提着油画箱在重庆、成都、乐山、宜宾的南溪县，给造反派画大幅毛主席像“毛主席在延安”、“毛主席去安源”，三米、四米高的大幅像换来赞扬、同情和一口饭吃……

结果，余立的户口上了。那是一个偶然的原因，派出所新来的女所长值班，既不熟悉政策而又自负的她看到手续齐备便办了上户手续。后来清理户口时，办事员是他母亲的

一个学生，见他又是独子，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没有再回山乡了。但等待他的是多年的临时工和体力活，混口饭吃而已。老知青的命运不管回城还是下乡皆如斯。

张益庭回城后没有上到户口，又没有了口粮，不久就"兵退"林场，后来在古路公社插队落了户。蒋光曦的户口通过在长江橡胶厂当人事科长的哥哥找关系给上了，直到老知青插队后，街道清理户口时，怕牵扯到其兄，他才又把户口拿回了邻水县。又不好回原华蓥公社，迁到了古路公社去落了户。

我直至林场知青插队前，才把户口拿回公社去上了，还领到一年多的粮票，卖了好几十块钱。后来的当权者们，也没有给"户口兵"定一条罪状，不知是法不治众还是网开一面的大度。

插队落户，留给老知青们和后来的新知青是同一条路，但老知青这条路仍然泥泞、坎坷、艰辛、苦难得多。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里，在我们这一群老知青身上烙上的是原罪的印痕，绝非我们可以选择、可以逃避得了的。美好前程，也不是我们可以用无价的美好青春去赌得来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这就是我们的厄运。

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邓公小平复出后，知青开始调工作。"先上船，后起坎"，后来者新知青走了，先来者仍无路可走。大学恢复高考了，一年不行，两年，三年，老知青中原来的初中生中的佼佼者，通过不懈的努力，也走了。而六四、六五届高中毕业生，无论多优秀，仍然无路可走，连考大学的资格因年龄较大亦被剥夺了。只有父母可"顶替"的走了，剩下的是多数，最终名正言顺地以各种病、残之名，把户口迁回了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

看眼前的年轻人，国内国际上大学，全球各地找工作，好不风光，好不快乐。就连农民工现在也可以"打飞的"全国去打工，到城市去买房安家。迁徙自由不再是一纸空文，也不再是宪法的华丽装饰，而真正给予了人民，这是历史的进步。

由是观之，我并不为曾经是"户口兵"而感到惭愧，感到内疚。对我来说，"户口兵"是我今生今世不会忘却的心痛，"户口兵"是我们老知青心上的一道创痕、一块伤疤。祈愿泱泱大中华的历史不要把它忘却，也不要让它重演。

作者简介

请见《天路迷茫》后的作者简介。

留痕

——一个老知青的故事

廖品涛

自白

孔子曰："知穷知有命，知通知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老知青用血肉和灵魂，
织造着真善美，
经过坎坷的人，
知道公正珍贵，
也是中国公众的良心。

不公平到了尽头，
除了忍耐、承受，以德报怨去完善美德，
那就是"绞歌不慑"——
天既降我以苦难，我用乐而受之；
"苦难属天，欢乐由人。"

圣勇者不会被遗忘，

历史请为他而礼赞！
老知青经历过，
血雨腥风、十年浩劫，
人祸制造的人间大灾难，
举世违心老知青可没违心；
亿万人喧嚣，颤抖、步履蹒跚……
只有圣勇者，
提着灯夜行，
是黎明的早醒者。
为此，我要一往情深地用字句段篇，景情事迹
去回忆，去追溯，去记述……
作引玉之砖，求千虑之一得。

下乡记

我，客家人，1942年出生在成都一个世代名医之家。

1957—1960年，我在重庆九中高六零级八班读书，是优秀学生又是共青团的优秀分子。这个时期，正赶上"反右"运动，接着1958年又在中学搞起了"整团"。在"向党交心"中，我除了真心礼赞祖国万岁，表白对党的忠诚（既然是交心嘛，就要坦诚——将私心杂念也献上），同时也提出了三个不理解。

我说："首先，我不理解'做党绝对驯服工具'的意义，'工具'这词是不是不妥，因为我们把党比作母亲，哪有母亲把儿女比作奴隶（工具）的；其次，据报刊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知道艾青、丁玲是反共老手。'我不理解为什么把他们的诗歌和散文，放在语文书里让我们学习；还有我初中时有两个最钦佩的老师，在'反右'中被打成了'右派'，我真的不理解，他们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敌人。"

不久后，大家对我这三个不理解辩论起来；尔后在辩论中，我书呆子般用马克思的原理，又说了一些不利于阶级斗争的言论——最早提出人类要和谐生存。大家开始批判我……而再后，联系到我的出身和"走白专道路"、"怀疑党的领导"、"同情右派"，其过错成立，最后以"劝其退团"了结。

15岁入团，16岁退团，对此，我没有什么可怨的……

从初中起，我就申请甲等助学金，共产党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从来把自己当优秀之士，"士"的独立人格应该是无畏惧无我，知恩而图报。我自省，觉得也有过失：我的确是个异己分子，说白了是个不斗争者。究其根源，那是母亲四十多岁早产生下我这独苗儿

子，从我幸运地来到人世间的那天起，人们对我都很好……于是，一听到"斗争"，我就会犯糊涂……于是，我当然够不上一个革命者，只能是党的同路人。

1960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西昌专科学校（综合大专学校）读师范中文专科。一年后，我"因病"休学回到了成都。一个从小学到高中成绩永远争第一的人，怎么受得了读二流大专的耻辱。

我家是世代名医，但直到我父亲，都讲求"医可学不可行，是尊崇张仲景，上可治君亲之疾，下可救贫贱之危，中可养生长全"（不收脉礼）。我休学待业后，就又要背叛父亲了，自立门户在青石桥街开了个医馆。年少气盛，挂上了"专医疑难杂症"的招牌；但在医馆里又有个醒目招牌："治愈收费"（脉礼随意）。不久后，这"随意"随得来我衣食颇丰。原来，我幼儿时，由于殷实的家庭和父母的名望，稀里糊涂拜过一些"五老七贤"为师，有很多知道我底细的朋友当吹鼓手。常言道："人捧人是无价之宝。"闲时，就同这些"恩护人"朋友，到茶馆高谈阔论。

四年的日子，过得倒也逍遥且快乐。

1965年，全国掀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经一年了。初期未涉及到我，而是我大姐，生死要把我动员下乡。我心知肚明：她看我社会交往那么复杂，怕有什么闪失，惹了祸，影响到她的前程。有天，她又来劝说，我一时激动，便骂了她。气头之上，"自私，卑鄙"这些语言是有的。晚上回家，老妈对我说："儿啊，她说你只管听，不去就算了。我知道你一激动就会惹事。姐在家里大哭了一天，邻居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其实，她也是为了你好，她15岁就参加工作，帮助你们读书……"听了以后，我沉思良久。我知道，大姐是在向我"逼债"！这次激动的代价：第二天我交了上山下乡申请书。

我要下乡了，几乎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这个知青有许许多多弱点，待不长久。首先是形象不好，这大概是我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我这个弱儿子，先天不足，长得精瘦而高，看上去弱不禁风，容易受到人的荫庇，所以我性格中有悲天悯人的热心热肠，同时又有桀骜不驯的另一面。第二我极滑稽，瘦而且白，一副猴子脸，一对大招风耳朵，走起路来弯腰驼背，大木块块，长相怪异且风趣，跟我的个性有很大的反差。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认为是接受命运挑战，去经历大劫大难，我是带着这些弱点走入知青旅程的。当时，下乡前要先集中起来参加训练，朋友们"死缠"，使我迟到了七八天才去报到。

我参加的是"青训班"第三期。踏进青训班，几千名志愿者正在听报告，他们的年龄一般16岁上下，我呢，23岁了，鹤立鸡群，真有点不伦不类的。这时，有位大腹便便的领导口若悬河正在作演讲，他的话风趣而带鼓励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召唤，革命的需要……出身不好的，要彻底背叛家庭，投身到革命熔炉中去……"

我们组共15个人，12女3男。因大家同住在督院街，平时有些眼熟。刚来，一位小

女生笑着说道:“经常在街上看到你摇头晃脑,还以为你是老师。怎么你也来当知青?”听后,我有些尴尬,回答道:“怎么搞的?我前几天还是在装韦陀,今天就来卖青果。”“那青果啊,又苦又涩,卖烂了也卖不脱。”不知哪个知青说完,全组人一起哄笑起来。我感到有些受伤……在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女生面前,我无能为力,只有无条件投降。

“40后”和“50后”有十年代沟。我自认:唯有沉默。沉默的最好办法是“入静”地进入“梵天”。黑格尔到了印度,这位睿智的哲人,怎么也不明白印度人梦寐以求的梵天。最后,一位妇女告诉他:“当我静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于是,我的灵魂便升华到了很高的高度。这时,我可以说,我已经接近梵天了。”这种沉默不用思维,却使我心绪不宁。这时,我才感觉到:梵天离我太遥远了。

我安慰自己:“天既降我以苦难,我用乐而受之;苦难属天,欢乐由人。”

怎么去寻乐呢?这时我忽然想到:幼年时学词曲,是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学的。这位“带头高手”用意境去评说各代诗词家,谈景情,议工劣,论高低……还发明了什么“隔与不隔”、“游词不游词”,真很有意思。

我从《人间词话》一则一则依次进入,瞬间,千般“境界”就有了使我乐在其中……但是,当我沉吟《人间词》《浣溪沙》:“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我惶然那云天悲鸣、良宵欢宴,这斗争的境界,怎么去诠释?

组上,小青年们看我一个人在那里时静时躁,时喜时忧,念念有词,认为我神经兮兮。过了七八天,一些知妹来找我聊聊天,以表示对“同命人”的一种友好,她们说:

“我看你像个精神病,怕招惹你;训练班老师说你是凶恶的狼,要提防你;家长们都说你是个好人,跟你一起下乡,放心了。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终于查清你的底细了……嘿,真想不到你还有点名气,更想不到你还是个风流浪子……有人说,你现在不显山露水,但只要有耐心,就会看到你演好戏。”

“前几天,幽了你一默,讽了你的刺,就算是伤错了好人。不过,你的招风耳朵那么大,反过来听,那不就是在恭维你了。”

……

听了她们唧唧喳喳、杂七杂八的道白,我无言以对,只有莞尔一笑。“我是怎样的人?”我没想过,总之,下乡后,我将重新洗牌。

当时,欢送知青的场面可算壮观,万人空巷,几百辆彩车,招摇过市于十里长街,锣鼓震耳,口号连天。途经雅安、石棉,到了西昌,更是大肆铺张:开大会、誓师、游行……热闹了好几天。到了盐源,十里慢坡子,夹道以欢迎,犹如节日的庆典。

盐源由四周的群山、中间的大坪坝组合而成。这里的群山,高而奇险,非常怪异;这

里的野波斯菊在疯开狂长，倍感荒凉。到了坪坝，泱泱梅雨河，弯弯曲曲从坝中流过，河边有良田美舍，果林村庄，使人有种丰饶的感觉。

我们小组被分到梅雨公社三大队四小队，在县上热闹了一天后，小队上的干部社员便把我们急忙接回生产队。队里的牛马圈，墙壁多粉刷几次，就是我们的新家，安家饭办得三盘八碗，非常丰盛。

这个地方就叫梅雨后坝子小河边，它位于梅雨河峡谷的前面，又有一条名叫"小河"的河，顺着山边，绕过果林，汇入梅雨河。这里坪坝沃土开阔，河水透明盈柔，林木幽幽，清泉处处，风景优美。

这是个多民族的自然村。当地人最爱自诩："其祖先是成吉思汗的亲裔，当年南征大理，来到了这里，大喜过望……"以后蒙族便与汉族、纳西、摩梭、普米等民族、择地而聚居，互通婚姻，世代和睦相处——以家族与礼俗为体，以姻戚与邻里为亲。每家都是一座独立"城堡"碉楼耸立于其中，有亲善也有戒备。

我下到的这个小队，是全县最富裕的，我暗自庆幸被分到这里。并想当代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没到这里来考察，若来，他编的教科书必增加新内容。

这里，村民受附近泸沽湖"走婚"的影响，汉子多为上门客。我们小组入乡随俗，也合了这规矩。组上三个男子汉，林胜利内向，王永福是 15 岁的顽童，这样，我就成了头面人物。在 12 个女知青中，有二三个是"知识淑女型"，我们彼此可以相敬如宾，但其他的全是"街妹泼辣型"，就很难和她们和平共处。

这些辣妹，我称她们叫"知妹"，口头上称她们"幺妹"或"十八妹"——她们永远不知道源于"妖精十八怪"。她们常常故意与我过不去，例如我沉默，她们说我"可怜"，我张扬，她们说我"讨厌"，我幽默，她们说我"卖弄"，我尊重她们，她们说我"想讨好"。我说："尊重妇女是绅士风度。"她们大笑起来："臭美，什么绅士，明明是最不正经的烂秀才。"我知道，我立地成佛去念真经，她们也会认为念的是："尼姑下山欲思凡。"

知青在集训时，我就感觉到所有人把我当成另类看待。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最危险的，"烂秀才"提醒我，假如加个"烂"字，便安全许多。于是，一个烂知识分子"演出"在他们面前——1.76 米的身高，但奇瘦又带簸箕背，足显其丑；戴副六百多度的眼镜，总算文质彬彬了吧；但说话怪异，时喜时怒；幽默时可以使任何人难堪，骂人时像连珠炮击向对方，永远不听别人骂，就是胜利者。而后就越演越佳，学起孔乙己来，头不梳，脸不洗，浅色衣裳变灰又转黑并且破了也不补……满口书呆子腔，把"烂"演到了滑稽的水平。

这"表演"，好像给当地人发出"愿意合群"的信息。接下来是大家请我去走三家坐十二户。在瞎聊中，东说南山西说海，谈地异事说风情。相互都感到新奇，有山重水复、一段一境之妙……很快，我成了他们有话好说的自己人。这地方的村民，从来都尊敬读书

人，这结果是让我干文职工作。总之，公社化嘛，吃大锅饭，轻松的活有的是……村民们看来：在小河边保留一个白面书生，是他们荣耀和神圣的义务；以雍容大度的娘们儿话说：让有学问的先生，到田间去干活，是糟蹋圣贤，丢人现眼失了体面。

组上的知妹们，却没有我这样的好运。下乡后，就碰上秋收大忙。这地方地广人稀，收谷子是两三个月的持久战。最使知妹们惧怕的，还算高原的阳光，它无情而残忍。她们想尽办法防晒，我给她们出主意：抹上厚厚的仙人掌液，让闪闪发光的脸，去和紫外线抗衡……每天收工回来，首先去照镜子。有天一照，不堪入目！大家干脆把镜子砸个粉碎，而后放声大哭。这时，我有些动容：出身不好，是她们的"命"；不管她们怎么努力，勤奋、奋斗、抗争都不能促其开花；"砸镜子"是必然的结果！在哭声中，我感觉到了"无花果"的苦涩！

过了些时候我"演烂"弄巧成拙，公社中有十多个最为调皮捣蛋的知青，在好好地向我学习。我的那些丑陋被美化了，什么"大而化之、不拘小节"；什么"名士风流、才气纵横"。这样一来我成了所有梅雨"坏"知青的龙头老大，每天都有三三两两的"坏"知青来串队。组上知妹并不反感，因为这些"恶人"到了我们知青院坝，像绵羊那样温顺，像牛儿那样肯出力……

有天，一个名叫黄北培外号"宝贝"的知青，偷偷跑来告诉我："那天几个崽儿半夜三更到街子上为你买纸烟，被说成到供销社闹事，县委书记都惊动了，现在正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要挽救被你带坏的知青。有人还揭发你在学《内经》，用阴阳五行欺骗群众……"

"我坏在何处？"我拍案而起，又激动了，一声大喊："这世道分不分善恶是非！"

我自信是个智者，唯有走为上计——天地之大，有很多我可以生存的地方。

初始论

在盐源汽车站，一位当地人把我挽留住。这人名叫廖家俊（这里姓廖的都是广东客家人），他是个铁血柔肠的汉子，好学且勤，技多而精。技艺中他长于电焊，可出入于机关；又会阉猪，常行走于乡间。他有孟尝之风，留一个像我这样的远方落难客，他认为万分荣幸。

盐源人一旦把你当成朋友，立时就可肝胆相照。朋友的朋友，又成了朋友，一些当地的中医生朋友，我们三言两语更成了知已。尔后，便约出去诊病，解些疑难。

当时的盐源县，缺医少药。我半路出家学的那些"小儿科"又可以"热炒热卖"了。一个月下来，天天有人请；过了第二月，诊病要预约；不到三个月，那位好心的廖家俊也在嫌他家的房子太小了。

在这偏远的县城里，谈到外边的世界好像是天方夜谭，但县里出了点小事，很快方圆

百里都知道了。"成都来的知青里头有一个高长长、瘦杆杆的眼镜医生……"

年末，是手艺人忙于生计的好时期。廖阉匠和方石匠愿意舍命陪君子，带我到离梅雨小河边更远的大垭口去走村寨。过了些时候，这两位老兄看我豁达、敏捷且耿直，机变会运筹，医病有口碑，并且身上还有本草药秘方。这样，他们胆子壮了，心血来潮要到盐源人的禁区——大垭口外的大山中去亡命冒险。

这里，交代下《草药秘籍》的来历——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学校在重庆南温泉挖铁矿，我脚扭伤了，肿成了"象腿"，就一直躲在"仙女洞"与老道长下棋，谈《道德经》，吃他小小的蒸馒头……一个多月后，离别时，这位近九十岁的老人，要跟我赌一局棋，说定：输家赔一件自己最珍贵之物。弈棋时，他时走软招，我看他有让棋之意，也连走臭招，最后我多半个兵，得了这手抄本的验方。我家世代儒医，从来讲求以理、德治病，是不相信什么验方的。现在，流落到了异域他乡，这里的山野是天然药场，这本册子便派上了用场，成了走进大垭口的法宝。

我们出瓜别，走观顶，到洼里金山……在四川、云南、西藏交界的横断山深处，浪迹了近三个月。我们到过蛊惑部落，又拜访过往昔金矿主的幽谷山庄……有很多匪夷所思、罕闻骇俗、惊艳绝伦的故事。

经过难与险，我们终于出世又入世，回到了盐源坝子。之后，我们小队的干部，终于找到我。他们说："怎么能墙内开花墙外香呢，手拐子不能净往外拐嘛！"

回到小队，全村人都来欢迎"浪子回家"，知妹们兴高采烈迎上来，说："走了你这个唐吉诃德，大家都郁闷死了。"没几个月，知妹们气质变了很多，说起话来，台词般富有诗意。我不知道她们把我带来的泰戈尔的《游思集》、《园丁集》抄背了多少。连那本《二胡曲谱》她们也在勤练，什么《孤雁》、《还乡行》……弹奏起来，指法弓法，中规中矩。

从前，小河边的村民没有什么玩意儿，天一黑就睡了，现在知哥知妹一闹就是半夜。于是，每天傍晚，社员们就像赶街般涌到知青院坝来"歌舞升平"。

梅雨小河边，离泸沽湖那么近，应该是很开通的。但近些年来，一种奇异的力量把它禁锢了。现在那些小知妹，还有那个最挑战的王小娃，以及一些会搞笑的"坏"知哥，白天晚上的瞎胡闹，好像下了道解禁令。村中那些居心不良的汉子，和一些风骚十足的妇女，便教大家唱起多情得使人肉麻的山歌。小河边的山歌，是中国情歌之一绝。我听一位汉子说，这里的情歌比泸沽湖的"走婚"还要"怪"。什么"哥呀、妹呀……把我的心儿逗得直发慌呀"，非使人早熟不可。村里的小伙们，唱得血气上冲；小知妹不醒事，唱得更娇气，只把村里那些小村姑儿撩得开了窍，羞羞答答地，脸颊红涨发烧。

1966年早春，这里的"民俗风情节"热情点燃了，欢乐在泛滥。我像一个旁观者，非常地欣赏；又像一个导演，不停地推波助澜。

好戏不长，四月初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公社书记王银清蹲点我们小队，同我住一间房。他看到了这一切，立刻叫停，说："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我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原来这里每天晚上都是。"我笑着帮腔："以前搞运动总是斗地富反坏右；现在有了知青，地老天荒的梅雨坝又有了新玩法了。"

这时耿直的老书记急忙把我拉进屋，教训我说："我晓得你喜欢凑热闹，难道我想大家愁眉苦脸？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大运动开始了！要你死我活去斗资批修。'资修'是什么玩意儿，我一窍不通……什么'资产'、'知识'把我弄糊涂了，总之，避下风头不会错。我分管知青，只要这公社一百多个知青都平安无事，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最担心你，闯过龙潭虎穴，见过鬼蜮异门，最引人注意，招惹是非。我了解你'人正不怕影子歪'，但工作组下来，他们怎么看呢？"

三大队的大队长毛国彬，住在知青院的对面，我们关系不错，有天他对我说：

"知青也要搞运动了，要批斗一些人，不过现在还整不到你的头上。第一你群众关系那么好；第二你那么会说，他们抓不到什么辫子；第三王书记还想你把他的红鼻子医好呢。"

果不其然，梅雨公社一百多个知青被集中了起来，评功查过，人人过关，这次运动我没有受到教育。评功会让我参加，还表扬了我；查过会就免了。他们怕我站出来捣蛋搅了局，还派一个进步青年罗重举（外号罗大头）上下跟着我，真像一个勤务兵。

这次批斗的对象，全部是跟我一伙的。其中作为重点批斗的，是谢人代，平时跟我关系最密切。他 20 岁，高中毕业，人也英俊。批斗他的罪行有二：一是宣扬"黄色"的芭蕾舞；二是散布泰戈尔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散文诗"。

批斗期间，书记和知青干部有天晚上与我谈心，他们要我表明政治立场，我说："八年前我就信奉马克思，追求共产主义，是自觉而理性不带半点功利。""那你为什么受到团的处分呢？""那是我反修正主义反早了，并且没弄清什么是发展，就被误会成了'布哈林分子'。"我怕大家听不明白，又反问他们"哥白尼"为什么会死？有位干部跳起来大吼："你拿烂洋鬼子来吓唬我们！"我笑着称是。他们问我对这次运动有什么感想，我说："跟 30 年前延安整风差不多。"这下把他们说乐了，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就要发扬延安抗大作风。"

运动过后，有天晚上王书记在房里请我吃豆腐干下烧酒，闲谈中他说："那天，你说你信奉马克思主义，我真想为你鼓掌……搞这次评查，是省上布置下来的，说要和风细雨。"我说："那岂止是和风细雨，还是在开国际玩笑呢。"说着，我拿出报纸，上面有条新闻："中央歌舞团在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看完他大笑道："玩笑真的开大了，县上的谢书记他老头儿没看到这个，若看到了一定只批斗那个叫什么'戈儿'的。"

我听了，大笑起来，这种笑是无须解释的。

当时，知青在农村，开头第一年是按“移民”标准由国家补助，以知青小组为单位吃大锅饭；第二年，“知青点”修好了，分锅分灶，做工分才能分粮食。一个全劳动力，一天10分。下乡七八个月了，大家常常计算自己的工分，组上最勤快的知妹何芳仙，评为“8分”劳动力，挣了1800多分，那个窈窕淑女龙文若也挣了1200多分。开初，我被评为特等劳动力，混一天得12工分，组上知妹们“叽咕”不满意。我出去“云游”了几个月，工分最少，“幸灾乐祸”便写在了她们天真调皮的脸上，于是，风凉话便时时传进我的耳朵里——

“我最大的愿望和乐趣就是看到廖眼镜饿得‘白鹤伸颈’，讨饭到我的门前来。”

“哎呀，他饿肚子，那不可能。这个百草痴不是天天在扯草药吗？哪种草医什么病，我不相信；不过，我信他会‘走火’，那些老草嫩草也可以当粮食。”

……

闲时那个叫郭九云的(外号叫九幺姑)，便带着大家逗着我乐，说：“廖眼镜，你的工分那么少，以后我们是不会供养你的。以后你说得可怜，大家才赏你一顿馊稀饭。”于是知妹们便你推我推，谁都不愿意背上这“包袱”。这时那个王小娃，便站出来大吼道：“一年后我们分锅吃饭，我是死贴廖大哥的，我们有干吃干，有稀吃稀……”

是时，梅雨大堰要重修大坝。我要去，王小娃紧跟。公社中只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知青，才有胆子敢去做要脱几层皮的重活。

我要去修大坝，村里社员们首先不依不饶，大家要留我在小河边“有作为”；组上知妹们也很有意见，她们希望把我管制在队上。这组，有三个男子汉。组长林胜利受不了气，吓到四大队去了；我和王小娃再一走，岂不是我们知青院坝就成了真正的“女儿国”……堰头上的工程要开工了，老龚堰长到小队来要人。队长杨秀元说：“他是特等，一个要抵两个工。”龚堰长一口气好忍，说：“认了。”干部社员议论了一番：“小队有几百亩水田，找个体面的人去争栽秧水，也是好事。”这样，很勉强地答应了。这时，组上知妹们生气了，叫道：“这个世道怪事太多了！一点劳力没有，被评为特等算怪吧。嘿，又涨价了，一个人挣双倍工分，还争着要……我看呀，以后牛皮吹破了，吃不了兜着走，是要惹人笑话的。”

修大坝，先得开山打石。这可不轻松，我虽受到百般照顾，几天下来手上也是血疱重血疱。一个多月，山上的石条石块堆积如山。

怎么把石头运下山，工程的领导犯了愁——正值栽秧时节，各生产队抽不出劳动力。

我看机会来了，于是我找到他们，提出运石下山由我们几个知青承包。几经讨价还价，我立下“军令状”。

各生产队选出的强悍汉子，坐在大堰入水处当观众，看廖眼镜他们怎么把石头运下山来。

不到几天，运石下山的滑道修好了。其实，也不全是知青在做，做到哪里都有些热心

人来帮忙。接着就是几个知青赤膊上阵，唱起长声吆吆的号子，用青㭎棒循杠杆原理，让石头进入滑槽；又是一声喊山吼，几百斤重的石头，就轰轰隆隆地滚下山来。

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观众们都忍不住了，要上来一试身手。龚堰长站出来大喊："愿意来的到我这里报名，分成组一批一批地上。我当总指挥，廖医生当评判，谁优秀就得'共产主义风格奖'。"没有几天，石头全部运下山了。丁壮们都得了奖，拿着奖状大家十分满意。知青没有得到奖状，但一个全劳动力两年才能挣到的工分到手了。大功告成，耀舞扬威的小知青们便到各处闲逛、吹牛，把故事编成了神话。

王小娃也要回队，他说："要拿 5000 工分去'显'那些红眼病女娃子看。"我说："你回去后就不要再来了。"那天出发，走了好远，我回头看大家还在目送，心里不是滋味。是嘛，我们知青院坝一个男子汉也没有，连挑水、劈柴都没得一个。走时，我一再告诫他：不要跟组上知妹们计较，她们说什么全是有口无心，把话说得"忍俊"，她们才好混时间。

运石头我"吹牛成真"，设计师是老龚堰长，这位忠肝义胆的可敬老人，是我忘年之交。很多年后，我们还在谈笑："那场戏演好了，群众演员真卖力。"

之后，我依然黎明即起，到坝上工地报到。龚堰长看到了，立刻宣布开工，用他当年当连长的腔调第一个点我的名："廖眼镜，廖医生，派你到山上去挖白蟮泥（打石留下的石粉）。"大家都爽朗地笑起来，我笑着向大家表示谢意地点点头，离开工地，脚不停步地回董家院子了。

奇情记

河口堰头大坝处，离梅雨小河边四十多里。没来之前，见多识广的朋友说："那里有个董家，从前很好客，这两年却很少有外人接近他家，原来他家出了个绝顶漂亮的小姑娘。"

董家院子独立于梅雨河岩岸边，左右无邻，气势壮观，显得有些神秘。

初来时，一进大门董大伯就迎上来上下打量我说："你就叫廖眼镜医生嗦，那天听县上的老朋友说你要在我家住，我天天在盼呢。看来我女人的大骨节痛有望医好了。"

我说："你让我们来住，我们是三生有幸。"

这时，董家丫头正赶着一群鹅回家。我一下被惊呆了，真想不到盐源会出一个这么具有东方神韵超凡脱俗的大美人儿！

董家院子是蒙古式城堡建筑风格，三房一照壁。房前院子，繁花烂漫开放，房后是凝碧含翠的园子，一座古式碉楼高巍巍耸立其中。主人安排我和王小娃住在碉楼的第三层。

董家大伯和两个儿子，强悍、敦厚，并有贵族风范。听说他们家以前出过一些传奇故事，全都与外河人有关，所以他对我们这些人厚道有加。董家伯母因为我成了她的私人医生，她吃了些药后，有了好转，对我更谦和了。

这位丫头知道自己非比一般,那种超自然的矜持就更加体现出来了。我来时那么看她,她不知要羞涩心跳多少时间呢。

足有一米七高的身子,16 岁的年龄,那奇绝俏丽的脸上配着稚雅、天真的神情。着一身节约式高腰衣、高脚裤,因为到这个年龄抽条快,更显得紧身。淡蓝色的衣裤,洗得泛白,把针线的细活儿显露出来。那双黑色绣几朵银灰色小花的鞋,也是精心制作的。看上去,她娇丽无双、线条飘逸,好像盐源的千般秀丽、万种风情、佳美绝妙处,都集中在她身上。

我想:因为读书不多,也与外界隔绝,她的气质才那么雅气得令人神往;因为从小放鹅,每天凝视着从龙潭汇入梅雨河的碧波,她的眼睛才那么水灵;因为长年在杨柳树下、野花丛中,肌肤容颜才那么柔嫩皙白。她一定常常在精心打扮,要不然她那乌黑、油亮的长发,怎么会那么舒展而飘飘洒洒的呢!

当一种美感透进了我的心扉,我会想到这河湾处,有位精灵般的小姑娘……我感叹:"只有这奇山秀水,才孕育得出这美丽如尤物人儿……"

当我在岩边"唱"完咏叹调后,回到院子,就去仔细观察花树草叶,我会多看少动。刚来时,我看到这园中的花木枝条很散乱,便大刀阔斧修剪了一次。我很满意,认为它艺术而工整。过了两天,我发现有人又修剪过一次,我知道是那丫头干的,当时我对她的这次"整形"很有意见。不久后,花枝抽放出来了,我才发现是那般自然而潇洒。我自省:对美的创意、美的探求、美的见解,都该灵活一点。

在数点了花枝后,我总是坐在火塘边的草凳上,把㭎炭火添得十分惬意,手里拿本书什么的,充分享受灵魂出窍的妙趣,好像一位虔诚的信徒,静候女神之归来。

她放鹅回来,我只消在夕阳的余晖中,看她一眼就够了。无论她在园子里的任何劳作,或我在讲外边世界的海阔天空时,她坐在草凳上做针线活儿,我都在留意她,都在感觉一些微妙的变化——

当晚饭前她把㭎炭火加得旺旺的,我知道昨天讲的故事吸引了她,她希望董伯母招呼大家来烤火,我再来一段精彩的。她在河边或崖上挖到一些珍稀花草,很认真地移栽在院子里,我知道她是在答谢我。她很会加肥、培土、剪枝,不多久,这院子里的奇花异草生机盎然,开放出非常艳丽的花朵……

有天,那丫头被雨淋回家来,我急忙到厨房为她熬姜汤,她抢着去切姜花。她浅色的衣裳被雨淋湿透了,小乳房朦胧地裸露出来,那粉红色的小乳头,也随着刀和姜花不停地颤动,我看着,心里有些犯傻,不正经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真想她多切些时候。她把姜米儿切得很细、很细,后来,她可能意识到有些异样儿,羞红便染透了她的脸,我以后好多时候都不敢去看她。

过了两天，倒是那丫头，看我没有留意她，做些奇巧的事儿暗示我，我直眼去看她时，她无精打采的眼光忽然闪亮起来，神如秋水的眼波，还有些勾人儿的情致，使我心跳异常，我也感觉到她心跳加速。

在风光雅绝的梅雨河边，从春雨初透时开始，度过了雨季凉爽的夏天，到了白露为霜的时节，大坝工程快结束了，我的心为之而黯然。

有天，董伯母去放鹅，说："我的侄女要找你看病，丫头好好陪着，两姐妹好久没有见面了。"因为是同龄的姑娘诊病，地方就选在那丫头的房里。

大凡医者，与人诊病特别是与年轻的姑娘诊病，心术是很正的。病看完了，病人也由她送走了，我在这简洁的屋子里，仍呆呆地坐着，为那位随时有死亡危险的姑娘感伤。

一会儿，她回来了，坐在我旁边的草凳上，莺声燕语地说："把我家表妹的病医好，我都要感谢你。"

"先天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神仙也医不好啊。"我有些郁闷地说。

"你看一下，我有没有得这病。"她话语中有些羞怯。

听了之后，我循规蹈矩先切其脉。我轻轻把她手握着放在我的大腿上，按之，"疾如滚珠"！一时，我的心为之而狂跳。为了故作镇静，我自言自语："心绝之脉，滚豆燥疾，谁都会认为是大心脏病呢。"

当我叫她解开侧襟衣扣儿，要"诊断"她的心脏，她背过身去，解了好久才解开。她转过身来，春光无限！当我要去接触她胸部时，她战栗不停，羞得来把脸紧藏在双手间……

只有天真、直率的乡村小姑娘，才能把美好的感觉袒露出来，任娇羞和狂喜在体内奔流。

良久，良久，我真希望时间永远静止于此时此刻。

而后，我把那只手抽出来，轻抚着她的长发，慢慢地把它盘成了一个发髻，从衬衣口袋取下那支红色的钢笔，插入发髻之中。

这时，我的心已完全融入到了——东方、古典；牧歌、田园。

后来，我笑着说："去照一下镜子，这才是典型的东方美人儿嘛。"

她柔声说："什么典型，什么东方，人家不懂，只说美人儿人家就欢喜得很。"

这时，我要她站起身来，心想好好看她一下，她怎么也不肯。最后，要我把眼睛闭着，我服从了，她伸腰低头扣上扣儿，走了。我听她走到门口，便把眼睛睁开。她又回过头来，用劲咬了下牙，说："那么你明天在碉楼等我。"她摸了一下发髻上的钢笔又说："这支笔我是不会还给你的，我还要你教我写字呢。"说完，她调皮地嫣然一笑。

……

我与那个董家姑娘，既是心有灵犀，也是互为悦己者，应该有完美的结果。但是，命

运往往会错过很多。人生如梦,男女之情往往也如此。梦想成真当然是好事,但是"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好梦难圆也使人肝肠寸断而遗憾。

初期,我在董家的痴与傻,本是用田园牧歌式的闲情雅趣,去逃避当时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但后来,董家要我当上门婿(把祖宗八代都卖了),对一脉单传的我,实难从命,其结果只有"东风恶,欢情薄"了。

以后,我也有醒悟,这是一种"奇情",这"奇"就在一个"舍"字当中,它是命运、缘分,也是智慧、达观、艺术、决断的结合。于是一种纯美的回忆便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里。

拾遗记

大堰完工后不久,时间和历史便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后来,历史给它定论,是"血雨腥风的十年浩劫"。(元凶林彪在温都尔汗了断,"四人帮"也受到法律制裁;为这场动乱冲锋陷阵的是红卫兵,知青也参与其中,任务完成,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游戏与玩笑般的大串联中,我到南方去免费旅游。所到之处,接待站人员很守纪律,唯唯诺诺,安排食宿,发放车票……这是个祸起旦夕、惊变一瞬的非常时期。我到广州那天,省委书记陶铸(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早上还在自诩是革命派,晚上就被红卫兵揪出来,斗得惨不忍睹……

少年时,我信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那是从"儒、道、释"更深一步去认知它,认为:只要人的道德觉悟到了"无我、无从生相"时,人类美好理想的天堂便来临。当时,我质疑无情的斗争,最后被迫退团。现在,看到眼前的斗争更惨烈而残酷,我便怀念起梅雨河边的嘻哈岁月,悠闲时日。于是,我急急想回到盐源。

串联完了,很多知青仍留散在成都,我是最早一批回来的。当时,动乱如瘟疫般渗透到了盐源,造反派在夺权。

我躲回小河边,避开斗争。哪知,有天王书记被揪到大队上来接受批斗,我跟他们大辩论了一场。当时"辩论"这词最时髦,一个小观点也要辩出个大是大非。这天的辩题是:王书记是走资派?还是公务员?

完了,我请王书记喝酒。他说:"真没想到……"

我说:"老书记呀,你不读书,不看报,怎么去背走资派这黑锅?你脚板上茧巴铜钱厚,你当什么权?你连资本主义是什么都不知道,这路你是怎么走的?"

"文革"发展到"革委会"成立,便动员滞留在城市的知青回乡抓革命,促生产。梅雨知青回乡不久,又三个一群、五人一伙跑回了成都。知哥知妹们年龄不大,但都是见过大市面的,回城"逃票"一套又一套,回乡由国家免费送。这种"逍遥派"旅游,岂不乐哉?

梅雨八家村(四大队)有个知青农场。当初那里干部想把三十多个知青当廉价劳动力,知青一跑,他们便收回失地,知青回来,哭天无路。

这时王小娃可算义薄云天,他三天两头到队上保管室去称米,请农场知青来吃大锅饭。组上知妹们陆续回队,一看急火攻心,自己用血汗挣的粮食所剩无几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拿米到社员家去换黄豆、鸡之类,让大家过共产主义,乐呵呵吃了豆花,又吃鸡汤豆腐。总之,过了今天不想明天,吃完这顿不想下顿。

有天,终于无米下锅了,知妹们又吵又闹又哭又骂,矛头直指憨胆大的王小娃,王小娃要绝食饿死以谢罪,我也慌了神。正巧二小队的队长简下伦来找我诊病,下午,送来三百多斤救急粮,丁保管指着一头小毛驴驮的口袋对我说:"这袋是葵瓜子,知妹有这哄,就不哭不闹了。"

二小队开了头,其他小队跟着上。两个多月后,公社对农场知青进行了重新安置。我们小队作出高姿态,把王小娃从前称的粮食全免了,给大家再分一次粮。组上知妹们起初认为不划算,说:"那我们岂不是白急白气白骂白哭?"但当回过神来,欢天喜地尖叫:"那我们吃的豆花和鸡块也是白吃,这样算,赢多赔少!"

过了粮荒期,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便"将"了我一"军":动员我办一个大队医疗点。小河边的父老乡亲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说得出一个"不"字。

医疗站设在原大队抽水机站,本钱是信贷的300元钱,大队共八个小队,每个小队各选出一个人来,来者都非凡。

我只提名要出山寨(八小队)的喇军秀,她是一位蒙族姑娘,乖巧、机灵且勤快。起初,大家都嫌她出身不好,几经考虑后,因是我的"点兵点将",便把她加进来,当炊事员。以他们的话说,是对我"给够了面子"。

在川滇的茶马古道上,喇家妹子不但以靓丽为人知闻,而一手的"茶饭"也叫人拍案叫绝。这位喇家小妹儿早学有绝招,而我做川菜,知识理论有一套。我口诉烹饪,她心灵手巧,不到半年便有小成。每年全县要在我们大队开几次会,一开就是好几天,干部们对伙食赞不绝口,喇小妹的"茶饭"使他们回味无穷。她的厨艺,誉满盐源。

医疗点开张,从此门庭若市,后这里成了公费医疗单位,更是车水马龙。

晚上,我回到知青院坝,有不少人不留名送了些鸡和蛋。我骂王小娃,坏了我的规矩,知妹们站出来说:"不吃白不吃,只有你这个方脑壳,不吃才瘦得光骨头。"我说:"好吃嘛,不闹死几个才怪。"她们笑弯了腰,说:"只有廖眼镜这个瓜娃子,才说得出鸡蛋都会闹死人。"不多久,鸡满为患,有些不知在哪儿下蛋的鸡婆,把小鸡儿牵群打浪带出来,到田里去吃队上的谷子。我只有请来知青大聚餐,杀之而后快,为绝鸡祸,费了我不少口舌。

不在行医中找钱,这是我"书香门弟,积善之家"的名训,但"投机倒把",我的点子是

不少的。例如我打包谷花，当时赚钱不少，不少义务工凑热闹，拉风箱要排轮子，包谷花爆开时，那声巨响，有如特制的大花炮。上有人宽容，下有人照顾，钱赚进了自己的腰包。又例如，我教唆知哥去当包工头，靠的是胆子和人缘，虽有资本主义之嫌，赚的钱大酒大肉吃了，能奈我何！

不到两三年，我医疗点的"徒弟"们，羽毛丰满，个个都成了气候，于是大队也财源猛进。之后，一所几百人的小学，在旁边建起来了，副食品销售点在前面开张了。大队的知哥知妹们，不但顶起了半边天，而且还成立了什么宣传队，想方设计、五花八门到队上去领"便宜"工分。

我又建议，新修了一个篮球场，组成大队篮球队，由我当教练，选队员"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知青少不了。隔天练次球，工分由小队给，成了半职业篮球队，在全县运动会上，梅雨公社三大队篮球队，夺得第一名，于是每个都心安理得：工分没白拿。

那时期，三天两头要搞政治运动。当然盐源也要依样画葫芦派工作组下来。大家知道，斗一两场"四类分子"，就把过场走完了。

我们医疗点伙食团可就热闹了，我们和小学老师就有两桌，他们来就成三四桌了。比富的小队隔三差五，还牵羊儿猪儿，来给大家改善伙食。喇家小妹儿慢慢变成了大姐子，这下她可以显示家大业大的蒙族当家女子的干练，"指点江山，一呼百诺"，让帮厨的人像风车般围着她团团转。"运动"结束后，下乡干部吃得油光水滑，带着笑不完的故事，回县城汇报，成绩突出的梅雨三大队，永远是全县的标兵。我出身不好，他们怕犯忌，不表扬我，说我的优点嘛，那自然是"爆米花丰富了贫下中农的娱乐活动"。

已经有两年，我没有回成都过春节了。过年是爆包谷花的旺季，而且，这几年一年变一个样，干部社员们，年三十夜，要杀猪宰牛，办他个几十桌来"庆功"。

酒宴正酣，大家还在争着大碗大碗敬酒，喊："喝就要喝他个痛快。"当喝得二麻二麻了，就把矛头对准我，说："这里就数眼镜廖哥子的肚皮烂、鬼点子多，开年我们又玩点新花样。"

前两年这时候，我喝了些酒，都要说些"酒疯子"话，哪知，来年都变成了现实。今年，我是早有"预谋"的，要把正经大事当成"酒话"，我说："县上那个林业局的头儿，专门来跟我说一个好消息，年初要从山东运来三万多棵苹果树苗，我'吹牛'要把它买断。首先，这树苗价钱低，省上扶持了一半，县上又补贴一半，而且我们出的四分之一钱还可以赊欠；其次，盐源的日照长，温差大，是栽苹果最好的地方；还有，你们看从出山寨到凉风坳那片荒坡，土层那么厚，至少也有两千多亩。如果把它变成苹果园，这个大队想不富都难了。"

我的这一"吹"，把所有人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大家争相叫好……

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盐源苹果的千秋大业，从这2000亩果园开始，香飘万里，甜向

世界。它不但为小河边，也为整个盐源开启了致富之门。感谢老天，它成功了！士为知己者死，也感谢老乡们的信任。

我与山上的许多彝族兄弟关系很好，每年6月24日火把节，彝族亲家们都来请。梅雨知青便约好，结伴而去。到了山上，便分散开来，各找各的“市场”。大家都知道，除带上互通有无的商品外，还要多带些酒和茶。当杀牛杀羊典礼后，吃完彝家姑娘献上的牛肝，这时，漫山遍野的火把燃烧起来，在欢歌中大家便跳起锅庄舞，而后，当酥油茶一喝，大碗大碗烈酒一下肚，大吃坨坨肉时，彝族的男女老少都豪爽极了。于是知哥知妹们，便拿物品、首饰等玩意儿与彝胞交换布票、猪儿和各种山珍。第二天回程途中，大家都喜笑颜开地计算你赚了多少我赚了多少。

姻缘记

岁月催人，许多知哥知妹，都难熬青春的寂寞。小河边有支情歌：“郎害相思妹忧愁。”相思与忧愁的结果，便是知哥知妹成婚配。结婚后，便要生儿育女，一帮又一帮小知青出世了。在当时看来，老知青一配成二，二生为三，三变万千；新知青又大批下乡来扩展。“知青家族”将成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知青客家人，也将在世界移民史上，写上空前绝后、最为辉煌的一笔！

梅雨河的知青们，在这边远的异域他乡，融入了这方的风情，也感受到这里的乐苦……下乡时，我只想“下”一两年，便回到我天府之国的故乡、我芙蓉花盛开的土地，哪知，竟“玩”了十年。不知时间过得太快？还是我待得太久？山外边，唐山大地震、天安门事件，灾祸不断；这里，峡谷中吹来了柔和的凉风，我知道，又挨过了一度秋色。

忘掉历史的兴衰，不谈个人的荣辱，我们知青院坝，人气指数永远是最高的。每年清明节，知妹回来了，好像是预先约好，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话，便惹得大家痛哭一场。但到了第二天，又喜笑颜开想方设法把季节工分抓到手。

我知道，她们哪里是在哭，明明是在与故乡、家人告别，在唱一支忘情与殉情之歌。

而后，她们又开始进入了这片由高山奇岭围着的古老土地，这熟悉的梅雨小河边，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去充分享受高原的阳光，让紫外线把她们的肌肤晒得黝黑。

岁岁年年，不知其期。

有朋自远方寄来七律诗，要我步原韵和之，其中一首我写道：

人人说我薄幸郎，自有奇情留八荒。顺其自然人不累，更添闲情心不忙。锦里才子异乡老，何处娇娃为我狂？佳人有约意之外，是时便飘桃花香。

应对这首打油七律时，我已经33岁了。这是我第一次独白姻缘。

在成都过去的朋友心中，在“现代避祸学”领域中，我的业绩可圈可点，是最高级别

的，是陶潜式的。君不见在动荡浩劫年代，有谁能“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怠”地去独善其身！朋友中，有良知而又不违心者，比我胆小十倍的，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便是牛鬼蛇神，人格、心灵、身体受尽了伤害。但是在“爱情竞技学”，我就是低级别了，比白丁还要白丁。我常常为白丁耿耿于怀——

我虽不风流，但绝对不古板，食人间烟火，懂饮食男女……到了超龄，姻缘之门却迟迟不为我打开。记得朋友寄来七律的第一句是“劝君不必学刘郎”，最后一句是“凌寒破腊是梅香”。前句是劝我不必活在虚幻怀旧的岁月中，后句是激励。

我应对的那首诗，反映了自己当时无可奈何的真实。因为，对儿女之情，我只有在失去的回忆中去寻找安慰，只有去遥遥无期等待，只有去虚设，去幻想，去想入非非。

那些年来，每当月朗风清之夜，我在午夜神驰，便期待着有个倾慕的人儿，姗姗来到我的身旁，听我柔声细语诉说。

当我去正视现实“姻缘”，我这个不拘一格、笑口常开的单身男子，就无脸见江东父老了。因为世界上所有生命中的雄性，不能“得到”，或是毁灭，或是弱者！

我的佳人何处？姻缘何方？

我真有点像苏联电影《红帆》中那个痴痴的女郎，她在向树林、鸟儿、流水们交谈，焦急、固执、急切地期盼：心爱的人，坐着红帆，飘到自己的海岸，向她奔跑过来……

亲友们为我的姻缘着急，80岁的老妈更心急如焚，专程赶到小河边来，到处招摇：“我这个一脉单传的不孝儿子，如果娶不到媳妇就永远不回家了。”这糊涂的老人家发了疯似的想找媳妇，但他看不见自己儿子之丑，却夸夸其谈：“不找个美人儿，怎么回去见得人。”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不知是吃不到天鹅肉，还是看遍姑娘总不如意，总而言之，婚姻仍“繁华想象虚无中”，媳妇仍在天之涯。

有天，我在县医药公司门口，背后忽然有人叫一声：“廖叔叔。”我回头一看，大吃一惊：“莫非又是一个董家丫头横空出世！”

我问：“你是哪家的？”

她稚气地笑道：“记不得啦，我是堰头上双狮村黄德银家的。”

十年前，一幅画面展现在我脑海中——

我住在董家“城堡”发痴呆时，有天一位妇女请我到她家去诊病，我们骑着马，顺着秀色可餐的梅雨河，慢悠悠走了些时辰，到了她家，一群娃儿正在火塘边烧胡豆吃，大人骂了一声，便一窝蜂地争着跑出去了。只有一个很小的姑娘，怎么也骂不出去，好奇地看着这个用马儿请来的、戴着眼镜的怪人。

“怎么一下子就抽条了，还长得那么高。”我在想时，那丫头早已走远了。

我当时医好姑娘爸爸的病，他们也为我争水帮了不少忙。后来每年枯水季节我到堰



作者夫妇俩

头上为大队争水，威风八面有说不完的故事，一连好几天让大堰水滴水不漏流到属于“尾水”的小河边来。我老妈来了，她家还不时送些时鲜瓜果来，人情美美的。

有天，我同老妈闲聊，这时老妈已经成了后坝子的“名人”，她找媳妇找得来已被人们传为佳话和笑谈。我跟她坐在一起，她总要把话题扯到“哪家姑娘长得好”之类。我无意间谈到黄家出了个非常脱俗的丫头。很世故的老妈听了之后，欣喜异常。

小时，老妈教训我们：“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对这位漂亮而脱俗的小姑娘，她老人家就要下工夫了——时而到堰头黄家去串门（实为看姑娘），几天不回来；时而买些钢笔、本子之类送给那姑娘，投其所好以诱之……

而后，便找体面人家去说亲。媒人嘛，多多益善。老妈不知请了多少说亲客，总之，愿意帮忙的，她都拜托了。

有天，老妈叫我千万别走，有天大的好事。不久，我在县上见过一瞬的姑娘，同她妈来了。

这时我才知道，她叫黄美，15 岁，才从小学毕业，如果没有这场事，她就读中学了。

一进家门，姑娘她妈就打着哈哈笑道：“走到哪里，都碰到说亲客，我家可托不下那么多情啊，要不然我家的门槛早晚是要被踢断的。还有那个算命的也来凑热闹，把八字测

得天缘巧合。现在一切就按你们成都的规矩,那叫什么的?”我妈接着说:“那叫自由恋爱。”说完,我也和两位老人笑了起来。我笑堰头上的人都说郭仁珍(丈母娘)厉害,果然如此。我笑老妈:一切都是你老人家包办,生辰八字都测了,还说自由。我看那小姑娘稚嫩娇羞的掬态,心想,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子,对恋爱能懂些什么。

这天的见面饭,老妈准备得非常充分,恐怕只有她的心肝没有掏出来了。老妈亲自下厨,丈母娘帮着做,小姑娘见机地忙个不停。

我认真观看这个姑娘,高挑纤细的身子,着一件白底红格子花的新衣裳,红底绣着白色自由花的裤子,鞋子也是新的。虽然这与她的清纯稚气很不协调,但明光钻亮地搭配得有光艳的韵味。当我的眼睛与她晶莹的眼波碰在一起,我猛然一惊,竟然使我不敢相信,那种超然灵秀之气,正是我寻觅的、等待的、梦幻中早已存在的……一时,我有些心猿意马起来:这样纯情灵秀、芳姿卓绝的姑娘,我要去千追万求的。

三媒六证,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婚俗,想不到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倒要回过头来,心甘情愿、千依百顺向古老的雅俗走去。

我要讴歌骑士时代了。作为一个骑士,一旦有了他膜拜的女郎,就可以为她拼死而战斗,去创造传奇与浪漫的业绩。

我要赞颂田园牧歌了。儿女之情一旦达到了这个境界,就会像梅雨河滞缓的绿水,漾起无边的欢乐。

我要彰扬古典雅俗了。谁说它没有佳美绝妙之处,没有奇趣的风情,没有完美的结局……

真理毕竟要胜利!知青们要回城了,知青们(包括我和黄美)新的老的大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在欢乐地整理行装。它像梅雨河源头从地层下涌出的千万股清泉要去汇成碧玉般的绿水去玻璃般流淌……

梅雨知青终于回城了。这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大家已告别了青春年少。他们承受过时代的风云,担起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有过迷茫与朦胧,随意与欢乐;有过离乡的悲伤,期盼的滋味;有过小雅般的俗与念,奇异般的情与爱……这些都是献给了知青时代,同时,留下痕迹,去见证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知青时代的历史。

作者简介

廖品涛,男,汉族。1957—1960 年就读于重庆九中 60 级 8 班,1960—1961 年就读于西昌专科学校,1961—1965 年在成都青石桥街口开医馆(中医),1965—1979 年下乡于盐源县梅雨公社三大队四小队,1979 年—1982 年工作于成都西建一公司,1982—2007 年经商于成都。

流年往事

黄晓龙

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

1963年8月中旬，一个阴霾的早晨，从两三个绝望难眠的日夜中平静下来的我，以一种近乎“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般的断决和平静，随同120个赴大竹云雾山茶场的知青，登上了军车。没有日后为知青送行时夸张喜气的锣鼓，没有写满豪言壮语的横幅标语，甚至没有亲人送别时千叮万嘱、难分难舍、悲悲切切。在一种近乎凄凉肃杀的气氛中缓缓驶离重庆两路口公寓，开始了我们这批知青长达数十年之久、充满苦难与抗争、迷茫与求索、彷徨与追求、放弃与坚守的人生之旅。

知青们有的怀揣少男少女的玫瑰色梦想，以为前面将像电影、歌舞中那样，是一片充满阳光、花香、希望、爱情、友谊的乐土；有的背负先天的罪孽，以为真诚和汗水可以洗净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有的信以为真地以为，那真的是一片施展才能、抱负、实现理想的广阔天地……而我则不同：刚刚才将户口从水产校和长寿湖渔场办回重庆。在这座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城市，在三个右派亲人的家庭里，在政治运动中屡被触及、已成惊弓之鸟的母亲和姐姐眼中，我这个被长寿湖农场党委点名称为“被右派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并且拒绝同右派断绝往来的儿子、弟弟，是随时可能给家庭招来灭顶之灾的“祸根”。处于惊恐中无可奈何的亲人，只能用令人心酸的沉默明确地告诉我：这个曾经温暖幸福的家，已容不得我继续待在重庆从容地寻找一个满意的工作了……

我已明白：这座熟悉亲切的、曾将做人的要义、人生的价值植进了我血液的城市，此时已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她不属于我。除了去到比长寿湖更远的农场，我别无选择。

我是1959年考入重庆水产校的首批学生，曾在饥饿和迷茫中完整地经历了那场"三年自然灾害"。我曾亲眼目睹过刚刚还在校门前踽踽而行的农民，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突然缓缓屈膝、倒下断气的可怕过程；也无奈地体味过领导一两一个的馒头竟比学生二两一个还大——解释为"领导的馒头发得泡一些"的黑色幽默；更领味过仅仅因为无意中发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的牢骚，被校领导斥为"攻击三面红旗"，逻辑推理为：水产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攻击水产校就是攻击三面红旗。也许更可能是阶级出身的缘故（除十几名农村同学外，几乎所有来自重庆的同学家庭出身都有问题），尽管我的成绩一直在班上数一数二，但1961年夏季学校压缩时，我竟成为了"暂时休学"的17名学生之一，并被安排在长寿湖劳动，等待复学。

那时的长寿湖依然沿用着几千年前的工具和方式从事着效率低下的劳动，我最初所在的捕鱼队更是如此。在纵横两百多里近千个湾岔的湖上，在冬日的雨雪霜雾和夏日的烈日暴雨中，仅仅凭借技巧和体力，或者两三只，或者形单影只的一艘"双飞燕"（一人划两桨的捕鱼船），从事着方式原始所获菲薄的劳动。在这近乎于原始状态的水天之间，我接受到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教育和熏陶。晚炊之后，三五只"双飞燕"系在一起，在水天澄澈的月影星辉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浩渺空阔"冯虚御风"般的飘飘然中，听老捕鱼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分子包括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他们曾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建立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这些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自始至终不承认"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怆，使我们迷惘中漂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慰藉。

那时，对右派的"思想改造"，是将被改造者推到一般人很难承受的、接近生命消失边沿，或生理心理承受极限，在令其丧失人格尊严、失去思考能力的状况下进行的。至今只要一想起长寿湖那段岁月，眼前就会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在狮子滩泥泞的公路上的情景：那些脸色灰暗、面部浮肿，肩挎黄挂包，穿着开花棉袄，趿着沾满泥浆的长统靴的右派分子，他们一边走，一边用大木勺贪婪地在脸盆般大的饭盆中舀着清似米汤的稀饭。

更忘不了那年参加农场的"双抢"时，在工区办公室门前，我站在水田中隔着七八根田坎，突然听见工区主任钱正华（此人后被提拔为重庆市政府秘书长）大喝一声："给我打！"只见几个身着齐腰防水裤捕捞队的彪形大汉围拢过去，"噼噼啪啪"，脚踢拳击加耳光把一个右派分子打翻在地。"我没有装病呀！我、我……"几个壮汉将这个"装病"的右

派打得连连惨叫，最后没有声音了，我看见他们把已经没有气息的他从地上拖进了工区办公室。我战战兢兢、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改造右派思想的现场，半天回不过神来。后来听说这个右派在同心岛“病死”了。当时，右派要摆脱这种非人的待遇，除了“认罪”，除了认真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之外，别无他途。其中“认罪”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不承认“有罪”，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都将面对漫长而无止境的非人境遇。

在和一些正直的老场员私下摆谈中，我获知多数右派获罪的原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反党，而是或因自恃清高开罪了领导同事，或因“木秀于林”，或因真诚地为党整风，提过善意的意见被无限上纲，或干脆就是平时不听话而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总之，多是源于些私人间的恩怨纠葛，而非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些右派也不过是被某些处心积虑向上爬的品质败坏者，于运动中顺手当成了垫脚石而已。在水产校、长寿湖那些年我所见到的右派中，也不乏委靡不振、神情颓唐乃至猥琐者。他们或者是担忧罪加一等再牵联家人而唯唯诺诺；或者为当年冲动失去自由、地位、名誉沦为“罪人”而低头做人；或者为了表示悔罪而卑躬屈膝讨好世人。尽管好多右派都是正直和饱学之士，但当时阶级斗争“痛打落水狗”的社会氛围却使人们对他们罕有尊敬。

也许正是因为潜意识中的敬重和理解，使我对那些因言获罪后还敢于对“自然灾害”私下称为“人祸”、“瞎话”的右派，油然地产生了一种信赖、亲近感，并因此同一些性格开朗的右派们有了密切的交往。我从小就爱写诗读诗，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影响的诗人，一直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当偶然认识大名鼎鼎的诗人孙静轩，并忐忑不安地将几首习作寄给他请教后，仅仅三天就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这个以《海洋抒情诗》在青年中颇具影响、在我眼中高不可攀的著名诗人，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肯定。这对当年对前途深感迷惘的我，无疑是一道明亮的曙光。于是我开始拼命地阅读宋词，元曲，《古文观止》和艾青、聂鲁达、普希金的诗，以充实自己。那些诗赋中美好动人的情感，那些博大精深、充满睿智的思想、意境、迷人的文字，将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于是，打鱼时默诵，念念有词，休息时手不释卷地沉醉于先贤们留下的思想文字中，且经常到深夜。这就引来那些一心想立功借以高升的人的注视。一位原水产校的总务老师，时任捕捞队副大队长，几次看似偶然非常亲热地找我聊天，懵懂天真的我以为是老师的关心，竟将对诗的热爱向往，对孙静轩老师的崇敬和感激，似朋友般倾其告之。不久，这位我信任的老师，在捕捞队的社教动员会上“补充两句”时，竟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培养的是普通劳动者，不要精神贵族，更不允许喊右派为老师，这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万万没想到，几次同这个“老师”的聊天竟使我差一点遭到灭顶之灾。

不久，我被调到水研所，同毕业后在长寿湖等待分配的水产校的同学们一起，为即将

展开的大规模草鲢鱼人工繁殖作前期准备。不知是有意或无意，我的宿舍竟被单独安排在右派学习班宿舍的外间。对此浑然未觉的我，依然保持着上班默诵诗赋名篇、晚上看书到深夜的习惯。并因近邻之便，同一个名为聂云岚、前《民间文学》编委的右派作家结成了朋友加师生般的情谊。

1963年春，正当我为《雷锋日记》大受感动时，一度暂缓的社教重新启动。我突然被调去搞基建，干重体力活。当我发现原来十分亲密的同学突然有意和我疏远时，方才知道又是水产校的那个“老师”在作祟。在即将降临的灾难前，尽管心中充满愤怒、屈辱、不平，但个人又岂能与强大的政治抗衡。绝望惶恐中，为了躲避灾难，经一个不知名的右派暗示，我以在水产校时腰椎受过伤旧病复发为由，每天交一份因病退职报告，不久就获得场部人事科以“只能自动离职”为条件的批准。并以派出所无人办不了户口为由，让我先回重庆等待。

回到重庆后，我四处借来高中二、三年级的文、史、地、数和政治课本，复习备考。但直到五月上旬，长寿湖答应寄回的户口却杳无音讯。在重庆四十中学任音乐教师的母亲着急了，只身赶赴长寿湖，为我索要户口。当得知我和右派交往密切、被党委高度关注而气急败坏时，碰巧收到孙静轩老师寄给我的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吓成惊弓之鸟的母亲，第二天下午就将大姐、四舅和全家兄妹召集在家中，召开紧急家庭会。先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给我下达了最后通牒：必须马上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并交出孙老师的信，争取主动把户口要回来，并同时断绝同右派的来往。如此，家里可以全力支持我复习参考。如果不接受以上条件，家里将拒绝接收我。

我清楚，如果回长寿湖不去“揭发”那些右派老师，必然会被打成反面典型，我这个风雨中支离破碎的家庭，将有灭顶之灾。但是，从小受的教育，又不允许我无中生有地按组织意图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更何况我敬重那些右派恩师，他们让我在迷茫中看到希望，在苦难中有了追求。我坚信只有心地坦荡磊落，有追求，有胆识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我以林哥哥、三舅、四伯被冤枉打成右派的事例说服他们，希望求得他们的同情。然而，在家庭的现实安全面前，平时教育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的大人们，此时已顾不上那些于现实威胁毫无补益的道义原则。尽管他们对我的反驳无言以对，甚至面有愧色，但无论怎样都要我同右派老师们断绝往来，并向长寿湖写检查和揭发。我坚不从命，以至僵持到不欢而散。自此开始，家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焦虑惊恐的母亲下班回家后，就是厉声呵斥，逼我就范，保全全家。由于长寿湖扣着户口，在重庆没有粮食定量，家中兄妹多，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我也“争饿气”，早上出门，深夜方才归家睡觉。靠黄珏、严中和、武辉夏等朋友和聂云岚老师的接济，几天才能吃一顿饭或一个烧饼。在这样有一顿没一顿中坚持了近一个月，高考报名期一天天逼近，户口还不见影。据从长寿湖回来的同事

讲，社教运动已经开始，在长寿湖的知青中，同右派交往密切的肖顺伟、莫德仲，先后被冠以不同罪名被捕判刑，其中莫德仲险些被判死刑。在社教动员报告中，党委负责人已将我称为“被右派拉过去的小青年”。回去，不仅拿不到户口，那些想将我做垫脚石的人，肯定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正当惶惶不安、心存侥幸时，一直同情我的大弟弟偷偷告诉我，母亲又去过一次长寿湖，仍没拿到户口。最后的稻草失去了，绝望怨愤中走投无路的我，一连几天在储奇门河边呆望江流，以泪洗面，几次都想一死了之。然而我还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

长寿湖不给我户口，是想逼我回去当反面典型，我不敢回去。我上午泡图书馆，下午就去聂老师家，或者探讨欣赏唐诗宋词、元曲，或者听他讲《基督山伯爵》、《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玉娇龙》等。至今我依然无怨无悔，当年我和右派老师的交往是值得的，虽然我这一生与金钱和权利无缘，那些人文思想对一个少年的启蒙，却使我受益终生，我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充实和愉悦的。

我本想在重庆谋一份工作，继续做我的文学梦。但母亲知道我已被农场领导当成反面典型，终日惶惶不安。我实在不忍心母亲在惊恐焦虑中受煎熬，1963 年 8 月初，适逢大竹云雾茶场到街道办事处招工，当时，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故乡之城，曾经温暖的家，已使我感到阴冷可怖，我没有考虑太多就报了名。

时隔多年后，每当母亲提起当年逼我重新下乡的往事，一直愧疚不已。但在那段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年月里，一旦遇到相似情况到底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俗？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个别子女保全全家是唯一理智的选择。

艰难求索中的迷惘和省悟

初到大竹，命运竟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抵达云雾茶场没几天，曾经被长寿湖打入“另册”的我，竟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副大队长。刚干了一个月左右，还没从以往的角色中转过来，又被县里直接调至乌木渔场。几天后又同渔场的其他三个知青一起，参加由省农业厅举办的水产技术干部训练班，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回到乌木渔场后，又受命在渔场的 150 个知青中挑选了三十多人，组建繁殖队，任命我为队长。随后又代表渔场参加省渔场工作会。戏剧般地从危险人物转变为被寄予希望和信任的骨干，社会角色的巨大落差，使我竟以为真的到了大有作为的天地。虽然我并不喜欢水产，以我在水产校学习时的了解，淡水养殖最多是一门工艺而不是科学，但命运注定我要和水产相伴终生，致力于水产业的技术进步就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也是现实能够给予我施展抱负，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空间。

乌木水库是一座拥有七千余亩水面的浅丘水库，它像一方绿绸，蜿蜒飘逸在大巴山

余脉的东山脚下。烟雨晨昏中，黛青色的山影若隐若现，大坝一带的十余个小岛，静如处子，焕发出梦一般摄人心魄的美。朝晖夕阳下的浩渺烟波，浮耀着粼粼金光，令人通体都仿佛浴满春风阳光。而当风雨大作时，那虎啸龙吟般低沉的涛声，使人远在数里之外也能感到血在沸腾。然而，风光再美毕竟不能当饭吃。从1964年初到"文革"初的近三年时间，除草鲢鱼繁殖季节的劳动强度稍低之外，挖土、挑土、打夯、抬石头、下水拉鱼苗，在令人发抖的凌晨冷雨中给亲鱼注射催情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体力消耗，每个人的饭量都大得惊人。每月15元到17元的工资，扣除伙食费后仅剩一两元甚至几角钱。买了必备的肥皂、邮票就可谓囊空如洗。这不仅使"烟屁股"在吸烟的知青中成了稀缺资源，也使得数年间多数人都无力添置在劳动中不断破损的衣服。那些年，从五月到国庆的数月期间，几乎所有男知青无论上下班，都是青一色的赤脚赤膊，或穿渔场统一下发的劳保裤。冬季则大多是开花棉袄加破裤和露出大脚趾的破胶鞋。每次休息进城，饥肠辘辘地算计着包里仅有的几角钱，能买几碗仅有盐醋的小面充饥。如果哪个月要买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就必须这个月不买邮票，不买烟抽。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清贫，工资如此菲薄，劳动方式如此原始，但在我们的汗水中，却硬是出现了一座初具规模、功能齐全的中型渔场。分布在场部和三个捕捞点上的十余栋办公室、宿舍和食堂；三十余艘用原木改成木板，然后一锤一斧打制的"双飞燕"；足以在全库进行拦、赶、张、刺大型捕捞作业的近百副三层刺网和张网；土石方工程量上万立方的全套草鲢鱼人工繁殖设施，都出自于我们始而布满血疱、随之磨成老茧的手中。其中，达县地区第一副三层刺网、第一副张网、第一批人工繁殖的鲢鳙鱼苗、水库捕捞的最高网次单量，都是由我们创造。作为渔场当时的技术责任人，更是我在那段生活的泥沼中，背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十字架，于苦苦求索中所创造的值得骄傲的物化的自我。

时隔四十多年后，尽管社会环境、生活水准、劳动条件同当年相比已是天上人间，但只要想起当年那些岁月就会激动不已。不仅仅因为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被沉没在荒山野水间的岁月。更多的是出于对年轻时为理想信仰而燃烧的创造热情的留恋；出于对那段在艰难中单纯、真诚、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的眷恋；出于为当年那段不甘沉沦和平庸，在苦难和不公前奋起抗争的人生历程而骄傲。不管现在是成功或平庸，毕竟我们奋斗过。

那些年，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晚间音乐会"。用一排搪瓷碗倒上水，调成音阶，用筷子敲出旋律，加上笛子和敲门声的伴奏，我们兴之所至，全身心投入，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是一个兵》、《人民海军向前进》和《共青团之歌》、《在乌克兰原野》、《学习雷锋好榜样》，直唱得热血沸腾、身心飞扬。忘掉了明天饭票就会用完，忘了明天又将踏着结满严霜的泥浆，用布满血口的双手去挖土、打夯、筑坝。忘记了有人会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在那些令人热血喷张的旋律和节奏中，我们随时都感到

肩上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和使命。正是这种近乎神圣的内心感受,支撑着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了那段苦难的青春。现在想来,在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山区农村,在政治阴影若隐若现盘桓于头顶之上,天天重复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单调生活中,唱歌、拉琴、读书、写笔记、写诗,是当年的知青们不至于在平庸的生活中陷入麻木、冷漠和短视,不至于失去青春、朝气、敏锐、热情、理想和希望,不至于使单调的生活变得像破抹布般猥琐暗淡和酸腐的唯一亮色。尽管事隔四十多年,那些年所历经的几次屈辱,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1964 年 9 月之前,水库捕鱼一直是用一种名为"刮网"的原始网具,效率极低。运气好,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捕得三四百斤,运气差则只有几十斤。对此,我一直想将一种名为三层刺网的新型网具引进渔场,以提高捕鱼效率。恰好七月中,省农业厅寄来一封附有尼龙线样品的产品征订信。在我一再请求下,场里通过邮局购进了 18 公斤,并同意由我利用业余时间指导网具队装配成三层刺网。但当时我对这种网的缩结系数尚不甚清楚。问长寿湖、省农业厅,都对此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只好在装了拆、拆了装的反复试验中测算。为了尽快拿出样品,一连七八天,傍晚下班吃完饭后就到网具队装网,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天天如此,双手被尼龙线勒出了十几条血口。而白天还得照样在繁殖队从事体力消耗极大的劳动。一天傍晚,正当我在大坝上趁着落日的余晖,按照最终测算的缩结系数装网时,不知听了谁的小报告,渔场的最高领导熊书记怒气冲冲赶到网前,叉腰怒目,不问缘由,劈头就是一顿大骂:"黄晓龙,你日天冒鼓,天上知一半,地下全晓得,把恁个贵的尼龙线弄烂了,搞不好,小心老子把你送进鸡圈!"说完根本不听解释,不听辩白就扬长而去。在场的几个网具队女知青见状,都悄悄丢下网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咬牙强忍着屈辱的怒火,任尼龙线在本已布满血口的手上勒出新的伤口,发疯般地装着网。几天后,这副网一下水,两个人一只船,三小时就捕得 900 多斤鱼。熊书记招待我吃小面以示表彰,这个心地善良、脾气暴躁没有文化,但又颇有心计的农村汉子,对前几天为何突然冒出"鸡圈"一词却避而不谈。无论我怎样试探,总是三缄其口。而此前,我已得知,我在长寿湖的一个名为肖顺伟的朋友,响应党委号召搞技术革新,无意中毁坏了几个平方米的香叶苗,竟被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送劳教。这场有惊无险的历险,令我在庆幸、后怕之余,更有一种难言的悲凉。为何真诚的奉献、探索明明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发展生产,却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应该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吗?

1965 年 7 月,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鲢鳙鱼人工繁殖终于首次成功,孵出数百万尾鱼苗。在这两个月中,作为技术负责人和繁殖队长,为了解决繁殖生产中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可谓全身心投入,自己都记不清经历过多少不曾合眼的日夜。而在此之前,又曾有过多少次失败挫折之后痛苦难眠、苦苦思考、总结、探求的日夜。我根本没有奢望过人

党、提干、当先进之类的好事，甚至也没想过要证明什么，只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凭着应当无愧无悔地度过一生的信念和追求，为实现将渔场建成达县地区最大的“活鱼库”的愿望不断努力。除了在取得成绩后有一种满足，觉得自己是一个社会所需要、于社会有益的人，并隐隐为之骄傲之外，没有更多的想法，更遑论当先进、入党、提干之类的愿望。我知道，我的出身和在长寿湖的经历注定了这一切都没有可能。同时，从渔场那些党员身上，也罕见“先锋队”的形象，很难在精神上对我产生足够的向往和引力。

当月中旬，一场暴雨将繁殖队七号池的防洪坝冲塌了大半，危及到池内的近百尾亲鱼，其修复工作量达数百立方。经长达两个月在鲢鳙鱼人工繁殖中的昼夜奔忙，早已疲乏不堪的我，面临着本不该发生的无效劳动，仅仅抱怨了几句当初熊书记没听从我力主用水泥砂浆和条石护坡的建议方才导致这种劳民伤财后果的牢骚，不知又被谁打了小报告。不到20分钟，背着手板着脸的熊书记来到现场，脸上板筋暴突地对我一通“日天死冲”的大骂，随之宣布了对我暂时停职检查、带队上山烧石灰的组织决定。尽管心里颇为愤怒不平，我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决定。毕竟这种处处被人监视打小报告，又必须处处带头，且得时常替人擦屁股还不得有怨言的日子已令我心力交瘁，不堪忍受。

烧石灰的土窑是在一座名为狮子峰的石灰岩质的孤峰脚下，在其近于垂直的峰脚，是一条水清得发蓝的小溪，其对面就是石灰窑，距渔场有8里水路加18里山路。每天从场部登船，划船一小时，上岸后走6里山路，到达一座小煤窑后，再每人装上120斤煤炭，气喘如牛般地经12里仅能容一个人通过的陡峭山路方能到窑边。每天早上六点半出发，抵达石灰窑多在11点之后，出发时所带的三四个二两一个的馒头或窝窝头，早已被肚皮大得像无底洞般的我们，一路上就着凉水吃光。此时再由几个人将昨天就点火烧熟的石灰撤出窑膛，另外几个人则从狮子峰后侧爬上山顶，用粗麻索捆在腰间，下坠到位于半山间一个几平方米的突出平台上，打炮眼，装炸药。点火后必须在几分钟内沿着麻绳迅速攀到山顶，躲在一方大石头后，等炮响过再重新下吊到半山，将炸开的石头用钢钎撬下山底。然后再碎矿，洗煤，装窑，点火。结束后每人再挑170斤石灰下山，登船。到达场部后多已在傍晚六点前后。此时，每个人都已是饥肠雷鸣、精疲力竭、瘫软如泥了。但还得挣扎着将石灰挑到六七百米之外的鱼池工地。

1966年前夕，场领导终于找我谈话，称我已通过了组织考验，随之恢复了我的工资和队长职务。大约一两天后，地区和县科委来人，召集我和繁殖队其他几人开会，称繁殖队已被县里评为群众科研先进集体，希望我们报一份材料，以便出席三月在地区召开的科技工作表彰会。当时在场的熊书记立即指定由我起草材料并出席会议。但当会议召开前，却悄悄指派了另一根正苗红的青年出席。当时强调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官僚要特权，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1966年元旦前一个上午，熊书记突然派人将我从鱼池叫到办公室，称县委办公室要渔场在两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送一条20斤以上的大草鱼去招待所。而当时渔场20斤以上的鱼只有七号池那尾。那尾亲鱼，是繁殖队唯一有把握在当年成熟产卵的雌草鱼，一旦顺利产卵孵化当有近百万鱼苗，价值好几千元。我要通了县委办公室电话，刚说了几句，就被一阵凌厉霸气的训斥喝断，对方称："你是哪个？你有什么权力和我说这些？这是政治任务，不执行就是政治事故。叫你的领导来，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轰得我好一阵都回不过神来。熊书记唯唯诺诺地听完对方的训斥，只得安排我们下鱼池捕鱼。当时七号池水深两米多，放浅池水根本来不及，只好由我和张卫国两人赤膊下水。在水温仅七度针刺般的冰水中，在七八个人的配合下，拉了两个网次，用了四十多分钟才将那条草鱼捕获。而我们两人却冻得全身僵直，连手脚都不听使唤，不得不由几人半抬半背地送回宿舍，在三四床棉被下整整抖了两三个小时。事后，从县农业局一干部口中，我们才知道这条其潜在价值每年高达数千元被赋予了政治任务的草鱼，是为了招待一位过路的杨姓省委副书记。我曾于1963年底，听过这位颇有水平的杨书记的报告。后来，领导、造反派头子等来渔场要吃鱼的事情就经常发生了。

1965年初繁殖队一个瘦小的名为赵永富的知青，在修建溢洪道抬石头时被砸伤右脚，一小时后就红肿到踝骨，按惯例回寝室休息。第二天上午熊书记突然找到我，声色俱厉地责问我凭什么同意赵永富休息，并严令马上将他叫回工地劳动，走不动爬也要爬到工地。不明就里的我还没来得及问清到底是为什么，满脸怒气的他已转身走开。中午休息时，我颇有些不忍地向赵永富转达了熊书记的意思，问他是怎么回事，赵永富竟哭了起来。据他讲，是因他远在蚕桑队的女友黄昭芸，于他受伤后的当天下午，未经队长批准就离队赶到场部探望，引来熊的大怒。当时渔场曾三令五申不准恋爱，所有知青间的恋爱都在地下进行，尽管我和他住在同一寝室，也是此时才得知他俩的关系。此时赵永富的右脚已肿到小腿，令人实在不忍，本准备硬顶着让他继续休息，但赵永富竟不顾我一再劝阻，硬是先单脚跳着，后来又是爬着去找熊书记。据赵事后讲，熊书记当时正在吃饭，听了他的讲述后根本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甚至向熊跪下，而熊竟砰地将门狠狠关上。自此，每当赵永富讲起这事，总是咬牙切齿眼喷怒火，一再声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果然，1967年4月，赵永富借口清查"黑材料"，将熊书记报以一顿毒打，令其在病床上躺了近一个月。1970年清队时，熊则借口赵永富有投机倒把嫌疑，组织"群专队"对赵永富白天大会批斗，晚上轮番审问，迫使其交待问题，一连折磨了四天。以为再无生路的赵永富，在第四天中午，挣脱"群专"看守，高呼着"他们搞逼、供、信"，从十几米高的右干渠闸门上跳水自杀，丢下每月只有22元工资的新寡黄昭芸，和两个一岁两岁的孩子，独自面对今后漫长艰难的岁月。记得赵永富入殓时，尽管"革委会"专门为此召开全场大会，称

赵的死系畏罪自杀，一再强调不准参加他的葬礼，但仍有数十个男女知青默默地伫立两边为他送行。见到这些眼含泪水满脸悲愤的知青，熊和那几个“群专队”的打手没敢出来制止。

1965年初，张敦信（人称张眼镜）在重庆的爱人生孩子，接到电报后三次请假均未获准，他就自行跑回了重庆。结果被渔场派人到重庆，请当地派出所协助，将他从家里强行带回渔场，并在回场当晚就召开了批判会，宣布撤销他永兴捕鱼队副队长的职务，安排在繁殖队劳动。几个月后，心头颇为不服的他，借一次喝醉酒，指着熊书记大骂：“姓熊的，你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小人，既无能又无德，凭啥子整我？”酒醒后已近晚上9点，熊还是马上召开批判会，将张敦信宣布为内部管制。当时很多知青都颇为不服，其中一个名为蔡庆华的大龄“社青”，非常聪明地引用了那段“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领导”的著名语录表示反对，结果又被狠批了一顿。

“文革”开始，乌木渔场和大竹县你斗我来我斗你、我登台来你下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朋友们多有叙述，我就不累赘了。



黄晓龙，重庆市人，1943年出生。1959年考入重庆水产学校，同年被“压缩”到长寿湖渔场参加劳动。1963年8月上山下乡到达县专区大竹县乌木渔场当知青，后调重庆市农业部门工作，高级农艺师。现已退休。

江永农艺队散记

邱　放

在中国的版图上，中国疆土的西南方向有一条大山脉，名曰：都庞岭。在奔腾逶迤的都庞岭中部，湖南广西两省交界处一地段，有一个不起眼的红圈被标上"江永"两字。公元1963年至1965年的这三年时间里，随着全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入，这个县陆续从省城长沙运来一批又一批共计七千多个年轻人。他（她）们无一例外地被冠名为"知识青年"的美称。从此中国汉语言中多了个简称的词汇：知青。江永县安置办将这七千知青分拆成一小堆又一小堆的陆续送往属于这小红圈内的各个农场、各个村落里……

江永县农艺队

1966年1月21日，一支全部为知青组成的江永县农艺队成立了。

江永县县城有一条往南去的公路，离县城六公里处有一座高山，绕过这个大山湾，就来到了一个名叫红旗公社杨甲大队的领地。一条清澈的小河从公路肚皮下穿越而汇入江永最大的河流潇水，横跨这条小河的是一座始建于明清朝代的秀美石拱桥——"接龙桥"。接龙桥斜对面的半山腰处，一幢新修建的二层楼房似乎很孤独却很傲然地依山伴水站立在那里，好似向南来北往的人们炫耀着它那与众不同的身份：我，就是江永县农艺队！江永县农艺队，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你一定理解成县农村园艺队。你这样去看那就大错特错了，江永农艺队全名叫江永县农村文艺演出队。

在这幢房里住着14个男知青与12个女知青，他们是在1965年12月县里举办的知青首届文艺汇演中，由县委、县政府、县知青安置办的各大家领导们从参加汇演的演员里挑选出来的。这些知青能歌善舞、能吹会弹、能写会画。而我正是那次凭着一曲独唱脱

颖而出的。可以说，这是湘籍知青部落中的第一支乌兰木骑演出队伍。

文化娱乐生活极为贫乏的江永，一下有了一支半专业性质的农艺队，无疑我们成为了“宠儿”。为了解决这26个宠儿吃饭的根本问题，县政府一句话，硬是从离农艺队最近本属红旗公社永丰大队那块良田里划出12亩寄在农艺队名下。

为了解决宠儿们的住房问题，县安置办还拨了一笔专款给农艺队盖房子。但是，这幢房子得由宠儿们自己动手去建。26个年轻人说干就干，炸山石，挖乱坟冈，筑地基，从半里外一肩一肩挑山石，短短几个月竟挑走了半座山。辛勤的汗水迎来了丰硕的成果：房子建成了。

这幢美丽的楼房是石木结构，楼房的正中间木楼梯拾级而上，共计20间房，男女知青各住一头。女的住在离公路远的那头，男的自然住在靠公路近的属于不安全的这一头了。每间房安排两人共住，余下的便是会议室、农具保管室等等。

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激动。女孩子们结束了寄居在鱼种场里像装沙丁鱼似的情景，挨冻受暑的男孩子们终于从二间牛棚搬进冬暖夏凉的自己的房，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说了。

1966年元月到1969年2月，我在江永农艺队度过了三年时光。我体味着边参加农业劳动边四处奔波演出的艰辛，也品尝着被社会承认与赞誉的喜悦。尽管若干年后，我在人生激流中又有过多少回的搏击，又看过多少幅人生图画，但农艺队的往事仿佛一幅幅生动鲜明的黑白照片在我脑海中凝伫，让我对青春岁月再一次产生神往……

绰　号

我们那时人人都有个绰号，如果谁没有那他可能是太不合群了，大家会视他为另类。但有一个人我们却不敢给她取绰号，因为她是我们的大姐，如同长辈一样关爱着我们，除了尊敬谁也不会给她取绰号。队长郑骅身材最高大，绰号为大肥人；才华横溢，颇具诗情的副队长王百明在队里担任编剧主写手，他那有着天生鬈曲头发的头经常高傲地昂着，让人不由得想起俄罗斯一位大诗人，于是这绰号自然加到了他的头上：普希金；曾从专业歌舞团下放到江永的灿辉在队里又编又导，因其在家排行第五被人呼为老五；挟舞美、舞蹈多种技艺的乃广，竟然有个很俗的绰号：广码子；相貌英俊，有一副芭蕾王子身材的成君，因其性格憨憨的，所得绰号倒也“号如其人”：慢三步；为人幽默待人诚恳的向维佳吹笛子技艺高强，别看平素性格不温不火，当时很为流行的曲目《扬鞭催马送粮忙》、《喜洋洋》、《我是一个兵》却被他演奏得激情四射、韵味无穷，被人恭称为向宝；至于年龄最小的周健平，长得短小壮实，虎头虎脑，小小年纪便懂得帮助他人，格外显得淳朴可爱，大家爱而怜之，不忍以“恶号”相加，按惯例又不得因人废“法”，于是给他取了个“奶崽”……至于

其他人，都是以性格或以其他特征冠以各种雅号，如：猫咪、小肥人、万人迷、夫子、茨伽、红薯、姑儿等等奇怪的绰号。

我有一不甚起眼的毛病：马大哈，做事丢三落四。不幸这毛病被众人逮着，于是“邱大娘”这绰号从年轻一直叫到老，挣都挣不脱！

既已是文艺“专业队伍”，自然少不了演出的机会。但那时可以作为排练节目的剧本、歌词、小品的脚本借鉴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那时只有八个“样板戏”。而这御用的样板戏可不是随便可以演出的，不说没有经费置办行头，还得考虑别演砸了玷污了“革命样板”。于是，编写节目的任务便落到农艺队那些笔杆子们的头上。应该说歌颂伟大领袖、歌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肯定出不了问题，因此，这些满腔热情的笔杆子们干劲冲天，日夜苦思冥想，创作出了不少的剧本、歌词、小品。这些作品几乎全部是歌颂领袖、歌颂上山下乡革命运动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在艺术上确实显得生硬而幼稚，但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当年的一段历史。

演　出

当时如果有演出任务，我们会立即从稻田里爬上来，跑到水沟里洗干净身上的污泥，背上锣鼓家什，用一辆木板车拖着乐队的扬琴、手风琴和一些场景道具就出发了。我们乡里常为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演出，为贫下中农演出，为解放军支左部队、工厂演出。

那时每人仅两套演出服：一套黄军装，另一套是用棉绸做的彩服，女的是桃红色，男的天蓝色。就这两套服装在台上换来换去的演了一台又一台的节目。

因为条件所限，那时我们化的都是油彩妆。女的化得像个古装戏里的青衣小旦，满脸都是鲜红色，额头至鼻梁涂得雪白，两眼被浓重的黑圈围着，眉毛往上高高挑起伸入两鬓。男的则是武小生脸谱。所有演员都像戴了个面具，在台上穿着黄军装唱着，跳着……用现在的审美观和化妆品位来看那时的我们，都会说我们那个时代的舞台妆显得是多么滑稽。

记得那次去道县与零陵地区（现改成永州）演出，有一个专业歌舞团要和我们同台表演，各演半台节目。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样安排是在比试演出水平。事前我们特意赶排了一个包括有工、农、学、兵的大型歌舞，由于演员不够，每个人在这个节目里得扮演几个角色。我与辣利先扮学生，后穿彩服还得马上抢妆换衣，上下只有一分钟时间。为了这个节目的完美，队里特意给我缝了条背带裤，让我先穿背带裤上场亮相表演，完了下来得马上换上彩装出场。谁知裤扣子的扣眼锁得太紧，我在后台怎么也解不开。此时，台上锣鼓一阵紧一阵敲着，辣利跑到台上做完了编排好了的动作亮相在那，她发现我没紧跟出场，灵机一动耍了个花枪，围着台上几个演员摆的雕塑造型转了一圈跑进后台来，看见

大姐、它它姐、干子哥几个人正在紧张地为我解扣子。台上那几个演员还纹丝不动地立在那等我俩，情况非常紧急，辣利只好又一个人跳出去亮相，而我还是没出去！辣利又耍了个花枪跑进来，直催：快点！快点！我的妈也怎么得了喽！乐队也察觉到味道不对，又重新将锣鼓重敲起来。辣利只好第三次跑出去……她在台上只差晕倒，我在后台只是急得眼泪双流，这时大肥人哥跑过来三下五除二抓起我的裤扣，嘣！嘣！两下竟将两粒扣子掰成两半才解了危。两个姐姐一个给我抢穿上衣，一个给我抢换彩裤。乐队的锣鼓点子也反复敲了三遍。好在下面的观众都没察觉出来，事后都夸我们演出水平赛过专业水平呢！

就因为这件事，“邱大娘”的绰号被大家一直叫到今天。

奶崽的初恋

“小华生子，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这是奶崽当时的心思，这个故事至今为我们津津乐道。

我们队有个年龄最小的女孩子，说话奶声奶气的细嫩，成天梳着一对小羊角辫，长长的睫毛下闪着对大眼睛。不知是哪个大哥因她是队上的幺妹，给她取了个绰号：“小华生子”。别看她人小，可却是个共青团员！这对当时大都出身“黑七类”的知青部落来说，华生子真可算是凤毛麟角的人物。

在江永，人们把小男孩叫奶崽。当然我们队上也应该有个奶崽，男生中最小的周建平理所当然地就叫奶崽。

奶崽是个善良纯洁的好青年。笛子吹得好，做农活时总将笛子别在腰间，一有空他就吹练起来。队上将那头宝贝——水牛交给他，当他骑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时，那情、那景，简直就是一幅美妙隽永的水彩画啊！牛儿也被他服侍得膘肥体壮，干起活来把犁耙拉得飞奔，惹得附近村庄的老乡常来借用。

那时我们正处在18岁至20岁青春荷尔蒙分泌旺盛期，男孩子脸上的痘痘争先恐后地竞相涌出，女孩子们个个出落得丰满水灵。在这朝夕相处、同锅造食的日子里，渐渐地相互吸引着，欣赏着，没有人说出口，只是各怀心事心照不宣而已。

奶崽的身高怎么也赶不上脸上长痘痘的速度。当他看见队上一些哥哥姐姐成双成对去赶场，去县城玩，而自已却是只影孤单，不觉感到了一种深深的落寞。他将队上女生暗自排了排队：这个是姐，不可造次；那个虽然与我差不多，但脾气大——辣椒，我怕！突然一个靓影出现在眼前：小华生子！天啦，真是上天要赐给我的宝贝啊！奶崽一下坠入情网了，笛声也跟随坠入了情网。它原来吹的《我是一个兵》不见了，《扬鞭催马送粮忙》不见了，《边疆处处赛江南》也不见了，而现在一首《对面山上的姑娘》却如痴如醉如影随

形地陪伴着奶崽，一天又一天……

奶崽这如歌如泣的笛声太刺激男性公民了，引起几个老哥子们的注意。但这些老哥子们不知奶崽对哪个姑娘心仪，同时又怕自己的姑娘被奶崽吹走，于是又有了下面这段故事。

一天，几个老兄凑了几元钱，特地到县城去买了五斤米酒和一副猪下水，回来后放到队上刚新婚不久的“济公”兄家里烧火做了几个菜等奶崽放牧归来。一看见奶崽回来了，几个兄长特别热情将他拖至早已摆好酒菜的桌旁坐下。奶崽一看见桌上酒菜，高兴地与兄长们吃了起来。几个兄长将各自从长沙下乡时家里给的漱口搪瓷杯斟满了酒送到他的手上，而奶崽这是第一次像个成年男人样与几位兄长喝酒，心里特别兴奋。他大口大口地喝酒，大筷大筷地夹菜，好不痛快也！杯干了，几位兄长轮番添上，并你一言我一语夸他：牛儿喂得好，长得壮，今年春耕多亏奶崽立了功……那刻，奶崽被灌得云里雾里，连脖子都通红通红的了。

兴奋之中的奶崽将笛子一把从腰间抽了出来，于是这支《对面山上的姑娘》又韵味无穷地响了起来。奶崽一个劲地吹啊吹，可此时吹出来的音却“黄”得使大家笑得直流泪。几位兄长将奶崽的双手从他嘴边按下道：“奶崽，今天你要讲老实话。我们大家帮你拿主意。你这个《对面山上的姑娘》到底对谁吹的？”

奶崽一听，一个劲地摇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你们讲错了可了不得，我这一辈子会抬不起头来了啊！”看到奶崽酒醉心里明的样子，兄长们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隔了会儿，其中一个叫辣利妹的女知青对奶崽说：“奶崽，我们没有乱讲啊。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晓得你喜欢哪个啰。说出来，说出来哈。让我们帮你呀。”大家也七嘴八舌地附和辣妹的话：对，对呀。说出来我们都帮你啊……

在知青部落里弹得一手好三弦的高手“济公”用老练的腔调道：“奶崽，实话不瞒你，现在住那一头的女孩子正在观察她们将来想依靠的男人，你实在不讲，大哥我也不勉强你。只怕你这前怕狼，后怕虎，等你心上的她爱上别人了，你就一辈子吃后悔药去吧！你不讲，我也不想听了……”

“济公”这一激将法竟激发了奶崽的胆量。他将“济公”拉到一边：“我对你讲，你不要讲出去。你发誓！”何济公将耳朵凑近奶崽：“好，你只讲给我一人听，我保证不说出去。还给你拿主意。”大家屏住神，只见奶崽在“济公”耳边轻轻地说了什么。突然“济公”双眼一睁，大声叫道：“有眼力！有眼力！不错！不错！”大家呼的一下围住了“济公”，可“济公”却卖起了关子：“对不起大家，我发了誓的讲不得，讲不得。”大家看到济公这煞有介事的模样急了，将矛头指向“济公”。

“济公”一脸苦笑道：“好吧。那我宣布她了？”

奶崽一听宣布二字。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对“济公”说：“你……你……你不要宣布，这是我个人的事。我是个男人，我自己讲，自己讲。”

奶崽此时的改变使在座的每个人都兴奋不已。连忙应道：“好，好，好样的！”只见奶崽眼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用充满感情的声音对大家道：“她是……她是‘小华’……”谁知“生子”这两个字竟被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空气突然凝固了，四周变得一片寂静。突然“啪啪啪、啪啪啪”，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声，一下子大家都跟着“啪”个不停，空气一下子又像炸开锅似的沸腾起来，几个兄长争先恐后对奶崽道：“奶崽，别着急，我帮你。”“奶崽，我可为你代笔写情书，你只要抄一下。”“奶崽，让我告诉你献殷勤的秘招……”把个奶崽弄得应接不暇，只是一个劲地点头：“好、好、好。”几个人齐心协力搭成个手臂轿子，把奶崽欢欢喜喜地抬上二楼，送进了他的房间。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当奶崽从他的房间里慢腾腾地挪出来，准备去放牛时，大家看见的奶崽：满脸、满嘴、衣服的前襟上都爬满了黑黑的东西！吓得大家急忙向奶崽奔去。奔近一看：原来半夜他口渴，竟将一瓶墨汁误当冷水全喝了。大家围着他笑得前俯后仰。奶崽羞得跑到屋前的那条河一头扎进水里，放肆地洗呀，洗呀，半天都不肯上岸。

正当大家齐心协力想帮助奶崽促成这桩心事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开始了，我们的文艺队长被杀害了。江永的知青开始了生与死的大逃亡，奶崽的心事也让这场空前劫难给摧毁了。

几年后几经辗转奶崽被抽调去支援三线建设修铁路。这一修却让奶崽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吃上了铁路饭，并娶了个没当过知青的女孩做了老婆。小华生子后来回城当了老师，找了个没当过知青的男人做老公。据说回城后过得并不好，先是得了抑郁症后来竟跳楼自杀了。这是早几年听人讲的。我们奶崽的这段弥足珍贵的初恋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普希金”之死

1967年8月，与江永相邻的道县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屠杀案，即后来史称的“道县大屠杀”。道县的某些造反组织先是彼此不和，大动干戈，继而发展到凡属“黑七类”分子乃至子弟一律杀掉，并且美其名曰“道县提前进人共产主义”。这段时间究竟被杀多少人，有的说九千多，有的说一万二千多人（被杀者不一定是“黑七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屠杀风波必然波及绝大多数均出身“黑七类”的江永知识青年，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捆绑吊打知青的情况，因此，很多知青纷纷选择各种途径逃向长沙。但是，也有一部分知青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坚持“就地闹革命”。其中，农艺队

的副队长王百明本已在长沙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此刻江永县的屠杀风正盛，王百明却毫不畏惧，依然从容在县城行走，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遭到屠杀，但他并不介意。

8月17日这天，百明和一位朋友到街口国营饮食店用餐，正吃着，突然进来四个什么组织的人，手里拿着鸟铳恶狠狠地问道：你是不是王百明？百明见状，连忙站起来回答道：是呀，我是王百明。百明嘴里含着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咽下去，话音刚落，只听轰然一声，旁边一持鸟铳的汉子竟对着百明的脸就是一枪！百明当即捂脸倒地，再也没有醒过来了。据说凶手不久即自杀，但这是后话了。

母亲对江永的武斗情况早有风闻，总担心我一个女孩子的安全，于是便拍了个"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将我早早叫回了长沙。我获得王百明的凶讯时，早已身在长沙。记得当时我和一群爱好文艺的男女青年正在十六中投考一个文艺宣传队，突闻此讯，大家泪流满面，相拥哭成了一堆。

王百明，一位愿意将生命交付给革命梦想并正在付诸实践的22岁青年，一位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诗人，一位与他的青年伙伴们在农艺队朝夕相处的兄弟，却在那荒诞的岁月殒命异乡。

从此，江永农艺队少了一位讴歌时代的"普希金"。

一盏灯有一团亮光，一棵树有一片阴凉。当年江永农艺队的哥们姐们与当今盛世的"超女超男"们相比，也许微不足道。但当年下放在江永的知青以及全县17万农民哪个不知晓江永农艺队？那些频频为知青们、农民们送去欢乐的帅哥靓女们的笑靥，不也经常在他们艰辛劳作中带来一丝慰藉？只可惜在那特殊的年代，曾经响当当的"农艺队"毕竟只给了人们惊鸿一瞥。即便是这一瞥，四十多年过去，老知青们、老一辈的本地农民依然在深情地怀念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无须发经天纬地的宏论，也难有扶危济困的神通，在生命的过程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只要能为周围的人带来点点滴滴的益处——有如灯，给人以光明；有如树，给人以阴凉——这大约便是有意义的生命，也是江永农艺队存在的价值了。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生命之河，日夜奔流，河汉星空，星散云流。从那已然褪色的黑白相片中仔细辨认当年的帅哥靓妹们的影像，这些昔日农艺队的帅哥靓女们，他们有的成了叱咤商场的悍将，有的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有的仍在鼓起余勇以花甲之躯去搏取那养生之钱，有的却因意外早早故去……

感谢你，江永农艺队，你曾给过深陷阴霾的老知青一点阳光。怀念你，那些曾经活跃在潇水河畔的年轻背影……

作者简介

邱放，女，生于1948年9月30日。196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十五女子中学，同年9月4日下放到湖南江永桃川农场。1966年2月调入江永县农艺队从事亦农亦艺的演艺工作。1971年转入湘西自治州龙山县贾坝公社团结九队插队落户，1973年3月病退安置在龙山县民安镇，1978年招工在龙山县文化馆当文化站辅导员。1981年转干，1989年12月调张家界市农业银行，2003年在银行系统退休。

一封上告信

赵永智

1970年夏天，气候宜人的贵州高原，正是晴空万里、山花烂漫的时节。蛰居在家中的我心里却阴沉沉的：已经20岁了，还要靠在旅社工作的母亲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养活，分吃她的27斤口粮，心里说不出的惆怅。原本在一个培训农民的拖拉机驾驶培训班找到一份做饭的工作，做了20天，那位姓熊的负责人打听到我是返城知青后，吓得赶紧将我辞退，说怕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出于对我的好感和同情，他还给了我说好的一个月二十多元的工资。

1965年初中毕业后，我尽管在学校年年评为三好生，成绩册上全是红色的高分，但毕业了还是进不了高中，原因是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的母亲曾经参加过“一贯道”。我从小就听老师的话，相信当时学校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用学校动员，率先报名下了乡。老师说今天去农村犹如当年革命青年去延安，开始去时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的结果是都会变成老革命。

成绩好而进不了学校的同学听到自己可以选择革命道路，一个个无比激动，地区二中一位高中同学还写了血书，表示下乡的决心。9月1日，我们贵州省安顺县（安顺地区机关所在地）六五届的53个知青坐在两辆大卡车上，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革命青年志在四方》，集体插队到了一个叫做苏吕堡的生产大队，53个同学按每队3男3女分到九个生产队（有个队少一个）。到农村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大家才知道是受了欺骗。在农村别说干革命，就连养活自己都不容易，选择的道路根本不可能改变家庭出身，“四清”工作组进村后并没有把知青与贫下中农同等对待，召开贫下中农的会议时根本不让知青参加。1966年12月5日，生产队分了粮食后，不甘心和农民一样被波澜壮阔的运

动遗忘的知青们，集体卷起被包，回到安顺城参加文化大革命。在"红海洋"中轰轰烈烈折腾了两年，国家政权倒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的命运却没有丝毫改变，一个个只能陆陆续续返回农村。我因为医院证明患有心脏病，所以才敢留在城里等待"知青办"的处理。六四届、六五届知青中执有医院证明的还有李遂珍、侯泽华等四五个同学，大家经常约起去找"知青办"解决回城问题。"知青办"的王主任总是推三阻四的，大家找了一两年都没有结果。那时候，广东部队485团进驻城里实行军管，这支部队"左"得出奇，甚至两口子为家事吵架，操着浓重广西话的大兵们都要质问双方："你是什么成分？"两口子中谁的成分好，就支持谁。这形势让我们这些留在城里的知青生活在惶恐之中，因为我们不但成分不好，而且还是没有户口的"黑人"。



左荷锄者为本文作者

"革命"高潮过后闲下来的"老三届"高、初中生，除了下农村当知青的外，其余的闲在城里无所事事。前不久，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公审了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说他们组织了一个什么"自由党"，其中枪毙了姓夏、姓肖、姓姚的三个人，被判刑的人中有张姓、刘姓两个女生，都长得很漂亮。（二人关到"文革"结束后放了出来，至今风姿犹存，都在做生意。）这些人在台上昂首挺胸，一副不怕死的样子。这事提醒了很多家长，都把闲得无聊的孩子们关在家中，不准外出。

我不想再让母亲为我担心，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一天上午，我独自在家读同学在"文革"初期从师专图书馆弄出来的《普希金诗选》。当我读到"我的道路是悲凉的，未来像海洋/汹涌激荡，只预示着操劳和悲怆。/然而，朋友，我不愿就这样死去，/我要活，为的是忍受痛苦和思维"，不禁掩卷沉思。就在这时，猛然一阵嘭嘭的拍门声将我拉回到现实中来，我赶紧将书藏在煤灶的灰坑里。那时，在中国除了毛泽东著作等几本书外，什么也不准看，搜家时连鲁迅的书也要搜，我的一本《野草》就被搜去了。我惊恐地打开门，居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出现在面前，他自我介绍说是地区公安处的，叫杨万里。问清楚我的姓名后，他说："正要找你，我们军管组的王建仁组长要找你谈

话。”王建仁，地区公安部门的第一把手，只有开重大的公审大会时才露面的那位大领导。他找我一个普通知青会有什么好事？过早去世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教育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这话已经不灵验了，从小就是父母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的我虽然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此时心里就很害怕——这是一个可以随意抓人的年代！看到我的忐忑不安，杨同志同情地对我透了底：“你写了一封信给省里的兰政委（当时的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我们军管组王组长和你们县革委第一把手安静海主任亲自处理，现在王组长要找你进一步了解情况。”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文革”搞了几年，国家主席被打倒了，各地都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说是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我们老知青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才下去的老三届新知青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学校有一个66届下乡的女生，姓姚，瘦瘦小小的，天生一副营养不良的可怜样。她母亲早死，继母对她不好，伟大领袖号召红卫兵下乡，不用动员她就抢先报了名，早就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的家了。她落户在乡下一个老太太家，老太太家里只有一个快三十岁的傻儿子。老太太给姑娘好吃好喝，要姑娘与她同睡，让姑娘感到了那早已失去的母爱。过了半年后，一天夜里，突然床上的老太太变成了话也说不清楚的傻儿子。姑娘吓得直抖，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事过之后，她痛苦没有亲人能够倾诉，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整整两天。第三天是赶场天，眼泪也干了，她拖着两天没进米水的身子，去乡场上买了一瓶剧毒农药，将自己了结在村外阴森森的竹林中。当时让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她的父亲居然没有追究这事，而是草草安葬了事，那神情似乎还感激人家为他卸了一个包袱。这件事，让知青们听了都很寒心，我也是有怒无处发。

事过不久，也就是1970年的春季，一个要好的68届女知青对我哭诉了她的遭遇：一天收工后，精疲力竭的她掉在最后。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了，两旁的山冷冷阴阴的，走着走着，想到自己的一生就要在这山沟沟里打发，她心绪极为低沉。这时，冷不防一双肮脏的手从后面紧紧抱住少女丰满的胸部，姑娘惊吓得大叫起来，本能地挣脱往后一看，竟是天天安排出工和叫大家读毛主席语录的生产队长。在这个小寨子，生产队长是说一不二的人，是掌握知青命运的主子。姑娘又气又怕，连锄头也不要了，哭着跑回寨子。这事也不敢对人说，第二天一早就搭车回城了。

听说这些事情后，我不由联想到自己的困境：病了别说没钱医，连粮食供应也没有，卖苦力也没地方敢要。前几天几位同学商量着打算赌气挑黄泥到城里大街上去卖（当时最让人瞧不起的活路——老百姓用黄泥拌煤粑），现“革命青年”的丑，但又怕被定为向“红色政权”示威，给抓起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日子怎么过？还让人活吗？一时激动，奋笔疾书，给全省的最高统治者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亦农将军写了一封上告信。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听了毛主席的话下农村的,可是去了后遇到很多问题没人管,女知青受到欺辱也没地方申诉(列举事实),容忍这些现象是对毛主席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破坏……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极左的“红色恐怖”时代,我怕连累家里和同学,这事没对任何人说起,连底稿也不敢保留,只暗地对受委屈的那个要好的女知青说:“我写了一封上告信,给你出气!”说这话时,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有的男子汉气概。

实际上,当时知青在农村造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已引起中央关注,甚至有些地方的知青和农民还形成了敌对情绪,我们县还有爱读哲学的新知青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小组”来对照现实(当时传说这也是引起公安部门注意的“反动组织”)。我的信,就是在积重难返的知青问题已受到中央重视的时候,送到了兰政委手中。兰政委根据中央关于处理知青问题的精神,很快作了批示,下面各级自然也就不敢怠慢了,于是就有了来人找我去公安处的这件事。

来到公安处,见到了身材魁梧的王组长——地区专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他一脸的严肃相,拿出几张纸在我面前晃了晃:“这是你给兰政委的信?”我抬头一瞄,信的前面加了两页,上面盖满密密麻麻的十多个公章。王组长拿着信看着窗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兰政委很重视,亲自批示了。”接着,他回过身来让我坐下,问起了知青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公安处出来,我心里很不平静,一场惊虚后才明白过来:这件事情害怕的不应当是我,应该是别人。这别人是谁?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最讨知青们恨的县知青办的王主任,今天应该整治他一下了。于是,大踏步朝着与公安处比邻的县政府大院疾步走去。我用力推开县知青办虚掩的门,矮胖的王主任端着茶,拿着一张报纸,皱着眉头,坐在那张堆满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办公桌前。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一看见知青就不耐烦,今天我推门的动作大,更是惹得他满脸不高兴,抬起头来瞪了我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他的报纸。

“喂——”我连称呼也不叫,直接冲着管我们的这个人喊道,“我们因病不能在农村劳动的问题,你解决不解决?知青在农村的困难,你管不管?”

“你又来闹了,我有本事解决吗?我管得了吗?”像以往的回答一样,这位主任理直气壮,而且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那你当这个主任做什么?”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声反驳。

“又不是你让我当的,你有本事把我撤了!我才不想干呢!”王主任这句话的语气虽然低了一些,但仍然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

我尽力压住气,也故意放低了声音:“知青问题多次找你不解决,好了,现在有人过问了……”

王主任听到这句,抬起头来懒洋洋地看着我,做出一副不屑相信的样子。我盯着他,

一字一字地吐出来："兰——政——委——过——问——了。"

"什么？"他耳朵动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

我做出神秘的样子对着他："省革命委员会兰亦农政委亲自过问了！"说到"省革命委员会"和"兰亦农政委"这两个名称时，我故意提高了声音。见到这位主任仍然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我又放低了声音接着说："我把我们的问题写了一封信反映给兰政委，兰政委很重视，亲自作了批示，责成公安处和我们县革委的领导处理，刚才公安处的王组长找我进一步了解情况。知青问题，我掌握的当然没有你的多，现在是特地来找你收集些去汇报。"

"啊！是这么回事，你咋不早说呢？坐下，慢慢说。"一下子，不可一世的王主任变得客气起来，还站起来去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真的给我讲起了确实应该需要上面解决的一些问题。我像模像样地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假装认真地记着，仿佛我是上面派来调查情况的人似的。一时间，我和眼前这位主任的位置来了个180度的颠倒——小学一年级当班主席、六年级当少先队大队长、初二当学生会主席的锻炼，让我能够用语言制造气氛，控制氛围。这本事别说是从乡下上来的王主任，就是很多当大官的，也未必具备。

我怀着沾沾自喜的心情离开知青办回到家后，冷静下来对发生的这件事又从头反思了一遍，想到开始公安来人拍门的情景，确实让人害怕：幸亏兰政委理解知青，是个通情达理的好领导；如果上告信落在一个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铁石心肠的人手里，先问一声家庭成分，再随便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后果不堪设想……1957年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的还少吗？洋洋一大篇上告信都是对现状不满的话，还揪不出问题来？冤死鬼再增加我一个，也不过是九牛多一毛而已。仔细掂量，以后这种事还是不干为妙。我也看到，虽然兰政委和一些领导都重视了反映的问题，但知青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改观。这事发生后不到一年，我们几个有病的知青被知青办带去会诊复查后，倒是办了回城户口。我知道，自己的上告信没有那么大的神通，而是全国都在着手解决知青问题了。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写的一封上告信，犹如丢到水中的一块石头，居然还激起了一点涟漪。它，在我刻骨铭心的苦难知青生活中，重重地加上了一笔。

作者简介

赵永智，男，1949年生，贵州省安顺市人。1965年9月，初中毕业下乡到贵州省安顺县詹家屯公社苏吕堡大队，1971年招工进厂，后录进政府机关工作。电大毕业，曾兼任电大领导科学基础、企业管理等课教师。1997年根据政策主动申请退休，时任安顺行署外经委办公室主任。

大竹四题

韩子渝

离开大竹已有整整26年，可大竹的山、水、人、事，无日不在脑海中出现。

赵家山

1969年1月，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已上山下乡四年，是到的四川省达县专区"通南巴"的通江县。家里商量着把我从通江的林场转来大竹县插队落户，原因是表姐也下乡在大竹欧家林场，好有个照应。哥哥来联系过，这边答应接纳，把我安置在一大队三队——赵家山。

欧家是大竹最南端的一个公社，紧贴华蓥山余脉，与邻水县普新场接界。两个乡场都不大，相距仅300米，汉渝公路穿场而过，在不通铁路的当年，交通算是相当便利的了。

赵家山不在坝上，它刚好跨在近坝的一匹山梁上。一个队分前中后三段：前山向阳，坡地为多，赵姓占众；后山背阴，水田为主，黄姓居多；中间则山石嶙峋，杂林交隔，数家外姓，点缀其间。翻山60里，可达广安地界观音阁。

我不是直接从重庆下来的新知青，所以没有安置费，要通江出钱，几无可能。但大竹这边要盖房，要购置农具、生活用品，不能没有这笔钱。最后，家里凑齐这笔钱。人到了，钱交了，赵家山的人口又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姓。

小　屋

我至今没记住我居住过的小院地名叫什么。"前山"叫赵家山，"后山"叫沟里头，中间呢？不清楚。只记得中间外姓有七家，散居四处：一处陈、唐两家，一处周姓一家，一处

张姓两家，再一处便是我和老林两家。

队上暂时将我安顿在老林的隔壁住下。这是一间保管室，左毗林家，右邻一间教室。

保管室仅有六平方米，四壁土墙，居中一个单扇木门，推开，完全一间“桶屋”：无窗，黝黑，顶上一匹亮瓦，“拣”进来一点亮光。进门左手是一眼柴灶，不高，齐腿，二尺见方，两边靠墙。灶门对角两步，便是我睡的大床。床是木的，有帐架，挂上纱帐，终年不取，算是既避蚊虫，又挡柴灰。床前一张如今女儿弹琴坐的琴凳大小的“桌子”，上面摆着小油灯、钢笔、墨水和《诗韵集成》、《龙池山馆诗》一类读物，还有吃饭的碗筷、炒菜的油瓶。屋门开不“繁”：一是会碰着“桌子”，二是门后还有水桶和锄头、蓑衣、斗篷。水是用完一挑，再担一挑，经过一块“望天田”，到200米外张姓宅子边水井去担。不知何故，后来我每读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句，便要忆起这块望天得水的孤田。



左边戴眼镜者为本文作者

队上要给我盖新房，说了三年，直到我离开都没有建，原因是他们请来“风水”先生看地形，放了罗盘，说对面的山太恶，压住的。而往别处建，我又不愿意。我喜欢小屋环境的幽静和屋后雨打芭蕉的情趣。

离别小屋三十多年了，可我时时忆起它。小屋的挑梁搁板上还放有我的一口木箱，箱里存有我“文革”时天天在街上买下的好几百张各派小报。那上边记载了我亲历的一段历史。那年夏天，从通江回大竹，第一次回了赵家山。小屋连同林家宅子和教室，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据说是毁于一场大火。木箱、报纸都不见了，可小屋，和在那里烧柴弄饭、豆火凝眸、挑灯读书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底。

昌 友

昌友是赵家山中间几户外姓中陈家的男主人，当年就三十来岁。我认识他是在保管室住下的第二天。

那天一早，我随前山过来的社员一道进后山出工。这是农历四月底，春寒料峭，为整办水田，以备插秧，全队男女老少都下"水"，铲田背坎。

去沟里头要走七八里路，顺着一条简易水渠，一直走到黄家院子。从位置上看，赵姓和黄姓刚好群居在这个队的两头，加之又是两个大姓，平时做活路基本上是各负其责，只有大活路才拉拢来干几天。所以这天外头的进了沟里头，好久不见，格外亲热。黄家院子的人端凳让座，倒茶递烟，礼性得很。

没坐多久，人们就被队长撵下了田。四川不少农活内容雷同，但工具有别，操作也见差异。比如"搭田坎"，都是取泥堆坎保水，有的地方是单人用耙，坎上操作，有的地方则双人拉板，坎上水中，合力而为。"铲田背坎"这活路整个川东地区差不多，人站田里水中，用锄、铲把水田背坎上、石缝中的野草、肥土铲下水里，沤作田肥。这活儿我在通江干过，二话没说，跳进田里，"呼哧呼哧"干了起来。好一会儿，才发现站着看我的人不少，远处，也感觉得到指指点点的手和眼。

"你还蛮在行也！看把裤脚打湿啦！歇口气嘛！"声音传处，一张和气的脸上，一双善良的眼睛，那是一大早我在地坝里瞧见过的。听得出也看得见，他对我的赞许和心疼。于是，歇气——再铲——收工。这天的晚饭就在他家吃了。他家就在保管室的对面坡脚，要从望天田过。

陈昌友一家六口人：父母、他、妻子和一女桥芬、一子桶儿。昌友勤快，农事熟谙，且臂力过人，二三百斤的树木一耸肩就走了。他教我在自留地上提倒土，点麦子，撒墙泥巴。就因为撒这带硝的墙泥，每年我二分菜土上的麦子长势茁壮，收成不菲。路人备极赞许，连广安观音阁过来赶场的人也指点称道"知青的麦子"。昌友粗通文墨，爱看古书，"之乎者也"不时冒出口。他不让我干重活，家中消受油荤（这在当时颇不易），总不忘喊上我，坐上桌子后死劲往我碗中夹。他把我的下乡看成"遭罪"，两三年过去了，知青们都看不清前路去向，他比我们还忧虑，时时叹息。后来，他劝我同意队上把房盖好，要为我提亲，说"成个家算了"。他的真诚，至今难忘！

我离开大竹的时候，桶儿还小，东跑西跑，可以办点上坎来请我下去吃饭之类的事了。昌友一家单传，他父亲有他一个，他有桶儿一个。舐犊之情，可想而知。那年回赵家山，听他说桶儿大学毕业，分在万县师专教书，也安了家，而老人已过世。我既高兴，又心酸。人事代谢，原本如斯。我在昌友家落座不久，又吃了那两年吃过无数次的荷包蛋，但这次不是婆婆煮的，是桶儿他妈端来的。

春　华

春华，是邻居老林的女儿。我到赵家山那年春华已经快四岁了。



我到保管室放下行李那天上午，没见她的影儿。天擦黑，她来了，是随她妈妈来的。她妈妈给我这个新邻居端过来一大碗咸菜，在屋檐口举行的“交接仪式”。她胆怯地抱住妈妈的双腿，只歪着个脑袋，睁着一双大眼盯住我。这双眼睛我印象太深了。以后我无论多少次回重庆带糖带衣服给她，逗她笑，都无法抹去我对这双眼睛的最初理解和最初“拍照”。

春华一家太穷了。她父亲老林是中国农村那种寡言少语、老实巴交、拼命干活，最后不知哪一天倒下不再起来就算寿终正寝了的农民。他没上过大竹，没下过邻水，更遑论重庆这些“大地头”了。他跟我一摆龙门阵，就眯上眼睛，称重庆是“大地头”。

他身材矮小，骨瘦如柴，却拖着比他更多病、终年咳喘的妻子和两个弱不禁风的孩子。那年头土地上没啥收成，“割资本主义尾巴”，鸡鸭之类农副业明明可以换几个盐巴钱，可老林他是不敢搞的，活生生在死亡线上挣扎。吃不饱，卫生条件差，好几次他老婆病得几天起不了床，我送药过去，才稍见好转。我真担心哪一天老林他这个“全劳动力”倒下了，这一家人该怎么办！我想象得出，但又不敢想；不敢想，这些念头偏要钻出来。

老林自己解释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信了看罗盘的人的话：这宅子地势不好，对面山势太恶，把人给压住了。老林下决心要改变这面貌：一、他开始积攒钱要建宅搬家；二、他把春华“抱见”给了我（即给我当干女儿）。“春华”，是我给老林女儿取的。当时我正看一本书，上面有武则天两句诗：“春华明旦旦，秋实乐融融。”“春华”叫惯了，赵家山的人反而把孩子的本名忘了。时隔六年，我的女儿诞生了，取名冬黎。以四季嵌名，应该说多少是有些联系的。那年回去，让昌友带我专程去了老林家，他搬到当年水井那边去了。房屋破败依然，春华早已出嫁。我塞给老林 50 元钱，让他转交给春华。

作者简介

韩子渝，当代作家，重庆长寿人，生于 1949 年 11 月。1962 年至 1965 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后在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大竹县务农八年。曾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重庆师范大学学习，本科毕业。高级讲师。先后从事教育、教研、新闻、督学工作。有《图绘史记》、《近代爱国诗人诗作赏析》、《读古指南》、《童心看世界》等专著出版。另有《谈“转注”》等三十余篇文史论文发表。



知青兄弟

李胜宇

我与"驼背"

"驼背"比我大三岁，身材也高出我一大截。下乡以后，我与他的经历颇多相似之处，也许，这正是我与他相识并成为好友的缘分。

"驼背"是万晓农的小名。"驼背"小名的得来我无从知晓，只知他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便有此小名了。

我认识"驼背"是从"青训班"(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开始的。

1965年6月我从成都七中初中毕业，在全国及四川省知识青年模范人物董加耕、邢燕子、孙传琪、巫方安等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感召下，自愿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申请上山下乡。同年9月，我和许多自愿申请下乡的初65届、高65届毕业生来到市政府和团市委共同举办的"青训班"学习。我参加的是青训班第四期培训。当时，青训班按东、西城区组队，我被分到东五中队。"驼背"便是我们的中队干部之一，任副中队长，集合整队是他的职责之一。当时我个头特矮小，而"驼背"身材高大壮实，他一米八几的高度在我眼中如巨人一般。每次集合站队，我总是在第一排第一位，看"驼背"得昂头向上，才能看见他硕大的头。"驼背"人高马大，脸盘也大，大鼻头上架一副大眼镜，我总觉得他的五官眼、耳、口、鼻均要比我的五官大许多，尤其显眼的是拥有一个又长又大的下巴，有点像列宁的下巴，当然没有列宁下巴上那呈倒三角形的胡子。在我的眼中，"驼背"的长相特像个领袖人物。

青训班实行半工半读和军事化管理。学员培训期间，凡学习、大会小会、劳动前后、

吃饭以前均要集合整队,唱歌呼口号。每次集合,"驼背"均是指挥官,由于我个头小,当队伍成横排站队时,我便是左边第一位,常听不清"驼背"的口令,仅能看见他那大下巴,凡向左转、向右转时,"驼背"的下巴总要向转的方向摆动,那就是我左右转动的方向标。

到青训班参加学习劳动半个月后,得知青训班全体学员要参加成都市1965年10月1日的国庆大游行。从9月中旬开始,学员们除上午学习、听报告、讨论外,下午多半是集合、整队、练方块队列的行进。

记得一天下午集合时,我看见地上有一根断成两头的电线,觉得好玩,便用左手捡起电线的一头。再用右手去捡另一头,突然,全身一麻,眼冒金星,我腾地一下被弹得躺在地上人事不知。几秒钟后,当我醒转来时,看见学员们围在我身边,尽是惊慌的脸和眼睛,在这些惊慌的眼神中,我看见了"驼背"那大大的颇具特色的下巴和充满关切的眼神。众人见我已清醒,均庆幸地说:好在没有出大事,否则,李小娃(青训班高65届大哥们给我取的小名)就完了。原来,那是一根断头而带电的电线,好在我用右手去捡另一头断线时,手指仅刚接触线头,通电瞬间一弹,右手便脱离了线头,否则,我于16岁时便见阎王去了。

方块队列行进训练半月后,我觉得在"驼背"的指挥下,我们中队的方块队伍走得真是整齐极了。

1965年10月1日,成都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第四期学员全体参加成都市国庆大游行。我们上穿白衬衣、下着蓝下装,颈上围着白围巾,背上背着草帽,在前导标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引领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通过人民南路广场,接受省市领导们的检阅。

据说,我们昂扬的斗志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当场被成都市建工局领导们看中,认为这么好的队伍下乡当农民太可惜。他们向市委、市府领导申请,要求把我们招入亟需人员的市建工局所属的各建筑公司当工人,充实成都市建工力量。

果然在当年11月,我们东五中队全体学员意外地进入成都市第三建筑公司当上了建筑工人。市建三公司的领导把我们当成了宝贝,对我们寄予了厚望。三公司工会主席祝谦逊第一次给我们讲话时就说:"公司很看重你们,我们的老工人很多至今都未办工作证,而你们一来就办了工作证就是证明,希望你们好好干!"

到市建三公司后,我们仍是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住行。饭前、会前、上工前仍要集合整队唱歌呼口号。"驼背"仍然是我们的中队长。在"驼背"等干部带领下,我们最先参与的劳动是三公司驻地的路面维修工作。

成都市建三公司成立于1965年初,当时三公司本部设在九眼桥附近致民路的一个大杂院内,因组建仅一年,设施设备还相当不完善。

一进公司大门，路面及院坝内场地均很破烂，我们十分卖力地参加修路工作。当路面修好后，全中队集体参加了砌墙、勾缝、抹灰浆等技能培训。技能培训结束后，公司又把我们分成砖工、机械工、抹灰工、架子工等小组，配备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我们。

我被分到架子工组。当时建筑工地修房用大南竹搭架（不似现在的标准钢构件），带我的师傅姓颜，年龄有四十余岁。有人说："李小娃个子这么小，学啥子架子工"。颜师傅看来很喜欢我，他说："别看他个子小，但灵活，爬架子正合适。何况，他以后肯定是要长高的。"见师傅帮我说话，我心里很感激他，下决心要好好干。1965年12月底，我们小组到位于牛市口的红旗铁工厂修厂房，我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干得很是卖劲。

到了1966年2月，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全中队市建三公司正式工人又回到了青训班。当时我年纪小，也不太关心周围的事，并不知道为啥子不当工人又回到青训班，只知道跟着大伙走就是了。后来才听人说：我们这期学员中也是有领导层的（即四期学员部的头头们），因为他们到市委、市府坚决要求说：我们是要上山下乡干革命的，不应留在城里当工人！市委市府领导无奈，各建筑公司领导更是无法。于是，我们在"驼背"等中队干部的带领下，全中队又整齐地回到青训班。

转眼间，1966年春节即将来临，青训班要组织文艺汇演。东五中队以"驼背"为首的几个高六五届大哥们编排出话剧《东山血泪》，反映龙泉山区抓壮丁的故事。剧情是：解放前夕，国民党为扩充兵源抓壮丁，连十三四岁的娃娃也不放过，一个叫"水娃"的娃娃被国民党"丘八"抓了壮丁，因不忍与母亲分离，他多次逃跑后又被抓住并押往前线，后来在半路上，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打退了"丘八"，解救下水娃及壮丁们。

"驼背"既是导演、编剧又是演员，他自然是出演共产党游击队的领导。我有幸被"驼背"及其他编剧选为演员出演"水娃"一角。整个剧中水娃除有许多在舞台上逃来逃去、跑上跑下动作外，仅有一个字的台词，即最后被"丘八"们抓住与母亲分离时，演母亲的演员凄惨地大喊："还我儿子！"此时，水娃则哭着大叫："妈！"说也奇怪，我无论如何不能入戏，不管"驼背"和导演们如何启发、诱导，我整死也喊不出那个"妈"字。无奈，最后决定在正式演出时，当"我"被两个国民党"丘八"拉着，只管摆出一个挣扎的造型，幕内一人帮我带着哭腔喊出那个要命的"妈"字。

这是我在舞台上扮演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角色。

1966年春节过后，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正是过大年的日子，也正好是我17岁生日，我和八名东五中队学员，上山下乡到成都市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二队当知青。

"驼背"也是那天和我们同时出发下的乡。他到的是与红花二队一山之隔的龙泉区茶店公社石经九队。

石经九队位于龙泉山著名古寺石经寺背后，"驼背"与"鱼皮"（大名王帮跃，也是高

65 届知青)同在一个知青组,他们的住房正对着石经寺后面巨大的柏树林,"驼背"是他们组的组长。石经九队与我们红花二队仅隔一匹山,从红花二队知青点到"驼背"处仅十余里山路。在下乡的头几年(1966 年至 1971 年)知青之间常串队走人户,石经九队是我走得最勤的知青户。

因为我比较勤快,又喜欢炒菜做饭,每次到"驼背"的知青组时,便帮他们择菜、淘米、洗红苕、做饭炒菜,故很受知青们欢迎。每每吃完饭后,大家便各自端根板凳坐在石经寺后面巨大的柏树林藩下谈天说地,很是愉快。"驼背"、"鱼皮"及其他几个知青,都是高65 届的大哥,据说早在七中读高中时,"驼背"与"鱼皮"等人就开始诗词、小说、剧本的创作了。每当他们引经据典、谈古说今大摆龙门阵时,我便是忠实的听众。"驼背"性情稳重、思维活跃,早在那时,他与知青大哥们谈论的话题已经是知青运动的方向与前途,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发展与结局,中国农民之命运等大事了。而此时的我对政治问题毫无兴趣,思想认识尚处于混沌未开状态,对于他们忧国忧民的谈论与有时激烈的争论,我完全插不上嘴,仅凝神细听而已。"驼背"组上的知青"鱼皮"常发感叹:"真是奇怪,李小娃一个初中生,咋和我们这些高中生耍得这么好呢?"可能,当忠实的听众、仔细聆听与勤快是其主要原因。

"驼背"与"鱼皮"下乡时,带了很多书籍,从马列大部头到众多中外小说。每次从石经九队走人户后回红花二队时,我都要满载而归,带上几本书回来读。他们那里简直成了我免费借阅的图书馆。在那段时间,我借读了《儒林外史》、《今古奇观》、《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女贞德》、《草原林莽黑旋风》等各种凡是能借到手的中外书籍。从"驼背"和"鱼皮"等那批高 65 届的大哥们那里,我获得了很多书本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真是受益匪浅。

刚下乡时,我们这拨来往密切的知青们约定:下乡第一年不回成都。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履行了这一诺言,实际上,我们几个最要好的知青均在农村待了两年多后才回成都耍了一次。那是 1968 年春节,我们几位到每个知青朋友成都的家中"团年",吃一顿团年饭。每到一处,各家父母都准备了最好的饭菜,亮出了最好的手艺招待知青朋友,同时,我们还受到各家兄弟姐妹的热情款待。浓浓亲情和无私友情融为一体,那段愉快而幸福的日子真是永世难忘。

1971 年初,当我组的知青们因招工离开红花二队,偌大的知青点仅剩我一个人时,石经九队的知青户也仅剩"驼背"一人。

1972 春节后的一天,我和"驼背"相约从成都过年后共同返回龙泉。在龙泉街上,有朋友对"驼背"说:"公社干部在找你,可能有好事。""驼背"颇有预感地对我说:"看来今年你我两人的命运可能有所改变了。"

果然，回到红花二队后，我也得到公社中心校领导通知，调我到凉风二小任代课教师，"驼背"则被调到茶店中学任代课教师。我二人居然同时调离生产队当代课教师，大概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与"驼背"命运相似还有一个明证。我在长松公社卫生院当医生六年后(此前我仅当代课教师一年)的 1978 年 8 月，因长松公社不能解决我的城镇户口问题，我顶替提前退休的母亲调回成都二十六中。几乎在同时，"驼背"在茶店中学任教六年后，靠当时所谓的"三抽一"政策(即家有三个知青，可以抽一个知青回城)得以调回农科所工作。

凭着"驼背"的能力、才华和勤奋出色的工作，他很快走上领导岗位，先任农科所畜牧兽医研究所所长，后研究所改为畜牧兽医研究院，"驼背"任院领导至今。

"鱼皮"

"鱼皮"的大名叫王帮跃，是"驼背"读七中时高中同班同学，下乡时与"驼背"同在一个知青组，"驼背"任组长，"鱼皮"是组员之一。据说，在读高中时，"鱼皮"最爱吃"鱼皮"花生，故落得一小名"鱼皮"。

"鱼皮"的身材与"驼背"相比矮了许多，整个人也是胖胖的，较圆的脸常常油光光的，大概是"鱼皮"花生吃得多的缘故。他眼睛近视度很高，侧面看他的眼镜片，有无数个一层又一层的圆圈。"鱼皮"的头也是圆圆的，因很早就开始秃顶，擦了无数生发油也无济于事，反而使额头显得又大又光亮。圆圆的额头加上圆圆的油光光的脸，真像是一颗膨胀无数倍的"鱼皮"花生米。

"鱼皮"极好读书与写作，早在高中时代，就开始编剧本、写小说、作诗填词了。他常常手不释卷且不知疲倦地看书，我每一次见"鱼皮"时，他手中未曾离开过书，只要一有空，便在看书。书看得多，头脑里便装满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稀奇古怪的故事。他记忆力特好，给我讲起书中的故事来眉飞色舞，凡故事中的人物、情节、时间、地点均记得一清二楚，很少有说错的时候。"鱼皮"的谈兴也极浓，大凡谈到他擅长的话题时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故事便从嘴里喷薄而出，不给其他人插话的机会。每每讲到高兴之处，"鱼皮"便哈哈大笑，怡然自得，仿佛从无忧愁之事。

"鱼皮"为人豁达大方，和知青朋友在一起从不分彼此，每次大家到他处，他均要慷慨解囊尽力招待知青们。"鱼皮"从来都是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他最愉快之时，往往是吃完饭后搬把椅子斜躺着，手捧一本书一面晒太阳一面说："吃饱了饭晒肚皮，真是快活如神仙也！"

"鱼皮"也常到红花二队来走人户，他来时，我们也是倾其所有，尽量改善伙食接待他。当然我们的条件要差得多，弄出的饮食大不如在他处，但他从未有过闲话。令人奇

怪的是，每次他来，几乎都要碰上半夜三更有社员喊我出夜诊（1968年初我即开始当大队赤脚医生）。1969年12月的一天，“鱼皮”来到我处串门，12月的山区夜里已经较寒冷了。我们几个好友摆完龙门阵上床，时间已是12点过了。对门半山坡上一姓都的社员隔着山坡长声吆吆地“喊”我出诊。“鱼皮”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寒夜，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说：“望山跑死马，何况是晚上，李小娃真是太辛苦了！”

当“鱼皮”了解到我出夜诊的辛苦及“危险”经历后，当即决定将他心爱的小黄狗送给我，陪我出夜诊。“鱼皮”回石经九队那天，我陪他返回顺便去领小黄。回红花二队时“鱼皮”送我，那小黄似乎与我特别有缘，未及旧主人打招呼，它便跟着我一路蹦蹦跳跳地来到红花二队。自从有了小黄，出夜诊也变为愉悦之事了。

小黄对我忠诚有加且情意深重，它陪伴我达三年之久，尤其是在我独守知青屋的那一年，它是我的保护神，也是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小黄的悲惨结局，是我终身遗憾之事。

1972年，当我调到凉风二小任代课教师时，小黄不便带走。“鱼皮”及其他调到龙泉灯泡厂的知青闻讯赶到我家，他们把小黄吊死在树上，将它剥皮熬汤，知青们痛痛快快打了顿牙祭，小黄也物归原主地回到“鱼皮”腹中。我因不忍看他们处理小黄而走得远远的。后来，我没有吃小黄的肉，但仍然喝了它的汤。对于忠实的伙伴小黄的死，至今我常有犯罪的感觉与内疚且深深地自责。

1971年初，龙泉区灯泡厂在全区知青中招工，一下便招走了长松、茶店、大兴三个公社的知青好几十人，“鱼皮”也是其中之一。大部分到厂的知青均作为普通工人，分在烧制玻璃器皿的高温炉前上班。20世纪70年代的灯泡厂刚由街道工业演变为区属企业，设施设备简陋，条件极差。工人劳作几乎是原始作坊式操作，尤其是在制作白炽灯泡时，除手脚并用外，还得用嘴对着空心铁管一面吹气，一面用手不停地旋转，使空心铁管前端沾浮的玻璃液体在吹气及旋转过程中膨大成灯泡状。每次我到灯泡厂看“鱼皮”，走进那条件极为恶劣的高温车间，看着工人们的劳作场面，感觉那环境之差和劳动强度之大，比当知青还苦。

几年以后，龙泉灯泡厂因效益极差而被成都玻璃器皿厂兼并，“鱼皮”得以调到位于成都市同仁路的成都玻璃器皿厂。当时，该厂亟需配方人员，“鱼皮”正好凭借配方技艺，理所当然地成为配方技术员。经多年的磨炼与继续钻研，“鱼皮”在玻璃配方领域已是如鱼得水且小有名气了。他能在原材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有把握地配制出各种彩色玻璃和技术含量很高的双层乳白色玻璃。在成都玻璃制品厂陈列室内，我看过经“鱼皮”之手配方生产出的各种彩色玻璃器皿，如各种形状的花瓶、各种灯具、茶具及桌案小摆件，其色彩艳丽、五光十色、鲜艳夺目，真是漂亮极了。

如今的“鱼皮”已经退休，有一个聪明儿子的小家庭更显热闹非凡……

老　喻

老喻是我所在的红花二队知青户组长，全名喻小庠。“老喻”是大家对他的尊称。他出身教师世家，父母均为教师，他出生在乡间小学故名小庠。“庠”即学校，“小庠”即小学校。

老喻身材不是很高大，但结实有力。下乡时，他带有一副吊环，那吊环在闭塞的红花山村成为稀罕之物。老喻将吊环挂在知青点大门门厅横梁上。下乡头几周，每当早晚他在吊环上运动时，均要引来无数观众。年长的社员见他在两个小小的圆圈上做引体向上、收腹翻腕转体、十字悬垂等动作时，常惊叹不已、咋舌称赞。当然，老喻的那些动作若与专业运动员相比是微不足道且十分不规范的，但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未见过此项运动的闭塞的红花山区社员来说，那已经是十分了不起的了。那些半截子幺爸们看见他的“惊险”动作与运动时肩臂部鼓鼓的肌肉，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下乡时，我组知青点暂设在蒋家老房子。

蒋家老房子位于红花二队地势较高处的一山凹处，屋基坐西向东，背后的坡地向上延伸与红花三队相连。老房子的右侧是一山坡，山坡上长有许多两人来高的小松树，得名松林坡。沿松林坡往上行约两里，有一陡峭似鱼背的山脊梁，人称青龙埂。顺青龙埂向上行，左边是一深沟名红岩沟，因沟内中部有一堵高大的红岩而得名。红岩上方属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三队，红岩以下则属简阳县地盘。踏在青龙埂的山脊上，即踩在成都市与简阳县分界线上，左脚是简阳，右脚属成都。

下乡的第二天，生产队长叫我们休息并熟悉环境。知青们未出工，在组长老喻带领下，我们九位知青沿松林坡爬上青龙埂，竟意外发现青龙埂上有一土地庙。所谓土地庙，不过是一柜子般大小的石屋子，石屋内端坐着一对小石人（一男一女）。社员说，这就是土地爷爷和土地娘娘。小石屋门楣上雕刻有花纹及一行字“青龙土地”。站在土地庙前，我们脚踏成都与简阳分界线，很有一番自豪感。我们九人异常兴奋，扯起喉咙大喊：“龙泉山，我们来啦！”喊声在松树坡及红岩沟内久久回转，余音袅袅……

蒋家老房子在当时的红花二队，是规模最大、修建得也最为宽阔高大的青堂瓦舍。它原是一蒋姓地主大院，正中是一宽大的四合院，院内青石板铺地，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小四合院。解放以后，右边小院由蒋家后人居住。左边小院住有两户人家，一户姓官，另一户姓蒋。男知青住进大院正中堂屋，我们入住时，堂屋内尚有神龛和供桌，巨大黑色的供桌上摆有蒋家祖宗牌位，牌位前还摆有香炉、灰钵等祭祀用物件，高大宽敞的堂屋显得阴森神秘。女知青则入住右边厢房。九个知青入住后，原本阴沉的大院顿显热闹非凡。

蒋家老房子屋后有一大堰塘，夏季蓄满水后能供老房子内人畜用水。老房子前门厅处即老喻挂吊环外面的街沿上有一口深井，井深约八米，其井水系后面堰塘之渗水，井深水也清凉。由于井很深，提水竹竿也很长，取水则全靠臂力。老喻等三位大哥取水毫无困难。我刚开始取水时常显得力不从心。头一次取水就闯了祸：当我好不容易用竹竿抵压水桶将水装满往上提时，因水桶太沉，加之用力不当，水桶在井壁内碰来撞去，终于将桶耳朵撞坏，水桶便从竹竿上滑落掉下井去。望着深深的水井，我急得几乎哭起来。老喻来到井边，一边安慰我，一边查看井壁。最后他决定攀缘下井，将水桶打捞上来。

该深井的井壁是用一块块石头砌就的，口小肚大，要从井口下去得四肢并用，脚踩在石块凹凸处，手抓住石块棱角才能攀缘而下，没有极大的臂力是不能下到井底的，且越往下井壁越宽困难则更大。我们取来两个电筒，照着光紧张地看着老喻向井下攀爬。终于，老喻平安下到井底，把水桶拴在竹竿上由我将空桶提上井，老喻再慢慢攀缘而上。好在他结实的身体和有力的手臂再加之胆大心细的性格，老喻终于安全返回。有了这次经历，以后，连社员水桶掉在井下，也来请老喻帮忙。

老喻为人处事沉着老练、稳重，在知青户很有威信。往往众人喋喋不休争论不已的户内大事，只要老喻一开腔，事情便有了结果。如知青自留地种植内容及日常管理、每日轮流煮饭及后勤工作、每年一次的砍柴等等大事，均由老喻安排。

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砍柴的艰辛。在老喻带领下，每年砍柴均是“全家”总动员，女知青带镰刀和背篼，主要任务是割草、背草。男知青带弯刀和扦担，主要任务是砍马桑和担马桑。因湿柴很重，回知青点路程又太远，对于刚砍下的湿柴，我们均先将它堆放在到知青点半道上的一片枣树林中，待过一段时间晾干后再陆续担回家。每年经两次转运(老喻及大耳朵两位大哥出力最多)后，当知青户门前柴草堆积如小山、一年的烧柴足够时，大家的心情才能安稳下来。

每年的砍柴任务意义重大且艰苦异常，但苦中有乐，故记忆犹新。当年知青们砍柴的劳作场面还经常出现在我几十年后的梦中，可见其烙印之深刻。

老喻话语不多但多才多艺。他会拉小提琴、弹月琴，尤其笛子吹得特好，具备专业水平。下乡的头两年，在农闲或“扎雨班”的日子里，喜欢音乐的知青们拿出各种乐器，如小提琴、月琴、笛子、口琴等吹拉弹奏，知青院内便叮叮咚咚、咿咿呀呀，乐声一片，歌声一片。逢年过节大队联欢，知青们的独唱、合唱、表演唱均大受欢迎。老喻的笛子独奏更是成为每次联欢的压台节目，常要加奏好几个曲子才下得了台。

1971年初，老喻以知青身份调到龙泉区茶店公社。其时，遇事不慌、冷静沉着的老喻在漫不经心时，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那年，我曾到茶店公社探望老喻，来到老喻与爱人卿丽安家的茶店公社红旗大队，那极其简陋的知青家庭一览无余，几乎未看到一件

像样的家具。看着老喻那刚刚出生不久的女儿，环视寒酸的知青小屋，心里有一种酸涩的滋味。但老喻仍是一副沉着镇静的表情，仿佛从未对贫困的"知青家庭"有过忧愁。

同年八月，老喻调入四川师范大学师训班学习，八个月的学习培训结束后，老喻调到茶店中学任正式教师。直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辛苦的老喻和爱人卿丽才得到机会，先后调回成都中学任教。当举家迁回成都时，遇事不慌的老喻已是有两个女儿的父亲了……

作者简介

李胜宇，1964年毕业于成都七中初中。1968年1月到成都市龙泉区长松公社红花二队落户。后成为农村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医生。1978年"顶替"回成都，在成都二十六中工作直至退休。



扎　根

金　霆

下　乡

许多年来，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一个故事，一个用我的青春和汗水书写的故事，一个让我走进去说啥也走不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青年点、扎根农村。这个故事的领衔主演是我，而联合演出的则是同在那片黑土地上摸爬滚打过的青年点的兄弟姐妹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间是 1965 年 9 月 2 日。

在这个日子之前，我是一个心高志远的高中学生。说是志远，不过就是将来想当一个工程师，因为我的父亲就是一家设计院颇有名望的工程师，耳濡目染和子承父业的双重刺激，让我觉得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既是顺理成章的佳话也是志在必得的远大目标。

1965 年临近高考，我也没有如临大敌般地紧张，以为清华、北大咱不去撩碰它，考个什么工学院应该是手拿把掐的好戏。于是照例轻松地复习功课，而后是轻松地参加考试，再后是轻松地回家静候佳音。

然而佳音却没有候到，我落榜了。

当时高校录取学生是暗箱操作，考试分数并不公布，所有的考生都蒙在鼓里，考中的和落榜的谁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于是每当高考发榜，便常常爆出冷门来。一些平时学习名列前茅的考生榜上无名，而一些平时学习"打狼"的考生却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成了这届高考的黑马。人们在感叹考试无常之余，便以为这无常现象的出现定是因为落榜者的意外失手和考中者的超常发挥。但我自己清楚，考场中我并没有大的纰漏，即便有些意外失手也决不会败在即使超常发挥了的黑马们手下。

榜上无名，我知道是败给了祖父的地主成分和父亲的历史问题。祖父是个中医大夫，大概是手头有些积蓄，便陆续买了一些土地，于是就给他自己也是给他的子孙买了个倒霉的地主成分。父亲则是在庄河县政府做技术工作。日本投降后，共产党的一支小武装进入庄河并成立政府，父亲继续留在新政府里工作。时间不长，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庄河。父亲就跟随共产党撤退转移，过一条河时遭遇敌人被打散而被迫转回庄河。不久父亲又被威胁去国民党政府上班，并被哄劝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大概是觉得情况不妙，没过几天父亲就悄悄地举家离开了庄河。但是到了最后情况还是不妙，父亲这一段阴差阳错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背叛革命行为，其人则被定为控制使用的对象。

一个地主成分，一个家庭问题，成了我考取大学的拦路虎，那年头的大学明明是招考学生，却不以成绩取人，反倒是先看看你的家庭出身，看看你的直系亲属和社会关系有没有问题。学校成立了政审办公室，先让学生们填表自报，然后四处外调，耗神费力地把每个应届毕业生的家庭情况查个水落石出。被查出问题的，前途便凶多吉少。这一招数的厉害之处在于，政审的结论并不告诉考生。于是，那些还没进考场就已经被淘汰出局的考生仍然在满怀信心地走完高考全过程，然后在最后时刻猝然倒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什么部位被一枪击中。一不公开、二不公正、三不公平的招生制度遮掩了当时主宰全社会的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阶级株连政策在招生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也完全剥夺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体考生的知情权。不知情便容易带出傻相，名落孙山的我依然笃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是读书的路已被堵死，我的道路在哪儿呢？

此时我的眼前还有三条路，我正站在三岔路口上。一条路就是来年再考。一位教过我语文的杨老师就关切地劝过我，让我再考一年。但我心知肚明，如果来年再考难免不会历史重演，那就白费了工夫。另一条路就是留城就业。当时就业虽然不易，但凭着我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上的三大优势，进工厂，去商店应该不是难事。根据以往的例子，一个男性高中毕业生等上个三五月，一般就会有个上班的地方。当时人们把等待就业的年轻人叫社会青年，社会青年由公社(街道办事处当时叫人民公社)的一个部门管理并分配就业。社会青年每日要到公社参加学习，或者干点临时性工作，一直到分配就业那一天。可是我不愿意去学习，让公社干部呼来唤去，挤在弱势群体当中；也不愿意只是为了谋生到工厂或商店去上班。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专门针对初、高中毕业生而发。解读出来就是你先去考试，考上了，你的心是红的，你就去上学；没考上，你就去上山下乡，心也是红的。没考上又不下乡而留在城里就业的，心是什么颜色，口号里没有说，那就有可能不是红的。我知道我的心是红的，也希望别人相信我的心是红的。

我没有选择来年再考和留城就业这两条路。站在三岔路口，我一眼就相中了上山下

乡那条路，尽管那是一条路僻人稀的路。

上山下乡喊了许多年，从邢燕子喊到董加耕，再喊到侯隽，到了此刻，已经喊出了一个高潮，也把上山下乡喊到了一个让人心跳的高度。上山下乡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安排城镇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而是一个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大问题，一个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的大问题。让我情绪高涨的还不止这些大道理。有一个叫黄宗英的作家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充满感情地讲述了北京高中学生侯隽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特别经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感动了不少青年学生。"特别姑娘"便也成了我的榜样，我觉得也能像她那样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但是我要报名下乡，却遭到亲友团的强力反对。母亲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农村太苦，农活也太累，而你身体从小就不太好，可怎么受得了，罪可怎么遭，那是一辈子的事啊。"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个时候我们家算得上是小康人家，父亲虽然被控制使用，但还在高级知识分子之列，所以工资不少，生活待遇也不算差。住的是楼房，做饭用煤气，冬天有暖气，食品上还有少许特供，虽不大富大贵却也吃穿不愁。从这样的环境里下到农村，反差太大，母亲的担心不无道理。何况我身体瘦弱，气管不好，冬天常咳嗽；扁桃体肥大，一不小心就发炎感冒，母亲无论如何放心不下。而我却是执迷不悟，用实际行动回应母亲，马上去医院做了扁桃体摘除手术。要不农村缺医少药，发炎感冒了还真是麻烦。

上山下乡使我们趋之若鹜，让我们从小就被培养起来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不怕吃苦、不畏辛劳的精神有了用武之地。"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震天动地，我们热血沸腾。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自愿报名下乡了。

1965 年 9 月 2 日，这一天是沈阳市全市下乡青年奔赴农村起程的日子，自然热闹非凡。这一年我们学校有 27 人报名下乡，当天起程的是 14 位高中毕业生，余下的初中毕业生计划月末再走。我们胸戴红花，背负草帽，都是一脸的灿烂，一身奔赴战场的豪气。

火车一声长鸣，缓缓启动，我们一下子簇拥到窗口。站台上站满了人群，如林的手臂向我们挥动。我们也伸出手臂挥向父母、亲友、老师、同学，挥向哺育我们长大成人的故乡沈阳。沈阳，再见了！

扎　根

下乡的第六个年头，也就是 1970 年，我在农村结婚了。爱妻叫刘锦秀，是 1964 年下乡的知青，比我早了一年。按进青年点先后论，我应该管人家叫知姐，其实她才是个初中毕业生，年龄还比我小两岁。爱妻和我还是校友，1964 年中考时，报考了本校高中。发榜前夕，她得到可靠消息，说是考上本校了，连分在哪个班都知道了。可是到了发榜之日，却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书，去问班主任老师，才知道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在最后时刻被

刷掉了。问题是出在她的父亲身上。她父亲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军医,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一个政治运动中被关进了监狱。父亲在押,求学无门,锦秀选择了下乡。幸亏这一选择,成全了一个男知青,引出了一段美满的姻缘。

知青结婚一般都很简单,把两个铺盖搬到一起,大礼就算告成。可是铺盖搬出来容易,搬到哪里去却是个问题。房子还没有呢,铺盖还不能轻易搬。要结婚,就得先盖房子,扎根农村干革命还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要盖房子,我却两手空空。下乡好几年了,每年工分挣了不少,但我所在的生产队太穷,分值太低,累了一天,就挣个三角五角的,连青年点的生活费都被照顾免交。几年下来,愣是一分钱都没攒下。没有办法,只有求助父母。想起下乡时扔给父母的豪言壮语,真是有点无颜再求"江东父老"。可是事关婚姻大事,就得厚起脸皮,谁让我是他们的儿子呢。

于是,我想给父亲写封信探探口风。不料却先接到父亲的电报,电文四个字:事急速归。到了家里,我才知道事情确实很急。"文革"期间,父亲也是在劫难逃,先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进行批判和游斗,而后又被送到了地处辽宁省盘锦地区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就在我谋划向父母伸手要钱的时候,父亲接到了下乡的通知。父亲被发配到昭乌达盟(现在改为赤峰市)赤峰县大碾子公社张家营子大队去做"五七战士"。我到家的时候,距离出发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时间越紧,日子过得越快,刚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停当,出发的日子就到了。1969 年 12 月 9 日,我和弟弟陪着父亲、母亲离开了沈阳,父亲八年的"五七道路"就从这一天开始起步了。我是在我们到了张家营子,一切都安顿好以后,才敢把我打算结婚,打算盖房子的事向父母全盘托出的。听我说要结婚盖房子,父亲说:"这是好事,看来我们都得在乡下安家落户了,将来我和你妈也许还要归到你那儿去。盖房子要用钱,到时候给我写信,给你汇过去。"

钱有了着落,房子就算成了一半。1970 年春节过后,我开始筹划盖房事宜。

我下乡的地方叫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村子北面,群山起伏,连绵无尽;村子南面,一条大河从东边的大山里弯弯曲曲地淌过来,穿过村前的田地向西边流去。靠山屯有山有水,算得上是一个好地方。靠山大队下辖九个生产队、三个自然村。前五个队和大队部就在靠山屯,六队和七队在西边一里外的宿家屯,八队和九队则在北边二里外的山沟里。那条沟叫夏家沟,却没有一户人家姓夏。我们下乡务农的方式是插队落户,全大队的知青分配在这九个生产队里,分到哪个队,就是哪个队的社员,同劳同得,荣辱与共,但吃喝拉撒睡却集中在大队青年点里。同来的李庆禄、刘恩义和我被分到九队,说是九队一穷、二乱、三艰苦,所以女生不宜,初中生也不宜,就打发三个高中生去遭罪。

罪遭了好几年,临到结婚成家立业,罪还得继续遭,当然房子就得盖在夏家沟,盖在

九队的地头上。社员陈玉生盖房子很有一套，主动过来给我当顾问。陈家是大姓，陈玉生排行老六，我们知青都管他叫六哥。六哥给我出主意，说："杨林山家东边那块地不错，你就在那儿盖房子吧。不过那是人家的自留地，丑妻近地家中宝，就怕杨林山不肯让给你。"不料杨林山还挺爽快，知道我盖房子，就说："你在那儿盖吧，这回咱们还成邻居了。"没想到我的面子还挺大，房基地就这么敲定了。然后就是备木料，主要是椽子、檩子和房梁。附近十里八村的山上没有，就套辆大马车，去几十里以外的大山里去砍。说是砍，其实是买。六哥还有三哥陈玉禄他们踏着积雪，在漫山的树林里转悠，相中了哪棵就由卖主砍倒。等到砍够数了，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趁着天黑拉回夏家沟来。

忙活得挺热闹，其实我要盖的就是一个土坯茅草房。当时农村非常贫困，土坯茅草房是当地农民的标准住房。六哥告诉我，房子不能夏天盖，也不能秋天盖。夏天雨水多，摊上下雨土坯就会变成烂泥；秋天又离冬天太近，土坯房子不容易干，屋子会发潮。结论显而易见，我决定春天就动手。可是到了春天，却遇到了大麻烦。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到了，春耕大忙也跟着一起来了。凡是能动弹的人差不多都被动员下了地，人们起早贪黑，地里人欢马叫。大队也推波助澜地发出通知，要求一切给春耕让路，任何人都不准破坏春耕生产。没有办法，我的"安居工程"刚把房架子立起来，就被迫下了马。可是几个社员兄弟却有绝招，指点我说："白天没有工夫，土坯不能打，咱们就垛墙。垛墙用的土贪黑拉，不让用牲口咱们用人驾辕。"主意挺有创意，就是太累人。况且我也没有烟酒招待人家，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没有锅碗瓢盆盘杯勺，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见我说出忧虑，他们来劲了，说："吃什么饭？我们去张罗人，今晚就干。"我感动得差点掉下眼泪。

晚饭过后，二十来个人拉着两驾没有牲口的大车陆续来到我的房场。老哥陈玉贵张罗着分配活，谁驾辕，谁拉套，哪几个人装车，哪几个人卸车，安排得井井有条像个队长似的。我的土坯茅草房工程在这苍茫的夜色中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几天下来，生产队的大豆、高粱没有耽误种，我的"安居工程"进行得也很顺利。可是没有想到，就在房子的四面墙都垛完的时候，大队竟在广播里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谁让我非得在农忙的时候盖房子来了？

大队长来九队检查春耕进度，进了沟，一眼看见了我的房子，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怎么顶烟上？""这是金霆的房子，都是贪黑整的。"小队干部据实回答。"告诉他，房子停下来，种完地再整。"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过了几天，按计划又整了一把。这一整，整出了两个后果。一个是我的土坯茅草房的主体工程胜利告捷，为后面的上檩子、挂椽子、苫房草、抹大墙等等房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一个就是挨了大队的批评，通过挂在家家户户墙上的小喇叭传遍了全大队。

急三火四地盖了房子，我们并没有立即结婚。一直到了庄稼全部割倒，粮食进了场院，我们才商量哪天结婚。“哪天好？”“哪天都行。”“那就今天吧。”还是我拍了板。一看日历，是1970年11月11日。几十年后，有人戏称11月11日是“光棍节”。我就是在“光棍节”那天走出光棍队伍的。

晚上生产队收工的时候，我把打头的（生产组长，领着干活的，相当于副队长）邓玉奇拦下，告诉他晚上我要结婚。打头的大吃一惊：“啥？一会儿结婚？”看见我不像开玩笑，就说：“那好，吃完饭我喊人。”一顿饭工夫不到，哨声响起（每日生产队上工以哨声为令）。打头的一边吹哨一边吆喝：“金霆今晚结婚，吃完饭都去参加啊。”哨声从沟里响到沟外，人们陆续涌到我的新房。男女老少挤了一屋子，都是一边把一瓶油或者一条毛巾什么的放到爱妻手里，一边埋怨：“怎么这么急？事先也不吱一声，连个准备也没有。”我们的新房此时还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家徒四壁，什么摆设也没有，但是却很标准，标准得和当时在农村流行的一首歌曲里唱的一样：“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像。”我和爱妻站在屋子中央，恭恭敬敬地给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行了个鞠躬礼，结婚大礼就算是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我说两句、他讲两句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喜磕，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意。爱妻把夏天挂锄回沈阳时买来的糖果分给大家。剩下的撒在炕上，小孩子们一哄而上，把糖果抢个精光。结婚典礼也就到此结束，大家都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干活，应当早点把来宾们放回家去睡大觉。对我们来说，结婚典礼就是贴了一张布告，告诉人们我们结婚了，要不偷偷摸摸地搬到一块去住，算是怎么回事？

“布告”贴完了，这就标志着我们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结束了青年点的生活时期，迈进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新阶段。在当时，上山下乡革命理论有一个说法，在形式上把上山下乡分成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初级层次。初级层次看中的是下乡，是志愿下乡，是能够冲破一切阻力志愿下乡。第二个层次是高级层次。讲究的是扎根农村，是一辈子扎根农村。这一辈子扎根农村就是上山下乡的最高境界。这最高境界很少有人达到，即便像我们靠山青年点这样的模范点，扎根农村喊得震天响，修炼到最高境界的知青也仅是一人而已。这也不能怪我们知青悟性太差。理论上讲扎根农村意义重大，但一旦去实践，让人感觉扎根农村就是当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重大意义愣是体会不出来，心里就老大的一个不愿意。心胸存有杂念，最高境界自然就修炼不成。所以到了后来，没有结婚的知青便不再结婚，待在青年点里等着抽调；已婚知青也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子辗转回城。

1967年春节前夕，青年点利用冬闲时间，决定对开原县各青年点作一次社会调查，想看一看知青都怎么了。我和两名女知青分在一个组。腊月初八那天，我们到达八棵树公社腰堡大队青年点。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腰堡知青非常热情，又是烧水又是做饭，就

是人少了点。原来这里的知青都回沈阳了，就留他们两个留守。饭后我们正在闲聊，推门进来一个人。腰堡知青连忙介绍："这是我们点的知青，已经结婚了，1962年下乡的，是开原县来的。"来者竟是知青大哥。知青大哥衣着破旧，脚上一双棉胶鞋补了又补，手里拿着一顶狗皮帽子油渍麻花。看来他也是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模范，要是不说，谁也看不出他是一名知青。大哥听说我们来作知青情况调查，竟掉下泪来："知青不能结婚，在点里还好些，一结婚就太难了。盖房子拉下饥荒，孩子小，老婆又不能到队里干活。不怕你们笑话，今年我连棉袄都没做，一冬就穿老婆的棉袄对付。"大哥撩起罩衫，里面果然是一件斜大襟的花布棉袄。我当时立刻傻了，我没有料到知青结婚后会贫困潦倒到这个地步。眼前的现实和我知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具有的全部伟大意义都搭不上界，这是不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必然结局呢？将来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回到靠山，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说出来，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也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乌合之众——我和几个爱想事爱说话的知青。几个人凑到一起，觉得"英雄所见略同"，就打算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并起了个名字叫"指点江山"，意思是说说而已，并不打算回城去造反。另一方是我们青年点领导机构政治组。"指点江山"贴出大字报，就知青的前途问题发表看法。大字报以腰堡已婚知青大哥现状为例，探讨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对我们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对现行的上山下乡工作的政策和方法表示质疑。并且呼吁大家对腰堡知青大哥现象重视起来，探索出一条避免这种现象重演，实现扎根农村干革命伟大理想的路子来。大字报意在抛砖引玉，希望全点知青都来参加讨论，并没有去想得罪政治组。但是政治组却很快做出反应，发表了题目为《两种前途观的决战》的大字报，毫不留情地批驳了"指点江山"涉嫌"回流"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重申靠山知青扎根农村一辈子、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不动摇的决心。1968年12月，全国几百万知青开始陆续上山下乡，连我们青年点也来了三十多个。这就为政治组送来了可以摧毁一切的炮弹，好像是说上山下乡革命道路无比正确，扎根农村前程似锦，要不怎么又有这么多的知青上山下乡？

也许是因为觉得上山下乡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迟扎根，早扎根，迟早都得扎根，不如现在就扎根。也许是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许多人已经老大不小，情窦已开。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在1969年和1970年前后，靠山知青掀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结婚高潮。"文革"之前下乡的46个知青，有27个人盖了房子，"贴了布告"，把行李卷搬出了青年点，开始了纯正的农民生活。这其中有7个能干的小伙做了贫下中农的姑爷，4个漂亮的姑娘做了贫下中农的媳妇，他们不但实践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目标，而且也兑现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誓言。一时间，男女知青相继结婚，成了靠山大队一道百年不遇的风景线。

1971年，也就是我结婚的第二年，事情起了变化。谁也没有想到，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宏图大业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开始抽调知青回城参加工作，不过已婚知青却被剔出，不在被抽调之列。春风吹到靠山，青年点一片沸腾，抽调走的兴高采烈，没有走的备战未来。一些原先准备结婚的知青吓得直伸舌头，心里说，好险！好险！从这时候起，知青结婚的"布告"开始销声匿迹，原本以为扎根农村的知青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没想到此刻却后继无人。上山下乡让我越来越看不明白。让我最不明白的还不在这儿，而是其成员几乎全部都在农村结婚扎根的政治组。到了1974年纪念靠山青年点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政治组还在发表文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其实这篇文章有点对牛弹琴，未婚知青原本都在坚持，不过不是在"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而是坚持不在农村结婚，坚持一定要等到抽调回城时刻的到来，不让坚持都不行。对于我们已婚知青来说，抽调回城没有份，坚持不坚持，都得坚持，根本不需要谁来鼓励和加油。好些年以后，忆起我们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忆起腰堡大队那位知青大哥，我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知青大哥已成婚，身着花袄挂泪痕。可叹仍怀凌云志，一样扎根步后尘。

打油诗有些自嘲，实际是感叹一段悲壮的史实。我们冲破阻力，志愿下乡，原本轰轰烈烈可以载入史册的壮举，到头来不过是把城里剩余劳力成功转移到乡下的把戏。一群壮志如云、战天斗地的青年却步了穷困潦倒"知青大哥"的后尘，也许这就是"文革"以前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意，只是我们原先没有看到或者明明看到却不愿意正视而已。

作者简历

金霆，辽宁省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知青。1965年高中毕业于沈阳市第二十九中学，同年9月下乡插队落户，1970年在农村结婚安家，1979年被安排到开原县公路养路段参加工作，1982年调转到沈阳市灯头厂工作，2006年退休。

打　桶

李　炜

我的青春有六七年的时间，都丢在了农村，丢在了四川东北部宣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老山里。因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我曾经留下脚印的地方，犹如一个女人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她的第一个男人一样。大巴山那个地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刻骨铭心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烙印。

有件事相隔近四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1968 年底，"文革" 中风雨飘摇的林场彻底散伙，知青们自由组合，或三三两两，或单枪匹马到本公社的各生产队插队落户。1969 年初，我和我们林场的知青唐忠勋到了新农公社六大队离公社最远隔芭蕉公社最近的一个生产队——大田边，插队落户了。那里山高树多，田土贫瘠，年终分配自然也不理想。于是我们望着那片绿油油的山林，突发奇想，将一棵杉树，在 24 小时之内，就把它变成了一挑粪桶。

谁没有见过木制的水桶、粪桶一类的东西？然而真正见过木桶的半成品的人却不多，亲手制作者，就更是寥寥无几。而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当中，在那个插队落户的地方，特别是什么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去懵懵懂懂地亲手打桶者，更可谓是凤毛麟角。也许是出于无聊吧，或者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对什么事都觉得新奇的原因吧，那一天我们俩望着自己屋后那翠绿的青山，看着挺拔粗壮的杉树，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打桶的念头。如果打得好，还能换成钱呢！要说木工这活路，也不太难，只要有工具，脑袋瓜子灵活就行。以前我们在林场的时候，可以说百分之六七十的男生都会做木工活，而且根本就不用拜师傅，抡起锯子会锯，拿着推刨会推，做出来的家具中看还耐用。至于把杉树做成水桶，应该说这是一个新奇的想法，但越是新奇，就越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乎

说干就干,并且立即开始选树了。我们三步两步就到了杉树林,其实离我房子最近的一棵杉树,也只有十米至二十米远的距离。我们相中后经过商量,决定晚上出来把它偷回家。白天也不是不敢偷,只是担心影响不好,晚上似乎要好一些,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公开地站在农民的对立面,避免扩大知青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天黑了,我们等待着。眼看着农户家木格子小窗透出来的微弱灯光一个一个地都熄灭了,我俩拿起了斧头和锯子,很快就来到了白天选好的树下。周围的茅草将手臂都割出血了,然而我们却一点也不在乎,蹲下来就开始拉锯。我俩一人蹲在一边,拉锯时的胆怯与兴奋,再加上对成功的期望值的不断增加,方方面面的因素糅合在一起,心里面竟然像蜜一样的甜！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体会不出来。

有人会问:当知青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这是“文革”期间毛主席定下来的调子,是任何人都不敢违背的最高指示。劳动就劳动呗,你打桶干啥？这话问到了本质。试想一下,一个十七八岁二十挂零的青年人,正处于朝气勃勃、充满生机的年龄,逼他下农村,他能规规矩矩地听你的话吗？笑话！思想活跃,富于幻想,不安于现状,且心里“冒包”的人,他啥事都干得出来！更何况打桶又不违背毛泽东思想！

我俩面对面,你把锯子拉过去,我又把锯子拉回来。脑子里想的就是打好了桶,赶场天就可以去把它换成钱。说实话,如果有钱的话,在农村生活应该说是很滋润的。没有钱,生活会很艰难,就会受苦受罪。我们俩属于既没有钱又不愿意受苦的那种人,打桶卖,实际上就是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因为我和老唐从林场到了生产队以来,有许多日子都没有沾上油花花儿了。突然想到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伟大教导,造他生产队走资派的反！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给我们撑腰,怕啥？对,创造条件,砍生产队的树打桶卖！

我认为锯树的锯末是没用的,可是老唐却说有用,把它拿回去,后来果真用上了。

啥也看不清的黑夜里,渐渐地,随着我们的汗水不断增多,那锯子也拉不动了。因为被锯开的锯缝湿漉漉的,把锯子夹得很紧,没办法再锯下去了。于是我们俩站起来,两人用四只手合力地推树,只听“咔嚓”一声脆响,树倒下来了。那声音在寂静的夜空中,像是天上打的大炸雷,挺吓人的,特别是那响声在深深的山谷里回荡,让人害怕。这时我们注意到个别农户的木格窗子亮了,农民们的美梦被惊醒了。此时此刻,我们俩可不管那么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棵大杉树拖到了家门口。我比了一下,从树根到树梢的长度,足足比我们的吊脚楼还要高,比我的三间房连起来还要长！要将它放在屋子里是不可能了。那么藏在哪里呢？于是我们俩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剔除枝叶,锯成树段。杉树叶坚硬而锋利,像是锥子一样刺人,稍不小心手就会被刺破出血。

这时,我们又想起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发扬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的

伟大教导。看起来我们挺乐观，实际上只有我们自己心里才明白，那叫苦中作乐。这都是当时社会给逼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给强行灌输的，无论做任何事都从里面找依据，当然也包括偷树在内，它倒真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我们的床下堆满了杉树段，可是还早着呢，门外面还有堆积如山的树段，到底将它们放在哪里呢？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把它们放在屋子里。清理完战场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在那个年代，既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照明全靠煤油灯，连喝稀饭都困难的人，谁又愿意点灯熬油白费钱！我们本想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偷一棵大树，悄悄地打成桶。哪知那炸雷样的声音，像是故意在对外宣称：树就是我们知青偷的。不知老唐那时的感受如何，反正我那时有种受谴责的难堪，决定仅此一次，今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打桶了。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伸个懒腰，起来一看，太阳已经有一竹竿高了。门一开，只见一个头上裹着白帕子的男人，站在我的门口。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长伍世定。

“社员们反映说是你们昨晚偷了队上的杉树。”他的表情严肃，态度生硬。

“没有的事！我们偷树干啥？”我抵赖，并强词夺理地狡辩。实际上，我的心里像是被蝎子螫了似的难受。

“看你们门前的杉树枝叶，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边说边进了我的屋子里。堆积如山的杉树段特别刺眼，其实把它们放在外面并不起眼。队长看着说：“要烧火煮饭的话，去砍那些个杂树嘛，烧啥不能煮饭？像这样成材的树，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哟！”

“是。下回不了。”我知道自己理屈，抵赖是没有用的。心想还好，队长的话为我们偷树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队长走了，他出门时又回头看了看后山。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嗨，我们拖树时留下的擦痕特别刺眼，本来翠绿的山坡，被杉树锋锐的枝叶犁出了深深的沟槽。新鲜的黄泥巴在茵茵绿草中格外醒目，这时尤其扎眼，难怪队长顺藤摸瓜找到我这儿。

队长走了，我和唐忠勋就光明正大地开始打桶了。我把树段竖起来，两手紧握菜刀的手柄，将锋刃对着树段的中央，老唐用开山斧砸向刀背，树段被一劈两半。依此类推，我们顺理成章地，很快就劈了一坝子厚度在一厘米左右的木板。杉树木纹非常直，它不会乱七八糟地裂开，剖面也很光滑，几乎跟刨床刨出来的一样。老唐拿出一个工具，就是两块木尺，合在一起，其中一头可以自由拉开，而另一头则被固定，实际上是变相的圆规，我们叫它圆卡尺。用时先定好木桶的半径，卡尺卡木板的两边，要把木板的两边刨成斜面，并且与卡尺面紧贴才行。我忙着把宽板改窄，不宽不窄的板材，才不至于造成浪费。

“一只桶需要多长的板料？你有什么办法算出来？”他一边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摆放在长凳子上，一边抬起头问我。其实我知道他是在考我，因为他是高中生，比我多读了三

年的书。

“直径的3.1416。”我一口就说出来了，这是几何学里的知识。“把直径定好再乘以3.1416不就是打桶所需用的木板的长度了吗？”

接下来，还要在杉板的斜边上钻孔，并且打进削好的竹钉，才能镶好桶板。他推板，我镶桶板，两个人分工协作，程序一点不乱。

镶桶板是将桶的木板合拢来，如此则一个类似圆的多角形桶便做成了，这就是粪桶的半成品。再用内圆刨把里面刨圆，用推刨将外面的棱角刨去，圆桶便基本成型。再用划好的篾条盘成两个圆箍，套在它的身上，还要做圆底放进去。这下锯末派上用场了，它的作用是塞缝。第一只桶做出来以后，成功的喜悦暂时赶走了下乡插队的沮丧，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偷树的耻辱，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我们两个外行一天下来，可以做成一挑粪桶。

赶场天，我们每人担上两挑亲手做成的粪桶上街去卖。我们插队的所在地叫凉风垭，虽然属于宣汉县管，但实际上它离开江县的天师馆比较近。那儿赶场的日子是逢三六九日，我们两个知青在场口和农民们并排站在一起，把亲手打的粪桶摆在自己的面前。很长一排，全是卖木货的，有卖水桶的、粪桶的，有卖锄把、卖扁担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我们那是第一次出卖自己的产品，来来往往的农民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们。

也有人来问价，“五元一挑。”我们回答说。其实说心里话，并不知道它的实际价值，因为其他农民卖五元的缘故，我们也跟着喊。比较了一下，我们的质量并不比他们的差。

“三元。”有农民真的想买，这个价格一喊出来，围观的农民向着我们笑。他们一是觉得新奇，知青中居然也有会做木匠活的，二是猜测和等待着，看我们究竟会不会吃价格的亏。

“三元就三元。”我们有点想卖了。材料又没有去成本，怕啥？刚才那个木匠的粪桶才卖了四元呢，何况人家是自己的料，而且还是干的杉料做的呢！在当时来说，三元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了，生产队里每天出工的农民，一年下来，也才分二三十元钱呢！“三元五，买不买？”

成交了。我和老唐每人分得七元，这是我们下生产队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挣钱。

我们把钱揣在兜里，大摇大摆地进了场口的一家饭馆。“来一份烧白，二角五，一两小酒，一角。再加上饭和豆花，算起来总共五角五分。”我叫道：“一人一份！”这是我们下农村以后，五年来第一次下饭馆这样潇洒！就在这一刹那，初中语文课本中的孔乙己宣布“这回是现钱”时那副得意的神情掠过我的脑际。

我们两个吃得满嘴油亮油亮的，心里那个舒展劲儿就别提了。

回去的路上，兴奋被渐渐地冷却，冷静占了上风以后，我仿佛又一次看到了队长伍世

定站在我的面前，用他那双责备痛心而又无奈的眼神盯住我。

一阵莫名的恐惧袭来，由不得一阵心酸，刚才所有的喜悦，重新又被无边无际的痛苦吞噬了。究竟哪年哪月才能熬出头？且不说回重庆，今生无论如何总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吧！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心中充满了惆怅。

作者简介

李炜，男，汉族，1946年4月1日生。1961年毕业于重庆市杨家坪初级中学。1965年5月上山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1972年回城，在重庆织布厂职工医院工作。现退休，自己开业行医。

塔里木马鹿苑

王泽恂

1968年春天，香港客人要到新疆兵团来参观，不知谁的主意，团里准备让我接受采访。我对政委说我现在住着破窑洞房子，屋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外什么都没有，还漏雨。政委说："没关系，我们开过会了。香港客人四天以后才能到，你和马副团长暂时换一下房，等香港客人走了以后再换回来，这期间给你发双月工资。因为你是北京知青，有文化，希望你对香港客人多介绍些新疆兵团的先进事迹，多谈些咱们团的成绩。"我想，我去过马副团长家，那儿虽然不是团里最阔气的，但彩电、冰箱、席梦思、沙发应有尽有，确实是给兵团职工长脸。可那些都不是我的呀！除了团级干部谁能有这样的条件？我将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呀？这不是明摆着骗人嘛？我不想做人家的戏子，也不稀罕那两个月的工资，当即回绝了政委。可政委说："不行，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革命的支边青年时刻听从组织召唤嘛！以后会有记者采访你，给你录像，你会成为咱们团场的北京支青典型，有什么不好呢？"我依然不答应。最后政委限我一天时间考虑。

我把这事告诉了常山，并说坚决不干这事，士可杀不可辱！常山说，好一个士可杀不可辱！他建议我不要硬顶，装病。可以先将我送医院，到了医院就说是突发性头晕，过去了就没事。然后出院了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去。

就这样，我从医院出来就去了塔里木马鹿苑。

塔里木马鹿苑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天赐良机。

风尘仆仆地走了三个小时，在大敦子吃了早饭，搭乘了一辆老乡的毛驴车，到马鹿苑已经九点。五月中旬，正是红柳开花、罗布麻花绽放的季节。在广袤的塔里木沙漠，先是微风中飘来阵阵清香，然后眼前一亮，只见云霞耀眼，有粉红，有碧绿，有蓝紫，目不暇接。

这里的风，这里的沙丘，这里的色彩，实在无法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联系在一起。可是，分明又置身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翻过几座沙梁，便进入了郁郁葱葱的罗布麻滩。这里的罗布麻长势密而高，枝条丰满，绽满粉红色花朵。偶见几丛红柳，缀着蓝紫色花穗，被簇拥在粉红色海洋中，于是，色彩更加丰厚。罗布麻滩一直延伸到孔雀河畔。繁忙的蜜蜂在花丛中飞上扑下，没有一点荒凉寂寞的感觉。真想不到荒漠之中会有如此美妙之地。我徜徉在花海中，如痴似醉。

忽然听到一声哨响，只见一位头戴草帽的放鹿姑娘，骑着一匹白马，手持红柳条从我面前斜穿而过。接着，一百多只鹿崽，欢蹦乱跳地跨过小沙梁，向孔雀河奔去。小鹿们线条优美，步态轻盈，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幼儿园小朋友。它们很快就钻进罗布麻丛不见了。

我顺小路来到吴场长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31团的，顺路参观一下。吴场长满口答应，并让我在食堂吃饭。鹿苑的杨师傅是个老农垦，还向我介绍了鹿苑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和支边青年在塔里木盆地垦荒时，经常发现三五成群的野鹿，后来他们就称这些鹿为马鹿，在动物学上应该叫麋鹿。以后，人们发现农作物成熟时，这些马鹿经常在农场出现。起初，人们先是敲锣打鼓吓唬它们，时间长了，向空中鸣枪它们也不怕了。于是有两个有心的支边青年，踏着鹿的脚印，辨别出怀孕母鹿的足迹，便跟踪追寻，发现罗布麻开花时，正是母鹿产仔的季节。他们在罗布麻丛中的红柳圈中，捕到了十几只出生不久的小鹿仔，尔后，用玉米粥和牛奶饲养。小鹿们渐渐长大，经过人工悉心饲养，到目前已经发展到两千多头（包括已出售的），每年可产上好的鹿茸一千七百多斤。那第一个养小鹿的人，便是现在的吴场长。

我随杨师傅来到圈舍，里面有五六十只一米多高的公鹿。这些公鹿毛色土黄油亮，个个头上晃动着枝叉匀称的毛茸茸的大鹿角。它们十分友善，见了来人打着响鼻，有的舔来人的手和衣服，有的还凑过来蹭痒痒。杨师傅说，公鹿每年四月长第一茬茸，五月下旬就要采茸。在鹿茸生长期公鹿是很本分的，互相之间不打斗，若看到穿花衣服的女同志来到圈舍，还会三三两两地围上来又是舔手又是蹭痒。有的公鹿还会在水塘边对着水面照看自己臭美。到了发情期，有些雄壮的公鹿成了“鹿霸”，不仅争妻霸妾，有时看到穿戴邋遢的人进圈还会抵上几下。原来，马鹿是一种很有灵气的动物。

我跟着杨师傅又看了产仔的母鹿。午饭的时候，杨师傅带我到小食堂。鹿苑的饲养员、放鹿员、销售员加在一起有十四五人，都在这小食堂开饭。我和杨师傅各自买了饭，刚坐下，见一个戴草帽的姑娘也过来了。她就是我刚才见到的放鹿姑娘。她说：“杨师傅，今天你来客人啦？”

“不是我的客人，他是31团的，来参观的。”

我看到她买了一个白菜汤，就把我买的红烧肉一推说：“一起吃吧。”

她不客气道："那好啊。你是北京人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那还用问，听你说话呗。"

这时，她摘掉了草帽，我这才看清她是一个非常俊俏的女孩，只不过大漠的阳光、风沙使她细嫩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对，是在电视上！"

杨师傅说："你说对了，她就是那个养鹿模范北京支边青年林丽霞，她的先进事迹曾多次在《新疆军垦》、《新疆日报》上报道，也录过电视新闻。"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望着她，她却不好意思地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杨师傅说，她是1965年第一批北京支边青年。

林丽霞告诉说："我开始养鹿时，就是觉得马鹿聪明，通人性，很好玩儿，没想到我养的小鹿崽大多都没成活。领导批评，战友责怪，自已委屈得常落泪，我真想不干了！可是又一想，我们支边青年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一个革命青年。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那不是革命青年所为。于是，我下定决心，向老师傅虚心学习，学习他们艰苦奋斗顽强敬业的精神，在第二年母鹿下崽时，我索性搬到鹿圈里住。哪个母鹿下了崽，我就让它们母子闻气味，帮助小鹿噙上奶头。对个别不相认的小鹿就采取开小灶的办法。结果，仔鹿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从此，当地的报纸、广播就开始宣传我的事迹。其实这有什么可宣传的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就算是有点小小的成绩，那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在我们党支部正确领导取得的成绩。"

我感到，今天是真的遇到一个革命青年，望尘莫及，看看人家的思想境界，听听人家的远大抱负、勇气、奉献精神、谦虚态度，这是我们时代的典型啊！相比之下，我是多么的落后！可我又觉得她说的这些话，好像在电影、报纸上经常出现。但是，她那真诚的眼神、恳切的语调，说明这些话绝对发自内心。自从我见到她以后，内心暗暗产生的倾慕之心变成了仰慕。这时，她问了我的名字，接着又问：

"你不是下大田的吧？"

"下过大田，以后又让我当文教了。"我说。

"对我的工作感兴趣吗？文教同志？"

"我非常羡慕你这养鹿、放鹿的工作。"

"那你今天下午就跟我一起去放鹿吧？"

"那……真是太好了！"

这时，杨师傅早已吃完饭，见我俩聊得热烈，便先自离去。于是，我随林丽霞赶着鹿群朝孔雀河走去。没想到的是，她让我和她骑在一匹马上。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被她拉

上马背。她笑道："看来你太缺乏锻炼。"

我在马背上坐不稳，只好两手抓住她的肩膀，任凭她一路对我谑笑不止。

我的心也随之跳荡，心想，原来她也是一个性格开朗热情的姑娘。我们同骑一匹马，这种零距离接触，对一个姑娘来说，只能有一种可能——她不讨厌我。而对我来说，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接触女性，只觉得坐在马上就像是在云雾中飘浮，忘掉了一切的烦恼绝望悲伤，让自己一颗疲惫的心灵轻松地舞蹈着，欢唱着。我觉得自己步入了一片神圣的土地，远离尘嚣，只有绚烂的花海，一望无尽的罗布麻滩，那是罗布麻编织出的梦啊！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两手已经扶住她的腰部。

她讥讽地说："你还挺新潮的嘛。"

我说，"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她不回答，却朗声大笑起来。

来到了孔雀河边，我们下马坐在一棵卧倒的枯树上，任凭小鹿们去采吃那鲜嫩的罗布麻花。孔雀河依然静静地流着，对岸胡杨林中的鸟儿也停止了鸣叫，只有小鹿们欢跳嬉闹的窸窸窣窣声。

她用柳枝打着河面，问："有女朋友吗？"

"惭愧呀，做梦都想呢。"

"你看我做你的女朋友行吗？"

"你当然好哇。可是你太先进，我太落后了，怕跟不上你。"

"你怎么落后了，跟我说说。"

于是，我便将逃避香港客人采访的事儿说了，不料她顿时变色道："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支边青年必须要跟着党走，处处听党的话，那才会有前途嘛！接受香港客人采访，多宣传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进事迹，有什么不好？难道我们兵团人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不应该宣传不应该歌颂吗？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希望我们在这广阔的天地锻炼成长，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国家永不变色。我们还要时刻记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单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样才能世界大同。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你想一想，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是多么的幸福。我一直都为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可你呢，真让我失望，要知道，你的行为是政治思想问题！你如果是我的朋友，赶快回去写一份思想检查交给政委，政委会根据你的检查作出决定。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

好家伙，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和她能有共同语言吗？刚刚萌生的浪漫情怀和美丽梦

想，被一阵冰雹砸得粉碎。我只好说："对，对，你说得对，我这人真的是不可救药了。"

可想而知，我们以后的尴尬和僵硬的对话，再也没有那种真情的话语。一段难熬的沉默过后，我知趣地向她告别，返回了驻地。

以后，听说她嫁给了吴场长，再后来听说她得了肝硬化。据知，她临死前还在问，13号那只小鹿吃奶了没有？

有人说她这辈子够惨的了，可我并不这样想，我认为她是幸福的，为自己的信仰活着，她的精神世界是充实的，尽管她的信仰比较缥缈——她为自己的信仰活着，能说不幸福吗？

不幸福的是我——我回到连队后，不知何故又遇上搞什么精简机构，说暂时不让我干文教了，让我下大田劳动去。我想，劳动就劳动，我有的是力气，怕什么？



作者简介

请见《见证塔里木河》后的作者简介。

巴山情未了

——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谢克庆

噫吁兮，白驹过隙，往事如烟，
乘着清风，驾着薄雾，飞上了九霄云天。
将多少酸甜苦辣，抛洒在通江河畔？
有多少个夜里神飞意驰，梦回巴山？

2007年4月的一天，忽有原东风林场的老知青皮永诚打来电话，说欲回林场去看看，问我可否一同前往？

一句话，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那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那绝壁上的手爬崖；那与狼群相搏的惊险场面，那风雪之夜的火塘边……

在大巴山当了七八年农民，晚饭后睡觉前这段时间，绝大多数光阴，是在火塘边消磨的。火塘记住了我们的欢笑和伤痛，也见证了我们的奋斗和迷茫。

一

1966年1月的一天，临睡前的夜空很平静。半夜里我突然惊醒了，只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北风，从我头上三尺高的房瓦上呼啸而过。木楼房在狂风的摇撼下微微晃动，柱梁接榫处一阵阵吱吱嘎嘎的呻吟。风裹挟着寒冷，拼命地从木板墙缝、瓦缝中挤进来，吹透薄薄的被子，我不由得再一次将被子扎紧些。房后的山林发出动人心魄的咆哮。我几

乎立即想到两句诗:半夜朔风山林啸,几度疑是乾坤摇。

脚下的寒冷使我再次醒来,起身一看,被子上竟有一层厚厚的积雪！四周白晃晃的,亮得刺眼。推门出去,见除了对面那架陡峭的大山上有几大片黑石壁因太陡站不住雪外,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床巨大的白绒绒的厚被子盖住了。时辰还早,天色灰蒙蒙的尚未大亮。风小得多了,那雪却漫天飞扬。也许同样被冷醒了,渐渐有人起床,踏着院中半尺厚的积雪去厨房打水洗脸。

不断有人去打探怎么还不吃饭。终于,炊事员喊吃饭了。但紧接着又说:柴烧完了,差点饭都煮不熟。于是场长宣布,饭后全体出动,去塘湾扛柴。

早已砍倒的青㭎树横七竖八地堆在塘湾沟边的陡坡上,被冰凌冻在一起,深深地埋在雪堆下。我们几个跑在前头的男生用手扒开厚厚的雪层,把碗口粗的青㭎树干一根根拖出来,掀到沟里。然后,力大扛大的,力小扛小的。多数人都累得一头热气,握住树干的手指却几乎冻僵了。

很快,整齐的柴垛出现在厨房后的檐下;很快,烟囱又升起了袅袅炊烟;很快,火塘里又燃起了跳跃的火焰。

雪还在下。晚饭后,院坝里已积雪盈尺。山林中不断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那是树枝不堪大雪重压折断了。目力所及之处,灰蒙蒙的天和白茫茫的地连成一片,像一个混沌未开的世界。

在重庆根本没经历过这样的寒冷,寝室薄薄的木板墙,四面透风,冷得似乎比野外也好不了多少。大家都往烤火房跑。

烤火房是夹在保管室和厨房及女生寝室之间的转角房,房中还立着根粗木柱,是名副其实的"多功能厅"——还兼有饭堂、会议厅、文娱活动室的功能。烤火房中,除挤着放了四张吃饭的大方桌外,最显眼的设施,就是那个大火塘(川北有些县也称火坑)。所谓火塘,就是在地上挖个方坑,四边以条石围住,用来生火取暖。农民都是一家一个火塘。我们这个"家"太大,故火塘尽量挖得大些,边长约四尺。为利用火塘的热量,火塘旁挖有两个窖,用于贮藏红苕萝卜之类。取窖中之物时,须兴师动众地搬开桌凳,由两三个力气大的男生合力揭开盖在窖上的大石板,故这间房还兼有贮藏室功能。

林场的同学几乎都围坐在火塘边,火塘边的四条矮长凳早挤满了。原本放在饭桌边的高长凳也摆放到第二排,坐了许多人。

塘火很旺,但也免不了有催人泪下、使人咳嗽的烟。且那烟时时随风改变方向,一会儿使左边的人泪流满面,一会儿又把右边的几个赶得慌忙向后躲闪。

柴块的搭放很有技巧,首先应保证中空,"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嘛。架在上边的柴块还要疏密适当。过密则不利通风,烟更浓;过疏,风倒是通了,但柴块之间相互烘烤、协同

燃烧就差了。但无论怎样搭放，刚加入的湿柴块都要经历冒烟、烘干、燃烧的过程，要在烟熏中等待。总有性急者等不及，总有人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传火手（知青们先是说“烧火”，被老场员们讥笑：“我家烧火烧不燃，你家烧火是祖传！”原来“烧火”竟是很丑的怪话，特指老公公和儿媳妇通奸）。故火钳总被争来夺去。有抢不到火钳的，干脆直接用手抓起柴块摆放起来。

并不大的烤火房聚了这么多人，闹闹嚷嚷的。有人见白红蓝（爱称白鹤）正咯咯地清理喉咙，便大声提议：“白鹤，唱首歌噻，唱最拿手的！”见有人请唱歌，白鹤很高兴，却故作谦逊地推让一番。有人逗他：“白鹤，你不唱，卢宾宁就唱了哦！”白鹤便不再推辞，站到房间烟熏不到的那边，那儿已让出一小块地方。他先“啊，啊——”地定了音，昂首挺胸，右手一挥，作势要唱，却一下停住，笑着说：“口干了，口干了！要喝口水。”众人的目光，监视他走进厨房。有人悄悄跟至门边，见他左手握瓢舀起冷水喝了一两口，右手顺势将水掬了些在乱蓬蓬的头发上，用五指捋了又捋，尽力使其平整些。回到人群中，故作矜持的白鹤将目光透过房顶，把四周的群山巡视了一遍，收回目光，再将眼前的听众巡视一遍，似乎找到了感觉，重新昂首挺胸，一句颇为高亢响亮的歌声直冲云天：“大鞭子一甩嘎嘎地响也——”同时右臂高举，食指指天，急速在头顶划了一个小圈，好像手中正持有驾车的长鞭。“一挂大车下了冈也——”左手虚握拳向前平伸，拳心朝下，肘部微微伸缩，全身也随之抖动，似正手握缰绳驾驭烈马。抑扬顿挫的歌声在扬鞭催马的动作中声震房顶：“今年咱送公粮排了个头一行，化肥农药新农具，满呀满车装。”当唱到“掌鞭的队长也——我的亲家也——”卢宾宁、皮永诚等好几个人一齐跟着唱起来：“我的亲家也——！”其中赵柳村不是唱，是在喊。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走。透过门缝及山墙缺口，见那雪还在懒洋洋地飘。夜渐渐深了，不知什么时候，塘边只剩下彭小凤、付国良和我。林场没有书报看，没有广播音乐听，人在寂寞之中，特别需要情感的交流。

付国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故去了，跟着唯一的哥哥生活。他读初中时哥哥也故去了。他初中与我同班，高中同级，独自住在七中鱼塘边一间小屋内。那小屋像丹麦童话中七个小矮人住的小屋那么小。我几次去找他，见那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极简单的物件摆放得恰到好处，显现他做事极是细心有条理。他拿着火钳，一边漫不经心地把柴块翻来覆去地摆弄，一边讲着自己童年的故事：夏日乡间的下午，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领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在一条小溪里摸鱼虾。夜里，一个瘦弱的身影打着火把，后边跟着一个更小的身影，在水田里捉青蛙。第二天一早，兄弟俩一起拿到乡场上去卖。他沉浸在对亲情的无限眷念中，语调缓慢低沉，火塘边气氛有些压抑。为冲淡沉闷的气氛，我抢过话头，表情夸张地说：自己对孩童当中的“十八般武艺”，如何样样精通。其实所谓

“十八般武艺”，不过是些爬树凫水滚铁环，鹞子翻叉蛇抱蛋之类的雕虫小技，是流行在儿童中的游戏。我讲起来绘声绘色，有时还即兴表演，讲到故事精彩处，火塘边响起三个人轻松愉快的笑声。

彭小凤是我们林场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生日最好记，与共和国同龄。她说起话来心直口快，天真无邪。她说小的时候，和五六岁的弟弟如何争玩具，边讲边交替装扮着自己高兴的表情和弟弟生气的模样。脸绷不住了，一下朗声大笑，满脸孩子似的灿烂笑容！我和付国良也忍不住笑了。其实她就是个孩子，还要两年才有选举权，若按时下的法规，是个非法的童工。记得那年上山下乡准备离开重庆时，因出发前的一些杂事，带队的刘老师让我到她家去过三次，第三次是帮她提行李。她的母亲显得年轻漂亮、知书识礼。去了几次，也熟悉些了。她见我是个热情正直懂礼貌的大男孩，便很自然地嘱咐我：“要照顾我们小凤哦。”我当然连声答应。其实彭小凤虽年幼，却行事乖巧、活泼大方，也并非看上去那么娇弱。她几乎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融洽，愿意帮忙的人很多。我一向乐于助人，但因有那句承诺，心中便有一点责任感，使我关注她更多一点，相处也要多一点，有机会照顾时我更尽力些。可照顾什么的时候并不多。记得有次从黑石窖往回背黄豆捆，途中要经过危险的独木桥、手爬崖。在捆的时候，我暗暗把该她背的那堆豆秆中抱一大抱捆到我背的豆捆中，使她背的那捆轻些。这么一个娇小的女孩子，离开父母，独自到这穷山恶水的地方来，真不容易啊。

夜深了，再次加入的柴块也化成了红红的木炭。那炭块也慢慢由大变小，终于一齐化为灰烬。房内便渐渐被黑暗和冷气笼罩，对面坐的人也看不清眉目了。初时火塘中的灰还很烫，在黑暗中发出隐隐的红和热，但很快就隐没了。用火钳轻轻翻动，黑暗中又有几点极小的火星闪烁。

二

1966年夏末的一天，下大雨了。午饭后因为没法上坡，全体知青就在火塘边召开民主生活会。所谓民主生活会，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发言者通常先不痒不痛地说说自己的不足之处，今后如何改正云云，批评别人才是重点。当然领导有时也顺便表扬好人好事。

我们几个是知青中的主要劳动力，大凡重活累活脏活都跑不脱。这不，上午引水还被淋成了落汤鸡，就等着受表扬吧。

会上说些什么，早忘记了。突然有段话当时如雷贯耳，至今记忆犹新。女同学崔古炫大声说：“他们改锯的几个也太吃得了，四个抵我们十个！扣一样多的口粮款太不公平了！要改正！”

她说要改正的是我们四个在黄草坡改锯的人。怎么回事呢？还得从头说起。

那是不久前的事。为了支援公社粮站建设，更主要是为了收入现金，林场要为粮站改几十方椽子。我和谢文宦、韩凯、白鹤四人，被派到黄草坡去改锯。

时逢盛夏，正午，林中一丝风也没有。一时兴起，四个人，两把大锯斗得难分难解，挥汗如雨，便一起脱光上衣和长裤，只穿了一条内裤。送午饭来的女同学赵胖竟无声无息地穿出密林，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时，我们一派书生气，平日无论多热，小伙子们至少也要穿件破背心，从未打过光巴胴。也许根本没有料到几个小伙子会全都穿得这样少，赵胖一下愣住了，涨红了脸站在那儿，一时手足无措。我们正斗得物我两忘之际，忽觉眼前一亮，恍惚中见一个穿红花短袖衬衣的姑娘站在面前！也许是热，也许是羞，她胖乎乎的圆脸上挂几粒汗珠、飞两朵红霞！赵胖其实远算不上胖，丰满而已。忽觉绿色的山林中万籁俱寂，还真有点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境！几个人便也一齐呆呆地望着她，好一阵才猛然回过神来，慌忙穿上背心和长裤。为掩饰窘态，嘴快的韩凯忙说些诸如“一个人走林子怕不怕”、“送的啥子好吃的”之类的废话，手快的我忙接过她的背篼和提在手中的半桶菜汤。背篼里是一个搪瓷盆扣着的大搪瓷盆，我揭开一看，哟，冒冒的好大一盆洋芋干饭！还有一大碗青菜。我们的胃口好极了，一阵狼吞虎咽。记得很清楚，那一大盆干饭，估计要七八斤米加七八斤洋芋才煮得出来，最后只剩下几个光洋芋在盆底滚来滚去。

半个多月，我们四个人改了几十方椽子，给林场换回近千元人民币。那个年头，那可是笔不得了的巨款！是林场年终分配现金的大头。

你说，我们劳动强度大，肚中又缺油水，饭量自然大些，怪得着我们吗？叫我们怎么改正？

那次火塘边的民主生活会，最终变成一场激烈的争论和争吵。原先被一团和气的表象所掩盖的各种问题，一下暴露出来了。真是“槽内无食猪拱猪”呵。看来，乌托邦似的林场内部矛盾重重。

时间到了1967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冬夜，许多男生照例围着火塘洗脸洗脚。几乎所有男生都只有一个搪瓷盆。先当洗脸盆，去厨房大铁锅里舀了半盆热水，端到火塘边。洗了脸，拧干洗脸帕拿在手中，把脚伸进那热水中去，洗脸盆变成了洗脚盆。

不久前林场进行了年终决算，我们的劳动日值两角九分五厘钱。我们中体力最强的，劳动一天，初时记八九个工分，后来会耕田犁地了，最多也就九分七八。劳力弱点的记七八分，更差的只有六七分。十分算一个劳动日，我们多的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少的也有两百来个劳动日，那差不多是天天出工了。可扣除口粮款后，最多的分了不到三十元钱。

火塘边很自然地议论起年终分配。有人大惑不解地说：“恁个辛苦地劳动了一年，怎么才分了七块钱？还买不到穿烂了的那身衣服和那双鞋呢。”我调侃道：“不少不少，如果

换成日元，就是一千元了。”韩凯一算，嚷道：“啥子哟，一日元才当我们七厘钱？不可能不可能！”于是韩凯和我为人民币与日元的比值争了起来。本是好朋友的我俩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打赌，说错了如何，对了怎样，最后却毫无结果。没有权威裁判，更没有图书馆可查资料。记得两三个月后，我竟从一张偶然得到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答案。忙拿去给韩凯看，他却说：“《参考消息》上说的，不作数。”

三

有一次出了个事故。

好几个人围着火塘取暖。我坐在长凳的一头，光足踏着自制的木板拖鞋，鞋跟轻踏在塘边石上。两手各拿着一只刚洗净了的袜子，一边与同伴吹牛，一边专心地烘烤着袜子。

这是双很舒适耐穿的尼龙袜。那时尼龙袜很贵，花了二元八角钱，用去一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夏天不必穿，春秋舍不得穿，冬季天冷才穿。而今过了大半年，足跟部磨出个小洞。我要在临睡前把袜子烤干、补好，明天才有穿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衣服的肩背部，裤子的膝部都很容易磨穿，我和大多数男生都学会了自己补疤。有的补得好些，有的手艺则很孬，那颜色不同的补丁东拉西扯的使衣裤变了形。有的男生补不好，就厚着脸皮找女同学帮忙。有些人也可能是“别有用心”，是在找机会相互接近吧。但为了避嫌，这种补衣之类的帮忙通常正大光明地在火塘边进行。那时恋爱似乎是不允许的。也有一两个小男生人缘既差，又懒，常穿着有破洞的衣裤。就这点而言，还比不上农村小伙子，他们有家，有母亲或女人。

火塘边还有好几个人和我一样，在烤袜子，烤解放鞋，还有烤衣服的。有的懒得拿着，于是塘边插了几根小棍，挂着要烘烤的鞋袜之类。尼龙袜易烤干更易烧坏，我正小心地翻烤袜子，不防长凳另一头的人忽然起身离去，长凳猛地翘了起来，我一下失去重心，木板鞋飞了，不知怎么右脚竟一下伸入炽热的火塘灰中，火塘边顿时响起几个女生的惊叫声。我爬起来一看，足底皮厚没什么，足背红了一大片，霎时冒起了几个大泡。若是现在得马上去医院。当时条件太差，仅打盆冷水浸了一阵，擦了些菜油。使旁人惊奇的是，我几乎本能地把尼龙袜举得高高的，袜子一点也没受损！

脚有伤上不了坡，手还闲不住。这天，管家“存半”便安排我和不知什么缘故也留在家里的“圣人”去办米。“存半”当然不是真名，她叫程姑琳。她年龄和我们也差不多，却极具中国妇女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美德。凡收获的粮食蔬菜，她必优先考虑怎样妥善贮藏，细水长流。故大家戏称她为“存半”。记得那次过春节，她竟变戏法似的搬出了各种平日难得一见的零食：葵花子、南瓜子、核桃、板栗子，甚至还有几大捧晒干了的枣子！火塘边的方桌上，一时还真有点琳琅满目，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一点点贮存起来的。

"真理往前半步就是谬误"。"存半"有一次却也"存"出了问题。秋末，我们收获了许多好吃的大萝卜贮藏在窖里。进入冬季后，饭桌上蔬菜越来越少。同学们多次要求：窖里有那么多萝卜，为什么不拿出来吃呢？"存半"却说："慌啥子慌！恁个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没得菜吃的日子还长得很哩。"坚持现在没到吃萝卜的时候。不料等她认为到了可以吃萝卜的时候，大家搬开火塘边窖上的大石板一看，表层的萝卜已经生出两尺多长的芽，完全空心了，下面的已完全烂了！大家心痛得好一阵埋怨。她当然也难过极了，眼睛红红的，当场掉下泪来。

话题还是回到办米。所谓"办米"，就是把谷子"办"成能下锅煮饭的米。办米至少有四步：砻、风、舂、筛。又要技巧又费力的过程就不说了。我这人生来命苦，这类手上活常常是一看就会。舂米我不惜力气，筛米则技术娴熟，办的米又白又熟，"存半"很满意。

交了差，也很疲乏了。我随便擦把汗，和"圣人"坐在院边石板上休息，悠闲地等着去黑石窖的大队收工回来。远远看去，对面那匹向南延伸过去的大山，像一帧静止的画。夕阳的余晕，把青绿的山的上半部涂上明亮的金色。好像大山后面有双巨手在拉动一块巨大无朋的金色幕布，只见那金色的幕布向山顶滑上去，很快消失了。远远的，出现了一些隐隐约约的人影，人影渐渐连成了一条细绳，那细绳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在画中缓缓游动。因那细绳的游动，彰显出那山的峥嵘和路的蜿蜒。我站起身，挥动双手吆喝，长长的吆喝声在山谷回荡。细绳中有人挥手响应。

虽然看到了，也喊应了，那队人真走拢还要很久，我坐下和"圣人"继续聊天。也许是汗流多了没地方畅快地冲洗一下的缘故吧，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故乡重庆的两条大江。我讲起了那年暑假畅游嘉陵江的得意往事。正发大水的嘉陵江，浩浩荡荡、奔腾咆哮，处处是变幻莫测、暗伏杀机的急流旋涡鼓涌。艺高人胆大，我与一个同伴从磁器口下水，在滔滔洪流中顺流直下，经高家花园、石门、红岩嘴，直到化龙桥才慢慢收水靠岸。说到兴起时，不禁手舞足蹈、得意忘形。

"圣人"叫邹在柏，她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秀发齐耳。性格有些内向，说话多轻言细语。有时笑也努力地抿着嘴，颇有笑不露齿之大家闺秀风范。因古文好，有时又冒出一两句之乎者也，遂被戏称为"圣人"。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也是在火塘边，大家天上地下瞎吹。不知谁说到毛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又扯到辛弃疾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皆是何等的气魄。"圣人"一时兴起，极认真地说近来她也填了三首词，并当众背诵。如今"圣人"见我说得热闹，也渐渐话多起来。她动情地讲起小时候妈妈给她缝衣服的事。她说，妈妈缝的衣服好像总是大些。略一停顿，"圣人"忽然很郑重地说，她还穿着三岁时妈妈亲手给她缝的背心，问我信不信？我说三岁时穿的背心，现在怎么穿得？不信不信！她见我怎么也不相信，急了，一边申辩一边还顺手掀起衣角，以示正穿在身

上。余光一瞥,那好像是件深色的马甲之类。

话题不可避免地扯到将来想干什么。提起将来,我和"圣人"的心情不约而同都沉重起来,刚才的兴致一下飞到九霄云外。我站起身,茫然四顾,不由想起李太白的诗句:"拔剑四顾心茫然。"许久,遥望南天,一缕低沉缓慢的男低音飘荡在山谷的风中,那是在知青中传唱已久的歌:

离别了山城已不知多少年啊亲爱的故乡,

望了又望眼前总是一片凄凉和渺茫。

什么时候才能够看到故乡的面貌?

什么时候才能和亲人欢聚在一堂?

唱着唱着,我发觉自己眼中已有泪花。不知何时"圣人"也低低地跟着唱起来。

并不算太笨的我和"圣人"想来想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在这里挖地怎么能大有作为。沉默许久,胡乱设想了几种可能后,我有些丧气地对"圣人"说:"其实扫马路也是不错的职业。你想,那扫帚有好重嘛。当然是去扫重庆的马路。""圣人"告诉我:"回重庆去当看门人也可以,最好是图书馆的看门人。"她说:"可以随便看好多书。"若干年后,她终于可以去重庆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随便看好多书"了。不过不是以图书馆看门人的身份,而是以大学教师的身份。

四

1967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的火塘边来了两个颇有些神秘的客人。为什么说颇有些神秘呢?理由有三。首先,那是两个陌生人。他们也不认识我们林场的任何一个人。不像以往的来客,多是林场某人的同学朋友之类。其次,两人的举止也有些奇怪。挎包中明明有什么却藏藏掖掖地不痛快地拿出来。看得出,他们刻意避开场长和任何老场员。最后,两人的言谈更不寻常,他们是来串联的!

在这之前,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也知道些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都说大城市里的大学生们不上课了,干些游行、贴标语或到处串联之事,离我们远得很。那两个人却把文化大革命拉到了我们身边。

傍晚,场长和老场员都回家去了。在火塘边,只有我们知青了。他们从挎包里拿出那卷神秘的东西,那是一卷传单。他俩从中抽出几张递给我们。传单的刻板和油印都很不专业,字倒看得清楚。就着火塘中晃动的火光,见那传单抬头赫然一排大字: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内容大致是列举了社办林场的若干弊病,号召全体重庆知识青年行动起来,砸烂社办林场。特定于3月12日,全体重庆知识青年到县城参加大会,商议砸烂社办林场的事。落款是"1079战斗团"。

来人极为健谈,满口新名词,也许可算"文革"中通江县知青中的先知先觉者。原来他俩一个是通江知青,叫马朋(化名。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名),另一个是巴县知青,叫范根红。两人是重庆三中高64级的同学。年初,两人回渝探亲,接触了"文化大革命"。想到重庆知青在大巴山的艰难处境,一时雄心万丈,觉得要为改变知青们的命运干些什么。两人联络了几个志同道合的知青(有通江县春在林场的,还有巴中的、万源的,姓名都记不太清楚了),弄了台油印机,辗转回到通江。在离县城近的春在林场安营扎寨,竖起"1079战斗团"的旗帜(文化大革命时期,几个人便是一个"团")。他俩解释了"1079"的含意:"1"像扁担,"0"似背篼,"7"如锄头,"9"若粪瓢。即"1079战斗团"是知识青年自己的造反组织。由马朋主持,范根红执笔,几个人夜以继日印刷了几百份《告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胞书》。怎么送到全县那么多知青手中呢?当时唯一可行的送达方式竟和古人一样,背在背上,跋山涉水,用双脚走去!"1079战斗团"的人分成若干组,一组去县城,找掌权的县武装部长,争取集会得到批准。还要与"安办"及造反派沟通。另几组,负责把《告同胞书》送到全县的每一个林场。林场分布在县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几十上百里,餐风宿露、忍饥挨饿是免不了的。他俩的任务本是去县城与上层沟通,因东风林场在全县知青中具有号召力,故他俩先到了我们林场。

东风林场全是重庆七中的应届毕业生,算办得好的。当时我们内心深处,已对前途充满忧虑和迷茫。更有一些林场由于种种原因,连吃饭都成问题。也许知识青年们天真地认为,砸烂了社办林场,才有可能改变现状,甚至可能回重庆去。不是有句名言叫"不破不立"么。加之静极思动,听到说全县知青都到县城开会,肯定热闹。还可见到平日很难见到的在其他林场的朋友、同学,故无不踊跃。

3月12日一大早,我们林场的知青几乎倾巢出动。虽说服装不可能统一,但有一样装扮却很一致:每人都左肩斜挎一个林场统一做的小红书包,右肩斜挎一个也是林场统一买的仿军用水壶。小红书包内装几本32开的小册子,其中"红宝书"是必备的,另外还有《十六条》之类。从我们林场到通江县城有两条路。一是从梁上走,号称九十里。二是经浴溪口到县城,先走五十余里小路,再走17公里公路,两者相加也有90里,好像差不多。但公路长度比较真实。虽说是公路,又绝无车坐,故通常情况下,都走梁上。

我们三十多人一路急行,刚过午便来到县城外。有几个负责联络的知青远远看见,便高兴地跑到城外迎接。看到我们统一的小红书包和水壶,他们兴奋地夸我们阵容整齐,认为又到来一支主力军。肚子早饿了的我们涌进一个小食店,每人吃了四五碗小面,空碗在桌上叠了很高。林场治保委员、好出头露面的韩凯和知青副场长皮永诚两人,便跟负责联络的知青去了。

后来韩凯告诉我们，他们去了大会筹备组（好像是邮电局旁的空房，谁也记不清了），去的有一中三中的、七中的，总之，县内较有影响的林场都有人去了。有人宣布到的人都是大会筹备组的。在讨论大会宗旨时却争论激烈，一些知青认为社办林场不利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当然有点言不由衷）要砸烂。另一些则担心知青太弱小，在一起还可相互照顾，分散后的生存有问题。但有一点看法基本一致，即对知青们的艰难处境不满，普遍对前途感到忧虑，遂迁怒于社办林场这一组织形式。虽明知纵然砸烂了社办林场，也很难拿到户口回重庆，也要先砸烂再说。韩凯说："1079战斗团"的确很有本事，还找来墨和纸，知青们一齐动手，裁成小块，写了很多标语，如"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等，大家拿到街上去贴。

大会筹备组的去开会，我等无官一身轻的便结伴闲逛。小小的县城这天很热闹，到处遇到成群结队的知青，小食店、小商店的生意也因此好了许多。整个县城很有几分节日气氛。我们一路走，一路看，碰到久别的朋友、同学，免不了惊喜地打招呼，摆几句龙门阵。不觉来到电影院下边的丁字路口。这地方路边比较宽阔，有许多人围成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圈，圈内传来歌舞声。我们几个停下来，挤进人圈内去看热闹。一个风华正茂的女知青正用普通话报幕，那人我认得，叫叶雷，是哪个林场的忘记了。随后，音乐声中，穿着还算整齐、短衣外都束有绿色军用皮带的八男八女，踏着整齐的步伐边唱边跳，从人圈缺口舞了进来。歌词极短，只有两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舞蹈动作也很简单，上肢以前手下探、后手高扬为主；下肢则是用力跺脚的踏踮步和快碎步。舞者反复颂唱，不断变换队形。凡唱到"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时，皆加重语气放声高唱，双手上举作颂扬状。挥手踏足之际，动作整齐有力，颇有气势。叶雷和她妹妹叶锋也在舞者行列中，两姐妹舞姿最好，说不定小时候进过少年宫的舞蹈训练班。我们几个正看得出神，忽然有个姑娘从人群中挤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拉到圈外人少处，很兴奋地对我说："唉呀，谢克庆，来得太好了！帮个忙要不要得？"我一看那姑娘很有些面熟，一时竟想不出她叫什么名字，也不好意思当面问，只好笑着连声答应。原来她们马上要表演舞蹈《北京的金山上》，本应有舞者八男八女，有个男生却因故突然上不了场，缺了个空不好看。不知怎么知道我歌唱不好却会跳舞，要我临时顶替。我有些为难地说："我会跳这个舞，可能和你们的编排不大一样哦。"她笑着说大致都差不多，并马上示范了一遍。她让我站后排："没得关系，跟上节奏就行了。"由几把二胡和几支笛子组成的乐队奏起了前奏，我跟在后边就匆匆上场了。那些舞蹈动作都是我很熟悉的，不过编排程序略有些变化罢了。我仓促上阵，倒也动作舒展潇洒，表情大方自然。下场后，那个女生跑过来对我说："太好了！谢谢你哟，没人会看出你是临时顶替的。"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林

场的。

表面看来，白天的气氛非常平和，我们哪里知道，一场阴谋正在暗中策划着。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全体知青到电影院旁的广场集中，大会正式开始。广场上还有许多打着巴山派旗帜的造反派，也许是巴山派和知青都是想相互利用，便同台表演了十来个小节目，可算知青的同盟军。

表演很快结束了。大会主持人说："请1079战斗团的一号勤务员讲话。"我一看，一号勤务员正是来过我们林场的马朋。马朋正宣讲《告同胞书》，才讲了一半，有个男知青急步上台，附耳说了句什么，两人便匆匆下台去了。知青们处于亢奋之中，闹闹嚷嚷的也不知缘由。过了好一阵，终于有人站出来组织我们游行。时近黄昏，谁也没顾得上吃晚饭。我们以林场为单位，四人一排，顺着县城的大道前进，一路兴奋地喊些诸如"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砸烂社办林场"之类的口号。天黑下来，显然是电压不足，街边稀稀拉拉的路灯很勉强地发出不明不白的光。我发觉昏暗的公路两边站满了人，也许大半个县城的人都来了。有些人显然不是来看热闹的，那些人在谩骂，做出挑衅的动作。更有似乎训练有素的壮汉，几人一组，突然逼近我们队伍，对某人抵近审视一番后又退去！知青人数其实不多。当时通江县有重庆知青一千七百余人，除去各种原因未到的，那天到县城的也就一半左右，其中五成还是女生。现在又拉成长长的队伍，处在人家的两面夹击之中。那些人有备而来，又吃饱了饭，以逸待劳。知青们则远来疲惫，连晚饭也没吃。这时"同盟军"也不知哪儿去了，形势极为不利！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有个不认识的男知青突然躲进我们林场的队伍中，神色有些慌张，他悄声说有人要抓他，同行一小段路后他又突然离开，钻入另一段知青队伍中。前后不断传来有知青被突然袭击、被拉出队伍带走的消息，气氛更加紧张。我虽不免也有些紧张，内心却因遇到这样强烈的刺激而无端的兴奋自豪起来，颇有点当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青年那种英雄气概！知青们相互告诫提高警惕靠紧些，把有可能被抓的知青夹在队伍中间。

在县城那条最大的沿江大街上，在两旁越聚越多的人墙中，知青们的游行队伍缓缓向前移动。猛然间喊声四起！前面大街两侧的巷道中，突然冲出数十面红旗，狂挥乱舞的旗子下，数百青壮男人呐喊着蜂拥而出，把去路堵得水泄不通！知青们游行的队伍一下混乱了，混乱中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男知青到前面去！冲过去！我和许多男知青一下热血沸腾，呼喊着奋力向前跑，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那里已是两军对垒，短兵相接。知青们裹成一团拼命往前挤，企图从层层叠叠的人阵中冲出一条路来。叫声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人们面对面、胸贴胸地你推我搡。路灯稀少，灯光昏暗，不太看得清阻拦对垒者的面貌。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对方持有数十面大大小小，写有什么战斗队、什么造反团之类的旗子，而知青们是没有旗子的。混乱中忽听有人大叫："把他们的旗子抢

了！”我正和一个持旗者贴胸相撞，闻言便一把抓住他手中的旗杆往下压！持旗者根本来不及反应，旗杆已到我的手中！我正想回身伸手去扯杆顶旗子，早被我身后的一个知青一把扯下塞入怀中去了。我扔了光竹竿，打算再找一面旗子，四处张望，只看到一些光竹竿，一面旗子也看不见了。两支队伍相拥相交处的十数面旗子，刹那间多半已落入知青们手中，剩下的被他们自己藏了。若讲贴身肉搏，在人数相当的前提下，那些人根本不是知青们的对手。他们有家有室，知青们无牵无挂，正一身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之年，值一股怨气怒气胸中乱窜之际，两军相逢勇者胜嘛。其实，至今我也没弄明白，那些与我们作红蓝两军演习对阵的兄弟们是些什么人。

感谢那些对垒者，因作为男子汉的我，至今仅止一役。

经此一乱，阻挡者们破坏游行的目的已达到，已作鸟兽散。知青们也没了游行的兴趣，多数便慢慢地集合到一起，找到一个比较背风的地方坐下歇气。记得那是一条短短巷道，石板路的尽头处是一个什么院子，青砖柱，弧形黑门楣，两扇黑色大木门紧闭着。巷道两旁，一边是几尺高的条石砌就的墙基和更高砖墙，另一边是一排低矮的临街房屋，也门窗紧闭，黑灯瞎火，了无人声。数百人随地坐下，把那条短巷塞得满满的。阳历三月十二，还在数九之末，川北山区夜里很冷。刚才冲锋陷阵，热血沸腾，汗水湿透了贴身的衣裤。现在精神一松弛，被那冷风一吹，便全身发冷。已近午夜，还没吃晚饭的肚子叫唤起来，知青们不免有些沮丧。这时有个个头一米七多点、面部棱角算得上俊朗的男生，激动地从人丛中站起来，几步跨上那大门前的台阶。他大声说："我们唱首歌，好不好？"也不等回答，他右手一挥，大声唱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立即得到全体知青的响应，雄壮的歌声顿时响彻川北山区这个小县城的夜空："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那听过唱过千百遍的旋律，是那样亲切动人，那歌词也写得太好了！大多数男知青眼中泪光闪闪！女知青们开始是边唱边抽泣，后来有的便号啕大哭起来！像我这个一向以男子汉自居的人也不禁热泪滚滚！谁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领唱者的歌喉很高亢雄浑，在那么多人的歌声中，还能分辨出来。听旁人说，他是陈河林场的，叫冯廷贵。

我们在哭声中歌唱，我们在歌声中怒吼！我突然发现，一旁的墙基石上阴刻着"赤化全川"四个斗大的字（这里不是指刻在当年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大门左侧墙基石上的那四个字，那"赤化全川"四个字要大得多，至今仍在。显然，在1967年时，同样的标语在县城内不止一处，县境内就更多了）。那是1933年闹革命的红军留下的。今天，非但全川，连全国也早就赤化了，我们又在这"赤化全川"四个大字旁闹革命。整个夜晚，不断有知青自告奋勇地上去现场表演。我们唱啊，跳啊，忍着饥饿和寒冷，直到天亮。

回林场的路上，同伴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昨晚的精彩场面。当我说到夺下对手旗杆，杆上的旗子却被后面的人抢去了时，有人从怀中掏出了那面写着某某某造反团的旗子，得意地展示给大家看。大家一起高兴地笑了起来。

后来，在火塘边，那面旗子被撕成条条，做成红袖箍，发给了大家。

这就是通江县有名的"3 · 12"知青大会。

五

"3 · 12"后不久，传来消息，才知道事情大概。原来抓人的不是造反派的武斗队，而是混在造反派中的公安局的便衣！原来这次知青集会没得到掌权的县武装部长的认可。而开会通知一旦发出，山高水险，要发出更改通知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了。于是，知青们的集会"非法"召开了。他们要抓组织者。这才想起，那天开会时，一号勤务员话未讲完，就匆匆下台去了，原来是得到了公安局要抓他和其他组织者的消息，急忙躲避了。

"1079 战斗团"的勤务员们被通缉了。勤务员们东躲西藏，不敢回自己林场。大约到了四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又有个讲话（中央文革小组经常讲话）："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通缉一事，这才不了了之。

也许因为 3 月 12 日的大会未达目的，特别是游行被别人冲散了，知青们内心躁动着愤懑和压抑。"3 · 12"大会的组织者们顺应这种感情，冒险策划了第二次大会。为表示是"3 · 12"的继续，时间特意选在 6 月 12 日，即后来通江知青称之为"6 · 12"的全县知青大会。

6 月 12 日下午，几乎全县的林场都有知青到了县城，人数估计和第一次差不多。因为是开会，知青们汇聚在电影院，坐满了前面的二十多排座位。主持人和勤务员上台讲话。由于没有扩音设备，更由于从大会尚未真正开始起，就有一拨一拨的人从大门进来，发出各种喧嚣。讲话者虽声嘶力竭，但连坐在前几排的我也未能听清讲了些什么。来捣乱的人不断涌入，挤满了所有的过道。也许是吸取了上次旗子被夺的教训，这次没有一面旗子进场。他们大声喊叫，起哄，喝倒彩，气焰十分嚣张。知青们极力忍耐着。会是开不下去了，改宣传毛泽东思想，唱毛主席语录歌总可以吧。于是前排有十来个女知青应主持人的召唤走上台去。女知青们眼含热泪："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还没唱几句，来搅局捣乱的人有的从舞台两侧的梯子冲上去，更多的一窝蜂地从三四尺高的舞台前沿爬上去，一瞬间便挤满了整个舞台，把唱歌的女知青赶了下来。几乎同时，只听哗啦啦一阵乱响，电影院所有的大门一齐大开，更多的人狂呼乱叫着蜂拥而入。那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知青们愤怒已极，热血上涌！突然后面有几个知青在齐声大喊："东风林场的，上！东风林场的，上！"赵柳村看了我们几个一眼，带头站起来。我

和屈家易、唐龙、鲁锋、白鹤、彭小凤、涂玉萍、龙礼等也站起来，匆匆整理一下装束。也许是见我们中有人没戴当时最时新的军帽，后面有人喊："接着！"空中飞来两顶军帽，是个男知青扔过来的，也不认识。来不及说什么，我跳上座位，伸手一一接过。往自己头上扣了一顶，第二顶随手递给了同伴。（后来这顶军帽我视为宝贝，还在正面绣了个红星。离开通江时，很郑重地送给了生产队一个喊我舅舅的小男孩。）过道已被搅局者们挤满了难以通过，前边的知青忙起身让出座位，我们从一排排坐椅上跨过去，来到尚未被占领的舞台与第一排座位之间的那小块空地上。屈家易在前，两手在胸前虚握，好像正举着一面红旗。其余四个男生四个女生，男左女右，两人一排，以行进步伐在那一小块空地上转圈。我们边走边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语录歌。全场的知青们顿时群情激愤，也一齐起身大声合唱。刚刚胜利占领了舞台的造反派们，站在那儿一时没了对手，有些尴尬。只听有人一声令下，又纷纷怪叫着从台上跳下来。（真的很像神话剧《西游记》中那些从乱石堆上跳下来的小妖怪！）台下这块我们正在表演的空地，眨眼间便被挤满了。肢体接触不可避免地在一刹那间发生了！猛见有同伴被那些人又拖又掀地弄出门去，我正打算冲上去帮同伴的忙，不料有一只手猛地从身后揪住了我的衣领，往后就拖，要把我摔到地上！揪紧的衣领勒得我一时透不过气来。左右又有人袭来，伸手抓我两臂。说时迟，那时快，顺那后拽之力，我左脚立即后退一步，一是以支撑失去重心的身体，二是避开左右夹击之人。同时左臂横格，借势向左后猛一拎腰，转过身来成左弓箭步，一招便将抓住我衣领的那只手打开！这一招有个名目：白鹤亮翅。紧接着我右掌借长腰蹬腿之势，在那只手的主人前胸击了一拳！这一招也有名目：黑虎掏心。这一拳用了七八分劲。倒不是我是什么武林高手，功力到了可收发自如的境界，实在是四周都挤满了人，使不上劲。余光一瞥，见那人生一张微胖的白脸。"白脸"凭空挥了挥双手，痛苦扭曲的脸上嘴张了张，因电影院里太闹了，他喊了句什么也听不见。只见他踉跄着向后倒去。他们人太多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扭身从人缝中钻出舞台旁的大门。

天色已近黄昏，附近有几盏昏暗的路灯。

电影院侧面的广场一片喧嚣，人流如潮水般涌来卷去。五分清醒、五分癫狂的人们或五七个，或十几个，或三二十人，刚聚合成一团，突然又轰然散开。辩论的、争吵的，吵急了挥拳要打的，打不过了奔逃的，狂呼乱叫着追赶的，什么都有。或唾沫飞溅，或怒目圆瞪，或掀衣挽袖，或捶胸顿足，怪相百出。但纵观全局，多以"文攻"为主，"武卫"为辅。

和那些人辩论毫无意义。东风林场的同伴都冲散了，很难集合到一起。广场边正是回林场的山路。我找到两三同伴，与浴溪林场的几个知青同路，迎着暮色茫茫的崇山峻岭，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县城。

几个月后，我们慢慢了解到下面的故事。

“6 · 12”那天，坐在靠前座位的我们林场的同伴和我一样，从舞台侧门出去，到了广场上参加辩论。而坐在后边的约半数知青被困在电影院的座位上，一两个小时后才得以从正门出去。被激怒了的知青们又举行了游行，（估计我们那时已离开县城了。）沿途却有造反派横加阻拦，最后竟被逼进了县武装部大院。马朋和两个勤务员去和武装部长对话，当时形势已非知青集会的组织者们可以控制的了。据说最后有人乘乱砸开弹药库大门，抢走了枪支弹药。

就在第二天黎明，城南河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那是平昌造反派向通江造反派进攻，是真正的枪战，是通江县城第一次武斗枪战。据说通江造反派早就探知平昌造反派要来进攻，而平昌造反派是有枪的。

因在6月12日这天发生了抢枪事件，比“3 · 12”那天仅仅是“非法”游行严重多了。抢枪事件被县武装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因此，“6 · 12”大会好像也“顺带”被定了什么“性”。

“6 · 12”后很长一段时间，通江县境内，主要是县城内弥漫着敌视知识青年的气氛。好心的场长和老场员们一再地劝我们待在林场，不要外出，特别是不要去县城，怕我们遇到危险。到处都在传说公安局正在通缉知青集会的组织者。大约过了半年，我们林场才有几个女知青大着胆子去县城办事。回来说，县城几乎所有的旅社都拒绝接待知青，后来有个小旅社听说是东风林场的，态度才好了些，她们才不致露宿街头。

在更长的时期内，据说“一号勤务员”的档案被记了一笔，这一笔可不得了，以后凡是“好事”都轮不到他。幸好有当年也是三中的尖子生、同样因家庭问题而无缘大学、一起下乡的红颜知己，陪着他度过那漫长的艰难岁月。

40年后的现在，当我经过千方百计的找寻，得以登门求证“3 · 12”和“6 · 12”时，成天坐在电视机前，很少出门的他顿时双眼一亮。他说：很高兴有人记得“3 · 12”和“6 · 12”。却不愿多说。我说：“难道你不认为那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亮点么？”他默认。却一再叮嘱，不愿姓名出现在文章中。

结束语

社办林场撤了，树倒猢狲散。先是插队。后来，招工的来了，投亲的、嫁人的、办病残的走了，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其实，我们哪是什么“仙”！在全国数以千万计的知青中，我们1964、1965这两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的，竟成了被政策遗忘的可怜虫。后来许多关于落实知识青年的政策文件中，这两年下乡的知识青年最好的也就是“参照执行”罢了。

却看青春何在，旧貌换了新颜。原本应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却因时代的原因，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苦难。但也劳我辈筋骨，磨我辈心志，我辈从未放弃努力！虽不一定个个都有什么大任小任天降，却也坦然行走于天地之间，足矣。

而大巴山与知青们的青春已融化在一起，想起青春，就想起了巴山。多年来，我们与通江的联系不断。我自己就给巴山的乡亲打过电话，写过信，寄去过钱和衣物。我们林场先后有陈代林、杨茂超、皮永诚等多人多次返回通江。2007 年 5 月，更是集合了十几个老知青，一路跋山涉水，穿过当年走惯了的黄草坡，爬上陡峭的龙洞沟。摘几片当年种下的茶叶，抓一把掺和着青春的汗水，甚至鲜血的泥土在手，真是感慨万千！更使我吃惊的是，一个并不是林场老场员，当年我也不认识的人，见面竟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年龄和我相仿的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唉呀！你是谢克庆！啷个头发都白了？那阵你身体好好哟！会拉手风琴。"看来当年在公社开大会时，和那些农民兄弟掰手劲，在牛儿沟的戏台上演出时拉手风琴，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难忘大巴山！难忘大巴山的火塘及其他！

作者简介

谢克庆，男，1965 年高中毕业于重庆七中。同年 9 月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兴隆公社聂家沟林场。后毕业于泸州医学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现已退休。

那年中秋月最圆

张崇实

一

1967年，是一个狂“热”的年头，与世人深陷歌如潮、旗如海的红色飓风中执迷不悟一样，老天爷也赶来凑热闹，秋旱连伏旱——整个暑季39度“高烧”经久不退。

9月18日，是中秋节，我要步行返回东乡。

这天，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身着当时颇为时髦的蓝白相间的海魂T恤衫，肩挎黄色小书包，足蹬一双半新旧的解放鞋，踢踏着露珠与碎石，沿溯一条不知名的小山溪，经潭口，进周洛，疾疾行走在进山的一条黄尘小道上。

夹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峰峦叠嶂，缥缈的晨雾尚未散去，山道上杳无人迹，清新的山风不时将竹林深处斑鸠的咕咕叫声与黄鹂清丽的啼啭声送人耳鼓。行走途中，间或有横跨溪流的高高小木桥和依山伴水的秀美吊脚楼在眼前一闪而过。透过薄薄晨曦，山崖脚下那一大片错落静谧的陈家祠堂后袅袅升起的炊烟依稀可眺，姚家老屋场中遥相呼应的声声犬吠隐隐相闻。我无暇顾盼眼前这水墨画般的山间晨光美景，只顾忙不迭地迈着脚步，向上，向前。

越往上走，路越来越窄，溪流也越来越激荡。待到火辣辣的日头透过重重峰峦照射在山道正中央、我身上的海魂衫也被汗水浸湿了时，一个巨大的，吱呀、吱呀作响，晃悠、晃悠旋转着的打水筒车出现在眼前——脚下的路没有了。

一座大山劈面凸现在面前。

我举目望去，只见眼前灌木稠密，林木葱茏，稍高些便是云遮雾障，青烟缭绕，莽莽苍

苍根本无从望见峰顶。低头瞧去，前面不远处的荆棘草丛中，一条长着些许青苔的崎岖石板小道约隐约现地蜿蜒而上。

是不是就是这条山路？我竭力分辨着，试图还想从身旁其他地方找到一条类似的山道加以比较。要知道，“望山跑死马”，我是输不起时间来回折腾的。

正当我徘徊几度拿不定主意时，一位中年樵夫“哼哧，哼哧”地挑着满满一担柴禾从前方这条弯弯山道上一步一滑蹒跚而来。

“借问大叔，往东乡是从这里过这连云山吗？”待他走到跟前，我迎了上去，满面虔诚地向他问道。

中年樵夫一脸困惑地瞧了瞧眼前这位赤手空拳、稚气未脱的少年，答非所问道：“后生，你今年多大了？就你单身一人过山岭？”

当得知年仅18岁的我不得不独身翻越这人迹罕至的山岭时，他转过身去，指着前面说：“确实，这就是连云山！进山后，经‘十八盘’，再往上走好十几里路，就可到顶了。当然，岭背后面下山的路好走一些，但也还要再走四十多里路方才可以到一个叫沿溪桥的地方。”

我连连向他点头称谢。

待我正打算试探着往没膝深的草丛中的石板路上迈出第一步……

“回来！”身后的樵夫叫住了我。

我应声回望过去，只见樵夫放下肩上的柴担子，从中奋力扯出一根酒杯粗细的梽木棒，抽出随身所带的锋利柴刀，三两下除掉枝椏，随即将它一头砍削成尖头的“梭镖”，递交到我手中并不无关切地说：“山高林深路滑，用这个一来防身壮胆，二来还可以用作拐杖以防跌倒……”说完，不待我再次道谢，只见他摇摇头，弯下腰挑起柴禾担子，晃悠悠地离我而去。

望着樵夫渐行渐远的身影，刚刚他所说的话还在耳畔回响，面对身前这巍峨挺拔、空旷幽森、深邃莫测的高山峻岭，孤身一人、手执梽木棒的我，相比之下显得那么渺小。

不知为什么，对下一步的行动，我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了。

如何办？是继续往上，还是从原路返回？我几番踌躇，不敢轻易造次提足向前——要知道，迷失在荒无人迹的大山中，后果只有一个……

以往下放江永的哥哥曾经叙说过：有一位知青迷失在莽莽大山中，方向尽失，三天三夜在深壑幽谷中盘桓，最终没能走出深山老林而饿毙。这更加深了我对身前这危崖高耸、绝壑连绵的原始大山的无比恐惧。往回走，来回仅仅多走了四十多里的冤枉路，不过生命的安全系数可能会大一些。然而那样，我的人生道路却可能面临另一番选择。

二

恍惚间，头天所发生的一幕又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

因为下乡后年幼孱弱的身体不能承受繁重的农业生产，数度累得趴在田头吐血的我，因为生存所迫，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周折辗转，寻访到地处平江与浏阳两县交界的大洛公社拜师学习木工手艺。

昨天下午，刚好举办完拜师酒之后，几位戴着红袖标、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以清查外流人员为由，凶神恶煞地出现在我面前。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将一切亲情友情全部抛弃殆尽，剩余的似乎只有一种敌对与仇恨的关系。面对所出现的陌生人仿佛都是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和现行反革命似的，因而脱口而出的每一句问话就像是审问犯人，每句话仿佛扔在地上的手榴弹——充满了火药味。

"出身、职业、家庭住址、有无证明？"一位五短身材、长着一脸横肉、看着像一位小头目的人咄咄逼人地向我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从前，可不像现今，每人都有一张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证可放胆行走于四方，而且不必向他人自报纯属个人隐私的出身。

当时，一般人外出之前，都要在户口所在地的大队去打上一张足以证明自己出身、现实表现以及行动去向的证明，并要盖上"大队革命委员会"大红印章才能生效。

望着这帮气势汹汹、耀武扬威的"活阎王"，我小心翼翼地一一作答："出身地主、下放本县××公社的知识青年，至于证明……"我停顿了一下说："我出来的时候，大队管公章的人不在，所以没有带。"

"没有证明，那……你就带上自己的行李，随我们到司令部走一趟！"

望着他们不容置疑的神色，想起不久前在湘南一个叫道县的地方所发生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将当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当做"地、修、反、封、资、修"的"残渣余孽"以赶尽杀绝，并很快波及当地下放的知识青年，使之也横遭屠戮从而惊动了中央文革的惨剧，我心中感到阵阵发怵，腿肚子也禁不住打起哆嗦来……我无奈亦无助地望了师傅一眼。

站在一旁的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给他们每人递上一支"红桔"，面带笑容地说："都是本地人，好说，好说。我担保：秋营长——我这个学徒成分虽高一点，但还是一个老实本分人，绝对称不上是什么坏人。至于证明嘛……要他回下放所在大队打一张回来，行不？"

"那好吧，看在应师傅的面子上，三天之内将证明带来，交给我们验证，否则不要让我

们再看到你！”点燃香烟之后，来人口气松了一点，但态度仍然冷冰冰、硬邦邦的，绝无回旋余地。

“妈呀，三天打来回？这简直比登天还难！”我差点从心底喊出来。

要知道，两地公路距离有三百余公里，中途需转乘两三次车，按正常情况要四五天时间才能到达。加之“文革”中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最近在县城武斗正酣，通往各地的公路要道上，交战双方早已重兵对峙，把守路口关隘，禁止一切车辆人员通行。

三天要我打来回，这分明是不准许我在此地继续待下去。看来因不堪艰苦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屡屡累得在田头吐血，被生产队善良的贫下中农看不过去后，方才特许我寻师学艺的学徒生涯尚未开始便即将废止。然而，从内心来说，我还真割舍不下这一好不容易寻访到的、自己今后赖以生存的机遇及想成为鲁班传人的梦想。

看着我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样子，待这帮人前呼后拥地去了后，师傅一把将我拉到门外，指着远处的一条黄尘小道说：顺着小道，沿着旁边的那条山溪朝山冲里走，径直走到路的尽头，就是连云山。山上有一条古驿道，早先没有官道时，田少人多的北乡村民都从这条古道翻越连云山，前往你下放所在的东乡插田拌禾，凭力气挣些零花钱，不过……由于修筑了公路，通了班车，现在很少有人走了。”说完，师傅回头望了望我，那神色似乎在对我说：有没有这种勇气？就看你自己的了……不待我回答，师傅继续说道：“只要你能吃得下这份苦，早行晚宿，翻越大山后，在三天之内说不准能返回。”

三

就这样，第二天——9 月 18 日，也就是中秋节的这天，一大早，我就上路了，身揣两个熟红薯和师傅给的二元钱与半斤粮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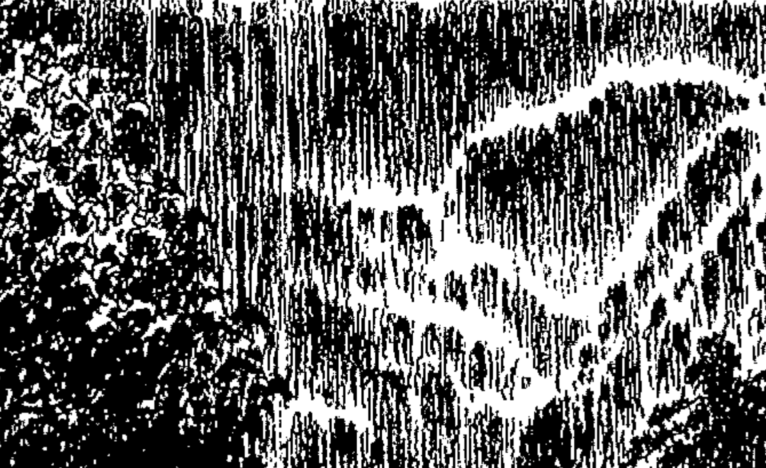
显然，临分手时，师傅他并未将翻越连云山的困难说得这么详细具体。是担心一开始将翻山越岭说得过于艰难我早早地打退堂鼓？还是希望我这位出身于城市中的学徒能克服困难走出困境，成为他今后的得意门生？我思前想后，不得而知。

“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

踌躇中，蓦然，我脑海中蹦出这豪气干云的古训。为了自己能如愿生存下去，暂且借眼前这座高耸云端的大山作为自己人生的一次历练吧，说不定坎坷之后是坦途。一时间，单身穿越崇山峻岭的想法占了先机——年轻气盛的少年将一切恐惧与懦弱抛向了身后。我弯下腰去，饮了几捧清冽的山溪水，将斜挎在身后装有红薯的书包捏了捏，抖擞精神，分开草丛，向深邃的大山迈出了第一步。

所谓“十八盘”，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之”字山路。只不过眼前这一条由一块块石板垒砌完成的超过 45 度坡度的“之”字路，每条“之”字的边长约有几十米。当我用自己的脚





艰难地一步一步丈量、数完百十个青石台阶铺设的一个巨大“之”字时，透过浓密的竹枝树蔓，回望下方刚才走过的路，其垂直距离竟达到五六层楼高。我咬紧牙关，低着头在心中默默地记着数：一个、两个……

不经意间，一次生死时速的生命考验在向我悄悄逼近。

走到半山腰一处当阳山坡，我抬头看到头顶上方不远处的荆棘灌木丛中伫立着一棵依山傍坳旁逸斜伸的高大杨梅树，望着果实全无、枝叶依旧浓郁繁茂、枝粗干高的杨梅树，心想，若是待其挂果熟透时再打这儿经过，我一定要顺溜地骑在枝繁叶茂的树干上，对着酸酸甜甜的杨梅果大快朵颐。心动时，嘴角唇边早已唾液涌动，好像已经品尝到了鲜艳可口的杨梅果。

正盘桓遐想间，忽然，一阵尖利异常的惨叫声传到我的耳边，同时还伴随着一声声低沉呜呜的嗥吼声，而且分明越来越近。

不好！遇到野兽了。我赶忙抓紧手上的梽木棒，慌不择路地拨开金钢刺丛，三五下，拼命登上山坳，攀缘到事先早已瞄准看好了的杨梅树上。此时尽管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我背后狠狠地牵挂拉扯了几下，仍然无暇顾及，奋力扯脱开去。

待我刚把身子藏匿在杨梅树浓密的枝干树叶之中，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十来只土黄色的豺狗，大声嗥叫着围追堵截，凶狠残忍地前后夹击追逐着一头约二百来斤体形大如牛犊的浅褐色野猪，一路狂奔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就窜到了眼皮底下，我这才看清楚：野猪的肛门已经受伤，高高翘起的尾巴底下，耷拉着一截粘着灰色尘土与暗红色血污的肠子。可能正是因伤跑不动，刚好停留在我原来所站立的路旁，鲜红的、斑斑点点的血迹一路滴洒过来，在青灰色的石板山道上显得异常刺眼。

这时，我唯有死命地抱住树干，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透过浓密树叶的遮蔽，瞠目结舌地注视着这近在咫尺的惊险一幕。只见被追逐的野猪将受伤的臀部紧贴山坳进行垂死挣扎，用它有力的带着尖利獠牙的嘴巴对着两个方向豺狗的同时挑衅与攻击左抵右挡。一只体形看似大一点的豺狗蹲在不远处一块巨石上，紧紧地盯着自己同伴与野猪的争斗，那姿态神色似与它无关又好像会随时都会一跃而下，参与吞噬野猪的战斗似的。

眼前的这只野猪显然已经遭受了致命创伤，起初，仍不时用强有力的獠牙巨嘴将身边前来挑衅的豺狗偶尔甩开掀翻，使其发出一阵哀号，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被身手敏捷异常的豺狗攻击而躲闪。几个回合之后，野猪嘴巴甩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动作也越来越显得缓慢沉重、绵绵无力了。终于，趁着一次向一旁挑逗的豺狗回击不力，缓慢转身所露出臀部抬高的破绽时，远处那只大一点的豺狗发出一声怪嚎，几只豺狗同时涌到了野猪的背后，几爪几口将野猪的肛门彻底撕裂，鲜血淋漓的肠子更是被拖出有老长，野猪发出最后的一声哀号，终于放弃了抵抗，四肢倒地而抽搐不已。这时，那只大豺狗向前一跃，对

准垂死野猪的臀部给予最后的一击。只见它将早已洞穿的肛门咬着奋力朝外一拽，似乎在我的眼皮底下开办了一个杂酱铺：野猪体内所有鲜红的、褐色的、花白的五脏六腑似乎全部掀了出来，场景极为恐怖恶心。

终于，所有的豺狗蜂拥而上，土黄色全部遮盖住了浅褐色。就这样，前后不到半个小时，在一阵低鸣嗥吠与撕裂咀嚼声中，一只硕壮的野猪顷刻间就消失了。又听得大豺狗一声仰天长号，大大小小的一群豺狗都齐刷刷地跃下悬崖，钻入茂密的山林，跑得无影无踪。

我胆战心惊地看完这异常惨烈的一幕，伏在树上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良久，我战战兢兢连滚带爬地从树上退下，回到曾经发生过生死搏斗之地，发现野猪仅仅剩下一张坚硬如铁与四只蹄子连在一起的粘满血污的外皮，甚至连地上的骨殖都被清理得一干二净。我暗自庆幸：老天保佑，蹲在稍远处的老豺狗并没有发现在高高杨梅树上枝叶的遮蔽深处，还有另外一个可供顺便捎带的可口的活物，否则，相信更用不了几分钟，我亦将成为这个世界的冤死鬼。想到这里，我浑身发软，心存惊悸，好久还迈不开步子……

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遭遇之后，我确实感受到独自置身于大山之中所蕴藏的险恶，心想，唯有早早脱离这令人惊愕的险境，才是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

于是，我重新握紧梽木棒，加快了上行的步伐，继续蹒跚上行。刚走不到一会儿，感到背上一阵火辣辣的疼痛，我想这肯定是被荆棘划破，经带酸性的汗水浸润，自然就会感到疼痛。一摸，背后的汗衫果然被拉扯成了烂布条，我将书包转过来一看，书包也被扯开一个好大的口子，包中的红薯也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心中一惊：干粮没了！这就意味着我必须饿着肚皮走完以后的绵延山道。

好在真如长途跋涉者所言：行者饱，坐者饥，睡着能吃一簸箕。

确实，行走了大半天的山路，我并没有丝毫感觉到肚中饥饿，只是口渴，要不停地喝水。要喝水，这倒不费难，因为山道上最多的就是飞瀑流泉可供尽情享用。

就这样，我走一段路，喝上几捧山泉水，以补充流失的体液。渐渐的，我感觉天地宽敞起来，天色也亮堂了许多。哦，前方眺望到了没有树木的地方。从学校中所学到的知识中我知道：海拔较高的山峰，山顶处往往只长茅草而不长树木。

胜利在望，我心中又一次感到欣喜与轻松，看来只要再加把劲，登上眼前的这座小山崮，转过最后一个山窝，就可以接近山峰顶部，乃至可以完成最后的登山之路了。

当我费尽千辛万苦登上了峰顶时，西边天际处已是一片通红的火烧云，浓浓的暮霭将脚底绵亘数十里的峰峦渐渐笼罩，昏暗的山林之中响起片天籁之音，圆溜溜、泛着淡淡光彩的月亮悄悄在头顶偏东方向升起。

此刻，我内心有些发紧，眼睛好像冒着金星，头部也感到阵阵发烫，喉咙像要喷出火

似的，双腿像灌满了铅般肿胀发痛，浑身上下就好像有千百根针在扎，好想好想就地坐下休息一会。但我内心知道：决不能坐下，一旦坐下就会起不来，在这荒无人迹的大山顶上不被野兽吞噬，也将会饿馁冻毙。

多谢樵夫大叔所给予的梽木拐杖，借着它的力，我跌跌撞撞地下山了。

好在下山的路比上山那边要宽敞平缓些，而且树木也没有那边茂密。渐渐的，头顶上的一轮明月如一个银盘明晃晃地扣在空中。感谢这一轮浑圆的中秋之月如水银泻地般的照耀，我得以借着月光，用梽木棒将齐腰深的茅草拨开，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下到了半山腰。行走中，尽管也曾两眼看虚，踏空摔倒，所幸只是皮肉外伤而并未伤筋动骨，还能坚持继续前行。

此时，黑魆魆的山林中，不时有猫头鹰发出像婴儿夜哭似的嗷嗷鸣叫声。头顶身后不远处，总有对对绿莹莹的“灯笼”在紧紧追随着我：那是夜晚出来觅食的野兽在寻找猎物。我不断地警惕着自己：坚持，不能倒下！倒下就会成为身后众多野兽的口中餐。在求生的本能与欲望的支撑下，尽管感到饥肠辘辘，喉干舌燥，体力也好像到了极限，我仍咬紧牙关坚持着，坚持着……

一时间，好像被浓浓的睡意笼罩着，冒着金光的眼皮沉甸甸的，即使在如同白昼的月光下，仍恍恍惚惚，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晰，我凭着感觉一步三摇地往山下蹭。当然，还真得感激头顶上方——这一轮浑圆皎洁的中秋月，让我不曾摔进深深的崖底。

走啊，走啊……就在快要坚持不下去，也似乎弯弯山道还不曾看到尽头时，隐约间，我看到前方不远处小山冲里有一盏橘红色跳动着的灯火。

我在内心狂呼起来：我有救了！那不是野兽，野兽眼光是阴冷暗绿的！千真万确是山里人家的照明煤油灯的火光。心里反复念叨着：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四

仿佛是用尽了最后的力量，我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来到了一栋简陋的农舍前。将身子靠在大门边上，我用梽木棒玍了玍大门，就伏在门槛上似睡非睡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朦胧中，感觉到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是什么人？”隐隐约约感到是一中年男子的声音，“不是什么造反派吧？”

“哪有这么多坏人？看！还是一个小后生。”感觉到一位女性轻柔软绵的手一把将我扶起。“哟，浑身滚烫的，衣裳也扯成这样了。快，老倌子，帮我将他扶到屋里去。”

直到第二天临近中午，我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是躺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床头。

我从床上下来，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也不是自己的。从房子里出来四周看了看：这是一幢农村中常见的“一担挑”格局的泥土砖砌就的农舍。房屋正中厅堂上挂着一块“光

荣军属”的牌匾，旁边是一幅现役军人的黑白放大照片。

菩萨保佑！我“病急乱投医”还真是投对了。

心中正犯嘀咕，一位大婶端着簸箕从外面菜园中进来。

“起来了？昨天晚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浑身滚烫得像一团火似的，嘴里老是‘证明……证明’地讲着胡话。我们老两口只好给你又是掐人中，又是用山泉水给你做冷敷的，最后给你通身抹了个澡，喂了一点发散面条后，你才昏沉沉地睡着了。”大婶如是说。

我这才明白是如何进得来这农舍的，赶紧连连向她道谢，感谢他们在我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救了我，同时将自己的来历全盘告知与她。

大婶欷歔不已地听完我的讲述，得知我也刚刚年满18岁时，便指着墙上的照片自豪地说：“看！你和我的小儿子同年，现在他已经参军在北京‘支左’。”

我急着要走，大婶对我真情地说：“看，你的脚肿没有消退，就在我家再休歇一两天，等身子完全恢复好了再走吧，反正我的大儿子也走人家了，我屋里老倌子也去参加运动了，家里再没有别的人。”

我告诉她，有要紧事急着赶路，况且自己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看到我执意要走，她将早已缝合好的黄书包递给我。翻开书包，发现里面尚存的两元钱与半斤粮票还存留在布缝中，我立马拿出交给她作为“报偿”，却引起了一场争执。

几经推辞后，大婶佯装生气地说：“我也是做娘的，哪有妈妈让自己的儿子吃一两餐饭还要收饭钱的？你身上的衣是我小儿子的，就当你这位长沙来的干儿子时刻感受着妈妈的照顾好了。”

话已经说到了这种程度，我眼含热泪地接过已经补好的、里面再次装着几个熟鸡蛋和红薯的沉甸甸的黄书包，身穿同龄兄弟的对襟衣裳，挥手与“大婶妈”告别。

待我回大队开好“家庭成分较高，本人表现可好”的证明从原路返回，拟再次向“大婶妈”——我心中的“活菩萨”一家道谢时，几经折返，盘桓数度，却总也找不到中秋夜晚住过一宿的那幢农舍了。此刻，我再一次深深后悔，当初匆忙中没有打听那两位慈祥但又素不相识的救命恩人的姓名。

人生如梦，岁月如歌。

弹指间，近四十年过去了。事隔多年，每逢中秋之夜，一轮皎洁如银的朗月高高镶嵌在广袤的夜空下，品香茗，尝月饼，年纪早已过半百的我，总会想起那刻骨铭心危难历尽的漂泊羁旅和洒满人间温暖关爱的中秋月夜。

作者简介

请见《迟到的鞠躬》后的作者简介。

天赐姻缘

唐生伟

人世间男婚女嫁，夫妻一场，实在是一种缘分。我十分相信姻缘，我的婚姻就是一场天赐良缘。之所以这样说，还因为我的婚姻有着某种传奇和惊险。

缘　分

1964年8月，我辞去了富顺县市管会的工作，成为第二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有三个妹妹，父母就我一个儿子，当时真舍不得我离去。临出发的前夜，我突然发起了高烧，睡在床上起不来，带队的请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知青办的领导来看我，劝我不要去了。但我意志坚定，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农村去，炼就一颗红心。第二天早上，竟然烧退了，病好了。上午九点钟，知识青年上车起程了。县市管会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在欢送的队伍里，我父亲也赶来送行。领导对我说："下去好好干，多来信，三年后又欢迎你回到市管会来。"

当天到达筠连，首批知青就迎了上来，热情地给第二批知青提包包、拿东西，欢迎新战友。原来认识我的知青说我是知青工作组的同志，是送第二批知青的。我说不是，我是来当知青的。工作组的同志证实了这一点，大家才信了。

第二天，蒿坝公社党委书记杨永贵对陈县长说，水龙大队周支书要求分几个知青组过去，那里缺少文化。陈县长召集知青组长开会，说水龙路距蒿坝40华里山路，很贫困，缺少文化知识，动员愿意去的报名。当时我们组和周祥熙组、张润生组踊跃报名，表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三个组买来大红纸，写了决心书，又在街上借来锣鼓，敲锣打鼓给党委送去。我们的愿望实现了，终于到四川省南部的筠连县蒿坝公社的水龙山落户了。



作者与夫人的结婚照

水龙的周支书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三个组的知青当成了宝贝，他亲自回去组织人到公社来迎接我们。这里是川滇交界的苗家山寨，汉、苗杂居的农村，风俗文化与城里有不小的差别。迎接的队伍来了，他们打着锣鼓，吹起唢呐、芦笙，热热闹闹地来了。我们组落户水龙三队，迎接的除了一些男子汉外，还来了好几个农村姑娘，我热情地递烟敬茶，男子汉接了，姑娘们却不好意思，只是笑。我的大红木箱子被一个小姑娘绑在架背上，我说：你背得起吗？她笑笑说，背得起。

下乡之前，我在富顺城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下乡后，我们感情却逐渐疏远，具体原因实在难以解说清楚。她虽然多次来信，我最后还是觉得我们之间没有这个缘分，断绝了和她的关系。女知青中，也有追求过我的，我觉得不太合适，也放弃了。母亲疼爱儿子，也为我介绍过女朋友，因为没有感情，也没谈好。毛主席“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号召，成了我终身结缘的思路。

说也奇怪，落户第一天给我背大红木箱的那个姑娘，倒成了我心中抹不去的影子。她叫周善容，年轻漂亮，聪明贤淑，对人总是笑眯眯的，穿着很朴实，不怕吃苦，显得很勤劳，是生产队女孩中的一把劳动好手。她上进心很强，敢同男子汉比高下，总是当生产队排头兵，样样活儿干得很出色，老是跑在男子汉的前面。她是众人夸奖的好姑娘。

就是这样一个好姑娘，因为她父亲有文化，教过私塾，当过半年伪保长，尽管家庭出身贫下中农，但由于父亲的影响，许多政治活动不让她参加。我认为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嘛。于是我亲自找到大队支书和主任说，让她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书、主任同意了，她从此也从“黑九类”中解放了出来。在宣传队，我教什么歌、什么戏，她一学就会，表演十分出色。记得在跳《毛主席的光辉》、《北京的金山上》这些舞蹈时，她比谁都跳得好。我对她更增加了几分爱慕之情。

有次到云南楠木公社宣传回来，漆黑的夜晚，我们打着火把往回走，突然雷电交加，天上下起了暴雨，火把灭了，全靠闪电寻路。大家都忙着回家，我像落汤鸡，全身湿透，摸

着黑路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走着，心里也有些害怕。这时耳边不停地传来温柔的呼叫声："唐老师，你慢慢走，跟着我的人影走，小心摔倒哟。"我这时才发现，其余人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唯有她在前面为我领路，我好感激哟！终于，她把我送回公房住地，细心叮嘱我要换去湿衣服，不要着凉了。这也是我一生难忘的事。后来，我们到公社开会，一去两三天，她就同另一个姑娘给我看家。由于住在一个生产队，家又隔得很近，经常一起劳动、宣传，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

定　情

女知青吴椒玉见我们很般配，主动为我们牵红线。但善容在她几岁时，父母就为她包办定了终身，男方是一个比她还小三四岁的小子。受封建婚姻影响，他们从来不见面，就是相互躲着，全由大人说合。善容本来就不愿意这门亲事，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不敢反对。通过一些社会活动，她的思想觉悟提高了许多，加之吴老师说合，她非常愿意和我结为连理。一天晚上，姑娘小伙们来到我住的公房厢房竹楼上听收音机，她也来了。听完后，人家都走了，她被我留下来和我谈心，双方情投意合。她送了我一条白线手工编制的白飘带，非常精致，我送了她一双红棉袜和一张花手巾，算是定情物吧。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她怕父母久等，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竹楼。

这件事她向她的父母说了。父亲也不反对，但他是"四类"分子，是阶级斗争批斗的对象，生怕别人说他用美女腐蚀知青，罪名承担不起。

后来，这事儿传出去了。他父亲唯恐出什么乱子，就叫女儿去云南她大哥那儿躲一躲。临去云南时，善容跑来找我，说明了父亲的意思，我为她撑腰壮胆，叫她不要去。可是她拿父亲没法，还是去了。她走后，几天不见她的面，我心里不免时时思念和着急。

那天我去中心校开两天会，回来见我住的角楼板壁遭到破坏，进屋一看，室内东西被盗窃一空。我着急了，以为是有人为我和善容的事捣蛋。这时公社韩书记、武装部李部长和大队会计冯廷学、党支部书记兼民兵连长熊付兴来了。当晚召开全队社员大会，会上分析案情，强调指出这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要一查到底！第二天天刚亮，发现被盗的东西全部被丢在山坡上，大家急忙帮着抱回来。逐件点物清理，发现少了 70 元钱和 140 斤粮票。早饭后，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又组织召开了社员大会，经过分析和排查，会上点了富农分子儿子的名字。重压之下，这人只得承认了罪过，从公房厕所的石板下拿出了钱和粮票。

过了两三天，熊付兴邀请我去他家。他是一个苗族，对人忠厚，办事认真，我应邀前往。

刚走到苗寨洞坪上，就遇见了苗族教师韩宗成夫妇。他们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的老婆在熊支书家等你。"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这一喜讯，有些害羞

脸红了。到了熊支书家,他热情向我招手,请我进火炉房里喝茶。一进房,果真见到了我思念已久的恋人。我们双方叙说了别后十多天的内心话。当晚,熊支书准备了丰富酒宴,为我们祝贺敬酒,也就算为我们订婚了,我们有说不出的感激。

第二天在支书家吃过早餐,双双把家还,拜见她的父母。父母见了我们非常高兴,特意为我们做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希望我们恩恩爱爱,建家立业,白头到老。她的二叔、三叔、幺叔知道我们订婚的消息后,都为我们高兴。二叔的儿子周善伦和我耍得最好,还特意邀请我去他家。他家在羊子坪,坐落在很高的一个大山坡上。记得那天下着鹅毛大雪,满山遍野一片洁白,道路很难行走,但为了爱情,哪怕刀山火海也敢闯。来到善伦家,嫂子送来了热茶和洗脚水,我烫了一个舒服的脚,用完晚餐,善伦叫善容到他房间里同我们畅叙,情深意切,我感激万分。

抢 亲

就在我们准备回富顺过年的时候,一天天还未亮,周大姐叫醒了我。看到她着急的样子,我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她慌慌张张地对我说:"唐老师,你快跑,郑家抢亲的来了,他们人多,要打死你!"我急忙起床,穿好衣服,不慌不忙洗了脸,端了一盅水带上牙刷,故意走到公房那边抢亲的人看得到的地方刷牙。

抢亲的那伙人约有四十余人,个个手持木棒,气势汹汹,高声叫喊:"就是他,把他拉过来,打死他!"

刷完牙,我慢步走向公房,边走边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当我一走到公房,就上来几个山野汉子抓住我的双膀,其他人手挥木棒不停吼叫:"捆起来,打死他!"此时此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派来的,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法律就要枪毙他!"拉我双膀的山野汉子急忙松了手,论理说道:"你违反婚姻法,捆你到我们云南黄河公社去!"我说:"违反婚姻法的是你们,你们搞包办婚姻是犯法的,我们是自由恋爱,不犯法。"这时又有几个人上前拉我,女知青吴椒玉慌了手脚,急忙上前阻挡,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我说:"她是女知青,怀了孕,你们推倒她,是犯罪!"此时熊支书、冯会计、韩老师闻讯赶来,善容也露了面,他们的媒人上前抓住她,叫人把她拖起走,我跑上前去,不允许他们抢亲。我说:"她已经是我的人,谁敢动她,我就同谁拼了。"

这时大队干部把他们叫到一边,通过算账、调解,赔了他们订娃娃亲的彩礼,这场风波才算得到了平息。

第二天,亲友们送来了山货,亲切祝福,我和善容告别父母,终于双双踏上了返家的路程。回到家里,父母和妹妹们都非常高兴,大舅和舅娘全家也从南部县来了,全家人一起团团圆圆过了年。1968年正月初四,在父母和亲友们的关怀下,我们正式办理了结婚

证，举行了婚礼。

情　歌

知青跟当地青年的婚姻，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原因，成功并圆满的其实很少。袁光荣，是我们同一天落户老君山麓水龙五队的知青，他同周祥熙、陈从惠、张佑仁、邹绩志一个组。他是个孤儿。他到齐心村知青农场后，常到我这里来玩，性格很开朗。我见他这个人本分老实，就同善容商量，给他介绍一个山村姑娘，当上门女婿。他们见面后，双方一见钟情，完全同意，女方父母要求要“三回九转”，按封建礼节办理。这一来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后来招工，由于他出身好，又是孤儿，被自贡大安盐厂招收为工人。从此，这门亲事也就罢了。

跟我要好的知青还有张润生，他和我同天插队。有一天我们赶场归来爬坡到半山腰时，已累得口吐青烟，寸步难行。突然，我们看到路边有座茅草屋，高兴起来，准备讨口茶喝，歇脚纳凉。进屋后，一个穿着素雅的姑娘请我们坐，给我们一人送来一大碗凉苦丁老杆杆茶，一股清香的茶味扑鼻而来。喝下整碗苦丁香茶，顿时觉得全身轻松。我们向姑娘道谢后，离开茅草屋又上路了。出门不远，张润生突然高声感叹“嘿！太美了，茅草屋里出西施。”这时我才深深感到，这位山村姑娘确实非常美丽。但后来一打听，这位美人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漫长的农村生活平淡而艰辛，那时的生活确实苦，买什么都凭票，计划供应，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我和善容结婚后，她年年都要喂几头大肥猪，除了卖，就是杀来自己吃。她除出工挣工分外，还要打猪草，做家务，带孩子，晚上等孩子睡了，还要打缝纫机，太辛苦了。当时杀猪要毛猪票，我的二叔（岳父的弟弟）是个杀猪匠，他一字不识，但办事很认真，不见毛猪票不给你杀猪。有一次，我挖好了土灶，三水锅里的水都烧涨了，他来了不见毛猪票，说什么也不杀猪。没办法，我上街花了 50 元钱买了一张毛猪票，他见了后，才给我们把猪杀了。等杀完猪，吃了年猪肉，我又将买来的毛猪票卖了，收回了花去的 50 元钱。周祥熙和刘亚丽结婚后，也喂了一头大肥猪，想杀来过年，带些回富顺老家去，但没毛猪票，杀不成。我们想了一个办法，请来我的叔伯舅子周善伦（会杀猪）来到高桥四队周祥熙住地，等夜深人静后便开始杀私猪，几个知青一起牵出猪，捏住猪嘴，不让叫出声。杀完后，打整出来，砍成一块一块的，当场弄了些来吃，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说笑，好开心哟。

有次我到社员周吉科家推包谷，推累了，就到他家火炉边歇气。只见他家几个孩子围坐火炉边，数九寒天没衣穿，光着身子烤火，个个满脸满身是黄黑黑的灰土。火炉上烤着一些粑粑，那时我肚子也有些饿了，就试探着问娃娃们：“这是什么？能吃吗？”大一点

的孩子约有七八岁，望着我笑着说："是仙米粑。"我真觉得奇怪，他们过的是神仙日子哟！那大孩子又开口了："你吃一个吧，不要咬久了，咬久了就是沙沙。"我就顺手拿起一个，热乎乎的，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问孩子们，这是什么做的，他们说是白泥巴。我惊了，山区的泥巴也能吃！大孩子又开口说话了："家里早就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吃仙米粑，要少吃点，吃多了拉不出屎。"我感到心悸，骇然不知所措。

对比之下，在这样漫长的艰苦岁月中，我的一家之所以活得像个人，完全是爱的支撑。在此，我深深感谢我的这段天赐姻缘，感谢我的夫人——周善容。我把我 1968 年正月初四为她写下的《山乡情歌》，录在这里，以飨大家。

妹妹穿双绣花鞋，
腰间系条红飘带。
瓜子脸蛋白又嫩，
抿嘴一笑逗人爱。
哥哥下乡远方来，
插队落户登讲台。
哥哥爱妹好勤快，
妹妹恋哥长得帅。
哥哥妹妹情意长，
就像高山金凤凰。
敢破封建结连理，
恩爱夫妻受赞扬。

作者简介

唐生伟，1942 年出生。大专文化。1961 年在四川富顺县市管会工作，1964 年志愿申请上山下乡落户四川筠连县蒿坝镇水龙村。在农村从事教育工作 15 年。1979 年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历任副乡长、乡长、巡司区文化干事。1992 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受训结业。

梦绕魂牵大小凉山

叶维智

告别蓉城

1964年4月8日，阳光透过人行道上法国梧桐茂密的枝叶洒满蓉城街道，急急奔走的人们大多是街道待业的城市青年，他们从各个路口汇聚到坐落在后子门的四川省成都市体育场，参加市政欢送知青下乡去凉山的欢送大会。体育场四周看台上坐满了年轻人，锣鼓喧天，红旗满天飞舞，歌声欢笑声响彻全场。我们坐在东看台的是来自成都市北大街、白家塘、西安路等街道办事处辖区的百余名男女青年，胸前戴着比碗口大的大红花和一枚红底金黄绕边的上山下乡纪念章，有的还戴着印有“到农村去”字样的草帽，扎着雪白的毛巾，脸蛋上红扑扑的，一个个天真烂漫，群情激奋地喊着“农村是广阔天地，到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与其他看台上同样亢奋的年轻人遥相呼应。

刚满18周岁的我也在这群激动而淳朴的青年中，即将告别生活了18年的城市。当环顾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物时，我思绪万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自由。我1963年初中肄业于成都二十五中学后，在家待业，加入了社会青年行列。母亲去世早，父亲还在市土产公司上班当会计，我跟着哥姐读完中学，渴求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参加社会劳动，获取劳动报酬养活自己。但待业近一年，等来的是上山下乡动员，而且被告知：“不去的，今后18年不调工作！”就这样，我在街办动员会上签名下了乡。

在高昂的《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勘探队员之歌》等歌声和欢呼声中，市

政领导将一面印有“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大字的红旗，授予即将开赴农村的一名高个子男青年手中。大个子激动地双手紧擎红旗，在头顶上呼啦啦晃动。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嘹亮的歌声响彻体育场上空！在那面大旗和巫方安、孙传琪的引导下，东看台的一百名城市知识青年列队，背着简单的行李，率先冲出了体育场，在后子门至人民南路广场上，我们在沿途夹道欢送的干部、市民们的掌声中，登上一辆辆停在市政府(皇城)门前的解放牌大卡车，告别亲友，告别父兄，告别市民，告别生养自己的故乡，从此踏上人生漫漫路。

落户昭觉

车轮滚滚，4月8日宿五通桥沫川，9日在雷波西宁农场过夜，10日晚住美姑县城招待所，11日车队终于进入凉山昭觉县境内。上午十时左右，队伍来到竹核区温泉山附近，同路到达的彝族向导和汉族干部向知青们介绍了这里温泉的情况，并引导青年们宽衣解带，脱了个光溜溜，一丝不挂跳入温泉池中，沐浴温泉水，洗去征程土，干干净净，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准备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昭觉城。

1978年以前，昭觉曾是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过去曾有人说“不到昭觉不算到凉山”，昭觉位于大凉山的核心地带，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我们102名成都青年来到这古朴神秘又十分向往的地方不多久，接来送往和合影留念的欢乐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旅途的辛劳也已恢复，我和知青们都在思考着下哪个乡？插哪个队？乡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从成都出发一直是个谜……

正在知识青年们猜想不定时，州、县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宣布了知青下队分组名单：

南坪大队三个小组共49人(其中南坪一、二队小组20人，三、四队小组21人，五、六队小组8人)；塘木大队小组25人；跳坝大队小组17人；乃拖大队小组11人。

并宣布任命了各组组长、副组长。孙传琪、巫方安任大组长并兼任南坪三、四队小组负责人。担任各个小组负责人的还有：陈保清、高永智、黄达砺、徐孝清、邓云芳、钟履端、陈泽谦、张恩宇等人。

我与其他20人分在南坪三四队小组，是知青人数最多的组，而且还与孙、巫二位名人在一个组，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知青们各自归队归组，相互认识结伴，跃跃欲试要去自己的新家，去新的知青生活点，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当即，招待所会议室的正墙上就有与众不同、政治敏感性强的人，张贴悬挂出了十多份“决心书”。

喝安家酒

4 月 14 日，我们三四队知识青年按组先去了专门为汉族青年修建的知青屋——三室一厅的住房，男女各住一室，住房内是靠墙的通铺。中间是过厅用来放劳动工具，并作学习和开会用，房头有一小屋是厨房，我在这里度过好几个春夏秋冬。

刚放下行李我们又被彝族社员分别领走了，领走我的是四队的一家彝族青年男子。一路上，他在前我在后，语言不通，路上只能用“手语”沟通。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他告诉我他叫阿尔木火，23 岁。论岁数，我小他大，我就叫他“阿木哥”。

我被阿木哥带进彝族式瓦板房后才明白，这是要按照民族风俗喝安家酒，吃坨坨肉。阿尔木火家在紧靠机耕路的瓦板房里，只见三个石头支起的大铁锅里热气直往上冒，“这叫三锅庄。”——木火轻声比画着说。灶膛里熊熊火苗映红了宽宽的屋子四周，这才看清屋内有一木质大粮柜很显眼，头顶上有低低的楼阁，楼阁下面有一半是牲畜圈栏，另一半就是烧锅吃饭用的空地了。屋内没有床，据说主人都睡在饭后熄火的“三锅庄”旁边。木火阿哥热情招呼我席地而坐。在火光中，眼前除了锅灶外，还有摆在灶边地上的碗盆勺和筷子，碗里是飘香的白酒，盆里是拌好盐、辣椒、花椒的有男人们拳头大小的猪肉——这就是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坨坨肉”。还在锅里煮的是彝族同胞家家都会做的“都拿巴”——就是彝家女主人用黄豆泡水推石磨，再用石膏或卤水“点”出来的像汉族的豆花一样的东西，再放些头年煮好晒干的元根叶子，既是菜又是汤，起锅后用“马食子”（彝家的勺）捋起就着辣椒水吃。再放些像干树枝一样刮成粉末的“味精”——木浆子，其味道真不比豪吉鸡精差！

主人木火一家一举杯——是碗！根本不会喝酒的我傻了眼。只听男主人道：“如如阿依，瓦吉瓦！”（彝语：知识青年，好得很！）“苏，苏！”（彝语：吃，吃！）什么也不明白，但什么都明白了呵！于是，酒肉穿肠过，民族友谊心中留！吃了坨坨肉，喝下安家酒，扎根凉山，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凉山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了！

过劳动关

生产队的活路有重有轻，但无论是谁都分配干啥就干啥！如：栽秧、打谷、背粮、挑粪、挖土、掏沟、送公粮、卖余粮……有的头顶烈日骄阳，有的脚浸冰冷水中，还有的背驮肩扛，弯腰跪膝……一个季节下来，哪一样活路都能让你脱一层皮，手脚血疱一串串。夜里脱鞋洗脚挑血疱的滋味，是酸是苦，是辣是咸……就拿挑粪积肥来说，到昭觉城里单位或公共厕所粪坑里装满一担粪挑回生产队，就可以挣到一天的工分。可这一担粪很不容易找够。城里厕所固定那么几个，有的还承包了，粪坑上都加锁加盖，找粪的社员又多，

有时一天下来半挑也掏不够。于是也要过假把式——到水沟里捋几瓢水或扯几把草草，混在粪桶里搅一搅，糊弄记分员。三队知青邹元贵每次进城挑粪都脱光肩膀挑，他说是肩膀磨烂了还能长好，衣服磨烂了没钱买！不知是节约还是……南坪五队女知青周云芳上街掏了一天才掏满两桶粪，天黑了才挨饿挑回去，可担子太重，把扁担压断了，大粪洒了一地。看到辛苦一天的劳动果实化为乌有，急得眼泪都滚出来了！咋办？就这样回去，一天没工，白干了！一着急，她弯下腰用双手将洒地上的粪便揽起来装进桶里……

常言道：没有粪臭，哪来饭香呵！

下乡时我在南坪四队四名知识青年中是身体最单薄的，1.68米的个子，体重只有八十来斤，清瘦无力。生产队每次派活路都把我和彝族女社员分在一起，照顾我做些薅草、扯豆子、匀苗、浇水、撒化肥等轻活。我们知青在生产队除了与社员一样劳动和评工记分外，还烧过砖瓦窑、改过勒马锯、打过石头、抬过电线杆、修过电站、淘过沙石、到田边地角为农民理过发……大多知青还是咬牙坚持住了，闯过了劳动关。我们每天收工或晚饭后聚集在队办公室或仓库里，自报公议，评质量，比数量，有斤两的算斤两，有尺寸的量尺寸，一分一厘也不多给也不少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呵！南坪五队小组女知识青年小周还当上记分员，用讨教学会的彝话为社员评工记分。

1964年8月10日召开南坪公社第一次新社员大会就表彰了一批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吃苦耐劳的"五好社员"知青代表。不过也有过不去的，下乡不久，就有以眼睛视力不好、个子矮小无力、体弱多病、城里爹妈年迈需要照顾……为由，离开乡下，返回城市的。

劳动关的确不好过！

闯生活关

从百万人口的省会大城市到边远山乡沟壑，生活方式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彝汉风俗更是不同！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对青年人本来就是一个大转变。下乡到队后，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要让年轻人重新掂量掂量。我插队的彝族区乡以洋芋（土豆）、玉米、荞麦为主要粮食作物，水稻是从汉族内地引进栽培的，因日照的原因亩产只有二三百斤，而且面积很少，基本口粮就是土豆和玉米。按照生产队的栽种收获分配，只能收什么分什么，分什么吃什么，一季顶一季，一粮接一粮。由于知青没有家底，年轻人胃口又好，计划内那一点点根本不够吃的。自留地种上还没收哩，拿什么来填补？南坪三、四队小组的男知青一个个都是"大胃"，知青张恩宇特别能吃，每顿饭吃下自己那份定量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于是就在吃饭之前，先喝一大缸（盅）米汤或菜汤垫底。

吃的靠分配，烧的咋办呢？上山砍柴禾，是各知青小组唯一的也是最具体的途径。

在距知青点十多里外的喏么山上有供烧柴用的薪炭林区，每次砍柴从去到返回要一大天时间。早晨天不见亮出发，天黑月亮爬上天空了，却还在路上。上坡下坎，冬天还要涉过冰凉刺骨的河水，那一背背湿漉漉的树枝，浸透了知青们的汗水。

下乡头一年，大家都有一份政策性的配给粮食，粗细搭配，有滋有味。又生活在集体之中，男女知青分两人一组，每组煮一天饭。虽然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大多知青下乡前很少会做饭做菜的，特别是烧湿柴茅草，无法煮熟20人吃的一锅饭，不是煳了就是生了。我在三、四队小组因为特能烧湿柴禾煮饭，还由大家推荐“客串”了一把炊事员，干一年工分3600分，由全组知青支付，顶上生产队一个全劳力了。我当炊事员那一年，配给粮没有了，生活补贴也取消了，只能按生产队农作物季节，分什么吃什么。我们汉族知青都没有存粮，分洋芋吃洋芋时，主粮就是洋芋。我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做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饭、土豆汤、土豆丁、烧土豆、烤土豆……各种吃法都用尽了，知青们还是一天难咽下几块土豆，肚里咕咕叫个不停。生产队还种植一种类似汉区萝卜的元根当蔬菜，我就用元根炒片片、拌丝丝、煮块块，尽量把麻辣酸甜味道做好一点，让大伙能多吃下一二块洋芋，有力气干活儿。分玉米了，原本可以吃个饱了，却没几斤，到加工房打成玉米面只有百分之九十，剩下的百分之十是麸子。等到啥都吃光时，这麸子就成了口中佳肴了。到分荞麦时，有苦荞甜荞两种，且吃法各异。

生活的滋味酸甜苦辣咸，环境磨炼人，生活穷欢乐。在缺吃少穿的困境中，知青们笑“熬”江湖，曾有过较灰色的行动——学时迁抓过邻居的鸡鸭；“跳丰收舞”狂背过农科所试验田和生产队的蔬菜；没有家具还到昭觉中学教室里扛过课桌椅……而生活就是生活，青年们从生活中学会了生活。南坪一、二队小组知青们靠自己的双手、汗水和劳动，摆出了一桌桌丰盛的佳肴——全南坪知青点生活现场会在这里召开了。

有啥吃啥，这在如今没什么不行的。而在当年那种环境条件下，几个月吃某一种东西，且很少有油、盐、酱、醋、肉、蛋等副食品调剂，生活是否太单调了些？县城一位退休干部回忆当年不少知青都缺吃少穿，有的肚子饿了去串门，为的是混顿饱饭吃！据说当年孙、巫二人一顿竟吃下两斤干面条！那个扛大旗的大个子知青冯伯良，一口气吞下近十个二两一个的白面馒头！体力消耗大，再能吃也不长肉，多数知青都很瘦，但瘦得有精神！

生活关不仅是吃和喝，还有穿衣戴帽同样要闯一闯才能过关。据观察，不少知青很注意这个穿衣戴帽，尤其是我们女知青们。因为年轻只要合身穿什么都美都靓，穿什么都好看；因为年轻只要稍稍改改，戴什么都漂亮！但衣服穿烂了又还没钱买新的时该怎么办？当然是学雷锋，学老红军，发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艰苦奋斗精神——补一补再穿嘛！但怎么补？还真难倒了一个个青年男女！自己动手，拿出人人都备

有的针线包，取出针线来——有的把破烂处缝几针了事；有的则发挥想象力，将破处剪开，围绕洞口串一圈密密的针线，就算补完了。结果洞还是洞，烂的还是烂的。还有的干脆用胶布贴在破烂处，一张不行就贴两张、三张……女知青中也有手巧的，“女儿红”做得精细漂亮的。据传，南坪五队一女知识青年一夜就织出一件大号毛衣，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有人说还真穿过这件毛衣。

靠父母帮助，现今也不少见。当初，南坪有的知青每年都有从成都做好的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寄来或托人带来的，穿脏直到穿烂不能再穿为止。缺衣少袜，冬天天又冷，几个月也洗不上一次澡，不少知青身上长了“革命虫”——虱子。但一到过节如元旦、三八、五一、五四、七一、十一、春节等等，他(她)们总有好看、时髦的衣裳穿上街去逛一逛！那时，知青们还私下选定了南坪女知青四位美女呢。

1966年春节，成都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组织的知青家长慰问团来到南坪公社时，见到了一个个结结实实、精神抖擞、谈笑风生的一代新型知识青年。在州委招待所礼堂，知识青年们向家长慰问团作了汇报演出，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劳动的号子》、《兄妹开荒》等等节目得到赞扬和肯定。

过思想关

有的知识青年在写回忆时总结了下乡要过“四关”：劳动关、生活关、思想关、语言关。这里说的是“过思想关”中的一件有趣的事。

1964年4月下乡到南坪后，喝过安家酒，青年们清醒地看到昭觉的山、昭觉的水、昭觉的生活环境、昭觉的劳动条件……昭觉的一切，是那样陌生，那样荒凉，那样落后，那样艰苦。总之，是那样的与想象中不一样！

于是，思想上开始后悔—动摇，动摇—后悔。

跳坝大队知青小组的张发荣、马长贞二人本来什么都不怕，被戏称为“张马二元帅”，却怕起了这陌生、这荒凉、这落后……眼泪可以冲掉内心的胆怯，哭声可以熨平心中的伤痕，二人相约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哭声惊动了更多知青，惊动了组长徐孝清大姐，也惊动了区县领导。

如何劝阻这可能蔓延、可能扩大、可能影响动摇整个上山下乡全局的哭声呢？昭觉县知青安置办公室从思想教育入手，抓典型，找根源，引导知识青年们过好“思想关”。共青团员带头积极做好谈心、交心工作，组长召集大家回忆下乡之前在成都时的学习讲话，学习孙传琪、巫方安的动员报告，区县领导还破例从成都调来知青们报名下乡时自己写的申请书、决心书，张贴悬挂在知青屋，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重读决心书”活动。

在自己亲手写的决心书、申请书面前，爱哭爱流泪的知识青年们止住了哭声和泪水，

挺起了胸膛，扬起了风帆，又迈出了坚定的结结实实的一步——扎根凉山的信心更足了，意志更坚定了！知识青年们闯过了这一关，长大了，成熟了，迎来了又一次新社员大会的召开。

多少年过去了。传说当年那一份份决心书、申请书是从成都打“飞的”运过来的。

你相信吗？我信！

说“团结话”

说“团结话”就是我们知青在彝族聚居区要过的“语言关”。

记得我们下乡那地方除了我们“如如阿依”（知识青年）外，全部是彝族社员群众，偶尔才有几位城里汉族干部下乡。因此，我们知青在这里成了“少数”民族了。上山下乡，向社员群众学习，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要向他们学习农业技术，学习生活技能，学习民族文字、语言。目的是丰富自己，武装自己，便于相互交流，融于群众之中。

学习说彝话，是每个知青的需要、义务和责任。从到社员家吃坨坨肉、喝安家酒的第一天起，语言交流就成了最大障碍和困难。安置办干部和社队干部也都向彝族社员和知青们提出了“教”与“学”的双重要求，要在短时期内攻克“语言关”。于是，汉族知青和彝族群众一一结成对子，手把手，口对口，说一句学一句，教一句记一句，许多知青都有专门记录彝话的笔记本，为了便于记忆和读说，还用汉字注音法，给每句彝话注上汉字或汉语拼音字母，有的还注上英文字母，力求更准确地发音说话。比如，数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彝话说：“吃尼所尔恩乎石黑古扯”，知青们就记上这十个汉字，再注上声调一遍一遍地在床上念、路上背，边走边读。又如，“苏”、“噜”、“哑”、“依里古”就分别记上“吃”、“喝”、“走”、“睡觉”。“渣渣”（米饭）、“日”（酒或水）、“曲拨”（朋友）、“阿米子”（彝家姑娘）……平时与彝胞语言交流时，就把这些单个的字、词连接起来说。比如，“渣渣苏”（吃饭）、“日噜噜”（喝不喝酒或水），差不多互相能听明白就行，大多时候是彝话汉话夹杂说。如：“毛主席瓦瓦苦！”（毛主席万岁）“共产党赫及赫！”（共产党好得很）还有，“我渣渣呵苏呵苏（我不吃饭）”，等等。大家把这种彝汉夹杂的语言称为“团结话”，彝胞汉胞都喜欢说，都能听明白。说“团结话”要数冯大个子说得最有趣，最像彝族说汉话的声调和表情。听他说酒后的“团结话”更有风味，能让你笑痛肚子！

但是，也有些彝胞爱开玩笑爱逗乐的，在教给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彝话中，悄悄塞进污秽的脏话，或骂人，或贬低人的话。一头雾水的汉族青年们依然认真地一字不差地记在本子上，天天练，见人就说。结果让明白的听者难以接受，哭笑不得。待弄明白时，知青们往往十分尴尬。之后，社队干部再次向彝族群众提出要求，要说文明话，不允许乱教不文明的。全公社知识青年由此掀起了学习彝话的热潮，真有许多彝话说得好的，可以

用彝语谈心，讲彝话评工分，唱彝语歌曲，跳彝族舞蹈，边舞边唱道：

“凉山好，好地方，彝族人民好家乡。

打碎千年铁锁链，奴隶翻身把家当……”

结束语

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受到干扰，受到重创。“文革”还没有波及到凉山时，上山下乡按部就班向前推进。1966年，广安、武胜又相继来了一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到昭觉。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凉山铺开，“社教”选拔了知青中的佼佼者，后来，据传说是为州县选拔培养的接班干部。那时，通知到谁，谁就悄悄走了，没有声张，也没人送别，更没有敲锣打鼓。因为当时谁也不去想什么，一心一意接受世界观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奴隶半奴隶）再教育，到哪里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动荡年代动荡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同样，动荡年代也动荡了知识青年队伍内部。

不过，动荡年代也为知识青年打开了一扇门。

1980年，“大返城”这种为当初决策者始料不及的方式突然结束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而昭觉南坪的知识青年招工大返城时间比外面更早些。1971年年初，南坪知识青年中第一批调动工作的有十余人，工作单位是凉山州乌坡铜矿。据说调去的知识青年是表现好的，是安置知青就业的初步示范。没成想这个铜矿原是一劳改单位的生产矿井，管理干部也是原班人马，对进矿的职工常常表露出对被劳改人员的那种歧视和强硬。紧接着州邮电局、州农科所、州公路养护路段，竹核水泥厂、矿山公司、大修厂等单位陆续在知青中招工。当年年底我与三十多名知青一起被招工去了凉山民兵团，开赴当年毛主席最关心的“骑着毛驴也要去”的“大三线”——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结束了我的七年多的知青生涯。

作者简介

叶维智，1963年肄业于成都市二十五中初中。1964年4月到四川凉山昭觉县务农。1971年到四川攀枝花市（现渡口市）工作。现退休。

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逐渐走出幼稚和蒙昧，学会直面荒诞的现实，把握自己的命运。



卷七 守望心灵

"贱民"之忆

任宗景

那天，屋外响起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我不禁一愣：来访者竟是我高中毕业时的班主任Z先生——一个被我恨之入骨，并在心里诅咒了千百遍的人！原来，他早年曾与我岳母同事，偶然听说我是他昔日同事的女婿，而且"混得不错"，便借口看望与我住在一起的我的岳母，"顺便"找我聊聊。

真没想到世界是如此之小！惊愕之余，我的内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但碍于岳母的情面，我尽量强忍住内心的愤懑，与他敷衍着，甚至脸上还挤出了几缕笑纹（我知道那笑肯定比哭还难看）。也许是我的"混得不错"纯系讹传，也许是我的礼节性的客套使他很快觉察到师生重逢的别扭，反正，连杯中的茶叶都没泡开，他便逃也似的告辞了。

屋外，云厚天低，天色晦暗，雨滴梧桐，飒飒有声，正是："往事依稀浑如梦，都随风雨到心头"——

1962年，我从重庆第十二初级中学（今复旦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重庆第二十中学（今育才中学）读高中。育才中学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当时是四川省的重点中学。1964年秋，原本教政治的Z先生不知为啥成了我所在的高65级6班的班主任。他一上任，我们班上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日子就难过了。首先，他把班干部和各科的科代表统统换成根正苗红的同学；然后，轮流找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谈心，如牧师布道般地大讲"出身不可以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之类的"革命道理"，要求我们做到"党不要我我要党"，定期向他交什么劳什子思想汇报。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在座次表上作上记号——出身好的学生姓名旁打上红钩，出身不好的学生姓名旁则是黑点。座次表通常是摆在讲桌上的，以便各科的科任教师点名抽学生回答问题时对根

正苗红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关照,以至后来课堂上举手要求回答问题的几乎全是根正苗红者(因为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无论将手举多高,老师都会视若不见,不予理睬)。

世界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印度的种族制度将人分成四等,最下等的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而像我这样的学生娃,当年在学校的境遇与贱民何异?这种歧视、这种贱民待遇,一直伴随着我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

Z先生口才不错,任何话到了他嘴里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即使是贯彻阶级路线这样杀气腾腾的话题,他都能舌灿莲花,让人打不出喷嚏。他的目光很有杀伤力,譬如说到"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站在讲台上的他把如炬的目光往下一扫,出身不好的同学无不胆战心惊,以为他"敲"的就是自己,一个个缩颈低眉,连大气都不敢出。其实,在阶级路线大行其道的当年,被打入"另册"的学生们并非只在Z先生威严的逼视下才缩颈低眉,在日常生活学习中(我们班全是住读生),无时无刻不是颤颤惊惊,深怕树叶子掉下来砸了脑袋。我们不敢和出身好的同学争论,不敢向老师提意见,不敢与出身同样不好的同学过于亲密,不敢请事假,甚至不敢开怀大笑,因为动辄就会被揪住小辫子进而上纲上线。后来每每忆及当年在学校里的处境,我都会想到"红色恐怖"这个词儿;而每每想起Z先生,我总是联想到小说《红岩》里的典狱长的形象。

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有这样一件事:

我家经济困窘,属城市贫民。从进初中起,我就靠领取学校的助学金维持学业,但Z先生一来,"好日子"就到了尽头。他觉得,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没有资格享受党的阳光雨露,要领取助学金么?可以,但必须付出汗水。具体地讲,就是在假期中参加专门为我们这批人安排的体力劳动——为学校修筑围墙(挑土、抬石头),打扫学校的环境卫生,整理学校的花圃等等,美其名曰:"劳动锻炼"。我们心中很不平:为什么出身好的同学领助学金可以逃避劳动呢?难道劳动只是我们的专利?如果只有出身不好的同学才应该锻炼,那这种锻炼与惩罚又有什么区别?当然,诸如此类的想法我们只能沤烂在肚子里,没有谁敢放半个瘪屁。尤其让人反感的是,整个假期的劳动结束后,还得向Z先生交一份不少于五千字的劳动体会。其实,写出体会并不难,十几岁的学生娃对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怎会没有体会呢?关键是这种歧视性的劳动叫人心理不平衡!如果劳动出于一种本能的需要,是心甘情愿的,再辛苦再繁重我们也不会叫屈。当劳动成了惩罚,需要成了嘲弄,提起笔来就感到重逾千钧了。但不交体会又是过不了Z先生那一关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写,而且还要写得有质量,写得让Z先生认为深刻。我们当时内心的屈辱和所受的折磨就可想而知了。

好不容易熬到快要毕业。毕业前的那一段时间,Z先生对我的态度明显地有了变化,有时路上与他对撞而过时,他会微笑着点点头,偶尔还会故作亲昵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受宠若惊，心里却大不敬地腹诽：黄鼠狼要给鸡拜年了！

果不其然，一天，Z先生又找我个别谈话。他开门见山："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学校对每个毕业生的要求，不知你有什么想法？"我的回答早就在舌根下压着，一张嘴就抖搂出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他像哥们儿一样顺手在我的肩上重重地一拍，笑意立马在他脸上荡开。接下来，他"推心置腹"地告诉我：学校已与有关方面联系好了，准备组织一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到大巴山区去办林场……"当然，只是作好思想上的准备，我认为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升大学的可能是相当大的。"他强调说。听他一说，我心中顿时升腾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一想到自己成绩的确不错，便又将大巴山撂在了脑后。

高考的结果令人黯然，我落榜了。乍看出乎意料，实则在情理之中——我不落榜谁落榜？我特别不平的是：一个历史知识大多来自街头小人书摊却根正苗红的同学，居然考上了四川大学的历史系，而我这个历史科的尖子学生却被无情地挡在大学的校门外。可是，不平有何用？我必须正视现实。当时，四川省正搞石油大会战，石油部门招工，通过亲戚的帮助，我得到了某会战单位的招工通知。正在犹豫不决的当儿，Z先生又找我谈话了。他说："作家柳青有一句名言——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你目前就处于这种关键时期。还记得我说的去大巴山的事么？依我之见，那才是你的明智选择。你想想，到农村去历练个三年五载，农民有的（指生产知识），你具有，农民没有的（指文化知识），你也具有，这对你一生都有好处。再说了，你不是有志于写作吗？体验个五载三年，还愁写不出好作品来？"

Z先生不愧有知人之明，他的话真是点准了我的穴道。我自幼喜爱文学，有志于文学创作，倘能通过大巴山的生活体验，写出像柳青的《创业史》那样的大部头来，何其快哉！更重要的是，阶级路线的贯彻，使我对前路充满了惶恐，极左的政治空气令人窒息，都市的繁华不属于我，不如躲得远远的，与山野为伍，与田园作伴，至少精神上可以少受许多刺激。如此一而二、二而三地深想，我对Z先生的看法居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甚至觉得"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Z先生也"。我决计放弃"同样是钻山沟的石油单位"（Z先生语），与另外三十几个高考、中考落榜的育才中学同学一起赴"抬头碰落柿子、扁担砍翻河鱼"（Z先生语）的大巴山区，开始了漫漫14年的"再教育"历程……

很快，Z先生的画皮就被揭开了。还未抵达林场，我们就从送我们赴大巴山的老师口中得知：Z先生因动员学生上山下乡工作出色而受到学校的高度赞赏（"文革"前夕竟升任育才中学的副校长），成为育才中学政治思想工作的典范。而我们这批同学在农村生活的滚水里、冰水里、碱水里都滚过几遭之后，才明白Z先生当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事实上，我们高65级6班每一个下乡的同学都与他的动员有关。有同学说他

“用青年学生的热血来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我以为一点儿也不过分！后来在“文革”中，存放知青档案的县安置办公室被砸，我意外地在一大堆垃圾中找到了自己的档案袋，令我目瞪口呆的是：档案袋中所装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我当年按Z先生的授意，违心地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的思想汇报。我的脑子里顿时“轰”的一声，一片空白……

40年弹指一挥间，人生旅途中的恩恩怨怨大都随风消散，但Z先生留在我心上的伤痕却很难结痂。据说，遗忘是百消丹，宽恕是一种美德，但是，疾恶如仇的我却很难做到，因为在我的心里，Z先生永远是标示那个时代的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符号！听岳母说，打倒“四人帮”后，Z先生逐渐失宠，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对他“敬鬼神而远之”，在学校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没有真才实学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再后来，三教九流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往市场经济的海里跳，Z先生也停薪留职，自封公司经理，做起发财的黄粱梦来。匪夷所思的是，像Z先生那样见风使舵、“一踩九头翘”的聪明绝顶之人，偏偏老是在“海”里呛水。看来，心术不正的人，幸运之神总有将他遗忘的时候啊！

如果Z先生看到这篇回忆文章，不知会不会掏出自己的灵魂，用忏悔的泪水认真地浸泡洗涤？



作者简介

请见《知青小屋》后的作者简介。

我的大学梦

姜蜀菱

一

成都四中64级高中三班毕业前夕的一次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我作为支部书记，带头表了个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参加高考，接受国家的考核和挑选。考上了，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考不上，下乡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会上有同学并不领情："你学习那么好，做梦都会考上。这个态，你当然可以随便表。"确实，在同学心目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又红又专的典型。

四中历来是成都市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又叫"石室中学"，由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创办。郭沫若曾就读于此。学校师资力量强，学风踏实、浓厚。在这样一种学习氛围的熏陶下，我不负老师和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在当时举行过两届的全市高二、高三数学竞赛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文革"后恢复数学竞赛，我的数学老师告诉我，我是全市唯一连续两届获奖的选手。当时学校数学教研组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展览，介绍我的学习方法。老师还安排我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一些革命干部的子女提高学习水平。

在高三全市数学竞赛的动员会上，市领导还讲过，凡参赛获三等以上奖项的学生，均可免试升入市内任一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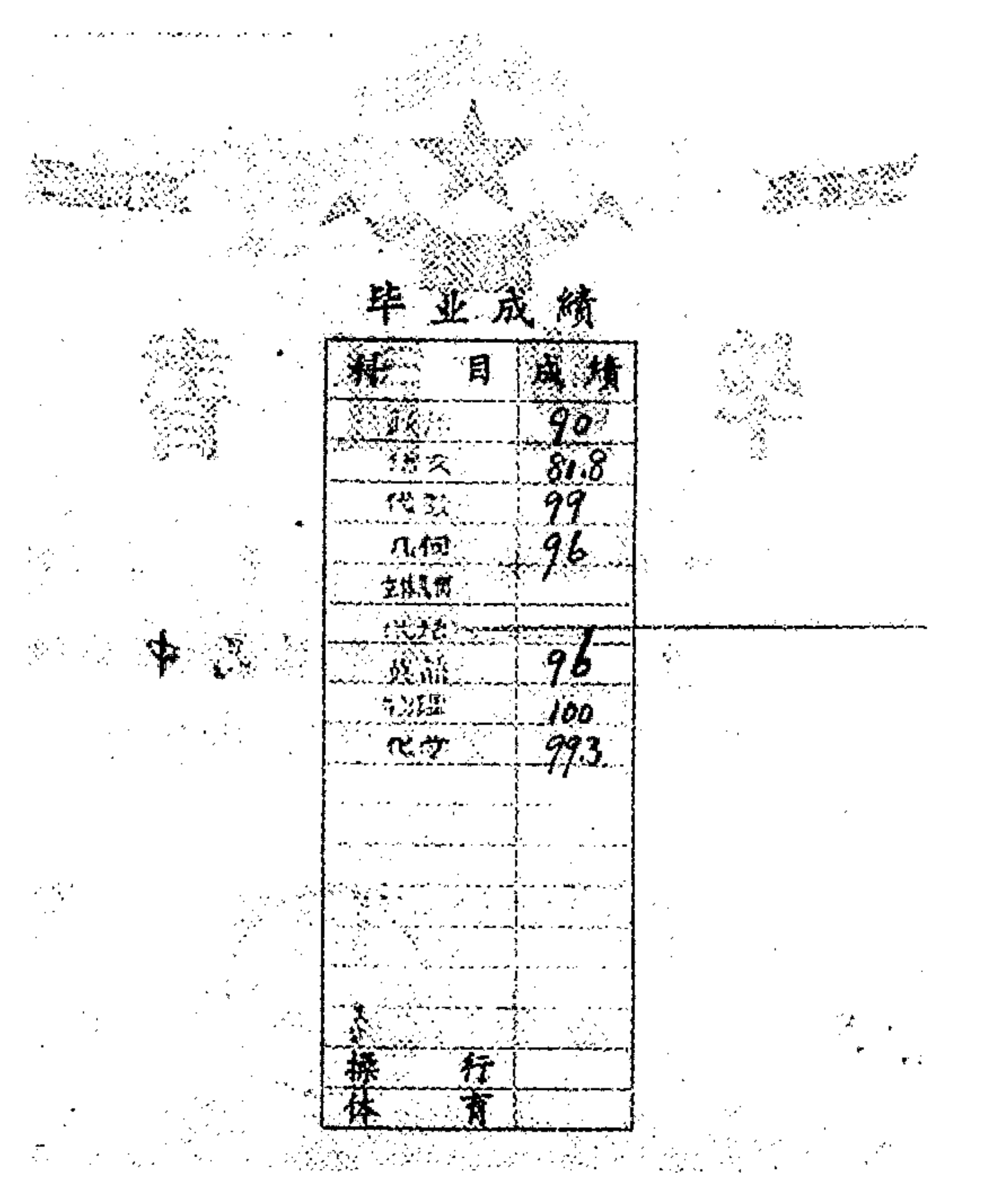
高考后，我和同学对答案、估分，我六科总平均决不会低于90分[①]，同学们都认为我

① 而实际上是96.5分，这还是我的一位同班好友"文革"后期特意翻山越岭到我插队的乡下动员我争取落实政策、重新上大学时告诉我的。（他的父母是老干部，"文革"前分别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总支书记，也很关心我没考上大学的事情，嘱咐参加招生的老师查到的。）

必定会上清华、北大。可万万没有料到，我竟然落榜了！同班同学不理解，老师们不理解，不少低年级同学都在议论：大学招生是择优录取，姜蜀菱是团支部书记，成绩又那么好，还不算“优”吗？那为什么会落榜呢？

在痛苦的反思中，我隐隐意识到一些缘由：我的三舅赵锡龙在临解放前随单位（中央资源委员会）去了台湾，由于家庭有港台关系，姐姐申请入党都没有批准，我高考多半也撞在这个刀口上了。我父亲姜亚光1927年7月以石室中学45班高才生的成绩考入中央研究院，成为竺可桢博士的第一代弟子。当时中国不多的气象专业人才，只能服务于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空军）的气象部门。工作期间他加入了国民党。这些，大概就是我政审不合格的理由吧？撞在这堵意想不到的墙上，我脑子天旋地转。接连多天老师来家访，同学来陪我，他们怕我想不开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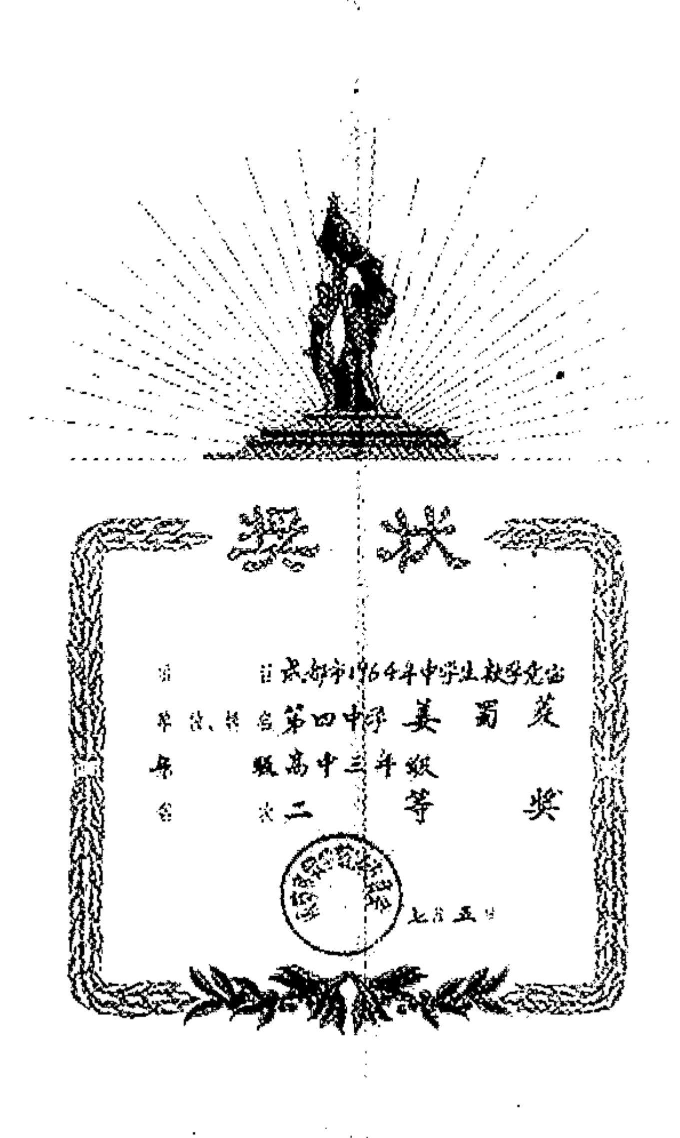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二哥叫我到他劳动的干校农场去玩几天。然而，学校的电报打到了农场，叫我回校。忐忑不安的我回到学校，副班主任——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说：“市上要组织应届毕业生下乡，你去吗？”我的心真难以平静：要说理想爱好，我并不想当农民。我的理想一直是当科学家，为祖国造火箭、导弹。高考时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数学力学系。后来班主任暗示我：“那是重点保密专业，还是填个一般的好。”我才填了个北师大数学系。我本以为我妈妈是教师，我当教师



毕业成绩

科目	成绩
[illegible]	90
[illegible]	81.8
代数	99
几何	96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96
[illegible]	100
化学	99.3
操行	
体育	

姜蜀菱毕业成绩



奖状

1964年中学生数学竞赛
第四中学 姜蜀菱
高中三年级
二等奖

姜蜀菱获取的数学竞赛奖状



姜蜀菱获取的数学竞赛奖状

总可以吧？现在却真的要去当农民，我心有不甘，但却又言不由衷地回答："党叫干啥就干啥。"先前我说过这话，现在得兑现了。教导主任说："现在党要你下乡！"我说："那就去吧。"这一去，就是13年！

当天回到家里，我告诉了母亲。母亲抱住我痛哭失声："儿啊，你真的愿意下乡吗？你如果还想读书，我就再供你一年，明年又去考吧！"妈妈的心疼，我的心也疼啊！我一直爱母亲，爱这个家，不能让母亲伤心。应该说我在学校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但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努力也难圆此梦啊！求之再不得，对母亲的伤害岂不是更大？我还有两个妹妹要读书啊！我隐隐猜到上不了大学的缘由是父辈的历史。但那历史也是他们难以自主选择的啊。父母含辛茹苦把我养育到今天，决不能让那些他们也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再继续伤害他们。我便用一句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总得有人去挑。"回答了母亲。这样我便参加了成都市首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

当时的官方宣传告诉我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既然上大学这条道走不了，那就改道吧。我心想，下乡当农民，彻底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通过脱胎换骨的磨炼，总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吧。

经过两个月培训学习，1964年11月29日，我们两百多名成都知青，分乘几辆敞篷卡车，在敲锣打鼓的欢送下，从人民南路广场出发，奔赴广阔天地。我作为知青大组长，同五十多名同伴到了成都远郊龙泉驿区茶店公社。我和岳世策等七位同学被安排到了石经大队十一生产队。

二

知青集体户的生活有点像“家”，生产队出工收工回来后就分工合作做“家务”：挑水、做饭、种自留地、打柴、喂猪，紧是紧，但还过得去。龙泉山坡度极大，水土流失严重。夏天，大雨把地里可怜的那点土冲到地沟里，到了冬闲季节，我们便和社员一样，一担担又把冲到下边地沟的土担上去，这叫“担沙凼”。我们刚下乡时还赶上冬季种桃树，天天担水上坡浇树苗。山路崎岖、狭窄，无法放下担子，百把斤的粪挑要一口气担上去。扁担很快就把肩头磨肿了，直到将肩上原本稍突出的那块骨头压平了，起了茧疤，才算练就了农民一样的铁肩膀。

在那难以述说的艰难的磨炼中，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大学》深深地影响着我。起


毕业證書

学生姜蜀美性别男系四川省荥经县（市）人現年18岁于1964年7月在本校高中部1964级第3班修业期滿成績及格准于毕业此証

校　长

公历1964年　7　月　　日

毕业证书

初,我利用天亮前和晚上收工后的时间在灶头前烧火做饭时,在茅草柴火的光中自学第二外语——俄语,同组知青都笑我"痴"。后来我便把田间当课堂,急用先学,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在实践中学习。当我在晒坝上和偏东雨争抢粮食时,萌生了要预知天气的愿望。我梦想在当地的最高峰——尖子山上建个气象站,看云识天气,可以提前观测到突如其来的雨云。我还学习竺可桢博士在他的《物候学》里讲的方法,记下当地的物候日志,研究当地天气和作物生长的规律,了解作物与农时、季节、大气候的关系,力争变被动为主动,规避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春夏天,面对成天肩挑百斤重的粪水上坡地浇菜灌庄稼的沉重劳动,我就想怎样减轻劳动强度,便学习华罗庚先生写的《运筹学》,试图用数学方法来设计一个最佳方案,确定集体粪地的最佳位置,既方便集中各家各户的粪肥,又能就近取水混合、就近担到待浇的地里,使所费劳力最少。队里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合适的位置修了个大粪池。

三

"文革"的动荡也波及到了农村,我抱着不当井底之蛙、要去见见世面的心态跑回城里想看个究竟。

1967 年,八月流火的日子,恰遇上成都的造反派要组织代表团去武汉,我的妹妹(十八中红卫兵)想去见世面,家里开会,决定必须要有亲人陪同前往,以保安全;哥哥姐姐们要上班,小妹还小,父母又上了年纪,只有我无固定收入,谈不上误工,经济损失最小,我也想去见世面,遂自告奋勇护送妹妹。在代表团列队上火车时,妹妹将我介绍为"清华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代表",随团去武汉。其实真正的清华红卫兵驻武汉联络站代表是我高中时的一位好友、清华无线电系的学生。整个代表团包括成都各界造反组织的代表,有教师、学生、工人……占了半节车厢,一路有说有笑。到了武汉,代表团想弄个宣传车造声势,便叫我这个"清华无线电系的大学生"帮助安装一下,我只得硬着头皮说:"虽然我是无线电系,大学才两年,专业知识还未学,只学了些基础,试着干吧!"哪知他们去联系,无法落实汽车及器材,这一检验真假功夫的考核才得以侥幸避过。随行的高中红卫兵还想上北京串联,也请我这个"清华的大学生"带带路、挂个钩。我想,路是人问出来的,带就带吧!团中一位记者的夫人也想随我们上北京,被记者挡了下来,在与我们在郑州分手后的火车上,他背着我,但当着我妹妹的面揭了我的底。原来这记者是下乡驻我那个生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当然对我很熟且了解,同团时大家心照不宣,都是为了见世面这个共同目标。到了夫人也想跟着上北京时,他对大家讲了老实话:"他哪是清华红卫兵,他是个下乡知青。"同车人一下便将原来人人夸的红卫兵小将视作了一个招摇撞骗的痞子,我妹妹脸上一时真无法搁下。

回成都知道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原以为上山下乡自己与农民群众彻底结合，通过饱含血泪痛苦的脱胎换骨之后，会被振兴中华的主流队伍所认同和吸纳。然而现实是，当人们知道你是一位下乡知青时，你即等同于一个痞子！同样一个人，当你披上清华红卫兵的外衣时，就是骄子！要知道在当时的理论中，一个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应当是一个尚未跻身工农革命群众的知识分子。

串联一阵我又得回乡了，我不能长期在家里吃闲饭，不能让父母再养我。只有农村才是我的生存之地，我得去挣工分、分口粮。那里的农民不也在生活么？他们能活出来，我也应该能活出来。

农村的生活确实不轻松，集体的农活从天麻麻亮（早上四五点钟）就得干到天麻麻黑（晚上八九点钟），收胡豆、点玉米、栽秧子、挑粪上山、下田挞谷……更难的是，农民回家后，一家人男女老少分工合作，能吃到一碗热饭，享受一点朴实的温暖；我们知青就不同了，原来乌托邦式的知青小家不存在了，走的走、散的散，我经常是光棍一个。收了工，抽空忙完了自留地里的活，回到屋还得要烧冷灶，打火做饭，最后躺上床已是十二点过了。这时抱头仰望茅草屋顶仅有的两片亮瓦中流入的月光，想到过去，想到城里的亲人、朋友，再想到串联，想到回乡后眼下的这一切，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鲁迅笔下的"阿 Q"、别人眼中的痞子，比鲁迅笔下描写的"闰土"都不如啊！

秋收后，那样的单独生活确实难磨，我得请假回家看一下父母，吃几顿妈做的可口饭……我也不能白吃啊！于是我挑了半担仅存的口粮——块头不大的"咪儿红苕"上了路，得翻过一座大山，八十多里的路。

回城的十天半月中，除了享受简朴的家的天伦之乐外，便是上"我的大学"学知识。想上图书馆，借书得有工作证、学生证、户口簿，我一个下乡知青、地道的农民，这一切都没有。书便借不成，只有看看门外报刊栏镜框内的免费报纸了。

我的中学老师穆容生（"文革"后任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从一位关心我的同学口中知道了我的处境和愿望，热情地借了《放大器原理》等几本无线电专业书给我，并让这位同学打开已经尘封的学校实验室，将门从外面锁上，让我在那里开始了实习课，充耳不闻窗外噼里啪啦的武斗枪声和高音喇叭的喧嚣，一心装收音机。我常常叽叽咕咕地装到深夜。这对我后来在农村当"电博士"、赤脚广播员，乃至后来的广电局长、光纤网络传输工程师，领导设计、建设、维护一个大城市的光纤电视网络等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来，"文革"中"我的大学"基本上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游历、看"革命"，有点像小说中的"痞子"；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换口粮，就像鲁迅笔下的"闰土"；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便是看书学习，钻研技术。

学得的东西中，在乡下派上了用场、起了较大作用的还是物理、电学知识。刚去时，

乡里没通电，整个乡只有邮电所的师傅有一个自己装的矿石耳机可以收到无线广播。1968年，乡场通电了，可以点电灯，还可以用电来解决抽水抗旱等问题。1969年，农村大办有线广播，需要一个懂点电的机务兼线务员，因为不脱产，所以简称"赤脚"广播员。凭着有限的无线电知识，我被公社选中。我边干边学，当年就建起了公社广播站，并且逐步将干线、支线架设到大队、小队，直至农户。

那时条件极其简陋，没有木电杆，就用石桩捆上一截树干代替。一次架线时，我用脚钩爬上插在水田里的一根有点弯的五米多高的木杆。快到顶时，木杆开始倾斜，我赶快往下爬，还没着地，已连人带杆倒在水田里，变成个大泥猴，惹得旁边干活的社员一阵大笑。邻近公社的一位师兄就没我这样的运气了。他爬的是一根用竹做筋的水泥杆，而且用安全带把自己捆在杆上。谁料杆一断，人随杆一起倒下，杆正好压在他身上，身下又是硬石，结果不幸因公身亡。

那时农家的广播喇叭，还是农民不吃食的公鸡、不上条的闹钟，起床、做饭、出工、作息都靠它指挥。我这名"赤脚"广播员，每天除了架线巡线、维护抢修外，还要下地挣工分，天不亮又要爬起来开机广播。天长日久，实在有些支撑不住。我想，何不搞一个自动播放设备？于是，我自学相关知识，用手上能找到的材料搞了个由电子管、电阻、电容组成的RC延迟控制器，加上闹钟触点等，土制了一个具有自动预热、开关机、播放录音等功能的自动控制设备。

"赤脚"机线员、广播员的工作使我在当地有了小小的名气，公社每遇用电方面的难题，就叫我去处理。一次，半夜两点过，公社水利员跑到我队上家中来敲门，大声武气地叫醒我。原来是公社抗旱的大功率高扬程的抽水泵坏了，无法启动。我带上一本技术参考书，赶到现场去检修。到了现场一看，那家伙可真大，光是泵的抽水井就有八九米深，仿佛张着大嘴的矿井。扬水管也有一抱粗、几十米高。我询问了情况，找出了故障原因。一切检修完毕后，就要启动电源了，我还真有些胆怯，只好请提灌站的值班师傅按下电钮。电钮一按下去，周围竟像地动山摇一般。水抽上去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还有一次，公社开会研究砖瓦厂的电机故障如何排除。在场的干部对这种大型电动机都不甚了解，讲不清楚，没人敢碰。有人提议："姜大来嘛，你是我们这里的'电博士'，也许有办法。"我赶忙起来，跑回家去翻出《农村电工手册》，回来讲清了有关问题。事后到会的另一位知青调侃地告诉我，我刚离开后，那位书记发话了："这个姜大，都劳动改造十来年了，咋知识分子味还那么浓（意指遇事还要去查书本）？"

四

我在乡下得了个绰号叫"姜大"，社员们叫我这个绰号，不仅因为我的身材，还因为我

老做不醒自己的大学梦。在那个年代，要想接触和从事更高科技水平的事业，只有通过上大学，国家分配才有可能。所以我一直希望能上正规的大学。

"文革"后期(1971—1975年)，大学恢复招生，采用的是自愿报名、层层推荐、领导评审、学校录取工农兵大学生的方法。每次我都报了名，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都根据我的表现层层推荐了，可每次都未被录取。显然是政审不合格，被家庭出身挡住了。根据当时的政策，真正出身"黑透了"的人也还有百分之一二的指标，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进大学；而我的长辈属于敌我矛盾，内部掌握，没戴任何帽子，上不了"线"，因此我一再落选。

即使这样，也有使我在失望中感到欣慰的事情。有一年，在全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上(每个生产队三四个代表，全公社二三百人到会)，有代表对上面下来招生的干部直言："我们公社像姜蜀菱这样好的知青推荐出来，你们几次都不要，不晓得你们究竟要招啥子人哦？"听到此话，我热泪盈眶——本地的农民是了解我的！



电大圆梦：前排左起第二人为作者姜蜀菱

1973年，我终于盼来了高考的机会。我们几个知青朋友翻山越岭到了区政府所在地——龙泉驿，准备第二天进考场。晚上，大家开玩笑翻成语词典测运气。我碰巧翻了个“出类拔萃”。同学们说：“你肯定得中！”第二天上场，考题不算难，轻松过关。事后听说我考了全区第一，数学、物理还是满分。殊不知那年高考中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交白卷的考上了，得满分的“没眼”！真是“釉子上反”了。

最后一年，我经过层层推荐、选拔、淘汰，到了最后一关：市招委审定。这时，区招办送审人员十分恳切地陈述我在农村的突出表现以及自学大学课程、将所学知识贡献于农村的情况。会议主持人竟说：“既然他都这么好了，何必还要上大学呢！”一句话又把我否决。这件事是当时参加录取会议的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文革”后出于义愤告诉我的。

那时，为了防止作弊、“走后门”，区上每天三次通过农村有线广播、连续五天向全区35万社员公布拟上送的十二三人的名单，其中就有茶店公社的姜蜀菱。真可谓做到了家喻户晓，以致区政府唯一的小车驾驶员一次路过生产队见到我还在地里劳动，突然停下车来问我：“你咋还在这里？”我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话来，只有苦笑。连一位司机都关心到我这样一位35万农民中的普通知青了，可见这个“姜大学”当时的知名度。

多次碰壁，考不上大学，我也认命了。哪知后来因为参加省招办调查“走后门”情况的座谈会，我如实反映了当地推荐的情况，竟遭到有关人士的打击报复，给我“穿小鞋”，在我管理公社广播设备、修理扩大机故障不顺利时，多次威胁要算我的政治账。我担任公社“赤脚”机线员、广播员，工作已经满负荷，足够一个全劳力的工作量，还要求我每年必须下队劳动300天！我披星戴月也难达到这个超常的要求。走投无路之下，我甚至想干脆迁到更远的山上去当农民算了。

五

“文革”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超龄而失去再次报考的机会。1979年，中央电大招生了，我无论如何要奋力争取。当时龙泉驿区没准备办班，我们区里二十多位渴望读电大的青年便邀约一起到区委信访办去请愿。工作人员见我们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便笑着问：“姜大，你又想干啥了？”我们说明了来意，他马上向区委作了汇报，很快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就接待了我们。我们向组织表达了迫切求学的愿望，表示如果办学条件不够，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条件，组织起来克服困难，绝不给区上增加过多负担。宣传部长当即表示支持，后经区委常委研究决定：由区工业局抽干部兼班主任，区工会将防震棚给我们做教室，区委还将驻区军工厂赠给区上的一台试制样品电视机拨给我们看教学节目。经过统考，21位同学合格，区电大便正式开班了，同学们选我当了班长，这才算最终

圆了我的大学梦！

身处那个特殊年代的我，始终梦想着上大学，虽不放过任何一丁点机会，努力创造合格的条件，历经诸多磨难，可最后也没能真正跨进我所向往的大学校门。特别是1964年的高考，受到了不公正、不平等的对待，给我前半生带来的磨难和心灵上的创伤始终是个痛。60岁退休时到单位人事处办手续时，我对接待办事的人事干部讲："我希望知道在我1964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是什么原因未被录取。我都退休了，没必要再对我保密了吧！"这里的干部也是熟悉我的，一位查了阵档案，答复我："当年，录取了的档案上才有记载，没有录取的也就没有记载了。"还有一位劝我道："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没有必要再了解了。"

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过确切的记载，只是在一些最近出的书中，看到了别人看到的相关政策文件的记载，如《炎黄春秋》2007年第六期里刊载的袁建平所著《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一文，就有比较确切的介绍。

原来自1957年以后，北京有关部门对高考录取有明确的政审要求，出生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尤其是有海外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不录取。这种歧视政策在1961—1964年执行尤甚。凡档案袋上政审栏盖有"不宜录取"印章的，根本不拆封就丢到一边去了。我家有港台关系，父母又有历史反革命嫌疑，（"文革"后澄清，我父亲只是一般历史问题；母亲不仅不是历史反革命，而且还落实政策，是享受离休待遇的革命干部。）当然不管下面如何反复推荐，也不管我历次参加高考成绩如何出色，都不予录取了。

我祈求上天，不要让那个年代的灾难重演，使有志报效国家、社会和人类的青年能够健康成长，让我们国家能多出些有成就和贡献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作者简介

姜蜀菱，1945年8月4日生。1964年8月毕业于成都四中高64级3班，1964年11月29日下乡至成都市龙泉驿区茶店公社石经十一队，插队落户13年，2005年8月退休。

坎坷大学路

程克武

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一切有志青年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加入了这支浩浩荡荡的高考大军。老实说，当年我考大学根本没去想为事业奋斗什么的，就是抱着一种类似当兵吃粮寻出路的念头，或者说得更难听一点叫“病急乱投医”。因为我非常清楚，除此一条路，今生我恐怕是无缘离开农村了。

我是1965年自重庆五中初中毕业下乡的知青，先到四川省邻水县三古公社五一林场，1968年撤场插队后落户在三古公社华尖大队三生产队。1977年高考时，我已在农村生活了12年。在我前前后后下乡的知青都已陆续返回重庆，而我却是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招工无望，顶替无门，连想作假办个“病残知青”都无从下手。

也难怪，那年头“黑五类”子女倍受社会歧视，我的家庭似乎还要“黑”得彻底一些。父亲年轻时本来也就是个职员，可他加入了国民党，历史就不再“清白”；后来又和国民党中统沾了边，性质就更加严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几年时间都找不到工作，后来刚有点工作的可能却又病故了。母亲原是父亲偏房，与父亲素来不合，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变了，即跟父亲离了婚，一个人要强地抚养着四个儿子。年轻的母亲追求“进步”，虽然儿女负担沉重，但还是努力考入了西南革大，毕业后在重庆银行学校当上了教师，情况看起来似乎比父亲好一点。可是，母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1957年反右斗争中，她不断给领导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从此也被彻底划入了另册。“文革”中母亲的处境雪上加霜，造反派大斗“牛鬼蛇神”，她的右派问题又被翻了出来，再加上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于是遭到接二连三的批斗。母亲不堪凌辱，上吊自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救下。当时母亲身体尚热，若及时施救是能够活过来的，可大队书记竟然说“这种坏

人还让她活着干什么”，令人用锄头猛击母亲头部，当即结束了她的生命。在那个人性沦丧的时代，母亲就以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辞别了人世，并且还被定了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吓人的罪名。

像我这种“双黑”家庭的子女，自幼便注定要背上为父母“赎罪”的沉甸甸的重负，尽管父母离异时我仅有一两岁、父亲病故时我才三四岁，我连父亲的长相都没有一点印象。高中大门向我关闭就是对我的一种示警，堵绝我脱离农村的种种出路，那是真格地要我为父母“还债”了。

除了难堪的家庭问题，更要命的是“文革”中我成了当地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文革”初期，知青们大多卷入了毛泽东掀起的疯狂的红色造反浪潮，我在其中也十分活跃。也许是母亲直言快语的基因无形中传给了我，在造反派狠斗当权派的过程中，我对公社一二把手的胡作非为特别不留情面，因此被他俩恨之入骨。由于我一向口无遮拦，在许多小事上也引起了领导深深的忌恨。一次秋收时，公社当权派们被我们叫来抓革命，促生产，在林场山下凤凰大队的点上帮我们收割谷子，碰巧我和公社书记陈某配对，他在前面割谷，我在后面挞谷。我劳动是一把好手，挞谷子挞得快，他割谷子总是跟不上趟，于是我便不断地对他冷嘲热讽：“怎么啦？当官当久了，四体不勤，不会劳动了……”搞得他手忙脚乱，狼狈极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些不检点的言行也给我种下了祸根。“文革”后期，公社当权派们逐渐官复原职，我的灾难便开始了。他们一直图谋报复我，除了追究我的家庭出身，还悄悄搜集我“反革命”的证据。当然，他们意图报复的知青本来不止我一个人，但我肯定是首当其冲。

我的一项罪名是盗卖国有林。那是1967年武斗期间，林场已开始涣散，知青们纷纷离场出走，只有我一人还待在场里。恰恰遇到公社粮站、卫生院等单位的人来买树木，我就卖了一些给他们。卖国有林的政策我是知道的，因为以往就是我与林场会计一起经手场里的林木买卖，只要买树的人有砍伐证，并且按国家规定价出售，就可以卖给他们。到1968年底撤场下户时，我把钱与我用白条写的账目一起交给了管知青的古社长，他叫我与他一道把近两千元钱存入了公社信用社。撤场下户后，我们几个结了婚的知青因无钱置买家具，也砍了几棵树回来做家具。这些都被当权派用作了整治我的把柄。他们先把我和几个知青朋友分别招进“学习班”，然后悄悄抄了我们的家，想从我们的日记等文字方面抓罪证。虽然最后一无所获，但他们还是强行给我定罪：私人盗卖林场树木。我与古社长一道存入公社信用社的近两千元钱也被他们无耻地说成是退赃。

更为可笑的是，为了搜足我的罪证，他们竟然还利用我那名为知青实则文盲的妻子。妻子是地道的“红五类”，而我是不折不扣的“黑五类”，我们夫妻间日常发生了口角扯皮，

我那不懂事的妻子便会去找组织倾诉。公社的头头们一时大喜过望，不惜笔下生花，滑天下之大稽地硬把夫妻不和定性为搞阶级报复。他们随后把我的材料上报了县公安局，企图把我弄进牢狱。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公然反抗他们的报复，抗拒他们的批斗，驳斥他们无中生有的诬陷，并给毛主席写告状信。因为怕他们卡信，这些信我都是跑到大竹县、垫江县去发的。不知是什么原因，写给毛主席的信最终都层层转了回来，不过他们也因此有了些顾忌，厚颜无耻地对我说："我们也不抓你了，就这样长期批斗你，看你怎么办！"

这就是当年我在农村的处境，试想，招工还有我的份吗？顶替也是天方夜谭，且不说父母的"黑"身份，只说他们都已远赴天堂了，我又去顶谁的班呢？

1977年的恢复高考无疑是我可遇不可求的一线生机，这时候国家政治气候开始转暖，而且全国性的政策一个农村公社、生产队也未必能够对抗，我毅然走进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考场。这次高考我纯粹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心想，我对哲学、政治颇感兴趣，就凭政治一门课程去闯一闯吧。这是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拼斗，面对铺开的试卷，我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比拿高考入场券更加棘手的问题：尽管我是当年小学的第一名，初中学得也还扎实，但自下乡以来，毕竟学业一丢就丢了十几年，也忘得差不多了，更何况我还没上过高中。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惨败而归。

1977年的高考失利让我非常失望，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可是，除了高考，还有其他办法帮我走出绝境吗？没有！我只有像项羽一样，背水一战！于是我又开始积极复习，准备参加1978年的高考。

当时，在农村找高考复习资料实在太困难了，我赶紧给在重庆的哥哥们写信，希望他们支持我的想法，设法给我提供一些复习资料。我没有料到，哥哥们的回信像一盆冷水，泼得我透心凉，他们竟然坚决反对我考大学，说我是痴人说梦。哥哥们认为，就我们的家庭成分，就我在农村的表现，就我的文化程度，考大学都是不现实的举动，别的不说，仅是政审我就铁定过不了关。哥哥们要求我放弃不切实际的打算，走唯一的正道：认认真真务农，搞好与当地领导的关系。

在那阶级斗争理论铺天盖地、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月里，哥哥们的顾虑不无道理。然而我不甘心，不服气，又给哥哥们写信，细述我四面楚歌的处境。我写道，我现在招工无望，顶替无望，病退无望，干农活受欺凌，确实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华山一条路——考大学。我又愤愤地说，就算政审被否，我也要用高考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就是要让那些连村小代课教师都不准我干的人看看我的知识和能力！只要高考考好了，政审卡住也值！我还客观分析了参加高考的利弊，即便不能改变命运，也不可能使我的处境更糟糕。我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用当时流行的语言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整

个世界”！信的最后我表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哥哥们不帮助我，高考这条路我也走定了！

哥哥们被我感动了，陆续给我寄来了许多切实有用的高考复习资料。

我从小最喜欢数学，本意自然愿意读理科，可从1977年高考结束到1978年高考，其间总共只有半年复习时间，在半年时间内，我除了温习初中知识，还得自学完成高中数理化三门课程，难度实在太大了，于是只好选择考文科。我是这样想的，语文、历史、地理、政治这几门课程虽也得突击，但记忆背诵的东西毕竟多一些，何况辍学下乡以来或多或少对文科知识有一些接触，集中主要精力攻克高中数学，效果一定会好一些。

事实证明我的决策是正确的。我的初中数学基础本来很好，认真投入后，初中数学很快就捡起来了，高中数学的学习也突飞猛进。与我同村的一个民办教师也在准备高考，他是高中毕业生，自然成了我学习高中数学的辅导老师。然而数月过去，我俩的教学关系悄悄发生着变化，先是我问他，接着相互探讨，后来竟已是他拿难题来求教我了。再往后，在公社许多准备参加高考的青年中，我解数学难题的能力似乎都显得略胜一筹，这让我考试信心倍增。

那一段高考复习经历也是一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我是生产队的记分员，工作不能丢，白天复习时间自然严重不足，于是就延长夜里的复习时间。每每学习累了，头昏了，把头枕在臂弯里眯一眯眼，又咬牙起身继续学习；实在疲倦得坚持不下去时，就把头浸泡在冷水里，清醒清醒又翻开了书。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领会到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含义。有时也真想不管三七二十一躺下来歇会儿，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坚持的勇气又顿时恢复。这大概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因为用功过度，我不时出现头疼，时而有点失眠。有一天，我失眠头疼得厉害，便吩咐妻子到乡卫生院去拿点药。晚上我吃了药，头是不痛了，可就是不能入眠。半夜里我又吃了一次，还是睡不着，于是只好睁着眼到天明。第二天我到卫生院去询问，方知妻子把安眠药和止痛药给我说反了，我一直在猛吃止痛药。这件事情让我又想起了公社领导利用我的文盲妻子诬陷我的事，感到啼笑皆非。

我高考复习的同时还承负着舆论压力。自我高考报名以后，周围一些人群颇不以为然，背后风凉话不断。公社书记陈某更是流露出一种“愿人穷、恨人富”的心态，他听说我已报名，哈哈大笑着对人说：“他如果考得上大学，我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直到多年以后，我仍然特别感谢当年同情、支持我报考大学的人，除了我的几个哥哥，还有我的生产队长。在我受歧视、受迫害的时候，生产队长一直关心、照顾我；当二哥来信要我回渝集中精力复习一段的时候，他又毫不含糊全力支持我，主动安排人代理我队里的工作，还鼓励我静下心来复习准备。

1978年7月，天气异常酷热，考场内简直就是火炉——那年月的教室风扇都没有一把。可这是我对大学目标的最后冲刺，于是咬紧牙关，克服睡眠不足的困扰，全神贯注答起题来，周围的暑热忘得一干二净。三天时间五门课程一一考过，自己觉得还可以，甚至有一点过五关斩六将的快感。作文考试时还出了个小插曲。作文是缩写，我认为是自己的强项，很轻松地就按限定字数完成了。可走出考场以后，我公社的另一位考生却向我诉苦："范文中华主席的话我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字数就超了。"我问他为什么不缩短一点，他激动地说："开玩笑，华主席的话都敢乱动吗？那可是政治立场啊！"听着他的话我只有摇头苦笑，这次作文他可要吃亏了，可能像他这样的考生还不在少数。但我又一想，我平时吃政治立场的亏又何尝少呢？毕竟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啊！

在忐忑不安的期盼中，考分终于下来了，我居然是全公社唯一一个上分数线的人，全区考生的第二名！我的总分是377分，不但上了本科线，而且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一炮打响，哥哥们自然是来信祝贺，当地也是人人交口称赞，处处以我为榜样，熟人见面向我竖大拇指，老师上课教育学生必以我为例，尤为难得的是岳父母也一改长期拉着的冷脸。我终于用高考证明了自己，在世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不过有时我因事去区里，路上听到别人议论我，说得简直有点神乎其神，又反倒让我这个经常挨批评的人很不自然，很不自在。不就是一次考试么？不就是377分这个数据么？我内心颇为疑惑，用共产主义思想颠覆传统意识这么多年了，乡民们的骨子里怎么还如此顽固地残留着"金榜题名"的腐朽观念呢？但确切无疑的是，我已经戏剧性地一下子从"坏人"成了"名人"，我的人生悲剧也一下子变成了人生闹剧。

接下来是填志愿。我五个志愿有四个选择了师范，因为当年读师范不交学费，国家还补贴生活费，可以减轻我的家庭经济压力。但是我填志愿时犯了一个错误，为了保险，我最后填了专科级别的达县师院。后来我才知道，为保障达师这样新办学校的生源，凡本地考生填了达师志愿的，都一个不少地留下了，我这个本科分数的考生就这样进了专科学校。不过这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我终究实现了参加高考的初衷，寻机离开了那个让人伤心的环境。

我入学以前最担心的是政审，生产队、生产大队我都不担心，最怕的是公社这一关。但出乎意料，我的政审很顺利就过了。读完大学，我被分配到重庆市綦江县双溪机械厂技校工作。我并没有因为读大学换来荣华富贵，只不过好歹算是从农民变成了吃专供口粮的城里人，这一点大大辜负了当年乡民们的期望。当然，新的生活之路总算是向我展开了，只是许多年以后，当年公社政审的悬疑却仍然像一个包袱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有一次填工作履历表，我终因"心怀鬼胎"，主动将当年受过批斗的事写进去了。谁知学校书记又给了我一个意外，他要我彻底放下包袱，说我的档案材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受

批斗的内容。

这让我大为惊讶，公社书记陈某没有给我安定时炸弹？考上大学以后，陈某自然没有实践“手板心煎鱼给我吃”的诺言，难道在政审上改变初衷就是手板心煎的那条鱼？也许人真的有良心发现的时候？也许是我这个高考“名人”震慑住了书记大人？也许是领导班子里的好心人起了作用？抑或是因为时代变了，所以人的思想言行也会随之与时俱进？毕竟我在农村那些年月普天下风行斗争哲学而后来又渐渐倾慕和谐社会，根本还在于世风不由人。静下心来想想也是，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以及不少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那种环境里不也一样做过不少不规范的动作？时势弄人哪！

不管怎么说，30 年前我走过的那条坎坷的大学路，最后还是画上了政审过关这一似乎圆满的句号，尽管我至今也不甚了解那次政审到底是怎样过的关。但我也确切地知道，当年各种各样的政审确实是“审”死了不少的人，我母亲匪夷所思的惨死就是我终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本文行笔结束之时，正好是又一年高考之日。目睹充满梦想的莘莘学子们走进日益现代化的考场，我感慨万端：今日之考生大概再不会像几十年前的我一样，仅仅为了摆脱一种政治迫害，仅仅为了一点果腹之念而去奋争了吧。

阿门！

作者简介

程克武，1965 年于重庆市第五中学初中毕业，当年随学校组队下乡。先分到四川省邻水县三古公社五一林场，1968 年撤场后落户在三古公社华尖大队三队。1978 年考入达县师范学院，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1 年毕业，分配到重庆市綦江县双溪机械厂技校任语文教师，1984 年底调入重庆市空压厂职工学校任语文教师。2001 年内退至今。

我的两次高考

唐龙潜

现在，每年的高考都成了一个特定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年年有几百万考生，近千万个家庭在等待和期盼中守护着那段时光。媒体跟踪报道，各界密切关注，什么划线、调档、填志愿，电话查询、网上公示，“重本”、“二本”、“三本”，其纷繁复杂的录取过程均在严密有序的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论贫富，不论权势，每一个考生都是一个平等的自我，考核的核心标尺就是分数。

可以说，高考至今是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缺陷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片亮色，一方净土，其基本原则所彰显的公开、透明、平等、公正乃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也许有人觉得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封建王朝的科举取仕不也大致遵循这样的准则么？然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记忆……

1964年，我面临高中毕业了。高考越来越近，似乎已能听见它那清晰的脚步声。课程已经结束进入总复习阶段，任课教师开始印发各种复习资料和参考题，包括历年的高考试题。虽然教室和寝室照例在十点半熄灯，但是在走道里、屋檐下、球场边昏暗的路灯下，总是伫立着一个个手捧书本的孤独的身影，他们基本上是毕业班的学生。这成了深夜里宁静校园一道特别的风景。生活已经从困难年代开始缓过气来，在夜幕中苦读的学子大多还能向肠胃里填进一只馒头，一只锅魁，奢侈点的甚至一个点心。人人在规划着自己的将来，希望迎来一场公平公正的考试。自然，12年的读书学习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己的成绩在什么状况，什么档次，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心里也大体有本账。不定因素也就是临场发挥是超常、正常，还是反常。

填志愿的时候到了，在我们这一批学生中早已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那时的口号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中又特别青睐与军事科学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而与国计民生接轨的工业建筑医科农科当又等而下之。我所在的学校是成都三中，并非什么重点中学，不过这时候重点中学的概念也还不明确，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虽然也有升学考试，但只要过了录取线，大体是按家庭住址来就近分配入学。就是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有考入北大、清华的，教师们总以此自豪，说北大、清华的种子在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断过。我自恃成绩好，觉得成竹在胸，所以就是最后那段时间过得也很轻松，球照打，泳照游，觉照睡。

我填报了清华大学。之所以这样做，跟最后一年来我们学校代课的一位老师有关。他叫谷西平，是两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的一个什么军工基地，大概是不甘那里的荒凉寂寞，更由于女朋友在成都的缘故，便请长假回到了成都。由于他当年就是从这个学校名动一时出去的，是那时从全市所有中学中选拔的三位留苏预备生之一，不知怎么“苏”没有去成，就留在清华念书了。由于这些渊源，母校就将这赋闲在家的他请来作毕业班的最后一年物理课代课教师。

他的教法的确别开生面，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实验做得出神入化发人深思。在授课中他大量拓展教材内容，什么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什么“地对空，空对地，空对空，地对地”，很多概念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极大地满足了时代造就的我们这一代崇尚战争的青年，竟在全年级四个班中掀起了一股物理热。当然他的讲课也使一部分成绩差的同学如坠雾里，只好“坐飞机”，兴趣浓成绩好的则直追他的思路，一次次进入到令人兴奋不已的奇妙的物理空间。在他命题的物理毕业考试中我拿了全年级第一，也就才 91 分。据他说这套题比高考试题难多了。由于他把题弄得太难，造成这一科的成绩比其他科都偏低很多，大家觉得别人又不了解情况，这样的分数拿出去面子上很不好看。于是他又出了怪招：按比例加分，分数越低加得越多，轮到我只加了两分，所以我的物理毕业成绩是 93 分，但这已是全年级最高分了。

在他的分析和怂恿下我填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按他的说法，清华是工，重运用；北大是理，重研究。自动控制专业是非常前沿的学科，他自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可惜超前了几年还用不上，而现在去学应该正是时候了。他又说，清华在同等条件下是招男不招女，招小不招大，特别注重物理单科成绩。心里一默，这不都是正对着我么？我当时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毕业时也就 17 岁。毫不犹豫地填了自动控制专业，见后面还有个括弧，赫然印着“绝密”二字，更是喜上心头，越“绝密”越好啊！

七月里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自己觉得感觉很好，便满怀信心地等着拿录取通知。

终生难忘 1964 年 8 月 8 日！按惯例，这天是接到首批录取通知的时间，往年清华、

北大的通知都是在这天送达，通过邮局送发，时间大概在下午四五点。而不巧的是，这一天我们全班同学正好在杜甫草堂举行野餐会。那时的成都远没有现在这样大，草堂已是郊外的概念。柏树森森，荒草丛丛，埋锅造饭不但是允许的，还是一种备受城里学生们追捧的时尚活动。记得是吃水饺，四个小组四只锅，挖坑、垒灶、拾柴，洗菜、切菜、和面。忙忙碌碌到下午两三点了，饺子还没有包成下锅。我和班上另一位也是成绩很好填报了清华的同学，暗暗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有些待不住了。溜吧，又不好扫了全班同学的兴，只好耐着性子熬着。

拾来的柴火湿的多干的少，只见浓烟缭缭不见熊熊烈火，一大锅水总也煮不沸。不过大家似乎都不着急，笑语欢声，忆同窗话惜别，畅想未来，大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有人提议将每年的今天定为我们永久的"班日"，地点还是这里，雷打不动，风雨不移，不相约不通知，各人记住，各人自来。多么激发人想象的浪漫提议，大家一致赞成，并认真地作了分析和补充，即：时间为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因特殊情况远在外地不能赶回的除外。后事为：第二年有一半同学来到这里，而我此时已在千里之外的西昌农村；第三年已处于"文革"发端，革命已将此类浪漫情怀冲得无踪无影，"班日"就此短命，从此星落棋散人世茫茫。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同学至今未能见一面。

我们终于还是没能熬到饺子煮熟，悄悄溜了。其实赶不赶回去，有通知都会照样送达，于结果并无关系。大概是想早一点领受那份喜悦吧，真是太年轻、太浮躁、太沉不住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同学们传为笑柄。

出了草堂我们便飞跑起来，还得走好几里到青羊宫才能搭上公共汽车。他的家在城中心，而我的家在东门外，正好要路过他那里，于是决定先一同到他家看看，再到我家。到他家后很快核实没有，而他已无心再跟我走了，只说如果你收到了就马上来告诉我一下。

我快步向家里赶去，一面走一面设想着，如果期待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一到巷口便能知道，天天进进出出，都是多年的邻居，这么轰动的事情，应该早就热闹开了。想象着那场面，真是脚履轻云，全身飘忽起来。一头扎进巷口，只见一辆拉粪的架子车正停在路中央，摇着手铃的老女人正在拉长声音吆喝："倒马桶啰——倒马桶啰——"，霎时各种秽器顿响，恶臭直冲云霄！此时正是公厕太少的老成都中无可奈何的小民百姓一天中清除秽物的时候。平静如昔，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但跨进家门见到母亲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没有通知书么？""没有啊，我今天整天都在家啊！"母亲正在弄开蜂窝煤准备做晚饭。

夜里有关心的同学来到我家，同时传来了三班两位报考清华的同学都已接到了录取通知，二班一位报考北大的同学也已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只觉得眼前一黑，清华已断然

无望了！我们年级四个班共有六人填报了清华，没想到三班的两位竟然都上了。

在此后继续等待的半个多月里，那真是一天一天，望眼欲穿。心里还在想如果接到别的什么学校的录取通知该怎么办呢？当然书还得去读，但校徽肯定是不敢公然地别在胸口前，只好悄悄地放在衣袋里了。直到报上登出“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录取通知均已送达到考生手中”为止，这才如梦方醒，彻底从头凉到脚，切实地感到大学真的与自己无缘了。

由于全部录取结果均已揭晓，而这结果与同学们之间的平时猜测和任课教师的评定估计是那样出入巨大，大家全傻了眼。有略知内情的人分析说这次路线比去年贯彻得更厉害了。于是藏在庄严的考试背后而较之更为神圣、神秘，也更为严厉的政审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消息逐步扩散开来，有人说早在高考前两个月，成都旅馆就已住满了从各地调集的政审人员，专门负责本届考生的政审，深挖细查，组织严密，滴水不漏，全部工作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又有人说不是在成都旅馆，而是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甚至说是在一个与部队相关有哨兵值勤站岗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是个谜，究竟政审本身的工作程序是怎样进行的，标准是什么，直到现在也没人出来披露啊，中国的千古之谜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审“审”的不是本人，十多岁一直在校读书的学生，就是有什么问题那不都明摆着的嘛，哪还需要调那么多人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审”？原来审的是与本人相关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说来可笑，我那时对政治的理解差不多就停留在政治课上，什么党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兴趣都很浓，学得也好，每次考试得分都很高。就是高考的政治试卷吧，我也深信答得非常完满！原来这些并非是现实的政治啊，与政审所要做的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自然，填了多年的表，总要写上家庭出身、主要成员、政治面貌等情况，也依稀知道出身“地富反坏右”，或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有“关、管、杀”情况的，那肯定是大大的不好。但我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家庭出身栏我一直填写的“中农”，这是解放初期在老家简阳农村土改时划定的，虽然不如贫雇农，但也靠不到地富那里去。家庭成员主要也就是父母，都是公民，都有选举权。社会关系中也没有“关、管、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起在毕业前填过一张情况登记表，父亲的简历和政治面貌不知道该怎么写，曾问过他本人，根据他的口述写了如下内容的文字：“1928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坐过三年国民党监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当时在我的心中还觉得这是一段有功于革命的历史，至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经过解放后的这么多运动和审查，父亲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头上也没有帽子。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就让我感觉到了。

录取工作一结束，很快就进入到落榜学生的工作安排阶段。那时的招工和现在不一样，招工单位和本人并不见面，只是通过档案决定录用与否。档案还在学校，用工单位便一批批到学校查阅档案挑选。自然首先是军工企业等保密单位，我们班有几位同学便这样被率先通知录用了。接下来便是一般工业企业、商业系统营业员。排在最后的是“师训班”，培训以后做小学教师，这几乎将所有落榜的人一网打尽。就连和我一同报考清华的那位同学也在最后一批接到了师训班的通知，只是他赌气没去报到，后来去了云南修路。而我等到的结果是学校通知我招工已结束，现在档案已转到街道办事处，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青年了。

现在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事情的明朗化使我和父亲之间作了一次摊牌。我不能升学，甚至不能工作摆明了都是因为他，他应该给我一个解释，一个说明。自我未接到录取通知落榜以来，父亲就成天阴沉着脸没说过一句话，他也在等最后结果。面对我明显带着敌视的无言的愤怨和质询，他交了一份材料给我，只说：“你自己看吧，这是我在运动审查中写来上交的材料底稿。原想这些和你无关，也没打算跟你说，现在你自己看吧。”

这是一份自传式的材料，篇幅很长，涉及的人和事很多，我只注意到关键部分是这样的：1928 年父亲在上海国民党警察部队作警官，经一位姓王的介绍加入中共，属中央军委领导。同年一位姓萧的人从莫斯科回国奉命来与他联系，还未见到他便先被叛徒出卖被捕，又供出他来。由于是军人，他被捕后曾接受过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审讯，他是被上级出卖的，而又还没有下级，审讯无果后被关押，三年后释放出狱，失去组织联系。为生计后经人介绍在南京中央合作金库工作，曾被迫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按组织审查标准，集体加入应不算本人的政治选择。

父亲解放后的情况我就清楚了。解放前夕举家回到老家简阳农村，还领头创办了一所小学以方便家乡子弟读书，该校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我自己就是在那里发蒙读书的。五十年代初在成都做中药材生意，后公私合营，再后调中药炮制厂作总务，1959 年申请退职自学中医，单位不许，后作自动离职处理，关系转到地方派出所，当居民。

我当时想，虽然经历复杂，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多年以后才知道他的问题在档案里比摆明的“关管杀”和“地富反坏”更严重！一位在七十年代做了官的好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知青办见到了我的档案，关于我的父亲里面竟有这样的文字：“叛徒，特嫌，内控对象，解放初期曾秘密去过台湾？”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钻进档案里去的！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他此后曾被多次集中学习，“文革”中更是被多次抄家和拘押审查，据说有关部门对他的审查外调经费花了近万元，这可是还很穷的六七十年代啊，这费用相当于

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二三十年的工资收入了,可惜啊！他最后一次被拘押释放出来是1971年,手上拿着公安局的一纸判定:“明确历史反革命身份,不戴帽子。”这就是他的最后结论,盖棺论定,第二年他就因癌症去世了。

关系回到办事处以后，为找工作我还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当时攀枝花正在大建设,有个单位来成都各街办招修路工人,办事处也在大力动员闲耍多年的老社青报名,但老社青们均不齿,说谁到那山旮旯里修路啊,霉得慌！我得到消息马上去报了名。但第三天就得到通知,说我政审不合格！修路也要政审？而且我不合格？连“霉得慌”的事也轮不到我？

我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绝望最黑暗的几个月。七月壮志高考,八月望断录取,九月梦断工作,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学校开学了,读书的读书去了,工作的报到去了,街市依旧太平,阳光依旧灿烂,唯我却觉得暗无天日,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最怕的是白天,怕出门,怕见人。人们都知道我是高考落榜,而且连工作都没有分配,我却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困住我的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鬼打墙！我回避了所有来看望和安慰的同学,早上不等别人出门上学上班,我就出门去了,在外一直待到天黑以后才回屋。开始是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走,在河边走,哪里人少哪里走。公园是不能去的,那要买门票。这样大概有十来天,后来我终于寻到了一个去处——省立图书馆。这里距我家有四站汽车路,走路40分钟,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半全天开放,不收费,来的人也不多。此后我便怀揣两个馒头或一只锅盔作为午餐,从开门到关门全泡在里面。感谢政府提供了这个场所使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这时因还未“文革”,古今中外名家大师的书都开放,借阅也方便,而且环境安静空旷,偌大的阅览室,常常就几个人,有时还就我一个人。我就在这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希望先圣先贤们能够洞开心结,指点迷津。绝望之人常发叛逆之想。我自信父亲没什么问题,就算有什么问题,与我何干？凭什么应该我来承受？中国有株连问罪之举,但那是在封建社会;有父债子还之说,但那是经济问题;有冤冤相报之事,但那是私人间的狭隘作为。我怎么也不明白,社会主义祖国、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怎么会奉行这样不合理不公正的歧视政策？不是都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吗？解放时我还不到三岁,旧社会什么样子连记忆都没有,我凭什么要对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承担连带后果？这里一定有什么错了。虽然对于整个困惑着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想清楚,但我坚信自己是受到了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原本满眼光明的景象现在布上了阴影,我开始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了。

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三个月,直到有一天突然听说成都团市委办了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不填表,不政审,不体检,只要报名就行,而且进去后就管饭,还不交伙食费。第二天我便背着被盖提着瓷碗进了这所当时设在梁家巷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内的“青

训班”,走进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走进这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类似的情况,大家幽默地概括为:“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原来如此啊,还何必让我等白下一回考场!

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7年,这是自“文革”废考以来首次恢复高考。我从报名、考试、考后、录取,一波三折,经历了一系列的偶然,充满着传奇性和戏剧性,最终得以结束知青生涯,再做学生。

当报纸和广播宣传恢复高考时,我已下乡当知青13年了,论说早已不“青”。按宣传的口径是主要针对老三届,即1966、1967、1968几年因“文革”未参加过考试的高初中毕业生,显然我不在此列,也未作此非分之想。这时我正在下乡所在地的公社小学做民办教师,但教的不是小学,而是高中。这是因为一年多前我们那位公社书记突然发了奇想,决定放颗“卫星”。他说既然原来的小学已经“戴帽子”办了初中班,那就“再加一顶帽子”办个高中班。就他一句话,学校腾出一间废弃教室,又弄来几个“四类分子”出义务工,把地刨平,和一摊稀泥把墙壁的大洞小眼补一下,教室就成了。没有桌凳,宣布由学生自带。核心的问题是教师,谁来上课?原有的公民办教师都不敢来出这个头,对一片物质和文化同样贫瘠的土地来说,这还真是个难题。书记下令在知青中找。我当时已被聘在一所县属中学代高中语文课,公社和学校找到我,许以评计优厚的工分待遇,外加每月11元的现金补贴。算来比当时我代课的收入还多,而且离家近,还可照顾自留地。更主要的,我是下在公社的知青,户口还在公社,代课的学校又无法帮我拨出户口转正,鉴于这些考虑我便同意了。但我一个人也不行,便又从66级高中毕业的知青中选了一位成绩优异者与我搭档。我们两人一合计把课程一分,他教数学、化学、外语,我教语文、政治、物理,这离奇而简陋的民办高中班就正式开张了。

这时高中学制已改为两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教的这个班也面临毕业了,这些学生也都要报名参加高考。全公社组织报名填表等事务是由我所在的学校在办,和我搭档的那位老师是高66级的,报名参考是正份,我根本不作此想,只在全力帮助学生备考。

初步的报名登记已完成,学校的一位副校长就要拿着材料去县招办送审并领取正式的报名表。平时大家是同事,很熟,经常开玩笑,在他走时我就开了句玩笑:“老陈,给我也混张表回来,我也报个名去考一盘嘛。”他下午就回来了,笑着说:“我还真给你混了张表。”原来那天去领表的人太多,招办人手不够,无法一一审查各地报的材料名单,只叫报个数字就领表,他就多报了一个多领了一张。表是到手了,但他也说:“你考不考得成,只有天知道,我估计多半没门,填也白填。”我说就当开个玩笑,当即就把表填了还给他,心

里确实也没当回事。

直到临考前发放盖有招办印章的准考证和志愿填写表了，不想还真有我一份，看来是真可以进考场了。我这才认真起来，慎重填写了志愿表。时过境迁，现已是而立之人，再不敢像 13 年前作非分之想，我选的专业是中文，学校是清一色的师范，在是否愿意服从调配栏，我写上："愿意"，又加上："任何学校都可以。"因为是报的文科，这才赶紧去找几本历史地理书来翻翻。考试很快过去了，坦白说我觉得考得很不满意，特别是数学一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其他科题又太简单，拉不出差距，特别是语文。

还没待认真总结反省，第一次警报拉响了。公社通知我，说县招办打电话来，我的情况弄错了，我是没资格报名考试的。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果然又白考了一回。同事们都很同情，老陈说："你自己到县招办去说说嘛，看他们能不能放一马。"管他的，心想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县招办。接待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一见到我就不住地道歉，说由于他们工作疏忽，我不属于老三届，是不应该参加考试的，让我白考了一回，很对不起。而我这时已经想好了申辩的理由和依据。我说你们先别忙道歉，我是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你不用管我是属于哪一届，这次规定是年龄不超过 30 岁（含 30 岁），这一条我是符合的，就算我没有读过高中，以同等学历的身份仍可以报考。他们对视了一下，觉得有些道理，又找出我的报名表来看，对于所填出生年月他们似乎有些怀疑，我说可以到公社查户口，他们说公社的户口不准确，不能为据。我说我还有证据：我从包里一股脑掏出保存多年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证放到他们面前，每张毕业证上都明确写着毕业时年龄，分别为 11 岁、14 岁、17 岁。这样算来我确实未满 31 岁，这条杠子通过了。他们翻看着毕业证，发现在初高中毕业证的背面都印着各科毕业成绩，不由惊叹起来：你的成绩好得很哟！那位女的还加了一句：当年怎么没上大学呢？我苦笑了一下："运气不好嘛。"还能说什么呢？

他俩的态度变得很亲热，便同我商量这事该怎么办，说毕业证确实能证明年龄没有超。但那时没有复印机，不能复印一份怎么办？我说算了，我把这些毕业证都交给你们了。那男的说你要想好哟，我们给你放进档案里就永远也取不出来了。我说不用想，放吧，反正就这一回了，我不会再参加考试了。这些毕业证应该至今还存在我的档案里，我也真的永远见不到了。

又过了一阵子，第二次警报拉响了。在县城工作的一位朋友专程赶来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县招办的工作人员，他曾委托其了解我的情况，昨天别人告诉他说出问题了，发往成都关于我家庭情况的函调被退回来了，这样我就没有家庭的政审材料，将不能上报。我问是发到哪里的，回说是发到我母亲工作单位的有关部门。我心里一默，知道糟

了。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住家还是老地方,父亲已去世,母亲在另一个派出所辖区的街道生产组作计件零工，有活就干。我在表上填的是母亲工作的街道生产组的名称,想必那函是寄到该生产组所在的公安派出所了,小小的生产组哪有资格收这样的政审调函,而当地派出所又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组,即使知道也查不到有关我母亲的任何情况。我跟那位朋友说让他转告他在招办的那位朋友,可以向我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发个函,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派出所是了解情况的。心想他们来抄家和传讯关押我父亲都有好几次,还能不了解？他马上跟那位招办的朋友联系了,但回话说来不及了,他们不可能再发函,材料过几天就要上报。

我觉得一下掉进冰窖里,又是政审？ 13 年了还是没有摆脱这个怪圈。政审是秘密进行的,本人并不知道,也绝不与本人见面。现在我知道这情况是通过朋友的朋友的私人关系,我无法直接到招办去说明,甚至请求他们我愿意自己出钱请他们派个人同我一道去成都,找到我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拿到相关材料。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如果到招办去一说,人家只问你一句:谁告诉你的？不但事情办不成,还会连累了朋友的朋友和朋友,还不知道这样的泄密该当何罪？我真是又遇到了鬼打墙。朋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回成都去找派出所请他们给招办发个函？可这能行吗？且不说我们是那样的家庭,又不认识一个人,就算转弯抹角能找到个人,可他敢发和能发吗？招办没有去函要,他们凭什么发？冥思苦想到半夜无计可施,看来是要又一次天绝了。天快亮时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成都工作,是在一个国营厂里当工人,大家都是同一个父亲,也许可以请他找厂里出个父亲已死的证明寄给招办。和朋友一商量,他觉得也只有这样了,如果办得成,起码能说明那遗患无穷的父亲已死了。本来父亲已死的情况我在登记表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按政审程序那不作数啊!

第二天天不见亮我就出发了,走了四十多里到西昌县城,找到邮局给哥哥挂长途,简要说了情况,请他立即办,我就在邮局等回信。中午时分他的电话来了,说厂保卫科不同意,他们无权出我的政审材料。我把着听筒不放,又说老哥,这实在太重要了,你再去说说,不要什么材料,只要他们出个证明,说明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弟兄,我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1972 年已死就行了。他又去找保卫科,也许看在他是老工人的分上吧,好说歹说,对方同意出了。几天后那位在招办的朋友辗转告之收到了,但说那是个啥东西,不像个政审材料。

政审,政审,13 年前我就深知它的厉害了,下乡后也有两次招工被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但一到政审就立马被枪毙了。连回成都去区交通局运输队拉架子车都说是政审不合格,幸好当农民不需要政审,否则我真不知这阳光明媚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我的去处。

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了,和我搭档教那个高中班的知青也已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

录取通知，就是和我们一同参加考试的学生也有三位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已判定无望，心如死水，不再作此想。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便埋头种自留地。务自留地虽然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但要吃饭也顾不得了。

通知书好像已经发完了，我也不再想这件事了。有一天突然听说公社邮政代办所有一封我的录取通知书，我不敢相信，直到把信拿在手里还是觉得有些像做梦似的。只见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公社、大队、小队地名和我的姓名，发信人是：西昌师范学校。我懵了一下，西昌师范是中专，我这样的年龄怎么还可能被中专录取，是不是搞错了？拆开看后算弄明白了，录取的是西昌师范高师班，后有括号注明：大专。（一年后迁址更名为西昌师范专科学校。）那么这一切是真的了？我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我无法描述当时那种振奋和欣喜，只觉一股热血直抵脑门，顿觉天旋地转，似乎整个人都要飞出去了。从 17 岁到 30 岁，13 年，13 年了啊！我想即使 13 年前接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也不会比现在接到"高师班"的录取通知更让人振奋和欣慰。那时是少不更事，心比天高，以为世界就是自己所见到的样子，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哪里知道真正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是那只自己永远也见不到的手。现在却是经历了数不尽的失望和磨难，知道在自己身上永远压着那可以窒息一切的冰山，已经下死心种一辈子地、当一辈子农民了啊！

我是按规定时间最后一天下午去报到的。一进校门就见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叉着腰迎面站着，正打算向他打听一下在哪里办报到手续，他却手一抬直指着我，大声说："唐龙潜，你终于来了！"我大吃一惊，团团迷雾从心中升起：他是谁？为什么认识我？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叫"终于来了"？难道我还会不来么？我不好问，他也什么都不再说，但却亲自带我去报到处办理了全部手续。

谜底是后来慢慢揭开的。这位老师姓刘，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分到西昌来的，后来教我们的哲学课，当时他就是学校招生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在决定录取我的时候他们是担了风险的。我的材料并未送省招办，早已被打入另册，他们是看到我的考分实在高才提出来研究的。按政审我是不合格的，但大家看在我已下乡 13 年，所在小队、大队、公社三级评价都很好，特别是我代课的那所县属中学对我的教学情况给予很高的评价。再考虑到"高师班"的学生毕业后也就是教书当教师，政审标准是不是可以稍微宽一下。反复研究了几次，最后大家共同签名承担责任录了我。我真是听得冷汗淋漓浑身发麻，好险啊！最后我问："刘老师，报到那天你怎么一下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说："你的照片我们都看了多少次了，还记不住？再说那几天我都在注意报到的情况，见你一直没来。"我顺势问道："你那天说'终于来了'是什么意思？"他笑了笑："我怕你看不起我们高师班嘛。"我很想问问我考试的具体分数，更想问问我那档案里关

于父亲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但我不敢再问，恐怕他今天说的这些已涉及到违反纪律泄密了。

我至今不知道我那次究竟考了多少分，只是后来有神通广大的同学传出，我是当年“高师班”录取的最高分，比录取的最低分高150分。又说那分数比当年川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出许多。有人替我抱屈，而我却毫不在意了，这些只是小不公平罢了，我人生经历的不公平岂止这些啊！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除了自己送上去的三份毕业证书。当我调离师专，人事处的一位女干部去寄档后和我开玩笑说：“唐老师，你的档案超重，我们还多花了些寄费。”我也开玩笑说：“你别忙寄啊，让我看看是些什么东西，寄费我来付都可以。”她也笑着说：“除非我不想活了还差不多。”

中国的人事档案制度究竟起于何时？是怎样管理和运作的？为什么招工、招生、招干不把目光投向活鲜鲜的人进行考察，却要死死盯着那些牛皮纸袋里的死材料？我想起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老师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教室里慎重宣布：“大家听清了，现在开始给你们建档了，以后这个档案就要跟随你一辈子，你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当时想老师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从现在起如犯什么错误就会记录下来放进袋子里，却没有想到这袋子的作用远不止这些，不仅是把自己装进去，还会把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姑八奶全都装进去，而且装些什么自己永远不知道，更永远见不到。我想我父亲的档案一定很丰富，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应该没有什么妨碍了。前不久见网上说国家档案局宣布部分档案可以公开解密了，这当然是针对那些重要会议、事件、统计数据等，以便供历史学家研究。我想能不能对个人档案也开放，比如人死后多少年其本人档案可由亲属领走，收费也可以，国家还能增加一笔收入。首先我就愿意出高价回购父亲的档案，那可是害了我一生的东西，而且那将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作者简介

请见《成都有个“青训班”》后的作者简介。

我的读书梦

邓　鹏

从 1964 年到 1978 年，十四年间，我做了一个长长的读书梦。梦很美，美不胜收；但做起来很苦，往往苦不堪言。如今，三十年过去，梦对我仍是那样清晰，依然还那样使自己感动。

中考落榜

1964 年夏天，我 15 岁，就读于重庆名校求精中学，少年立志，初露才华，不仅在学业上名列前茅，而且全面发展。虽然知道自己的家庭成分不好，也感觉到阶级路线的寒气，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失学的可能性。

在初中毕业前夕填写升学志愿表时，班主任王大富老师语重心长地劝我放弃第一表的六所市属重点高中，将母校求精中学填写为第二表的第一志愿。显然他听到了什么风声，对我解释说，重点学校要求太高，报考纯属徒劳，而报考自己的母校，应该问题不大。

听了老师的话我暗自委屈。凭我的成绩和在学校的表现，报考市重点学校应该有相当的把握，至少可以碰碰运气吧。1961 年我报考初中时，三个志愿都选择了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没有成功。现在，报考高中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不可放过。但老师劝我时的语气虽然委婉，却有某种我无法抗拒的权威。其实，1961 年我报考初中的失利已经是严重的教训。那一年，我以全优的成绩从重庆市佛图关小学（现在的大坪小学）毕业，当我把自己那孤注一掷的志愿表给班主任李正常老师看时，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居然连声说“填得好”。后来，我考上了初中，但没有如愿以偿到南开，而是被分到一所名气三流的初中就读。班上另一位成绩平平的同学却意想不到地被南开录取，多半因为他出身

工人家庭。幸好后来母亲被调到求精中学教书，我才跟着转学到求精。我转念一想，上学又何必名校？只要有书读，而且又在求精中学，也不算什么晦运。俗话说，“出水才看两腿泥”，我就在求精苦读三年，高中毕业时再让人们看看我的水平！再者，母亲从教多年，自1961年起就在求精中学教书，是该校英文教研室的骨干。就看在我母亲的面上，学校也该录取我吧。所以，虽然“落榜”这个念头偶尔也来骚扰我内心的宁静，我实在没有名落孙山的思想准备。

然而我的确落榜了。接到不录取通知书后，我有好些日子不能正视失学这一现实。我多么想读书、多么依恋学校呵！

我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曾祖父邓石泉是川东名校江津县聚奎中学的创始人之一，祖父邓鹤丹曾留学日本，为川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过杰出贡献。父亲邓夔纪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和上海复旦大学，母亲黎恩珞毕业于重庆求精中学和金陵女大，他们都是教师。父辈的亲戚当中有好几个知名学者，叔伯兄姐也大多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多数就读于国内的几所名牌大学。堂姐敬时大学时因为品学兼优，被选拔进留苏预备班，可惜因为伯父夔刚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痛失留学苏联的机会。我的表兄叶含弘也是因为姑父、西南师范学院的教授叶麐先生被打成“右派”，大哭一场后放弃报考重点大学的计划，委屈地进入昆明师范学院。相比之下，我的运气最糟糕，仅仅读了九年书，在求知欲最旺盛、立志以聪明和勤奋来报效国家的时候，硬被永远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

两个月后我下了乡，到距离重庆四百多公里的大巴山里的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在人生最严峻的挫折面前，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愿望。我想，既然下乡务农，那么就读点农学书籍，搞点科学种田，既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又能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出力，岂不是两全其美？党和政府不是要求我们“又红又专”吗？专者专家，要当专家，就必须学习。

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离开重庆的两天前，我专程到重庆解放碑的新华书店，选购了一套准备在农村自学的书籍，包括《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蔬菜栽培学》、《农艺学》等，当然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

冷酷现实

到了茶场后，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学习计划极不现实。所谓青山茶场，却是一棵茶树也没有的荒山野岭。我们一到茶场就开荒种地，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一天收工回来，天已黑尽。我们一帮知青虽然年轻，精力充沛，但毕竟不是机器，可以不停地运转。吃过晚饭后，人已筋疲力尽，哪还有精神读书？往往把书捧在手上才几分钟，睡意就排山

倒海袭来，人一倒在床上，就像一块木头，睡得昏天黑地。大巴山里的冬夜，常常风雪交加，雪花从瓦缝里灌进寝室，在被盖上积一两寸厚，我们也全然不觉，照样酣睡。一年到头的大强度劳动和“三饱一倒”的生活使我读书的意志逐渐减退。

我们的场长叫何炳德，是个四十来岁的大队干部，他为人不错，生产上是行家，但没有什么文化，我们这帮调皮的重庆知青背地里叫他“老炳德”。政治指导员叫邱占富，复退军人，虽然在部队里淘了一点文化，但并不知道如何“指导”我们这帮从大城市来的学生青年。他带领我们进行了几次队列操练，知青很快就感到厌倦。他的家离茶场只有几里路，所以天天回家。后来借口家庭负担重，干脆几天不到茶场来，主动放弃了指导权。因为他是指导员，谁也奈何他不得。生产队长叫杨厚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产上是个好把式，但文化水平最多高小毕业。

第一年，我曾经异想天开地试图说服这些当家人给我们一点搞科学试验的机会，大概因为我实在没有农业生产的经验，人微言轻吧，他们根本没有采纳。唯一对我的想法有点兴趣的是一个叫胡大寿的本地青年，当年十八岁，在县上学习过果树栽培，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不久也参军离开了茶场。

在茶场读书，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实验条件，学习自然科学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自学这件事上，我很孤独，常常陷入茫然，时间一久，原本立志改变大巴山的贫困和落后的我，不料先被大巴山“改造”了。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跟着老炳德、厚禄队长和其他几个从不同生产队调来的农村青年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荒山、庄稼和虱子打交道，在平淡中打发日子……有时我暗自琢磨：莫非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希望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莫非这就叫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莫非这就是我们这帮出身不好的人今后的命运？

在茶场读书甚至还给我带来了麻烦。读书多半是在晚上，没有电，只有靠煤油灯。当时煤油三毛多钱一斤，而我们每个月只有两元钱生活费，于是我们学当地的农民，用“松光”来照明。“松光”也叫“松明”，就是松树的枝跟干相接的富含油脂的那一段。将它砍下来，再劈成小片，放在一块石板上点燃，就成了我们依赖的光源。这种光源不稳定，很伤视力，但要读书，也只好将就用。

1966年初夏的一个晚上，我隔着蚊帐借着床边一张方桌上跳跃的松明翻读“毛选”。读着读着，感到困乏，顺手就把书放到桌上。正要昏昏入睡，突然被异样的光亮惊醒，翻身起来一看，原来石板上燃烧的松光片落到“毛选”上，“毛选”着火了！等我掀开蚊帐将火扑灭时，“毛选”已经被烧焦了几页……

几个月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十六条》下达后，鬼使神差，我执笔写了我们茶场的第一张大字报，写了还觉得兴犹未尽，又同一群知青朋友兴高采烈地步行到区上，把它贴在区政府外面的墙上。殊不知，一时兴起的孟浪行为竟闯下了大祸。达县地委很快组

织了工作组，进驻有知青“造反”的林场、茶场，对知青们进行弹压。全地区的几百个社办林、茶场的知青大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这些人现在要造反，不是“狗崽子”翻天了吗？我也自然成为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想混进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因为当年早些时候，我遵照公社党委组织部长侯焕章的要求写了入党申请书，其时年仅十七岁），“吃”了五百多张大字报。罪状之一就是：居然胆敢“烧毁”毛主席著作。在批判会上，我申辩说“毛选”着火乃是事故，并非有意所为。但是，当时谁管你有无动机，既然你烧毁了“毛选”，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任何解释都徒劳无益。在工作组的发动下，全公社五个大队的贫下中农对我口诛笔伐，不少大字报的作者发誓要剥下我的“画皮”、砸烂我的“狗头”等等。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白天被强制劳动，连其他人都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仍然要上山打柴或只身一人到老林看守包谷，晚上经常接受工作组主持的批判，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违心的自我揭发批判……

这一切无疑是对我这个毛泽东的小信徒的无情嘲弄！我没想到自己响应政府的号召上山下乡，对毛泽东思想虔诚地信奉，最后竟落得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我本想借下乡洗刷自己的原罪，逃避父辈的命运，结果偏偏步了父亲的后尘，刚刚年满十八岁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才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在接受强迫劳动改造思想的日子里，我万念俱灰，常常独自面对青山和空中悲鸣的寒鸦苦苦思索：人要是没有知识多好，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烦恼。干吗想读书呢？自己周围的那么多农民，世世代代都没有读什么书，不是生生息息也过来了吗？我又何苦自讨罪受呢？

重整旗鼓

1967年“二月镇反”之后，茶场涣散了，两年前的欢歌笑语在青山茶场消失了，知青纷纷离场回家。不等夏收，我也回到重庆。父母宽容地收留了我，让我在家中赋闲。在这段期间，我接触了一些老同学，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包括我初中同学刘明琼、她的高中同学王宗元及其哥哥王宗笠、年轻工人黄少刚等。这些朋友不仅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有自己的见地。跟他们的交往使我逐渐摆脱消沉。通过他们，我找到许多文学书籍，这些文学书籍多半是红卫兵“打、砸、抢”期间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其作者包括俄罗斯的别林斯基、果戈理、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和左拉，美国的杰克·伦敦、霍桑、惠特曼、德莱赛和英国的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哈代、狄更斯和拜伦、雪莱等。同时也没有系统地阅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和《古文观止》中的一些文章以及鲁迅、茅盾、曹禺、巴金的作品。

这样，离开学校三年之后，我又读起书来。由于在大巴山的经历，我读得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常常在一起交谈读书的体会。不

久,又有一些朋友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包括草坝区的知青张诗亚和刘定强等。在武斗四起、烽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读书给了我许多慰藉,也开启了我那几近麻木的心灵。我真正感到,知识是心灵的救赎,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饥不择食地读了一两年书,做了不少读书笔记,究竟想干什么,当时没有多去想它,因为看不清前途。跟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开始悄悄萌生搞文学创作的念头,但那是一种胆怯、羞涩的梦想,像一个养在深闺的少女。我也想过做学问,但不知道做学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记得一次闲谈中,王宗笠宣称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我心里想:"你连中学都没有念完,如何混来教授身份?"但他那对浓眉下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自信,我不能让他扫兴。人们常说梦想是一种奢侈品,可是在那年头,它却是我们这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唯一的精神慰藉。跟善于梦想的同龄人经常在一起,我也不知不觉异想天开起来。

那两年,母亲常让我陪她去北碚西南师范学院看望我的四姑母,这样我跟四姑父叶麐先生成了忘年交。姑母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极少回家,老两口都非常寂寞,所以只要我去看望他,老头儿就高兴得很,一老一少常常摆谈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姑父在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师从于心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赛贡(Segond)教授,在其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和题为《兴趣的心理研究》的博士论文。为了报国,他不仅学成归国,而且放弃了出国工作的机会。回国后曾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担任过四川大学的教务长和代理校长。1952年中国大学搞院系调整,他被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他信奉社会主义,1957年"反右"前夕甚至还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运动结束之前却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从此离开大学讲坛,直到1977年去世。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和他们当年的荒诞遭遇使我暗自寒心。

但是姑父大概见我孺子可教,不仅告诫我要坚持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鼓励我不断学习。一天,我谈起自己对古汉语的兴趣。姑父一听非常赞赏,顺手从书架上取下王力主编的全套《古代汉语》和《古代散文选》送给我,叫我认真学习,打好古汉语基础。在这几本书上,我的确下了一番工夫。然而,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里,一个知青要系统学习文学谈何容易!尤其想到自己最终还要回到农村去,感到前途十分渺茫。

1968年暑假,表兄叶含弘从柳州回重庆探亲,顺便来我家小住。看到我读书不得要领的情况,忍不住给了我一些指点。表兄说:"自学必须有道,否则事倍功半。学习文学需要读的书太多,你在大巴山里不可能找到这些书,所以不现实。"我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拉如是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中国的诸子百家等,知道表哥之言不虚。那么学数学怎么样,我问,因为朋友当中王宗笠鼓励我自学数学。表兄想

了一想，说："学数学也不现实，因为你在大巴山里没有好的老师。"我不免有点怅惘。表兄显然有备而来，他说："与其在文学上拾个一鳞半爪，倒还不如抓紧时间学一门外语。学习外语不需要很多书籍，一套教科书就奠定基础。而且一步一个脚印，步子将迈得比较坚实。再说，虽然现在外语是个冷门，将来说不定大有用场。"

表兄的点拨，使我茅塞顿开，决定自学英语。通过初中三年的学习，我已经具备了自学英语的能力。当时书店里没有英语教科书出售，我就去找自己初中的英语老师陈知勇，陈老师慷慨地把他在大学使用过的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的第一、二册借给我。另外，我又在父母的书架上找到了几本红卫兵抄家时漏掉的英文简易读物，包括《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三人出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等。找到学习资料后，我决定返回大巴山"面壁修行"。我意识到自己的行动是跟一个庞大的体系抗争，我不知道这抗争的结果，但是我年轻，我明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真理。

耕读之乐

这时达县地区的所有社办林、茶场都已经解散，大批的"老三届"新知青因为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表的《12 · 22最新指示》涌进了大巴山，我们这些1964、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也就跟新知青一样插队落户。我和1964年同一批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汪勃来到新店公社姚家坪的二大队二生产队落户，住在一个名叫挂鼓岩的小院里。院子里原来住着三家人：西厢住的是大队主任张志兴一家，他的妻子我们叫表婶；西北转角屋住着姚富云一家，我们跟着生产队里的人叫他"土哥儿"，叫他的妻子袁嫂嫂；东北转角屋住姚礼祥老伯和他的女儿一家，他的女儿我们叫木姐姐，他的上门女婿叫李成交，我们叫他老李。我们三个知青住在东厢的吊脚楼上，楼下是一间闲置的牛圈。我们跟院子里的乡亲相处得非常融洽。就在这面对青山、绿树环合的小院里，我开始了漫长的自学英语之路。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拿一本书，找个僻静的地方读半个小时的英语。白天在地里劳动，每次"歇稍"的时候，我就躲到一边，掏出书来默默念上几段，总是避免让人听见，以免招惹是非。晚上收工回家，轮到我煮饭就边煮饭边读书，以至经常把饭烧焦；不该我煮饭时，我就干脆在院子里或寝室里读书。

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私自定了一个规矩：一年的时间一半贡献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按照我们的劳动能力，只要劳动半年就能挣足自己全年的口粮，不会成为生产队的负担；自然，年终结算时不欠生产队的钱，也就不会招来农民的反感。虽然我不是全年出满工，但是我一旦出工，总是全力以赴，从不偷奸耍滑，而且特别喜欢在别人不喜欢出工的坏天气上坡劳动，因为这样的日子生产队收工较早。我和两个"插友"还专门争着干其他人不愿干的活，如打燕麦，干半天就能挣12个工分，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大的效益，

是种“名利双收”的勾当。那时我身强力壮，善于学习，通过几年劳动实践，已经谙熟生产技术，是生产队的全劳动力，干起农活来，不让生产队的任何一个“把式”，所以尽管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仍获得当地农民的交口称赞。

说来也奇怪，在茶场那个知青成堆的环境里，我的自学半途而废，而且终年辛苦，不得空闲，最后落于孤独和麻木；插队落户之后，我们生活在贫下中农当中，反而找到了学习的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然，在农村学习英语的确使乡亲们匪夷所思。同院老李的儿子万平和张主任的小儿子良平经常过来看我读书，看到我书上的洋文，非常好奇，问这问那。我可以给他们讲解一些书上的故事，却无法给他们解释我心里的秘密。我自学英语的事不胫而走，邻近的草坝公社二大队有一个回乡知青叫陈前炯，很有文才，曾叹息生不逢时，做长诗《苦荞之歌》抒发怀才不遇的慨叹。他从旁人口中听到我自学英语的事，说我学的是“屠龙之技”。我听到哑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教育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又如何敢说英语不是“屠龙之技”呢？对这样善意的嘲讽，我只是一笑置之，仍一如既往地自信“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之所以能够这样罔顾现实，是因为我做着一个梦。梦什么呢？梦的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是重庆七中高六七级的学生，长我一岁。她不仅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荣昌县插队落户。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鸿雁传书，互诉衷情。我对姑娘做出了许诺：耐心等着我，我会有成就、会脱颖而出的。爱情成为我学习的动力，支撑我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

人需要梦，因为梦总是比现实更美好。

初进万福

1971年6月，我离开新店，参工到达县地区万福铁厂。刚到万福铁厂时，我被分到灰石场当“特重体工”，我的工作包括抡12磅重的铁锤，将大块的石灰石砸成小块，然后装进平车，送到卷扬机上，等大卡车拉到高炉上去，工作很辛苦。

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工友住在公路边的工棚里，除了一张床，别无他物，床上挂起一副蚊帐，就算是自己的小小天地。每天下工之后，工友们有的打扑克牌、有的嬉笑打闹。工棚外面，运送矿石、焦炭、生铁的卡车鸣着喇叭过上过下，路上尘土飞扬。我就躲在自己的床上，专心阅读从家里带去的原版英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陶醉在那动人的故事里。忘情之时，似乎自己也成了故事里那位身世飘零而又终于如愿以偿的主人公。

那时，单位里经常有政治学习。我对政治已经非常厌倦，总是千方百计逃避。趁着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悄悄溜出会议室，独自一人来到附近的小河边，或者读书，或者对

着清澈的河水、青山、田舍上淡淡的炊烟和悠然自得的水牛驰骋想象……直到太阳落到山的后面，阴影渐渐覆盖布满卵石的河滩，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宿舍。

1972年，万福铁厂的子弟校办起了初中，缺少教师，尤其需要英语教师。学校领导听说我的英语不错，就通过厂宣传科把我从灰石场调到学校。当时厂里有不少分配去的大学毕业生，本来他们才是子弟校教师的最佳人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大学生都愿意留在机关科室，或者在工区当技术领导，谁愿意到子弟校当保姆？工厂领导只好找工人队伍里的知青来充数。

我出身于教育世家，对教书这个行业至少没有反感。我也知道，学校工作会让我脱离体力劳动，给我更多的读书机会，何乐而不为？于是欣然去学校报到，从此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其时我24岁。

在学校，我开始了更系统的自学。因为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知识欠缺，为不误人子弟，必须充实自己；另一方面，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自学得到学校领导的支持。当时主管教学的罗启孝老师对我特别关照，分给我一间九平方米的寝室。从此我下课后，回到寝室，把门一关，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学业有明显的长进，先后学完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

第二年暑假回家，我在重庆的外文书店里买了当时唯一的英语口语教材《林格风》及其唱片，又买了一台电唱机。有了它们，我下了课就经常关在寝室里听《林格风》。

《林格风》并不容易听懂，尤其是第二册以后，难度加大。我有些急躁，写信向父亲请教。父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1949年以前因为工作关系常跟洋人打交道，英文很棒。他来信这样指导我："《林格风英语教程》第三册，书上原名为'Advanced English Course'，应译为'高级英语教程'。我已试听了其中几张唱片。听起来真觉得很是'高级'。'高级'在于：1.每篇教材里的生词、成语不少，需要花工夫查字典，需要工夫去理解；2.唱片里的说话速度真快，快得异乎寻常；3.文章体裁特殊，多半属于新闻报道、实况广播之类。这类'高级'之处，待到你自己听到唱片时，便会自知。"父亲告诉我，之所以听起困难，是因为不熟悉教材的内容，只要熟悉教材的内容，听起来就不仅容易，而且有味了。我遵照父亲的指导，交替阅读课文和听唱片，果然奏效。一两年的工夫，就基本上攻克了《林格风》。

父母知道山区缺乏信息，还不时从重庆给我寄来英文的《北京周报》和《中国建设》。关于如何阅读《北京周报》，父亲在信上说："这个刊物看起来比较枯燥一些。但在当前自有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学会看它。不必每册每篇都看，我以为一册之内，只要看一、二篇文章或者一、二段消息报道就行了……为了节约时间，又能掌握阅读《北京周报》的能力，不妨在某一期上着重看看有关某一方面的文章，而在另一期上又着重看看另一方面的文章或消息报道……遇到《北京周报》上的文章或消息是在中文的报章杂志上发表过

的，我以为最好找到有关的中文报章杂志来对照着看……”关于《中国建设》，父亲说：“这种杂志看起来比较富于兴趣。你看《中国建设》，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看其中的一些文章……遇到富有意义的词句，还可以抄写抄写，用心记记。”父母送来的资料，不仅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而且为我搭起了自学英语的阶梯。

到万福铁厂子弟校不久，我结识了沙滩公社小学的李尚志老师。李兄是四川内江人，1965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文化大革命中却被糟蹋圣贤的政府分到沙滩小学教小学和“戴帽”初中的数学。李兄是那种大智若愚的人，他不仅有数学天才，而且爱好诗词歌赋，古诗写得很有章法。其中一首题为《自勉》的七律写道：“平生夙愿竟若何，为国争光志不磨；不作孤芳寻自赏，愿为滴水汇江河。攀登岂畏千般险，读书不辞万卷多；回首征途才一步，宜将剩勇奏新歌。”“文革”以前他从来没有下过象棋，分到沙滩完小之后才学下棋，但是他天分过人，棋艺日新月异，尤其善于下盲棋，不仅跟他的老师“张胡子”过招，而且能跟几个人同时对弈，很快成了沙滩象棋一霸。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很快跟李尚志结成知心朋友，除了在一起打乒乓球、下河游泳、合奏器乐（我拉手风琴，他吹笛子），还切磋自学英语的体会。

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跟李兄交往三年有余，收益可以车载斗量。

苦其心志

自学不但需要正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需要反面的刺激和鞭策。逆境使弱者沉沦，使强者奋发。在万福铁厂的七年多时间里，我屡遭挫折，所幸的是，这些挫折不但没有压垮我，反而成就了我。

1973年，父母来信说，高等院校要重新开门招生了，只要有单位推荐，任何人都可以报考。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不安。激动的是——我自修了好几年，学业有了明显长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求学的愿望。不安的是——报考需要单位推荐，我在万福铁厂无亲无故，没有臂膀靠山，找谁推荐？思忖再三，我鼓起勇气去找厂里主管宣传教育的魏副书记。

魏书记是万福铁厂的第二号人物，据说他原来是平昌县某乡镇的一个裁缝，土改时参加了革命，后来调到万福铁厂工作。因为他有小学文化程度，办事又四平八稳，所以官运亨通，坐上了万福这个所谓“达县地区的鞍钢”的第二把交椅。只要他同意推荐我，我就能够参加考试。

找到魏书记不是很容易，我等了几天，终于在离厂部不远的地方把他截住。我知道他很忙，就匆匆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要求。最后我战战兢兢地说：“魏书记，我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即使参加考试也多半不会被录取，但是我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检查自己

学习的机会。学成之后我一定会报答领导对我的培养。"

魏书记慢条斯理地说:"你的要求我知道了,让我们研究研究再作答复。"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

那年秋天,厂里所有主要干部的儿女,凡是符合年龄条件的,都上大学去了,包括魏书记的千金;而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的心情岂止是"失望"二字可以描述!也就是那一年,东北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知青在高考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为"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的工具。

常言说,福不双降,祸不单行。自从到万福铁厂工作之后,不顺心的事一个接着一个向我扑来。1973 年 7 月 12 日,河南省马振福公社中学学生张玉琴因为不愿意学英文,受到老师、学校批评,一时想不开,竟投河自杀。这一下,"四人帮"找到了进一步摧残中国教育的"钢鞭",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五号文件》。

1974 年 2 月,这个文件一下达,我们这些中学英语教师首当其冲。本来我们的困难就够多了,英语教科书充斥着知识垃圾——第一课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A Long,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三课是"The working class is the leading class"(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样乌七糟八的内容,莫说我一个初中毕业生,就是一个英语科班出身的教师也没有高招。一些顽皮的学生知道这个文件后,公开向我挑战,他们口口声声说:"不学 ABC,一样闹革命。"有的学生甚至当着我的面把英语书撕烂,以示挑衅。我那时血气方刚,愤怒到几乎要对学生动武的地步。反智主义的逆流不仅毒害了我的学生,而且剥夺了我仅存的一点职业自尊。

更糟糕的是,跟我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因为我陷在万源,几乎没有调回重庆工作的可能,经不住她父母的劝说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在同我的关系上开始退却。和我一起下乡的好朋友饶传辉当时已经参工回了重庆,十分了解我的处境,为了成全我和我的女朋友,他愿意跟我对调工作。我断然谢绝了这样的好意:我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能让朋友作出这样的牺牲! 1973 年,我跟女友的恋爱关系经过几度风吹雨打,终于结束了。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变故应该早有思想准备。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在就业、迁居方面没有自由,在终身大事上自然也就缺乏自主权,更何况我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实在狼狈。痛失所爱之后我很难过了一些日子,继而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和出路。想来想去,悟出一条道理,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学习成了我最大的安慰和生命的支持。也就是在那几年里,我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加快了自学的步伐。我虽然被剥夺了享受正规教育的权利,但是我有父母赐予的天赋,有逆境中铸就的倔强,我要跟那些上大学的幸运儿比赛,看谁更有知识,对社会更有贡献! 在完成了许国璋的《英语》一至四册的学习之后,我又一鼓作

气，攻克了俞大因编写的大学《英语》五、六册和徐燕谋编写的《英语》七、八册。其实，“文革”以前英语专业的本科生也很少有人学完这几本书的。

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困难重重。往往一段课文要反复读几十遍才能理解其含义。为了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我将每一课的课文翻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既是学习英语的过程，又是练习中文的过程，很有挑战性，也给我无穷的乐趣。我一向仰慕傅雷、朱生豪和戈宝权等翻译大师，梦想有朝一日像他们那样成为东西文化的桥梁。实在难于理解的地方，我就把问题集中起来，通过信件，向父亲请教。父亲爱子，总是有问必答。如果有他自己不懂或有疑问的内容，父亲就不辞辛苦，到四川外语学院或西南师范学院，向那里的英文教授请教。

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我还硬着头皮读完了几部英文小说，包括《基督山恩仇记》、《大卫・科波菲尔》和《月亮宝石》。同一时期，我还开始用英文跟父亲通信，借以锻炼自己英文的写作能力。父亲除了一丝不苟地回信之外，还将我的一些英文信带到西南师范学院，请我四姑父叶麐先生的挚友熊正伦教授评阅。据父亲说，熊教授对我的英文信评价甚高，说我达到了西师英文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水平。这样的褒奖当然极大地鼓舞了我。

父亲知道我奋斗得十分艰苦，不时在来信中勉励我。在一次来信中，他引用了祖父的一位学生、民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吴芳吉的《还黑石山作》的几句诗：“鹤山坪上春草长，龙门滩下风波响，一湾又一潭，幼年常来往。指点告诸儿，为我发悽怆。慎勿为悽怆，儿气须苍莽。当时叹辛苦，回首成真赏。但愿尔曹多坎坷，迨到壮年乐无两。”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诵读吴先生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仍然不免心潮涌起。

其实，在那几年里，我最偏爱含弘表哥介绍给我的清代词人张惠言的一首《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拾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越楚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岂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词人在这里表达的怀才不遇、进退两难的焦灼心情常常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我个人觉得它比李白的《行路难》更有韵味，更为深沉。但是当时我连张惠言“一笑醉颜酡”的本钱都没有，于是“乱我心者”就只有那“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的浩叹，它催迫我去焚膏继晷地学习，不敢懈怠。

乍暖还寒

1976年9月，毛泽东谢世。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在那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我常常站在子弟校的高坡上，俯视着厂部外排着长队到毛

泽东遗像前鞠躬的工人和那些如丧考妣的大小干部，心情十分复杂：我曾经那样崇拜过毛泽东，然而这个伟人竟然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几番浩劫。现在他虽然撒手人寰，但是在那些芸芸众生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尊神圣的偶像。而我心中的偶像早就破碎了，灰飞烟灭了，因为知识开启了我的思维，思维必然否定迷信。而且也只有打碎心中的偶像，我才可能获得心灵的解放。那时我就朦胧地意识到中国要变，因为物极必反；而且只要有变，我的境况就可能好转，因为否极泰来。

父亲在10月29日的来信中写道："当前形势一片大好。'消除四害，人心大快！'有关消息肯定万源早已遍传。我相信今后各方面会得逐渐好转。道理很简单：过去'四害'未除，他们总是利用权势，多方捣乱，企图别人不能安位，只好下台，从而他们好上台。如长期如此，各地安得不乱？工农业如何能抓好？人民群众又焉得不受其害？根据这个道理推想，我相信今后大势会日益好转。"

严冬已过，春寒料峭。在清理"帮派"的运动中，子弟校的校长黄某率其部众把我当成重点整治对象，因为我不识时务，没有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我刚进万福铁厂的时候，黄某仅仅是宣传科的办事员，跟我们这帮厂宣传队的知青比较接近，我们也亲切地称呼他老黄。1973年，他到学校当了党支部副书记，后来又小施权术，排挤走了一位姓冯的老校长，将学校的大权一手独揽。地位变了，讨好的人多了，他的架子也一天天大起来。形势所迫，连我在学校里的几位好朋友也改口称他"书记"，我生性木讷，就是改不了口，当着众人的面还是一口一个"老黄"地称呼他。他嘴上不说，心里不悦。以后，我因为不满他的"训政"和一些颐指气使的作风，当面顶撞了他，使他耿耿于怀，现在，借整顿"帮派"体系的机会，他想杀杀我的傲气。

黄某并不亲自出马，而是安排一些手下出面。手下之一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徐某。徐某跟我本无夙怨，但他有强烈的官瘾，所以唯命是从。黄某号令一下，他拿起鸡毛当令箭，赤膊上阵，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上纲上线，硬要说我在"文革"期间指使学生闹学潮，耸人听闻地给我戴上"四人帮"的追随者的帽子。另有个别想借此机会捞一把的人也跟着起哄，一唱一和，来势汹汹。这时我一无所有，无所牵挂，不仅没有避让，反而针锋相对，在会上跟他们据理力争。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真的想"横"了。

朋友们都为我的鲁莽捏一把汗。一天，同事骆协强设宴为我压惊，还请了另外几个好朋友作陪。席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苦口婆心地劝我：老弟，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正在风头上，何必跟那些人争一日之短长？敷衍认错算了，也给黄某一副梯子下台。

我一杯烧酒下肚，突然有了一股匹夫之勇，说："谢谢大家的好心。我实在无错可认。他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不向谎言和权势低头！'四人帮'都倒了，我不信他黄某就能一手遮天，天下就没有公道！我知青出身，十六岁就下乡，反革命也当过了，强迫劳动改

造的滋味也尝过了，谅他们奈何我不得！他们要整我，我也不会束手待毙，至少我可以说、可以写信、可以逃跑、可以申冤！”

后来，黄某一帮人没有抓住我的任何把柄，加之我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又是知青出身，对我的讨伐也就不了了之。

背水一战

1977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进了大巴山，对于我这个在大巴山上度过了13个春秋的人来说，这是时来运转的时候。

那年夏天，社会上纷纷传言说要恢复全国高考。父亲在9月17日的来信中说，重庆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包括我的两个弟弟和老朋友如邹克纯、张诗亚都在积极准备。他写道：“我同你妈妈、四爹（姑妈）都认为鹏儿投考大专院校，在各科知识上都要胜过许多人，希望自然要大一些。鹏儿是否已经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是否已在为此逐渐准备，届时报名，一试身手？”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当时的兴奋真是难以言喻！十三载辛苦，近十载寒窗，到底要盼到出头之日了！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高考的《招生简章》上说，考生的年龄一般不应超过25岁。只有“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刻苦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那年我29岁，已经超过了一般考生的年龄标准。那么，我是否能算以上所说的特殊情况呢？我问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当然不置可否。于是请父母在重庆打听报考的行情。父母回信说：“你已经教学高中英语五六年，自学了大学英语教材，还作了许多翻译工作，能够说你不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吗？……如果标准定得过高，就在全国范围内又有几个真正符合标准的人呢？目前说的只是报考大学，不是报考研究生，更不是考诺贝尔奖金嘛。”他们知道我学校的领导不支持我报考，又写道：“我们认为，你可以积极找出一些理由，争取领导支持，争取报考。自然，同时也不妨稍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准备。”

但是在报考这件事上，我不能有“两手准备”，必须破釜沉舟。由于政策日渐明朗，加之我据理力争，学校无法公开阻止我报考，我报了名，利用手边极其有限的材料进行准备。

考试前夕，父母在来信中根据当年高等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其他具体情况，建议我考虑报考以下学校：四川省内的三所大学是：1.四川师范学院；2.西南师范学院；3.四川大学。省外的三所是：1.杭州大学；2.南京大学；3.北京大学。这样的排序有点滑稽，看得出来，父母要么对填报志愿一无所知，要么对我的前景没有把握。但是，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1月29日，母亲在来信中鼓励我说：“战斗在最艰苦的时候，说明胜利也即将到来。再过十天就要举行考试了，这几天好好的鏖战过去吧。”她接着写道：“传闻今

年考题不会太难，政审也不至于太左，都因要照顾全面。但我们思想上总要有两种准备。万一考不上，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今后也还有进修的机会。"在信的末尾，母亲写下这样几句话："沉着勇敢地去迎接战斗吧。静待你胜利的佳音。我相信你是会考得很出色的。战酣，天寒，多保重。"

12月8日，我跟同厂的朋友卢铿结伴而行，到万源县城参加了高考。考试中我的水平发挥正常。英文考试更是超常发挥，因为试卷上最后一道题是"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介绍一下你自己）。看到这道题，我真是喜出望外，就借题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上千单词的英文散文。据参加地区阅卷的朋友说，我的考卷轰动了阅卷场，在阅卷的老师们手里传阅多时。我从此成了县上的"知名人士"。

考试过后，初选合格的考生又到县上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完全合格。此后，我又参加了英语考生的口试，口试在县上举行，考师是四川外语学院的章为民先生。同时参加口试的还有我求精中学的校友曹培丽。口试完毕，我自我感觉良好。章老师对我的英语口语很满意。他后来对我的一位在四川师范学院英语系教书的亲戚说，像邓鹏这样的学生只需要学一两年便可以在川外担任一些教学任务。但是，我对前景还是不敢过于乐观。一想到政审这道鬼门关，我就不寒而栗，并在家信中流露出自己的疑虑。父亲在1978年1月14日的来信中对我的升学前景表示出谨慎的乐观："据闻，邓副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是很高的，一般人还是有所畏惧，不敢轻易触犯。中央发出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必将贯彻执行，'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流毒终究会彻底肃清。假定仍不能按择优录取、重在个人表现的原则办事，则部分人由此而遭受挫折事小，中央指示不得认真贯彻，影响多出人才、早出人才计划的实现事大。这岂是部分有志青年一时考试得失的问题！"

1978年1月初，一些朋友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我一等再等，等到月底，等到2月初，没有任何音信。卢铿也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们惶惑极了，最后按捺不住，决定到县上去打听情况。我们俩结伴到县城上访，找不到任何门路，也得不到任何解释。当时有位我们认识的县革委干部已经得到录取通知书，志得意满。他知道我和卢铿担心落榜是因为政审不合格，就劝慰我们："不要东想西想了，我看你们之所以没有被录取，多半还是因为分数没上线。"我和卢铿听了他的分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在那段时间里，我心如乱麻，知道自己十有八九遭人暗算了，但又没有任何证据。难道我就命中注定在大巴山里陷一辈子不成？方寸一乱，我甚至想铤而走险，直接报考研究生，跟命运拼个鱼死网破。父母知道我的处境和心情，来信劝我不要灰心，再考一次。父亲在3月26日的来信中引用了一些古人和前辈的话："'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段话，可能出自'孔老二'，似又得首先批判。）'何以为业日

况不正是这样吗？言念及此，很感内疚。惟冀鹏儿今后，也许还能替我找出一些理由，为我原谅罢了。

鹏儿，"凡事如此，难可逆料。"到今天，回看一下，当初报考时所抱的一些看法，不是完全无益的。当初考的，不是姑且一试，即使考不上，对个人也丝毫无损吗？到今天，由于一些不明不白的原因——理由，自己尽了很大的努力，考试成绩也很不差，终未获得录取，纵然如此，对于个人又说得上什么损失呢？权当当初不曾参加考试，不可以吗？

鹏儿，我一时自己寻不出几句对你勉励的话，聊抄几段古人的话，用代慰勉之意。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段话，可能出自孔老二，似又得当先批判。）

"何以为乐日致？曰：不求人知求天知。何以为德广远？曰：不求天知只自知。"（见吴芳吉诗）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

影印件1：邓鹏的父亲邓燮纪1978年3月6日信

孜孜？不求人知止天知。何以为德夜迟迟？不求天知只自知。'（见吴芳吉诗）'古之君子，于修身治家，必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他接着写道："上面这些话，乍一看，仿佛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之思想，实际上绝非如此。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是终生奋斗不息的。他们胸襟广阔，从不为一时一事之得失所困倒。"他知道我准备重振旗鼓，参加当年 5 月举行的高考，就这样写道："知道你准备五月应试……诚属可喜。但我不能无虑者，一则时间如此紧迫，要看的书又如此繁多……再则考试一事，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假定结果失利，又将对鹏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以是在我的心里，不免顾虑重重。假定鹏儿真能够做到来信所说，通过考试，达到提高自己业务水平，那么是可以的；假定得失心重，没有遇到意外的充分思想准备，那就不可以。我是既支持，又不敢太支持。假定鹏儿能始终抱定这样的态度去应试，即：成功固足喜，失败决不忧。如能做到这样，我就很支持。如其不能，我就不免有些顾虑，不敢过分支持。"可见父亲在疼爱我的同时，对我的报考前途也缺乏信心，更担心我对可能的失败缺乏承受力。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是心烦意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七八年前的一件往事。那一年，我们生产队来了几个重庆的"闲散人口"，其中一个叫张正国，外号"张懒王"。老张原来以卖打药为生，没有老婆，倒有两个三五岁的儿子。他大概是道教的信徒，但信得有点狂妄，写的歪诗里有"天上神王张自然，地下懒王张正国"这样神经兮兮的句子。到底是老乡，他很快跟我们挂鼓岩的三个知青混熟了，经常来聊天。闲谈之中，自称会看相，说"先验"的东西自有奥妙。我们虽然不信，觉得好玩儿，也就请他给我们看看相。记得他看了我的相后一本正经地说："你虽然一生不能聚财，但是三十岁上会转运，而且会有两个孩子。"我们听了，着实乐了一阵，压根儿没有当真。

1978 年初，突然想起当年老张的话。掐指一算，我心里一亮：人们都说时来运转，1977 年我才 29 岁，时未来，当然运就不转，所以希望还在 1978 年！病急乱投医时，迷信也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重振旗鼓，又投入紧张的复习。这一次，子弟校的其他几个知青老师陈和威、刘长宜、袁仲生、张世学、骆协政也决定报考。有了朋友的参与，我的斗志更加旺盛。那时候，我不仅要教四个班的英语、每周 16 节课，而且是学校唯一拿着初中毕业文凭教高中毕业班的老师。

我们几个朋友互相鼓励、互相帮助，集思广益，形成一个友爱、团结、奋发向上的小集体。在这个集体里，陈和威和张世学系高六六级毕业，任教高中毕业班的数学；袁仲生系高六七届学生，任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骆协政和刘长宜系高六六级毕业生，任教高中的语文；我初六四级毕业，自学有年，任教高中的英语。有时在厂办"七二一大学"工作的朋友卢铿还来客串复习。可以说，我们这个集体的总体实力可能超过绝大多数考生群体。

遇到大家都解不出的难题,就找同事彭孝敏老师请教。老彭是四川万县人,老大学生,不仅为人厚道,而且功底深厚,我们给她的难题,她总是很快找出答案,让我们这帮人心悦诚服。

然而过了几个星期,好朋友刘长宜没有任何解释,突然打了退堂鼓。几个朋友对此好生疑惑,因为长宜兄高六六级毕业,知识全面,尤其有文学方面的天赋,其总体学业水平不在我们任何一人之下。我当时就怀疑是学校领导,特别是黄某给他下了什么"烂药"。但是我又不敢去劝说他,因为我怕他给我的解释会让我丧失希望:如果黄某告诉他的是我们上大学断定无门,我该如何应对?我心里知道,黄某对我不满,可能一手遮天,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他在我 1977 年的报考过程中做了手脚。但是如果我相信他的能力,那么我的任何努力就是徒劳,所以我只有拒绝相信他的法力,不计成败地往前闯,考了再说其他。

这时候,上大学对于一无所有的我,就像是那摩天的龙门,我就是那条一心想修成正果的鲤鱼,即使粉身碎骨,我也要跳啊!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别无他路可走,求学的道路我选定了,既然已经上了路,就在这条路上走到"黑"。

事实证明,长宜老兄当时的确上了黄某的圈套。有一天,黄某专门到长宜家,意味深长地说:"让邓鹏、陈和威他们去考好了,我看他们不会如愿以偿的。邓鹏、卢铿去年已经试过了,有什么戏?"可叹长宜兄生性忠厚,优柔寡断,居然听信了黄某的话,偃旗息鼓。但他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独自承担失望的重负。为此,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的友情。

高考前夕,母亲来信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在信中,她非常兴奋地谈到自己超负荷的工作和国家面临的大好形势:"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教的春天',干文教的人谁能静得下来呢?有时我也因过度的工作和学习而感到身体不适,感到老之已至,但一觉睡醒又忘记了一切,又照样走我的老路,认真地干起工作来了。三十年前,在可以选择其他许多种工作的情况下,我选上了教师这门手艺。我一直很满意这个手艺,别人骂什么'臭老九'的时候,我也没有丝毫自卑感……我内心常有一种自信和安慰,那就是我认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民教师是以终生淡泊而辛勤的劳动去换取桃李满天下,是以毕生的信念去争取祖国光明的前景。如今我已两鬓斑然才似乎看见了黎明的曙光。鹏儿,你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比我好,希你努力学习,争取深造,将来做个理想的人民教师,为下一代多多造福,为祖国的科技战线多多输送新兵。奥林匹克的火炬将由老一代传交在你的手里,希你高高擎起它,向胜利的明天奔去。"大概怕儿子疏忽大意,母亲还用红笔在这一段话下面画了波浪线。

为了保证自己在高速转动中的身体保持良好竞技状态,我总是在赶场天买些鸭蛋和

第　　页

花甲。现在形势既喜人，又逼人，以我花眼的岁月，再为祖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尽一点绵薄吧。"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在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教的春天"，干文教的人谁静得下来呢，比我将近大十岁的甘老师还不是又要重新上阵了？前时我也因过度的工作和学习而感到身体不适，感到老之已至，但一觉睡醒又忘记了一切，又照样走我的老路，认真地干起我的工作来了。我在卅年前，在我可以选定许多种工作的情况下，我终于选上了当教师这门手艺。我一直很留恋这个手艺。别人都看作"臭老九"的时候，我也没有丝毫自卑感，而今天教师的辛勤劳动受到了应有的尊重的时候，我既感到自豪，继而感到惭愧，惭愧我自己这些年来也多少受了"四人帮"的欺骗，放松了自修，感到自己远远落后于形势。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为人民服务这几年里，作一些补偿。

我内心常有一种自傲和安慰，那就是我认为一个正直无私的人民教师是以终生精力辛勤的劳动去换取桃李满天下，是以无比的信念去争取祖国光明的前景。而今我已两鬓斑白，却似乎看见了光明的前景。鹏儿，你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比我好，希你努力学习，争取深造，将来做个称职的人民教师，给下一代当个好导师，为祖国的科技战线多多输送新兵。四化建设的火炬将由老一代传交在你们手里，希你们高高举住向胜利的明天奔去。

影印件 2：邓鹏的母亲黎恩珞 1978 年 5 月 25 日信

猪油，每天中午自己煎两个鸭蛋改善伙食，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尽管焚膏继晷，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我利用父母寄来的复习资料，将各种知识分成条块，实行了周密的复习计划，凭着自己的判断，找到重点，强化记忆。我甚至还准备了几个模拟散文，以应付语文考试里可能出现的作文试题。

1978年的高考，是我向命运的最坚决的挑战。我没有退路，志在必夺，大巴山14年的苦熬能否结束，就看那两天半的拼搏。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各门考试发挥正常，而且越考越有信心，越考越斗志旺盛。

值得一提的是，考试那几天，我和朋友王思明住在县城里的一个知青朋友张方琦家里。张方琦在城关小学工作，是个好客、厚道的人，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居住条件，而且每天把饭菜准备好，让我和王思明能够吃好、休息好，自始至终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在1978年高考中的胜利，张兄应拔头功。他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

那一年，高考阅卷评分再不是暗箱操作，考试结果向考生公布。8月的一天，地区文教局打电话通知学校：我是全专区文科考生的第一名，好朋友陈和威是理科考生的第一名。得到这样的消息，我的激动简直无以言表。然而学校一个同事，竟然到厂领导那里去拨弄是非，说我目中无人，口出狂言，藐视领导。（这位同事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他很有才气，也有抱负，但内心十分阴暗。他曾因为自己在"文革"期间受到了挫折，怪罪于已经不在人世的父亲，大概也为了表示自己对革命政权的忠诚，他竟然率领自己的兄弟掘开父亲的坟墓，将亡父尸骨取出，用锄头将其砸得粉碎！但这一政治秀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毕业后他还是被发配到我们的"夹皮沟"里。）

一个"坐直升飞机"上去的厂领导徐某听了他的一面之词，马上到学校来专门开会，煞有介事地谈教师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和目无领导。还意味深长地威胁说"不要以为自己报考了大学就有什么了不起"等等。我知道这些话有来头，会后就去徐某办公室说明实情。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新贵先入为主，不仅不听我的解释，反而板着脸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我深知节骨眼上小不忍则乱大谋，强忍心中的轻蔑和怒火，没有跟他对抗。

这一年，因为我在高考中为万源县挣了面子，跟县文教局的何远明局长也成了熟人。何局长告诉我，1977年高考我本来完全合格，但是万福铁厂专门致函县文教局，要求他们扣下我（和卢铿）的材料。何局长抱歉地说："当时政策界限不明确，我们也不好违背你们厂领导的意见。今年不同，高考成绩公开，你们厂里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卡你了。"何局

长的一番话倒提醒了我一件事：1977年秋天，我请求学校领导同意我报考大学，副书记黄某当时就说，学校正缺教师，不支持教师报考大学。我将这一情况报告父母，意在让他们对不利结果有思想准备。母亲素来果断、机智，她马上来信表示：为了让领导放我上大学，她愿意到万源沙滩来工作半年，为万福铁厂子弟校培训几个英语教师。母亲的话我转告了学校领导，但是看来并没有让黄某回心转意。

第二次体检期间，我们一行人到县文教局填写入学志愿。我在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第一栏第一志愿写下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专业。填完之后，与陈和威一起回我们住宿的旅店。旅店在城外两三里外的公路边上。当时太阳已经偏西，我们一边走，一边展望未来。我虽然兴致很高，但是心里还是不十分踏实。我在大巴山里已经待了14年了，想离开大巴山的心情非常急切，越急切就越是患得患失。从县城出来两里地左右，和威兄对我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第一表第一志愿上选择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求最大的保险系数。"

听了好朋友的话，我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斗争：是啊，万一北大高攀不上，阴差阳错地落了榜，我的所有努力不是就全部付之东流？回到旅店，越想越不踏实，一想到跳不出万福铁厂，一辈子当黄某这样人的"下饭菜"，我就不寒而栗。左思右想一阵后，我赶回县文教局，不无犹豫地从何局长那里要回已经填写好的登记表，在一份新的登记表上将四川大学填写为第一志愿，医学院英语师资班为第二志愿。

显然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这决定我后半生事业的关键时刻，我胆怯了、动摇了；我追求保险，放弃可能的辉煌。根据当时的条件，这一决定可能是完全明智的，但二十多年来，无论我怎样企图安慰自己，这件事总像心头上的一条毛毛虫一样困扰着我。

否极泰来

1978年10月4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那天上午，天朗气清，金风送爽，大巴山的群峰在秋阳的照耀下，格外苍翠；一层层梯田里的稻谷黄灿灿的，好一个丰收的年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正在学校的操场上跟几个同事聊天，管信件的陈邦国老师走过来，他狡诡地对我眨眨眼，笑着说："邓鹏，你的信！"我接过他手中的牛皮纸信封一看，信来自四川医学院！我的手颤抖着撕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了盖有四川医学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啊，我终于成功了！苍天毕竟有眼！苦海毕竟有边！我情不自禁地跳起来，忘乎所以，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莫名其妙的老党支部书记和几次告刁状陷害我的那位同事！

几天后，我告别了"万福"，告别生活了14年的大巴山，踏上了继续求学的征途。路

过重庆时我还听说，省里复查高考试卷的结果表明：我是当年四川省高考的文科状元[①]。这条消息是否属实，当时对我已经无关紧要，我只知道，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常言道，好汉不提当年勇。从1978年考上大学至今，30年过去了。我个人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每当回想起当年的艰辛和奋斗，我都忍不住万分感慨。在美国大学的课堂上，好奇的学生偶尔会问起我的身世，我告诉他们：当年在大巴山里，我做梦都想不到今天会在美国的大学教授美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

作为当年的二等公民，我衷心希望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的年轻人都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报效国家的机会，希望他们不再遭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论为借口的政治歧视。

作为学者，我用"著作等身"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为的是不辜负自己那逝去的、曾经为梦所支撑的青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① 我当年的高考总分是448分。各科成绩分别是：语文86；政治86；历史90；地理91；英语95；数学83。因为我报考外语专业，所以按照当年政策英语考试成绩算入总分，数学不算，只作参考。对报考文科的考生，数学算进总分，外语分作参考。后来跟我父母相熟的一位重庆的中学教师告诉父母，1978年四川有关部门对部分考生的成绩进行复查，复查结果给我加了12分。这一消息没有证实，不足为凭。2007年，网上出现一篇介绍1977年以来历届高考状元的文章，文章显示，1978年四川的文科高考状元为高贤君（他当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出于尊重事实，我托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帮我查证落实。她辗转托人在北京大学学籍科的档案里查找到高先生的高考成绩。使我惊讶的是，高先生当年的高考总分居然也是448分。

反苦为乐的知青岁月

杨代欣

一

我 1964 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6 年因父亲身边无人调回成都，在山区一共待了 12 年。

当时如果我的所谓家庭出身稍微好一点点，肯定是不会上山下乡的，因为我要读书，我能读书，我有我的愿望。但是在那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那人性完全扭曲甚至泯灭，人根本不像人的年代，在那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这点起码的要求，都是无法实现的。

家庭成分是当时很大一批人身上的枷锁和头上的紧箍咒。

1964 年初中临近毕业，学校要我们填《学生登记表》，填写这样的表最使我抬不起头的就是家庭成分一栏，因为给我定的是地主家庭出身呀！不过，当我听到班主任向一兰老师的一番话，我的心豁然开朗，转忧为喜，万分激动。因为他再三强调："填你们自己的家庭出身，并不是依据自己父母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而是依据直接供养你的人的解放前三年的本人成分来填。"我的主要供养人是母亲杨汇川，她抚养了我 12 年，剩下的几年大部分都是国家负责，而我的父亲朱君友从来没有抚养过我们。所以我的家庭出身不应当是父亲的地主成分，而应当是母亲的职员成分。幼稚十分、少不更事的我就兴冲冲地向班主任汇报了此事。哪知道向老师当即就严肃地回答："派出所怎样划的就怎样填！"意思你就是地主家庭出身。至今，我都没有弄清楚这个家庭出身应怎样划。对这个答复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向老师出尔反尔？为什么必须要由管治安的公安局派出

所来划家庭出身？更有意思的是我下乡后得知：在当地，如果父母本人成分是富农或地主，那么其子女的本人成分也照样。可以想象在“文革”以前，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为错划或误划家庭出身而被摧残、被打击、被排挤啊！

临近初中毕业，班主任通知我到办公室看我能看到的评语，虽然好的写了一大版，我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评语中有“不敢正视自己的家庭”这样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评价。虽然我幼小的心灵非常沉重，但我还不可能知道它影响我一生的程度有多大，有多么可怕，有多么残酷无情。

不过，我并没有气馁，我从来就十分自信，依旧我行我素，疯狂地努力学习，填报的高中志愿是有名的成都七中。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居于全年级的前一二名，又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们同班同学都纷纷认为我填得好，没有问题，当然我也时时鼓励自己。但有时我心里也禁不住七上八下，会不会是我错了，运气会不会离我越来越远呢？

在“文革”前，有关成分和出身问题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这个政策是十分滑稽的，也就是说它既要计较成分，但是又可以不计较成分，并且还要看政治表现，而且这种政治表现在三者之间是处于“重在”的位置。这样的所谓政策，真是使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许许多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都上了当，以为重在表现就能抵消前两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毫不客气地说，这种政策完全是愚弄人的政治游戏。

我考高中落榜的原因就在于此。这都是以后才知道的。我的父亲是地主分子，也就是“戴帽地主”，又叫“现管”，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母亲是“极右分子”，而且投河自尽。难道你杨某人能靠这样的家庭背景考上高中？这种家庭出身是十足的“黑五类”。

需要补充的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母亲的问题获得平反（18 级干部获得 280 元抚恤金）；而我父亲就十分特别了，经过好几年的折腾，他不仅得以全面改错平反，而且还获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经多方调查核实，他是成都“十二桥惨案”中被敌人批准枪杀的 36 个人中的唯一幸存者。我也莫名其妙地从“狗崽子”变成了“革干子弟”。这结论是幸运的，父亲几十年的不白之冤洗刷了；这结论又是苦涩的，这几十年造成的两代人的灾难和痛苦又怎样填平？这结论也是发人深省的，如果我的父亲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平反改正，我的遭遇就是公正的吗？推而广之，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因此剥夺了正常的读书和工作的权利就是应该的吗？

导致我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生计问题。由于父亲是“戴帽地主”，1959 年又从砖瓦厂“压缩”回家，失掉了工作，无生活来源。我和弟弟同父亲就挤在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中，度日如年。冬天北风呼啸，人冷得直打颤；夏日暑热笼罩，蚊虫叮咬夜不能寝。忍饥挨饿，吃糠咽菜，遭人白眼，遭受欺辱歧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又是大地主家庭的少爷(解放前的我家被称为“朱财神”)。他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进步运动，40年代参加民盟。他不仅将家中的大量钱财支援革命运动，而且还将自己的公馆作为革命的联络点和掩护进步人士的重要场所……他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狱，受尽酷刑，在被执行枪决前的几小时被营救出狱。他在解放初也被判刑关监，原因是粮押问题。出狱后由于他无工作，在街道上接受管制。每当看到他低着头站在“四类分子”评审会上时，我的心里就十分难过。他尽量低着头语无伦次，他无数次地承认自己有罪(何罪之有？)，周围的居民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纷纷起来揭发他的“滔天罪行”，对他进行指责和无休止的凌辱、谩骂……我当时并不仇恨这些人，我只是反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父亲是善良的，从来遵纪守法，从不乱说乱动，况且还参加过革命，对革命也还有点贡献。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被人批斗，被人侮辱，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应该实事求是吗？

经过几十年“炼狱”的锻炼，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从1960年起，为了生活，我曾经陪着他上街卖过洋芋饼、煮玉米、红薯；卖过油条、空花糖；后来又协助他开过锅盔大饼店。但他根本做不好这些，他太“笨”。他已经被整得变态，随时随地都提防别人对他监视跟踪，随时随地都在恐惧中。他一见到居民干部就说话打抖，他一见到下段民警就六神无主，惊恐万分。1965年，他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去打扫厕所。由于工资极低(每月17元)，他开始了十多年在新南门饭馆“味之腴”协助捡碗筷，然后吃残汤剩饭的生活。父亲是我最尊重的人，他待人厚道，做人意志坚强，他忍辱负重，热爱生活。他给了我在艰苦环境下学习上进的信心和力量，给了我坚强、厚道、诚信的处世准则。父亲生前多次对我和弟弟说：“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们两兄弟！”多好的父亲啊，他使我们懂得要有登高远望的胸怀。虽然我下乡12年，他从来“不敢”来看我，但在他的鞭策督促下，我没有倒下去，而是站起来，父亲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在我12年的农村生活中，父亲经常来信，信中他要求我积极上进。下面所录的一封信，是他老人家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刚任民办教师时候写给我的：

代欣：

五日投邮给你的信当已收得？代云回来拔牙，昨天同老二一道转龙泉，给你带的红染料一包想已交给你了。煤因他们要走一半路，故不便带，等享志来时带给你了。叶烟若尚未分出，可全交老二带回，并告老二速回，因他们可能分工作了。旁的市区已开始登记学习，他爸爸叫他快回来。

今天，四川省与成都市开公判大会，全省判处死刑的共61名，成都市判死刑15名。我们去参加，受教育很大。一个人应该严守国家一切政策法令，这才是对的。法律是极严的，谁若违纪，一定会遭到严厉制裁。一个人也只有跟着

政策走，依着法律办事，才是正路。你应该仔细看看布告，理解政策，对于自己的教育是很大的……

你教书每天时间如何安排的？何时睡，何时起床？伙食何地吃，住处何地？教学效果如何？学生反映如何？自己体力吃得消否？领导上对你工作效果评价如何？希一并告我。钱若用完了，可来书告我。柜子尚未卖脱，若不急用，缓慢进行，可多卖几文，不知你能等到否？可告我。又，你这工作是再好莫有了，我也觉得满意，既合乎你身体条件，又与你好学习相合，边教边学对自己有大益处，你应该以全力来搞。只能搞好，对自己将来有大好处，更可能得到培养，再读书，深造。总之希你努力为之，切戒。不能缺课，寒暑假才能回城，决不能随便走了；对学生态度要和蔼，万万不能发态度；对女生不能随便了，要有男女界限；不能到学生家随便吃东西，请也不去好些……

理发不能去搞了。若社员与同事理可以，但不能要钱了，注意、注意。

君友

3月10日

这就是父亲，一个为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却长期蒙冤受尽煎熬的父亲给儿子的信。尽管他当时是专政对象，虽然他当时已蒙冤多年，居然没有半点怨言，更没有什么"刻骨仇恨"。

高中未考上，肯定是成分问题，我心中十分悲观。生活无着，连饭钱都没有，只有同弟弟一道，在生产组剥花生、剥核桃，一天下来能挣几角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当时想，难道这就是有意义的生活？难道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我的前途？

终于有一天接到学校的通知，通知中说落榜的同学应该"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现在共青团成都市委举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一期，可以报名参加。

我弟弟接到通知后万分激动，态度坚决，表示要听党的话，到广阔的天地中磨炼自己。但我就硬是激动不起来，因为我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些"狗崽子"根本不可能被国家重视，只有当垃圾扫到农村去。我这种想法并不是凭空乱想的，因为1964年上半年成都各街道办事处就大张旗鼓地动员过数千名社会青年到西昌，听说这批人文化程度许多比我还低。

弟弟很快就去报了名，并反过来对我进行动员。他说：只有同剥削阶级家庭决裂，划清界限，只有到农村去摸爬滚打，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报了名。然而过了几天，我实在想不通，撤回了自己的报名。

1964年的国庆，青训班参加了人民南路的游行，弟弟也在其中。他很骄傲地向我谈

起青训班的情况，不过我更注意到另一条消息，那就是青训班第一期学员有一部分要分到成都龙泉驿区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到龙泉，离家很近，机关农场种棉花就是农业工人，待遇肯定比农民高。于是，我就向弟弟提出，如果青训班能够分我到机关农场种棉花，我就马上参加。出乎我的意料，青训班的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到青训班是1964年10月中旬，在青训班待了一个多月。青训班是团市委办的，直接挂帅的是团市委刘秘书长，下面还有多位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鼓动人的青年干部。一期的学员95%以上是1964年毕业而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并且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有大资本家的子女，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当然也少不了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这批人成绩一般都很冒尖，思想激进，愿意同家庭决裂，严于律己，乐于助人，上进心极强，书生气十足。他们既不同于1964年上半年成都下乡的知青，也不同于1968年、1969年的“老三届”的知青，更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初那批到云南的支边青年。

1964年11月30日，在初冬的寒风中，我忧心忡忡地踏上了上山下乡去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的漫长的岁月。

农场位于成都东门茶店子，这里是成都到重庆的东大路的一个十分落后的小场镇，只有一条短短的“小街”，没有通电，一切都笼罩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刚刚过后的伤痕累累的氛围中。

当地的欢迎是热烈认真的，但是也是非常做作的，因为这是上级的安排，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看见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农民隔在供销社食堂围栏外，以十分饥馋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们聚餐吃饭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多么痛心难过。尽管我处境困难，但比起当地的农民来总还要好点吧！供销社的食堂数十盏装满煤油的亮油壶冒着浓浓的黑烟，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走进了伸手难见五指的黑暗之中，右拐左弯地来到公社的土坝上，观看了耐人寻味的电影《摩雅傣》。

电影完了，到处是“欢迎新社员”的声音，原来我不是到什么市委机关农场种棉花，而是被分配到生产队去，我这时恍然大悟，但覆水难收啊！

半夜，我们的知青七人小组就在大跃进时的伙食团（公共食堂）房屋基础上为我们改建的“知青点”上住下来。生产队长、副队长、会计、财务又同我们促膝谈心到凌晨。

天亮了，干劲十足的“新社员”立即投入到坡地改梯地的农业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中……

二

保存自己基本情况资料的习惯是我的母亲培养的，因为有她的身体力行，至今我的

有关学校读书的资料都较完整地保存着，下乡十多年的一些资料也还有一些。《一九六五年(乙巳年)历书》(附社员劳动手册)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册子又简称《工分本》，由记分员记载了我从1964年11月31日到1965年10月31日的劳动出勤及每日所得工分情况。

我的第一天出工是1964年11月31日(即下乡后的第二天)，评了6个工分，那年队上的工分值(以10分计)为0.23元，也就是说第一天出工我挣了人民币0.138元。

1964年12月我全月出工情况如下：

全月出工27天(实应26天)，共评得工分185.7分，

其中，

改地7天每天9.5分

担水4天每天12.6分不等

浇麦6天每天10分左右

锄草4天(统一评分，未记载)

栽树1天8分

担沙2天9.5分

学习2天9分左右

事假2天

开会1天

放假2天

全月工分为185.7分，即可挣人民币4.27元。这个收入是非常低的，一个月基本上是满出勤，而且是强劳力。当时城市里的二级工人，每月待遇为36元，学工待遇为18.5元。我们一个月的报酬只及二级工人的九分之一，学工的1/4不到，并且强度大大高出二级工和学工的劳动。

我当时17岁，幸好在城市里一直未脱离过劳动，担水、扫地、煮饭都要做。但那是在平地上，况且水桶要轻得多。一位乳臭未干、刚刚迈过童工年龄的城市准青年就担水上山，其强度是可以想象的。

抬石头、担挑子是龙泉驿山区劳动强度最大的农活之一。抬石头有两人抬、四人抬或八人抬，可以集体打拄换肩，进行休息，并且上坡机会少于下坡，四人抬以上都是走大路。担挑子是个人的劳动行为，全凭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忍耐力，茶店公社地处山区，属于深丘，一般从山下挑粪或者挑水到大半山腰，起码都是七八百米，也就是说有一里多路。如果说一里多路是平路还算好，但这是山路呀！山路弯弯曲曲，爬坡上坎，城市里人打空手走都要喘气，何况是担担子上坡。根本没有停放挑子的可能性，担着一百把斤的

水挑子或粪挑子硬是必须鼓足气力，一步一步往上撑。冬天寒风凛冽，担担子的人衣服几乎脱完，仍然汗流浃背；夏天，骄阳似火，汗迷糊了双眼，身上唯一的一条火窑裤也只为遮羞。由于剧烈的体力劳动，我食量大增。说来你可能不信，二三两一碗的米饭，一顿要吃七八碗。农民却非常羡慕我们"新社员"，因为我们吃的是精白米干饭。（头一年国家每月有粮食供应。）他们一年以杂粮为主，吃红苕汤、玉米糊、小麦糊等，吃白米干饭的机会很少。

记得我挑担子最远、最艰苦的一次就是同全队的男劳动力一起挑公粮送到山泉铺粮店去。我挑的是豌豆，有 130 斤，要走上坡路 15 里。挑了回来，精疲力竭，浑身骨头都似散了架，累不堪言。

我要感谢苍天，在那么小小的年纪担那样重的挑子我居然没有致残。担挑子锻炼了我的劳力，增强了我必须战胜困难的信念，练就了一身铁打的筋骨。当然也使我后来较早地发生了椎间盘突出症，还使我的饭量过大，使胃下垂扩张，为现在的身体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

下到茶店公社的一期青训班的几十名知识青年（当地称我们为"新社员"）大多思想激进，在校成绩优秀，但家庭背景都不好，有国民党将军的子女，也有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右派的子女和地主，伪军官的子女，都愿意同家庭分清界限，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我们的知青小组一共有七人，其中女的三人，男的四人，高中毕业的四人，初中毕业的三人。我们的组长老姜，为 1964 年毕业的四中高才生，曾获得 1964 年成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他因为父亲是伪军官而高考落榜。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如果有这样的成绩，不是上北大就是上清华，肯定会出国，而且极可能成为中国知名的专家。不过还算好，由于自强不息和发奋努力，他后来成为公社广播站的负责人，接着是龙泉驿区广播站的负责人，最后退休于成都广播电视局有线电视处处长任上。他是一位非常执著的江西共产主义大学迷，他做梦都想办共大，现在也是如此。

小组的七人头一两年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也就是完全的大锅饭。大家轮流值日煮早饭和晚饭，中午女生煮饭，男生种自留地……到了年底分红，我们小组最高的也只有 100 元左右，最低的只有几十元，所幸没有人倒补。由于第二年（1966 年）国家停止了对我们的生活补贴，我们就将分得的工分钱全部投入第二年每月的开支中。也就是说尽管我们都有"远大志向"，但都不能自己解决温饱，零用衣物及医药费用，仍然需要父母的支援。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们离开农村为止。

三

在下乡的头六年，我干过很多农活，当过果树管理员（龙泉山成为全国知名水蜜桃基

地有知青的一份功劳)、农田水利建设的爆破员(打装炸药的孔,并负责用火雷管或者电雷管引爆)、理发员、面房会计、生产队的保管员等多种职务。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小组就带去了全套理发工具,有推子、条剪、梳子和扫刷等。因为我在1958年上小学时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学的就是理发,所以在大家相互理发中我就得以鹤立鸡群。本生产队的社员也纷纷找我理发,我也乐得助人。山区交通闭塞,农民买点东西、理一次发都要跑很远的地方,十分不便。一位生产队干部提议,干脆让杨代欣逢场时在保管室门边摆一个小理发摊,说不定生意还不错,收的钱上缴生产队,给他记工分。又有人说,摆摊可以,他会用剃刀,不如让杨正建同他一道,一个用推剪,一个用刀子,岂不是更好。

我用毛笔写了"理发"两个大字,将它们贴在保管室大门的两边,再摆上简陋的桌椅,还有面盆什么的,山村的小小理发店就开张了。理发每人一角钱,大半天下来,可以有三四元的收入。我用推剪剪样式,杨正建负责修面和剃光头。杨正建有四十多岁,既是种庄稼的好把式,又是一位颇有资历的道士。他手很巧,嘴会说,龙泉山歌也唱得极好,能唱很多曲牌段子。他的夫人与他分居,因为感情不和。又听说,杨正建因为在鸣放时提出农业机械不好用的意见,受到过处分,不过没有戴右派的帽子,原因是他还不够资格。其实,杨正建是一位做事认真的农民,我从他手上学会了剃头的一整套技法。那个时候,大多数农民都舍不得花钱上街理发,而是在家里用土刀子剃头。土刀子就是铁匠师傅打出来的小刀,有一木柄,经专门的磨刀石粗磨细磨后,锋利无比,刀口呈黑线一根。磨刀很考究,要端平,来回要实在,最后朝自己身前收刀。

我们的理发收费低,服务周到,很快就在附近的生产队展开了包头的业务。所谓包头就是定时每月上门服务1—2次,以一年为单位收费。

理发尽管是小技术,但是它也帮了我的大忙,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兵荒马乱,武斗猖獗。为了吃饭,我开始在城里理发挣钱了。由于我的推剪技术、条剪技术都有长足进步,造型也有相当的感觉,收入也就大大增加。我的理发是两大方向,一是走医院,二是走宿舍区。如果生意好,一天下来就能挣10元左右。在宿舍区给小孩子理,收费1角;在医院给病人理,坐着理是2角,睡着理是3角。我还能给刚出生的婴儿剃胎毛。这是一项难度非常大、风险性相当高的技术,要求捉刀者胆大心细。产妇将婴儿抱在怀中哺乳,我就用刀子慢慢地操作,绝不能失误。若婴儿的胎垢多,还更麻烦。我不仅可以用土刀剃,也可以用洋刀(又称响刀)剃。如今能剃胎毛的师傅已经很少,即使能剃头的人在形象设计店也属凤毛麟角了。

我去的医院主要是川医,一、二、三医院和一工、二工。我曾经为即将离世的癌症病人剃头,让他安安稳稳地上路;我也曾经为武斗中的枪伤病人剃去阴毛(医院需要);我还

曾经为即将出院的病人理好了漂亮的运动头……也许是农村担挑子锻炼的原因，我的理发活动一般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即使满身汗湿透，也不觉得疲倦。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二医院住院部为一位沉默寡言的老者理发时，他欣赏我，并夸奖我手很轻，感觉好。他说他也是理发的，是下江人，在大光明理发店工作，他表示愿意收我当徒弟。虽然我当即感谢了他，但最后仍然没有拜他为师，因为我的志向还不至于此吧！不过，我感谢他，因为他直率地对我的理发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在生产队的面房，我也待了较长的时间，那是1970年。

面房实际上就是面对周围农民的生活需求，为他们制作挂面。一般是一斤麦子换六两五至七两干面，收五分钱加工费。每日我除了记账，有空就给师傅打下手。

不论我做什么，父亲都一直在关心着我。我保存的另一封父亲给我的信，可以看出他对我在面房工作以及理发还做不做的建议：

代欣：

上月十几号我曾经给你一信，信内并附寄有两元人民币，你是否收得？若未收得，你可去查询查询！若收得，你应马上复信来，我才好再由平信把钱寄你！

代云来有信，他有转变，并也打算要学画了。他也来信说，是你一再向他提起此事的缘故。先把他的来信寄你看看，我再酌情帮助他。我并要他在他回家前来与你交换意见，你务必要多多开导他如何着手去学，才与我们实际情况吻合，才能行得通。因他性夸大，他所想象的有些眼高手低。我们帮助一个人，应该明了他的个性，也要用他个性能接受得下去的方法与语言来制胜他，这才是聪明办法。我想你看了他的信后，是有妥善意见提供的。

你搞面房的事务必要分文不苟，账目天天要清，要以全副精力来搞好，这是与你前途有很大关系的。有机会也要注意进行落实教书的工作。快放暑假了，要随时留心，遇有机会就要向两个队长或公社的人说，争取很快的决定下来比较好些！

理发最好缓搞，若你要去时，也要先向队上说清楚，得了同意才去。

代云回来时，把皮纸二刀与装盐的胶袋交他带回。盐若未用，胶袋可缓。他的棉衣是否在你那里，也一并交他带回补。

君友

7月1日

父亲的信当然对我有所触动，我在面房中的确清清白白。按照父亲的建议，我曾多次主动向队上、向大队上、向管我们的公社干部陈书记反映，希望他们安排我教书。

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那是我回家后又到外地去了的一天，同生产队的农民朋友曾兴林受生产队的委托，到成都我家来送信。因我不在家，父亲又出去扫厕所了，于是他给我父亲留了一张条子：

朱同志，您好！

其他事情不谈，给你专谈一个事情，关于杨代欣现在是否在成都，听说他送深安到保（宝）兴去了。如果不在成都的话，就请您速写信去，回（或）是电报，叫他马上回来。因我队决定，公社也同意，在本大队公办小学教书。因走了一个公办教师，大队公社固定了杨代欣长期教书。据大队说只要争取好，可能要转为公办教师。现从十月十五号开校，叫他马上马上回来，千万不要把这机会错过了，完！

70 年 9 月 15 日

平桥生产队曾兴林抄

四

不久，我就被调到石经寺旁边的石经小学任教，这是茶店公社的一所“戴帽”学校。所谓戴帽学校就是学校除有 1 至 6 年级外，还开设有初中班。

我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按一般的要求，根本没有资格教书。由于山村缺乏师资，也就糊里糊涂地被推上了讲台。开始还十分惶恐，因为这所小学的教师大部分是成都师范或成都师专毕业的学生，起码是中专毕业。他们的待遇比我们高很多倍（他们一月 40 元左右的收入，一年近 500 元），我是记工分，一年有 3000 分左右，每 10 分 0.4 元，也就是一年有 120 元，除去公粮的扣款，年终分红也就只有几十元钱。不过，还算好，我每月还有上面给予的 4 元的补助。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教书自卑感就慢慢消失了，因为我觉得我还能胜任这个职业，而且比起那些公办教师，我这名社办教师也不差，或许在某些方面还要稍微高点。我深深地体会到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学习方法的必要性和学习方法的稳定性。我初中的底子铺得较牢实，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都在教学中直接获得了检验。在石经小学的六年里，我教授过从小学低年级到初中几乎所有的课程，包括音乐、体育和美术，只有英语例外，因为我初中是学的俄语。记得有一次学校派我到龙泉驿镇参加区文教局举办的教学研讨会，会上的主讲者是一位资深的老教师。他分析了小

学中年级的一篇诗歌《天安门赞歌》,认为它是史诗体。我当时就认为这位老师将它定错了,难道这只有五段的小诗就是史诗体吗?研讨会的休息时间,我毫不客气地向文教局的有关主管反映了我的看法,并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我在当民办教师前六年中的农村劳动锻炼没有白费。孟子就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这六年中我深入地接触了社会的底层,我体味到了农民的艰辛和淳朴,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我慢慢长大了,慢慢成熟了。尽管社会使人眼花缭乱,我始终尽力洁身自好,守诚信,待人宽厚。即使在那极其恶劣,甚至被一些人形容为比劳改犯还不如的知青环境下,我从来都未气馁。我暗暗发誓,我就不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可以说,从下乡上山开始,我的学习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我的学习是有方向、有目的、有量的积累。这也许就是我这个社办教师比公办教师在某些方面还要稍稍高点的原因吧。

六年的社办教师生涯令人难忘,从22岁到28岁,是每个人的黄金时期,是受教育和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阶段。虽然我的资格不够,但我始终认认真真,尽心尽力。我无悔自己的教育工作,但是我有悔我的青春。当教师的一些经历,似乎像昨天才发生。

印象最深的当数"黄帅事件"。1973年邓小平复出,他顺应民心,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方针。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北京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黄帅,在极左派喉舌报纸的大力宣传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的最典型人物。"黄帅事件"的波及面十分宽,十分深,即使我们这所山村小学也未能幸免。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教唆下,我们班上的学生也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我,说我杨老师上课太"凶",连黑板刷都摔坏了;说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严格是"师道尊严",是十足的"复辟"、"回潮"……在此种情况下,我十分灰心,这书怎样教呢?我更痛心和惋惜,这样天真无知的小孩,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政治的牺牲品。

除了在石经小学任教外,我也曾经在汤家河坝小学教过书。住仍然在石经小学,每天早上走下去,下午放了学吃了晚饭后又走回来,来回有十二三里。

学校设在汤家祠堂里面,有六个年级六个班,每个班就只有十个人左右。学生可以带弟弟妹妹来,边照顾弟妹边听讲。常常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的小孩就闹闹嚷嚷,有哭的,有笑的,有爬地的,有摔跤的,还有打架的,可以说人声鼎沸,教学难度很大。这还不说,学校的六个班只有三名教师,于是每位教师就需要同时教两个班,这称作复式班,也就是用所谓的复式教学法教学,这样就难上加难。因为每节课都要上两个班,如果每节课40分钟,那么一个班就只有20分钟。授课老师先将一个班的作业布置好,然后给另一个班上课,反过来才给布置作业的班上课。

三名社办教师中数我年龄小，那两位都姓汤，资格很老，但不敢恭维。其中一位个子稍矮的汤老师我至今都仍然清楚地记得，他教学生的小数，基本概念就错了。比如 0.169，他教学生读作零点一百六十九。我不好向他指出，因为他很自信，况且出身又好，我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吧。

在这所学校的周围住着十多家社员，他们很尊重我，经常为我提供方便，如送菜、送蛋等。学校有一间厨房，就我一个人使用，两位汤老师都回家吃饭。我中午、晚上都在这里自己煮饭吃。我还征得学校同意养了几只母鸡。说来怪有意思的，这几只母鸡是自己管理自己，我操心不多。厨房墙边有一个小洞，早上天刚亮，它们就出洞，晚上夜幕降临它们就进洞，白天就在学校周围觅食。放暑假了，我回家一个多月。开学回校时，"呀！"我喜出望外，这几只鸡在我的灶边灰坑里生了好几十个蛋，堆成小山似的。我分送给周围的农民，自己也用棉籽油煎着改善伙食。

我不愿意以太压抑、太悲愤的笔调来述说我的知青生活，毕竟大苦大难够深的了。我是以苦为乐，是反苦为乐。我在农村为什么能安然自得呢？也许跟我的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

上山下乡以前，我的生活就非常艰苦，幸好国家发给我助学金，有了一口饭吃。我初中三年根本无钱买书包，我的书包就是自己用崇宁线打的网兜。所以我在农村的生活虽然有时甚至不如劳改犯的待遇，但在经济上只是平移而不是跌落。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每年的生活费用大部分还是自己挣的，有时还能够分得几十元钱。

其次，在我上山下乡以前，对那种无休止的所谓抓阶级斗争、对因为受父亲的牵连而获得无端的屈辱和政治迫害，已经习以为常。"文革"初期我周围的"麻五类"知青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时，我的家庭已经摧毁得到底了，父亲已成了"死老虎"。当时我还冒死将家里的一些较重要的东西背回茶店，一直保存至今。我想反正我都到底了，比劳改犯也好不了多少，人到这种田地，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茶店的知青当中，接二连三发生自杀事件。许庭义，我十六中高六四级的同学自杀了。由于世间的重压、家庭的冷眼、前途渺茫、个人问题的苍白，她绝望了，喝下了一小瓶敌敌畏。当人们将她抬了十五六里路到茶店医院时，她已经撒手西去。

张秀实，一位嘴不饶人的白白净净的姑娘，十中高六四级毕业。由于环境的恶劣，她身不由已地嫁给了一位出身很好的公办教师。他们成了家，有了小孩，表面上生活美满。由于他的丈夫提升为茶店中心校的负责人，她因此也被选送到四川师范学院深造。然而因为我们至今不明的原因，她狠心地抛下她的幼子吊死在川师的厕所中……难道我对这些熟视无睹吗？不，不是这样，因为我早在上初中前就曾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但最后我避开了这一劫。我升华了，我骄傲地向天空大吼，我热爱生活，我不会去死，我要坚强地

活着。

五

在我上山下乡的12年中，除了父亲的谆谆告诫外，我的一切认识和行动都是靠学习来拯救着我，直至现今也是如此。我的学习不仅是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我的学习既有务虚的，也有务实的；在学习上我绝对不会见异思迁，看准了一个目标，就矢志不渝。

在农村要想自学，谈何容易。一天到晚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人筋疲力尽，食物的匮乏和营养不良使人面黄肌瘦……每天的空闲时间少得十分可怜，但这些都没有把我难住。我每天出工，都要带上一两本小册子，利用休息时间进行精读。《宋诗一百首》、《唐诗一百首》我都靠聚沙成塔的办法背过。文天祥的《正气歌》给我深刻的影响和教益，它使我懂得大自然中的山河日月无一不是"正气"的体现。做人应该有"正气"，有了"正气"才能为国效劳，才能在危难时刻毫不动摇，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懈斗争；有了"正气"才能承受任何磨难和痛苦。梅尧臣的《田家语》使我体味到农民苦难已经延续了几千年；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使我的认识论大大提高了一步；朱熹的《观书有感》对我的学习有直接的帮助……我也读马恩列斯毛著作，还要读孔孟的、诸子百家的、佛门的等等，书比较难找。1970年以后，成都孙中山铜像背面就有旧书市，几毛钱一本，我在那里淘了一些很不错的书。

自从教书以后，我的读书时间就比较多了。而且礼拜天都要放假。于是我每个礼拜六都要搭王大爷开的公共汽车回成都去，王大爷他免我的车费。按预定的时间（星期天下午）到韩文畦先生处听他讲课。韩先生是内江人，是我父亲的战友，1949年以前曾任西康省教育厅厅长、民主同盟成都主委，1949年后任川西行署农林厅副厅长，后任绵阳专区副专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是1963年就向他拜门，成为入室弟子。他合儒、释、道为一体，精于诸子百家，精研佛家的"唯识学"而汇通各派，又善于书法，主张篆隶结合，长于章草。他指出："作人至不易，必具学识气量，乃能卓立于天地之间。有学，乃能照微烛幽；有识，乃能审是辨非；有气，乃能任难安险；有量，乃能容物济世。吾虽老，仍不可不奋发，以求克终之美。"他还指出："少年中年晚年皆怕内心无聊。无聊乃最危险之诱因。一切犯礼干纪伤人害己之罪恶，皆可从此引逗而出，甚可畏也。"

韩先生的至理名言不少，非常启迪人的心灵。他给我讲文学、历史、哲学（包括佛学）、艺术、书法。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关押所释放回家，无生活来源，仍勤奋学习和著述。我每个星期都要向他问道，并经常为他带棉花根（他当成黄芪熬水喝）。他非常看重我，经常鼓励我，他的教诲使我受用终生。

我极其爱好书法。书法是我小学三年级时母亲给我发的蒙（现在看来发蒙的时间都

晚了),但随意性的练习居多。初中时我考进了成都市少年之家的书法组,指导教师是十三中的老教师陈道尊。1963年,韩文畦先生也给予书法的指导。从1961年开始,我的书法练习直到如今从未间断,已经有46年的时间。下乡的12年是我书法学习的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阶段,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下乡是背着背篼去的,除了被盖衣物外,就是书、字帖和笔墨。出工一天,背痛腰酸也不顾,吃了红苕汤,立刻就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下练起字来,旁若无人,全神贯注,直到深夜。我开始练习的内容主要是唐楷,后来又参照郑诵先编的《字体源流浅说》的隶书图版练习隶书,可谓盲人瞎马,画像了事。1966年初龙泉山掀起了厂社结合、学大寨改土的热潮,东郊十二信箱到我们生产队支援,大部分都是教师。腊月间,我同十二信箱的教师们一起写春联慰问贫下中农,我的隶书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对我鼓舞很大。后来我还给水库题字,写毛主席语录碑等。1970年我在四伯父朱炳先的带领下,拜著名书法家刘东父先生为师。东父先生同我家有亲戚关系,我叫他表爷爷。表爷爷是著名大学者刘咸炘先生的嫡传弟子,我称咸炘先生为舅祖爷(我祖父是咸炘先生的外侄)。刘咸炘先生不仅是大学者,而且字也写得非常好,可称为大书家,韩文畦先生都非常称道他。刘家的书法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使我眼界大开,书艺猛长。表爷爷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学问渊博,诲人不倦。他写字非常讲法度,真、草、篆、隶各体精通,小楷榜书无所不能。他慧眼独具,看了我一次小篆的练习,就认定我很有感觉。通过几次篆书练习的检查,他老人家十分满意,并慷慨地将《邓石如篆书十五种》借与我临习。他十分满意地告诫我:"你的篆书五年之后必有成就!"在东父老师的指导下,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进行行书、隶书、小篆三体并行练习,从不废止。到了星期日上午,我就上老师家接受检查指导。每次检查指导后,他就为我示范。我的书法艺术和书学理论研究有今天的水平,确实来之不易。我应该感谢表爷爷的指导,更应该感谢乡下恶劣环境的煎熬和锻炼。

1971年暑假期间,我又拜草堂寺的孙受昌师傅为师,学习刻字。刻字与书法是相通的,师傅又很有名,武侯祠的《岳飞出师表》就出自他之手。一个假期过后,我的刻字作品就获得表爷爷和徐无闻老师的赞许。后来我回城了,虽然理发不搞了,但刻字却挣了不少的工钱。如今我起码有一万多册藏书,这些藏书就是用刻字的工钱买的。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1966年至1969年),我们茶店的知青经常回成都。有一段时间武斗厉害,我们甚至不敢返回乡下。就在这个时候,我经初中同学郝传贤介绍,认识了成都市歌舞团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杨通六。他是重庆巴县人,为马思聪的高足,曾获得西南小提琴演奏比赛一等奖。由于他的档案上有胡风嫌疑分子的记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被打成牛鬼蛇神,靠边站。我经常去看他,并帮助他处理一些事务。后来,他们团里的职工要全部集中,排练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家中四五岁的两个小孩子无人看管,我

就主动承担了为他们管理家务、照看两个小孩的任务。家务不外乎就是做清洁、买菜、煮饭、洗衣服等，而照看小孩就任务重了，睡觉起床、拉屎拉尿、穿衣吃饭，什么都要管。更重要的是每天还要定时督导他们练琴……我也在杨通六老师的辅导下，从持弓持琴开始，一直进行到《开塞》、《克勒策尔》等小提琴练习曲的练习和一些学生协奏曲的演奏练习。他还指导我们拉了一些中外小品。他的练习非常严格和正规。他对音乐的敏感力、洞悉力令我惊讶无比。从此我对音乐的理解上了一个新台阶。回到乡下我依然每天坚持在煤油灯下进行书法和小提琴的练习，持之以恒，在苦难的生活中享受着艺术熏陶的乐趣。在石经小学任教时，我用小提琴教学生的音乐课。小提琴是一种极其难学的西方弦乐器。它的弓法、指法、音准都十分严格，只有能吃苦者，有恒心者才能获得收益。那时成都市京剧团在石经寺排练《海港》，邀请我加入他们的乐队参加排练，并且有可能被录用。有一天团里的军代表田复权找我谈话说："小杨，如果我们不录用你，那就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是的，我非常懂他话中的意思。不过龙泉驿区文化馆知道了我，他们将我吸收进文化馆的乐队，担任首席小提琴手，虽然是业余的，虽然同学校的教学工作偶尔有矛盾，但我非常满足，因为音乐拯救了我的灵魂。

在农村的十二年是漫长的，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挠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虽然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在"耳顺"之年，我仍然对上山下乡运动让近两千万知青，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

最后我不禁想到了我们这本书的书名——《无声的群落》，我想我们未必是无声的。朋友，你说对吗？

作者简介

杨代欣，又名朱欣，号西蜀农夫。1964 年毕业于成都十六中，于 1964 年 11 月 30 日上山下乡到成都龙泉驿区茶店公社石经大队十一队落户。现为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四川省社科联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民俗学会副秘书长。

倔强的树

邹克纯

大巴山满山遍野都是树，但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些在乱石缝中破土、在狭窄山沟里拼命长高的树。

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多舛。

"文革"前夕，在贯彻阶级路线、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尽管品学兼优，却因为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不得不面对中考、高考不予录取、不宜录取的残酷现实，无奈地选择了走向大巴山的上山下乡之路。从十几岁到三十来岁，我们背负着一种原罪的潜意识，十分虔诚地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深山老林里最原始落后的农业劳作，以至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后，许多人的知识、技能却跟不上社会的变迁，难以自拔地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以及我所看到的不少老知青朋友却又仍然能以超乎年龄的充沛精力，去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实践人生劳作，并不时让一些年轻人感到惊讶，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四十年前大巴山上那段艰难的知青生涯。

大巴山以及大巴山的经历由是成为了缠绕大巴山老知青一生的情结。它是一个梦魇，又是心灵中的一方净土，正如桑德伯格所说："人生就像一颗洋葱，你只能一层一层地把它剥开，尽管有时你还得为它流泪。"

劳苦，恐怕是知青的一笔独特的生活资源。

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大人们口中听到了"川北苦寒之地"这个说法，没想到，后来命运

真的把我抛到了那里。

在毛泽东时代，"消灭三大差别"是妇孺皆知的社会理想，城乡差别就是"三大差别"之一，而大巴山那地方则是放大一号的"差别"之地。

"瓜菜半年粮"只是道出了一般农村的穷困，对于大巴山的农民来说，这已经是比较宽裕的生活了。记忆中，我每年只能分得120斤毛谷子，加上红苕、洋芋，也就能勉强维持四个来月。有时饿慌了，就去寻山上野生的红子，大把大把地勒下来，往嘴里填。新米出来是知青们高兴的时候，我喜欢在门前的花椒树上掐几片嫩叶，捣碎了，和上盐，加在新米饭里吃，那种美味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极度的穷困，山里世代流传着一句让人心酸的俚语："碗米的恩人，斗米的仇人。"记得当年我曾读到一段恩格斯的话，大意是：在这里，食物的人世形态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食物的抽象概念。恩格斯的话给我的感触是很深的，我由此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

1969年社办茶场撤销插队后的一段日子尤其艰苦。我跟刘德齐、苟源基、罗世英插队到了万源县草坝公社三大队五小队。这里的地名叫张家坝，乡民有时也叫它"五指坝"，因为坝前有五条深沟夹峙的山梁，就像一只左手反扣在大地上。年老的乡民有些无奈地对我说，因为"手背"朝上，只有筋没有肉，所以张家坝的人穷。不幸的是，我们几个知青恰恰住在"无名指"与"小指"的交接处，这似乎就更不吉利了。

张家坝熟田熟土很少，和大巴山许许多多地方一样，至今沿袭着一种非常原始的生荒地耕作方法。人们先用刀口一尺来长、镶着木柄的弯刀将斜坡上的树木杂草砍倒，用木杈将树木杂草叉到山坡下，码成一条"长龙"；然后用宽口的"月亮锄"铲掉斜坡上一层土皮，将土皮覆盖在"长龙"上，点火烧成草木灰；最后在铲得光秃秃的斜坡上点包谷、种洋芋，草木灰就用作播种的底肥。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巴渝竹枝词中描写道："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一千三百多年前刘禹锡描绘的刀耕火种情景，居然像是当日大巴山的生动写照。其实，刀耕火种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荏苒的时光仿佛在穷乡僻壤的大巴山凝滞了。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必然超负荷地劳作，我们跟张家坝的农民一道，每天疲于奔命粗糙地拨弄着自己的土地。我们总是半夜就起身，夜深才回家；往往出工时在一道坡前，收工时却已翻越了好几座山坡了。极度的疲劳使我总想睡觉，哪怕是数九寒天，只要生产队长工间休息的哨声一响，我都可以立即倒在冻土地上睡过去。

这是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就在城市近郊农民为可怜的人均三分地犯愁的时

候，我们却在为广种薄收的人平三亩地苦恼。更可叹息的是，大巴山的农民从未想过、也无从想到怎样改变这种世代劳苦的命运，那里的农谚理直气壮地认为："毛干毛干吃饱饭，过细过细吃个屁！"

每天黎明前，生产队长来敲门催工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这时我最感劳累困倦。放松的身体仿佛每一处肌肉都在酸痛，蜷缩的十指怎么也伸不直，要握着农具干好一阵，才能重新伸缩自如。然而，我们仍然得日复一日地跟农民们一起摸爬滚打，因为这就是我们当时别无选择的唯一的生存方式。

记得有一天我们去垦荒，我跟往常一样，迷糊着眼提起"月亮锄"，揣了几个荞子馍馍，就跟着生产队长出了门。

每逢耕作生荒地，我们都愿意带荞子馍馍作中午的干粮，因为劳动量大，荞子馍馍最能持久。农谚就是这样说的："荞翻山，麦打坐，稀饭吃了当时饿。"然而，荞子馍馍也是最难吃的，记忆中它只有苦涩没有香味；而且颜色黑黢黢的，硬得像石头，一口咬下去上面还会留下几个牙齿印。

由于垦荒总是远离住所，饮水也成了大问题，遇到有山泉还好，有时就只有在野猪滚出的泥坑里喝几口积水。

这天的垦荒地点是在张家坝的山顶上，这里叫"五龙台"，山势险峻，还残留着过去白莲教的山寨。我们在寨前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劳动，斜坡下是九十度垂直的石壁。斜坡上的树木杂草在前一日已经砍倒并叉到了崖下，今天的任务就是铲土皮。

铲土皮有一项基本功就是脚跟要稳。开始还好，到后来土皮越积越多的时候，人就很容易滑倒。

我因为基本功不牢，这天又特别疲倦走神，在斜坡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滑倒了。松软的土皮带着我飞快地向下滑，一会儿就到了石壁陡立的崖边。我心里一阵慌乱，下意识地将锄头向外一甩，双手不停地乱抓。出乎意料地，我居然抓住了一截浅浅的树桩。

等农民们赶过来，把我从崖边拖上去的时候，我才壮着胆向下望了一眼：高高的崖下是一片乱石。

我没有再继续参加劳动。我的和尚领汗衫已经磨破了，胸膛上沾着青苔和血迹。意外的遇险让我联想到繁重的劳动、饥饿的肚子、贫乏的生活。我独自躺在山寨冰冷的长条石上，躺了好久好久，心境跟山寨一样荒凉……

由于几十年匆忙于稻粱之谋，我很少刻意地去回忆大巴山，这些记忆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了，但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种种苦难的经历竟然成为了我后半生宝贵的生活财



富。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的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

回想大巴山，我还总会想到大巴山的树。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然而铭刻在我心灵最深处的还是那些在恶劣环境下倔强生长的树，哪怕是乱石堆中也要拼命地扎根、发芽。记得在星火茶场的时候，住地旁边有一条名叫"浸水沟"的狭长山沟，沟里的许多树都长得瘦瘦高高的，因为狭窄而拥挤的空间、贫瘠的土壤使它们无法强壮起来，于是它们便拼命长高来努力赢得自己的一片蓝天与阳光。

我由此想到了柏林的一段对于生活的见解："生活有百分之十在于你如何塑造它，有百分之九十在于你如何对待它。"

这似乎有些无奈的味儿，但也或许恰恰表述了一种心灵的坚强和对命运的抗争！……不管怎么说，那些无声无息却绵绵不断的平凡的巴山树，肯定是大巴山老知青生命历程中的华彩乐章！



请见《冬夜的山路》后的作者简介。



这里的诗章记载着一个不甘沉沦的群体艰难而顽强的精神自救。



无声的群落

WUSHENG DE QUNLUO

卷八 青春之歌——老知青诗存

王百明诗选

新农民之歌

我真正的生命，是从这块土地上开始的……

一

我不曾为祖国横枪跃马，
也不曾挥汗在炼钢炉前。
但，我依然要骄傲地宣称：
我是我们阶级队伍中坚定的一员。

一脸微笑，
一身汗水，
长满了老茧的手啊，
像一对铁钳。
一手握笔，
一手挥镰，
稻穗、棉桃加上这深情的诗篇，
就是对于祖国的贡献。

像鹰儿搏击长空，
我们经风雨、见世面，
毛主席亲切的笑容啊，
即使在梦里，也常在我脑中浮现。

放心吧爸爸，
我会把双手磨炼好，
让它像您长满老茧的手一样，
力大无边，忠实可靠。

别流泪了，妈妈，
祖国会深深地感谢你，
为她培育了
一棵多么倔强的幼苗。

来啊，同学们，
快把行装背好，
十载同窗我们心心相印，
万里征战又把臂膀挽牢。
像是多么遥远的过去啊，
就在不久前，
我们展开幻想的翅膀，
在金色的梦境里盘旋升高。

有多少次，我们想要
穿上医生雪白的长袍；
有多少次，我们想要
去探索原子核的奥妙。

有多少次，我们用
一双火热的眼睛，
在繁星闪烁的天空，
画满稚气而又勇敢的问号。

有多少次，
我们想用自己的笔，
向诗人证明：
“我们可以写得更好。”

在我们的国家里，
理想是明天的现实。
党指引的每一条道路啊，
都能把你引得那样远、那样高。

井冈山上的星火，
化作了天安门前的礼花。
中南海上的明灯，
又点燃了我胸中的火把。

高高举起猎猎飘舞的红旗
迎着那喷红吐焰的朝霞。
征途漫漫几万里，
我们要奔向战斗的远方。

二

扶着犁、扬起鞭，
赶着我的小黄牛，
朝前走，
紧紧地追赶春天。

风像一把把刀，
雨像一支支箭，
一身湿透两腿泥，
汗珠雨珠连成串。

千行犁沟刻下了一个心愿，
祖国苍茫的土地啊，
我要将根深深地、深深地，
扎在你的心间。

牛粪担在肩，
心里蜜一样甜，
大把大把地向田里撒去，
为我们诗一般的生活打下晶亮的标点。

挥动锄头，
拨动每一个土团，
挖透这铁硬的土地啊，
用双手填平路上的坎坷艰险。

谁说脸朝黄土背朝天？
我们深深地、深深地懂得了，
哪里有挥汗如雨的劳动，
哪里就有真正的理想、闪光的生活。

一千次赞美啊，一万支歌，
唱不尽我们崭新的生活。
像阳光下奔腾不息的春水，
我们青春的声音是最美最美的歌。

我们顽强地战斗，
我们健康地成长。
不是儿女情长啊，
我们想念亲爱的故乡。

故乡的山啊故乡的水，
星光下想啊睡梦里念，
我们将一夜绵长的乡思，
化作千日无比的振奋。

乡间小路上，
我们的木叶和小鸟一起鸣响；
清清河水边，
笑语在桂花香里飘荡。

迎着晚风，
我们翩翩起舞，
沐着月光，
我们纵情歌唱。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书记交给我们两本书，
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
一本毒汁淋漓的“变天账”。

多少次夜深学毛选，
热血沸腾心里亮，
像颗颗闪光的金星，
主席的教导深深地嵌在我们心上。

三

我们的脚步，
像鼓点响在大地的胸膛；
我们的心脏，
紧连着时代的脉搏激荡。

我们的目光炯炯，
像熊熊燃烧的火焰；
我们的歌声豪迈，
像熔岩般喷出热量。

我们不渝的信念，
是一个光辉的思想，
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吧，
在革命的列车上闪亮。

拔一棵青松当彩笔，

裁一片白云作信笺，
蘸着太阳熊熊的火焰，
写下心中神圣的誓言。

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
我们的生命属于人民，
我们的理想——红旗手，
我们的专业——革命人。

我们播种的
是对事业无比坚定的信念，
我们收获的
是对祖国百倍增长的爱情。

革命的知识青年啊，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
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永远跟着毛主席，
永远革命永向前。

炊　烟

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
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
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
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

作者简介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仅有22岁。

陈徳诗选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听，那咚咚的鼓声，
正在呼唤青年们远征！
看，那一杆杆红旗，
正漫卷着青年们的激情！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儿子已经长大成人，
每一颗细胞都浸透党的恩情，
当祖国在召唤的时刻，
把儿子交给党是您应尽的本分。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你看那烈士塔顶的红星，
多像那烈士永恒的眼睛。
每夜我总觉得那炯炯的眼神啊
在质问我够不够一个后来人。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您看到美帝、苏修的暴行，
常常憎恶得咬牙痛恨。
今天为解放普天下受苦的人类，
党分配我当一名荷锄的士兵。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您看我苍白的脸色，
需要田野阳光雨露的滋润。
您看我纤弱的身体，
早应接受山野的风吹雨淋。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您看我塞满粉笔灰的肺叶，
需要山村新鲜的清晨。
我头脑里资产阶级的污点，
应由贫下中农来剔净。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快把那忧伤的眼泪，
化作欣喜激动的热泪盈盈。
我走出了家庭的温室，
迎来的天地多么广阔无垠。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快把过多的唠叨，
化作激励我前进的福音。
我虽失去了在您身边的庇护，
却获得了贫下中农的深情。
妈妈，让我走吧！

妈妈，快为我收拾行装，
带上红彤彤的四卷雄文。
听，远处又响起掀天的锣鼓，
让我跑步与这批青年同行。
妈妈，再见了！您的儿子走了……

尝 新

谷子成熟了，收割前这里习惯割一点分到每一家尝尝，叫尝新……

捧起雪白的米饭，
满屋弥漫着芳香，
不仅仅是平生吃自己种的粮，
还因为奋斗经历，这样难忘……

这本是一块无人开垦的冷浸地，
雨为它哭泣，风为它悲伤，
几个世纪做着暗淡的梦……
让山山水水都在把大寨追赶。

是支委会把这当成攻坚的阵地，
是老支书带领知青突击队一甩臂膀。
二月，我们在寒风中开沟垒堰排渍水，
三月，我们在春雨中填土堆肥整田忙。

队里尝新老支书指定要这里的谷，
捧起雪白的米饭我们心起波澜：
祖国啊！哪怕您交给我一块不毛之地，
我们也要将它建成地上天堂！

不要放弃追求

——为前途感到茫然的知青朋友而作

我曾以为我一无所有，充满烦忧，
不！
十几年的书我没有白读，
我有那无价的知识，知识归我所有！

烧木炭其实就是木柴的干馏，
看火色，留风口一下就干得得心应手。
老炭工赞叹，几十年经验我们一蹴而就。

养蜜蜂我们摒弃老办法杀鸡取卵，

钉蜂箱，用巢础，放养田野山沟，
用摇蜜机取蜜又使多少人驻足停留。

做油漆化学知识全都派上用场，
干性油、湿性油原理一清二楚，
一道道新工艺老漆工也连连点头。

学木工、做木模更如鱼得水，
读本“制图学”“铸工工艺”便胸有成竹，
复杂图纸难不倒，老技工也伸拇指头。

让他们去批判“知识就是力量”，
让他们去宣扬读书无用，
莫任年华似水流，
我拼命吸取知识，为生命之舟扬帆加油！

不必抱怨生活对我们过于悭吝，
不要面对艰难的日子叹息摇头，
占有知识吧，不要停止前进，放弃追求。

让心中充满阳光

——写在文化大革命许多知青家庭受冲击之时

我也曾经惆怅，
我也曾经忧伤。
当我知道，家庭又遭“冲击”，
我明白，我别无选择。
——只有挺起脊梁。

我已成人，宽阔的肩膀，
应把家庭的责任承当。
不能让母亲忧郁的眼睛再流泪。
于是我再也不感叹
——欢乐太短，忧郁太长。

生活不相信眼泪，
一双手必须有钢。
做生活的强者吧，
看双手满满的老茧
——枚枚闪光纪念章！

不相信世上有救世主，
不介意命运对我发难，
时间给每个人相同的分秒，
你能有硕果，我必有华章
——风吹雨打莫迷茫。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决不拘谨和猥琐。
朋友啊，不要让生活把头颅压低，
无论生活用什么方式回报
——让心中充满阳光！

影　子

有人把你比作胎记，
总与生命同行，

可胎记是生命的一部分，
在娘肚子里生成，
你却游离生命之外，
像幽灵，永远把生命跟踪。

只有烈日当顶，
你才有所收敛，
匍匐在人的脚跟，
其他时分，
总是扭曲人的灵魂。
难道还不够吗？
我每一个前行的脚印，
都让你给蒙上阴影；
我青春的色彩，
早被你抹得一干二净；
我的体形已被夸张，
我自己也无法辨认；
只有当我消融于黑暗，
你才停止行动。
难道这就是你的目的，
你的用心？

不，我不能，
我不摆脱你，
就是甘愿沉沦！
我是这样热爱光明！
我实在还年轻！

哭泣的夜

那晚，我们的三个知青战友被斗、被吊……

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夜晚，
天也昏昏，地也昏昏。
一场向“阶级敌人”宣战的斗争会，
对象竟是我们的战友——三位知青。

这是电影里敌人拷打战士的场景，
将人反绑着的手吊上祠堂屋檩。
看着那战友紧咬牙关痛苦的表情，
像撕裂我的肝胆，绞碎我的心！

被吊人脚趾还被往上拉动，
那几个人声嘶力竭，充满深仇大恨。
我们都是父母赋予的血肉之躯，
为什么他们几个人竟毫无人性？

我们有什么罪，有什么罪，
值得像对敌人一样用酷刑？
我们有什么错，有什么错，
为什么容不得我们把话讲明？

当晚，一张门板作担架，
我们送受伤战友上县城。
风在哭泣，水在呜咽，
月亮悲伤地躲进云层。
想唱首“抬头望见北斗星”，
却怎么也唱不出声……

受伤的战友嗫动着嘴唇，

有什么要说，我生死与共的亲人？

“今夜发生的事情，
请千万不要告诉我的母亲。
不要让她那早已失眠的眼睛，
再哭得通红通红……”

让爱情见鬼去吧！

已经感到了，感到青春期的躁动。
已经感到了，感到异性灼热的眼神。

为什么回避，那异性一个个的顾盼？！
为什么回避，那投桃报李的飞吻？！

是的，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有血有肉的躯体感情一点也不贫穷。

青春期年轻的心是那样难奈，
可清晰的理智将我整个生命支撑。

是靠母亲的津贴才勉强维持生活，
我有什么给你，我未来的爱人？

工价如此低，一年到头两手空空，
将来我用什么维系一个家庭？

何况青春的萌动还遇森严壁垒，
那斩不断、挥不走的“家庭出身”！

于是我们只好把青春的精力用劳动发泄，
无奈的选择从春到秋，从夏到冬……

让爱情见鬼去吧！
他不属于我们知青！

我要读书

希望的河床裸露出沙滩和卵石，
欢欣地迎来了铺天盖地的大雨。
顶着茫茫雨线赤膊走上禾坪，
用扫帚在水漫中写下大字：我要读书！

曾在大山中用我烧出的第一根木炭，
冒着雪花在削壁上写下：我要读书！
曾在寂寞的火塘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枯藤下意识地写下：我要读书！

我眷恋课堂，实在不愿诀别，
不愿诀别校园灯火如燃烧的火炬。
我渴望校园生活，篮球是我青春的形体，
我指着书山发誓征服，任道路回迂。

我要读书，我诅咒一个没有花开的花季，
我知道没有知识的滋润人生都将窒息。
听着卫星上天的消息我掩面哭泣，
为一代人求知的困惑我神疲志沮……

不！我坚信惆怅与迷茫一定有阳光穿透，
我坚信读书的企盼决不是个人的私欲。
轻蔑的微笑是给贻误生命者的礼物，
荒诞的吹嘘终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啊！青春逝去，我心中伤痕累累，
要读书的愿望终究化作泡影和委屈。

望柳枝转鹅黄我把春天托付，
愿春雨滋润每个心田，春阳永远和煦……

病　退

出于无奈，许多无病知青用各种手段制造病情，病退回城……

看着一个个知青打着被包回城，
我也不得不坐下来认真思索。
现实告诉我必须这么做，
不然眼前困境无法摆脱。

我曾经把自己比喻成一名战士，
戎马倥偬，岗位就是瑶山村落。
我曾经把自己当成革命接班人，
上山下乡，当时热情绝不是买卖交涉！

今天，年龄屈指三十岁，
自己不能自给，收获竟这样微薄。
今天，上山下乡十个年头，
远大的抱负无法改变眼前的困惑。

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
屋里零乱灰尘多，单身不嫌衣破，
做汤辣椒打泡椒，做菜缺油红烧锅。
静夜难眠，想说妈妈何必要生我。

好人装病人，良心又受审判，
这算什么？伦理早被倒错！
骗子捧为旗手，忠良诬为逆叛，
我们无私的心也得为日子盘算。

病退，这似乎背离了我人生准则，
啊，无奈的选择哽塞我心窝。
原谅我吧！
我是个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
无可奈何，奈何又如何……

作者简介

陈德，诗人，1964年湖南长沙初中毕业即下乡到湖南江永落户。除农活外，烧过木炭、养过蜂，又有十年木工生涯。1979年第一届电大机械专业毕业。

胡天仁诗选

长沙知青之歌

再见了,奔流的湘江水;
再见了,青翠的麓山峰。
啊！再见了,长沙,
你这山川秀丽的古城。
橘子洲头的明月啊,今何在?
爱晚亭畔的枫林啊,几时红?
纵使命运把我们抛向那偏远的山村,
我们长沙知识青年,
将永远把家乡怀念,
永远把长沙歌颂!

再见了,亲爱的母亲;
再见了,敬爱的长辈们。
啊！再见了,姑娘,
让我再看看你的眼睛。
不要用辛酸的泪水送征途,
要把那凄凉的离恨付东风。
纵使生活引我们来到那崎岖的小径,
我们长沙知识青年,
将永远把亲人呼唤,
永远把爱情歌颂!

抬起头,我亲爱的伙伴;
抬起头,我亲爱的弟兄;
抬起头,朋友,我们都是风波浪里人!
宁可将青春的热血洒荒野,
决不能庸庸碌碌度一生。
纵使时光使我们生命一年年消损,
我们长沙知识青年,
将永远把幸福向往,
永远把自由歌颂!

春　雨

春雨啊！
淅淅沥沥……

呵！
你是母亲的乳汁，
毫无例外地
哺育着整个的
大地！

呵！
你是天女的圣水，
无情地冲洗
人间的积垢污泥！

不！
你是造物者赐予世间的
新鲜血液！
——万物发展的
动力！

春雨啊！
淅淅沥沥……
欣欣向荣啊
自强不息！

映山红

……
如团团火焰，
似斑斑血痕，
你坚强的映山红呀！
可是春风燃点了你
不屈的生命？

抬起高贵的头——
向着那冷漠的天空，
苏醒的大地，
展示你青春的面容吧！
你骄傲的映山红呀！
多么光荣！
……

蚯　蚓

我鄙视你们！——
蠕动的泥浆！
你们只能蜷曲着身体，
永远也不能像一个正直人那样
挺起自己的胸膛！
你们安于黑暗，
你们害怕阳光，
只能终身躲藏在那些
阴湿腐臭的地方！
……
就是你们最引以为傲的工作！
——整天无目的地躁动
极限的意义：
只等于给大地搔了搔痒！

柳

柳！
你既然是春天的信使，
且认你作个朋友！
一支烟，
一杯酒，
来！
先请你把我爱人的消息
讲清楚！

柳丝！——
你的诗？
你的诗纵然写得极好，
又有谁知？
须知人们只是欣赏
你的风姿，
不是你的诗！
把你的诗兴收起吧！
把你的丝收起！
青枝绿叶
才是你的正经事！

柳丝长！
千条万缕
恰似九曲回肠！……
不要那么悲苦的离情，
不要那么凄凉的别绪，
——全没有用场！
好儿郎志在四方！
当排除万险千难，
把“大风”豪唱！

犁 田

我把这乌黑的泥土
认作洁白的纸张，
紧握犁手，
掺和着血汗，
来谱写自由的诗篇！
一步步
满怀着希望，
一行行
充实着理想！

那是什么时候啊！
幸福的歌声响彻了整个
诗一样的人间！

我把这有限的田块
看为无边的大地，
为了她的纯净
我决不吝惜力气！
杂草么？——
把它深深地埋起来！
……
顽石么？——
把它远远地扔出去！
……

正是春光明媚，
万万不可错过时机！

所有的计划
都应该有条有理！

所有的行动
都必须脚踏实地！
——这就是劳动者的
法律！

鹰之歌

阴沉沉的天空，
群鹰在搏斗着乌云。
风吹雨打，
电闪雷鸣……
他们勇敢地翱翔，
神色是多么镇定！
他们嘶叫着相互鼓舞：
“同志们，前进！
没有任何障碍
能阻挡我们
胜利的飞行！”

阴沉沉的天空，
群鹰在搏斗着乌云。
不能后退，
只能前进！
宁肯骄傲地战死，
决不苟且偷生！
他们嘶叫着相互支援：
“同志们，前进！
我们就是牺牲，
也是光荣！”

阴沉沉的天空，
群鹰在搏斗着乌云，
没有恐怖，
只有激奋！
一双双锐利的鹰眼
充满着信心！
他们嘶叫着相互祝贺：
“同志们，前进！
黑暗即将消逝，
自由、幸福、光明
就要来临！”
……
阴沉沉的天空，
群鹰在歌唱着光明！
——用信仰！
——用战斗！
——用生命！！

形　象

好比观望那
巍巍崇山——
我将她景仰！

好比幻想那
深深的海洋——

我将她向往！

好比流连那
圆圆的月亮——
我将她怀念！

好比赞颂那
红红的太阳——
我将她歌唱！

……

呵，维纳斯！
你在我心田
树起了一个
多么威严健美的形象！

眼　睛

她的眼睛，
就像天上的星星，
明亮晶莹——
给光辉予黑暗，
将希望带给仰望她的人。

她的眼睛，
就像天空的云彩，
妩媚骄矜——
仿佛心有留恋，
却又带着满身的荣耀远行。

她的眼睛，
就像天堂的仙境，
美丽神奇——
脉脉含情的一顾，
我的心呵再也不能平静！

凋谢的桃花

一夜风狂，
吹落了满树的桃花，
青春的娇女，
失去了昨日的韶华……

呵，凋谢的桃花！
你是饱含屈辱
恨恨地离去？
你是满怀希望
一去不还家？

呵，凋谢的桃花！
你是甘心化作这
平凡的泥土？
你是向往融于那
绚烂的流霞？

呵，凋谢的桃花！
这些死掉的可是
你的躯壳？
你的精魂早已随风
到天涯？！



呵呵，凋谢的桃花！
你飞天盖地的红雨
难道不是给无耻的强暴
以血的回答？！……

喜　鹊

喜鹊呀，
你“善良”的鸟！
休要吱吱喳喳地叫！
唯有那些糊涂虫，
才迷信你的喜报，
——他们渴求安慰，
希望吉祥……
而这一切
你又何以知晓？！

喜鹊呀，
你“如意”的鸟！
请不要忘形地胡闹！
——如果只是将幸福的幻影
蒙骗苦痛的心灵，
而不是彻底解救——
这勾当不仅卑鄙，
而且微不足道！

你……

你是那皎洁的月亮，
我是那平静的池塘……

月亮呵东游西荡，
池塘呵永远凝止在一个
地方。

每当你从云中向我顾盼，
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忧伤……

你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是高高地站在天上！
……

闪　电

在无边的黑暗里，
不可阻挡的
是勇猛的闪电！

在阴森的恐怖中，
纵声大笑的
是狂热的闪电！

在乌云的铁幕里，
旗帜鲜明的
是带血的闪电！

在残酷的搏斗中，
慷慨就义的

是燃烧着的闪电！
……

呵，你呀！

不灭的闪电！
这太阳的金光呀！
可是你千千万万的
英魂再现？！

理　想

呵，
爱人哟，
——我的理想！
你是怎样的令我神往？！
……
如果你只是迷人灵魂的
幻形，
我也愿永世不变的
苦苦地恋着你呀！
将你的美丽欣赏！
……
然而
只要有一点希望，
我将借着你圣洁的光
一步……一步……
走近你的身旁……

野　花

在清冽冽的小溪畔，
盛开着一朵红艳艳的花
……

啊！
不知名的鲜花，
你多么优雅——
高扬着羞怯的笑脸，
婷立在荒山之下！

听凭那凉风阵阵，
细雨斜斜，
慨然把所有的芬芳，
尽付流水到天涯！……
啊！
怒放的山花，
你多么焕发——
饱含着沸腾的热血，
飞溅着生命的火花！

把一切烂泥腐草
全不放在眼下！
欣欣向上呀，
好一幅青春的图画！

溪水流过时忘记了歌唱，
人们看见她就想起自己
宝贵的年华……

啊，
你浪漫的花，
怎么不说话？！

是小鸟将你错种在
这清凉的山间?
是你甘心逃离那
富豪的人家? ……

啊,
你娇丽的花,
为什么不回答?!
你在期待命运的奇迹!
你在等候那时髦的少年?
是不是他?

……
野花微微地转过头来,
她的眼睛在笑。
美的享受人所共有,
爱的力量不可动摇!
我的温馨不属于凡夫俗子,
它将在真理的灼炙下
升华!

……

在茫茫的思想的土壤里,
有朵永不凋谢的
绝色的鲜花!
……

作者简介

胡天仁,湖南长沙1964年下乡知青。已故。



谢几何诗选

谢几何

云影集(选)

一

我记得那么一刹那春光。

碧净的蓝天下,有一只白鹭在徜徉……

那是一个禾苗绿得鲜翠欲滴的季节。四周弥漫着春日野地里特有的芬芳,田间的小路被春风打扫得纤尘不染,远处的山丘上面布满了彩霞般的繁花绿叶,景色像仙境一样。

一只白鹭的倩影就在这仙境一样的野地上空翱翔,她盘旋着,寻觅着,期望着什么,终于轻盈地飘立在不远的地方。

我轻轻地惊叫一声,凝止住了,看着她雨雾一样洁白的柔羽在飘荡。

这是梦境般转瞬即逝的美景,美得令人惊叹,短促得使人恨恨……

我还记得另一刹那美的光芒。

也是在这样春风和煦的野外,她披着一肩垂柳的浓阴,亭亭玉立在村外的古道上,伸延着秀项把我盼望。我从她的后面向她走去,在她不知不觉的时候,偷窃了她思念我的形象。

我的忍不住的呼唤碰破了画面。她发出一声清脆的欢叫向我跑来,两条长辫一时间如此美妙地在她身后飞舞,似乎融入了春风的舞蹈的旋律,至今在我的心中清晰地震颤

和回旋。

她那被骄阳和青春染红的笑脸，是如此神奇的鲜艳；她美好的身躯是那样洋溢着生气的轻盈。情和景的交融在她身上焕发了异彩，错过了这一形象，够我懊悔千万载！

我的心发出了一声无声的惊叫，在美的享受中凝止住了。

感激您呵，春之女神！

感激您呵，神秘的生命！

思念您呵，青春，令人心醉心碎的青春年华！

1971 年于焦塘胡归屋场

二

当知道你噙着昏花的泪眼，离开我住过的茅舍时，啊，请相信吧，我一切都原谅。

我能够想象得出，你那孤独的身影，是怎样在一片寂寞的晚霞照耀下彳亍，就在那我们曾经无数次漫步的青石板路上。

请不要以为我那么轻易地就作出了不辞而别去流浪的决断，正因为我是如此的苦恼怎样才能较容易地割舍那缠绵的丝丝缕缕，我才下定了决心。就让我背上寡情的罪名吧，只要不使我再看见你娇小的身躯，那么可怜地背着感情的重负。

我当然知道，就青春而言，这次分别，就等于是永诀。谁说那么容易相忘呢？当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曾经把你我连在一起的时候，我怎能忘记在这块天空下被春风鼓动着飘游的白云呢？我怎能忘记那在清晨的阳光下盛开的鲜花？又怎能忘记那在花草上双飞的蝴蝶？更怎能忘记你那因欢愉而光艳照人的笑脸？

但是，当我把这些美好的情景，编织成一片幻景的云霓时，我理智的内心深处仍不能忘记，自己是这人世间许多被命运摆布的可怜的凡人之一。而且你也清楚，这一切真实的幻景毕竟不能成为生活的基础。所以，当你首先从梦幻中醒来，面对着我们爱情将要面临的命运而为之却步的时候，我不应该责怪你。

如果说，我因为自己没有完全清醒而恨过你的话，我要请求你的原谅。

当我得知你因我的离去而流下伤心的眼泪时，我似乎明白了生活中一个令人难堪的真理：这世界上哪有真正随心所欲的爱情呢？从前，我感激过你的欢笑，感激过你的温柔，现在，我深深地感激你伤心的眼泪！

最后，请记取我的赠言吧，愿意记住的，不妨记住，不愿记住的，赶快忘掉。只是不要过多地背着感情的重负，去完成你今后的生活旅程！

作于 1973 年

三

在夏天的一场暴雨骤然降临的时候,我们来不及跑到村里去,你我只好躲避在一堵山崖下。

谷地里的包谷秆儿被豆大的雨珠打得东倒西歪,狂风猛烈地摇撼着树木,山坡上一霎时水流遍地。

你身上薄薄的衣衫被雨水淋透了,紧贴着你青春的躯体,发丝打湿后零乱地粘在你秀美的颈项和脸庞周围,我发觉你从未被我看见的形象竟是如此美丽。

眼前一片电闪雷鸣,你早已不由自主地靠在我的身上,从一只紧握着我的手,我感到你微微地颤抖,竟愚蠢地问:你冷吗?

你异样地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含着一丝欣喜的恐惧摇了摇头。我更加愚蠢地问:你怕这雷电的轰响吗?你好像承认似的更紧地贴在我的身上。

当一个霹雳夹着震耳的轰鸣在我们头上滚过的时候,你把淋湿了的头惊慌地倒向我的胸前。这时,我已不自觉地克服了自己的愚蠢和怯懦,把你紧紧地拥在怀里。是的,当我确切地感到你在企求我的保护时,我难道能表示出丝毫的胆怯吗?

暴雨终于因用尽了它的气力而收敛肆虐变得细小,一丝轻松的情绪回到我们心中来。这时,你看着眼前的水花出了神,我奇异于你太像一个出浴的小山妖,忍不住抓住你的双臂把你拉向我的眼前,久久地凝视着你。

你嗔怪而逗人爱怜地一笑,我情不自禁猛地把你拉向我的怀里,你温顺地靠在我的胸上,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现在你离我已如此遥远,遥远得像隔着一个命运。但我总禁不住想向你诘问,你可还记得,还记得暴雨骤临时,我们躲避在山崖下的那一幕情景吗?

1973年于郴县焦塘

我的心曾是……

我的心曾是青翠的竹林清风拂煦,寂寞而安静。
你像小鸟一样飞来,
竹林啊,从此——
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我的心曾是荒凉的沙漠,
寸草不生,灼热而干渴,

你像流泉一样注入，
沙漠啊，从此——
充满生意，繁荣欢乐……

我的心曾是清澈的池塘，
花影扶疏，滟潋波光，
你像月亮一样出现，
池塘啊，从此——
竟日竟夜把月亮盼望……

我的心曾是湛蓝的海洋，
水天一色，波澜不惊，
你像暴风雨一样降临，
海洋啊，从此——
洪涛汹涌，再也不能平静！

作于1972年

七　律

桃源

诗酒飘零意不差，运交华盖漫咨嗟。
家国有难成孤客，城乡无碍看晚霞。
误入歧路餐秀色，迷进武陵醉桃花。
风尘陌路逢知己，一路浩歌又归家。

1975年于茶庵铺

作者简介

谢几何，男，1946年生于浙江淳安。1965年毕业于长沙市三中，同年9月插队落户到湖南郴县板桥公社红金大队焦塘生产队，1973年病退回城，后在一建筑公司谋生至退休。

朱四维诗选

长相思·初到凉山　五首

一

山从容，水从容，山水迎送常葱茏，随行有清风。
雨蒙蒙，雾蒙蒙，雨雾洗尽路边松，车行正匆匆。

二

想凉山，见凉山，农场不在邛海边，回望泪眼酸。
去凉山，到凉山，去到云雾缭绕间，荒坡建家园。

三

山悠悠，水悠悠，山水聚潆拖木沟，诧见土碉楼。
溪水流，河水流，溪河摔碎碧玉绸，击打乱石头。

四

云相连，峰相连，云峰相连去天边，几处见炊烟。
看亦鲜，听亦鲜，彝胞相遇多笑颜，虽不通语言。

五

风凉山，雨凉山，气水润色绿层岚，雨山虚实间。

月凉山，星凉山，碧空剪影黑峰峦，夜山似鬼幻。

作于1966年8—10月，整理补充于2005年10—11月

七　律

无题

山掩夕阳晚风清，群峰共托满天星。

云漫山庄灯火迷，月笼幽谷溪水清。

一对亲谈疑私语，三五群论赞清贫。

帐篷归后读《毛选》，立志红专干革命。

1966年9月16日

卜算子二首

凉山待开发

凉山待开发，新农来四方。

雄文四卷擎在手，革命豪气放。

登高放眼望，莫道土地荒。

指日穷山改面貌，松风吹麦浪。

1966年10月31日

题螺髻山照

谁忍怨青山，山我不相负，

总是春风吹难达，高寒可奈何。

螺髻超然好，偏惹东君妒，

千嶂深锁洪荒地，可为知青主。

1968年

七 绝

南风推雾

南风逆河推晓雾，漫入炊烟共一处。
涌动成云淹螺髻，茫茫不见凉山路。

凉山雪后吟

谁领凉山一段情，山风吹后雪初停。
银装才见山林秀，琼枝著花最可亲。

1966 年 12 月 26 日

农场轻音夜

屋漏轻风敲急雨，墙角斗虫奏琴胡。
庭树枝叶摇沙锤，溪潭跌水乱蛙鼓。

1968—1969 年

知青大胡

杆是大秤筒是鼓，知青大胡吟如虎。
宣传队里常伴奏，革命歌曲忠字舞。

注：知青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缺少低音乐器，知青胡义迁用大秤和腰鼓设计并制作成大胡，取得很好效果。吟：胡琴类乐器慢揉技法，速度慢，幅度大，声音犹如吟哦咏叹。知青大胡用吟奏法似虎低啸——声调沉闷低浑。

1968 年

听龚联宇小提琴奏《娜娜之歌》

月华如水雾若纱，灯火迷离知青家。
泥墙茅屋有龚崽，提琴弦上唱娜娜。

1969 年

五　绝

听陈佑彬二胡奏《江河水》

二胡弦泣忧，江河水在流。
今夜看螺髻，满山都是愁。

1969年

小知青大箐梁子获救

漫天飞雪凉山路，大箐梁子无躲处，
独行知青返农场，怎敌高山严冬苦。
饥寒疲乏步难挨，冻倒路边雪纷盖，
恶劣天气断人行，失去知觉雪渐埋。
过路军车正翻山，内有军官警惕看，
如何雪堆略似人，停车刨雪现衣衫。
深深冻昏唤不醒，军衣紧裹未暖身，
急送荞窝可救治，暴风雪中赶一程。
抢救及时解危情，满狗捡回一条命，
救命之恩永不忘，感谢亲人解放军。

1968年初，南充知青满吉祥（满狗）从西昌独自步行返场，在大箐梁子遇大风雪，冻昏，被雪掩埋遇过路军车，经解放军救往荞窝，生还。

烛影摇红

返凉山前答友人

避乱成都，家屋小，钱粮少，难留住。
"文攻武卫"遍中国，无奈返乡路。

行前莫问归处，深山里，泥墙茅庐。
孤灯暗影，愁管怨弦，凄凉低诉。

1967—1968年

孤坟

凉山冷月夜，流萤绕孤冢。
知妹何缢死，疏林鬼泣风。

注：农场年仅19岁的女知青罗桂英自缢而死，留下谜团和一孤坟。夜里每过孤坟，听到冷风从稀疏的矮松、青枫混杂林中传来，似冤魂哭、怨鬼诉。

追祭

罗案冤平心未平，孤坟无觅野草深。
旧处烧纸请魂取，黄泉莫贫如知青。
1999年2月17—20日知青专列回凉山

囚中

集训囚屋夜静悄，无字歌曲来如飘。
随声逐月飞蓉城，泪雨泼打九眼桥。
注：集训囚中听知妹唱电影《农奴》主题曲"无字歌"。

袁东旭磨镰刀

东旭溪边磨镰刀，敢携锋刃寒带霜。
革委主任莫太狂，知青拼命能虎啸。

注：清队运动中知青袁东旭好友多人悉数进集训队。因身处险境，携镰刀自卫，必要时可拼一死。

晨觅夜梦

晨觅夜梦奔哭处，叶叶滴露都是泪。
落地山花红零乱，恰似梦魂带血坠。

卷帘体诗一首

凉山中秋夜

庚戌中秋，秋中冷月望愁人歌染忧，卷帘体诗十字读成四句七言诗

秋中冷月望愁人，月望愁人歌染忧；
忧染歌人愁望月，人愁望月冷中秋。

注：本诗系作者在受迫害中所作。该诗作成10天后，即1970年9月25日作者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抓捕入狱，后判刑八年，于1979年7月6日获得平反。

作者简介

朱四维，成都市小天竺民办中学1965年高中毕业。成都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4期学员。

刘兆英诗选

早 炊

声声鸡啼唤起床，
明灯引路下厨房，
灶中松枝燃得旺，
映红姑娘的脸庞。

切菜淘米忙又忙，
寂静黎明歌声扬，
锅铲汤勺叮当响，
一股饭香飘林场。

姑娘捞柴上山梁，
鸟雀啁啾迎朝阳，
肩挑清水泛微波，
雄鸡催炊声悠长。

喜迎春

梅树枝头喜鹊叫，
一年一度春节到，
林场落户度新春，
载歌载舞多活跃。

菜籽花儿迎春笑，
喜鹊为我把喜报，
辛勤劳动在山区，
荒山秃岭把林造。

梅树枝头喜鹊跳，
层层山岭春光照，
我像树苗茁壮长，
站在农村最前哨。

恭贺亲人佳节好，
立下功绩再相告。

丰 收

夏日骄阳分外红，
传来捷报喜重重，
黄金铺就千重岭，
丰收乐融融。

振臂挥锄金浪涌，
金雀飞舞人群中，
肩挑两座金穗垛，
双脚撵疾风。

蜿蜒山路送粮队，
川流不息风帆动，
车马驰骋尘烟滚，
一片情意重。

丰收不忘共产党，
贫困山区不再穷，
公粮踊跃交国家，
丰收喜气浓。

挑粪之歌

营盘山路小羊肠，
山下山上歌声扬，
姑娘挑粪山上走，
好似娇燕在飞翔。

串串汗珠落土壤，
累在身上喜心房，
我问姑娘累不累，
姑娘摇头歌嘹亮。

恋

有一位知青姑娘，
站立在插队落户的山冈，
阵阵晚风
掀起她淡蓝色的衣裳。
天边的晚霞替她披上红装，
她手扶青松
凝望着遥远的故乡。

在山城的高等学府
有她往日的同窗，

命运之神
无情地把他们
分隔在天各一方。

她想捎信
欲借风儿的翅膀，
又想写诗
想留住夕阳的余光。

不，不必那样，
把千言万语深藏在心房。
让诗情画意
与她共梦同床。

泪眼望穿千重山峰，
知心人要地久天长，
让思念折磨她七年八载，
要爱情经受住雨雪风霜。
凭忠诚播下幸福的种子，
用心血把它浇灌滋养。

采树种的路上

绵延的青山啊，
重重起伏望不尽，
秀丽的营盘啊，
山峦之间绕白云。
一群快乐的年轻人
像山雀喳喳叫不停，
带上响槌油布
为采树种到山林。

翻一岭层层苍翠，
是青松和翠柏，
过一坡片片赤黄，
是枫树青栩林。
行至山前疑无路，
披荆斩棘又一村，
见山涧里座座农舍，
炊烟袅袅升，
望岩畔上树树弯了腰，
一片果树林，
幽径旁盛开的鲜花，
娇艳又芬芳。
吃够了红柿黄梨，
采朵山花插发鬓。

越过清溪入密林，
响槌撞树“咚”一声，
群山回鸣，
金雨纷纷，
瞬时采种好几斤。

我爱这迷人的景色，
我爱这如画的山村，
年轻人有理想的憧憬，
让荒山披上绿茵，
给坡地铺上黄金，
要桑林挂满银茧，
叫漫山遍野走牛群。

依靠贫农下中农，
立场坚定方向明。
永远跟着共产党，
革命到底不变心。

举起响槌不知累，
浑身上下添干劲。
看见树种望见林，
幸福生活万年春。

注:20 世纪 60 年代写于宣汉东南公社营盘林场

作者简介

刘兆英，女，重庆人。1964 年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宣汉县东南公社营盘林场务农。

刘炎诗选

七 律

失群孤雁何所期？四顾茫茫几星稀。
疾首常思平生贱，牵情唯恨一念痴。
披肝沥胆曾谁诉？吻颈剖心敢自知。
似水光阴飞逝去，奋发便是再生时。

1972年秋于开原下城子

水调歌头

春日几时有？举首问苍天。但见乌飞兔走，埋骨是何年？我欲遨游玉宇，只恐凡胎俗骨，陨落一身残。今生多薄命，路途举步艰。

熏风至，百花艳，齐争妍。不应有恨，好花能有几时鲜？人于忧患而生，志因安乐而渝，此事古亦然。留得青山在，自有客行船。

1974年春于开原镇北罗家沟

作者简介

刘炎，又名刘恩义，沈阳人。1965年沈阳二十九中高中毕业。当年到辽宁省开原县威堡公社靠山大队落户。1975年回到沈阳。

张诗亚诗选

告别嘉陵江

群星点缀了夜幕，
悄悄地铺在大地的身上。
歌声唤来了晚风，
轻轻地抚摸着嘉陵江。

绿色的江水静静地流，
倒映开两岸的万家灯火。
疲倦的白帆已默默的掩息，
在沿江停泊的万杆桅上。

良宵和晚风把人们吸引，
在大桥的铁栅栏和水银灯下。
嘉陵江用美的爱抚，
安慰他们困乏的躯体和灵魂。

在故乡这醉人的时辰，
夜色的晚礼服把嘉陵江装束。
我——您的一个被命运捉弄的儿子，
来告别您，送上一个痛苦的吻。

我怎能忘记啊，我的母亲！
您宽阔的胸怀是那么温柔，
用希望的乳汁把我哺乳，
可是，报答您的深恩我却无力……

明天，这个残酷的日子就要来临，
我就要离别您伴随颠沛，
去那遥远渺茫的地方，
去那人生坎坷的路上……

1969年8月8日凌晨2时作于渝

姑娘的歌
——听诗珂妹唱歌有感

晚霞把天边染红，
田野在暮色里沉默，
孤独的屋里孤独的我，
要唱一支欢乐的歌……

正当我黄金的青春，
为什么要在枯燥里生活，
无休止的琐事毫无意义，
单调的日子我多么难过。

我不愿生命这样耗磨，
我要青春充满快乐，
唱吧，我受压抑的心，
唱一曲欢乐的歌。

唱一曲欢乐的歌啊，
欢乐的歌里没有欢乐，
为什么啊为什么，
有的只是深深的寂寞？

秋天的晚风飕飕掠过，
无边的黑暗沉重的来临，
孤独的屋里孤独的我，
要唱一支欢乐的歌……

1969.11.4 晚
于荣昌凉平 7 大队 6 生产队

吹吧，风

吹吧，风！
你这自由的灵魂，
大自然的骄子，
力量的化身。

去吧，去那浩瀚长空
——驾驭万里青云；
去吧，去那广袤的大地
——呼啸大漠征尘。

去吧，去那无际的海洋，
——掀动巨浪万顷；
去吧，尽你的性子，
——怒吼，狂奔！

是的，你是野性，
丝毫不懂先礼后兵；
是的，检验一切，
挥动长臂只用强劲。

要继续存在吗？
拿出理由方许生存；
——像岩石，坚实紧密，
——像苍松，错节盘根。

否则，在毁灭的咆哮中，
那些浮云的光怪，气候的阴沉，
那些趋势的轻尘，枯朽的树木，
都将被无情地荡涤，化为齑粉。

面对你豪放无羁的意志，
无论是道德的囚禁，
无论是生活的赤贫，
都不再是万能的至尊。

你听，不留恋破房的人们，
向你欢呼，向你啸吟，
吹吧，风，
——你这自由的精神！
吹散那满天的乌云，
吹散那心里的阴沉，
让那勃发的生机，
让那明朗和清新
迈着狂飙的步伐。
尽快，尽快，来临。

1971 年 5 月 25 日，于荣昌凉平 7 大队 6 生产队一场暴雨中，狂风掀揭屋瓦，折断烟筒，我躺在漏雨透风的屋内小床上，无力无助，唯思绪纷飞，赋此以记。

夜——致我的朋友

一片和谐的虫鸣，
从田野上荡来；
一派皎洁的月光，
自夜空里洒下；
一阵爽心的清风，
打树梢上拂过；
一股莫名的忧思，
由心扉里飘出。

啊，神秘的夜色，
你不是俯瞰万物吗？
此时，你可曾看见，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朦胧的巴山，
也有一个我，一个我，
在你的爱抚下，
向着远方，把深情寄望。

1970 年 8 月 12 日

花　蕾

（初冬见门前菊花绽放有感寄友人）

怀着与生命过不去的心理，
露出要摧折一切的面目，
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吗？

那与我有何相干。
既然是花蕾，
花蕾含着春天。
开放了，不愿凋零的花蕾，
开放在这严酷的冬天。
她向人们宣布：
冬天里有春天。

1970年11月6日深夜于荣昌凉平

作者简介

请见《生日忆》后的作者简介。

大巴山诗话

吴　波

2005年10月7日，我们一群当年上山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盐井乡的重庆知青聚在一起，纪念大家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共同回忆起那长达14年的艰辛岁月，那与共和国命运一起沉浮的惨痛经历，那知青们因同病相怜而患难与共的真情厚谊，我们都禁不住欷歔不已。

回到家里，大巴山的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一幕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悲欢离合，像江潮一样汹涌澎湃，在脑海里翻腾，一股强烈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却又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经过几个辗转难眠的长夜，我想起当知青时曾有过以诗词为日记的习惯，于是翻箱倒柜，搜出幸存的残篇，以诗词的形式，把几个生活片断缀成一篇，作为对青春的纪念和对穷哥们的怀念。

一、菩萨蛮·第一次背米掉队有感

负重跋涉意气扬，背米如同上战场。气喘汗如雨，衣背湿如洗。斗志不可松，攀爬过陡峰。莫嫌路途长，人人盼口粮。

我下乡时不足17岁，在通江的艰苦条件下，过生活关、过劳动关自然是非常吃力的。初下乡时是集体生活，36个知青在一起，号称社办林场。第一年口粮由国家供应，但林场离买米的区场有四十多里路，来回九十里。通江的山路实在不能叫“路”，连挑担的条件都没有，山高路险，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悬崖，中间一线，放得下脚就叫“路”。所以一切东西，包括水、粪、日用品、农产品都靠人背。“巴山背二哥”天下闻名，就是这山水磨出来的。

第一次背米，可是苦了个够。背上的米越背越重，脚下的路越走越长，只走得全身发

软，气喘如牛，心虚胆寒。眼看太阳越落越低，心里慌得不知怎么好。但米还得背回去，否则第二天口粮断顿，大家要饿饭。正在跌跌撞撞，高一脚低一脚往回摸，场里老场员打火把来接，走出五里多路把我找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全身湿透，真不知还能活多久。

二、五言古诗·打猪草

偶尔受轻伤，重活不能派。大家照顾我，让我打猪草。一筐"贼耳根"，全成下饭菜。摟我芙娘叶，背回漆枝来。人人都肿胀，唯我独无害。大家都愤怒，一起把我怪。垂头又丧气，我也实无奈。从来干重活，内务不曾在。今后多学习，莫再把事坏。

这首诗记录了另一次劳动。由于年轻，个头大，也比较好学，我很快成了林场的主要劳力。耕田犁地，烧炭养蚕，砍山养银耳都是重活路。有一次受了"轻伤"，其实伤得不轻，我差不多躺了十天，但一直闲着心里过意不去，就要求做点轻松活路。大家就叫我打猪草。这倒反而难为我了，因为我从没干过这活，不知道什么是猪草。当时，当饲养员的谢云珍告诉我，"贼耳根"就可以。我一听，简单，一会儿就扯了满满一背篼"贼耳根"。谁想到林场缺蔬菜，常常靠白水盐巴汤下饭，一看到"贼耳根"，大家齐声欢呼，一拥而上，顷刻间就被抢光成了下饭菜。一个老大娘给我一株树叶，说叫"芙娘叶"，山上容易找，让我照着采。我走上山马上就看到一株大树，一比照，不错，就是"芙娘叶"，满满地采了一大背，兴高采烈往回赶。刚进院子，就骂声一片，"短命鬼，砍脑壳"暴风雨一般。原来"十个男儿九个粗"，我把生漆树叶采了回来。这两种树叶外形完全一样，只是"芙娘叶"背后有点淡红，我哪里分得清。结果造成一大群人包括院子里的本地人都皮肤过敏，脸肿得像猪，严重影响了个人形象。挨骂是天经地义的了，还害得几个靓丽女生从此落个"漆痱子"的外号。这"阶级仇、民族恨"就结深了。多次"检讨"，才算过关。

三、七律·答问

朝晖映满光明地，堂堂七尺男儿身。雷电几颠霓裳步，雨风长验革命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学得辩证法，历经霜雪有精神。

当年我们林场有个规定，知青们工余要排练节目到农民中去表演，常常要求男生去跳舞。我一向是个粗人，缺乏文艺细胞，叫我跳舞真是要了我的命，常常躲到炭山上躲跳舞。那时烧㭎炭可是个又脏又累又苦又险的活，要砍山、剁柴、装窑、点火，又要力气，又要技术。我是烧炭组的骨干，因为干力气活，饭量大，常饿得在山上吃野果、红籽充饥。青㭎柴里的老母虫又肥又大，常常成了我们充饥的佳肴。最苦的是点火，要在山上独自一人管一整夜，才能保证窑不熄火。一个人守着一堆篝火，面对群山，十里方圆无人烟，又寂寞也有些胆怯。可是"跳舞猛于鬼"，为了躲跳舞，我还是选择上山点火照窑，宁愿担

惊受怕。

有一次，这“鬼”就真的来了。我一个人待在深山老林，万山沉寂，抱着开山斧在火堆边打盹。忽然，一阵轻微的、凄厉的怪笑声飘过来。心头猛一激灵，睡意全消。这怪笑声慢慢朝我靠近，越来越清晰，哈……哈哈……顿时，毛发直立，全身僵直，两眼瞪大，牙齿叩响，双手紧握开山斧头，一副拼死一战的样子，心头不住默念“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正吓得半死，忽然“呼”的一声，一只怪鸟黑糊糊地落在我前面的树上，发出清清楚楚的怪笑声，在深夜里还引起微微的回音。原来是它！我顺手抓起一根柴火，猛力朝它打去。那怪鸟落荒而逃。此后我就再没怕过黑，没怕过走夜路。

四、浪淘沙·下队

临歧各西东，何事匆匆。无情棒喝鸥鹭中。无端惊起无端散，泪洒西风。患难情谊重，苦共甘同。生死相依意重重。分路分手难分心，味比酒浓。

1968年底，上级撤销社办林场，要求知青下到生产队，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临别时，场友们难分难舍。几年来，大家同病相怜，互相照顾，同袍同泽，有许多感人至深的回忆。一顿分家酒，人人泪淋淋，喝到嘴里也不知是酒是泪。

五、浣溪沙·黄家湾水库工地写景

闹醒山林唱喇叭，车水马龙起尘沙，“老头”挥汗打哈哈。背筅移山造平湖，歌牵盘山如牵牛，太阳脸红清泉流。

那时农村生产落后，靠天吃饭，水是农业的命脉。全大队组织起来，在碾子岩和黄家湾筑坝蓄水，全大队的水田就靠这两个塘。被抽调的人自带口粮，吃住在工地上。诗中的“老头”是个特殊人物，叫何文煜，红军时期赤北县苏维埃主席，当年跟张国涛、徐向前等人经常见面，常给红军筹钱、筹盐、筹鸦片，是个“胡胆大”。老人家这时已七十多岁，是个五保户，但身强力壮，跟年轻人一样，还在工地上来指挥拉碾子，喊号子。因为他年高望重，大家听他的，劳动号子他唱什么，大家跟着唱。老人家的号子也是贴近生活，雅俗共赏，乐得大家哈哈大笑。

水坝筑成，山塘蓄水，一湾清泉，大家似乎都看到来年的白米饭，辛勤劳动有了回报，当然高兴。谁知这年冬天，塘底发生渗漏，眼见大家的心血和希望白白流淌，急得不知怎样才好。“水是农业的命脉”，马上就要播谷育秧，山塘漏水把全大队人的心揪紧了。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赶到坝上开现场会。一筹莫展之际，有人说吴知青水性好，恐怕能解决问题。大队书记和“老头”一道来找我，大队李书记一向对知青很好，而“老头”更是把知青当成兄弟，说红军是毛主席缔造的，知青也是毛主席缔造的，所以他跟知青是兄弟，区

长、县长倒不在他眼里。他们来找我，我也没有多说，就跟他们来到坝上。一看也知道情况严重，赶快叫在坝上烧一堆大火，借来一条棉被，李书记又到处想法搞来一瓶酒。我潜到水库底去补漏。由于塘深，不容易到底，双手抱块石块，才沉到水底。由于水压力大，漏口急，泥根本堵不住，一抹上去就冲走了。只好上来，在身上捆些葛藤，藤上挂些破麻袋片、烂棉絮之类。先在漏口上垫上破布片，然后再抹泥，一点一点地堵。天寒地冻，水冷浸骨，实在受不了就浮上来披上棉被烤火。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自发地到坝上来助威。这样反复几十次，整整大半天，终于堵住了。大家群情激愤，非常高兴，几个平常要好的年轻人，半开玩笑喊"知青万岁"，"老头"抓着我一阵乱摇，连说："兄弟好，兄弟好。"

六、卜算子·两章

其一：空屋两大间，是我参禅处，佛陀救世苦心长，冥顽何时悟。尘海苦无舟，喜鸿焦不顾。天寂地寥谁为伴，门前老李树。

其二：茅败夜风吹，壁颓月光渡。秋冷衾薄人不寐，沸沸来蛙鼓。不耐嚣嚣急，聊数跬跬步。遥盼天鸡望寒星，无语倚霜树。

这两首诗中的生活场景，空屋两间，家徒四壁，茅败通风，壁残过月，都是真实写照。但却包含了一段千奇百怪的故事。

知青们为了争取招工返城，除了努力劳动，也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争取跟领导搞好关系。眼看一批一批的人调走，剩下的心急如焚。

有一次赶场，路过新知青小张家进去歇气喝水，见到他给家里的紧急求援信，信中说几次招工没有他，日困愁城寝食难安。就开玩笑把他的信连成一篇"解放体"《水调歌头·招工》：

招工几时有，消息真难求。不知招呀招的，中断啥理由。我想自己回去，又怕居民委员，骂我没户口。半夜想妈妈，叹气泪长流。且忍泪，暂宽心，漫发愁。那老知青，十年没调都还有。坚持埋头苦干，多找领导恳求，争取下回走。求求天上月，照到我家头。

古话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来是想调他一侃，劝他一下，谁知生出不少事来。他一见就说，正好有个机会：生产队要办宣传栏，他想写两首诗，挣点表现。可怜他字还认不到几个，哪里会写诗，就求我帮他个忙。过了几天，我写了几首（可能是八首）"解放体"的《忆江南》给他：

山区美，最美山泉水。甘甜因我曾洗汗，清澈似有水中天，染碧百畦田。

笑声扬，夜半催碾场。连枷如雷风车唱，儿童犇牛父老扬，成山丰收粮。

争大干，今年赛往年。两条铁龙闹长堤，几支人马战秧田，头顶无云天。

他们队里很高兴，就报了他到达县读书的名。谁知又出了竞争对手，有个当地干部

子弟，也想去读书，争这个名额。这家伙不会写文章，就学林立果到处搞“讲用”。又没什么水平，只好卖弄阶级感情。一上台就哭，边哭边说：“我们是吃的毛主席的饭，活的毛主席的人，毛主席就是我们亲爹娘。”然后哇哇大哭，台下人赶快鼓掌。许多知青抱不平，就去搅场。有一次那家伙正故技重演，边哭边卖弄“毛主席是亲爹娘论”时，台下一个知青用《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调子唱“毛主席不论怎么说，都是全国人民的老外婆”，台下哄堂大笑。那小子的后台恼羞成怒，拍桌子大叫：“毛主席怎么成了外婆，今天说得脱走得脱，说不出个所以然，叫民兵抓起来！”我看事情闹大了，就出来打圆场，对他说：“我把党来比母亲，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他明白我可能有机关，认真想了想，也没什么不对，只好说：“没有！”我又说：“党是毛主席缔造的，毛主席是党的母亲不对吗？”那时个人崇拜严重，毛主席怎么都是对的，他只好又说“对的”。我说：“母亲的母亲，按民间说法就是外婆嘛，你反对毛主席是外婆，要注意阶级立场哟。”这事才算了了。本来是想开个玩笑，化解矛盾，谁知种下怨恨。那时，我成了大队的农机手，因为技术好，机况好，年年评先进。正好遇上批唯生产力论，一批人就提出，在盐井乡，“吴知青就是唯生产，唯生产就是吴知青”。真是癞格宝跳到脚背上，不咬人却烦人，所以有了以上两首《卜算子》。

七、浣溪沙·高考复习琐忆

素淡常食损牙筋，烹鸡煮酒酬孤清，和寝醉卧入槐阴。秋霜侵醒庄周梦，皓月当空疑天明，低头失笑觉头晕。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许多知青都抓紧复习，报名参考。我当时因成分不好，已经在农村待了13个年头了，根本不相信大学有让考的，还不是层层推荐的吗？就在这一年，一个成分比我还糟的知青，似乎他父亲是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特务，他都去参加了高考，我才敢相信是真的。1978年正在抓紧复习，突然，公社的土广播叫了：“吴波、李世琪不必复习了，你们已超龄，没有报考资格。”李世琪因而中止了复习。我已听说，1977年一些地方领导阻挠知青报考受了处分，相信会有转机，所以没有中断。

可怜我初中毕业就下乡，许多数学符号见都没见过，只好硬记：把“△”叫“三尖角”；把“ζ”叫“草花”，把“Σ”叫“耙梳”，用“红苕+洋芋除以萝卜等于包谷”的方法记数学公式。日夜攻读，废寝忘食，倦了用水洗脸。真的是“一堆火熬到天亮，一盆水洗到发烫”，好容易完成高考，一个人杀鸡煮酒，痛喝了一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火灭后，被冷醒了，一看外面，天已大亮，但却静得出奇。心中疑惑，出门来看，只见皓月当空，原来还是深夜。心中暗笑自己喝多了，进屋去倒头就睡，直到日上三竿。

八、菩萨蛮·接入学通知书别诸父老

其一：秋风秋月秋露白，秋虫秋歌送秋客。秋叶凝秋霜，秋怀秋味长。秋意秋色早，秋颜秋鬓老。举酒酹秋空，秋云舒卷中。

其二：秋风爽神秋霜白，秋虫秋歌送秋客。临别依依情，桃花潭水深。扶持恩难忘，心存一捻香。明月长天共，乡心处处同。

这年10月，入学通知书来了。14年苦熬，终于有了回城的机会。而且当时社会尊重大学生，从公社到区上、县上满街都是大红喜报写着本县当年考取的人的名字，生产队更是每一家都设宴相送。又一次万感交集，情不自禁，写成两首《菩萨蛮·接入学通知书别诸父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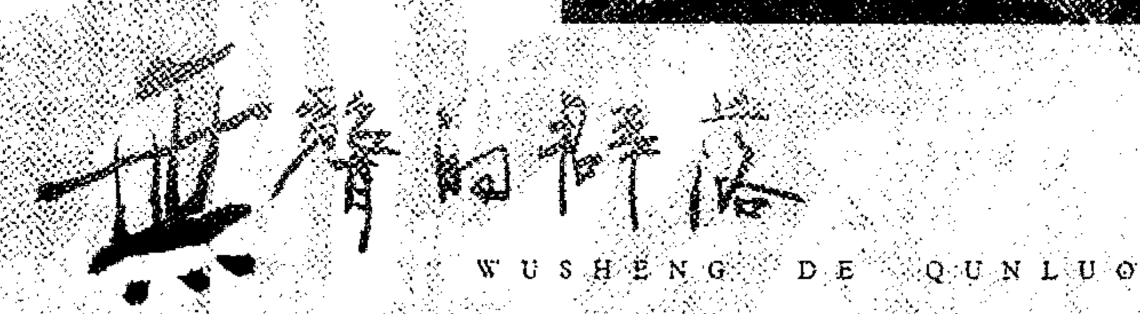
14年，做梦都想离开通江，真到了离开时，一草一木又那么牵人。毕竟人生最美好的14年，充满大起大落、刻骨铭心的十四年啊！多少人、多少事已经融到血液中去了！

以上的文字，不过是滚滚江流中泛起的几点白沫。14年的感受，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理得清、说得明的。谨把这段不成体统的文字，作为对那段生活的一次咀嚼，对当年穷哥们的一种谢意，对逝去的兄弟姐妹们的一点怀念，对给了我们许多艰辛却也相伴我们成长的山水的一份问候吧。

作者简介

吴波，重庆人。1964年下乡到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盐井公社。在大巴山区务农达14年之久。1978年通过高考回城。退休前任重庆七中校长。





附录

1964 年招生文件

1. 重庆市关于 1964 年中等学校的政治审查工作的通知

发文：公办(64)2275 号

教中招(64)9 号

1964 年中等学校招生的政治审查工作，根据省教育厅指示，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仍按 1963 年的规定执行；政审工作的作法，也仍照 1963 年的作法办理。为了认真严肃地做好这项工作，除了按照上述规定办理外，根据市委批转教育局、劳动局、团市委关于 1964 年中小学毕业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中"保证"招生和全民所有制单位吸收人员的政治质量的精神和往年的工作情况，特提出以下几点贯彻意见，请认真研究，切实执行。

一、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识不够，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使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各校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领导，把工作做好。

二、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农村应以土改时划定的成分为准；城市没有划过成分，如一时难以查寻清楚的，应该在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如实反映学生的家庭情况。有些学生生身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三、学校应通过组织认真核实学生家庭的政治历史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对于家

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中学党组织应将情况认真填入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附件四）内；高小毕业生由于没有政治审查表，小学党组织应认真将其家庭情况以及对学生的影响如何，填入高小毕业生登记表（附件五）备注栏内并加盖党支部印章。

四、学校进行政治审查工作，必须按照政审标准和规定执行，不得自定标准，不得自制表格，对于需要审查的学生，应该通过组织手续向公安部门、公社党组织或考生所属单位党组织进行了解，不能找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及其一般亲友谈话，或令其交待政治问题，不能直接发信到国外了解情况。

五、政审标准和作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长，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应届高小毕业生的审查工作，请区、县将初中录取新生的审查标准、高小毕业生登记表和作法，向所属小学党组织布置。学校一般不要向外索取学生直系亲属的政治材料，对于学生生身父母或养父母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而平时不了解的和不清楚的，才应通过调查，实事求是地将情况填入学生登记表备注栏内。

六、社会知识青年和其他考生，报考时应填写考生登记表（即学生情况登记表）。在区、县党委领导下，高中一级学校考生以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初中一级考生的招生单位为主，会同考生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人民公社党组织或工作单位党组织进行审查。

七、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各校必须加强领导，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首先，应认真组织好政审工作的班子，及时组织政治上可靠、品德好的党员干部和学校政审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审标准和政策，统一认识，提高政策水平。在对学生进行政治审查时，必须严格掌握政审标准和政策界限，并应根据初中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都不成年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对于未成年考生政治思想问题的审查，既要有阶级观点和政治警惕性，又要有政策观点，注意区别政治反动和思想认识落后，区别本人表现和直系亲属（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要写上）的问题，区别生活上的缺点和道德败坏问题，区别偶犯和一贯等问题，防止偏宽偏严的现象发生，保证政治审查工作和操行评语两项工作的质量。其次，政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经党支部委员会讨论或请示上级党委后决定。

八、此项工作限于正式报考截止之日前完成。

由于这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因此，各校必须在区、县委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才能保证完成任务。各区公安分局、县公安局应专门通知所属基层单位，积极配合区县招生分会办公室和学校搞好这项工作，在学校向公安派出所索取材料时，应尽可能给予方便。

附件：

(一)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二)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三)中学学生情况登记表；

(四)初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

(五)小学学生情况登记表。

重庆市教育局 （戳）

重庆市公安局(公章)

1964年6月12日

2. 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1962年修订。内部掌握,不公布)

1. 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不予录取。

2. 思想反动而屡教不改的考生,一律不得录取(系1963年增加)。

3. 品质十分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不予录取。

4. 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下同),或因反革命罪行现在被我判刑、管制、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对我有抵触不满情绪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 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本人没有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没有进步表现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的,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3. 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一)中等专业学校的机密、绝密专业和其他国防单位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应该按照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中等专业学校的一般专业(包括师范),按照1962年高等学校一般专业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执行。

(二)高级中学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

1. 本人参加反革命组织或有现行反革命活动、查有实据的,不予录取。

2. 本人思想反动,有严重的或多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3. 本人品质十分恶劣而又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4. 直系亲属因反革命罪行被我处死(包括因罪恶严重畏罪自杀的)、本人对我抵触不

满有言行可查的,不予录取。但本人确已划清政治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

5.直系亲属在资本主义国家、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经过查明,确实是从事反革命活动、与本人关系密切而本人政治上又表现不好的,不予录取;但直系亲属是从事一般社会职业,或者职业性质虽不明,但没有发现政治上有可疑情节的,可以录取。

(三)初级中学录取新生,应主要看本人的表现,对于品质极其恶劣、屡教不改的,不予录取。

致刘定强

邓鹏

定强兄:

送去我从《华夏文摘》下载的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请你把它打印出来,供参与《巴山知青丛书》的朋友欣赏。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很有趣,有些地方代表了这些年国内外知青问题研究的主流。

请特别注意作者对知青一代的界定。这一界定将我们130万"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排除在"知青一代"之外,因为我们的经验跟新知青相差悬远。这样划分固然不无道理,但它使我自然想到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知青研究对老知青以及"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非常肤浅,而且表现出部分新知青(学者和文化精英)的傲慢。轻描淡写地说老知青是考不上大学或高中的"社会青年"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64、1965年落榜的高、初中毕业生当中,有相当部分人乃是各个学校成绩最拔尖、表现最好、工作能力最强的学生,是班长、学习委员,团支部书记、委员,学生会主席、干事等等。他们之所以落榜,完全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是因为一个荒悖不公的社会剥夺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他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因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家长当时都没有话语权。

落榜之后我们面临着人生最困难的选择:是自愿下乡还是滞留在城市当"社会青年"?由于多年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这些人接受了从保尔·柯察金到雷锋和邢燕子、董加耕的一系列榜样,接受了舍己为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当中很多人能一字不漏地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段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向往崇高,仰

慕英雄，期盼轰轰烈烈的献身机会。我们甚至接受了自己由于父母的“过失”而低人一等的荒唐逻辑，怀着一种朦胧的原罪感。这样，下乡也成了我们“脱胎换骨”、参加革命的朝圣之路。由于真诚和单纯，我们当中一些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把弟妹都带到农村，为的就是通过自己的献身来实现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我记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1964年刊载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一首关于董加耕的长诗。那首诗不仅歌颂了一个聪明而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而且浪漫地美化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国内低迷的经济状态和几乎不存在的就业机会。对我们这帮心高气傲、不耻于在城市吃闲饭，甚至不齿于干售货员、售票员这样的行当的人，农村成为一了百了的归宿。根据“文革”当中我们在北京的中央安办看到的材料，特别是周恩来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知道政府为了掩盖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长的矛盾，制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政策。所以，虽然我承认“下放”对于“文革”前知青是“个体而非一代人的命运”，但是却想指出，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注定国民经济的长期徘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命运预示了后来的新知青的遭遇。两个群体虽然感受不同，其命运之间却有着某种历史的逻辑关系。

韩子渝在他的散文集《山月心影》中对自己下乡的情况做了简练、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描述：“勤俭楼和红专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三中的大校门大打开，街上许多人都涌进来看热闹，十几辆大卡车整齐地停放着，下乡的人被父母领着，对号上车。”对他落榜的原因，韩子渝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他轻描淡写地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他的祖父还是一个地主。这样看来，无论韩子渝成绩多优秀、表现如何出众，都注定没有上学的机会。这是未曾被我们认真探讨过的共同遭遇。

其实，如果我们的《巴山知青丛书》能够启动，我想写的题目之一就是自己在毕业前后的经历：我在毕业前学校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慷慨陈词、我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感到的天塌地陷般的失望和将近两个月的精神炼狱，亲朋好友，包括老师对我的劝慰，以及自己拿着户口到街道办事处下户口路上的那一片思想的空白。我想很多老知青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人的经历比我的还要戏剧化，还要精彩、还要令人扼腕叹息。而这种经历是新知青大多不了解，甚至难于理解的事情。

我还想指出，作为上山下乡的先驱，老知青在许多问题上也是先知先觉。《知青一代》的作者在区别两代知青的经历时写道：“当‘文革’中的知青一代随红卫兵运动狂热地从学校向社会革命造反，‘文革’前的大批知青则在造反要回城。”这种说法首先有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不少“铁杆”老知青在所谓知青“回流”期间没有动摇扎根农村的决

心，没有离开农村（林、茶场），甚至在社办林、茶场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仍然抱成一团，死守阵地。1967年初，我在北京上访期间，结识了一些其他省的老知青，知道他们当中能人不少。其中，辽宁省的一个名叫“山里红战斗队”的知青组织特别活跃，在中央安办、农垦部张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大字报。这些人当中肯定有些成功的人，他们也许跟我们有类似的想法，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再说，1967年初，在红卫兵们跟随伟大领袖稀里糊涂地到处糟踏圣贤的时候，遭受不公待遇的老知青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上访请愿、争取返回城市，不正表明他们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的英勇抗争？当时的红卫兵们不仅不理解、不同情老知青的正当要求，反而轻蔑地称老知青为“户口兵”。他们哪里预料得到：不到两年时间，下乡的厄运会同样落到他们的头上！这岂不是有几分讽刺意味？

实际上，由于老知青被社会打入另册，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往往看得见许多其他人看不见的问题，有新知青所不具备的对生活的感悟，有英文里的“underview”（低视点）。在许多新知青面临农村的“culture shock”（文化休克）而不知所措时，老知青们已经饱经沧桑，能够笑看人生了。这样的经历，在任宗景的《情窦初开的时候》中反映得十分生动。谁说老知青没有对“文革”的体验？正是因为老知青的存在，中国农村里的文化大革命才别有一番景观；也正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老知青才完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最重要的一课。这种经历虽然在任宗景的中篇小说里（或其他的文学作品中）被描写得回肠荡气，但从整体上讲，至今还没有对它翔实的文字记载和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知青文学/知青研究的确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前知青”对自己的那份生活体验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言，还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虽然我们的确有许多旧事、旧情可怀。话语权跟其他政治权利一样需要争取，如果不争取，那你就没有，也不配拥有这样的权利。毋庸讳言，跟新知青相比，老知青的话语权至今不大，这跟老知青为数较少有关系，势单力薄乃是事实。但130万到底是个不小的数字，它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假定当时城市人口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即6 000万）。此外，这种“语塞”状况跟老知青长期被边缘化也有直接的关系。过去，老知青被阶级路线边缘化，如今被话语精英、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边缘化。而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群体又似乎特别谦虚，特别旷达，特别与世无争。我们当中许多人接受了平淡这一生活的基本原则，接受提前退休、下岗这样严酷的现实。我们当中也并不是没有善于表达、擅长文字的人才，可他们偏偏采取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自己边缘化了自己，至今成为一个沉默的群体。而如果我们听任时间来尘封自己的过去，那就不能责怪时代和

他人,只能责怪自己的谦卑和无为。

我以为,事在人为。如果我们相信自己那些年的经历对后人有些价值,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经历有助于后人理解人民共和国那段悲怆的历史,如果我们的经历也是中华民族上个世纪历史的血肉本文,那么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去记载下那段让我们终身不忘的时光,而我们的记载对后人的启迪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那段经历的意义的发掘深度和我们在文字上的功力。

我还想就"社青"这个字眼说两句话。长期以来,"社青"在中国的语境中是个贬义的字眼,似乎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要比他们高一等,连我本人过去也有这样的看法。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应届毕业生认识到,社青、知青其实都是一棵藤上的瓜,都是一群被社会遗忘的孩子。说到底,社青也是由知青来的。知青未必高贵,社青未必低贱。我所认识的老知青当中,虽然有被扫地出门的小偷扒手,也有从北大、交大这样的名牌大学休学的青年。而有许多社青只不过比我们更早就遭受了社会的不公待遇罢了,他们同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还往往有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人所不具备的锐利的洞察力和常识。大多数社青由于过早失学,从来就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现在生活日益窘迫,却没有任何话语权,我们这些还能说话的人不正是应该为他们说几句话吗?

说到个人要求,我们这批人的处境还算不错,至少没有饥寒冻馁之虞。韩子渝和任宗景等是享誉全国的作家;张诗亚、林木等是知名学者。我自己多少也挣得了点"话语权":我发表了五部中文著(译)作,三本英文专著,仅仅美国国会图书馆里就藏有我的四本著作(三本英文、一本中文),国内国外发表的文字应该在两百万字以上,好歹也算身后留名。但是,每当我想到自己当年的辛苦,想到自己的老知青朋友的种种遭遇,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让老知青的那些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岁月在中华民族的当代史上留下一点清晰的、可以让人抚摸的痕迹。而且我相信,老知青的群体回忆必将发掘出动人的故事,产生出凝聚着人生智慧的思维,唤起三代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子女)的共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为后代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

我知道,《巴山知青丛书》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愿意为之尽绵薄之力。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努力最后不一定能有圆满的结果。但如果人不谋事,天成我何?即颂

大安

邓鹏　匆匆

2002年9月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丁玉敏

邓　鹏

丁玉敏：

你好。昨天从重庆传来喜讯：在重庆出版中心举行的2005年出版选题审批会上，我们的《无声的群落》（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共三册）以全票通过。这样，我们的作品很快就要跟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的一件大喜事，特地及时向你通报，让你分享这一份快乐。

听说你想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原因是其中涉及的一位知青朋友的妹妹坚决反对你在文章中提到她姐姐的名字。我不愿意去揣测那位从中作梗的女士的动机和她的那种无理要求背后可能存在的难言之隐，只想对你说几句心里话。

《无声的群落》是包括你在内的几百个老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它凝聚着我们老知青的心血和对社会的严肃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勇于牺牲的群体对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奉献。我知道你听信某些朋友的意见，对自己的文章产生一些疑虑，因为其中涉及了一些过去的人事，怕因此引起麻烦甚至法律纠纷。对此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们都有过相似的、让人心惊胆战的经历，当年的梦魇在我们这些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散。

但是我希望你回头再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程——那是多么勇敢、多么豪迈、多么辉煌的人生！你不仅战胜了野蛮的政治歧视，而且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取得了大巴山的群众和领导的信任，成了一方物望，当上了一县人民的“父母官”。你不愧是我们大巴山老知青里真正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我们这个群体的骄傲！

常言道：文若其人。你的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写得娓娓道道、不卑不亢，处处显示出你的真诚、坦荡和机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忠实而生动地反映出老知青这个群体那

史诗一样的经历，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我今天又将它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让你忐忑不安的内容。说实话，我们也仔细研究了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规定，咨询了这方面的专家，你的回忆文章根本不存在损害他人名誉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面，但是你的性格和人品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你执意收回大作《插队落户的日子》，我们一定遵命，编委会决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作者。但是我仍然衷心希望你能战胜一时的犹豫，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同意我们在《无声的群落》中采用大作。

古人有训："君子坦荡荡。"让我用大作中的一句话与你共勉："管得他的哟，总比当知青好点！"

盼回复。即颂

秋祺

邓鹏匆匆

2005年10月25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致李自森

邓 鹏

李自森兄：

惠书收悉，反复诵读，浮想联翩。四十多年前的一些事情，一起涌到记忆的狭小窗口。我知道家母曾经教过求精中学高六四级的英语，却不知道老兄是家母的得意门生。记得1963—1964年间，母亲担任了初六四级五班的班主任，兼任我们初六四级二班的英语课。我们班初中换了几个班主任，是个“乱班”，教英语的老师一年级是陈知勇，二年级是刘学亮，两位老师其实很不错，无奈班上的不少同学不懂事，英语学得一塌糊涂。所以到了初三年级，学校决定让我们全班重新学习初二的英语。母亲教书，课堂上的儿子总有几分不自在。好在我当时已经有了一点自学能力，那一年里，我自己抽课余时间学习初三英语，而且用其他班的期末和年末考卷来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按母亲那里提供的统一评分标准，我居然得了96分。这件事虽小，却为我后来自学英语奠定了心理上的基础。

在我们这些天天盼着长大的初中生的眼里，高中的同学就是英雄豪杰。举一个例子说明。初中三年，我几乎每年都要主持班上的壁报，在办壁报的过程中，我常常要到“长楼”外面的广告栏和楼梯口处观摩高中同学贴出的壁报，“剽窃”一点有关排版和主题的构思；壁报完成贴出之后，我常常不敢看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跟高中同学的壁报一比，我们的作品真是相形见绌。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高中同学的书法、绘画和文笔，在一些图文并茂的壁报前我经常流连忘返。但居然不知道老兄是高中文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

我也喜欢运动，因为有一个崇尚科学、热爱运动的父亲。父亲虽然出生在四川乡下

(江津白沙),但十二三岁就被祖父送到天津南开求学,受到南开的风气熏陶。后来到复旦大学读书,曾在复旦的足球队效力。至今我还记得"南开五虎将"和"球王李惠堂"的轶事。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我一上初中就梦想参加学校的体育代表队。初中一年级,我参加了学校的跳伞队,每逢周三下午课后到大田湾的跳伞塔接受训练。记得跳伞曾经是我们学校的传统体育项目,还出过一个女子定点跳伞全国冠军王淑珍(?)。她曾经回校作过报告。但是过了不久,体委的纪教练和寇教练炒了我们的鱿鱼。原因是我们这些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孩子发育不良(1958年小学三年级时我的体重是30公斤;三年后我上初一时,体重还是30公斤!),体质单薄,力量不够,他们没有耐心等我们长大长壮。我们班也有一个自发的篮球队,但是初一、初二时老是输给一班,因为一班的篮球队里有些干部子弟,他们发育良好,人高马大,在篮球场上有绝对空中优势。直到初三我们个头儿长高些了,才最后"翻了稍"。但是我们又碰上了新的劲敌:我母亲主管的五班有许多住读生,他们因为经常在一起打球,所以彼此配合默契,传球流畅到位,几次对抗,我们都饮恨败北。我一心想到高中再跟他们一争高下,哪知初中毕业就梦断曾家岩。

兄在运动场上的雄风我曾瞻仰。我还记得你经常穿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戴一副眼镜,本来白皙的脸在镜片后略微泛红。你的大名许多初中生并不知道,只听见人叫你"小眼镜"。最喜剧的一幕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求精中学男生宿舍前面的一个篮球架下围了一大群同学,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小眼镜"和校队的另外一个英雄在"过招"。那位学兄的名字(绰号)我记不得了,但是记得他经常偏着脑袋,脸上不时挂点玩世不恭的微笑,看得出他非常"油",有点诡计多端。依照通常的规矩,你们一局12个球,打得天昏地暗,难解难分。最后,兄不幸以两分(一分?)之差败北。为此,你的对手非常得意。但就在这时候,兄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你两个箭步,跑到篮下,纵身跳起,抓了一下那个向下倾斜的篮圈,然后向对手提出新的挑战:"你摸不摸得到篮圈嘛? "对手狡黠而残酷地一笑:"我抓不到。"他拒绝跟你比赛弹跳。

兄当时可能非常尴尬。但你那可爱的一跳,就这样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那一跳非常出彩,因为它充分显示了兄的纯真、聪明和不服输的性格。兄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万般逆境之中含辛茹苦、奋斗不息,以至后来脱颖而出,成绩斐然,让世人刮目相看,就是因为你有遭受挫折甚至面临绝境时还能奋力一跳的那种精神。那种精神就是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精神啊!

兄来信中提到的两代人的"脱胎换骨"的故事意义悠远,发人深省。令尊出身贫寒,当了富家子弟的"书童"。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居然学有所成,不仅金榜题名,而且平步青云,实现了中国社会"茅屋出公卿"的理想。令尊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和成长是我

们许多朋友的父辈的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和成就的佐证,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希望。但是,由于后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非但没有能够为国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反而遭到了一个教育文化层次相对低下的政权的嫉妒、压制和迫害。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中华民族的劫难。而兄由于被阶级路线打入另册,被迫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环境里,重复了令尊的奋斗过程。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跟令尊当年一样,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兄的毅力、勇气、机智和成就在老知青之中鲜有出其右者,而兄虽然在新的体制中显贵一时,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老知青身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真是难能可贵。

依弟之愚见,兄完全可以你自己和令尊两代人的经历为题写一篇文章,通过对比,介绍两代人的既相似又相异的"脱胎换骨"经历。也许读者从中可以窥视到中国在20世纪下半叶走过的一个怪圈。

我们这一代人以青春换来了许多人生教训,也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苛政猛于虎,暴力革命不可取。所以我非常欣赏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口号。从进行阶级斗争到建设和谐社会,中华民族用了半个世纪时间,牺牲了几千万人的性命。而要实现和谐社会,中华民族必须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21世纪的中国面临太多的挑战——环境恶化、资源匮竭、文化断裂、世风日下……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国再也不能有暴力革命了,否则中华民族将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比早些年王立雄的小说《黄祸》中所描写的景象还要可怕。以种种形式,通过种种渠道向后代传递这一信息乃是我们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如老兄在信中说的那样,我们的这一举动还是"为了展现老知青精神"。

兄在信中的一番鼓励和希望出自肺腑,洞悉幽微。兄坦然指出,"《群落》是春雷但不是惊雷。读它催我泪下,但不能催我夫人泪下"。对于读者的不同反应,对批评、不解甚至冷漠我自己早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我知道我们的文字的局限。第一,回忆录是老老实实的文字,它缺乏文学作品的"蛊惑力",在目前这个浮躁、任何历史都可以"戏说"的时代,真正欣赏回忆录,特别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文章的人不会很多;第二,我们的文字受到环境的限制,受到出版社的编辑的见识和修养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畅所欲言;第三,我们对上山下乡的本质和意义的认识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所有"老三届"和"新三届"的知青朋友的认同,我们不讲"青春无悔"、"劫后辉煌"那些大话。

但是尊夫人关于老知青是靠新知青解救的这一观点我是基本赞同的。我记得,毛泽东的《12 · 22最新指示》下达的当天,我和几个朋友正在重庆上清寺的大街上闲逛,一位嗅觉敏锐的朋友听到这一消息,当即跳将起来,发出欢呼:"好球!我们有救了!"不是吗?试想一下,如果文化革命晚发生十年,升学录取中的株连政策就将被教育部门心安

理得地多执行十年，我们就可能在农村多接受“再教育”十年。那样一来，我们这个群体就可能完全农化，在乡下自生自灭了。虽然后来文化大革命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加速了上山下乡的步调，使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寿终正寝，极权政治和乌托邦理想的结合仍然让我们，特别是知姐知妹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67年初，当老知青回流到城市造反、争取回老家的时候，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十分鄙夷地给老知青取了“户口兵”这样一个雅号。殊不知事过不久，毛老人家烦红卫兵小将了，将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里去，这下才有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招工。即便如此，许多老知青在招工期间，仍然因为家庭出身跟好运一再失之交臂，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办“病残”回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家乡，回到故乡后仍然要面对由人为后移的人生起跑线所造成的严酷现实。这种经历，并不是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能理解的。

谢谢兄在信中推荐的回忆录作者人选，希望兄代我们编委会热烈欢迎他们参与我们的工作。这些朋友的文章想必会给我们的书增添异彩，因为他们的回忆可能更富于传奇色彩，更富于“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感。但是我们也应该防止以成败论英雄的倾向，因为古往今来，成功的英雄总是少数，失败的英雄要比成功的英雄多得多，再者成功者不一定个个都是英雄。年轻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家父常为项羽感到惋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为人不能太机巧，太功利，坚持和操守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窃以为回忆录的质量的根本是作者本身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社会的思考，它取决于作者年轻时候有没有一个梦，并曾经为那个梦苦苦追求过、彷徨过、失败过、痛苦过、牺牲过；而且，因为人人都有过失，它也取决于作者是否敢于正视自己的过去，超越自己的过去，甚至批判自己的过去。反躬自省往往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个“无声的群落”出声的机会不多，一旦得到出声的机会，应该说点实话，说点真话。

信中提到的裴某某女士当年跟我夫人的胞姐同在平昌县石板公社金银林场务农，我本人曾在一次跟重庆市政协主席的会谈中见过她。据说她不太愿意跟知青来往，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兄能够动员她参与我们的工作，弟将非常感激。根据我的经验，一些后来在体制内混得不错的老知青朋友似乎都有点甩不掉的包袱。一个重庆的朋友曾经这样拒绝我们的征稿邀请：“过去的记忆就让它烂在心里吧。”——哀大莫过于心死啊。

兄的日记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望惠予提供。希望兄也留意为我们收集一些老照片和其他文物。处理方法，定强兄会详细介绍。

从兄来信中知道，令爱通读了兄当年的日记，实在让人既羡慕，又感动。她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将来一定有所成就。

兄年届六十，精神矍铄。但岁月无情，还望多保重。明年夏天回渝，一定登门拜望老兄。

即颂。秋祺。

邓鹏谨呈

2007年9月30日

作者简介

请见《前言》后的作者简介。

像人一样生活①

——读《无声的群落——大巴山 1964—1965 老知青回忆录》

杨 健

1962 年官方正式把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计划，17 年中有 1776 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放逐”的行列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在 1964—1965 年到大巴山区落户的 14000 多名重庆知青。今天，已经人到中年的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叙述了上山下乡运动带给他们的苦难人生。这份沉重的人生记录，弥补了有关“黑属”群体在知青运动中的空白，为知青运动史提供了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宝贵史料。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 1964—1965 老知青回忆录》是一部迟到的书，它是在全国各区域、省份的知青回忆录出版高潮过去之后近十年才出版的回忆录。但是，它与众不同，是一部自觉站在私人立场讲述的回忆录。它是知青群体在新世纪向自由主义继续迈出的重要一步。

上世纪 90 年代知青思潮的兴替——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知青文化热”兴起以来，知青思潮先后经历了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的发展过程。

1990 年北京东北知青率先举办知青回顾展，此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各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回顾展，掀起一股知青文化热潮，推动了“青春无悔”这一先验理念的推广传播。进

① 曾载于《中国青年报》2006 年 6 月 7 日“冰点”栏目。

入90年代中期,《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全景式报告文学)以28名知青成功者的个人口述,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建立起知青返城后创造"劫后辉煌"的新神话,成为新的知青文化思潮。

同一时期,知青文学"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以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为代表)被生存哲学的宏大叙事(以郭小东"知青部落系列"、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为代表)所取代。后者将官能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宣扬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审美观念,它们与封建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知青回忆录的出版——人道主义与生存主义的冲突

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但是基本思想主题是"青春无悔"、"悲壮的青春"。回忆录大多围绕着"悲壮的青春"主题展开,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片面歌颂苦难,乡村生活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写作,从老三届(66、67、68届)扩大到小三届(69、70、71届),由中心城市延伸到中小城市,甚至延伸到部分"文革"前的支边知青。1996年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回忆录的编者和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自我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幅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为自己树立起一座青春的纪念碑。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业绩,这种情绪恰恰流露出一种对青春逝去的焦虑。

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思想主题和价值定位,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将1600万知青的生命实践和思想历程都归纳到"青春无悔"的唯一思想主题之中,以群体的名义,逃避个人自由。集体主义光辉暂时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整个90年代,全国范围的群体书写,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冲突——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

90年代末,知青群体广泛兴起怀旧热潮,全国各地的知青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没有促进群体内部成员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铁板一块的幻象。人们广泛注意到知青个体之间存在着权力和财富方面巨大的差距。在知青座谈会上,不同人群也对"无悔"、"辉煌"的论断发生了分歧。显然,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知青群体已经分裂,统一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它正在成为被主流媒体虚拟出来的一个文化象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知青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人的族群则据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者和操控者，他们动辄站出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发言，而多数人则成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对知青历史的宣传、报道一直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进行过独立的判别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独立的话语权。

进入90年代后期，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知青群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先富起来的这一小部分知青，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的初期阶段，结束了创业时期，他们对于一个在文化层面上虚拟存在的知青群体，已经不感兴趣。知青旗号对于他们已经失去精神慰藉和文化使用价值，他们无暇沉浸在怀旧情绪之中，满怀兴奋地投入财富的增殖活动和娱乐性消费。而大部分知青却面临下岗失业，他们的思想情绪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可是却已经不能从富有的、握有权势的知青哥们儿那里，借用和调动文化与社会资源。他们正在沦为经济和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面临被社会丢弃和漠视的命运。

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学的“去知青化”思潮开始兴起。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他们认为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并难以超越。有一个知青作家声称自己并不是以知青文学成名，“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知青作家开始群体性地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知青文学作品数量开始锐减。在世纪末，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知青文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历史终点。

世纪之初，自由主义立场的知青文学叙事

在广大知青群体中一直不乏清醒者，在史学、社科和文学界中，也有许多严肃的知青学者，他们对主流媒体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运作，进行了持久顽强的抵制。《中国知青史——初澜》（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在1996年出版后，在史学界、社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无论是中央台读书栏目还是主流报刊，都未做任何介绍和报道。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如《血色黄昏》、《黄金时代》，未能搬上电影、电视，知青群体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未能在知青群体中取得压倒优势，也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随着强势群体的离去和主流传媒的放弃，知青文化在大众传媒中被边缘化。“寂寞旧文坛，平安新战场”，在看似空白的时期，却从余烬中产生了自由主义立场

的私人叙事小说，出现了《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岳建一主编 2001)，出现了像《羊油灯》(逍遥 2001)、《抒情年代》(潘婧 2003)等优秀知青文学作品，虽然在知青集体中和社会上未能产生广泛影响，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上个世纪的主流知青文学。它们是寂静中的雷音，鼓舞着寂寞的自由主义知青族群。

重庆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可以说是对上个世纪 90 年代自由主义文脉的自然延续。重庆老知青以群体的姿态迈入自由主义派别，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思想风貌。它所取得的思想成就，展示了知青一代人仍然在精神的道路上前进，昭示着自由主义的脚步在新世纪并未停止迈进。

"认命不随命"——对"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和"生存主义"宏大叙事的突围

重庆老知青是知青运动的最早受难者，他们对自己的青春、人生，有着区别于主流社会的不同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具有鲜明的私人叙事特点。他们将上山下乡的历史描绘成"苦闷的青春"或是"不放弃梦想"的坚持；将返城后的人生描述成知青个体对历史宿命的抗争。这种"认命不随命"的私人叙事与此前的"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回忆大巴山的岁月，虽有悲凉之处，但绝无一丝怨尤，更多的是平静的关注与格外的珍惜，特别是经历了生死关，对人生更是别有一番领悟。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农民们一个朴素的人生哲理：一根田坎三截烂。……凡是大巴山的知青，也许谁都会记得那连峰接岭的树，生生不息，郁郁葱葱。"(《倔强的树》邹克纯)

1996 年是上山下乡 30 周年，各地的知青群体掀起了纪念热潮，这本是一次进行历史反思的宝贵机遇，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沉浸在"青春无悔"的情绪中，放弃了反省、忏悔和历史批判。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对偷盗农民津津乐道，流露出对权力的敬畏，宣扬个人生存奋斗的胜利。

知青是"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借助城乡分治的余泽，作为"半个公家人"在乡下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为了返城、招工和入学，知青群体中也曾出现相互倾轧，或是被迫贿赂官员的事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知青群体中的无是非、无原则和价值虚无主义，造成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盛行。

孔子说过，"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产则有恒心者，惟士之能。"农民是小"有产者"，可以通过集体劳动得到某种尊严，而知青是无恒产的赤贫者，在生存线

上挣扎，很难坚持道德原则。物质上的无产化，造成了许多知青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在他们的生存主义中潜伏着浓厚的流民意识和灾难意识。在新时期返城后兴起的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热中，有着明显的流民意识，这一切并未引起知青群体的警觉和深刻反省。知青流氓化已经为“八九”之后的知识分子痞子化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人造成的扭曲，并不是一场道德清洗运动可以恢复的，它需要单独的个体在长夜的寂静中进行默默的修复。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被污辱和被损害”的群体，经过80—90年代的思想历练，在新世纪展示出他们修复、壮大起来的心灵。

重庆老知青回忆录中有不少文章回忆了生存艰难，衣食无道的往事，但没有一篇描写在农村偷鸡摸狗，或对此行为津津乐道。在“瓜菜半年粮”的大巴山贫困的农村，艰苦劳动一年，毛谷子加红苕、洋芋也只够维持四个来月。有的知青饿得跑上山寻找野生的红子，往嘴里填。他们大都不肯自暴自弃，即使极个别的人迫于饥贫偷盗了农民的东西，也不会对这种行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因为他们“深深地同情大巴山的农民，也同情自己”。（《倔强的树》邹克纯）

重庆老知青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比一般知青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因为“出身不好”被社会打入另册之后，绝大多数的重庆老知青在非人的环境下，都自律自爱，没有放弃做人的道德准则，即使面对饥饿、苦难，他们出于所受的教养、尊严，也不甘沦为流氓无产者，不愿坠入兽畜和阿修罗道。他们在回顾那段苦难的岁月时，仍然能够发出自尊、自信的声音。在这个时代背叛、出卖，如同家常便饭，而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罕见的勇气。

对自己的青春负责，对历史负责——对“阶级路线”的控诉、清算

《无声的群落》的书写群体比较独特，他们均在1964—1965年下乡，下乡的原因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被剥夺了升学、就业的权利，被迫带着“原罪”下乡。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是肉体的折磨，还有精神的折磨。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初下乡时，希望能够脱胎换骨，改变成分，“披上无产阶级成员那耀眼的翅膀。”（《我的初衷》张光亲）他们的梦想很快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破碎了，他们在劳动中表现出色，却无法摆脱“另册”，不能参军、入党，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进工矿和回城市的机会；即使回到城里，“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最差最苦最累的工作”（《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李忠公）。有的老知青甚至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仍然因为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梦断1977》任宗景）

重庆老知青群体是一个被“阶级路线”政策制造出来的“不可接触”的卑贱群体；这种“血统论”制造出来的等级，是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所说的，类似“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

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

重庆的一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没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没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人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来。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在严寒的日子里》周邦宪）

距离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四十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重庆老知青像犹太人在战后追逐纳粹罪犯一样，对曾经制造过一场青春浩劫的“阶级路线”并没有轻易地放过，对造成终生苦难的历史原因进行了执著的追究。

重庆市教育局、公安局发布的1964、1965年大学、高中生招生文件，在政治审查一条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极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也是我们和资产阶级争夺后一代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中等学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学校招生，必须坚持贯彻阶级路线，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提高新生的政治质量。把好这个关口，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印把子掌握在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女的手中的问题。”文件提出，要防止“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值得警惕”，要求学校认真核实学生的家庭出身，“有些学生亲生父母是四类分子，随母后嫁的，也要弄清楚，写明白。”

在高等、中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政治审查标准有数条，不仅直系亲属被判刑、管制的学生不能录取，甚至有海外关系的亦不能录取。标准中虽然提出“本人确已划清思想界限、拥护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表现进步的，可以录取”，但这只是一种虚伪的“摆设”，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从来没有实行过。

制定这份文件的人也很清楚，这种侵犯人权的政策是见不得天日的，文件特别提示“政审标准和做法，只能传达到学校党支部委员会、公安派出所，不得扩大范围，不得对外公布，防止造成紧张气氛。”

回忆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重庆老知青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曾经历过的苦难往事。他们对“阶级路线”罪恶的血泪控诉，也是对“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清算。这种历史的清算，不仅是对自己的青春负责，给自己的人生求得一个明白的说法，更是为了对历史负责，避免同样的灾难再次发生，使得人权不再遭到同样的践踏。

像人一样生活——超越世俗的价值评价

“劫后辉煌”的神话曾经在90年代风行一时，其中不乏对返城后拥有财富和权势的艳羡和追求。《无声的群落》对个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却有着新的价值立场。他们已经放

弃了"青春无悔"和"劫后辉煌"的神话，从依恃集团转向依靠个人，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从沉迷于群体神话到正视个人的人生悲剧。

许多重庆老知青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在农村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最终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升入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读书梦》邓鹏、《大巴山上学英语》周邦宪)他们作为弱势的知青群体中的一员，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他们以个人之力对扼杀人才的专制制度进行顽强的抗争，他们用事实证明，这个被扼杀的"原罪"群体，本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可以奉献给国家和社会以聪明才智的青年群体。

重庆老知青群体中的多数人则经历了平凡、艰辛的人生。《刻在记忆里的岁月》(苏谦)记述了一个知青平凡的青春经历，在重庆老知青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作者16岁怀着革命理想到大巴山插队，患重症病退回城后，当过教员、护士、统计和财务经理，干一行专一行，行行出成绩，最后因病退休，又自学成才当上了画家，获得"和平女神首届国际书画大展赛""和平奖"。她的人生看上去并无多少荣耀，活得十分辛苦，没有成为富婆、高官或明星，算不上所谓的成功之士。但是，她的生活处处闪耀着光彩。她能够不断地适应各种险恶的环境，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再来，她珍视自己的人生，自尊自爱，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的英雄气概。

重庆老知青讲述他们在大巴山苦难的生活，以及返回城市后艰辛的工作，语气总是那么乐观、自信，从容淡定，字里行间传达出坚忍不拔的生活意志。

他们没有"悲壮的青春"，只有"苦闷的青春"，返城后没有"劫后辉煌"，只有艰辛的奋斗，但是，他们并不自卑自弃，努力维系做人的尊严。他们的人生是如此艰险，又是如此的平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并没有获取到惊人的财富、权势和功名。但是，他们不需要用世俗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本分做人，清贫自守，能够上无愧于父母，下无愧于子女，这已经足够了！

重庆老知青付出的一切努力，不过是为了像人一样活着。他们要活得像个人样，却要付出血泪甚至生命的代价，那本是成为神的代价。最大的奇迹并不是"悲壮的青春"、"劫后辉煌"，也不是在绝境中生存下来，而是努力像人一样地活着。像一个人那样活着——这是黑暗年代中最有价值的"成就"、最值得一代人骄傲的"业绩"。要活得像一个人，却需要一种英雄的气概。我们还活在英雄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大幸。

《无声的群落》放弃了以往"青春无悔"的宏大叙事立场，完全转向个人化的各自表述。重庆老知青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总是以个人的骨力、胆识承担着生活的苦难，无论是个人的曲折经历，还是个人曾经的苦闷、彷徨，都坦言无忌，他们不再以群体和社会的思想定式取代个人的情感表述。

重庆老知青坦然地陈述着自己的人生，自信地谈论着自己的平凡业绩。他们确信，

自己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判断！每一个人面对自己的一生，面对着自己的灵魂，进行独立的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长期存在的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和普遍的组织化，使得个人意志难有立锥之地。在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私人的声音。重庆老知青回忆录能够形成一种私人叙事的声音，十分难能可贵。

"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集体至上"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负责任，放弃个人承当是拒绝忏悔的重要原因。"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体的价值观，脱离了集体、国家的立场，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存在为个体承担责任，他不能把责任推诿于他人，他要为个人自由承担全部的后果。重庆老知青的这种个人主义立场，为他们的个人忏悔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红色忏悔录"——从自由主义的世俗价值到宗教的超世价值

重庆老知青在大巴山里的生存环境，非比寻常，其政治的严酷性和生活的艰苦性，远超过了一般知青，在这场上山下乡的浩劫中，他们苦海求生，努力保持做人的尊严，不放弃一个人的良知。回忆录专门开辟了"红色忏悔录"一栏，专门记述一些忏悔文字。其间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精神苦斗和艰难的灵魂炼狱。

一个重庆老知青因为发表过对反右运动的不满，在"文革"运动中被工作组抓住了政治把柄，设下圈套，逼迫他揭发自己的好朋友。这位老知青在回忆录中忏悔说："当时，我真像一个淹在水里的人，何尝不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要指控一个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还是自己最推崇的战友，实在是难以决断。……软弱的我最终没能抵御工作组的诱迫，当了'叛徒'，以揭发批判邓鹏换取了自己的安全。但是，我一直深深地内疚着，这成了我一生中最懊悔的耻辱！"（《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张弘）

这篇忏悔文章，有着坦荡的陈述和深刻解剖，这种自我曝光，并不是因为社会压力，完全是由于自我良知的逼迫。从中可以看到作者那颗强健、光明的心灵。他用自己的道德勇气，洗涤了灵魂的污点。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像但丁一样，穿过地狱的苦难、炼狱的烈火，被自我的良知引领进天国的大门。

《那一年，我参加了阶级斗争》（章孟杰）记述了下乡参加批斗地主的斗争会，在会上他动手打了姓何的老地主一个耳光。13 岁的地主女儿端着菜来为父亲求情，却被知青们打翻了菜盆。"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总是重现批斗会的情景和送菜小女孩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她哀怨的神情。我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懂礼貌，要与人为善。我从来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更别说先出手打人，在老师眼里我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我为自己在批斗会上的举动感到惊讶。'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思索着。

答案其实很简单:我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正在劳改中,我无非要用行动来证明我与反动阶级划清了界限!”

文章中最后记述,1986年暑假他带儿子重返大巴山,又看到姓何的地主,“他早已忘记我曾经打过他,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我为被加害者对加害者的宽恕而感动。毫不奇怪经过共同的苦难,他们已经消弭了往日的仇恨,成为一家人。还有什么比这种场景更令人感动呢?

读着“红色忏悔录”栏目中诸篇大作,我的心灵跟随着忏悔者们一起翻山越岭,走向救赎的彼岸,这些师兄们仿佛是引领我穿过地狱的导师,“导师和我从那条暗道走进去,回到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里;然后,不想作任何的休息,我们就往上登,他在前而我在后,一直登到我从圆孔里辨出了天下累累地负载着美丽事物;我们从那里面走出,又见到繁多的星辰。”(《神曲·地狱篇》但丁)

重庆老知青的忏悔实践,是在个人化的层面上进行的,独立个体不仅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个体的责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社会化的忏悔转为宗教性的忏悔,由世俗的价值评判转为宗教层面的价值评判,铺平了道路。

在世纪之交,关于“忏悔”的论争,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引发了长期的激烈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普世的道德准则,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道德清洗运动中,问罪的一方属于自由主义群体,他们认同和依恃的理念是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也是一种世俗权威。用自由主义的标准来断定知青群体的青春与生命,其结果自然也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评判。这种评判有其优长亦有其缺陷。它使不同政治派别和社会背景的人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把忏悔当成了一种政治批判工具,使忏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在有关忏悔的论争中,有人想要厘清道德忏悔与宗教忏悔的关系,强调二者本质的不同之处,努力清洗其间的宗教因素。不少人认为忏悔应该在现世层面进行,但忏悔的实践与论争表明,坚持世俗的评判标准,难免与现世生活相纠缠,造成不同个体表述之间出现诸多混乱和冲突。

由于忏悔运动发展成为社会集团和政治族群的冲突,在其间的忏悔者难以避免政治集团的批判和受害者的威慑;许多人拒绝忏悔正是为了免于政治压迫和法律质询。他们把自己视为政治运动的另一种受害者,认为权势者的“罪行”不应该由个人来承担。在这场有关忏悔的论争中,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政治道德和社会清肃,而很少看到个人的灵魂,看到超越(的)世俗的个人内心冲突。试图回避忏悔的宗教因素,是道德清洗运动最终进入误区的重要原因。

超世的宗教忏悔，虽然不脱离现世，忏悔者却只能依赖自己，依靠个体灵魂的良知良能，他如果不愿或无力面对现世社会道德的审判，还可以进行私下的自我审讯，独自去面对上帝（天地、神、佛或良知）对自己的"最终审判"。

显然没有比宗教更为全面的，经历过历史检验的超世价值体系了；宗教忏悔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是针对每个人的。首先在个人心灵上，排除世俗理念和信仰的无上权威，为个人心灵留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个人的忏悔是一条走出国家政治误区，进入由个人担当责任的多元社会的必然之路。

重庆老知青的普遍个人价值立场，独自的灵魂内省，都为进入宗教境界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神殿，宗教性的超世境界已经呼之欲出。重庆老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实际上已经预示着宗教性的超世价值体系的恢复。

自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从知青群体形成之日起，知青一代的群体内部，就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冲突，60年代上山下乡初期，老知青为争取返城与中学红卫兵发生的冲突；"文革"中"出身论"与"血统论"的冲突；"文革"上山下乡高峰时期，"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冲突，阴谋知青文学与知青地下文学的冲突；新时期"权力—知青文学"与"新现实主义"知青文学的冲突，后新时期知青文学生存主义宏大叙事与自由主义私人叙事的冲突；以至新世纪之初的今天，犬儒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仍然在继续着，如今它已经发展为反对生存主义的兽道（2005年畅销书《狼图腾》）与坚持自由主义的人道的斗争。

《无声的群落》的出版，突破了泛滥一时的犬儒哲学的羁绊，打破了"法西斯国家主义"的生存哲学的喧嚣。它代表了知青群体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在继续前进。

作者简介

杨健：男，195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导。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992）、《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中国知青文学史》（2002）。

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①]

徐友渔

读重庆出版社刚推出的《无声的群落》时，我不时停下来，掩卷沉思，等待内心剧烈涌动的情绪稍微平静一些。我对诸位作者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始终怀抱热情和理想敬佩不已，但更多的是悲愤，为一代有志青年被歧视、被愚弄、被欺凌，走投无路的遭遇悲哀和愤怒，为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极大不公正和荒唐感到寒心与后怕，为那无声的群落中许许多多已经被艰苦的生活埋没，至今仍处在无声状态的不幸者悲哀。

《无声的群落》是一本关于"老知青"的书。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之前，曾经和成都市一批下到西昌的老知青有密切的关系，还到好些知青点上去生活过，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了解他们的才华和对未来的绝望，1976 年形势剧变之后，还和一些人有联系。很可能，我是少数本身不是老知青但懂得他们的人之一。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出版《无声的群落》一书感到特别的欣慰。

所谓"老知青"，就是在 1966 年之前下乡的知青，他们有别于 1968 年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离城的知青。区别在于，后者大致上是从初中 1968 级到高中 1966 级一锅端，而前者几乎都是"文革"前没有考上大学或者高中的落榜生。如果说，我们这批作为"文革"中"革命小将"的新知青是兴师动众、浩浩荡荡地开赴农村的，那么他们是早几年作为城市中的另类或异类半被哄骗、半被遣送下乡的。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带着"文革"运动中叱咤风云、当仁不让的余威和后劲，早已懂得人世的艰辛，无声地品尝人生这杯苦

---

① 曾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 年 5 月 24 日。

酒。当我们还在没头没脑地回味政治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时，他们已经在思考平等和公正的问题。

在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我们这一代人重新在社会上大声喧哗，把“劫后辉煌”、“苦难与风流”喊得震天响，小说、电视剧、电影，加上“黑土地”展览、大型会演、专列回乡的报道，“知青”一时成为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主题。但在这阵喧嚷中却听不到一点老知青的声音。其实，他们这批人走过的人生之路更艰难、更曲折，他们的遭遇更值得关注和同情。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和不公正，它并不让吃过苦头的人得到补偿，哪怕是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如果他们自己不冲破沉寂，顽强地去表达、控诉、呼喊，那么同代人不会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后代人不会知道在历史的墓园中，原本埋藏着苦难和不幸。

终于，在下乡四十多年之后，在第一阵知青热十多年之后，我们听到了老知青的声音。通过《无声的群落》，我们知道，在广大知识青年已经讲述过的令人感慨、回味无穷的历史中，还有那么一个曾经被人遗忘的角落，那里的故事同样感人，那里的苦难和奋争同样是我们那值得记忆和反思的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本书的作者是原四川省重庆市在 1964 年和 1965 年下到川东大巴山区的知识青年，当年他们之中的多数是品学皆优的学生、学校和老师看重的人才，在从初中升高中或从高中上大学的考试中都获得优异成绩，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因为当时贯彻的阶级路线即基于血统论的歧视政策，他们受到了落榜的打击和羞辱。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积极自觉地，有的人是被胁迫、不情愿地注销掉城市户口，去到那深山老林、贫瘠荒凉的大巴山区。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苦不堪言的人生道路。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浩劫，使得几乎全部老三届统统下乡，他们才与同代青年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同龄人同处社会、经济底层的平等，正如“文革”中几乎所有人同样贫穷和无望的底线上的平等。

我不重复书中的故事，读者自会读到和品味那真实、动人的描写。我只讲两点最触动我的事。

宋晓涛在《我的 1964—1968》中写道，“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但在“文革”运动的混乱中，他读到了一份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的文件，才明白“原来，我们 1964 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而精简的标准，就是按照成分和家庭出身。

卢晓蓉在《咏雪四题》中告诉读者，在当了七年农民后，她偶然得到了当初她报考大学的材料，看到尽管在成绩栏里填满了高分，在优缺点栏里写的是各种优点而没有缺点，但在“此生是否录取”栏里却赫然注明“此生不宜录取”！

上面描写的情况是普遍的,这说明什么?我们只能说,那是欺骗,那是类似于印度种姓制的身份歧视。其实,这是经历过20世纪50至70年代生活的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这样的事造成了亿万人的无奈和伤痛,造成了千万个家庭的破裂,夫妻分离,子女视父母为仇敌。但是,只有为数极少的书籍,才把这些情况用文字表达出来,《无声的群落》就属其中之一。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后人在碰巧听到这类事情时,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事实上,现在的青少年懂得他们的父母辈为什么上不了大学、为什么要下乡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我有一个从前的朋友和同事,从美国回来后似乎把自己经历过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不久前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一开始就说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平等"。

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

我要向《无声的群落》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致敬,他们发出的卑微的声音会对改变我们因循守旧的历史作出贡献。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自由的言说》等著作。

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1]

——《无声的群落——大巴山1964—1965老知青回忆录》

定宜庄

《无声的群落》一书，辑录的是1964、1965两年到四川省达县地区达县、邻水等九个县的社办林场、茶场和畜牧场落户的重庆知青集体撰写的数十篇回忆。

近十年来，由老知青集体撰写的回忆录，在近百种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相当引人注目。这种形式参与性强、容纳量大、形式随意多样，撰写的过程往往也成为某一群体的知青共同回忆当年岁月、增进相互感情的方式，不仅广受知青欢迎，也在众多对1949年以来历次运动和事件的记录中独树一帜。

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大多数都是集体结队前往，人员的构成，都有某些共性。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知青的组合也多少有些自由度，譬如"文革"时同一派别的同学会集体报名前往某地，同校同班或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乃至邻居好友也会选择同一个插队地区等等。下乡之后多年同命运共患难的磨砺，更使他们对那段生活拥有了共同的回顾。而回城之后，尽管经历不同、地位各异，但凡是还能够集聚在一起撰写回忆录的，也往往多年并未完全中断联系，互相间的影响也使他们对当年经历的反思，多少具有某种共性。城市下乡知青由此而以当年下乡的地方为基础，形成诸多的小群体，由这些小群体撰写的回忆录，也带有明显的集体记忆的特征。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过来人，可以从中读出

[1] 曾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24日。

各个群体间的差异；作为为历史留下的记录，众多这样的集体记忆，会使人们对知青这段历史的认识更丰满更多样；而从这些回忆录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对知青生活的反省与思考，也为人们留下知青一代人对这段历史反思的参差不齐的蹒跚足迹。

虽然每个知青的群体都各有其特点，编著的回忆录也都各有自己的光彩，但写作《无声的群落》的这个知青群体，还是非常独特的一群，那就是他们都是1964—1965年间，也就是"文革"前的下乡知青。

众所周知，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以"文革"时滞留在校的所谓"老三届"知青人数最集中，牵涉面最广，影响也最大。对于这场运动和这代人命运的回顾与反思，也由他们首当其冲，所谓青春无悔，所谓知青情结，主要就是由他们中那些成功者喊出来的，知青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声音如此洪亮，掩盖了其他知青群体的声音，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这场历时二十余年的运动中，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群体。而被人遗忘最甚的两个，一个是回乡知青，还有一个，就是像重庆市这些到大巴山社办农场下乡的中小学生一样的、"文革"前的城市下乡知青。

十年前我与刘小萌一起写《中国知青史》，我写的部分名为"初澜"。把重点放在"文革"之前的初衷，是因为作为史学家，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必然要追根溯源，但越写到后来，我就越发现这个"文革"前的知青群体的不可忽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知青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运动的先驱，还尤其是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与歧视，从根本上揭示了"文革"及其前后的那些做法给中国人造成的悲剧命运。

早在"文革"开始之前，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当中的弱势群体了。固然在无论哪个人群中，都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但问题是他们之成为弱势乃至在升学、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上遭受种种歧视，原因十分不公正，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看到在《无声的群落》一书中，他们诉说着当年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的迷茫失望，尤其如卢晓蓉《咏雪四题》，写到学校还在刻意向她隐瞒这样的事实时，相信读者都会像我一样，感到心灵痛苦的颤动。

在人生起跑线上遭遇的不公正，显然会影响人的一生。他们在农村经历"文革"，对于这场运动的荒谬性和危害，有着比当时在校学生更早和更深的省悟，他们中一些人把"文革"当做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以及始发轫于同一年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却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在本书上卷的第二部分"红色忏悔录"中有几篇文章，尤其是万源县夏先争的《回首"乌托邦"》，非常具体详细地描述了知青在"文革"期间追求、奋争及至失败的过程，以及如邻水县李忠公的《曾经，我们都是"户口兵"》中所写那些中学红卫兵对老知青的不理解与轻蔑，都可以作为不可多得的史料来看。与此同时，很多人对于当时由于

幼稚、由于单纯而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也有颇多反思，如万源县张弘在《政治悲剧中的“跑龙套”者》一文中称：“我曾经对一位知青朋友说，知青是中国政治悲剧中的配角。他断然认为，知青连配角都谈不上，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因为配角毕竟还是一个‘角’……”（第一卷 271 页）敢于正视这点，是需要勇气的。

待到 1971 年后的招工大潮来临时，这个老知青群体的弱势又一次凸显，这次不仅由于出身，还因为年龄，这使他们的回城之路比后来的知青走得更艰辛。甚至到 1977 年恢复高考时，“在有的县，1965 年的高中毕业生根本没有资格报考，理由是年龄太大了……”（宣汉县任宗景的《梦断 1977》）。本书主编邓鹏在序言中也提到：“老知青当中参加高考的人却寥寥无几。原因是经过了在农村和城市十三四年的蹉跎，绝大多数老知青的学业已经荒废，加上坎坷的经历，他们已经心灰意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一些达县地区的基层单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竟然禁止高 1964、1965 级的老知青参加考试。”而更悲惨的，还有 1964、1965 级高中毕业下乡的女知青，待到知青大规模返城的机会终于来临的时候，她们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最佳年龄。

与一些早期结集的知青集体回忆录相比，《无声的群落》的叙事风格更为平实朴素，对这场运动以及自己经历的思索也更成熟，更客观。即以篇幅之巨来说，众多的知青回忆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从中亦可见参与者的投入程度。

我与大巴山这个群体的知青们同龄，只是比他们多了一次上高中的机会，虽然这个高中也仅仅读了一年。“文革”中我曾有过与老知青接触的机会，但囿于当时的年龄和境遇，对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对此我在《中国知青史——初澜》中有过反思，我提到过：

（老知青）的返城风已经预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根据不足的。……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抗争与思考，都没有引起社会应有的重视。

那些红卫兵，也就是在校青年的大多数，尤其是北京等城市的中学生，对于他们的先行者，态度是相当的冷漠无情。当他们又一次豪情满怀地迈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他们将重蹈这些先驱者的覆辙。他们甚至忘记了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一百多万知识青年踏上了这条道路。直至今日，他们还不无骄傲地宣称，是他们的下乡，卷起了全国知青运动的大潮，是他们为中央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请原谅我在这里重复自己的话，不仅是因为读这部《无声的群落》，又引出我写作《中国知青史》时曾经发出的同样的感喟，还因为我想证实，我是真的寻找了他们将近十年。当其时，“老三届”知青的集体回忆录已出版数部，“青春无悔”的歌唱也正是豪气干云，那时我是那么费心费力，想倾听到这些老知青的声音，但他们却好像已经隐没到茫茫的人

海中，始终默默无语。本书主编邓鹏称这个群体为"无声的群落"，有心者应能体味其中隐含着多少的悲苦与不平。所以，读到这本书，如果以一句话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相见恨晚"。我为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为他们一经亮相就有这样的精彩，而由衷地高兴。

"给孩子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本书中很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它表明了这些老知青历经人世的坎坷艰辛之后，仍未放弃自己的历史责任，这正是他们写作本书的动力。因此我把这句话作为这篇小文的标题，也用这句话来祝福这本书中的所有作者，以及他们的，还有我们的、所有知青的孩子们。

作者简介

定宜庄：女，满族，北京市人。1968 年到内蒙古牧区插队，1974 年回城。1978 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 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5 年留校任教，1990 年获博士学位。1993 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重庆知青在四川通江

谷继文

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早期开始的，那时我还在读初小。

1964年秋天，听大人们谈起有一群重庆知青来到通江，我家的那个公社也分来了约二十多人。公社在全乡海拔最高的穿石粱大队一个名叫野鸭池的山上建起了知青林场，还选派了一个叫谢运林的人担任林场场长，管理那群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娃，教他们学习当农民，学习干农活，学习自己生活。

一群神秘的人

野鸭池林场位于贡桌包山麓，周围全是大山和一望无涯的森林，林场后面的石梯子沟经常有蟒蛇和野兽出没。再往上经贡桌山，穿洞子向北便是荒无人烟的莽莽林海，只在场部周围有一些零星土地和山上由农民开垦出来的"火地"，它们像镶嵌在大山里绿色地毯上的一块块"补丁"。场部附近散居着几户当地农民。

林场与我家是邻村，约有七八里远。我们一群乡村的娃娃，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经常跑到林场周围去藏头露尾地悄悄打量那里的重庆知青。在我们这些边远山区的娃娃的眼里，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就好像一群神秘的外星人。他们嬉笑打闹，说话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衣着打扮有着城里人的高贵气质。知青们白天跟着场长学干农活，拿起几斤重的锄头挖"火地"和种田，手上打起"血疱"和死茧。听说他们晚上倒在屋里哭的哭，掉泪的掉泪，想家的想家。但他们男男女女又经常在一起吃喝玩耍，说笑亲热从不避嫌；他们在空闲时有的读书，有的写信；一些男知青抽着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公社还供应他们每月每人半斤猪肉；他们穿着发给他们的皱巴巴的棉衣；有的人甚至还有着一个

塑料的小钱包和拳头大的小玻璃镜，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令我们山里的孩子羡慕不已。在他们面前，我们自惭形秽，从不敢和他们说话，打招呼。但是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放着大城市不要，偏偏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

这就是我最初印象中的知青，是第一次把城市生活的信息带给我们、让我们对山外世界产生第一次向往的知青哥姐们。

一群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革"中到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开始是揪斗地富反坏右，然后变成破"四旧"，接着是揪斗"走资派"，造反派夺权，武斗升级，各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全面瘫痪。这时，知青也像脱缰的野马，三五成群到处乱窜，一些知青趁机偷偷跑回重庆。回来后，把那里的混乱带到大巴山里。他们有的身上带着寒光闪闪的三棱刀，有的不知从哪里搞来手枪空皮套，挂在身上，耀武扬威。一些男知青拿着刀，见老百姓的鸡就抓，见老百姓的蔬菜和其他吃的东西就抢，弄得当地老百姓人心惶惶。一些知青"天棒"还到处扬言：谁敢惹他们，他们就放谁的血。一时间，"放血"两个字成了知青的代名词，连当地老百姓哄小孩都说："你再哭，小心知青放你的血！"小孩一听，就不敢哭了。那两年里，老百姓见了知青像躲瘟神一样远远躲开。经常听人说，某处某处又遭知青抢了，某某人被知青放了血。

一天，生产队安排我继父到平昌县喜神滩公社去给集体购买生猪。爷爷和小叔也一同去赶场，小叔头上戴了一顶解放军帽。正走在街上，迎面碰到一伙知青。一个知青伸手抢去小叔的帽子，小叔由于年轻气盛不服气，又去一把抓了回来。这下惹恼了这个知青，他掏出一把三棱刀就要放小叔的血。小叔吓得三两下就钻跑了，藏在一个裁缝铺桌下躲过了一劫。可是我爷爷慌忙跑去猪市上把这事告诉继父说："你快去，知青要放你兄弟的血。"继父听到后连忙往街上走，边走边说："知青总也要讲理嘛，我不相信他们真敢放血。"这时那伙知青追赶小叔不着，正好迎面碰到继父，不问青红皂白就劈胸一刀捅来。继父毫无防备，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倒在血泊之中。继父的死给我的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从此辍学，姐姐远嫁。妈妈当时正怀着小弟弟，为了生计，忍痛将两个弟弟继抱给人家。我的一生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那几个知青杀人犯当中有两个在平昌被枪毙，最终埋骨深山无人问，还有两个判重刑，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我对知青的印象从此改变。我恨他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一帮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胆大妄为的人。

一群可怜的人

1969年初，达县地区所有的社办林场解散，知青被分散到大队和生产队落户。我家那个爱国大队也分来了几个知青，之后又陆续从重庆来了一些知青。此后跟知青的接触使我对他们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们的看法逐渐转变。

有一次我到喜神滩公社去赶场，为家里买点盐和煤油之类的东西，在上街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叫傅章平的知青。因为他拜我的一个堂兄学木匠手艺，常在堂兄家走动，相互都认识，但从未打过招呼。傅章平在街上卖几个小木瓢。那时的百姓穷，木瓢一角多钱一个都很少人买，到晌午傅章平还没有开张。我路过时他叫我帮忙卖小木瓢，说自己卖木瓢不好意思，怕其他知青看到。我反正没事，就答应了。结果四个木瓢一共卖了六角钱。他很高兴，就请我同另外几个知青到食店吃面条。当时面条卖八分钱一碗，一共才卖几角钱，一顿就吃光了。回家路上经过知青住处，他还送了我一条短裤。有一次，他们几个知青抓的田鸡和黄鳝，红烧了半盆，看见我路过，傅又请我吃了一顿。这时，我渐渐觉得知青中还是有好人，也有的和我们一样贫穷，远离父母也实在可怜，坏的只是个别人。为了报答他们对我的好处，特别是送我短裤的恩惠，我悄悄背着母亲把我家喂养的一条骨瘦如柴的母狗送给他们，因为那条母狗常常和我们兄弟争食，经常是我们兄弟未吃饱，母亲却非要给母狗留下一碗。傅知青和其他几个知青来我家牵狗时，我先在狗颈上套一根绳，然后他们用一个长长的木杈撑着狗的头，强行把狗拉走。那狗被牵走时不断哀鸣着回头望着我，眼角还渗出了眼泪，那种充满哀求的眼神让我许多年都感到内疚。为了与狗争食，自己竟然忍心把一条活生生的狗命推上了绝路。这是我一生干过的唯一的一件歹毒的事。

在那个混账的年代，我逐步感到那些知青远离大城市，远离父母，来到我们贫穷的山区，其实很不容易，他们是很可怜的一个群体。

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有一个知青名叫宗腾，与他的女朋友黄泽君是全乡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且品行素养不错，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最融洽。他们落户在原林场所在的黎明大队，住在抱养我弟弟的父母家里，平时劳动表现、政治表现都很好。一次，他们把自己喂养的小山羊牵到喜神乡场卖钱，走到二朗庙遇大雨，正好此时我也走到那里，于是我帮他牵羊，他们在后用一根木条撵，走到乡场上时周身淋湿透了。上街后我帮他们把小山羊卖了三元五角钱，几个知青和我在饭馆里饱餐了一顿，把这笔钱花得所剩无几。这个宗腾最后被推荐为教师，先是在村小、乡小教书，后来到县城教书，最后在80年代中期调

回了重庆。黄泽君被选为村支部副书记，又调到区上任妇联主任，后调县里任妇联主任、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长，后来调重庆渝北区任广播电视局局长。还有一位叫丁玉敏的知青。在知青大批回城时，她留在了县中学教书，后来担任了副县长，主管全县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成就卓著。她们在通江工作期间，为改变通江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办农业、办交通、抓工业、抓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做了不少为老百姓称道的好事，终竟成为通江地方上的历史人物。

七十年代初，城乡到处学唱学演样板戏。一遇节日，还经常举办全公社文艺和农民运动会。每逢这样的时候，知青就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公社和大队就要借助知青的知识文化，男女知青们有的教唱样板戏，有的排演节目和舞蹈，有的参与体育运动。也只有这样的时候，知青们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体现。

一群把青春贡献给山区的人

在知青中，后来招工、升学、调走的有很多人。1978年中央通知没有回城的知青全部安置工作。直到最后一批安置回城，仍然有很多人留在山区。他们虽然历尽曲折和坎坷，也经历了风雨人生的洗礼，但他们热爱大巴山，把毕生贡献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教师，有的成了医生、护士、工程师、建筑师，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有的在山区结婚生子，把根永远扎在了这片贫困而美丽的地方。在通江的知青中，黄泽君、丁玉敏固然是知青中的典范，做了通江县的县长、副县长，用她们的一生，为知青写上了光辉的华章，但也还有默默无闻地把毕生贡献给山区的一大批知青，他们仍然是知青的光荣，是可敬可佩的人。例如六十年代最早到通江上山下乡、至今还在通江的刘道俊，就为通江的茶叶研究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研发的“天岗茶”曾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为此他获得“五一”劳动奖章。还有扎根通江、刻苦自学医术、多年从事公费医疗管理、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先进个人的医保局会计喻德秀大姐；夫妇都是知青、在银行战线工作几十年、做过农行分理处主任、多次荣获银行系统先进个人称号的林素怀；还有在农业战线工作几十年的叶大容大姐；以及饱经曲折坎坷、自学成才的中医师唐启利等。这些重庆知青扎根大巴山，热爱大巴山，都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大巴山，献给了这里的人民。

普通而不平凡的人

为了收集重庆知青留守通江的情况，也带着报社朋友的嘱托，我专门采访了县中医院退休的女中医师唐启利医生。当我在东方医院找到唐医生、说明来意时，她未曾开口早已泪水盈眶。

唐启利于1965年告别美丽的山城重庆，带着新奇和向往，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离别亲人来到通江东北部最边远的云雾山林场落户。云雾山是全县海拔最高的大山，冬天特别寒冷，把衣服晾在房外，一会儿就会冻硬。唐启利和她的知青伙伴脚手都长了冻疮，但还得上山打柴；没有电灯，没有煤油灯，夜晚照明主要靠"松光"（一种带油节的松木肉）；高山不产稻麦，知青主要是吃"包谷糊糊"（即玉米粥）。从林场下山赶场要走四个多小时，上山时要走五个多小时，进县城就是一百多公里路。"文革"期间，山上没有盐，没有蔬菜，生活苦不堪言。他们有家不能回，想父母，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

这里是大山，知青和当地农民一样，从事刀耕火种，粮食以包谷为主。夏天包谷成熟时还要在夜晚轮流睡在半山坡的"窝棚"里守候，防止野兽糟蹋庄稼。有天晚上，三个女知青在"窝棚"守夜。睡到半夜，听到野猪嚎叫，几个人都吓哭了，抱成一团。后来还是唐启利年龄稍大，给另两名女知青壮胆，说"不用怕，野兽怕火"。她点亮火把，在"窝棚"外边舞边吼，野猪才被吓跑了。

1969年林场解散时，唐被分配到泥溪二大队落户。由于舍得吃苦，表现好，当地的干部杨永年、杨继焕等人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她，还让她担任粮食保管员。但由于唐启利家庭出身"不好"，几次推荐招工回城和升学都被卡住，心里非常绝望。1972年乡党委书记、全国劳模李步坤推荐唐启利到了乡医院学习医术，先管西药房，后来学习注射、接生等医术。1975年唐又被派到县卫校学一年，以优异成绩结业。回到乡医院后，她担任一名助产医生，在此期间与在县医药公司工作的吴景新相识并结婚。1981她被调到县城关医院工作。1985年又被派到重庆妇产科医院进修一年，医术得到了全面提高。回院后，她着手组建中医院妇产科室并担任该科主任。多年来经唐医生医治的妇幼病人和产妇没有出过一例医疗事故，在病人中有口皆碑。她后来还考上了医师、主治医师职称。1993年她被县授予"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的称号；1994年被县卫生局授予"白衣天使"称号；她连续16年获得市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的荣誉。2003年退休后，唐大夫又被东方医院聘请为妇产科医师。当东方医院院长问她对报酬的要求时，她说："我不是为了多拿报酬，而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为患者解除痛苦。人民健康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我问唐大夫："你当知青到山区已四十多年，把你的全部青春和一生丢在这块土地上，你后悔吗？"她回答说："我当知青时，亲眼目睹了山区农民的贫困和有病得不到救治的痛苦。能用自己所学的一点浅薄医术为山区人民解除痛苦，我感到自豪，永远也不后悔！"

好一个唐大夫！好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老知青！

作者简介

谷继文，男，汉族，生于1958年2月，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曾担任县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财政学会秘书长、县审计局副局长、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现任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通江县作家协会副主席、1992年出版诗集《初潮》、1995年出版个人诗集《临界钟声》、2006年主编并出版《通江苏维埃志》、《中国共产党通江县历史》、《通江县历史编年记》、《温家宝总理在通江》等地方历史著作。

爸爸和大巴山

邓元姝[1]
罗 燕 译

如果要我脱口说出爸爸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会说他是个"慈爱的爸爸"，或者是"才华横溢但丢三忘四的学者"。稍加思忖之后，我会告诉你他是一个勇于开拓、慷慨大方、意志坚定、雄心勃勃、永不停息的人。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还可以罗列我爸爸的许多细节。例如，他最喜欢的颜色为什么是绿色，他最喜欢的数字为什么是二十等等。说实话，妈妈、我和妹妹常常觉得爸爸身上缺乏学者应有的"优雅"。显然，爸爸身上的那些令人忍俊不禁的习惯，跟他年轻时在农村所经历的那些岁月有密切的关系。

事实上，要全面地描述我爸爸，就不得不说到中国四川省东北边沿上的大巴山，说到大巴山里的万源县。在那里，他生活了 14 年。

爸爸在万源的经历，我是一点一点地了解到的。好多年里，他的那段经历在我脑海里是一堆纷然杂陈的片段和印象。我知道，他曾经在梯田里栽秧挞谷、在学校教学生英语和音乐，甚至创作、编导文艺演出。他扒过行驶中的火车、到处游历；他跟个别的地方干部相处不好，但却和许多人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曾充满活力、乐观奋进，也曾经深深地为可能永远被困在大山里而感到忧郁。

我的困惑多半归咎于爸爸和我自己的忙碌。爸爸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可是却只能偶尔抽出些时间吐出一鳞半爪。每当我因为体力活而叫苦的时候，爸爸就会提起他从前所干的繁重的田间劳动；每当我为了学中文而不高兴时，爸爸就会提起他年轻时闻鸡起舞、苦读英语的经历。黄昏时分，每当我们在林间小路上散步时，爸爸总会叨念他那些忠实的老朋友，还有他搭卡车和火车回重庆所经过的漫长旅程。这些故事让父女俩各得其

所。爸爸偶尔还会提到他头天夜里所做的噩梦，说梦中他又被困在了山里，动弹不得。我不时回味爸爸的那些故事，始终不明白他究竟对万源怀有怎样的感情，是深深的恐惧呢，还是浓浓的乡思？

两年前，爸爸大概觉得是让我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了。为了重拾往日的那段回忆，他带着我回到了万源。我很怀疑自己的一切所见所闻是否完全与爸爸所见到的相同，但那里的农村和人民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灭的印象。爸爸的目的完全达到了，这次旅行帮助我理解爸爸为何对他的过去怀有复杂的感情，也帮助我理解爸爸的过去如何塑造出了他的今天。

我永远忘不了站在大巴山的那一幕。我和爸爸、爸爸的老朋友刘定强叔叔和刘叔叔的儿子刘翼，乘坐一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三菱越野车，一大早从达州市出发，下午两三点钟到达万源县新店乡境内的姚家坪脚下。我们下了车，在耀眼的阳光下走了几里山路，重访爸爸曾经生活过的名叫挂鼓岩的地方。当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在烈日炎炎下跋涉又累又渴之时，突然来到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湾，几层梯田和一排苍翠的柏树前面，坐落着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爸爸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走进院子。听到爸爸的声音，屋里的男女老幼一拥而出，一看是我们，主人们喝三吆四地忙乱起来：端板凳、倒开水、拿毛巾，还给我们端来了新鲜的脆苹果。老人、孩子、猫咪都围坐在我们周围，耐心地等待我们缓过劲儿来（因为暑热和兴奋，爸爸当时的脸色苍白。），然后互相亲切地聊起家常。我生性内向、腼腆，每次面对只说汉语的人时更是不自在，这已经无数次让爸爸感到不悦。但那天下午，不知是因为小院的清凉还是村民真诚好客的缘故，我感觉很轻松。到我们要离去的时候，除了带路的那个人之外，院子里的所有老小都站在台阶口为我们送行，那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这趟爬山对爸爸来说只不过是个热身。离开那个农家之后，我们又去了另一匹叫做青山子的山梁。山腰的一片缓坡就是爸爸当年农场的旧址。上山的路早已湮没在丛生的荆棘中，但爸爸却坚持说他认识路。他拨开树枝，奋力向前，就好像那块地方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我跟在后面集中精力小心自己的步伐，尽量避开荆棘，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退路。

一番不可思议的奋力跋涉之后我们终于走出了荆棘，来到了爸爸魂牵梦绕的青山茶场。当年的土墙房子已经坍塌大半，当年的篮球场也已经种上了玉米和我叫不出名的庄稼。从房子里走出一位老农，爸爸立即跟他打招呼。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居然还能记起爸爸的名字。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记得自己、爸爸和他一起坐在一块特别的大石板上，爸爸和那人亲切地聊天，我坐在向日葵中间，望着山脚，看着美丽的日落。这时候，我忘记了自己的疲惫和周身大汗。当老农离开，只剩下我和爸爸坐在石头上时，爸爸

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当年管我们坐的大石板叫“望乡石”，因为它微微向南倾斜，对着重庆方向。当年他在这里眺望绵绵青山，常常思念自己的老家和爷爷、奶奶。他知道自己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能回到老家重庆。

果不其然，他在大巴山的乡下待了六年半，接着又在位于万源县境内的沙滩镇的万福铁厂待了似乎永无尽头的七年半时间。那个满是灰尘的地方自此便不停地出现在爸爸的梦魇中。我很清楚地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不经意地问爸爸是否害怕恐怖电影里的场面。爸爸说他从来不怕。这使我觉得爸爸很了不起。如今回想，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让他感到恐惧的话，恐怕就只有万福铁厂了。

然而，对爸爸来说，那段要将他困缚而令他日夜不安的记忆，现在应该已经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回顾，因为他居然将万福铁厂的所在地沙滩也纳入了我们的行程之中。那天我们起得很早，乘车到沙滩，爸爸故意在离万福铁厂厂部两三公里的地方下了车，让我步行，一路上指点矿井、高炉，向我诉说往事。

一路上爸爸告诉我，他当年万般无奈时曾想过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女人结婚，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沙滩这个小镇上安居乐业。他的故事让我觉得很难过，倒不仅仅是因为如果他那样做我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还因为想到眼前的学者很可能就此埋没、永无出头之日。整整七年半，爸爸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一个既不能满足他的志向，又不能发挥他的才智的地方。这七年半足够磨灭许多人的雄心壮志。

因为在此之前，我所听到的关于“万福”的故事都是负面的，所以行程一开始我就感到勉强。一想到爸爸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曾经被束缚在一个默默无闻的矿山里，沙滩之行就成了一桩苦差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我所想象的沙滩之行是令人沮丧的，但它却偏偏以其戏剧性成为我们万源之行中最有趣的一段。我和爸爸刚进入小镇的街口，就迎面撞上了他的一个老同事。那人看见我们，放慢了脚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确定不速之客是爸爸后，惊喜万分，握住爸爸的手久久不放。这之后的半天时间里，爸爸遇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熟人，不一会儿，爸爸就成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的一个老同事家里最尊贵的客人。爸爸已经多年未见这些人，但他们在给爸爸递烟和敬酒时丝毫不显得生疏。从爸爸的这位同事家里出来时我心满意足，而且对沙滩和万福铁厂产生了好感。

刚到达沙滩时，由于爸爸曾经是那样希望离开这个深山里的小镇，因此我也想尽早结束在那里的逗留。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前途的地方。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我那天下午遇到爸爸曾教过的两个学生时会有多么惊讶。他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沙滩镇上条件相对好些的一套公寓里。丈夫经营着一家还不错的水泥厂，妻子在家料理家务。两个人很满足地谈论着孩子学业以及他们舒适的生活。从他们

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对沙滩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他们开心地回忆起当爸爸的学生时那些快乐的日子，言谈中流露出对爸爸的感激。

这样看来，爸爸当时想要离开万福铁厂的强烈愿望就肯定有点令人费解。我们自己不喜欢的地方，往往是其他很多人安居乐业的地方，沙滩也并不那么可怕。爸爸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虽然万福铁厂曾经困锁爸爸而使他感到厌恶，但如果说他在那里没有过欢乐也言过其实。在万福铁厂子弟校工作期间，爸爸也影响了许多学生的未来，学生对此念念不忘。在我们往学校走的路上，爸爸指点着路边的一些低矮狭窄的职工宿舍，告诉我某人现在成都工作，还有某夫妇曾在那里住过，等等。当年，爸爸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常常去拜访那些朋友。在万福铁厂爸爸和一些曾经帮助他度过艰难岁月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我们回国时，这些老朋友总是邀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难怪尽管爸爸曾经受困沙滩，仍然坚持回来旧地重游。

大巴山区和万福铁厂都对爸爸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在那里的经历可以解释他今天的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万源的 14 年，包括在沙滩的那些不愉快的时光，其实成就了爸爸。

大巴山区依然是那么质朴，那里的人依然是那么诚恳，一如爸爸当时离开的样子。尽管爸爸当年在这里劳其筋骨，这里的经历归根到底在爸爸的心中留下了美好光明的记忆。有趣的是，直到今天，在地球的另一面，农田、绿野以及辽阔的土地仍然对爸爸有着无穷的魅力。我们家的影集里的许多美国农村的照片就足以证明爸爸的偏好。几年前，我跟爸爸去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小镇上的一年一度的“夏收节”观光，在那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我和爸爸大概是唯一的东方人。

尽管爸爸在我眼里是个第一流的学者，他依然喜欢和“老百姓”聊天，例如，每次我们乘坐出租车，他都会跟司机聊个没完，直到下车“拜拜”。爸爸对此解释说，他在大巴山区的时候，在最简单的农民中遇到过一些最好的人，他也因此很愿意亲近那些依靠诚实、辛勤的劳动而谋生的人。

爸爸比普通人更具冒险精神。他时刻准备冒险涉足不熟悉的领域，这并非因为所谓的“中年危机”，而是因为他在只有 16 岁的时候就离家到了万源，而且为了可以回家，在卡车和火车上干过各种玩儿命的勾当。大巴山区的田间劳动所需的体力塑造了爸爸今天的好身体，让他觉得自己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不是因为爸爸、不是因为他在山区的那些经历，我对世界的了解将会比现在少得多。

就连沙滩这个老让爸爸做噩梦的地方，也铸就了爸爸许多最优秀的品质。爸爸在那些年里成长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教师，学生的成功给爸爸深深的满足。“万福”也是人格的一块试金石，爸爸从那里脱颖而出。当从各方来的信息都在告诉他“知识无用”的时

候，他坚持了自学，并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他终于走出了大山，获得了自由。而正是那个地方所给他带来的持久影响，才使他今天能面对逆境保持泰然自若。爸爸已经从困苦中走了出来，他最终可以不带任何怨恨地亲切地回忆在沙滩度过的那些宝贵时光和那里的善良的人民。

坦白地说，当我们的越野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颠簸行驶，当我坐在车里摇晃折腾时，我觉得万源让我的中国之旅绕了一个大弯。我无法想象十四年对爸爸来说是人生旅途中怎样的一段弯路。显然，爸爸自己也难料想如果没有在万源的经历，他后来的生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今天，他老是忙这忙那，总是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来追回那段蹉跎中度过的岁月。他老早就在计划编写大巴山老知青的回忆录，现在他终于要如愿以偿了。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偶尔我也会想，如果爸爸没有将生命中的那些年头耗在万源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凭他的才干，我相信无论做什么他都会取得成功。然而，我不能肯定，如果爸爸没有在大巴山区劳动过或在万福铁厂教过书，他会比现在更好。我喜欢那段艰苦和欢乐交织的年代所塑造出的爸爸。爸爸是那种可以激发耐心、勇气、慷慨、宽容及坚韧的人。他可以更全面地看待生活。当我感觉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的要求太苛刻、自己负荷太重的时候，我经常会提醒自己：爸爸曾经多次被抛出人生的轨道，但他却恰恰因此获得了更美好的人生。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生，“文革”前老知青邓鹏的长女。

俄罗斯书简

通江黄良

邓鹏：

你好。在重庆你几次提到，希望我能在莫斯科对知青问题作些回忆思考。分别以来虽然俗务繁多，此事一直记在心上。刚安顿，即提笔，不敢稍有怠慢。

“知青”这个词，在汉语系统中有其特殊的历史时代内涵。对应于俄语，可以粗略地译为“青年知识分子”或者“有知识的青年人”。这些译法具有普遍能指性，却失去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上山下乡运动中“知识青年”的特定所指。我用这种译法去问俄国学者，他们也觉得茫然。听我解释之后则表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种“青年知识者到边远贫瘠的地区去建设农村”的大规模运动。

俄罗斯人(年长一些的)也很容易联想到自己国家历史上某些类似的经济开发活动，参与这些边远地区的开发活动的多为青年人。他们印象较深的有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发展开垦，建设者们修建起了若干新的居民聚集地，这些集居地以后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新兴城市，俄罗斯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卡姆萨莫斯基城(共青城)等城市都是那时奠定下的基础。碰巧手边有当时著名的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诗人对这些新城市作了美好的展望：

经过四个
年头，
在这里，
将出现一座花园城市

……

我相信，

城市

将出现；

我相信，

花园里

会盛开鲜花！

(1927年作)

读到这些诗，那内在的激情总会令我想到知青们身上当年的某些激情。要知道，在严寒的远东地区建“鲜花城市”是何等艰难！而无独有偶，我们通江知青中也有首歌唱道：“让大巴山开遍映山红哟……”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前苏联政府认为西伯利亚大片荒芜的土地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于是继续组织年轻人往西伯利亚开垦冻土处女地。

我记起小时曾翻读过家里书架上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是前苏联一位女作家写的《勇敢》。这部小说写了一群各具个性、各有不同经历的年轻人，他们从城市来到陌生的边远地区垦荒，其间演绎出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一位小伙子(主角之一)，瘦瘦的个子，在学校数理化成绩好，好穷根究底钻研，富于想象力，在艰苦的冻土地带森林里，他发明了许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他为人善良、忠厚，最终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小说充满了浪漫想象和那时作品中常见的英雄主义色彩。20世纪70年代前后(包括勃列日涅夫当政期)，俄罗斯东部地区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建设开发，这次活动成果集中在一条新的铁路干线上。这项铁路工程量大，施工环境艰苦，许多年轻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这条铁路同早先修建的莫斯科—海参崴铁路线被称为远东两大铁路干线。

这几批“支边”(此处“支边”一词乃我杜撰)的人群，后来有的留在了新开发的城市和新铁路干线沿线，在当地扎了根；有的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了老家。

虽然我用“支边人群”这个词来勉为其难地称谓前苏联的边疆建设者，但与中国1960—1970年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相比，他们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前苏联的边疆建设重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如修铁路等)；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人口多方面的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学者对此也有他们的见解。一位俄罗斯汉学家说，当时，俄罗斯青年人去开发西伯利亚完全由于热情的驱使；中国的知识青年也有热情，但“文革”时期安排红卫兵们就业实在不容易。言下之意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也有些不得已。显然，俄国的学者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损

失，仍然记得中国的学校纷纷关门、整整一代人失学的历史教训。

回想当年下乡之际，我们多多少少都憋着一股劲，想到艰苦之地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种证明能力的冲动在青年人身上都有。往小处说是为生存，往宏大叙事处说是改变山区一穷二白的面貌乃至惠及普天下穷人的壮举等等。这种豪情背后，其实是某种文化状况。在这点上，我以为中国当时的文化状态同俄罗斯文化似乎还有某种可比之处。在莫斯科，我得以静下心来细读俄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他谈到俄罗斯宗教，谈到东正教对俄国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分析了东正教中的"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先知，弥赛亚意识是一种文化心理情结，其核心是广博的普济救世情怀和对他人乃至人类的苦难的同情和解救之愿，其实也就是"救世主心态"。应该承认，这种对他者的救赎也是某种精神上的自救努力，只是我们下乡时尚不明白这个道理。

别尔嘉耶夫称俄罗斯"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一般说来我们置身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重现实、重现世的文化，并无明显的彼岸关注和强烈的宗教情怀。但在儒家传统的训诫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平天下"同"弥赛亚"两个命题、两种文化情怀，相映成趣。虽然二者在表层都有开阔的人文视野和某些普济天下的内涵，但内在差异又很明显，也很深刻。我想，若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中解读我们当年的"热情"，很可能会得出某些新意的结论。

莫斯科的秋天颇有凉意，阵阵朔风扑面，同时又阳光灿烂。我喜欢在外面走，在阳光下、在凉风中欣赏俄罗斯的秋天那飘零的美。

即叩

教安

黄良　9月25日

匆匆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作者简介

黄良，1965年重庆市南开中学高中毕业，同年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务农。1977年考进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后语

邓 鹏 等

《无声的群落》从启动到今天，六年时间匆匆过去了。在即将告别这--段难忘经历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感到快慰，因为"文革"前老知青这个弱势群体终于通过这本书，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史册上留下了一鳞半爪，他们的诚实的回忆给子孙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历史证词；同时，我又感到一丝悲凉，因为这本书很可能就是这个群体的"天鹅绝唱"了。

我本想对这本书的年轻读者再说几句话，但一番搜肠刮肚之后，发现自己要说的话在这部书的三篇前言和一篇后记里都已说得差不多了。不如邀请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和编辑的朋友，也对您说几句心里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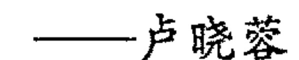
少年情怀、青春磨难、身世之感、家国之恨，都已随岁月飘逝，这段历史却需要我们认真清理并使之成为民族的记忆。还中华民族一个清晰明朗的历史天空应该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谢几何

因为有人企望时间的流逝会使人们遗忘历史，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有必要真实地再现历史，使后人能对前一代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

——章孟杰

一个忘记了自己历史的民族，注定会走向衰亡。愿这“无声的群落”终于发出的声音，在龙的传人心中长鸣！



——卢晓蓉

百万替父母赎罪的青春书写出一页带血的历史;几篇"无悔"的神话推动着一个民族的集体遗忘。老知青的经历和感悟折射出当代中国沉重的步履,《无声的群落》为历史存照,为后人留训。

——何隆华

《无声的群落》以老知青的泪和痛还原再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真实,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作者的思考。

——周国威

一种无边的麻木与冷漠穿越世纪相随我们到了今天。环顾四周,我们看到一个权金之世、娱乐之邦、无忧之国,人们淹没在盛世的灯红酒绿之中。麻木与冷漠又在覆盖着另一个世纪!

作为上个世纪那场浩劫的经历者,在沉重的时代横断面上,我们有权力拒绝遗忘。

拒绝遗忘就是选择真相。拒绝犬儒就是选择尊严。拒绝权势就是选择人性。

透过来自于民间的拒绝与选择,您也许能够洞悉民族的未来。

——郑文斗

精神家园不是生活家园。不知从什么时候算起,我们坍塌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要重建精神家园,就首先要敢于面对废墟和坟茔。

——韩子渝

是否因为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是否因为我们都太快地抛却了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施明

我深信,历史虽然往往会犯一些令人遗憾的过失,但它最后必将回归于公正;我也深信,"上帝无处不在",那些偶尔被他忽略了的事情,到时候他终会睁眼一见。

——廖品涛

雨后的蓝天是最美丽的，蓝天下的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寻求真理、探索知识、追求梦想……。不断地追求与探索，能带给民族兴旺，带给追求者快乐。

——苏谦

虽然我们失去的太多，毕竟我们在有生之年等来了历史的公正，看到了中华民族美好的明天。

——赵永智

规律无情。回流和逆流，都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但是，历史潮流中的那种回流和逆流，却常常左右着某个时期人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的理想化为泡影，使他们的成长道路与生活道路充满困苦与艰辛……

今天，“伟人”、强人创造历史的时代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过去。历史重新由人民创造，而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不过，一个健康、有活力的社会不能没有记忆，也不能不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经验。而这，正是我们这批老知青要追忆并写下自己坎坷的过去的原因。

——谭世通

当历史呼啸而来的时候，我们被裹挟在混浊的激流中尚且难以自救，哪里还能感受到作为人的痛楚？无言的时代，你只能无言，无言的时代规定着你生存的状况。所幸这种日子已经远去，所幸那种远去的历史能够给未来的中国社会一种警示。

——张健夫

当历史嘲弄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嘲弄历史；当社会唾弃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唾弃社会。

——董大南

现在提笔写当年上山，方知道大山有太多让人忘不了的东西。人年少时，其心易发，其情易感，大山以其之厚、之大、之博、之淳，使其心生，使其情种；大山之刚、之高、之野、之容也便融入其一生。一个人如此，一批人如此，一代人如

此，于是，自然之山便立于社会人群了。我想，这便是“仁者乐山”了。

——张诗亚

人的一生恰似大海行船，偶有风平浪静时，更有浊浪滔天日，你要做的就是始终把好自己的舵！

——黄欧平

曾经的苦难铸就了一种只有知青才有的特质，这就是可贵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和影响到他们整个的人生。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我们民族辉煌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希望“知青精神”的精髓得到继承、彰显和发扬。

——赵明和

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苦难构成了人类文明这一辉煌大厦的基础。假如命运安排我成为一块基石，我无言。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推进，必有智者视我为英雄。

——邱放

“知识青年”不应该仅仅是“苦难记忆”的代名词，还应该是反思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孟企平

彻底铲除迫使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社会制度，让祖国的女儿们自由平等地生活。

——王时燕

虚假的历史只会湮没过去，真实的历史可以导引未来。历史不是权贵耳边的谄语，小人物背后亦有大故事。

——邹克纯

撒谎和欺骗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劣行，对于国家来说则是一场瘟疫。用生命呼唤真诚，以事实颠覆谎言。

——李忠公

一群知青的自画像，一部直笔的平民史。潮起潮落人间沧桑，花谢花开笔底波澜。

——徐建成

提笔填补近半个世纪前的空白历史，不给政治谎言以可乘之机，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乃是今天每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对人类文明义不容辞的责任。

——夏先争

历史往矣，记忆犹存。前无古者，后盼来人——助邓鹏先生编撰《无声的群落》有感。

——刘定强

这里记载着的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奋斗和追求、彷徨和颓丧、觉醒和思索。故事里有我们当年的美丽，也有我们的过失甚至丑陋。我们呕心沥血，本想给您展现一个时代，结果只拼凑出一幅残缺的画面。见仁见智，一任后人评说。

历史的进程不是一条直线，它似乎总是进两步，退一步。既然有歌舞升平的盛世，也难免出现民不聊生的乱世。如果您碰巧躬逢前者，那么希望您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如果您不巧遇到后者，那么希望您处变不惊，自强不息。

——邓鹏

为了这本书的问世，许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付出了心血。他们是：杨健、潘婧、岳建一、老鬼、丁东、定宜庄、徐友渔、李焱、邱新睦、李琳芝、许长安、左文河、谭国庆、郭光锴、彭行健、姜魏年、聂浩、刘敏、罗少年、彭剑文、肖先太、彭凯琪、蔡益平、陈石、杨东、丁宁、喻国政、赵守诚、刘锦绣、刘桂云、李庆禄、于众、吴佐忻、赵令如、金光耀、洪汝诠、郭显德、蒲显夫、颜令仪、胡义迁、陈博文、曾碧光、宋良虎、吴希、刘正生、朱登树、周英玉、刘俐、吴学林、徐锦昆、杨义瑶、时建国、罗丰、罗平、向豪、钟钢、刘德忠、王迪、钱英东、刘伯林、胡先慧、黄芳言、吉家定、李飞、岳学柏、张俊贤、蔡渔光、汪佐芬、文崇彦、张璐、赵灿、姚明、汪学雯、李德和、柳玉兰、任正蓉、阎妮娜、马芳群、熊大容、周倩、向继红、马可、吴柏淳、林木、傅琳、曾力为、汤国镛、徐人助、赵怀东、舒莉、范小娟、刘倩、袁丰厚、袁东旭、陈世钰、苏谦、王康、杨新元、邓鲲、许璞、郭定、黎小龙、张益庭、胡嘉、董纪玉、杜玉玲、何致毅、刘名新、龙学益、夏永全、徐安肃、于寿泉、王位琴、周美乐、廖良蓉、牛伯雄、蒋万渝、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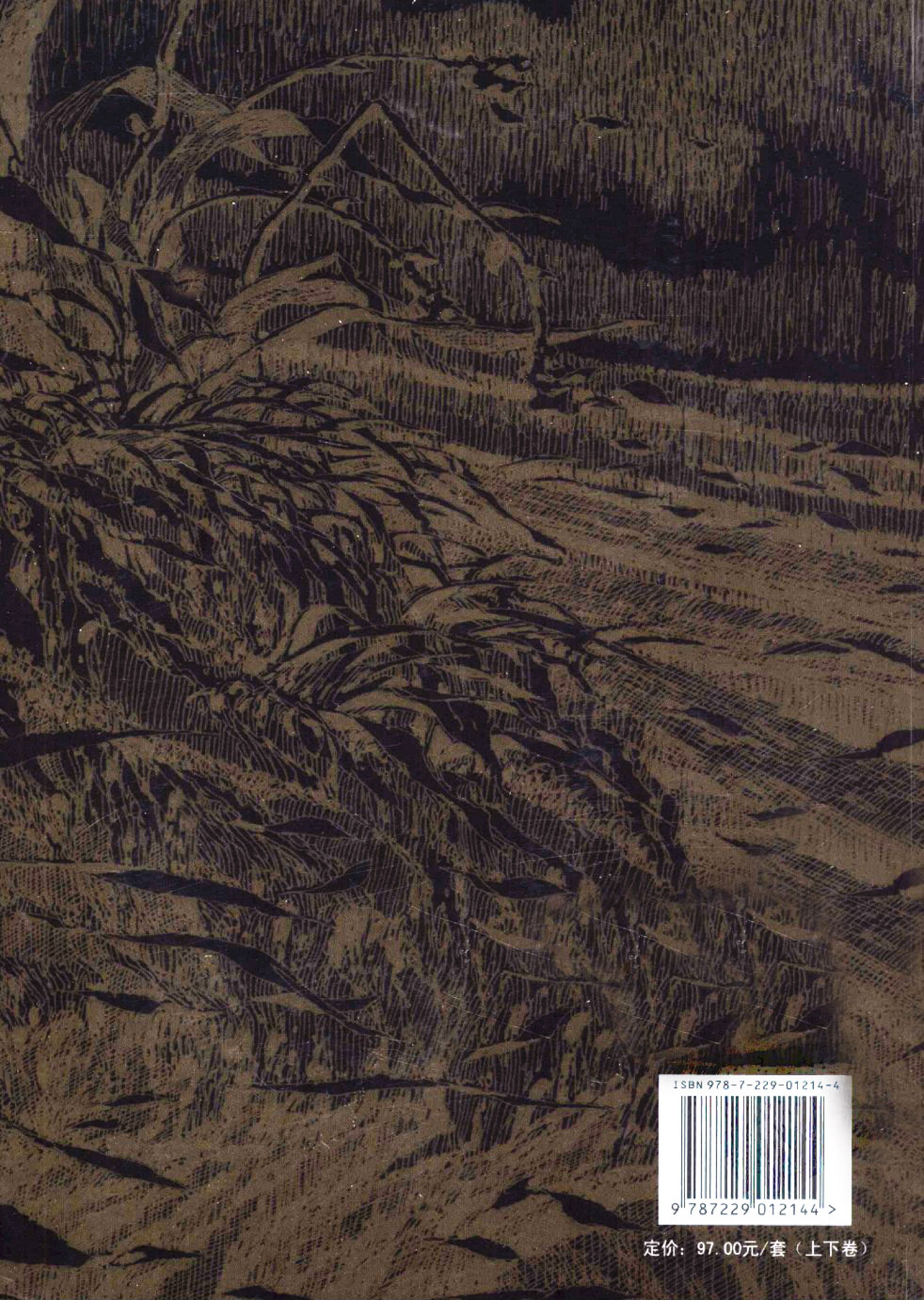
治杰、杨永碧、杨通贵、蒋春林、赵时荣、刘启碧、徐泽和、陈尚愉、刘志强、刘德华、马登科、陈春林、王思明、崔启健、彭圣平、任宗景、肖亨利、王扶、周邦宪、李力、文旭、朱晓峰。

借此书稿即将付印之机，向这些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重庆出版社的朋友罗小卫、刘嘉、陈慧、朱子文、戴前锋及娄春先生。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同仁的理解、支持和提携，就没有《无声的群落》。我们的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古人云：人之相与，贵在知心。六年间跟重庆出版社一帮朋友的交往，足证此言不虚。

插图作者甘铭

甘铭，重庆人。1965年重庆第四十二中初中毕业。同年9月到四川省达县专区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务农。1972年回城，到中国第十八冶金建筑公司当工人。以后离任工长、工程技术负责人，获助理工程师职称。1993年离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从事建筑设计、施工和室内装潢工作。



ISBN 978-7-229-01214-4

9 787229 012144 >

定价：97.00元/套（上下卷）